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S

现代经济学的 历程

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

The Lives and Ideas of the Great Thinkers

[美] 马克·斯考森 著 / 马春文等 译

■ 经济人寻踪，令人惊叹，对主要经济学家和
令人惊讶、最难的，但最精彩的评论。

——《华尔街日报》书评

■ 最佳读物，有启发的读物，文如其人。

——《纽约时报》

商务印书馆

现代经济学的历程（暂名）

导论

告诉你一个秘密。人们以为经济学家都是干燥如尘土 (dry as dust)、阴沉如浓云的人。这是不对的，不是事实。

——保罗·萨缪尔森 (1966: 1408)

现代经济学的历史如此微妙，堪与任何小说情节媲美。其主线是人对财富和繁荣的追求，是对能最好地服务于普通人需要的经济模型的寻找。

主角是亚当·斯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孩子，和他代表的哲学——自我调节的自然自由和竞争制度。我们的主人公在200多年的经济史上经历了无数的胜利和失败。在对手的打击下，有时他已毫无生机。然而，他似乎有很强的生命力，总是能缓过气来。

概述

故事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始于1776年，当时伦敦的出版商印刷了亚当·斯密的里程碑著作——《国富论》，世界各处响起了思想的枪声。随着工业革命和政治自由的爆炸出现并创造了接下来超过200年的财富和经济增长的新时代，斯密的富有感染力的自然自由和看不见的手哲学迅速成为现在经济学的中心角色。启蒙的苏格兰繁荣模型迅速扩散到法国（通过J.-B. 萨伊和巴师夏）、美国（通过托马斯·杰弗逊）和西方世界其余地方。

然而，亚当·斯密的乐观世界几乎立即受到了罗勃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这两位严肃学者的挑战，他们提出了生存工资铁律和工人阶级永久贫困的悲观学说。这些悲观的预测继之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出现，他在乌托邦社群主义达到其光辉的顶点时摇摆与自由和社会主义之间。然后，在19世纪工业革命中期，卡尔·马克思突然带着产业工人的剥削和异化言论登上了舞台，把经济学投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社会主义的崛起成为斯密式资本主义在下一世纪面对的最大挑战。

边际革命

幸运的是，对抗社会工程化黑暗力量的新灯塔的出现。这一“边际”革命给我们的主要角色——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模型——注入了新的生命。它在19世纪70年代初产生于三个源头——奥地利的门格尔、瑞士的瓦尔拉斯和英格兰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欧根·柏姆—巴维克[亦译庞巴维克，但考虑到原文“Bohm-Bawerk”为复姓，故采用现译法，译者注]，门格尔的一位同事，是第一位与马克思较量，并对其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理论做出毁灭性批判的经济学家。通过英格兰的马歇尔、美国的弗兰克·陶西格和欧文·费雪的教科书，斯密的现代经济学模型得到重建。如此复活后，它对不断增长的社会主义思潮作出了有效反击。科学的经济学家长大了。然而，19世纪末是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等大企业和大托拉斯的时代。如索尔斯坦·凡勃伦等制度主义者用其对炫耀性消费和垄断力量的警告打动了愤世嫉俗的人们，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则揭示资本主义的宗教基础和“铁笼”。

凯恩斯与大萧条

但对亚当·斯密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大打击来自1929年的大崩溃和30年代的大萧条。新古典经济学家理解了供给和需求的微妙，却未能掌握“货币关系”——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之间的最重要联系——的奥秘。20世纪初，伟大的耶鲁教授欧文·费雪大胆尝试解决微观和宏观之间缺失的联系，奥地利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最终以瑞典人纳特·维克塞尔的主要著作为基础，在其《货币和信贷理论》一书中架起了二者之间的桥梁。但米塞斯——维克塞尔理论未能获得学者和政要的认可。到30年代初，银行崩溃了，企业破产了，世界各国的政府挣扎着摆脱长达十几年的金融梦魇，而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期盼活命的工资。

谁来拯救资本主义？在捍卫自由放任政策的古典经济学家和要求通过革命推翻旧秩序的马克思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之间界限分明。在全球思想界的冲突中走来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作为救世主的经济学家。这位剑桥大学的教师提出了一种新的、复杂的、以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为基础的模式。这一“新经济学”要求政府干预货币和财政领域以稳定市场经济。然而，与其主要对手马克思主义不同，凯恩斯模型并不

要求国有化或对供给和需求的微观控制。古典的节俭、平衡预算、低税和金本位制模型交给了充分就业时期，而凯恩斯主义对消费需求、赤字财政、累进税和不兑现纸币的处方则在经济衰退和失业时期发挥作用。它被看成是理想的妥协，很快大学教师——他们沉浸在麻省理工学院神童保罗·萨缪尔森的流行新教科书中——便在教授学生奇怪的新工具——乘数、边际消费倾向、节俭悖论、总需求和C+I+G——了。凯恩斯经济学反映了宏观经济理论形成和数学模型化的高潮。

市场经济学的回归

我们的故事的最后一章开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过由芝加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领导的货币主义反革命，经济学开始更加重视政府宏观政策的不稳定性。弗里德曼，更多地依靠经验工作而不是抽象的模型构建，展示了联邦储备——一个政府造物——如何是造成大萧条的罪魁祸首。通过采用稳定的货币政策，亚当·斯密的自调节市场经济能够再度繁荣。芝加哥学派成了向古典经济学回归的驱动力，**他们还主张必须用经验性证据来支持理论**。很快，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学流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挑战了凯恩斯的主导地位。

市场的胜利在苏联经济体系于1990年代初崩溃时达到了成功的顶点。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许多年前就已预言社会主义式的中央计划的失败，现在这一预言应验了。社会主义范式的失败标志着遍及发展中世界的自由贸易、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新时代的出现。

我们的现代经济学股市在此以一个乐观的音符中止，尽管关于在面对金融危机、不确定性和全球化应采取何种经济政策的战斗仍在继续。但这些只是局部的，不是全面的战争。在许多方面，关于现代经济学的最后一章预示着两种范式——自由放任和社会主义干预之间长期战斗的结束，在我们进入一个新千年的时候，斯密的不受拘束的资本主义世界似乎胜出了。

千奇百怪、热情洋溢的生活

然而，我们的故事不仅仅是相互冲突的思想的描述，它也是关于妄想家、学术上的粗制滥造者、少数骗子及执政狂人的令人吃惊的故事。**[执政狂人和学术上的粗制滥造者 (madman in authority和academic scribbler) 是凯恩斯用过的概念，见《通论》(英文版)第383页，译者注]**。经济学家的生活那些最著名人士的生活一样令人激动、不比寻常（甚至有些古怪）。在这本书里，你将读到下列人物的故事。

- 一个在去世前烧了自己衣服，而后又烧了自己的文稿得到的哲学教授。
- 一个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当过苏联秘密特工的剑桥经济学家。
- 一个其收入处在欧洲最高5%水平却仍不断要钱并在股票市场上大肆投资的革命者。
- 一位对人的手相如此着迷以致于保存其同事手相铸模的政府顾问。
- 一位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时失去一切的百万富翁。
- 一个被其管家谋杀的富裕的经济学家。
- 一个要求将其遗体展示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功利主义思想家。
- 一个创造了收入所得税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筹集资金的自有市场的鼓吹者。
- 一个虽然有七个女儿但却将其所有财产给了他唯一儿子的拥有百万家财的经纪人。
- 一个被指控亵渎圣母玛丽亚而在监狱中关了两个月的经济学家。
- 一位三岁时学了希腊文，二十岁时精神一度崩溃的哲学家。
- 一个把自己想象成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非正式顾问的经济学家。
- 一个拥着两个妓女在维也纳街头招摇过市而成为美国经济学学会会长的著名财政部长。
- 一位不使用电话、不收拾床褥、**不刷碗筷**、不洗衣服，对所有学生给同样分数而无视其实际表现的美国经济学家。
- 一位打定主意在其众多著述中不使用任何图表，**在57岁以前还是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的欧洲教授。

欢迎你来到这一奇异的经济学家世界！

为什么研究经济学家的生活，而不是只研究其思想呢？只是因为一位哲学家是一个坏丈夫或一个酒鬼便摒弃其理论是不公平的。我们也许发现卡尔·马克思的生活**应受谴责**，但这就意味着他的异化和剥削理论错误吗？思想必须因其本身的优点而站立，而不是以创立它们的人为基础。然而，我们研究和评判我们的正反主角的行动，不只是为了证明和证伪他们的哲学，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理解他们为什么说那些所说的。

经济思想史通常不是这样教的，本书因而不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老实说，这是

一部不恭不敬、感情用事、有时幽默、对从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开始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为止的著名经济学家的生平和理论经常是固执己见的说明。

为了进一步激发读者对本书的兴趣，我添加了许多杂闻，包括照片、图、加框的解说，甚至还有适合各章的古典音乐选段。

对一部新历史的需要

但本书并不只是一部传记和激进思想的选集。我之所以写这部书，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感到失败。我作为本科生学得最令人失望的课程之一是经济思想史。这门课令人厌烦，教材枯燥乏味，经济学家的生活似乎毫无情趣，即便是最好的学生上完了课也在心里嘀咕经济学家是不是都是疯子。在本章开头引用的保罗·萨缪尔森的话似乎完全不切实际。当然，对经济如何运行，政府应采取什么政策保障繁荣也似乎没有共识。通常情况下，经济学的学生都得面对一大堆思想流派——新古典学派、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奥地利学派、供给学派、制度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没人去验证这些理论的准确性，探讨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方式。简而言之，学生被带入一种无所适从的困境。

大多数学生也许会赞同亚当·斯密这位现代经济学家的创造者，他嘲弄了那些“哄人的课堂”的教授们，他们对经济学只有极有限的知识，总是将一些迂腐、无意义乃至可笑的话。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当他[教授]看到学生大部分不来听课或者来听课的却持明显的轻蔑、嘲弄态度，他一定感到不快”（1965[1776]: 720）。

为什么经济学行业有如此混乱的倾向呢？

根本原因经济学的故事是在传统上是以一种随机的、零散的方式讲述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故事。没有连续的情节，引人入胜的戏剧效果，没有一个主要人物。经济学家被摆放在历史的书页上，配上对其生平和贡献的说明，这就是全部。每个人都是单独地、孤立地站立着。今天的经济学史缺少一根真理的主线，没有一种连续的观点，学生无法了解一个学术的粗制滥造者何时沿着峡谷和狭路前行。

我的方法不同。他是告诉读者一种被称为现代经济学的新科学是如何建立的——因此署名叫做《现代经济学的历程》。这一大厦的建筑师是亚当·斯密。他的工作模型，“自然自由制度”写在《国富论》中。他开始的工作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完备的，时时需要大规模的重建。但其基础是牢固的。

在后面各章，我试图说明每一个重大主题如何添加在了亚当·斯密的现代经济学大厦上或如何被从这一大厦上抽掉了。许多人，如门格尔、马歇尔和弗里德曼都强化了基础，在必要之处进行了改建并扩大了空间。某些人，如凡勃伦和加尔布雷恩是一些愤世嫉俗者，他们退后站着，轻蔑地对正在建设的大厦指指戳戳。另一些人，如凯恩斯、试图在这一大厦建设的中途改弦易辙。最后，还有马克思那样的激进派，打算拆掉这一大厦，从头再来。这些人的攻击迫使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建设者重新考察基本方面，提出新的计划。结果是更新、更好、更顽强的经济学。

在我们即将进入21世纪时，大厦终于接近完工了。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建筑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已经建成的是值得赞美的。世界上几百万人都感受到了新古典经济分析，亚当·斯密建造的房子力量。实际上，经济学影响了如此众多的学科——历史、法律、政治学和金融学，只提到这样几个——以至于批评家不再说它“阴郁”，而说它“帝国主义”（见第十七章）。[卡莱尔曾将经济学称为“阴郁的科学”，现今有些人评论经济学向其他学科的渗透时则使用“经济帝国主义”的说法，译者注]

钟摆和图腾：哪一个更好？

历史上曾有两种方法写经济学家的生平和思想：钟摆和图腾。

在钟摆模型里，历史学家把单个经济学家按一种从极左到极右的政治谱系分类。经济学的历史可能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极端或静止在中间，因人因时而异。从一种目前的经济思想中复制的图A描述了这种钟摆模式。

这种钟摆型方法的问题是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被等量??了；在这种情况下，两个经济学家都被认为处于极端位置。其含义是两种位置都是不合理的。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占据的“温和的”、中间道路的位置似乎更平衡、更理想。一个经历着磨擦的钟摆最终将静止在中间，在两个极端之间。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我喜欢一种大胆的备选方案，我称为从上到下的方法或图腾方法。在印度民俗中，最受拥戴的头人被放在图腾柱的顶端，不那么受人拥戴，但仍很重要的头人放在下面。如果目标是发现哪个经济学家使经济自由最大化，使经济增长（生活水平的上升）最迅速，那个经济学家应被放在图腾柱的最上端。提倡较少的自由，其政策产生了较慢速增长的其他经济学家应放在下面。不再在一个摆或谱系上横向地比较经济学家，我们应根据这一对自

由和增长的量度从上到下地摆列他们。

用这种图腾柱结构，我将重构上图（见图B，第8页）。

亚当·斯密提倡个人和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最大程度的经济自由和最少的宏观经济干预。最接近斯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观点的国家取得了最高的生活水平。其次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支持个人自由，但经常赞成宏观经济干预和投资的国有化。他的大政府方式导致了缓慢尽管是稳定的增长。图腾柱下端的人是卡尔·马克思，他鼓吹命令经济（既在微观也在宏观层次上）。在历史上，中央计划社会主义的政权的经济绩效大大低于市场经济国家。

对本书的观点不会有很多读者不置可否。你也许不会同意我对有关经济学家的排序，但我试图与我的图腾方法保持一致。

近期的传记丰富了经济学的故事

经济学的故事因近期出版的一些优秀的传记大大丰富了。直到最近，传记最多的是卡尔·马克思。实际上，关于马克思的生活的资料是令人激动地，如果不是令人震惊的。甚至还有关于其女儿爱琳娜的完整传记。与此同时，关于亚当·斯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欧文·费雪和其他主要经济学家生活的详细资料却很少见。现在一切都缓慢但却非常确定地发生了变化。新传记开掘很深，研究了私人通信和为出版的手稿，访问了他们仍在世的同时代人。下列是将会长久流传的传记：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凯恩斯传》（1992）、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的《熊彼特传》（1991）、罗伯特·洛林·艾伦的《欧文·费雪传》（1993）[艾伦另有《开门——熊彼特传》（1992），已有中译本，见马春文等译《开门——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彼德·格伦纽维根的《呼啸的鹰》（1995）和威廉·斯塔福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传》（1998）。希望有更多深刻的传记在未来出版。

只是西方经济学吗？

我在教经济学史时，一个罗林斯（Rollins）的学生问：“西方以外没有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正确地注意到西方人在传统上一直主导着甚至垄断着经济思想史。这种偏见有两个理由：首先，重大经济进步和工业革命一起始于西方。第二，西方风格的经济学在20世纪指导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经济思想。在日本、印度或阿根廷拿起任何一部现代经济学史著作，你都会看到斯密、凯恩斯和马克思的重大影响。

非西方经济学也发展了很多年，但几乎都未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与物质进步联系起来。马克思·韦伯在其世界范围的经济学和宗教研究中注意到了这一事实。E·F·舒马赫（1973）在其经久不衰的《小即美》一书中有著名的一章，标题是“佛教经济学”。在许多方面，舒马赫对佛教经济学的赞美说明了未能实现经济繁荣的原因。按舒马赫的说法，传统的佛教徒拒绝劳动节约型机械、流水线生产、大型跨国公司、对外贸易和消费社会（Schumacher 1973:44-51）。

当然也有许多杰出的非西方经济学家，他们的名气随着亚洲的增长而增长。阿马提亚·塞恩（印度）[国内多译为“森”，译者注]和森岛道夫是两个主要代表。罗伯特·尾崎（Robert Ozaki）的《人类资本主义》（1991）解释了西方如何能从东方学会更好的企业——劳动管理关系；但在一部一卷本的著作中，我们必须集中于现代经济学的历程中的主要推动者和破坏者。

我怎么会写这样一本书？

在开始我们的探险之前，我先告诉你一个与本书有关的故事。1980年，我请一位自由放任派的经济学家穆雷·罗斯巴德写一本书替代罗伯特·海尔布伦纳的《世俗事务的哲学家》（1999）海尔布伦纳的简史极受欢迎（已经售了400多万册），写得很好，但其内容和背景却省略过多。海尔布伦纳集中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自由市场学派，亚当·斯密的追随者注意不够，这反映了他的偏见。例如，海尔布伦纳基本上忽略了以萨伊和巴师夏为代表的法国自由放任学派、以欧文·费雪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及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自由市场的鼓吹者殷切希望有一种更平衡的经济学史方法。

罗斯巴德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也接受了一笔诱人的20,000美元预付金。在我们的合同中，我做了几项具体规定：该书应面向大众（包括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像海尔布伦纳的著作一样，它应该有十几章，从亚当·斯密开始，至现代结束。它不应超过300个印刷页。还有，手稿要在一年内完成。

罗斯巴德和我在合同上签了字。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没有完成的手稿，没有300页，没有讲给外行的话语，没有亚当·斯密。罗斯巴德倒是写了，但他不是为大众写一本300页的书，他是在写我们圈子里称为“熊彼特式的巨著”的东西：为专业人士和经济学高年级学生写的几卷本、厚重的经济思想史。在20世纪40年代，熊彼特这位离经叛道的哈佛教授，写了他的大部头的《经济分析史》，到出版时达到了1260页。罗斯巴德的著作从希腊人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缓步走向天主教神父和启蒙运动，最后在第16章终于到达了著名的亚当·斯密。对作为离经叛道经济学家和激进经济史学家的穆雷·罗斯巴德我??钦佩，但这不是当初我们商定的东西。他从未真正完成他的工作。年复一年，在厌倦了询问——“你写到马克思了吗？”——之后，我寄给罗斯巴德约瑟夫·熊彼特1944年在接受《哈佛深红》采访时的一段话：“我的研究项目越来越长，而我的生命越来越短了。我的《经济分析史》迟迟不能完成，而我总是追逐着另外的兔子”（Swedberg, 1991: 167）。它使我想到了罗斯巴德拖起来没完的历史著作。

15年以后（！）的1995年，爱德华·埃尔加（出版商而不是作家）出版了他的经济学史的前两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566页）和《古典经济学》（528页）。罗斯巴德的第二卷以论马克思的各章结束。我从研究罗斯巴德令人激动的经常是批判性的评论中获得了乐趣，我同意他写的大部分的东西（但他对亚当·斯密的否定评论是例外）。然而，他一直没有完成这项工作。

我经常对朋友谈起罗斯巴德在写一部熊彼特式的巨著，这也意味着他可能在完成这一著作之前去世，它用的时间太久了。在熊彼特于1950年去世后，熊彼特痴情的妻子伊丽莎白试图将几近完成的手稿编辑出版，却也在完成这一任务之前去世，手稿由他们的哈佛同事整理出版了。

令人痛心的是我不幸而言中，1995年1月，罗斯巴德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与纽约市，终年65岁，仅仅几个星期后，他的两卷本著作便付印了。他从未有机会着手他计划的另外两卷。

我写《现代经济学的历程》一书的动机之一是出版某种我请罗斯巴德写的东西。现在，在20年之后，我完成了这项工作。

第一章 第一人亚当

本章音乐选段：艾伦·科普兰, (Aaron Copland)，《平民之父》“Father for Common Man”

亚当·斯密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和革命者——就像我们时代鼓吹自由放任的人一样。

——米尔顿·弗里德曼 (Glahe 1978: 7)

现代经济学的故事始于1776年。

在这个著名的日子之前，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6000年历史上，出版的重要著作中没有一部是关于谋生——这实际上是每个人在醒着时的每一刻都牵肠挂肚的问题的。

几世纪、几千年，从罗马时代经黑暗时代到文艺复兴，人们辛苦劳作，为生存而斗争，但经常只是勉强糊口。他不断地防范着夭折、疾病、饥饿、战争和活命工资。只有走运的少数——主要是统治者和贵族——过着一种闲适的生活。对普通人来说，几百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人均工资年复一年，几十年如一日地没有变化。在18世纪，当时平均寿命只有40岁，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正确地称人的生活“孤独、贫穷、肮脏、兽性、短暂” (1996[1651]: 84)。

1776，一个预言家的年代

然后就到了1776年，希望和日益光明的前景第一次波及了普通劳动人民。这是一个被称为“启蒙”的时代，法国人称为l' age des lumières [法语，大意为“光明时代”]。有史以来第一次，劳动者有了获得最基本的衣食住条件的可能。就连茶，过去的一种奢侈品，也成了普遍饮料。

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只是1776年几桩重大事件之一。托马斯·杰弗逊模仿着约翰·洛克宣称“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一个正在奋斗的民族（它最中要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经济力量）建立了法律框架，并为自由建立了宪法基础（它很快便被世界各国所模仿）。

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出现了

四个月之前，在大西洋另一侧的英格兰，一部具有同样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出版了。1776年3月9日，伦敦出版商威廉·斯特拉汉和托马斯·卡德尔发行了一部题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一千页两卷本著作。这是一部书名很长的厚重著作，并注定了要产生巨大的全球性的影响。作者是亚当·斯密博士，一个在格拉斯哥大学教“道德哲学”的安静的心不在焉的教授。

《国富论》是响彻世界各地的思想枪声。亚当·斯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后裔，将一种或的繁荣和金融独立的通用公式付诸文字，它在下一个世纪中，使民众和领袖思考和实践经济学和商业的方式发生了革命。它的出版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一个大量财富的世界，而财富不仅仅只是金银。它创造了一个每个人的，不仅仅是商人和统治者的，而且也是普通人的新世界。《国富论》提出了一种使劳动者从霍布斯世界的苦难中解放出来的公式。概括地说，《国富论》是经济独立的宣言。

在人类历史上，某些日子是转折点。1776年是这些日子之一。在这个预言家的年代，两种最重要的自由——政治自由和自由企业——被宣布了，二者合起来启动了工业革命。现代经济在1776年后不久便正式展开不是偶然的（见图1.1）。

启蒙运动的重要性

1776年之所以重要，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例如爱德华·吉本的经典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88）第一卷也在这一年出现。吉本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主要提倡者之一，启蒙运动体现了对科学、理性和经济个人主义的无限的信任，它们替代了宗教狂热、迷信和贵族势力。

对斯密来说，1776年因为个人的原因也是重要的。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大卫·休谟于这一年去世。休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哲学家，对亚当·斯密影响很大（见本章附录“斯密前的经济学家”）。向斯密一样，他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袖，一个商业文明和经济自由的倡导者。

经济进步的雷声

几个世纪以来，平均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一直停滞着。近10亿人民与日常生活的残酷现实进行斗争。突然，在19世纪初，美国革命和《国富论》出版数年后，西方世界开始空间繁荣。纺纱机、动力织布机和蒸汽机是位企业家和普通人节约时间和金钱的许多发明的最初几种。工业革命开始展开，实际工资开始增长，不论贫富，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开始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的确是启蒙，是现代的曙光，各界人士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为普通人呐喊

正如乔治·华盛顿是一个新国家的父亲，亚当·斯密市一门新科学——财富科学的父亲。

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称经济学是研究“普通生活事务”的科学。亚当·斯密也适当地有一个普通名字。他是按圣经中得以第一个人“亚当”，意为“出于众多”，取名的，而他的姓“斯密”则表示“工作者”。斯密是英国最常见的姓。实际上，亚当·斯密的父亲也叫亚当·斯密，他的监护人和表兄也是如此。

行人亚当·斯密为普通劳动者的福利写了一本书。在他的代表作中，他向读者保证他的经济成功模型将导致“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1965[1776]:11）。

它不是为民族和国家写的书。实际上，亚当·斯密对既得利益者和商业势力鲜有尊重。他的同情放在普通人一边，他们在几百年中，屡受虐待、屡受压迫。现在他们将被从每天16小时的工作、活命工资和40年的寿命中解放出来。

亚当·斯密面对着一个主要障碍

在花了12年时间写他的大部头著作之后，斯密确信他找到了创造“普通富裕”的正确的“经济学”。他称其模型为“自然自由制度”。今天，经济学家称之为“古典模型”。斯密的模型受到了伊萨克·牛顿爵士的启发，斯密及推崇牛顿的自然科学模型，认为它是普遍、和谐的。

他的最大的困难是说服其他人特别是立法者相信他的体系。他写《国富论》的目的不是教育，而是劝说。几百年来，因为盘踞着所谓重商主义体系，英国和欧洲几乎没取得任何进步。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粉碎支配着当时商业利益集团和政府势力的重商主义观点，用财富和经济增长的实际来源取代它们，引导英格兰和世界各国走向普通人命运的“最巨大的改善”。

重商主义的呼声

重商主义者相信世界经济是停滞的，财富是固定的，因此一个国家只能以牺牲另一国家为代价而增长。结果，他们在国内建立了政府授权的垄断并支持对外殖民主义，派遣特务和军队去贫穷国家抢掠黄金和其他贵金属。

按照现有的重商主义体系，财富完全由货币构成，在当时货币就是金银。每个国家的首要目标都是积极积累金银，并为此采取任何必要手段。斯密在《国富论》中宣称“我们总会发现，获取货币是一件要事。”（1965：398）

如何获得更多的货币？首先，如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派遣使节到远方寻找金矿，尽可能地堆积贵金属。渴求金银使任何远征和对外战争的代价都可以接受了。其他欧洲国家，模仿着寻找黄金者，经常对交换实行控制，在严酷惩罚的威胁下，禁止金银输出。

第二，重商主义者寻求贸易出超，这意味着金银将不断进入他们的国库。如何？斯密报告说：“鼓励出口，打击进口是重商主义提出的富国的两大招术。”（607页）斯密小心地解释了意图限制贸易、生产并最终达到较高生活水平的种种办法。这些商业上的干扰自然而然地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斯密斥责贸易壁垒

一次，在对重商主义体系的直接攻击中，这位苏格兰哲学家斥责了高关税和对贸易的其他限制。增加出超的努力使“荒唐可笑的”，他说（456页）。他谈到了一个国家生产产品时对另一个国家的“自然优势”。“通过斩玻璃、设温床、建温壁，苏格兰也能栽种极好的葡萄，”斯密说，但生产苏格兰葡萄酒的成本降生从法国进口的30倍，“单单为了要鼓励苏格兰酿造波尔多和布岗迪葡萄酒，便以法律禁止一切外国葡萄酒输入，这难道是合理的吗？”（425页）。

按斯密的说法，重商主义政策只是模仿真正的繁荣，只对生产者和垄断者有利。由于它未能给消费者带来好处，重商主义是反增长、目光短浅的。“但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625页）。

斯密认为贸易壁垒对两个国家的生产能力都是损害，因此必须拆解。例如，通过扩大

英法之间的贸易，两个国家都能过的好处。斯密宣称，“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制造的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向他们购买”（424页）。

揭示财富的真正来源

金银的积累也许填满了富人和有权势者的腰包，但对整个国家和普通人来说，财富的源泉在于何处呢？这是亚当·斯密最大的问题。《国富论》不只是一部论自由贸易的著作，而且是一种繁荣的世界观。

这位苏格兰教授有力地论证了不是以牺牲其它国家利益为代价获得金银，而是生产和交换是“国民财富”的关键。他说：“一个国家的财富，不仅在于金银，而且在于它的土地、房屋和各种消费的物品。”（418页）财富应当按照人们衣食住的状况来衡量。1763年，他说：“一个国家的财富在于生活所必需和使生活便利的物品的便宜”（1982[1763]：83）。

在《国富论》中，斯密从讨论财富开始。他问，什么能带来“劳动的生产能力的巨大改进”？出超？更多的金银？

不是，是更好的管理技术——“劳动分工”。在一个著名的例子中，斯密详细描述了一个针厂的运行，为了使针的产量最大化，工人在这个工厂中被分配了18种不同的操作（1965：第3-5页）。并且，市场通过全球贸易的扩大意味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能够**加强**。通过提高的生产率、节俭和努力工作，世界产量将会增加。因此，财富不是固定的数量，一些国家的增长能够不损害其他国家。

斯密发现了繁荣的钥匙

如何使生产和交换最大化，并因而鼓励“普通富裕”，改进“劳动生产能力”呢？

亚当·斯密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给人们经济自由！斯密在《国富论》中，通篇都在倡导“天赋自由”原理，做人们想做的，不受国家干扰。它意味着劳动、资本、货币和产品自由流动。并且，斯密说，经济自由不仅导致更好的物质生活，而且是人的基本权利。用斯密的话来说：“禁止人民大众制造他们所能制造的全部物品，禁止他们按自己的判断，把自己的资财与劳动投在资及认为最有利的用途上，这显然是侵犯了最神圣的人权”（第549页）。

这里有一些东西能抓住英国工人——不仅是英国工人，还有法国农民、德国劳动者、中国的散工和美国的移民——的想象力和希望，斯密是在倡导一种普遍的富裕原理。工作自由能使每一个人从日常杂务中解放出来。

这种新的经济自由包括哪些内容呢？根据亚当·斯密的论述，它包括从任意地方购买物品，包括国外产品，的权利，不受关税和进口限额的限制。它包括在一个人想去的地方、想去的行业就业的权利。斯密犀利地批判了在十八世纪欧洲，甚至在一国内，劳动者必须获得政府许可（通过证书）才能从一镇进入另一镇的政策（第118-43页）。

天赋自由还包括要求市场能够承担的任何工资的权利。斯密强烈反对国家管制和人为提高工资的努力。他写道：“无论什么时候，要是法律企图规定工资，其结果总是使工资降低，而不是使之提高”（第131页）。像每个工人一样，斯密渴望高工资，但他认为高工资迎来自劳动力市场的自然运行，而不是政府法令。

最后，天赋自由还包括不受政府限制而进行储蓄、投资和积累资本的权利——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亚当·斯密“皇冠上的明珠”

乔治·斯蒂格勒称斯密的竞争性的自由企业模型是《国富论》“皇冠上的明珠”，是“全部经济学最重要、最有实质意义的命题。”他说：“斯密取得了一个压倒一切的重要胜利：他将对在竞争条件下追求其自我利益的个人行为/system分析放在了经济学的中心”（Stigler 1976：1201）。概括地说，一个允许男男女女在“天赋自由”和竞争条件下追求体自我利益的经济体系将是一个自我调节、高度繁荣的经济。消除对进口、劳动和价格的限制意味着通过低价格、高工资和更好的产品而实现最大程度的普通繁荣。

斯密的经典著作获得了举世承认

亚当·斯密对天赋自由的精彩倡导燃烧了不断崛起的一代心灵。他的言词改变了政治进程，颠覆了旧有的重商主义保护学说和人类的枷锁。世界自由贸易的大部分运动要归功于亚当·斯密的工作。《国富论》是伴随工业革命和人的政治权利的理想文献。

斯密的巨著受到了举世喝彩。H·L·门肯说：“在英语中没有哪一本书比他有更大的影响”（Powell 2000：251）。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声称：“《国富论》和蒸汽机毁灭了旧世界，建立了新世界”（Roshid 1998：212）。英国史学家亨利·托马斯·巴克尔

进一步夸张地说，就其最终的影响来看，斯密的大作也许是包括《圣经》在内的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Rogge 1976: 9）。保罗·A·萨缪尔森将斯密置于经济学之“巅峰”（Samuelson 1962: 7）。就连马克思，有时候也会由衷赞美亚当·斯密。

你是否愿意花45000美元买《国富论》的初版？

一位收藏家在1989年11月花了4万5千美元买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版。1776年的原定价是36先令。收藏家支付溢价因为这一套是没有拆封的，被拍卖人评为“最好的一套”。一套用过的但保存得较好的复本今天能买到5万到7万美元。自从200多年前，这部著名作品出版以来，其价格一直稳步上升，最近突然暴涨，按照稀有书籍收藏家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的说法。

毫无疑问，斯密1776年版本的大部头作品是稀有的。只印刷了1000套，每年拍卖会上能见到少数几套。原始出版商是Strahan and Cadell，他们在那之前一个月还出版了吉本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是全名——在1776年3月9日出版，两卷的精装皮面四开本。Strahan花了500磅向斯密买下了第一版的版权。

这部作品马上就成了畅销书，特别是在斯密的朋友大卫·休谟的宣传下。（“Euge! 优美！我对你的表现太满意了，”他在给斯密的信中说。）6个月之后，《国富论》就售罄了，但直到1778年才重印。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和其他语种的版本纷纷出版。第一个美国版本在1789年出版于费城。但这些版本的定价都没有超过第一版，后来的四个版本（三卷八开本）没有在亚当·斯密的有生之年出版。

购买第一版还是一桩好买卖么？购买第一版所需的大笔金钱显然不是普通收藏家能接受的，更别说普通经济学者了。在古本收藏书商之间有传言说，有一两个投机家（当然是对这部作品本身毫不欣赏的非经济学者）有时在市场上囤积居奇。过去，日本人大量购买第一版。由于第一版数量有限，价格当然会高踞不下，令多数书迷可望而不可及。

每一位称职的经济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都应该阅读这部伟大的经典著作。你应该读那个版本呢？因为版权已经到期，所以许多出版商都推出了自己的版本，包括：格拉斯哥大学、芝加哥大学、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自由出版社（Liberty Press）。我个人最喜欢由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编辑，1937年（1994年最新重印）的Modern Library版本。

《国富论》包含了圣经般的信息量，于是科罗拉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佛莱德·Glahe（Fred R. Glahe）在1993年为它作了完整的词语索引。你知道吗，在《国富论》中，“a”这个词出现了6691次。噢，这真是电脑带来奇迹呀！毫无疑问，词语索引很有价值，尤其是对于学者来说。例如，“需求”出现了269次，而“供给”只出现了144次。凯恩斯该满意了。

要用词语索引的话，你需要看格拉斯哥大学的版本，在多数大学的图书馆都可以借到。

斯密找出了三个成分

斯密从财富和繁荣如何通过市场资本主义被创造出来的讨论开始他的伟大著作。他强调了这一自我调节体系或古典模型的三个特点：

1. 自由：生产和交换产品、劳动和资本的权利。
2. 自我利益：做自己的事并利用别人自我利益的权利。
3. 竞争：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交换中竞争的权利。

看不见的手的好处

斯密认为这三个成分将导向工人、地主和资本家之间利益的“自然和谐”。几百万个人的资源的自我利益将创造一个稳定、繁荣社会，无需国家的中心指令。其开明的自我利益学说经常被称为“看不见的手”。从《国富论》中一两段著名的话：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1965: 14）

每个……使用资本和劳动……的个人……既不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在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1965: 423）。

斯密宽恕自私和贪婪吗？

批评者担心苏格兰自由蓝图也将给贪婪和欺诈甚至“还有社会动乱、生态破坏和权力滥用”开绿灯（Lux 1990）。《国富论》难道不是对自私贪婪和虚荣的堂而皇之的赞同吗？亚当·斯密怎么能无视贪得无厌资本家的比比皆是的欺骗、欺诈、欺负顾客，以牺牲

大众利益为代价追求自我利益的情形呢？

答案在亚当·斯密的天赋自由体系中是显而易见的。引用斯密的话：“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的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1965：14）。换句话说，所有合法的交换必须对买卖双方都有好处，不是一方获利另一方就一定受害。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只有在商人有开明的长期竞争的观点时，即认识到名声和重复交易的价值时才能够起作用。简言之，自我利益只有在生产者对客户利益做出反应时才会促进社会利益。当客户被欺骗或欺诈时，在市场上这种事件经常发生，自我利益的成功是以社会福利为代价的。

实际上，斯密的理想社会总是与阻止不公正和欺骗性业务做法的德性、互惠和民法结合在一起的。斯密的“公正无私的旁观者”反映了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裁判（Smith 1976[1759]：215 散见）。他的经济人是合作的、公平的，不伤害他人。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和法律体系将促进经济增长。斯密支持培育自我控制、自我约束和仁慈的社会制度——市场、宗教共同体和法律（Muller 1993：2）。毕竟，亚当·斯密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还是一个道德哲学教授。

斯密的模型反映了这一基本特点：“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1965：651，着重号系后加）。

亚当·斯密难题：同情与自我利益

在其1759年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写道，“同情”是仁慈的、繁荣的社会的推动力。在他后来的著作《国富论》中，“自我利益”成了主要动力。德国哲学家称这一明显的矛盾为“亚当·斯密难题”，但斯密自己不认为二者之间有什么冲突。他把他的两部著作看成是互相补充的，是自由社会的系统的世界观。斯密相信每个人都有被他人接受的基本欲望。为获得同情，人们将按能获得尊重和爱慕的方式行动。在经济生活中，这意味着开明的自我利益，在其中买卖双方在交易中互利。并且，斯密争论说，经济进步和剩余财富是同情和慈善的先决条件。简言之，斯密意欲将经济学和道德行为结合在一起（Fitzgibbons 1995：3-4；Tvede 1997:29）。

这位苏格兰哲学家相信人既受自我利益推动，也由仁慈推动。但在一个复杂的市场经济中，个人远离了他们最亲密的朋友和家庭，自我利益成了更强大的力量。按罗纳德·科斯的阐释，“市场的最大优势是它能利用自我利益的力量弥补人次的微弱和偏宠，使那些不为人们所知、缺少魅力、地位低微之人的需要得以满足”（Coase 1976：544）。

斯密并不赞同不受羁绊的贪婪，他赞成自我约束。的确，他坚定地相信自由的商业社会淡化了激情，阻止一个持异见者进入“霍布斯丛林”，这是孟德斯鸠以及后来的纳索·西尼尔强调的主题（见本章附录“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他教导说，商业鼓励人们称为有教养的、勤俭的和自律的人，并拖延满足。“使他不敢欺诈懈怠的”，正是对失去客户的恐惧（1965：129）。

垄断如何损害市场体系

斯密说，在一个自我调节的社会中，为了将自我利益转变为仁慈，竞争是绝对必需的。他偏爱较便宜的“自然价格，或自由竞争的价格”，而不是垄断势力或赋予某些公司和贸易公司（如东印度公司）“专有特权”带来的较高价格。斯密激烈地反对享有特权的商人习以为常的“卑鄙的贪婪”和“卑劣的独占精神”（1965：428）。竞争意味着较低的价格，意味着有更多的钱购买其他商品，进而意味着更多的工作和更高的生活水平。

根据亚当·斯密，垄断势力创造了以奉承、溜须拍马和虚伪为特征的政治社会（Muller 1993：135）。垄断带来了迅速、容易获得的利润和浪费的消费（Smith 1965：578）。

虽然信仰市场，但斯密决不是商人和特殊利益集团的辩护士。在他的一段著名的话中，他抱怨说：“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1965：128）。他的目标是说服立法者，抵制对商人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采取行动促进共同利益。

最新发展(更新?)1: 自由经济更加富裕

如果亚当·斯密今天还活着，他无疑会将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归功于一种自由民主资本主义。

一项由詹姆士·格沃特尼、罗伯特·A·劳森和沃尔特·E·布洛克（1996）所作的研究似乎证实了斯密的观点：经济自由和繁荣密切相关。这三位经济学家花大气力构造了一种指数，衡量100多个国家的经济自由程度，并将1975至1995年的经济自由水平与其增长

率进行比较。其结论可见图1.2

按这项研究，自由度越大，用人均实际GDP计算的生活水平越高。自由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新西兰、香港）增长比中等自由度国家（例如英国、加拿大、德国）增长快，**而比**自由度极小的国家（例如委内瑞拉、伊朗、刚果）增长更快。

他们得出结论：在过去20年中，没有哪一个经济自由度持续处于高水平的国家未达到高收入水平（1996： xvii）。

那些在过去20年中改变了政策的国家如何呢？作者认为，“所有17个改善最大的国家都有正的增长率……相反，在1975-95年间经济自由下降的国家的增长率持续为负数”（1996： xvii）。

最新发展（更新）2：穷人从资本主义得到了好处

亚当·斯密还认为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从一种自由经济体系得到了好处。他声称，“普遍富裕……扩展到了最底层的民众”（1965： 11）。

斯坦利·莱伯格特和迈克尔·考克斯近日的统计工作证明了斯密的这一观点并质疑人们通常持有的批评——在自由市场中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根据莱伯格特（1976）和考克斯（1999）近期的研究，穷者也变得富裕了。

斯坦利·莱伯格特，卫斯理安大学的退休教授研究了事物、衣服、住房、燃料、家务、运输、健康、娱乐和宗教等单个消费品市场。

例如，他给出了表1.1中的统计数字，说明1900年到1970年生活水平的改善。

拥有下列设施的居民户的百分比	1900年占全部家庭的百分比	1970年占贫穷家庭的百分比
有抽水设施的厕所	15%	99%
自来水	24	92
中心供暖	1	58
每个房间一个人（或更少）	48	96
电力	3	99
冰箱	18	99
汽车	1	41

表1.1 美国人生活水平， 1900-70；来源：莱伯格特Lebergott(1976:8)。

如莱伯格特的表所示，在20世纪，所有阶级，包括最低阶层，生活水平都有大幅度的提高。他证明了安德鲁·卡耐基的说法：“资本主义把奢侈品变成必需品。”通过企业家、工人和资本家的竞争努力，实际上所有美国消费者已经能把一个不确定的经常是残酷的世界变成一个更令人愉快、更方便的生活和工作场所。1900年一个典型的居民户没有中心供暖，没有电、冰箱、抽水马桶，甚至没有自来水。今天，甚至大部分穷人都可以享用这些产品和服务了。

另一项由迈克尔·考克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和理查德·奥姆（《达拉斯晨报》的商务作者）所作的近期研究得出结论：住房、食物、汽油、电、电话服务、家用电器、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实际价格在20世纪都显著下降。两位研究者也说明美国穷人的经济生活逐渐有了改善。更多的穷人有了住房、汽车和其他消费品，就连最穷的居民户也有了电视（Cox and Alm 1999）。

最新发展（更新）3：宗教竞争是有益的

亚当·斯密市对所有行业不只是工商业竞争的最坚定的信仰者，他赞成教育竞争、医疗竞争，甚至宗教竞争。他反对任何国家宗教，它们鼓励不容忍和狂热。而另一方面，天赋自由赞成许多小教派，这些小教派进而可以使追随者产生兴趣。“在小教派中，普通人民的道德，几乎常是特别有规则有秩序的，**一般都比在国家建好的教堂里要严肃的多**”（1965： 747-8）。

在这一问题上，斯密不同意他的朋友大卫·休谟的观点。休谟仇视一切宗教，因此赞成一种非竞争性的国教，正因为它将打击宗教追随者的热情，保持政治秩序。斯密相反，认为如果宗教信仰和组织是自由、开放的，宗教就是有益的。他赞成“许许多多的教派”，它将减少热情和狂热，促进宽容、温和和理性宗教（1965： 744-45）。斯密在自己的一生中，秘密地做过许多慈善工作，并曾帮助一个年轻盲人准备学术事业（Sowell 1993:220; Fitzgibbons 1995:138）。

劳伦斯·伊恩纳考恩（圣克拉拉大学）检验了斯密论宗教自由的假说，比较了1968到

1976年间各新教和天主教国家教会参与人数和宗教垄断程度的关系（伊恩纳考恩 Iannaccone, 1991:156-77; West 1990:151-64）。图1.3 表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伊恩纳考恩的检验产生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果：在新教国家，教会活动参加率与教会集中程度成反比。在自由竞争国家，教会活动参加率高，而在一个单一的新教教会垄断的情况下，教会活动参加率低。（然而，要注意在天主教国家，垄断对教会活动参加率没有显著影响。）

谁是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是谁？他怎么会写出他革命性的现代经济学著作？

海港和商业是亚当·斯密生活的组成部分。他于1723年6月生于爱丁堡附近苏格兰东海岸的柯科迪，他一出生就有不行的名声，在他出生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似乎刚出生的亚当·斯密注定要成为一个贸易学者和海关官员。他的父亲，也叫亚当·斯密是柯科迪的一个海关审计员。他的监护人，还是叫亚当·斯密是同一城市的海关收账员。他的一位表兄是阿洛亚海关的检察员。他的名字——信不信由你，也叫亚当·斯密。

毫不奇怪，我们的亚当·斯密（著名的）的最后职业是苏格兰海关关长，但这是后话。

在其早年在柯科迪的日子，斯密被认为是一个“脆弱的孩子”。4岁时被吉普赛人绑架但很快便回到了母亲身边。传记作家约翰·雷评论说“他本来会成为成为一个贫困的吉普赛人”（1895：5）。他的感情焦点一直是他深爱的母亲。

虽然这位苏格兰教授有很多异性熟人，他却从未接过婚。“他说话很严厉。牙很大，丑如鬼怪”，法国一位小说家里克博尼夫人在1766年5月第一次在巴黎见到斯密后这样写道。她后来写道，“他是最心不在焉的人，但也是最可爱的人之一”（Muller 1993:16）。我们对他的爱情经历了解很少。从他的传记中我们知道，斯密年轻时爱过一位漂亮的有成就的女士，但不为人所知的境遇阻止了他们的婚姻（Ross 1995:402）。几位法国女士追求这个不帅的学者，但也都没有什么结果。（由于他生命结束时的一宗事件，他的私生活仍有些神秘，详见30-31页加框文字）。

尽管大卫·休谟经常责骂斯密太不合群，但斯密加入了几个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活动占据了她的剩余时间，如Poker（扑克牌）俱乐部、爱丁堡俱乐部、伦敦“学者”俱乐部、约翰逊俱乐部。“母亲、朋友和书——这是斯密的三大快乐”，约翰·雷说（1895：327）。

在14岁时，斯密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然后获得了牛津大学奖学金，在那儿他花了6年的时间研究希腊和拉丁文经典、法国和英国文学以及科学和哲学。后来他在写《国富论》时谈到牛津大学，“最近许多年来，牛津大学一大部分教授，简直连表面上装作教师，也不装了”（Smith 1965：718）。

就其外貌而言，斯密中等个子，稍稍偏重。他从未照过像，但有几幅速写表现了他“很清秀的脸，饱满的额头，突出的眼睛，曲线优雅的眉毛，有点鹰钩的鼻子，坚毅的嘴和下巴”（Rae 1895:438）。他自己说，“我只是我的书的情人”（Rae 1895:329）

毕业后，1751-1763年，他去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道德哲学教授。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出版于1759年，奠定了亚当·斯密作为一位有影响的苏格兰思想家的地位。

斯蒂格勒教授警告学生不要阅读《国富论》的这一段

我热切地推荐这本书，但不要读第720页。

——乔治·斯蒂格勒（1966：168n）

芝加哥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J·斯蒂格勒（1911-91）的冷嘲十分出名。他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书迷，他推荐这部著作的全部，但第720页例外。

第720页写了什么？查一查《国富论》的“现代书库”版（对其他版本，见第五篇第一章第三节，第二项）。

斯蒂格勒教授在《国富论》中发现了什么恼人的话呢？是亚当·斯密对大学教授的指责！

以下是斯密对“青年人教育”和“哄人的教学（是否要和导言中的统一，译为课堂？）”的精彩论述：

如果教师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当他自己意识到，他向学生讲的，都是一些无意义或近似无意义的话，他一定会感到不快。此外，当他看到学生大部分对于他的授课，不来听讲，或来听讲而明显

地表示轻蔑、嘲弄态度，他也一定会感到不快……

大学的校规，大体上不是为了学生的利益，而是为了教师的利益，更恰当地说是位教师的安逸而设计出来的。

显然，亚当·斯密的话也适用于今日！

注意这个“荒唐的”英国习俗

但在我看来，比起亚当·斯密几页之后写的，上面的引述根本不算什么。亚当·斯密在那谴责了某种使年轻人更自大、更没有原则、更放荡、更不能专心用功、勤奋做事的“英国习俗”，做父亲的让他的儿子践行这些陋习，将很快看到儿子“在自己面前，无所事事、漫不经心地堕落下去”。

在斯密著作的第728页上找出这种可怕的陋习是什么。（好吧，如果等不及，看本页脚注。）

亚当·斯密烧掉了衣服……然后烧掉了文稿！

不要发呆，丑恶地狱！
不要靠近，魔鬼卢斯福！
我要烧掉我的书！

——克里斯托弗·马娄《浮士德》

什么？亚当·斯密是个放火狂吗？

第一起事件颇具讽刺意味。在《国富论》中，苏格兰教授赞成自由贸易。他主张取消大部分关税，甚至同情走私。2年以后，在1778年，斯密积极寻求一个高级政府职位，可能是为了改善他的经济状况。斯密成功了，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关长！别管他以前关于自由贸易的论述或他的朋友萨缪尔·约翰逊博士的话——他说：“人类最低级的职业是海关官员”（Viner 1965:64）。这项工作声望很高的职业，每年有一笔600英镑的可观收入，而且以一种矛盾的方式，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的斗士将其生命的最后十二年花在了实施苏格兰重商主义进口法律和打击走私上。

一经上任，斯密便熟悉了海关法的条例和规章，并突然发现他个人已违犯很久了。他穿的衣服大部分是非法走私进入这个国家的。在写给奥克兰爵士的信中，他感叹说：“我吃惊地发现，我所有的领巾、围巾、假领和手帕在大英帝国几乎都是被禁止穿戴使用的。我希望能以身作则，就把它全烧掉了。”他建议奥克兰夫妇查一查他们的衣物，该烧的也烧掉。

想到一个如此聪明的头脑毫无成就地花十几年的时间实施莫名其妙的海关法，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他本来可以去做更有价值的工作。他打算写他的第三本关于政治和法理的哲学著作，他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续篇。然而，这是政府职位和工作保障对所有人包括对自由市场的最强烈倡导者的诱惑！

另一件放火的事

另一件焚烧事件出现在1790年斯密生命的终结之时。他每个周日都与两个最亲密朋友——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和地质学家詹姆斯·哈顿在爱丁堡的一个酒馆吃饭。在辞世前的几个月，他请朋友毁掉所有他未出版的手稿，除了少数他认为已接近出版的部分。这不是新的请求。17年前，当他带着《国富论》的手稿履行到伦敦时，他曾指示大卫·休谟，他的遗嘱执行人，“不加任何检查地”毁掉他的所有零散手稿和18个笔记本，只保留关于天文学史的部分。斯密显然读到过关于一个同时代人的私人手稿在一部“全面”传记中被披露给世人的事，并担心同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也许一直关心为维护他的朋友，不容于当时社会的异教徒休谟，写的信或文章。但休谟比他更早去世，他需要一个新的遗嘱执行人。

在生命晚期，斯密极端关注他的个人手稿，屡次要求他的朋友布莱克和哈顿毁灭它们。布莱克和哈顿总是拖延，希望斯密能理智，改变主意。但在他去世前一个星期，他把他们找来，坚持要他们烧掉他的所有手稿，不知道也不要问其内容是什么，除了少数可以出版的以外。最后，两人找出并烧掉了几乎所有一切——16卷手稿！扔进火中的是他论法律的手稿。幸运的是，关于这些讲授的大量学生笔记在1958年被发现了，后来以《法理学讲义》为名出版。

火灾之后，老教授如释重负。在接下来的星期天，他的朋友为通常的晚餐来访，他拒绝了。“我喜欢和你们在一起，先生们，但我觉得我必须离开你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是他对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在接下来的星期天，1790年7月17日，他去世了。

心不在焉的教授

至于说他的个性怪癖，这位著名的道德哲学教授有刺耳、沙哑的声音，经常口吃。他是一个典型的心不在焉的教授。他的生活杂乱无章。书本纸张在书房里到处都是。从孩提时代起，他便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微笑着与看不见的伙伴全神贯注地对话”（Rae, 1895:329）。关于他粗枝大叶的特点的故事很多：一次在与朋友谈话时掉进了一个**路旁的沟里（tanning pit）**；一个早上他将面包和黄油放进了茶壶，喝了茶后说这是他喝过得最糟糕的茶；一次他穿着旧睡袍出外散步并做着白日梦，出城几英里才停下来。一个熟人说：“他是我认识的最心不在焉的人”（West 1976:176）。

他如何写他的大作

1764年，查尔斯·唐森，一名著名的英国议员，提出给斯密一笔不菲的学费和终身养老，让他教自己的继子亨利·斯各特，巴克勒(Buccleuch)公爵。他们旅行到法国，斯密拜谒了伏尔泰、杜尔阁、魁奈和其他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惊呼，“斯密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没有什么能和他相比的”（Muller 1993:15）。

正是在法国，斯密谈到他已对教学没有兴趣，正开始研究和写作《国富论》。这是一部畅销书，发行6个月便告售罄。这部在斯密生前便已发行数版，并被翻译成几种语言的著作得到了许多人包括，大卫·休谟和托马斯·杰弗逊的赞扬。

他的最后岁月

在他的经典著作出版后，斯密被任命为爱丁堡海关关长，这在前面说过了。他还花时间修订他已出版的著作，过着一种恬淡的生活，尽管有养老金，他年复一年把他的大部分收入在秘密的慈善活动中捐赠了出去，而他一直小心地隐瞒着这件事（Rae 1895:437）。他剩余的岁月都在爱丁堡渡过。

亚当·斯密赞成强而有限的政府

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天赋自由德性的提倡者，斯密是一个节俭但强政府的坚定的信仰者。他写道政府的三个目的是：“使一个国家从最粗野的原始状态变成最富庶之地的不是别的，只是和平、轻税和可容忍的司法管理”（Danhert 1974:218）。更具体地说，斯密认为（1）需要有一支军费充足的国防军，（2）一个保护自由、财产、实施契约、支付债务的法律体系，（3）公共工程——道路、运河、桥梁、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和（4）对抗资本主义中专业化（劳动分工）的异化和精神堕落影响的普遍公共教育（斯密 1965: 734-35）。

大体说来，这位苏格兰教授赞成社会上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包括娱乐的多样化——只要它“不伤风败俗”（第748页）。斯密不是一个纯自由放任主义者。

斯密警告大政府的危险

同时，他是国家力量的犀利批评者。按斯密的说法，政治家通常是挥霍的伪君子。《国富论》的下列段落可用于参加政治争论：

一个政府，向其他政府学习技术，其最快学会的，莫过于从人民腰包里刮取金钱的技术（第813页）。

英格兰王公大臣们不自反省，而颁布节俭法令或禁止外国奢侈品输入，**??**要监督私人经济，节制铺张浪费，实是最放肆最专横的行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始终无例外地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他们好好注意自己的费用就行了，人民的费用可以任凭人民自己去管。如果他们的浪费，不会是国家灭亡，人民的浪费，哪里算的上呢？（第329页）

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个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可把它弄得贫穷。在大多数国家，公共收入，全部或几乎全部都用来维持不生产者。朝廷上的王公大臣、教会中的牧师神甫，就是这一类人。又如，陆军，他们**既在平时一无生产，又在战时一无所获**，来补偿他们的维持费。甚至在战争持续进行期间，也如此。这些人，因为他们一无生产，不得不**??**于别人劳动的产物。（第325页）。

斯密主张平衡预算，反对大规模财政赤字。他主张私有化，出售“皇家土地”，以此增加政府收入，培育财产。他赞成对公民个人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最小政府干扰。斯密认为，战争是不必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误导的，结束战争不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第436-37页）。

当他表示对“不断受税务人员恼人扰人的访问”的纳税人的同情时（第880页），他就好像自己刚刚被收入调查员审计过似的。在责骂过税制的复杂和不平等后，他开出了全面

减税的药方，虽然他赞成严厉的高利贷法和累进税。

斯密赞成健全货币和金本位制

斯密也担心政府对货币体系的操纵。在拒绝了金银是一国财富的思想之后，他赞成建立在金银基础上的稳定的货币体系，支持自由银行学说。他也拒绝流行的“货币数量论”（参见，第11章中关于欧文·费雪的讨论），这种观点认为价格水平与货币供给等比例变化。在他的“关于白银的离题的讨论”中，斯密说明在白银（货币）供给增加时，价格有大幅度的波动（第240页）。

储蓄：经济增长的关键成分

亚当·斯密赞赏节俭的品德和资本投资是他的宏观经济学必不可少的成分。在他《国富论》论资本积累的一张中（第二篇 第三章），除了稳定的政府政策、竞争性的工商业环境和健全的企业管理外，他还强调了储蓄和节俭作为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关键的必要性。斯密强调了资本投资和节约劳动的机器作为促进普通人生活水平增长的关键元素的必要性（第326页）。

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基本内容

概括地说，亚当·斯密提出，为其未来各代门徒所赞成的古典模型由四个一般原理组成：

1. 节俭、**勤奋**工作、开明的自我利益和对同胞的仁慈是美德，应该鼓励。
2. 政府应将其活动限于司法、维护私有产权和防范外敌入侵。
3. 国家应采取对经济事务自由放任不干预的总政策（自由贸易、低税、**最精简官僚机构**等等）。
4. 古典金/银本位约束了国家实行货币贬值的行为，提供了稳定的货币环境，经济在这一环境下也许能繁荣起来。

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接下来的200年中，亚当·斯密的古典模型将不断受到攻击，这些攻击既有来自朋友的，也有来自仇敌的。

亚当·斯密与经济学家时代

亚当·斯密不是完人。在下面各章，我们会评论和修补他粗糙的劳动价值论、他对地主的批评、他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奇怪划分。他未能认识到价格理论的主观边际效用的基本原理。**但这几个附属的瑕疵，丝毫不影响他对经济科学的惊人贡献。**

亚当·斯密将因他对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激烈捍卫和他的“天赋自由”、竞争性自由企业的自我调节体系及有限政府的主题而受到祝贺。他对经济自由的精彩表述推动了世界从狭隘的保护主义和国家的重手干预中解放了出来。没有他的领导，工业革命也许还会同上一百多年。

伟大的乐观主义者

亚当·斯密，苏格兰启蒙运动之子，对世界未来是乐观的。他的经济学的代表作的主要焦点是个人通过“节俭和良好行为”、储蓄和投资、交换和劳动分工、教育和资本形成以及新技术的“改善”。他对增加财富比对如何分配财富更感兴趣（这与他的门徒大卫·李嘉图正相反，我们在第四章将看到这一点）。

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就是最有力量最邪恶的政府也不能阻止进步：“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错误，使事情日趋改良”（1965：326；另参见508）。

亚当·斯密的一个著名评论

在美国革命时期，一个公民来见亚当·斯密，此人为英国1777年在萨拉托加Saratoga的失败而惊慌。“**The nation must be ruined(国家要灭亡了)**”，这人语带惊慌地说。当时已50多岁的斯密平静的回答“**Be assured, my young friend, that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ruin in a nation (冷静，年轻的朋友，一个国家里坏掉的东西多着呢。)**” (Rae 1895:343; Ross 1995:327)。米尔顿·弗里德曼、加里·贝克尔和其他经济学家在答复“经济末日说”者时，经常引用斯密的这一说法。

它意味着当一个民族在几个世纪中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制度和名声时，一场大的战争或自然灾害是不足以毁灭一个国家的。

他的生命是完全的。亚当·斯密也许会为“赞美诗”而高兴，“安息吧，我的灵魂：主对你已十分慷慨”（赞美诗 116：7）。

在他安息在他的墓穴中时，他的古典经济学模型将传遍欧美。令人吃惊的是，他最激情的门徒来自一个在几个世纪中一直是英国最激烈的敌人的国家——这是下一章的内容。

附录 亚当之前

亚当·斯密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出现代经济学的，就像雅典娜充分长成、全副武装地从宙斯的脑袋中跳出来那样。相反，斯密受到了众多经济思想家的影响，这些思想家中最早的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孩子，斯密在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时不会发现多少魅力。柏拉图提倡理想的由集体主义哲学家王统治的城邦国家。他认为亚里士多德更好，因为它捍卫了私有财产，批判了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私人财产将给予人们实践仁慈和慈善的德性的机会。这些德行都是亚里士多德的“黄金平均数”和“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但亚当·斯密不赞成亚里士多德对赚钱的轻蔑和把货币交换和零售商视为非道德、非自然的做法，这是中世纪许多基督教作家后来神化的哲学。

新教、天主教和西班牙经院学者

亚当·斯密受到加尔文教义的很大影响，加尔文教义赞扬节俭和勤奋工作，谴责过度奢侈、高利贷和“非生产性”劳动（参见第七章，注释2，第171-72页）。天主教和新教都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的“公平价格”有异议。16世纪西班牙经院学者决定“公平价格”只是通常市场价格，它们通常是由自由放任哲学支持的（Rothbard 1995: 97-133）。像孟德斯鸠后来写的那样：“竞争使物品有了公平价格，建立了商品之间的真正关系”（Montesquieu 1989[1748]: 344）。

在许多方面，亚当·斯密的目标是用一种将道德生活和对物质欲望的合理追求结合起来的体系取代西欧反唯物主义的基督教教义，它是自由和经济增长的障碍（Fitgibbons 1995: v, 16）。

伯纳德·蒙德维尔和《蜜蜂的寓言》

某些经济学家认为亚当·斯密是从伯纳德·蒙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荷兰的一位心理医生和小册子作者的臭名昭著的著作《蜜蜂的寓言》中提出“看不见的手”概念的。在该书第一版中，孟德维尔讲了一个一群活跃的、“闹哄哄的蜂巢”的故事。蜜蜂们变得“诚实”，建立了一个道德社会，但很快便贫穷、毁灭。在流行的第二版中，孟德维尔描述了一个繁荣的社会，所有公民都决定改变他们的奢侈习惯，解散军队，结果是贸易和房地产业的萧条和崩溃。

他的结论：私人的邪行——贪心、贪婪和奢侈产生了大量公共财富，“**邪恶停止之时，社会即使没有完全解体，也已经被破坏了。**”显然，在孟德维尔的著名北仑中，自我利益导致社会利益。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都赞许性地写到了孟德维尔的寓言。根据哈耶克，亚当·斯密从孟德维尔那里获得了关于劳动分工、自我利益、经济自由和意料外后果思想的见解（Hayek 1984:184-85）。凯恩斯赞扬了孟德维尔的反储蓄情绪和在社会上保持充分就业的国家主义压力（Keynes 1973:358-61）。

然而，明显的是，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并不赞成孟德维尔。他称此书“完全是有害的”，说法是“错误的”，斯密不同意经济进步是由贪婪、虚荣和不受约束的自私达到的，抱怨孟德维尔似乎没有区分邪行和美德（Smith 1976[1759]: 308-19）

孟德斯鸠和文明商业（*Doux Commerce*）

斯密对自我利益的态度更多地受到了法国大法学家和哲学家查尔斯·孟德斯鸠（1689-1755）的影响。他的《论法的精神》初版于1748年，鼓励了詹姆士·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推动权力的宪法性分离，斯密赞成的一个概念。孟德斯鸠，在工业革命前写作，看到了“文明商业”（gentle commerce）的许多好处。他表述了新观点：对赢利和商业利益的追求起这对战争的激烈情感和滥用的政治权利的制衡作用。“商业治愈破坏性的偏见”，孟德斯鸠指出，“它清洁了并软化了愚昧习惯……**商业的自然作用**是导致和平”（1989: 338）。根据孟德斯鸠、詹姆士·斯图亚特爵士和那个年代其他哲学家的说法，作为和平的、理想的、纯洁的人的商人形象与“当时的掠夺的军队和杀人越货的

海盗”是构成鲜明对比的（Hirschman 1997:63）。商业改善了政治秩序：“与商业精神俱来的是节俭、经济、谦和、工作、智慧、平静、秩序和规则等等精神”（Hirschman 1997:71）。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指出的那样，斯密赞成了这种进步的商业社会观。

弗朗索瓦·魁奈医生和他的《经济表》

亚当·斯密在法国遇到的最著名的重农学派学者是著名的医生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当时他是国王路易十五的宠妃的私人医生。他的著名的图形——《经济表》——被其同时代人认为是人类最重大的三个经济学发现之一，仅次于文字和货币（斯密 1965: 643）。

魁奈的曲折折的图形，首次发表于1758年，在许多年中引起了人们很大兴趣和争论（见表1.2）。它被赞许为现代经济学的许多发展的先驱：经济计量学、凯恩斯的乘数、投入产出分析、环流图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它当然是一种“宏观”经济观点，没有提到价格，但没有人确定知道其真实意义。作为重要学派的首席发言人，魁奈支持了农业是唯一的生产性支出，工业是不生产的这一谬误。

关于魁奈的影响，《国富论》声称魁奈医生是“天才而深刻的作者”，他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放任、自由通行”口号，这是斯密全身心地赞成的说法，虽然他自己从未将自己的体系成为“自由放任”经济学。（他更喜欢“天赋自由”或“完美自由”。）作为一个领先的重农学派学者，魁奈反对法国重商主义、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然而，《国富论》否定了重农主义的基本命题，即农业，而不是制造业和商业是一切财富的源泉（1965: 637-52）。

理查德·坎梯隆

对这位苏格兰经济学家的其他重要影响来自理查德·坎梯隆、雅克·杜尔阁和艾斯蒂安·博诺·德·孔狄亚克。理查德·坎梯隆（1680-1734）被穆雷·罗恩巴德和其他经济史学家认为是真正的“现代经济学之父”。

坎梯隆是爱尔兰商业银行家和冒险家，移民到巴黎，1717-20年参与了约翰·劳臭名昭著的密西西比股票泡沫事件，但在金融风暴到来之前狡猾地卖掉了他的股票。他的独立地位使他能写一部关于经济学的小册子——《论一般商业的性质》（在他死后1755年出版）。1734年他神秘地死于伦敦，似乎是被一个愤怒的仆人谋杀的，他杀人后烧掉了房子，来掩盖罪行。

坎梯隆的《论一般商业的性质》确实很出色而且确定无疑地影响了亚当·斯密。它集中论述供给和需求的机制、企业家的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在《国富论》中被低估了）和一种精细的对货币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如何既提高价格又改变支出结构的“前奥地利学派”的分析（见论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第12章）。

雅克·杜尔阁

雅克·杜尔阁（1727-81）是一位重要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者，其深刻的著作《对财富形成和分配的反思》（1766）也激励了亚当·斯密。作为一个热切的自由放任者和自由放任的提倡者，杜尔阁是路易十六座前的一位能干的财政部长，他解散了所有的中世纪行会，废除了对粮食贸易的全部限制，并保持了一种平衡预算。他太能干了，引起了国王的愤怒，1776年国王革了他的职。

作为一个重农主义者，杜尔阁坚持农业是最有生产性的经济部门，但不仅如此，他的《反思》展示了对经济学的一种深刻理解，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过斯密。他的顺畅的作品提供了一种对时间偏好、资本和利率及资本家——企业家在竞争经济中的作用的出色理解。他甚至描述了收益递减规律，后来被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所普及。

孔狄亚克

另一位有影响的法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是艾斯蒂安·博诺·德·孔狄亚克（1714-80）。他在18世纪70年代中期过着一种巴黎知识分子的生活并保护了1775年作为财政部长在粮食暴动问题上陷入困境的杜尔阁。像杜尔阁和孟德斯鸠一样，孔狄亚克支持自由贸易。他的重要著作《商业与政府》出版于1776年，只比《国富论》早一个月。孔狄亚克的经济学先进得令人吃惊。他认识到制造业是生产性的，交换是不等价的，交换双方都得到好处，价格是由效用价格而不是由劳动价值决定的（MacLeod 1896）。

大卫·休谟

大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76）是亚当·斯密的亲密朋友，他有限的论贸易和货币的著述有很大影响。斯密把他的苏格兰朋友称为“在他所处时代最出色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菲茨吉邦Fitzgibbons 1995:9），并且“几乎接近人的脆弱性所能允许的完全智

慧、纯正的人的理想”（斯密 1947：248）。休谟反对禁欲的自我否认，赞成奢华、追求物质享受的好生活。

像斯密一样，休谟谴责重商主义对国际贸易的约束。用其著名的“**硬币流动机制（specie-flow）**”机制，休谟证明限制进口，增加specie流入的企图将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出口限制将提高国内价格，进而降低出口，增加进口，导致specie再度外流。

休谟也揭露了重商主义获得更多specie（贵金属）将降低利率，促进繁荣的说法的虚妄。休谟提出了古典观点：实际利率由储蓄和资本的供给，而不是由货币供给决定。作为一个货币数量论的坚持者，休谟感到人为地扩张货币供给只会提高价格。

斯密的亲密友谊导致许多观察者得出结论说斯密赞成休谟的反宗教叛逆和他的纯粹世俗商业社会。他们指出了《国富论》中未提到上帝的事实。然而，斯密没有放弃他的宗教信仰。**斯密在《国富论》出版后，修订过他的《道德情操论》，此书数次提到上帝和宗教。**公认地，他不是一个实践中的长老派信徒，反叛严苛的加尔文主义行为，但他是一个信徒，一个采纳了斯多葛派的信仰，认为上帝通过自然发挥作用的自然神论者。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斯密信仰世界的善，憧憬着**地上天堂**。

本杰明·富兰克林

传记作者约翰·雷和伊恩·西姆森·罗斯使这一传统——美国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90）发展了与亚当·斯密的友谊并对其写作《国富论》产生了一定影响——有了可信性。约翰·雷重述了富兰克林如何在苏格兰和伦敦拜访斯密的过程，而且，按照富兰克林一个朋友的说法，“亚当·斯密在写作其《国富论》时，有把每一章都带给富兰克林本人、普拉斯博士和其他学者的习惯，然后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从他们的讨论和批评中得到收获，有时整章整章地重写，有时甚至颠倒他的某些命题”（Rae 1895:264-65;另见Ross 1995: 255-56）。

在他的经济学著述中，富兰克林谈到了节俭、自由贸易和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好处，这些都是在《国富论》中自然而然地出现的主题。（然而，我确信斯密不会同意富兰克林出版于1728年为在宾西法尼亚州扩张纸币**发行**的辩护。）斯密对美国独立的赞赏也许来自富兰克林（斯密 1965：557-606）。

插图及图表注解

P7

极左——激进派——自由派——保守派——极右
马克思 凯恩斯 斯密

图A 各种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的钟摆模型方法

来源：梅尔和怀特（Maier and White）（1998：42）。经McGraw-Hill允许重印

P8

图B 图腾方法：根据经济学自由和增长对三位经济学家的排序（斯密、凯恩斯和马克思）

P14

插图1.1 亚当·斯密 1790年 “我只是我的书的情人”
经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允许重印

P15

纵轴：人均GDP（1990美元）
横轴：英格兰的收入（1100-1995）
箭头处：《国富论》出版（1776年）

图1.1 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英国，1100-1995
感谢 Larry Wimmer, 博明翰扬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提供

P25

纵轴：人均GDP 1994 000美元
横轴：1995经济自由水平级别
图1.2 经济自由和人均GDP的关系，1994-95
来源：格沃特尼、劳森和布洛克（1996）

P26

纵轴：每周参与人数
横轴：新教集中度？
方块：天主教国家
菱形：其他所有国家

注意：Al=澳大利亚，Au=奥地利，Be=比利时，Br=英国，Ca=加拿大，De=丹麦，Fi=芬兰，Fr=法国，Ge=西德，It=意大利，Ne=荷兰，NZ=新西兰，No=挪威，Po=葡萄牙，Sp=西班牙，Swe=瑞典，Swi=瑞士，US=美国

图1.3 抽样国家的教堂参与率与宗教集中度

来源：Iannaccone（1991:157）；West（1990:161）。经Sage公司允许重印。

P29

照片1.1 斯蒂格勒与他最喜爱的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感谢芝加哥大学乔治·J·斯蒂格勒中心提供，摄影：Lesley Skousen。

P31

照片1.2 马克·斯考森和他的朋友保罗·特尔霍斯特，拜谒斯密在苏格兰爱丁堡的墓地。

“我喜欢和你们在一起，先生们，但我觉得我必须离开你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P39

1.2 魁奈的经济表 来源：Vaggi（1987：23）。经诺顿出版社同意重印。

第二章 法国亲戚：自由放任的前进

本章音乐选段：赫克特·柏尼兹，《幻想交响乐》

亚当·斯密博士的著名著作只应视为是由许多著名例证支持的最成熟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汇编。

——让-巴蒂斯特·萨伊（1970[1880]: xix）

改善亚当·斯密的古典模型，将它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繁荣模型的任务落在了著名的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和弗里德里克·巴师夏的肩上。萨伊和巴师夏首次论证了一种由创造性的企业家领导的自由工业经济的无止境的可能性。特别是萨伊的市场定律成为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真确性在全行业中如此普遍以至于直到下一个世纪凯恩斯革命之前，一直未受到质疑。从来没有比弗里德里克·巴师夏更好、更顺畅的自由贸易的提倡者了。

此外，法国经济学家澄清并改良了《国富论》中论述的，并建立在坎梯隆、孟德斯鸠、杜尔阁和孔狄亚克发展的成熟经济原理基础之上的许多概念。而且，萨伊和巴师夏拒绝劳动价值论和自由企业资本主义下对工人的剥削思想。

请告诉我，你所说的自由放任是什么意思？

自由放任应是每一个公共权力机构的座右铭。

——阿尔让松侯爵（Marquis d'Argenson）

我放弃自由放任——不是充满热情地……而是因为不论我们喜欢与否，其成功所依据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Skidelsky 1992: 186）

在17世纪末，著名的法国重商主义部长——让-巴蒂斯勒·柯尔培尔，一次问一组商人他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其中一个人，勒让德（Legendre），回答说：Laissez nous faire（让我们做自己的事）。18世纪初几位法国学生，包括阿尔让松侯爵，使用了“自由放任”这一口号。大经济学家杜尔阁将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自由放任，自由通行）这一规则归于Gournay。其他有类似意义的法国说法变得流行起来：Le monde va de lui meme（世界自己转自己的）和Pour gouverner mieux, il faudrait gouverner moins（管得少才能管得好）。

Laissez faire逐渐代表亚当·斯密提倡的经济自由政策，虽然斯密本人从未用过这一短语。20世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使自由放任蒙上了恶名，它代表了大萧条岁月中流行的“无为”政策。“不论是好还是坏，在今天的条件下，自由放任政策在提供经济项目所需要的资本方面已经不再可以信赖了”（斯基德尔斯基 1992: 185）。根据凯恩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需要政府来挽救。

实际上，自由放任决不意味着铁石心肠的“无为”政府政策。亚当·斯密和古典自由放任经济学家实际上以拆解旧的监管体制和特权并因此改善大众福利为目标。

法国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斯密的大作，从他在法国准备这部著作和与魁奈、杜尔阁、伏尔泰讨论思想开始。《国富论》一经出版，法国在整个西方世界普及斯密的自由企业模型，解放贸易方面十分成功。他们将斯密的著作译成法文，出版了第一部经济学大全和经济思想史，并写出了第一部重要的经济学教科书——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在十九世纪前半期，这是美国和欧洲的主要教科书。亚当·斯密的许多原理被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采纳，写入他深刻的《论美国民主》一书（见第57-59页加框文字）。简言之，在近半个世纪中，法国自由放任学派主导了西方经济思想，而且萨伊定律甚至还高枕无忧地进入了20世纪。

谁是法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世界上最伟大的四个经济学家中，三位是法国人。

——约瑟夫·熊彼特

1935年保罗·萨缪尔森开始在哈佛做研究生时，约瑟夫·熊彼特被认为是最有影响的经济史学家，曾令全班学生感到吃惊：他宣布四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中，三位是法国人（Samuelson 1962: 3）。熊彼特提到了谁呢？

首先是里昂·瓦尔拉（1834-1910），熊彼特奇怪却毫不犹豫地将瓦尔拉作为所有时代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因为他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Schumpeter 1954: 827；见第八章）。这一选择似乎是不合理的，因为熊彼特因其“创造性毁灭”和一般动态非均衡理论，以及他对完全竞争和静态均衡分析的熟练批评而著名。

他的第二选择更令人难以理解：安东尼·古诺（1801-77），一位法国数学家，他第一画出了需求曲线并证明了垄断者如何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这一点上最大化利润。古诺的工作最终被马歇尔继承并被纳入标准价格理论。

第三位是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因其神秘的经济表（经济学的环流图）而著名。萨缪尔森认为熊彼特的第三个选择更怪，称之为“离谱的”。

谁是熊彼特最喜欢的非法国经济学家？起初萨缪尔森以为是亚当·斯密，但后来发现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熊彼特被称为是奥地利学派的坏孩子，这是容易理解的。你永远也不能理解他会说什么或相信什么。

凯恩斯最喜欢的法国人

凯恩斯也有出人意料的偏好。1939年初，在其法文版《通论》中，凯恩斯将这位法国学者说成是“真正的法国的亚当·斯密，是你们（法国）的经济学家中最伟大的，在深刻、清晰和理智（这是经济学家应有的素质）方面远远超过重农学派学者”（1973: xxxiv）。不，这不是萨伊也不是巴师夏。

这是孟德斯鸠！

这也似乎是一个奇怪的选择，这有几个原因。很少有历史学家将孟德斯鸠（1689-1755）看成是纯粹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主要是一个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论法的精神》（1748）一书，只有15%的篇幅是用于讨论经济问题的。并且，与凯恩斯不同，孟德斯鸠是“自由放任学说热情支持者”（Devletoglou 1963:42）。他憎恨权威主义政体，反对所有形式的中央计划，他认为它剥夺了社会的天然动力。他捍卫自由贸易，认为自由贸易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文明化、教育和合作力量。像亚当·斯密一样，他认为代表一个国家的财富的是商品和服务而不是贵金属。他以西班牙为例反对过度货币通货膨胀，认为这是灾难。在重农学派普及了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这一错误学说之前，孟德斯鸠正在教诲工业和商业作为财富源泉的是同样重要的。企业家精神和节俭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成分。并且，与马尔萨斯不同，孟德斯鸠视巨大的、不断增长的人口是高度有利的。

因此凯恩斯确实推崇孟德斯鸠，但他这样做却不是出于这些原因。凯恩斯感兴趣的是孟德斯鸠的朦胧的流动性偏好利率理论（Montesquieu 1989: 420-21）。他反对货币窖藏，提倡高水平货币支出以保持和促进经济福利（Devletoglou 1963:37）。

奇怪的是，除了在法文版《通论》的导言中，凯恩斯著作却未提及这位法国哲学家，凯恩斯的好朋友也都没有回忆说凯恩斯说过孟德斯鸠是最伟大的法国经济学家（Devletoglou 1963:44）。

J.-B. 萨伊：生逢其时

这场法国戏剧的最重要角色是《国富论》付印前9年出生的。在他人生的65年中，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过着一种“一个困难时代的经济学家”的生活，引用一部近期传记的标题（Palmer 1997）。他目睹了美国和法国革命，承受了拿破仑政治权利的冲击，并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开始时期。他创造了“企业家（entrepreneur）”这一目前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和工商界术语，自己也成为一位企业家（一位棉制造业者）。他被任命为第一位法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写了一部流行的教科书，今天主要因其“市场定律”而著名，这是一种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把生产、贸易和储蓄看成是经济增长和更高消费水平的关键因素。

J.-B. 萨伊生于法国里昂。他出生于法国南部一个古老的新教家庭，这一家庭搬迁到了日内瓦并最终搬迁到巴黎。在15岁时，在法国革命的高潮时期，他同许多法国公民一样，受到了本杰明·弗兰克林自传的巨大影响，他在著作中称赞富兰克林是模范公民并为其节俭、教育和道德生活的原则而喝彩。

“法国的亚当·斯密”

让-巴蒂斯特也在伦敦待过两年，他在那儿学了英语，读了《国富论》。这是一个影响了萨伊终生学业的有利机会。他将以“法国的亚当·斯密”为人们所知。

萨伊的影响在其32岁初现端倪，那时是1799年他成为拿破仑的“（**Tribunate:护民官制**）”的成员。然而，拿破仑是一个权力饥渴的独裁者，他反对萨伊的自由放任政策并在1806年，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出版后，将萨伊逐出了**Tribunat**。实际上，拿破仑禁止萨伊的教科书，因为它批评他的政策。

《政治经济学或生产、分配和消费概论》的第一版出版于1803年，尽管被拿破仑禁了，在萨伊生前还是出了四版。托马斯·杰弗逊对萨伊的印象深刻，以致于他在1821年出了第一个英文译本，告诉他的朋友说萨伊的书比《国富论》“更短、更清楚、更确实”。杰弗逊要让萨伊去弗吉尼亚大学，但萨伊拒绝了，他更喜欢生活在巴黎。萨伊著作的英文版在美国是最流行的教科书，直到南北战争后被小穆勒的教科书所取代。

1815年，拿破仑下台之后，让-巴蒂斯特·萨伊成为法国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etiers（**(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etiers)**是巴黎技术博物馆，这里似乎应该是法国国立科学技术与管理学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etiers (CNAM)**）的第一位产业经济学教授，1830年被任命为位于巴黎的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的政治经济学主任。他与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经常通信，他把他们看成是亲密朋友，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他与他们的意见不一致。他于1832年，在被任命为教授仅仅两年之后，与巴黎去世，享年65岁，结束了他光辉的一生。

萨伊做出了几项重要贡献

让-巴蒂斯特·萨伊是亚当·斯密竞争、天赋自由和有限政府的自我指导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持者。他是一个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毫不妥协的捍卫者。

此外，他的分析比斯密和李嘉图更为深入，在四个方面开辟了古典经济学的新天地。

这些贡献是：首先，对用事实和观察检验理论的坚定信仰；第二，一种主观效用——而不是劳动——价值论；第三，企业家的十分重要的作用；和第四，萨伊的市场定律，它成为古典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

让我们来分别考察这四项目献。

看谁葬在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旁边

每年数以千计的美国歌迷涌向巴黎去祭奠吉姆·莫里森，20世纪70年代摇滚乐队“门”的领袖。莫里森因吸毒过量死在巴黎，未举行葬礼就被葬在拉雪兹公墓。

莫里森是葬在这一富有浪漫气息的公墓的许多名人之一，包括许多外国人：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作曲家弗里德里·肖邦、歌唱家玛丽亚·卡拉斯、舞蹈家伊莎朵拉·邓肯、作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还有女权主义者格特鲁德·斯泰因。这一大墓地的许多幕都是独一无二的创造，满是浓郁蔽日的树木、鲜花和雕像。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被谋杀的记者维克多·恩瓦尔（Victor Noir）身着夜小礼服的全身雕像。当地妇女的迷信是如果她们能刮下他的雕像的一小块，便可以怀上孩子。

复活萨伊

1999年当我和我儿子Tim拜谒拉雪兹公墓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伟大的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并没有被正式地列入名人之中。在得知了他坟墓所在的方向后，我们花了半个小时寻找。在我们最终找到了他的巨大陵墓之后，我们看到它令人痛心地被忽视了。当我铲去覆盖他名字的厚厚的苔藓，我感到我是在复活他的著名的经济贡献——萨伊的市场定律。

萨伊批评抽象的理论化

让-巴蒂斯特·萨伊对经济学家从事远离现象的象牙塔理论化深切关注。模型构造不一定是错的，萨伊推理说，事实上，他喜欢与几何学类似的模型，从“不可否认的一般事实的严格推理”出发，“一些基本原理和许多论证或结论能从这些原理中推导出来”。

（Say 1971[1880]: xx, xxvi）。但他坚持认为，这种模型必须总是用观察来检验，以免它变得不切实际，使人误入歧途。按照萨伊的思想，所有理论和模型都需要不断地在当前事实和观察的面前受到检验。

他特别担心他的朋友大卫·李嘉图——古典经济学的源头之一——的影响，因为在他

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中出现的频繁的抽象推理和不切实际的模型构造。萨伊不指名地谴责李嘉图创立了满是“无理的论断”和“在事实尚未确定之前已经形成的体系”（第xvii页）。结果，经济学被拖向一条危险的道路，包括了一种劳动价值论。（这一抽象模型构造的方法论经常被称为“李嘉图恶习”——见第四章。）

萨伊宣称，“没有什么比反对让理论面向实践更懒散的了！”在写给罗勃特·马尔萨斯的信中，他写道：“最好是坚持事实和他们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三段论。”他赞扬亚当·斯密汇集了“由令人信服的例证支持的最确定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但接下来，说李嘉图那样不用事实支持其理论的经济学家只是“懒散的梦想家，其理论至多只是满足文学的好奇心，完全不能应用于实践”（第xxi, xxx页）。

数理经济学的谬误

出于同样的原因，萨伊对数理和统计经济学颇有微词。他表示了“不论何时只要我们让政治经济学的现象服从数学计算，我们便总是被它引入歧途”的担心（Sowell 1987: 249）。

萨伊证明供给和需求的主观性质，价格和需求弹性为什么不能被准确预测。换句话说，经济学是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科学，因此不服从“数学计算”。他用了法国葡萄酒下一年价格的例子，法国葡萄酒的供给和需求不可避免地逐年变化。新的供给取决于“财富的增减”、酒的质量、剩余供给的数量、资本市场、利率、出口市场和“法律和政府的稳定性”。而需求方面，需求量决定于不断变化的“消费者的口味和手段”、一般经济条件、替代性饮品等等。简言之，下一年的葡萄酒价格“不可能被准确地计算”（Say 1971: xxvi-xxvii）。

他也对盲目的经验主义和汇集统计事实而不与理论建立联系十分谨慎：“**但没有一种关于其相互关系的知识，不能说明为什么一种事实是原因，另一种是结果，这样的事实知识并不一个办公室职员的粗糙信息更好**”（Say 1971: xxi）。

萨伊创造了另一种价值理论

萨伊与他的朋友英国古典学派的领袖大卫·李嘉图在另一个重大问题上也不一致，这就是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的影响下，寻找一种不变的价值标准，而且在劳动上找到了。但萨伊在其李嘉图《原理》的译本中写道：“不变的价值尺度是纯粹的妄想”（Rothbard 1995: 18）。

相反，萨伊采取了一种更积极的方法，赞成一种主观效用价值论。效用，或消费者给予一种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决定其生产。生产者通过将投入变成产出创造价值或效用，按足以弥补成本的价格出售。

不幸的是，这位法国经济学家没有发现边际效用理论，但他的确接近认识到效用而不是成本决定一种产品或服务的最终价格或价值。

企业家的作用

萨伊创造企业家这一术语。从字面上说，它意味着“承做事务者”，但由于其含义模糊，企业家被译成了“冒险家”。它令人联想到一个商业冒险家或一个冒险的资本家，一个将资本、知识和劳动等投入组合起来建立或管理营利企业的人的形象。亚当·斯密是一个教师，从未经营过企业。由于没有作为企业家的经验，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没有重视这一重要问题。但让-巴蒂斯特·萨伊是一个企业家，一个棉制造业者，他将这一概念作为他的经济模型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第二篇“论分配”的第七章中，萨伊将企业家、“master-agent”或“冒险家”（**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系列中译为：“老板、经理和冒险家”**）作为一种不同于地主、工人、甚至资本家的经济行动人引入。“不是说他必须很有钱，因为他可以靠借来的钱经营”，为了成功，企业家必须有“判断力、坚毅、节俭和专业知识”，萨伊注意到。“他需要相当准确地估量某一商品的重要性及其**需求的可能数量**与生产方法。在一个时间，他必须雇用很多工人，在另一个时间，他必须购买或定购原材料，集中工人，寻找顾客并随时严密注意组织和节约；总而言之，他必须掌握监督与管理的技术。”他必须愿意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并总是有“失败的可能性”，但在成功时，“这一类生产者将积累最大财富”（Say 1971: 729-32）。

萨伊注意到，企业家“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更高，收益更多的领域”（Drucker 1985:21）。他是寻找超过平均机会，承担风险的利润最大化者。

企业家又回到教科书中了

只是在最近的教科书中，萨伊的“企业家”又流行了起来。许多年里，在现代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它几乎完全消失了，特别是在无处不在的“完全竞争”模型中，这一模型几乎被20世纪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特别是在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影响下）。

在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中，不存在有差别的产品，没有价格变动。所有产品都是一类，有许多买者和卖者，没有人能影响价格。

显然，在这种一般均衡模型中，不需要企业家创造新产品或做广告。创新、想象、创造力和承担风险都是不必要的。按照教科书作者艾德温·都兰（Edwin Dolan）和大卫·林赛（David Lindsey）的说法，“没有用方程和图形准确地捕捉企业家行为的办法，因为企业家精神概念本身是变化的、不确定的和创造性的”（1988：603）。都兰是最先试图将企业家的作用纳入经济分析的教科书作者之一。

如经济学史家马克·布劳格所写的那样：“今天，经济学学生要用很多年才会听到企业家这个名词，这是一种耻辱”（1986：229）

布劳格的《经济学史》出版于1986年，从那时起，教科书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企业家精神经常被作为除土地、劳动和资本外的生产要素的一种。组合正确数量的土地、劳动和资本，创造消费者可以使用的产品或服务是企业家的责任。

奥地利学派伸出了援手

主要是通过奥地利学派，萨伊的企业家才被拯救并在现在展示在教科书中。约瑟夫·熊彼特出生于奥地利的哈佛教授因其集中地把企业家称为在全球经济中增进国民财富，创造动态非均衡的中心人物而著名。通过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企业家使经济风景不断改善。熊彼特拒绝“虚幻的完全竞争的黄金时代”，说它“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取的，没有被作为理想效率样板而确定的资格”（Schumpeter 1950：106）。竞争过程缺少企业家，就像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没有了王子（1950：86）。

伊斯雷尔·柯兹纳，纽约大学的一位伦敦出生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将其事业生涯的大部分用于研究企业家精神及其在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像熊彼特一样，柯兹纳批判了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完全竞争模型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市场过程”（Kirzner 1973：8）。熊彼特强调企业家如何走出均衡，而柯兹纳则集中考察“发现过程”，企业家通过这一过程发现错误和新的盈利机会，并因此使市场走向均衡（1973：72-75）。

最后，彼德·F·德鲁克，出生于奥地利的管理学大师，已经写了大量论述工业界企业家作用的文字。德鲁克推广了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是企业 and 经济的破坏者，是试用新产品和新工艺，犯错误并从错误中学习的人。像萨伊一样，德鲁克把企业家看成是在表现出超过平均潜力的部门的投资者。企业家首先是“寻找机会的人”（Drucker 1985）。

然而，尽管对企业家有这些谈论，教科书仍然使用一般均衡经济模型，它将试图垄断市场的创新型企业看成是无效率的。

萨伊的突破：市场定律

除了将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关键的生产要素引入之外，萨伊著名的最重要原因是提出了古典宏观经济模型，即“萨伊的市场定律”。

萨伊定律经常被引用为“供给制造其自身的需求”，一个许多经济学学生——沐浴在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中——觉得难以理解并违背常识的说法。“难道不是恰好相反的吗？”他们问，“需求难道不创造供给吗？”

实际上，将萨伊定律定义为“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而不是萨伊（见通论第18页）。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凯恩斯极端扭曲了萨伊定律的真实意义和深刻含义。正如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斯蒂芬·凯茨（他用了整整一本书讨论这一问题）所宣布的那样，“凯恩斯……错误理解并错误解释了萨伊定律……这是凯恩斯最耐久的遗产，而正是这一遗产破坏了直到今天的面貌”（Kates 1998：1）。

（见第十三章加框文字：“凯恩斯关于萨伊说了些什么？”）

萨伊揭示了一种错误，发现了一个新的定律

萨伊定律远比那一引入误入歧途的概括——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更加深刻。

为理解萨伊定律的广泛含义，我们必须首先考察这一原理的起源。十八世纪的重大问题之一（像在第一章中讨论的那样）是重商主义教义：货币特别是金银的发现以及贸易出

超创造财富和经济增长。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萧条中，人们不断抱怨货币短缺。对这一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似乎十分简单——找到更多的货币并花掉，这将会使经济复苏。

在其教科书第十五章中，萨伊抨击了这种货币短缺论，指出创造需求的不是货币，而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货币只是一种交易机制，经济萧条的真正原因不是货币短缺，而是缺少公民、制造业者和其他商品和服务生产者的销售。如萨伊所述，“销售呆滞决不是因为缺少货币，而是因为缺少其他产品……用一个更老生常谈的说法，人们购买得少了，因为他们钱赚得少了”（萨伊1971：134）。在较早时的一版中，萨伊声称：“在一般情况下，促进销售的不是货币的丰富而是其他产品的丰富……货币在这种双向交换过程中只不过是起着一种导管的作用。当交换完成时，我们总会发现人们是用产品去购买产品”（凯兹 Kates 1998：23）。

萨伊否认在经济的下降阶段存在任何一般性的“过度生产”或“过剩”，而是声称生产只是“方向错了”。某些需求不足的商品生产过多。一旦价格和成本调整到新的需求结构，经济将再度开始增长。按萨伊的说法，直到劳动者回到工作，生产者在开始盈利后，消费者才会再开始花钱。

这一分析使萨伊有了更大发现：生产是消费的原因，换句话说，**增加的产量导致更多的消费支出**。用萨伊的话来说：一种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就立刻给其他产品创造了等于其身价值的市场“（萨伊 1971：134）。一个卖者生产并出售了一种产品，卖者立刻就成了有可支出收入的买者。为了购买，我们必须首先出卖。

概括地说，萨伊定律是这样的：X的供给创造了对Y的需求。萨伊用收成好时候的农民的例子描述了他的定律：“收成愈佳，农民要购买的东西愈多；反之，收成不佳，就会在很大程度阻碍各种产品的销售”（1971：135）。另一个例子是：当一个有利可图的企业进入一个领域时，它创造工作和对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这种增加的消费归根结底来自新的供给——进入该领域的新企业。

萨伊是有道理的。按照经济周期统计，下降阶段开始时，生产先于消费更早地下降。在经济开始复苏时，也是因为生产者先复苏，然后才是消费。经济增长开始于生产力的增长、新产品和新市场的增长。**于是**，生产支出总是领先于消费支出，因此是一个领先指标。

萨伊将其论点扩展至经济增长

萨伊将其论点扩展至经济增长。鼓励新产品和更好产品的生产而不是简单地增加消费是经济**绩效**的关键。

我们可以知道在个人基础上，情况为什么如此。一种更高生活水平的关键首先是通过涨工资、换工作、在受教育或开办赚钱企业来增加你的收入（即你的生产力）。在收入增加前，去花更多的钱，或是花你的储蓄或是借钱，买更大的房子或者新车，来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办法，是愚蠢的。你也许能快活一时，但终究是拆东墙补西墙。

按萨伊的说法，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一个国家。创造新的、更好的产品开辟了新市场并提高了消费。因此，“仅仅鼓励消费并无益于商业，因为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我们已经看到了只有生产能供给这些手段。”萨伊接下来说：“刺激生产是好政府的目标，而鼓励消费则是坏政府的目标”（1971：139）。

储蓄是福不是祸

萨伊定律的一个推论是储蓄对经济增长有利。他否认“节俭”导致支出减少，产量下降的观点。既然说消费，按其定义，是消费效用，储蓄是更好地支出形式，因为它用于进一步生产所以需要的资本品的生产。无疑萨伊受到了他所读到的富兰克林在“存一分，赚一分”和“钱可生钱”等格言中对节俭是美德的辩护的影响。

一种不断扩大的经济总是生产比他所消费的更多的财富。生产因此超过消费。剩余是储蓄，用于投资品的生产。记住，有两类生产：消费品的生产（消费）和投资品的生产（储蓄）。

萨伊定律：总结

凯兹（Kates）总结了萨伊市场定律的结论（凯兹Kates1998：29）：

1. 对一个国家来说，资本无论怎样多都不会太多。
2.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3. 消费不仅不能刺激财富创造，而且还恰恰相反。
4. 需求是由生产构成的。
5. 需求不足（即生产过剩）从来不是经济扰动的根源。只有在各种产品生产的比例不相一致时，经济扰动才会出现。

托克维尔从何处学的经济学？

民主时代的人必须自由，才能获得他们长期以来不断追求的物质生活享乐。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1988[1848]: 539）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59），最著名的法国政治家，杰作《论美国民主》的作者，主要就美国社会的社会和政治方面写作。他的目标是讨论政治艺术而不是经济学。虽然他未将他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建设，他对经济状况做了几种重要观察。

民主资本主义的支持者

以其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的旅行为基础，德·托克维尔认识到美国代表了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一个正变成“各民族最繁荣但也是最稳定”的国家（Tocqueville 1988[1848]: xiv）。他预测美国将“变成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1988: 383）。按照这位法规观察者，美国是一个比任何其他国家都体现着斯密天赋自由模型的民族，美国人享受着“真正的自由”、“主权”、一种“条件的平等”和“受担保的私人财产”（1988: xiv）。到1848年，遍布欧洲革命的一年，德·托克维尔观察到：“美国甚至没有经受过动乱”。美国人是具有教养的、爱国的、信仰宗教的和守法的。为了保持稳定的民主，德·托克维尔赞成政府权力的分散和普遍存在的个人的小片土地所有制。德·托克维尔赞成个人主义而不是国家或一种乌托邦社会。

德·托克维尔观察到美国人总是试图推进他们的财务条件。每个人都是企业家，“有追求繁荣的激情……[他是]一个燃烧着欲望、积极进取、勇于冒险的人，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创新者”（1988: 404, 538）。作为结果“普通人通过贸易而变得富裕”（1988: 10）。“在美国”，德·托克维尔注意到，“我从未遇到一个公民过于贫穷，以至于不对富人的快乐报以希望和嫉妒的一瞥的程度”（1988: 531）。

德·托克维尔赞扬美国人：“体面的唯物主义”。“但对物质享受的热爱从未使民主的人民走的过远”。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想建大宫殿。“人们所希望的，只是多购几亩良田、种植果园、扩大住房面积、使生活更容易更舒适”（1988: 533）。

《论美国民主》中的斯密主题

德·托克维尔写道，在美国个人“启蒙的自爱……与一般利益都一致”，这是明显的斯密主题（1988: 525-26）。

像斯密一样，德·托克维尔认识到：“自由和工业之间的紧密联系。民主时代的人必须自由，才能获得他们长期以来不断追求的物质生活享乐”（1988: 539）。在美国，公民从来不会过于忙碌到忽视市民义务的程度。

像斯密一样，德·托克维尔赞成宗教和道德说教但反对国家宗教。“在美国”，他写道，“当第七日来到之时，贸易和工业似乎在整个国家都中止了。所有噪音都停止了”（1988: 542）。

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然而，德·托克维尔警告过多的无心思的装配工作能使工人“堕落”使他们变得“愚蠢”。，它能导致工人和老板之间重大的不平等，创造一种“商业贵族”。因此，“在工业科学不断降低工人阶级地位的同时，它提高了老板的地位”（1988: 555-56）。德·托克维尔在他批评分工的影响时具体提到了亚当·斯密制造针的经典例子。

然而，就连德·托克维尔的异化概念也模仿了《国富论》题为“对青年人的教育”那一章。亚当·斯密警告说：“其全部生命用于操作少数几种简单操作的人……一般会变得愚蠢和无知”（Smith 1965[1776]: 734）。斯密和托克维尔都将道德的和知识的教育作为解决办法。

萨伊的影响

托克维尔从何处学到他的经济学？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读过《国富论》，但他确实研究过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实际上，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和他的旅伴古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在他们1831年美国之旅的途中带了一本并每天在船上研究。博蒙在他们去美国途中的日记里写道：“我们现在全力以赴地用让-巴蒂斯塔·萨伊

的著作研究政治经济学。这项研究极吸引人”（Pierson 1938: 46）。

弗里德里克·巴师夏，自由放任的提倡者

弗里德里克·巴师夏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经济记者

——约瑟夫·熊彼特（1954: 500）

查尔斯·达尔文有他的斗犬——托马斯·赫胥黎，让-巴蒂斯特·萨伊有他的恩主——弗里德里克·巴师夏（1801-50）。巴师夏是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的孜孜不倦的倡导者，社会主义的激烈反对者和一位意志坚定的辩论对手和政治家。其道德之高尚、纯洁和文词之优雅曾被比附于伏尔泰和富兰克林。

用颇具娱乐性的寓言，法国这位小品文作者攻击了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主义和重商主义。两篇最著名的文章“蜡烛制造商的请愿书”和“碎了的玻璃”今日仍在重印，被引用（Bastiat 1995: 1-50; Roche 1971: 51-53）。

《新帕尔格雷夫》认为巴师夏“在揭露谬误方面无人能出其右”（Hebert 1987: 205）。

一个羸弱的孤儿挑战世界

弗里德里克·巴师夏的个人生活是悲惨的。他一生健康不佳，勉强活过了49岁。他的肺一直不好，这让他一生痛苦不堪。（他一生都因肺病所苦。）1801年出生于法国南部的巴约讷(Bayonne)。弗里德里克·巴师夏是土地所有者和西班牙商人的儿子。他七岁时死了母亲，9岁时死了父亲。他是由他的婶婶养大的，17岁为巴约讷的一位叔叔工作。后来，他试图染指农业，但也不成功。最后，他转向了他可以热爱的东西——书籍和思想。这位乡下学生在19世纪20年代末结婚，是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

像斯密一样，巴师夏在一个港口城市长大，这对他的信仰有重大影响。拿破仑战争后，生活困苦，巴师夏亲眼目睹了政府控制和关税的影响。在萨伊和斯密的影响下，关税的邪恶成为巴师夏主要关注的问题。尽管有这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令人信服的著作，法国政府在19世纪上半期持续提高关税。巴师夏支持了1830年代针对查尔斯十世和波旁家族（Charles X 和Bourbons）的虐待的革命。多少有点堂吉珂德，这位偏执的哲学家领着600个年轻人冲击一个皇家城堡，但受到了毫无抗议的接待，并被邀请参加一个宴会。

巴师夏反潮流

为经济和政治自由而战对巴师夏和其他萨伊的追随者来说仍是方兴未艾的战斗。为帮助萨伊遗产的传播，巴师夏开始就自由贸易写作。1846年，他迁到巴黎，模仿英国贸易改革者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自由贸易协会。他出版了Le libre échange，一种自由贸易报。

同年，他写了他最著名的寓言，对保护主义的嘲讽，“蜡烛制造商的请愿书”。（见第61页加框文字。）

1848年革命和第二共和国

一个重大转折点出现在1848年，法国农民反叛法国国君，举起反抗红旗，与国家卫队浴血奋战。同路人的叫喊是社会主义，但巴师夏，与众不同，抱怨说：“我们已经试过许多东西；什么时候我们试试最简单的‘自由’呢？”（Roche 1971: 79）。

巴师夏在国民大会上坐在了左边

1848年革命的结果是第二共和国和民主大选。巴师夏被选入国民大会，成为大会财政委员会的副主席。人们记忆最深刻的是，他曲着背、瘦瘦地身影坐在左边，那是自由派和激进派做的地方，正对着右边的保守派（这就是政治学中左和右的起源）。除了激烈地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策的时候，他还在反对监禁社会主义者，反对让和平的工联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不合法或宣读军事管制法的时候，感到坐在走廊的左边更舒服，

巴师夏死于1850年，49岁，因肺结核。但他等到了他两部主要著作——《经济和谐论》和《法律》的出版。

蜡烛制造商的请愿书

下面的讽刺文章出现在Le libre échange，巴师夏1846年开始出版的自由贸易报上。“蜡

烛制造商的请愿书”是他最著名的例子——真正好笑。使用这一荒唐的例子，巴师夏从不厌倦地抨击法国能通过关税和其它贸易限制限制生产而致富的想法（Roche 1971: 51-53）。

。蜡烛、烛芯、灯笼、烛台、街灯、烛剪、熄烛器的制造业者和油脂、油料、松香、酒精和所有与光亮（照明？）相联系的一类物品的生产者

致议会各成员

先生们：

我们正在遭受一个外来对手的毁灭性竞争。与我们相比，他在光的生产方面有明显优势。他正以难以置信的低价在国内市场上倾销他的光。他一经出现，我们的销售便停止了，所有的消费者都转向了他。法国的一个有无数分支的行业立即完全停滞。这个竞争对手不是别人，就是太阳……

我们要求你们发发慈悲通过一项法律，关闭所有的窗户、天窗、顶窗、里里外外的百叶窗、窗帘、遮帘、舷窗、眼罩——一句话，所有的开口、孔洞、通道和裂缝……

发发慈悲，先生们，认真地考虑我们的要求吧，不要不听我们提出这一要求的原因便加以拒绝。

首先，如果你们尽可能关闭所有自然光进入的通道因此创造出对人造光的需求，法国哪一种工业最终不会受到鼓励呢？

如果法国消费更多的蜡烛，必须有更多的牛和羊，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清理的地面、肉、羊毛、皮革，特别是粪肥，这是农业财富的基础啊。

如果法国消费更多的油料，我们将看到罂粟、橄榄和油菜种植面积的扩大。这些富有养分但耗竭土壤的油料作物可以恰如其分地使我们因养牛变得更加肥沃的土地得到更好的利用……

先生们，只需要稍微思考就可以相信也许不会有任何一位法国人，从Anizn公司的富裕股东到地位卑微的卖火柴小孩，不能因我们请愿的成功而改善其状况。

巴师夏更新：一堂课的经济学

巴师夏的著名寓言之一是“碎了的玻璃”，载于一本题为“见的到与见不到”的小册子，写于1850年，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一次搬家时丢了手稿，不得不重写，在死前仅几个月时完成了写作）。它讲述了雅克·博雷姆的故事，他是一个社区的坚定公民，他的不可救药的儿子打碎了窗玻璃，开始时旁观者同情雅克，他必须花6法郎更换玻璃。

然而他们开始想也许打碎的玻璃对商业有好处。毕竟，“如果没人打破玻璃，玻璃制造商怎么活？”的确，公众开始考虑打碎玻璃是否“有助于让货币流通，并且鼓励工业发展”（Bastiat 1995: 2）。

巴师夏写道：“这是见得到的。”破坏鼓励了玻璃行业的新支出。

然而，接下来巴师夏问，“见不到的是什么？”在他的第三层分析中，巴师夏指出雅克·博雷姆不再有6个法郎去买他穿破的鞋子或是一本书了。

巴师夏得出结论：“现在让我们考虑整个行业。玻璃碎了，玻璃工业得到了价值6法郎的鼓励；这是见得到的。如果玻璃未碎，制鞋工业（或另一种工业）将得到6法郎的鼓励，这是见不到的。”

故事的寓意是：“破坏无利益”（Bastiat 1995: 2-3）。

总的说来，巴师夏做出了下述关于经济学家在揭示谬误方面的作用的概括：“一个坏经济学家和一个好经济学家的唯一区别是：坏的经济学家限于自己可见的影响；好的经济学家考虑可见的影响，也考虑那些必须被预见的影响”（Bastiat 1995: 1；着重号系原文所有）。

亨利·海茨利特：当代的巴师夏

亨利·海茨利特（1894-1993）是一位当代的、二十世纪的弗里德里克·巴师夏的追随者，他以打碎的玻璃的寓言为基础写了一部经典著作：《一堂课的经济学》。海茨利特像巴师夏一样，是一个孜孜不倦的记者，为各种读者写作，抨击各种形式的集体主义。写过《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国家》的社论，为《新闻周刊》写了二十年专栏；并接替H. L. 门肯成为《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的编辑。门肯，以为很少称赞任何人的文学批评家，把海茨利特称为“真正的能写作的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海茨利特1979：封面）。

尽管他能写，他的著作和专栏却并不很受欢迎，特别是不很受经济学界的欢迎。在他

出版了《“新经济学”的失败》——一部逐字逐句批判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通论》的著作后，各种恶评蜂拥而至。显然，没有经济学学位的记者在该俱乐部中是吃不开的。

在他的十八部著作中，只有一部仍然畅销。首次出版于1946年的《一堂课的经济学》卖了近百万册，并被译成八种文字。

海茨利特从重述巴师夏打碎的玻璃的故事开始他的著作。他将打碎的玻璃的教训归于一：条：“经济学的艺术是不仅寻找任何活动或政策的直接影响，而且还要寻找较长期的影响；它是发掘该项政策不仅对一个集团而且对所有集团的后果”（海茨利特 1979[1946]：5）。海氏然后技巧地将这一教训应用于许多经济问题：租金控制、最低工资法、所谓的战争的好处、公共工程和赤字支出、货币通货膨胀、关税、对储蓄的攻击。当我们在报纸上读到或在电视新闻中听到地震对经济有好处，进口使我们破产了，或者赤字支出是持续繁荣的关键时，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忽视了亨利·海茨利特——和巴师夏——的社会的结果。

海茨利特可以被经济学家作为“非经济学家”而避开，然而，很少有经济学家在攻击今日过剩的经济学谬误方面能与他的技术相媲美。

巴师夏将情况扩展到自由

巴师夏不仅是一个经济学记者。他也是一个法哲学家，写了大量关于最适合一个自由民族和自由市场的社会组织文章。他的主要著作是《法律》，1850（1996）年6月出版的一个小册子。知道自己的生命到了尽头，他令人吃惊地多产。

对巴师夏来说，法律是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一种否定性的、合法的保卫。政府的适当作用是保卫这种“自然的、上帝赋予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阻止统治上的非正义”（Bastiat 1996：2）。人类的自由应尽可能地广泛，每人的充分利用其官能的权利，只要他在这样做时不伤害他人（1996：51）。自由包括良心、教育、劳动、贸易和结社的自由（62页）。

如果这些权利受到了适当保护，一个社会的繁荣和幸福将是无止境的。“这是正义、和平、秩序、稳定、和谐和逻辑的原则……如果每个人都享有他无限制地利用其官能，自由处置其劳动成果的权利，社会进步将是无知无休、连续不断、不可战胜的”（第20页，第5页）。并且，“每个人将实现其存在的实际价值和真正尊严”，巴师夏如此声称（第73页）。他问道：“哪一个国家有最和平、最道德、最幸福的人民？”是那些对公民的私事干预最少，税收、关税和监管最少，言论、旅行和结社自由最不受阻碍的国家（第74页）。

巴师夏警告法律掠夺的危险

不幸的是，巴师夏声称，法律因两种原因而被扭曲了：“愚蠢的贪婪”和“虚伪的慈善”。贪婪导致大众掠夺他人的果实：“法律从一个人那里拿走财产，将它给予另一个人；法律从所有人处拿走财产，将它给予少数人”（第13页）。简言之，法律破坏财产而不是保护财产。巴师夏具体地提到了美国的奴隶制和关税，作为法律掠夺的例子。“法律成了非正义的工具”（第15页）。

按巴师夏的说法，法律掠夺，“社会主义的诱惑”，有多种形式：“关税、保护、福利、补贴、鼓励、累进税、公共学校、有保证的工作、有保证的利润、最低工资、受救济的权利、得到劳动工具的权利、无息信贷，等等”（第18页）。

巴师夏也警告“虚伪的慈善”，即，非自愿的慈善事业。他反对所有形式的强迫福利、教育或宗教。“我们拒绝接受强加于我们，而不是自由结社的所有结社形式。”巴师夏在政府——一种强制性的体系和社会——一种自愿性网络之间做出了区分。用一种争论的风格，巴师夏回击他的批评者：“我们反对国家教育，社会主义者然后说我们反对任何教育。我们反对国家宗教，社会主义者便说我们不要任何宗教。我们反对国家强加的平等，他们便说我们反对平等……因为我们不让国家种粮食，社会主义似乎就要说我们不让别人吃饭了”（第2页）。

巴师夏反对社会上“善人”让所有人服从细碎的规则和监管，破坏个人自由的不断增长的傲慢。担心公民如果自由将不可避免地自轻自贱，“立法者必须为人民制定计划来拯救他们”（第63页）。对过度热心的要管辖所有公民的立法者，巴师夏写道：“请在一些时刻记住，你随意地处置的这块泥巴，这颗沙砾和这堆粪土是人！他们是你的平等物！他们是像你一样有官能的、自由的人！像你一样，他们也从上帝处得到了自己观察、计划、思考和判断的官能”（第48页）。

巴师夏用对自由的呼唤结束了他的小册子：“愿他们抱怨所有体系，尝试自由；因为

自由是对上帝和上帝的作品的信心的**认可**”（第76页）。

经济学达到了一个高峰，然后走下坡路了

斯密的观点从未落在比那些法国信徒——杜尔阁、孔狄亚克、孔多塞、萨伊、巴师夏和德·托克维尔——甚至早于亚当·斯密的孟德斯鸠更能干的手中。他们将看不见的手和市场体系的自然和谐的教义发挥到了极点。但我们会在下面几章中看到，经济学的故事将要出现出人意料的转折，远离亚当·斯密的乐观世界，走上一条黑暗的道路，直到一代人之后才恢复过来。有意思的是，**背离**斯密的杰作的堕落始于他自己的国家的他自己的两个门徒的著作。

插图及图表注解

P48

插图2.1 查尔斯·路易斯·德·孟德斯鸠（1689-1755）
感谢赫尔顿-格蒂档案馆（Hulton-Getty Archives）提供

P49

插图2.2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
比《国富论》“更短、更清楚、更确实”。
感谢英国政治经济科学图书馆提供

P50

照片2.1 J-B 萨伊被复活了！

P57

插图2.3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59）
感谢布朗兄弟。

P59

插图2.4 弗里德里克·巴师夏（1801-50）
“在揭露谬误方面无人能出其右”
感谢经济教育基金会

P63

照片2.2 亨利·海茨利特（1894-1993）
当代的巴师夏
“但他不是一位经济学家！”
感谢经济教育基金会

第三章 不抱幻想的马尔萨斯挑战新繁荣模型

本章音乐选段：格利格“山王大厅”，选自《皮尔·金特》

人类[是]从其镣铐中解放出来，从其命运的帝国中释放出来……坚定地沿着真理、德行和幸福之路前进！

——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Kramnick 1995: 38）

人口的超级力量只有苦难和邪恶才能约束。

——罗勃特·马尔萨斯（1985[1798]: 79）

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伴随着欧洲乐观主义的新纪元。追随着许诺“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的美国革命和许诺“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社会改革者充满希望。威廉·华兹华斯描述了法国革命早期理想主义，在《序曲》（1986[1850]第11篇第108-109行）中，他写道：

在那个黎明仍然活着已是福份，年轻则是上上天堂！

从托马斯·莫尔爵士写了《乌托邦》开始，哲学家们就梦想着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犯罪、没有贫困的普遍幸福世界。斯密和他的法国同行孟德斯鸠、萨伊、巴师夏和德·托克维尔的天才是能带来和平、平等和普遍赋予的天赋自由经济体系的发展。

现在，这一模型遇到了它最困难的挑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挑战来自斯密的两个门徒——托马斯·罗勃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马尔萨斯特别提出了即使今天我们仍然要回答的问题：一个过度拥挤的星球和过度使用的资源能切断亚当·斯密的民主繁荣观吗？

孔多塞和葛德文的乌托邦观点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针对18世纪末启蒙运动的两个大众哲学家——出色的法国哲学家孔多塞侯爵（1743-94）和激进的英国牧师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而提出的。

18世纪启蒙运动是由一组赞扬科学反对迷信，赞扬理性反对信仰，赞扬宽容反对狂热，赞扬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赞扬唯物主义反对禁欲主义的科学家、哲学家和作家领导的。这些启蒙运动人物——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杰弗逊、潘恩、富兰克林对经济进步和平均主义有无限信仰。他们的大多数认为人口增长是好事，是政治和经济实力和**创新**的重要来源。

启蒙时代的乐观主义者有一个是Marie-Jean-Antoine-Nicholas de Caritate（1743-94），人们知道的名字是孔多塞侯爵。孔多塞是一个数学家和一个自由意志论者，具有令人吃惊的预言之才。在一部预测下200年的深刻的著作中，孔多塞想象了一种制造业和农业的更高生产率，住房和食物重大改革，世界人口和生命预期大大增长，医疗技术迅速进步，疾病减少的未来（Kramnick 1995: 26-38）。他在被宣判死刑逃亡中写了这部题为《人类思想的未来进步》的最后一部著作。他支持法国革命但却因为反对处决路易十六而与雅各宾派极端主义者发生了冲突。在完成该著作几星期后他被逮捕并去世。

较年轻的威廉·葛德文同样乐观，但很偏执。这位英国牧师是一个受到了法国革命激励的理想主义的无政府——社群主义者。他揭露了霍布斯的“肮脏、残暴和短命”（**第一章译作“肮脏、兽性、短暂”是否要统一？**）生活的观点，赞成亚当·斯密，想象一种美好的新的富裕世界。但葛德文与斯密相比，是一个**程度深得多的社会工程师**。他坚定地相信，如果法律和财产被废除，犯罪会消失，人类关系将是完全和谐的，人类或许会变成不死的。葛德文在他的著作《政治正义论》（1793）中**对于一个以人类的健康、长寿、正义和善行为特征的新时代表示了极端的乐观主义**。“将不再有疾病、焦虑、抑郁，也不再有不满意”，他预测说，而且由于“每个人将都用极大的热情寻求为所有人的善”（Downs 1983: 244），政府也将不必要存在。无政府主义者葛德文也反对婚姻、称它是“邪恶、可恶、自私的，最坏的垄断”（Kramnick 1995: 478-79），虽然他娶了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他甚至想象，如果睡眠这一“人体的最大缺陷之一”能够消除，过度人口将不是个问题，因为强有力的性欲将会淡化甚至消失。

伏尔泰在他小说《老实人》中讽刺了这种天真的乌托邦精神，其中一个角色潘格罗斯博士盲目地将所有事件，不分好坏都作为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和有好处的重要组成部分接受。如同潘格罗斯不断地唠叨的：“在这个好得不能再好得世界上，一切都已经是最好”（Voltaire 1947: 20）。甚至玛丽·雪莱，葛德文的女儿，著名诗人皮尔西·雪莱的妻子，在其小说《弗兰根斯坦》中也采取了关于人性的更暗淡的观点。在法国大革命的极端破坏性之后，艾德蒙·伯克（1963: 591）用“??私人领域，使生活变得艰难的困难重重的风暴”替代了华兹华斯的乐观主义。

马尔萨斯挑战乐观主义者

然而，对新哲学纪元的最大挑战来自一个不抱任何幻想的青年牧师罗勃特·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1798年，在32岁，马尔萨斯匿名出版了一部著作，题为《人口论》，它的基本思想是地球上的资源不能跟上不断增长人口的需要。他的消极的著作永久地改变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风景，并迅速中止了斯密、孔多塞、葛德文和其他启蒙运动提倡者的积极观点。马尔萨斯，与他最好的朋友和同行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一起声称对有限资源的压力将总是使绝大多数人类生存在糊口水平。相应地，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逆转了令人高兴的斯密经济学的进程，虽然他们是斯密自由放任政策的严格追随者。

马尔萨斯的重要影响

马尔萨斯对当代思想有如下有力影响：

1. 他被认为是人口学和人口研究的奠基者（实际上，英格兰于1801年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这是马尔萨斯影响的证明）。
2. 他被认为是提供严格的人口控制和**经济增长极限**的社会工程师的导师。（见第79页，更新1。）
3. 他的人口论支撑着许多科学家和社会改革者的阴郁和宿命的观点，这些人预测由于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将**产生的贫困、死亡、苦难、战争和环境恶化。（见86页，更新2。）
4. 他启发了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见71页加框文字。）
5. 他的原理教科书影响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以经济周期是由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总的有效需求的变化所导致的思想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见13章。）
6.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是经济学获得了“阴郁的科学”的名声。（见80页加框文字。）

若干年里，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论被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所接受，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和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许多著名的社会批评家和当代生态学者也支持马尔萨斯的观点，将**饥荒**、短缺、战争和污染归罪于人口过多（见更新2）。就连某些政治保守主义者如罗素·柯克（Russell Kirk）也捍卫马尔萨斯（Nickerson 1975: 3-7）。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赞成马尔萨斯的悲观未来论。马克思主义者拒绝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绝望，恩格斯称之为可以想象出来的“最原始、最野蛮的理论”（Malthus 1985: 51-52）。自1900年以来，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由于看到了食物和经济产量的巨大增长也放弃了马尔萨斯的观点（见86页，更新2）。

不论怎样，在19世纪的其他时期，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多和资源有限的难题一直困扰着当代世界。

谁是罗勃特·马尔萨斯

谁是这位年轻的牧师？他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能使亚当·斯密的新的普遍繁荣的世界脱离轨道呢？

他于1766年出生在萨里区（Surrey）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教名是托马斯·罗勃特，但家人和他的朋友总是称他为罗勃特或鲍勃。（现在历史学家通常称他是托马斯·马尔萨斯。）作为家中八个孩子的最小的一个，他对人口过多问题十分熟悉。大家庭受到了他的基督教信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中，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在地球上繁衍生息”）和当时更多孩子增加父母在老年受照顾的机会的正统智慧的鼓励。

1784年，在18岁时，马尔萨斯去了剑桥大学，他在数学和语言方面（他学了五种）表现突出。在其一生中，他喜欢打**板球**，享受着活跃的社交生活，加入了许多俱乐部。1788年毕业以后，他接受“神召”，成为英格兰教会的牧师。6年后，在1804年，他抛弃了牧师职务，决定结婚。他只是在晚年才使用“神父”这一名头，努力捍卫关于人口的有

达尔文从何处得到他的进化论？从马尔萨斯哪里！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十分重大，而且不仅是在社会科学家中有影响。现代进化论的创立者查尔斯·达尔文将他的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理论归功于马尔萨斯。在《自传》中，达尔文明确表示了谢意：

1838年10月，即在我开始系统研究的15个月之后，我碰巧出于娱乐的目的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准备从对动植物习惯的长期持续的观察中赞赏每个人都在继续的生存斗争**，在这些环境下，有利的变异将常常被保持下来，不利的被毁灭，这一点立刻令我震动。这一结果就是一个新物种的开始（Darwin 1988: 120）。

令人瞩目的是，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他独立地发现了有机进化理论，也赞扬马尔萨斯。在其自传《我的一生》中，华莱士说他在与达尔文受启发的大概相同的时间里读到了马尔萨斯：“也许我读得最重要的著作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是我读到的第一部讨论哲学生物学的著作，它的重要原理是我一生的财富，20年之后，它给了我长期寻找的有机物种进化的有效主体的线索”（Wallace 1905: 232）。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暗示了人类发展的一种进化过程。在第十八章，他表示了这样的思想：上帝，造物主创造人类经历了“特定过程”，“特定时间”（Malthus 1985: 201）。

为什么马尔萨斯直到67岁才同意画像？

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年，马尔萨斯一直拒绝画像。为什么？他天生就有一种遍及其全家族的缺陷。他生来就有裂鄂，这影响了他的说话，使他痛苦终生。一位女士提到了他的“难看的嘴唇和难听的声音”，但其他人没有受其不好看的脸的影响，并认为他本来会很帅气的。然而，马尔萨斯为自己的难看十分尴尬，一生中只画过一次像，那是1833年，他去世的前一年（James 1979: 2-4）。艺术家使得他嘴的毛病难以觉察，就像你在下面的复制品中看到的那样。

马尔萨斯牧师写了一部有争议的著作

马尔萨斯的经典著作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他与他的“一位朋友”关于威廉·葛德文的乌托邦理论的一次争论。这个朋友后来被证明是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一个可爱的老偏执狂，享有恶名的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的信徒。卢梭的最著名的一句话，“人生而自由，到处都带着枷锁”，反映了该时代理想主义和现实的冲突。

关于葛德文的新生活观的争论是如此强烈，以致于年轻的马尔萨斯写了一篇有利的争论性论文来辩驳。按当时的传统，马尔萨斯的著作有一个很长的标题：“论人口原理因为它影响社会的未来改良，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学者的思潮。”担心会使他的父亲在公众中感到尴尬，他使用了假名并称他的父亲是一个“朋友”，但事隔不久，人人都知道作者是谁了。

该时代最受虐待的人

马尔萨斯的末日论是“人口的力量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力量”，因此人类的大多数注定要过一种霍布斯十的日子（1985[1798]: 71）。

该书已经出版便引起了轰动，马尔萨斯不断地受到批判。他的著作创造了来自神学保守派、自由市场派和乌托邦激进派的一场批评和虐待的暴风雨。牧师认为它是反宗教的，他质疑了**造物主**的仁慈，社会改革家则指责马尔萨斯对穷人缺少慈悲。

马尔萨斯不赞成英格兰的济贫法，一种由地方管理实施的温和的福利体系。按照马尔萨斯的**观点**，任何改良社会、缓解欲望的努力都必定是反生产性的。一种福利体系不可避免地使人口增长，但却不能使食物生产增长，因此导致大众的更多苦难。（后来，在1815年，马尔萨斯也出来赞成英国的谷物法，对粮食进行征税，它提高工作的穷人的面包的价格。）

作为一个虔诚的英国圣公会教徒（Anglican），马尔萨斯严格地反对任何形式的生育控制。在人口论的第二版中，他讨论了对人口增长实行晚婚、节欲和其他形式的“道德抑制”的可能性，但他并不主张避孕，在他看来，**那**是可憎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育控制的倡导者却经常引用马尔萨斯来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计划生育”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见79页加框文字**更新1**）。马尔萨斯也不主张人口的零增长，实际上，他的宗教信仰赞成人口增长以服从上帝的繁衍诫令。他只是在人口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增长，导

致苦难和邪行时才反对人口增长（Pullen 1981：46）。

马尔萨斯反对济贫、生育控制甚至免疫吗？

威廉·科贝特，称他为“马尔萨斯牧师”，写下了下列批评：“马尔萨斯及其邪恶愚蠢的信徒，那些要废除济贫法的人，如何阻止穷人结婚？这个愚蠢、狂妄的部落如何能面对一个他们希望拿起武器、为保卫国土奉献生命的劳动者？”（Downs 1983：249-50）。

因此，马尔萨斯被视为是一个反社会的人，“一个反对施粥所、早婚和教区救济，为天花、奴役和杀婴辩护的人；一个在鼓吹过反对家庭的邪恶后却恬不知耻的结婚的人；一个认为世界管理得如此糟糕，最好的行动只能造成最大的害处的人；概言之，一个把一切甜蜜都从生命中抽掉的人”（Downs 1983：149）。

1798年的第一版《人口论》只印了不多本，目前十分罕见，是收藏珍品，比第一版的《国富论》还要昂贵。（按照一个珍稀著作交易商罗伯特·鲁宾的说法，一本第一版的《人口论》可以卖10万美元以上。）在马尔萨斯生前，出版了六版。该书的附录和数据越来越多，篇幅越来越大，但只有没有统计数字和经验事实的第一版被认为是经典。

马尔萨斯用他的余生捍卫、修正他的人口过度论。虽然他继续写了许多其它的小册子和著作，包括1820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他在欧洲大量旅行，考察人口问题。

婚姻、教学和死亡

1804年4月，38岁的马尔萨斯娶了哈利特·埃克塞尔。12月，即婚后仅八个月，他们便有了第一个孩子。这件事情令亲戚朋友飞短流长，虽然这孩子也许是早产。夫妇俩后来又生了三个孩子，婚姻美满。

1805年，他被任命为新建立的黑利伯里的东印度公司学院的现代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学院是为了对东印度公司的公务员的综合教育而建的。因此，马尔萨斯拥有第一个经济学教席。他担任这一职务直至1843年去世。他的最亲密的朋友是同行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两人经常通信，直到1824年李嘉图去世**。（关于他们的关系，下一章有更多说明。）

1834年12月，马尔萨斯死于心脏病，他被葬在巴思教堂。

马尔萨斯的两大著名自然定律

我们已介绍了马尔萨斯的生平，现在我们更详细地介绍他的理论。他想证明什么？

他的人口论有两个基本的“自然定律”，他认为这些是“不争的真理”。

首先，人口以几何级数（1，2，4，8，16，32……）增长。

第二，食物生产（资源）以算术级数（1，2，3，4，5，6……）增长。

结果将是地球的资源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不可避免地出现的“苦难和邪恶”（Malthus 1985：67-80）。马尔萨斯的理论可用图3.1描述。在该图中，我们看到资源的供给在收益递减下增长，而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以几何级数的速度更迅速地增长。点C代表生存水平，在这一水平上，人类的大部分仅能维持生存。如果世界超过了C点，饥饿、死亡和邪恶会使人口重新回到生存水平。因此，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世界注定要停留在一种充满“不可征服的困难”，包括苦难、饥荒和罪恶的日子中（Malthus 1985：69，250）。

问题1：人口增长

马尔萨斯的第一“自然定律”——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正确吗？图3.2倾向于证实马尔萨斯的第一个命题。不论怎样，一直到最近，世界人口的确是按几何级数在增长。在马尔萨斯的时代，地球上的人口不超过10亿，现在则约有60亿。

然而，更仔细地考察1800年以来世界人口的迅猛增长，我们看到其原因在本质上不是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增长是因为马尔萨斯未预见到的两个因素。首先，由于通过医疗技术消除了许多威胁生命的疾病，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第二，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医学的突破、卫生、保健和营养状况的改善，以及事故发生率的下降，人的平均寿命稳定增长。结果，更多的人活到了成年，更多的成年人寿命更长了。这两个因素都反驳了马尔萨斯对苦难和死亡的恐惧。图3.3表明了世界各地婴儿死亡率的巨大变化。

问题2：下降的出生率

马尔萨斯及其追随者的末日景象的另一漏洞是在20世纪下半期出生率的下降。不论是

在工业化世界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出生率从2.8下降到1.9，在发展中国家从6.2下降到3.9。趋势是准确无误的：妇女现在有更少的孩子，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生率远低于更新水平。概括地说，人口增长的几何速度可以说是下降到了算术速度。

出生率的长期下降来源于两个因素：医学的突破和不断增长的收入。因为有了更好的医疗技术、更好的营养、更好的卫生、更好的保健，夫妇明白不需要生更多的孩子来顶替死去的孩子。

马尔萨斯认为更高的收入水平只会鼓励生育更多的孩子。他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人口将更快增长，这进而会抑制人均收入，使之降低到生存水平。

然而，近来的历史证据指示着恰恰相反的情形。富人往往有更少的孩子。见图3.4。为什么富人家庭一般有更少的子女，原因有几个。在许多文化中，有尽可能多的子女提高了父母在老年时得到照料的机会。因此，子女被认为是一种能提供未来收入的强有力的金融资产。在收入水平更高时，对更多子女的需要减少了，而且实际上，现在子女经常被认为是太昂贵了。并且，增长的收入通常意味着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对生育控制方法的更好的理解。

更高收入对出生率的影响为关注人口控制的发展中国家送去了清晰的信息：像亚当·斯密指出的那样，降低生育率的更好的办法是鼓励经济增长和“普遍富裕”。较高的生活水平远比政府对家庭事务中个人隐私的侵犯更为优越。

在第二版和其后的各版中，马尔萨斯修正了他的简单化理论，[?]定人类不一定像昆虫那样生育，而是比动物或植物更可能改变行为。马尔萨斯称这种认为对人口增长的“预防性抑制”。在第一版中，他指出了几种对人口增长的抑制，包括短缺、疾病、瘟疫、饥荒和罪恶，但得出结论说这些抑制最终都将无法减缓两性生殖的内在的强有力的力量。在第二版中，马尔萨斯感到了预防性抑制，如晚婚和禁欲，可能降低增长率。然而，马尔萨斯对此心存疑虑并重申了他以往的信念：人口每25年翻一番（Malthus 1985: 24, 238）。显然，马尔萨斯低估了人类改变养育子女行为的能力。

检验马尔萨斯的第二条定律：资源是有限的吗？

马尔萨斯的第二个“自然定律”是“生存资料只是以一种算术级数增长”（Malthus 1985: 71）。这种说法似乎是相当奇怪的，即使不是明显错误的。动植物都比人类更多生育。女人要十月怀胎，很少产双胞胎或三胞胎，而许多动物，特别是人们用作食物的牛、鸡、猪、鱼和其他动物，都是更[?]生产性的。植物如小麦、玉米和其他作物甚至比动物更多产。如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所述：“人和小麦都是物种，每一种的增长都受各种力量的约束。没有生理的理由认为两物种有不同的增长规律”（Simon 1996:333）。

马尔萨斯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没有哪个国家采取的人口政策比共产党中国更加严厉。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攻击，这也许令人感到奇怪。马克思主义教义强调了产业工人作为关键性的进步元素的力量。然而，各种生育控制政策，例如鼓励晚婚，一直未起到作用，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7.5亿人口以3%的速度增长。为了努力平衡资源和不断增长的中国人口，中国共产党人做了两种变化。他们解放了经济，实施了一夫一妻一个孩政策。

新的自由派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堪称奇迹，独生子女政策迅速抑制了人口增长。今天，中国已有10多亿人口，但年增长率已下降到1%。尽管如此，中国为其这一对中国人个人生活的深刻干预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 流产在中国急剧上升，特别是女性胎儿。（中国人有对男孩的强烈偏好。）
2. 中国有严重的老年问题，有巨大而且不断增长的高龄人口和相对少的支持他们的青年工作人口。
3. 中国^{存在}不断增长的男女差距。目前，55%的中国人是男性，造成了严重的女性短缺。中国男人正在经历一个难以找到配偶的困难时期，而诉诸拐卖妇女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妇女贩子。
4. 传统的中国大家庭已逐渐解体。

以下是独生子女政策最终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感谢我的妻子乔·安（Jo Ann）指出了这一点）：

没有兄弟
没有姐妹

没有侄女
没有侄子
没有舅舅
没有姑姨
没有堂、表兄弟和姐妹
四个祖父母和两个父母溺爱着一个孩子。

独生子女政策的最具悲剧性的方面是它不必要。如朱利安·西蒙和其他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更高的人均收入导致更低的出生率。因此，中国只要通过经济自由鼓励经济增长，就能达到同样目标，而无须采取极端的人口控制措施。

资源的稀缺

但马尔萨斯的确提供了支持其动植物可能不像人口那样增长的理由。他迅速承认“大自然用最浪费最慷慨的手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她在养育他们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是相对节约的”（1985：71-72，224-25）。换句话说，没有维持生命的充足的肥沃的土地，也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

哪一个郁闷的批评家给经济学贴上了“郁闷（阴郁？）的科学”的标签？

问题：谁是对将经济学称为“郁闷的经济学”负责的人？

1. 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在《穷人理查德历书》中写道：“经验是宝贵的学校，你们傻瓜在别处是学不到什么的”（**经验是宝贵的学校，但傻瓜们才会光从经验里学**）（1986：225）。
2. 让-巴蒂斯特·萨伊，他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描述经济学家时，说经济学家是“懒散的梦想家，他们的理论，只是满足文字上的好奇心，对实践毫无用处。”（1880：xxxv）。
3. 爱德蒙·伯克，他在《法国革命反思》中写道，“骑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继之而来的是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学家的时代；欧洲的光荣以永久地灭绝了”（1955：86）。
4. 沃尔特·白哲特，《经济学家》的主编，他写道：“每一个真正的英格兰人在内心中都不会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去世而感到遗憾”（Reynolds 1989：xiii）。
5. 托马斯·卡莱尔，英国散文家，他在《黑人问题》中写道：“经济学不是‘快乐的科学’，而是郁闷、孤独而且的确的确是相当悲哀痛苦的科学”（1904：354）。

上述五个说法都是准确地引用的，**都由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但只有托马斯·卡莱尔是对“郁闷的科学”负责的。

谁是这个批评家？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是著名的传记学者、历史学家、社会、文学和政治评论家。一位在伦敦郊区度过其大部分成年生活的苏格兰人，他对许多问题都有**极端的**看法。在其生命临近终结时，他被称为“切尔西的维多利亚隐士”。

“郁闷的科学”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问题：卡莱尔的“郁闷的科学”是指什么？

1. 马尔萨斯、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对人口过度、地球资源的可悲性质和工资铁律极为悲观。
2. 经济学总是计算政策和能够改善经济的救济措施的成本，总是警告急于对新宠项目花钱的政治家：“成本太高了！”
3. 经济学家在预测通货膨胀、利率和下一次衰退方面的工作令人不敢恭维。

正确答案：都不是。所有三个答案，虽然可能并经常被用来解释卡莱尔的意义，但都不是准确的，或者说是令人迷误的。卡莱尔，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主义者，实际上是在抱怨仁慈君主制的“旧制度”的衰落和功利个人主义及民主的兴起。他反对赞成放任、自由竞争、供给和需求的“金钱关系”和“劝说我们放弃不必要的统治的肤浅??”的古典经济学家（Milgate 1987:371）。卡莱尔语言的大多数是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语言是类似的。概言之，卡莱尔是在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大声呐喊，他把它定义为是“无政府+警察”。

他最初是在1848年在一个关于种族主义的演讲中把经济学称为郁闷的科学，这次演讲的题目为“黑人问题”。今天的读者也许会为“黑鬼”一词而感到震惊，但在当时，这是通用的。有趣的是，在上述引语中，卡莱尔谈到了“快乐的科学”。使用了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意义有重大改变的形容词。在最近重印的卡莱尔的小册子中，它已被更名为“关于黑人问题的即兴演讲”，但卡莱尔确定无疑地是将它作为一个种族主义术语使用的。

在这一演讲中，卡莱尔讨论了争论不休的奴隶制问题。19世纪30年代，大英帝国已宣布奴隶制非法，但还是在为奴隶制废除后西印度群岛以前的奴隶和商业利益集团之间的劳工骚乱问题争论。卡莱尔，他的沙文主义遗产根深蒂固，是同情工人苦难的，但他也是工作福音的坚定信徒。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西印度群岛以前的奴隶要无所事事，不愿劳作。闲散是“国家皮肤上的永久污点”，卡莱尔声称，因此，所有公民，不论肤色，如果不能被说服工作，就要被“强迫”工作。“但如果你的黑鬼不为所动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十分肯定地，他必须被强制，他应该被强制，也必须被强制”（Carlyle 1904[1849]: 355-56）

卡莱尔，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家，因为这种法西斯倾向受到强烈批判。小册子报告说在他的演讲中，几个公民离席而去表示抗议。作为一位总是“反对自由”的反动派，卡莱尔还作了其他有争议的判断。他反对普选权，反对犹太人，认为爱尔兰人无能、懒惰。由于他的偏执观点，卡莱尔失去了许多朋友，包括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称他的讲话是“真正的魔鬼作品”（Stafford 1998: 110）。

正是在他有争议的关于西印度黑人的演讲中，卡莱尔攻击经济学家在分析西印度群岛的劳工骚乱时，用“供给和需求”替代了“命令和服从”。他呐喊道：“这种社会科学——不是一门快乐的科学，而是令人懊恼的——它在‘供给和需求’中发现了宇宙的奥秘，将人类的统治者的职责降低为让人们自行其事，也是精彩之极的。我要说，不是像我们听说过的某些科学那样是门令人愉快的科学，不，不是。它是郁闷、孤独而且的确确是相当悲哀痛苦的科学”（Carlyle 1904: 353-54）。

在另一处，卡莱尔评论说，“在所有的鸭鸣声中，政治经济学家的叫声是最响亮的。它不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什么使人幸福、道德、有信仰，或者相反，它告诉我们如何用法兰绒上衣去交换猪肉”（Viner 1963: 8-9）。

1849年以来，这种称谓已经固定下来了，特别是在许多社会科学家都有抨击全球资本动力学的倾向的情况下。

收益递减律

在以后各版中，马尔萨斯发展了这一稀缺性思想。支持人类生活的手段是“受土地稀缺性的限制，受地球上非常大部分地区巨大的资源贫瘠限制，受在已经种植的土地上资本连续增加所带来的生产物必定递减的限制”（1985: 225）。资源使用的这种“不变的递减趋势”今天被称为“收益递减律”，马尔萨斯被认为是第一个发展了经济学中这一至关重要的概念的人。它是指这样一种事实，当我们对固定数量的土地增加更多的劳动或资本时，产量以越来越缓慢的速度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在图3.1中，生产函数是稍稍弯曲的。

马尔萨斯警告说，最肥沃的土地和资源最先耗尽，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面对着土地和资源质量的逐渐下降。但收益递减律只是在我们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即技术和其他资源数量既定时才起作用，而在长期中，所有投入都是可变的，不论是土地、劳动还是资本。由于集约型的耕作技术，在现代世界中，土地的经济重要性已经降低了。不幸的是，马尔萨斯和他的门徒没有理睬这个关键性的事实。

马尔萨斯为什么如此悲观？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吗？

土地因你而被诅咒。

人口学家马尔萨斯与神学家马尔萨斯是不可分离的。

——J. M. 普伦 (1981: 54)

马尔萨斯确信虽然地球母亲“用最浪费最慷慨的手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她在养育他们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是相对节约的”(1985[1789]: 71-72, 224-25)。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也许这是他的宗教信仰。作为一名虔诚的圣公会牧师,马尔萨斯一直被教诲说动植物生命“可在大地上繁殖”(创世记8: 17),但在人堕落之后,上帝将亚当和夏娃驱逐出了伊甸园,“诅咒了土地”(创世记 3: 17)。

一个仁慈的上帝会创造一个不能支持其创造物的地球吗?马尔萨斯的宗教批评家回答说,如果这是真的,人类又如何完成他们的使命,“生养众多的儿子,遍布全世界,统治全世界”(创世记 1: 26-31)?诗篇作者难道没有写下:“主啊,你的造物何其多!你用智慧造就他们,使他们遍布大地”(诗篇104: 24)?然而,马尔萨斯,他经常持非正统观点把上帝的“诅咒土地”在很大程度上按字面理解。在其著作的结尾,马尔萨斯肯定这一不变的“自然律”：“至高无上的存在已经规定……人口当比食物增长更快”(1985: 204-05)。

马尔萨斯可能注意到了——一个事件,创世纪也提出了关于人口过度可能性的最初的讨论。圣经讲述了亚伯兰和罗德人和动物之间的土地短缺:“土地不够用……亚伯兰对罗德说……全部土地不都在你的眼前吗?……如果你选左边的,我就选右边的,如果你选右边的,我就要左边的”(创世纪13: 6-9)。

马尔萨斯反对“普遍富饶”

马尔萨斯似乎也采取了一种反对财富的态度,这在当时的基督徒中十分常见,一种明确反对亚当·斯密乐观主义观点的观点。马尔萨斯写道,繁荣“常常败坏而不是升华品格”(1985: 209),闲暇“将产生邪恶而不是善良”(208页),并且“如果人口和食物以同样的比例增长,人也许永远不会走出野蛮状态”(206页)。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人口过度和糊口生活是有好处的。它们迫使人们工作,发展技能,“使心灵变软、更人性化”,“**获得**所有基督徒的品德”(205-06, 209)。

在接下来的各版本中,“出于对我们教会的某些杰出人物意见的尊重”,马尔萨斯略去了这些说法(和最后的两整章)(Pullen 1981: 48)。

有趣的是,在第二版中,他添加了下面的这些对**没有价值**的穷人的严厉说法:

一个出生于一个被拥有的世界中的人,如果他不能从他对之有要求的父母得到生存资料,如果社会不要他的劳动,便没有权利得到最小一部分食物,而且在事实上,在他所处境身之处也没有什么事,自然的盛筵没有给他空位,她告诉他消失(Ross 1998: 22)。

也许马尔萨斯正在玩味着圣保罗的话:“不劳动者不得食”(新约一帖撒罗尼迦后书 3: 10)。

马尔萨斯略去了一个重要的元素

马尔萨斯忽视的是农业中的技术进步、在地球上新矿藏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不断发现,以及价格在决定资源耗尽速度大小方面的作用。概言之,他未能认识到人类的天才。

在关于食物生产方面,马尔萨斯被证明是大错特错了。随着麦考米克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的出现、化肥的使用、灌溉面积的扩大以及其他科学和管理方面的突破,耕地面积和食物产品大幅度增长。图3.5描述了美国农场的玉米、小麦和棉花的劳动生产力。

食物产品的增长支持了更大量的世界人口,减少了全球的饥荒。并且,大部分饥荒都被认为是不适当的政府政策——不让农民享有其劳动果实,限制国外进口,不鼓励使用新的农业生产工艺——所造成的(Simon 1996: 92)。

“公共地的悲剧”

虽然环境主义者的极端预测没有成为现实,但这并不是说资源的过度利用不是问题。世界的确面临着对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某些地区的无林化、渔业资源的耗竭、土气侵蚀、某些动物的灭绝或濒于灭绝以及地球大气层的可能的破坏的严重关注。

1968年，在《科学》上，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人类生态学教授加列特·哈丁写下了一篇关于这一问题的环境学文献的经典论文。它的题目是“公共地的悲剧”，（它已被收入100多部文集）。哈丁注意到当资源被公共拥有时，资源有被过度利用的趋势。他使用的例子是公共放牧土地。由于没有人单个地拥有该地，每个牧人都有动力在牧地上增加一头动物的放牧。结果，土地被过度放牧了，用哈丁的话来说，“在一块公地上的自由带来了一切的毁灭”（Hardin and Baden 1977: 20）。

产权和市场价格的缺乏创造了“公共地悲剧”——导致了不必要的污染、动物的灭绝、森林的毁灭和环境的破坏。许多环境主义者强调对公共地的政府监管，而经济学家则强调公共地区的私有化，如果可能；以及对资源的完全定价作为重建对一种稀缺资源的适当管理的最好方式。

总结：马尔萨斯放弃了斯密的观点

罗勃特·马尔萨斯的故事在发展对不断增长的经济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动力学的理解方面是富有启示意义的。当然，马尔萨斯认识到政府干预在消除贫困、控制人口增长方面是通常反生产性的。因此他和亚当·斯密一样，采用了一种自由放任哲学。但他最终背离了他的老师，放弃了对地球母亲和自由市场使资源供给与不断增长的人口不断增长的需求相匹配的能力的信心。从根本上说，他未能理解价格和产权作为配给稀缺资源的动力和解决问题机制的作用。进一步说，他误解了不断增长的企业家经济的动力学——一个数量更大的人口如何通过创造新思想和新技术创造自身的繁荣种子。

虽然亚当·斯密确实提出了生存工资问题，但他坚定地相信挣工资者能通过机器、工具和设备的使用而超越生存水平。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逃脱贫困的机制。而马尔萨斯，对人类逃脱贫困和恶习（苦难和邪行？与前统一？）的能力都是悲观甚至是宿命论的。人类命中注定要被工资铁律束缚。大卫·李嘉图——马尔萨斯最好的朋友，掉进了同样的陷阱。在下一章，我们将探讨李嘉图如何与马尔萨斯联手在郁闷的路上进一步滑了下去。

更新2：终极的马尔萨斯争论：厄里希对西蒙

在这个世界历史上非常关键的时期，人口过度是人类幸福和进步的最严重威胁。
——朱利安·赫克斯利《太多的人口》（Osborn 1962: 223）

解决食物问题的最终办法将是控制世界人口的增长。
——莱斯特·布朗（Ross 1998: 138）

马尔萨斯理论往往将致命的饥荒、极端的贫困或环境被破坏归罪与过度的人口和经济增长，而不是低度发达或政府政策。人口过度和环境破坏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最高点。1960年，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出版了一部警世主义的著作，年轻的斯坦福生物学家保罗·R·厄里希的《人口炸弹》。厄里希写下了一个令人惊骇的景象，警告说：“在如此晚的时候，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世界死亡率大幅度上升……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将经历饥荒——数以亿计的人口将饿死。”什么会导致这一灾难？厄里希用一种马尔萨斯主义的立场说：“我们必须在人口压力永久性地毁灭我们这个星球之前，采取行动逆转我们对环境的破坏。出生率必须与死亡率达到平衡否则人类将会让自己销声匿迹”（厄里希1968：序言）。

厄里希和Sierra俱乐部认为无法控制的人口是一个威胁，耗尽太多的珍贵资源，破坏了自然，污染了环境。在发展中国家，厄里希在提出“人口——食物危机”时，完全是马尔萨斯式的：“在不发达国家，每年食物生产都会稍许更加落后于新生人口的增长，人们都会更加饥饿地上床睡觉……大规模的饥饿现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1968：17）。

厄里希的世界末日论著作继之以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出版于1972年。这一关注社会的团体提倡人口控制，限制美国等工业国家的消费，将这些作为从全球生态危机中拯救世界的办法。

一个乐观主义的经济学家挑战环境末日论

在20世纪60年代，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是一个担心人口过度和核战争的经济学家教授，他认为这是对人类的两个最大的威胁。他开始研究人口增长的经济学，发现标准的马尔萨斯观点与事实不符。他得出结论说，既没有不可持续的人口增长也没有被蹂躏的土地。

西蒙在几部书中发表了自己的发现，这些书充满了生活如何改善的数据资料。基本上，他提出了两个论点：

首先，在供给方面，自然资源在长期中实际上是无限的。如果不可再生的资源煤炭用尽，更高的价格会鼓励替代品例如原油的发现和使用。此外，企业家一直都在做出新的发现，显著地增加了已知的自然资源或使得更多资源能不断被开发的**降低成本**技术的存量。由于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在长期中不是固定的，收益递减律可以被无限地推迟。与此相对应，我们不会缺少食物、水、油、**树木**、清洁空气或任何其他自然资源，因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可用商品的数量是不断增长的。

总之，“每个世界末日论者[包括马尔萨斯]的预测都被证明是大错特错的。在各个时期，金属、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都变得更加丰富，而不是更加稀缺”（西蒙1996：12-15）。

第二，在需求方面，大量而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是有利的而且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水平，因为它提高了有用知识和受过训练工人的存量。按西蒙的说法，“人类不只是更多张嘴，也是有助于发现对人类问题的创造性解决办法，并因此使我们在长期中境况更加改善的生产性和发现性的头脑。”并且，他说，“人口增长刺激了对现有技术的采用和对新技术的发明”（西蒙1996：376）。图3.6是一个描述科学活动和人口规模的密切关系的有关图形。

西蒙补充说，过度的人口增长不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财富增加和生育控制手段的使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出生率都在下降。

厄里斯和西蒙的1000美元之赌

西蒙对自己的发现非常确定，他用1000美元打赌：在10年中，5种商品的价格将会下降。厄里希于1980年10月同意赌。5种商品是工业用金属——铬、铜、镍、锡和钨。如果1990年这些金属的价格合起来超过1000美元，西蒙将用现金付差价。如果价格下降，厄里希方将付给西蒙。

在接下来的10年，世界人口增长了**8亿多**，是历史上增长规模最大的时期，但在1990年秋天，金属价格急剧下降，厄里希寄给西蒙一张576.07美元的支票。西蒙寄出了感谢信以及另一个挑战，将赌注增加到20000美元，标的是未来某个时日的任何一种其他资源。厄里希拒绝赌下去。

西蒙沾了点运气，因为如果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时期，他会输掉。但不论怎样，西蒙的判断是正确的：虽然需求不断上升，新技术和新发现大大增加了80年代自然资源的供给，降低了基本商品的价格。显然，厄里希和其他生态学家低估了人类的天才和地球潜在的平谐。一切全球性**大灾变(启示录?)**再一次被推迟了，悲惨的先知名誉扫地。

插图及图表注解

P71

照片3.1 查尔斯·达尔文（1809-82）
查尔斯·达尔文出于娱乐的目的读到了马尔萨斯
感谢赫尔顿-格蒂档案馆提供

P72

插图3.1 托马斯·罗勃特·马尔萨斯（1766-1834）
该时代最受虐待的人”（Down 1983：249）

P75

纵轴：人口、资源
横轴：年
虚线处：生存水平
图3.1 人口增长、资源和生存水平

P76

图3.2 估计的世界人口，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2000

来源：Simon（1995：35）。经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允许重印

P77

图3.3 各国下降的死亡率，1860-1960

来源：Simon（1995：43）。经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允许重印

P78

图3.4 某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出生率

来源：Simon（1996：353）。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允许重印

P81

照片3.2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

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主义者

它是郁闷、孤独而且的确的确是相当悲哀痛苦的科学

感谢赫尔顿-格蒂档案馆提供

P84

图3.5 美国农场玉米、小麦和棉花的劳动生产力，1800-1967

来源：Simon（1995：375）。经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允许重印

P87

图3.6 科学活动与人口规模（考虑了人均收入因素），20世纪70年代

来源：Simon（1996：381）。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允许重印

第四章 狡猾的李嘉图将经济学引入险路

本章音乐选段：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巴赫作品第565号

出类拔萃的大卫·李嘉图，简直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

——保罗·萨缪尔森(1962：8)

李嘉图才华横溢却执迷不悟，他把经济学的车开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而在他同样才华横溢并且同样执迷不悟的追随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推动下，越走越远。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965：1i)

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1772-1823)声名显赫的理由有很多：他是史上最富有的经济学家；是马尔萨斯最亲密的朋友；他支持自由贸易理论，主张实行硬通货，提出比较优势原理以及古典经济学中很多其他较为成熟的理论；他的自由放任政策更是与亚当·斯密毫无二致。

李嘉图的积极影响

李嘉图在他那个时代可谓是大红大紫，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他对健全货币的论证极具说服力，最终导致英国国会通过了1844年的《皮尔条例（Peel Act）》[银行条例]，由此建立起严格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本位制(monetary standard)。而他对贸易壁垒(trade restrictions)批驳不仅令人信服，并且卓有成效。1846年英国废除了《谷物法》，解除了臭名昭著的农业

产品关税壁垒无疑与此有直接关系。

经历这两项历史上著名的政策变革之后，英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食品主要依靠进口，同时对外出口纺织品和制成品，并由此驱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可见，对于李嘉图我们还是应该大加赞赏，他的政策符合亚当·斯密的思想，也带来了市场机制下的繁荣。

此外，许多人认为李嘉图首创了具备数学精确性的严谨的经济学。这位金融经济学家在抽象推理方面极有天赋，他能建立一个仅包含很少变量的分析模型，经过一系列处理后却能得到有力的结论。这种建立模型的方法后来被许多杰出经济学家采用，包括20世纪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而且，这种方法还带来了计量经济学的普及。

消极的是……

尽管如此，李嘉图也有不光彩的一面。他的分析建模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货币数量论和比较优势原理，而另一方面却产生了劳动价值论、生存工资铁律以及某些经济学家说的“李嘉图恶习 (Ricardian vice)”。所谓李嘉图恶习，可以解释为或是过度使用抽象建模或是采用错误且带有误导性的假设条件，来“证明”想要得到的结论(例如他的劳动价值论)。卡尔·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者们继承了李嘉图的最糟糕的一部分思想，它们原封不动的出自李嘉图的《原理》(1951)。事实上，马克思把李嘉图当作他的思想导师 (intellectual mentor)。在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李嘉图权威的传记作者，的影响下，一批“新李嘉图”社会主义者成长了起来。

从根本上来说，尽管李嘉图热爱斯密的学说，但是他却把经济学引向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与他的政策建议背道而驰的道路。李嘉图创立了一种思考经济问题的全新思路，这一思路偏离了亚当·斯密的和谐“增长”模型，走向了一个对立“分配”模型，其中工人、地主和资本家为争夺经济的甜头而大打出手。而马克思和那些社会主义者们则把李嘉图敌对斗争的体系发挥到了极致。斯密的模型关注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而李嘉图的模型则强调经济成果是如何在不同的群体或阶级中进行分配的。李嘉图关注的是阶级冲突 (conflict)，而非斯密所说的各方利益的“自然和谐”。

李嘉图恶习

最后，还有李嘉图恶习。经济学家们在它面前好像总是不堪一击。穆勒、瓦尔拉斯、帕累托、费雪、萨缪尔森、米塞斯乃至凯恩斯无不饱受其苦。而我们今天的研究生们却都“固执地”迷恋着它(Colander and Brenner 1992: 2)。

那么李嘉图恶习究竟为何物呢？保罗·萨缪尔森称之为“抽象的方法论”(abstract methodology)(Samuelson, 1962: 8)，而罗纳德·科斯名之曰“黑板经济学”(Coase 1992: 714)。简单的说，李嘉图恶习就是把理论和历史长时间的割裂开来；是将经济学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剥下来；是纯粹的演绎推理加上高度数学化、公式化，完全无视历史、社会学、哲学和制度框架；是在不现实的或错误的假定条件下进行抽象的思考，建立抽象的模型。读者不妨去看看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1947)或新李嘉图主义者皮耶罗·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萨缪尔森的书不过是微分方程的罗列和大量脱离现实假定的堆砌，对活生生的现实却只字不提。而斯拉法作品几乎无一言一字涉及现实世界(见108页关于斯拉法的加框文字)。他们都非常好地继承了李嘉图的传统。

哈佛大学的一位商学教授埃尔顿·梅约(Elton Mayo)作过这样的论断：对整个经济理论基础的误解必须追溯到大卫·李嘉图(1945: 38)。他将李嘉图这种不现实的理论推演，归咎于他与生产经济的实际严重脱节的股票经纪人出身(1945: 39)。

李嘉图把他的技巧发挥得太过分了

抽象理论推演确定无疑发端于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面也尽是理论陈述，但是他的理论总是有大量的史实作为辅证。李嘉图则不然。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他天才的头脑，足以称得上是出色的理论家的头脑，却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兴趣”(Snooks 1993:23)。

正是这种抽象理论推演，迫使萨伊将经济学家称为“只会白日做梦的闲人”。就算是萨缪尔森(他本人就是一个抽象思想家)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的确看地来如此，我们最优秀的学生可谓是无所不知，但就是对常识一无所知”(Samuelson 1960: 1652)。阿加·克莱默(Arjo Klammer)和大卫·柯兰德尔(David Colander)主持的研究表明了一种对弥漫整个经济学博士研究中的高度抽象数学建模严重失望。克莱默和柯兰德尔对常春藤联合会[常春藤联合会：由美国东北部八所大学和学院组成的一个联合组织，包括布朗大学、哥伦

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译者注] 的六所学校硕士研究生项目进行调查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学越来越脱离现实”（1990: vx）。形式主义在这一学科内依然是坚不可摧的。¹

建立富有启发性的模型非常有利于得到准确的估计和符合要求的结论，但是模型也很容易扭曲事实从而导致破坏性的结论。李嘉图就是把他的理论推演发挥到了极致，做了各种各样的限定和可疑的假定，其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他想要的结论。而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价格是由劳动力成本决定的。

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这位著名金融经济学家的生平和思想，无论这些思想是对是错。

犹太人出身的李嘉图

李嘉图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排行第三。家里面孩子很多，至少有17个，也许多达23个(Sraffa, 1955:24)。他多子的父亲的名讳非常犹太式，叫做亚伯拉罕·伊斯雷尔·李嘉图。亚伯拉罕·李嘉图是一个非常虔诚的西班牙系犹太教徒。这一教派的西班牙——葡萄牙裔先祖在15世纪末被驱逐出西班牙之后一直定居在荷兰。由于这位成功的股票经纪人想要建立一个大家族，所以亚伯拉罕·李嘉图一家于1760年迁居到伦敦，12年后大卫就出生在那里。在阿姆斯特丹一所希伯来人学校学习两年之后，14岁的大卫受雇于其父开始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供职。

令人爱恨交织的李嘉图

很少有哪位经济学家对李嘉图能够完全无动于衷。要么对他大肆推崇，要么对他恨之入骨，有的人干脆对他爱恨交加。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会这样赞美他：“李嘉图的思想是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接着又会这样责备他：“李嘉图（的经济学）对经济学界长达100年的统治对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不啻为一种灾难”（Keynes 1951: 117）。

保罗·萨缪尔森会赞誉这位英国经济学家思想造诣深厚、作为投资者的卓越超群，说他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然后，又宣称他是“经济学家里最被过誉的一位”（Samuelson 1962: 9）。

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现在是一位经济思想史方面的专家。他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曾经为李嘉图的思想所震撼，因此他自己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李嘉图的，他给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取名叫大卫·李嘉图，还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挂上了李嘉图的画像。他这样赞美李嘉图的方法论：“如果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部分分析的机器，是一种思维方式，而非一大堆具体的结论，那么就是李嘉图真正发明了经济学这部机器所使用的技术”（Blaug 1978: 140）。布劳格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其中的一条脚注里他引用了所有有关李嘉图的文章和书。这条脚注长达四页，差不多可以算是学术史上的最长的了（Blaug 1997: 46-49）。

随着时间的推移，布劳格的思想走向成熟并发生了转变，他开始谴责李嘉图把经济学引入了一条通往“悲观”模型的危途，并批评他“可悲而又令人难以理解”地尝试寻找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1997: 45, 24, n. 1)。在他的《经济理论回顾》第五版中，布劳格引用希腊诗人阿基洛古(Archilochus)的诗句：“狐狸千伎百俩而有尽，刺猬凭一技之长而无穷”。

（这句诗的放在这意思不大对吧，译成：狐狸博闻广知，而刺猬坐井观天？？可是这样不符合原诗）按照布劳格的意思，亚当·斯密就是一只博闻广知的狐狸，而李嘉图则是“一只彻头彻尾的刺猬”。他补充道：“曾几何时，我欣赏刺猬，但那时我少不更事，眼界狭窄。现在，我更喜欢狐狸——斯密胜于李嘉图”（Blaug 1996: xviii）。

李嘉图的婚姻然后立即失去的继承权

然而，1793年，在他21岁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大卫娶了一位教友派信徒(Quaker)。（他自己后来皈依了一神教派(Unitarian)，而他的兄弟姐妹最终也大多追随他离开了犹太社群。）尽管他父亲最终谅解了他，但他的母亲为此大为光火，逼迫亚伯拉罕将他逐出家门，并剥夺他的继承权。不管怎样，大卫都不得不开始依靠仅有的数百英镑自谋生计了。

依靠在给他父亲当学徒时积累的经验和他在针线街(Threadneedle Street)上的股票交易所咖啡厅里面的交际，李嘉图踏足股票经纪业，并承包政府贷款，因而数年之间就积累了万贯家财。（见96页加框文字，“李嘉图是如何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经济学家的。”）

李嘉图身材匀称，不过体形偏瘦，个子矮小。但是他声音高亢激昂，对他在下议院进行演讲非常有利。晚年的时候一耳失聪，牙齿脱落，使他饱受其苦。

李嘉图是如何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经济学家的

年方21岁的李嘉图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时候，他拥有的财产不过800英镑。而仅仅30年后他去世的时候，即1823年，他的财产约价值675,000至775,000英镑，简直不可思议。这使得他每年从中获利28,000英镑(Sraffa, 1955: 103)。没有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内，能够如此富有。

李嘉图之所以声名显赫，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作品博大精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生财有道。而经济学家中二者兼顾的寥寥无几。(凯恩斯算是者寥寥中的一个，可以和李嘉图相提并论，他在大萧条期间赚取了650,000英镑的财富，同时还著就了《通论》。见13章)

李嘉图生财的秘诀何在呢？如果他写一本有关投资的书，他会告诉我们什么秘密呢？

套利之王

李嘉图是通过操作的是自己的账户进行股票投机赚钱的，而不是当股票经纪人(broker)。股票投机商(stockjobber)就好比是纽约股票交易大厅里职业投机商(specialist)，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股票，适时地造市生利。19世纪早期，虽然诸如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等大型特许公司(chartered companies)发行股票，但是大多数交易的对象都是政府债券，称为统一公债(Consols)。除此之外，那个时代不存在公司和公司股票。

李嘉图早期的主要财源是投机政府公债。他投身规模十倍于现金市场的期货市场(forward market)。李嘉图的一位同代人这样描写他：“有人说他反应极其敏捷，能够在大市变化时，察觉到股票(政府公债)相对价格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偶然差额。”他主要从事短期交易，而且他“会将一大笔资产中的一小部分变现”，一般是一天200至300英镑。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从事的都是小额交易，因此就算出了问题也没什么好心疼的”(Sraffa 1955: 73, 81)。

历史学家们对于李嘉图致富在多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内部人交易(insider dealings)和操纵股市一直争论不休。根据诺曼·J·谢尔伯林(Norman J. Silberling) (1924)的说法，当时存在一个小圈子，里面都是操纵市场的行家，他们被称为“熊市投机家(Bear-jobbers)”，因为会在政府债券市场上进行“熊市奇袭(Bear-raids)”，而李嘉图就是这个小圈子的首脑。李嘉图及其一党设法使公众发生恐慌，进而使统一公债的价格急剧下降，然后低价收购之并从较高的利息率中获利。谢尔伯林指责李嘉图1810年写的那本名为《贵金属的高价》的小册子目的就是想压低债券价格。1810年后期债券的价格果然发生了迅速下滑，Goldsmids的成员之一，同时也是政府贷款的主要金融专家，为此而自戕身亡。不过李嘉图的传记作家，皮耶罗·斯拉发却质疑这样的说法。他提醒人们注意1810年李嘉图曾经积极投标于政府贷款，因此统一公债价格下降对他来说并无益处。不过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李嘉图并未中标(Sraffa 1955: 91-92)。

李嘉图的投资黄金律

李嘉图对他的交易技巧未曾留下过之言片语。而他的商业伙伴非常谨慎地说他有两个“黄金律”：一为“止损”一为“增利”。他还会利用股价高估和低估的情况，基于他的观察结果，投资公众们总是对各种事件反应过度，有时他可能还会煽动这些过度买入或过度卖出的条件，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

尽管如此，李嘉图却不是一个吝啬鬼。一赚了钱他就为他夫人和孩子购置更加豪华奢侈的住宅，还经常带他们到布赖顿去度假。他1815年左右退休以后，成为了一名乡绅(country gentleman)，买下了哥特科姆庄园(Gatcomb Park)（一大宗地产），投资土地、抵押贷款和法国股票。

作为金融家的李嘉图

开始竞标政府贷款的承包人，是李嘉图萌芽中的金融职业生涯的一个飞跃。19世纪初叶，拿破仑战争期间，政府依靠股票交易来保证不断增加的支出。李嘉图和他的商业伙伴很快就和一些知名的金融巨头展开了竞争，如：Goldsmids，巴林银行(Barings)以及罗斯柴尔德银行(Rothschilds)。竞争的胜出者可以获得财政大臣的特别奖励。李嘉图和他的商业伙伴们非常漂亮的赢得了这次竞争，他们获得了1811至1815年战争期间所有的政府贷款项目。

赚到一百万磅

1815年6月14日，也就是滑铁卢战役的前4天，政府要进行战争期间最大也是最后一次

贷款，数额高达36,000,000英镑。政府公债萎靡不振，因为贷款数额太高，而战争的结局仍是未知之数。此项贷款共有四方参与竞争，而李嘉图最终胜出。

李嘉图非常有勇略地持仓观望于极度低迷的政府债券市场，这也是他最大的一次冒险。其他胆怯的投资者都在滑铁论战役之前清仓(请看下面马尔萨斯的情节)，但李嘉图没有。他一直等到威灵顿将军战胜拿破仑的惊人消息传来。政府公债的价格顿时飞涨，而他自己也立时成了百万富翁。1823年9月14日《星期天时报》在他的讣告里曾叙述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传闻，就是他在滑铁论战役期间赚了一百万磅。

李嘉图资助他的朋友马尔萨斯

李嘉图经常资助他的朋友们，例如罗伯特·马尔萨斯，而那些费用在股票市场里不过是些零头。滑铁论公债发行之，前，马尔萨斯曾经让李嘉图为他购买5000英镑的债券。随着战争临近，马尔萨斯坐不住了，他要李嘉图把自己的份额卖掉，哪怕只能获得很少的利润，虽然这么做“可能是错误的，或是给你(李嘉图)添了麻烦”。李嘉图迅速地满足了马尔萨斯的愿望，而结果是马尔萨斯没能象李嘉图那样发财(Sraffa, 1955: 84)。

退休、政治生涯以及英年早逝

1814年，42岁的李嘉图成为一名乡绅，买下了格洛斯特郡的哥特科姆庄园(现为安妮公主所有)作为自己的不动产。由于李嘉图对数学、化学、地质学乃至矿物学都有着广泛的兴趣，他经常在哥特科姆庄园召集讨论会。后来他又积极参加伦敦地质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1799年他在巴斯 (Bath)的时候买了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且从那时候开始就对经济学发生了兴趣。

1815年左右李嘉图的生活已是富足有余，但是也失去了对股票交易的兴趣，他开始经常就经济问题写作。1817年他发表了自己的宏篇巨著《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9年他获得下议院的一个席位。

1823年李嘉图51岁，并不算年老，却突然因耳部感染而与世长辞。他的妻子和八个儿子中的七个都比他长寿。他的遗产分配极为不公，三个儿子从中获益(见111页的加框文字，标题是：李嘉图讨厌女性么？)。他还将一部分财产遗赠给了他的朋友马尔萨斯以及詹姆斯·穆勒，也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父亲。

李嘉图的若干贡献

正如本章开头所言，尽管大卫·李嘉图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却做出了若干重要的贡献。让我们从回顾他对经济学的积极贡献开始。

李嘉图：支持硬通货的货币主义者

首先，作为先驱货币学派的大师，李嘉图制定了严格的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在1809-10年这段时间里，由于军费开支激增以及英格兰银行暂缓实行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英国物价螺旋式的急剧上升，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李嘉图参与了有关贵金属的讨论，并发表了他第一篇经济学方面的作品《贵金属的高价》(1811年代和前文不符)，他在书中争论说英国的通货膨胀是英格兰银行发行过量的银行券造成的。李嘉图坚信大卫·休谟和其他一些人持的刚性货币数量论，认为一般价格水平同货币和信用数量的变化紧密相关。

为了在英格兰恢复健全货币(sound money)，李嘉图支持英格兰银行恢复使用硬币进行支付。他的解决方案是这样陈述的：“对于货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祸端，我的补救方案是英格兰银行应该逐渐减少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直至其余额与其所代表的硬币等价，或者换言之，直至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下降到铸币价(Mint price)为止”(Ricardo 1876: 287)。李嘉图也意识到了这种反通胀措施可能会“对贸易和商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但是要想使货币恢复其应有的和公正的价值，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李嘉图认为如果政策能够逐步实施，那么只会有“少许不便”。简而言之，他支持硬通货，支持金本位制(gold exchange standard)，支持简单兑换(simple convertibility)，目的是希望贵金属的价格与银行券的价值保持一致。中央银行不能有任何相机抉择的权力：“纸币的发行者只能根据贵金属的价格，而不是流通中纸币的数量，来决定纸币发行量”(1876: 403)。

李嘉图去世之后，被称为货币学派的一批有影响力的银行家发动了一场保卫英镑价值的运动。他们支持恢复硬币本位制(specie standard)，认为使用金和银才是完美的。他们反

对由中央银行来相机地对货币进行管理。他们认可这样的基本原理，所有未来发行货币的增减只能根据一国贵金属储备的变化来进行，不能有丝毫的偏离。1844年，在李嘉图的影响下，国会通过了皮尔银行特许法案，以支持这一货币原则。然而不幸的是皮尔法案并没有使英国拥有一个健全的货币体系，因为它并没有对货币替代物进行规制，尤其是银行系统内迅速扩张的支票账户存款。

收益递减律

第二，李嘉图(也包括马尔萨斯)提出了著名的收益递减定律。李嘉图是在1815年他的短文《谷物低价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中提及这一定律的。他这篇文章中所使用的方法就是1817年在《原理》中使用的抽象方法的前身。李嘉图的主要论题就是土地的稀缺性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

在建立这个“谷物模型”的过程中，这位英国经济学家设定了一系列假定来进行简化。首先，他假定只有一个大农场来生产谷物。(在英国，“谷物”是指大麦、小麦以及其他农作物。)第二，根据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两人持有的“工资铁律”观点，实际工资（剔除了通货膨胀）固定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

第三，他假定资本固定，每个工人配备一把铁锹来进行谷物生产。

由此，在李嘉图的模型中，所有的投入(土地、劳动和资本)都与谷物的价格相关联。随着劳动力的增加，养活工人所需的那些额外的谷物需要更多的土地来生产，而这些必需的土地不如原来的肥沃或产量没那么高。即便等量土地上投入的资本和劳动有所增加，结果还是一样。净产出会下降，进而经济增长下降。

在李嘉图1817年出版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他把简单的一部门谷物模型换成了三部门的模型，但是其论证和结论还是一样：每英亩土地的产出是下降的。

为了推迟乃至逆转这一“阴郁”结果的出现，李嘉图激烈地批评《谷物法》，因为英国根据这一法律对小麦及其他农产品实行了严格的限制并设置了关税壁垒。通过进口更多的谷物，可以使谷物价格下降，农民也可以降低付出的货币工资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增加投资，进而促使经济更高地增长。结果李嘉图成了自由贸易和废除《谷物法》的主要鼓动者。

李嘉图发现了使世界贸易发生革命性变化的规律

第三，李嘉图揭示了经济学中最伟大的定律之一——比较优势原理，从理论上宣判了保护主义的死刑。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在1813-15年间有关《谷物法》的论战中，李嘉图坚定地站在自由贸易这边，但是他对自由贸易问题最大的贡献是在稍晚时候做出的，那就是他在1817年的《原理》一书第7章中提出的比较优势原理。

这一法则说明自由贸易使两国都受益，更令人惊奇的是，即便一国在特定商品上有绝对优势，两国进行分工和专业化也是有利的。

精妙的学说

李嘉图这一精妙的学说来自他与朋友和共事的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父亲）所进行的长时间讨论。事实上，一些学者认为詹姆斯·穆勒和他之前的罗伯特·托伦斯 (Robert Torrens) 才是这一定律的真正发现者。(历史学家们总是知道一些前辈们，他们先发现了这样那样的著名原理。也许最终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是新的。不过，的确是李嘉图使这一原理广为人知。)

李嘉图用一个著名例子来证明他的原理

李嘉图用著名的“英国布、葡国酒”的例子来演示比较优势原理(李嘉图 1951: 133-42)。这次他又使用了高度简化的模型来说明他的观点。假定英国生产一单位布需要50个工人，而在葡萄牙只需要25个工人；另一方面英国生产一单位酒需要200个工人，而在葡萄牙还是只需要25个工人。(这里对李嘉图原来模型中的数字进行了少许修改，为使之更容易理解。参见de Vivo 1987: 194)

我们用下表来概括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情况：

	生产每单位的劳动者数量	
	英国	葡萄牙
1单位布	50	25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葡萄牙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都拥有绝对优势。所以，葡萄牙应该同时生产两种产品再出口到英国。粗略的观察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样的情况下，葡萄牙进行分工，只生产一种商品再和英国进行交易是无利可图的，因为葡萄牙在两种商品的上都是有绝对优势。但是李嘉图却非常巧妙地说明了分工并进行贸易是有意义的。

我们来说明一下这其中的奥妙。假定葡萄牙从生产布匹的工人中抽出25人来生产酒。其结果是，在葡萄牙酒的产量增加1单位而布的产量减少1单位。如果同一时间英国从酒的生产中抽出100个工人来进行布的生产，那么英国布的产量将会增加2单位，而酒的产量只损失0.5单位。

如果把两国分工之后的产出加总的话，就会得到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两国之间进行贸易总共能够多产出1单位布和1.5单位酒。

李嘉图就是发现了这样惊人的事实：两国间的贸易能够提高总产出，即便其中一国可能拥有对另一国的天然优势。

更进一步地，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也可以在一国内部得到应用，而不仅仅限于国与国之间。一个医学博士可能无论是当医生还是做秘书都有绝对优势，但是如果这位博士想要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那么他专门从事医疗事业，而雇佣别人做秘书是有益的。比较优势原理在任何一项交换或是任何一个生产过程中都发生作用。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其他学者对自由贸易经典论述非常有力并且十分令人信服，其结果是1830年以后贸易壁垒不断降低(参见103页的更新1)。詹姆士·威尔森(James Wilsoo)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自由贸易支持者。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极大地鼓舞了他，所以他在1843年开始出版《经济学家》周刊，致力于“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讨论。威尔森的观点比较极端，他甚至这样说：“我们坚信，‘自由贸易’，也就是人们之间的自由交流交往，能够比其他任何可见的方式都更好地将文明与道德播撒到全世界，并最终消灭奴役”(Edwards 1993: 21)。在威尔森的女婿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以及郝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其他作家的共同努力下，《经济学家》逐渐成为国际政策、经济学以及金融学方面的权威杂志，到了今天其订阅者已逾50万。

1846年，英国废除了《谷物法》，进口所需食品并出口制成品，由此英国成为了工业世界的动力之源，其他国家也顺应潮流降低了各自的贸易壁垒。

李嘉图的“招人烦的书”

第四，李嘉图笨拙的“谷物模型”成了经济学发展的一块大绊脚石。

李嘉图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极为深远，但是却在好和坏两个方面都是如此：好的方面是他对健全货币和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坏的方面则是他的阶级利益对立的宏观模型。

李嘉图在根本方法上区别于亚当·斯密。斯密的《国富论》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其中到处都是现实例子。而李嘉图的《原理》则单调乏味、枯燥抽象，全都是些欧几里得式的推导，却没有任何历史案例研究。学生们经常管他的书叫“李嘉图招人烦的书”(St. Clair 1965: xxiii)。

斯密提出的经济学是乐观向上的，关注的是“看不见的手”创造财富的过程以及资本与劳动和土地如何奇妙的结合在一起，并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以增进每个人的福利。至于地主、工人以及资本家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作用，他只是进行了附加地评论了几句。我承认，他的评论经常是批判性的，但是其最重要的主题是增长，而不是收入分配。

另一方面，李嘉图把斯密那些附加的字句和脚注都拽了出来，当作讨论的主题，“对抗性的和命中注定的敌对下的野蛮和混乱”(Chamberlain 1965: 75)。

更新1：自由贸易与重商主义的衰落

思想有现实影响力！国家之间贸易壁垒的逐渐降低就是这一格言的最佳例证，而亚当·斯密和他门徒大卫·李嘉图在这一方面的影响极为深远。

图4.1描绘了1820年以来美国关税的历史。

尽管仍时有反复，例如1828年出现过“tariff of abominations”，1830年出现过史慕德-哈利关税（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下降的趋势依然是清晰可见的。

美国建国初期，政府收入几乎百分之百来自于关税。而到了1910年，这一比例下降至

50%。如今关税甚至不足政府预算的2%。

自由贸易不仅在美国大行其道，而且风行于英国乃至全世界。战后成立的欧盟甚至已经实现了资本、劳动乃至货币可以在12个欧洲国家内毫无约束和管制的流动。自由贸易协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北美洲、南美洲、亚洲以及欧洲各国家之间。此外，经济学家们坚信日本、香港乃至亚洲其他国家之所以能够在战后得到迅速的增长，其原因恰恰是美国敞开了进口廉价商品的大门。

在经济学家之中，自由贸易原理得到了最多的认可。几项对专业经济学家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95%的经济学家都支持自由贸易，这一数字在任何分类里都是最高的。如此广泛的支持大部分应该归功于大卫·李嘉图和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开拓性的工作。

捍卫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但是依然存在少数反对者，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他的国家计划以及贸易保护的思想在东方更为流行。他的著作在亚洲的书店里尤其显眼，而在西方则是非常少见的。

李斯特的一生可谓多姿多彩，但又杂乱无章，他当过会计师、教授、农场主、政客、记者、作家、外交官、甚至是铁路资本家。不过他最终因为资金运转长期不灵而自杀。李斯特由于煽动暴乱被驱逐出德国，其后他与家人移居到美国，在那里美国的保护关税体系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他最主要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中，李斯特提出了一个构想，这样一个国家主导型经济，政府要保护幼稚的关键产业免受来自国外的过早竞争。他坚信一国之内应该是没有关税壁垒的，但是要对幼稚产业要实行保护主义以对抗外来的竞争。他把自己家长式作风的“国家经济”与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的“个体经济”进行了对比。他在书中赞美了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各种益处，并描绘自由经济的悲惨前景。按照李斯特的说法，英国就是通过推行自由贸易才获得的优势。(李斯特的辩护者们说美国和日本也都是如此发迹的。)在李斯特的体系里，促进生产者发展要比保护消费者免受高价之苦重要的多，这与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流行的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重商主义做法完全一致。李斯特说“点石成金的手指头要比金子更重要”(Fallows 1993: 67)。李斯特也承认长期中如果所有国家发展程度大致相同，那么自由贸易是最优的全球机制。但是正如凯恩斯所言，长期可能是一条不归路。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降低其关税和贸易壁垒，李斯特的模型正在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毫无疑问，香港就没有因为是自由贸易区而受到任何损害。²

李嘉图关注的是分配，而非增长

在一封写给马尔萨斯的信中，李嘉图这样解释道：“政治经济学，你认为是要追问财富的本质与源泉[这是亚当·斯密的观点]；我认为就它应该是对一些规则和定律的追问，这些定律决定工业产品在共同生产它的各阶级之间的分配。”(Ricardo 1995: 82)

亚当·斯密方法和李嘉图模型之间区别在图4.2和4.3中很贴切的描绘出来。

李嘉图的工资铁律和不断下降的利润

李嘉图的体系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个悲剧，唯独地主除外。李嘉图笔下的工人就象是长期中赚取生存工资的机器。如果工资上升，工人会生更多的孩子，反过来会增加工人的供给然后压低工资。因此李嘉图的“工资铁律”提供给工人的是暗淡的前景。

利润的前景也不容乐观。资本家们不是亚当·斯密笔下那些因为“爱好交往、交换和交易”而生机勃勃的商人们，而是千篇一律而枯燥的个体只会机械地储蓄和积累。利润的增长只能通过降低工资来实现，反之亦然。在李嘉图的体系中，根本不存在工资和利润同时增长的可能。《原理》一书中，李嘉图称工资与利润之间这种此消彼涨的关系为“分配的基本原理”。他不断地重申：“工资增长多少，利润就会下降多少”(Ricardo 1951, vol. I:111)，并且“利润是取决于工资的”(1951, vol. I:143, 35)。

更糟糕的是，由于“边际收益递减法则”的作用，利润在长期内也倾向于逐渐下降。在李嘉图狭隘的世界观里，工资升高将会刺激人口增长，而这就意味着必须开垦更多的土地来养活这些人，以及使用生产效率较低的土地。谷物的价格会上升，地主可以收到更多的租，但是由于资本家必须付给工人更多的工资以使其免受饥饿之苦(因为食品价格上升了)，所以利润会下降。

李嘉图对地主激烈批评

李嘉图描绘的黯淡图景中只有一种受益者，那就是地主们。随着谷物价格的上升，他

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租。佃农并不会从中受益，因为要缴纳的租金也随之增加了。李嘉图证实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地主就是喜欢在从他们从没播过种的地方收割”(Smith 1965[1776]: 49)。

按照李嘉图宿命论式体系的预测，工资趋近于生存工资，利润在长期下降，而地主不断增加他们不正当收益的所占的份额。诚如Oswald St. Clair所言，地主“既未参与田间劳作，也无任何个人牺牲，却每年都能够在共同创造的财富中获得越来越高的分配份额”(St. Clair 1965: 3)。

李嘉图对懒惰的地主们的攻击很自然地被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们吸取了，同时，李嘉图的批评也促使亨利·乔治提出土地国有化以及单一税运动(见第9章)。

李嘉图徒劳地追寻内在价值 (intrinsic value)

最后，李嘉图决心要寻找一个“不变的价值尺度。”作为计价物，他关注的是劳动的数量(不是工资!)而非记账的最终单位——黄金。按照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李嘉图决定使用生产成本价值论，论证说价格由成本(供给)而非效用(需求)决定。他很清楚该理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情况，例如“罕见的雕像、美术作品、珍本书籍、稀有钱币、某种特定质量的酒”(李嘉图 1951: 12)，以及机械设备的影 响。但是机械设备和资本不过是“累积起来的劳动”(1951: 410)。后来他又写道：“我的命题是商品生产中使用劳动的数量决定了这些商品交换的比率，由于存在例外的情况，……所以不是严格正确的，但是作为衡量相对价格的规律，它是我所说过的所有命题中对真实情况最近似的描述”(de Vivo 1987: 193)。

李嘉图一直奋力完善劳动价值论，至死不渝。在他逝世前的一个月，他写信给他的同事：“我实在是解决不了这样的难点：一瓶窖藏了3、4年的酒，或者是一棵橡树，可能使用的劳动都不到2/-，但是却值100英镑”(de Vido 1987: 193)。

就连罗伯特·马尔萨斯都不同意他的朋友李嘉图的观点，他这样写道：“劳动也好，其他什么别的商品也罢，都不能作为交换中实际价值精确的量度”(李嘉图 1951: 416)。

《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一个马克思主义/斯拉发主义阴谋？

马克思和斯拉发的作品被引用的最多，事实上甚至要多于亚当·斯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里昂·瓦尔拉斯、梅纳德·凯恩斯、肯尼斯·阿罗、米尔顿·弗里德曼、保罗·萨缪尔森，或者其他任何你值得说出名字的经济学家。

——马克·布劳格(1988: 15)

1987年，新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们执行了一个重要策略，他们出版了声望很高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马克·布劳格，出色的历史学者，他完成了惊人的任务，将所有的4卷从头至尾读完，超过4000页特大型的纸张，读完后，他严厉地谴责了这部书。《新帕尔格雷夫》取代1894年由帕尔格雷夫编纂的《政治经济学大辞典》，成为世界上各个大学图书馆里的必备参考文献。这本书是剑桥大学的John Eatwell、Murray Milgate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彼得·纽曼共同编写的巨著。世界各地超过900个经济学家同意加盟，其中也包括很多自由市场的赞同者。

但是，尽管编辑们许诺他们的观点是“不偏不倚的”，但事实上，他们呈现给我们“一幅毫无希望的扭曲图景”(Blaug 1988: 46)。所有马克思经济学方面的文章都是由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来撰写(Blaug 1988: 30)。而“资本主义”词条的作者却不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或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而是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海尔布伦纳，并且他根本就没有参考过弗里德曼、哈耶克或是其他任何支持自由市场的学者的论著。

斯拉发主义经济学究竟为何物？

对于斯拉发经济学这含混一问题有不下50种的说明，按照布劳格的说法，《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就是用来推动斯拉发经济学的。”

那么斯拉发经济学究竟为何物呢？皮耶罗·斯拉发(1898-1983)是一位意大利人，但是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剑桥大学度过，因此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影响颇深。他的著述很少，但是花了20多年来编辑李嘉图那10卷本的著作(1951-73)。在研究李嘉图的过程中，他逐渐确信自己发现了标准新古典经济模型中的缺陷，而这个错误自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来就一直统治着经济学界。

1960年，剑桥大学出版了斯拉发那本标题怪异的作品《用商品生产商品》。这本薄薄

的小书奠定了斯拉发在新李嘉图学派中的领导地位。斯拉发的论文一如李嘉图般抽象晦涩，既无经验研究，亦无边际分析。斯拉发沿用了李嘉图的“谷物模型”，做出了劳动同质、单一商品和单一技术的严格限定。没有涉及需求、价格或人类行为。所有的分析都是机械式的。布劳格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总结：“一些经济学家相信这样一种认识对于经济学来说是错误的，即这本书中几乎无一字一词提到现实世界，而斯拉发的书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 (Blaug 1975: 28)。

斯拉发得出的结论是一国的产出事实上是独立于工资和价格的。在他的模型中，相对产品需求对价格毫无影响。垄断厂商可以使其价格高于成本，并且不减少他们的利润。只有投入才能决定价格。这个“新李嘉图主义”(也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的模型含义非常明显：国家应该采用税收、规制乃至征收充公等方式，设计执行庞大而激进的财富收入分配方案，而这一切并不会对该国的生产能力造成任何不好的影响。

斯拉发经济学是李嘉图、马克思和凯恩斯的一种怪异组合，它最终抛弃了消费者需求理论和边际效用理论这些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是政府全面干预经济和执行中央集权计划的理想文献。不用说，斯拉发经济学只代表了整个经济学界的非常小的一部分看法。

经济学家们对李嘉图模型的回应

这么多年以来经济学们一直难以理解李嘉图的“谷物模型”和他的《原理》，尤其是他用以证明其理论的那些扭曲事实的假定条件。李嘉图曾经说过英国全土之内也只有大概25个人能够明白他的《原理》(1951)。一个世纪以后，聪明绝顶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弗兰克·H·奈特说“[这里]有很多东西我无法理解”(1959: 365)。熊彼特痛斥李嘉图把大多数经济中活生生的人当作是“僵死不变的”，将“一条条简化的假定条件堆砌起来”，而提出的理论“永远无法被驳倒，具备一切要素除了意义”(Schumpeter 1954: 472-73)。

凯恩斯曾经这样写道：“一个人若闭门造车，即极可笑之事，也会暂时深信不疑。经济学尤其如此。”(Keynes 1973[1936]: 序言)。也许写这句话时，他指的就是李嘉图。

更新2：“寻租”

比较优势、递增成本、货币数量论以及劳动价值论。

李嘉图对经济学的贡献非常多。多年以后，经济学家们从李嘉图的著作中总结出来两条新规律：寻租的概念和李嘉图等价定理。

“寻租”是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戈登·图洛克发明的术语，意指企业或产业通过利用政治影响(如游说)来抬高竞争价格从而获得的垄断收益(即超额租金或高利润)。农业计划、出租车许可证、中央银行以及广播电视授权皆属此类。

寻租源自李嘉图租的理论中。在他的谷物模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于耕种，农民必须使用不那么富饶的土地。然而，无论土地肥力如何，每蒲式耳谷物的价格是不变的。因此地主(而非佃农)可以从更高的土地价格中获利。把李嘉图的分析应用于今天的情况，经济学家发现对农业的价格支持会使土地所有者从中获利，而不是那些佃农。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纽约出租车行业的案例中，出租汽车经营牌照管理中获益的是牌照所有者，而非出租车司机。

更新3：李嘉图的等价定理

“李嘉图等价定理”说的是政策变化时存在大量隐含的替代关系，而现代经济学家，尤其是哈佛大学的罗伯特·J·巴罗普及了这一概念。例如，按照巴罗的说法，无论政府通过何种方式来筹措新支出项目的经费——借款也好，税收也好，抑或增发纸币——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最终结果都是一样——高额成本，更多的通货膨胀。巴罗指出，即使那时，财政赤字对投资和实际利息率也“没有任何影响”。预算赤字可以被私人为了支付未来的税收(即支付赤字)而进行的私人储蓄所改善。因此他认为赤字不会引起国民储蓄或投资的改变。因而其结论是联邦财政赤字根本就不算什么问题(Barro 1996: 93-98)。

巴罗和其他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20世纪90年代，即使当联邦财政赤字开始缩减，美国家庭储蓄还是递减的。换言之，私人储蓄的减少抵消了公共储蓄(联邦盈余)的增加，而整体上一国的储蓄率是保持不变的。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同期的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很多西方国家的私人储蓄率在这个时期都表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和政府的预算平衡的大幅度改善。根据商业周刊的说法，“这意味着人们的储蓄行为对政府的借款情况是十分敏感的，而这一思想是由李嘉图于1817年首先提出来的”(Koretz 2000: 40)。

经济专家委员会前主席赫伯特·斯泰因(Herbert Stein)曾经说过社会保障的私有化对

整个经济不会有正面的影响，这个观点与李嘉图的观点是极为相似的。他写道：这一点“显而易见”，“私有化社会保障资金不会增加国民储蓄、私人投资或是国民收入”(Stein, 1998: 202-03)。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运用了“挤出效应”，即私人储蓄的增长只不过是抵消了公共储蓄。

巴罗、斯泰因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济学家都相信李嘉图的“等价定理”。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税收原理》第17章中讨论公债问题时认为，无论政府的支出计划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支付的，税收也好，借款也罢，“都不会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富裕或是更贫穷”(Ricardo 1951: 244)。

批评者认为李嘉图的等价定理不过是又一个神话般的理论抽象的经典例证，不切实际，甚至是痴人说梦(Barro 1996: 98)。大多数替代都不是零和博弈。降低关税会伤及某些国内企业而惠及另外一些，而其最终结果将是有益的。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对投资征税的国家，增长速度快于那些对其征税的国家。如果说到社会保障私有化的问题，智利等国在转换为私人退休金体系之后增长速度加快，国民投资率也有所提高。私人储蓄的效率似乎要高于公共储蓄。总而言之，经济中的确存在替代，但是构建适宜的税收和筹资结构也确实可能使收益高于成本。

李嘉图自己曾经写道：赤字支出“趋于使我们不那么节俭”(Ricardo 1951: 247)，虽然他没有坚持研究这个问题。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歧视女性么？

在李嘉图的体系中，代表女性的土地扮演着魔鬼的角色。

——沃尔特·韦斯柯夫(1955: 127)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区已经登上了经济学的大雅之堂。在他那本颇具煽动性的著作《经济学中的心理学》里，沃尔特·韦斯柯夫(Walter A. Weisskopf)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悲观论调归咎于他们显而易见的“反女性”偏见。韦斯柯夫注意到无论是在李嘉图的思想里，还是在马尔萨斯的思想里，都有这样的论述，“土地……是邪恶之源”，而土地在宗教和神话中都象征着女性(1955: 126)。

马尔萨斯《论人口》的主要观点就是土地的生产能力相对于人口来说实在是非常的不足。韦斯柯夫这样解读马尔萨斯的话：“土壤、泥土以及土地（全都是原始的女性象征）在十分小气地生产食物”(1955: 127)。

李嘉图也是从肥沃土地的稀缺性出发，以类似的方式得出他那阴郁的观点的。李嘉图体系基于三个假设前提：(1)收益递减律，(2)人口规律，以及(3)生存工资铁律。韦斯柯夫宣称，“这三个假定都与肥沃土地的稀缺性相关”(1955: 127)。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可能是潜意识中有反女性的倾向。但是他们真的厌恶女人么？

马尔萨斯和圣经

作为一个基督教的牧师，马尔萨斯可能在年轻时有厌恶女性的情绪。在第3章的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马尔萨斯一生笃信圣经，而圣经教诲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大地就已经被诅咒。马尔萨斯可能对《新约圣经》中圣保罗排斥女性的教义也很有共鸣。例如，圣保罗警告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他辖管男人，只要沉静。”(提摩太前书 2: 12)，再比如他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哥林多前书 14: 34)。不过，所有这些不过是韦斯柯夫有争议观点的旁证。不管怎么说，马尔萨斯的婚姻还是非常美满的。

李嘉图不公正的遗嘱

有更加确凿的证据表明李嘉图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厌恶女性的。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煞费苦心地把自己的家产(每人3,000英镑)平均分配给15个儿女，但李嘉图却没有这么平等主义。李嘉图拒绝在孩子之间均分家产，严重地歧视他的四个女儿。在遗嘱里，他特别坚持“儿子的份额应该至少是女儿的八倍”(Sraffa 1955: 104)。他大量的不动产留给三个儿子，包括那个哥特科姆庄园。他进行如此分配的理由不得而知。

对李嘉图影响的总结

不管怎样，李嘉图还是成功地说服所有同时代的人接受他的劳动价值论和自由放任学

说。凯恩斯说“李嘉图彻底征服了英国，就如同“异端裁判所（Holy Inquisition）征服西班牙一样”（1973: 32）。只有到了今天我们才发现他观点中存在谬误。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李嘉图的思想把经济学在错误的轨道上推进到了什么的程度，离亚当·斯密提出的可靠理论越来越远了。

插图及图表注解

P92

插图4.1 大卫·李嘉图（1772-1823）

“他真正发明了经济学这部机器所使用的技术”

感谢赫尔顿-格蒂档案馆提供

P103

图4.1 美国关税的逐步下降，1820-2000

关税以应纳税进口额的百分比计算

来源：萨缪尔森（1998：708），经McGraw-Hill出版公司允许重印

P104

插图4.2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

点石成金的手指头要比金子更重要

P105

图4.2 亚当·斯密的“和谐利益”模型：工人、资本家和地主共同工作生产产品和服务

图4.3 李嘉图的“阶级冲突”模型：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为了占有产品和服务的份额彼此竞争。

第五章 徘徊逡巡：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社会主义者们寻找乌托邦

本章音乐选段：卡米尔·圣-桑（Camille Saint-Saëns），《死之舞》（Dans Macabre）（经查似乎应为Danse Macabre）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被视为古典自由主义的英雄，但是我个人深信，就是他把知识分子引向了社会主义。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Boaz 1997: 50)

1848年对欧洲大陆而言意味着一个充满了叛乱和人民抗争的年代。就是在这一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就了他们革命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的确在欧洲徘徊，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还包括傅立叶主义、欧文主义、圣西门主义乃至先验论等一系列的学说主义，而它们都拜倒在“社会主义”这个新名称之下。乌托邦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这一切都是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急速转型的过程中产生的。

19世纪上半期是不安分的时代——工业革命、拿破仑战争以及遍及欧洲大陆的各国国内判乱接踵而来。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型不是一条平滑上升的直线，而是一条崎岖起伏的曲线。斯密理想的增长模型早已被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悲观学说破坏殆尽。人民的反抗在1848年达到了顶峰，这一年就如同1776年一样是一个关键时刻。1848年，民众叛乱遍及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

1848年的重要意义

1848年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他对世界的影响而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经济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是一本统治西方世界达半世纪之久的教科书，前后共修订出版32次，直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教科书在1890年顶替了它的位置。

就是在这本书中，穆勒宣称生产规律已经客观地确定了，而分配规律则可变。“财富分配仅仅是一个人类制度的问题，他们可以把财富以任意形式交给他们满意的任意人去处置”(Mill 1844: 155)。他又补充道：“共产主义有着极大的优越性，而现今的社会则是充满了苦难与不公正，如果要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如无论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有多少困难，在衡量二者的天平上都是轻于鸿毛的”(1884: 159)。他在书中还对私有产权的精确性提出了质疑。

穆勒的书是彻头彻尾李嘉图式的，关注的依然是收入的不公平性，而非增长。

高深莫测的穆勒损失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73)是他那个时代的代表，高深莫测又迷失在一个动乱的年代。从很多方面来看，穆勒是一个希腊的悲剧式英雄的化身，他在事业上是勇往直前的领军人物，却最终令人不解地惨淡收场。他是大学者，古典自由主义者，也是古典经济学派最后一位杰出的人物。和李嘉图一样，穆勒支持个人自由并积极捍卫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根基萨伊市场定律，他反对采用不可兑现的纸币，反对强制道德准则，不容忍，以及国教。而且他还是一位支持妇女投票权的废奴主义者。

然而他最出名的还是自己的言行不一和自相矛盾。他捍卫自由企业但却始终自称社会主义者；他在整个事业生涯中玩弄社会主义，支持维多利亚文化的革命性转变，批评人口过剩，鼓吹李嘉图的分配理论，把生产和分配完全分割开来。他笃信边沁的功利主义，因而被蒙蔽了双眼，主张政府应该经常地干预经济。他对高额遗产税和土地国有化的害处视而不见，却怀疑私有产权的公正性。而后者就是哈耶克为什么说影响深远的穆勒支持社会主义事业。

穆勒成长在一个缺乏爱心的家庭

穆勒的家庭生活与他的职业生涯有很大的关联。1806年他出生在伦敦近郊，并在其父詹姆士·穆勒(1773-1836)的严格管教下逐渐长大。老穆勒虽然聪明绝顶，但是却专横跋扈。他是大卫·李嘉图及杰里米·边沁的密友，他是一位激进的功利主义者，精力充沛却毫无感情而且顽固不化。在写到他父亲的时候，穆勒说“他对激情和情感报以极大的蔑

视，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在他自传的草稿中，穆勒又说“我因而是在没有爱心只有恐惧的环境中长大的”(Mill 1961: 184)。穆勒母亲没有受过教育，也毫无主见，穆勒将父亲的冷酷和易怒归罪于她。穆勒轻视且讨厌自己的母亲，在他的自传中从未提起过她。

3岁学希腊文，8岁学拉丁文，14岁学经济学，20岁神经失常

老穆勒决心要在自己的大儿子身上进行一个试验。(穆勒的三个弟弟和五个姐妹所受到的待遇和他是不同的。)所以在父亲的严加管教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变得非常早熟。他所接受的教育是19世纪时最好的。他没有上过正式的学校，也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完全是在家中受教于包工头一般的父亲。他3岁的时候就学习希腊文，8岁时已经在读柏拉图的书了。同一时期他也在用拉丁文进行会话和写作，并且很快转入微积分、几何以及哲学的学习。11岁的时候他就在读牛顿的《数学原理》。他的朋友边沁教给他的是功利主义，而非宗教，而且恰恰是边沁的著作将他转变成为一个“哲学激进派”。

十几岁的时候，穆勒开始读古典经济学著作。追随着马尔萨斯，穆勒发表匿名文章支持人工避孕，甚至还因为向女仆散发控制生育的读物而被拘捕过(Stafford 1998: 5)。14岁的时候他开始反复阅读李嘉图的书。父子二人会连续数个小时漫步于林间，讨论古典经济学家们。他的父亲送他去了法国，在那里他爱上了法国文学以及政治激进主义并终生不渝。作为年轻人，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而且也从不参与体育活动。他曾这样写道：“我从来就没当过一个男孩”(Courtney 1889: 40)。穆勒同时代的人把他描绘成了一个“远离人群、冷酷无情的人，聪明过头、性冷淡、怕老婆、自负、毫无幽默感”的人(Stafford 1998: 23)。某些同代人声称他一点爱好、一个朋友都没有，但这可不对。他会弹钢琴，爱好植物学，喜欢周游列国。除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的一段隐居时光外，他一直是出没于社交圈中的。

他所受到的教育是非常严酷而惨无人道的（一位旁观者写到，他曾被用手铐铐起来，还不被允许吃晚饭，总是长时间地学习(Stafford 1998:44-45)。)，因此，穆勒在20岁的时候出现了神经失常也不算奇怪。由于感觉不到任何生活的意义，他曾经企图自杀。通过阅读华兹华斯的诗集，他最终走出了这种浓黑的绝望，不过这一顽疾仍然时有复发，1836年他父亲去世后还复发过一次。

父子二人一生一直很亲密。约翰和他的父亲一起供职于东印度公司。如果考虑到东印度公司在英控印度的地位，那么穆勒的职位就相当于国务卿。正如传记作家威廉·斯塔福德(William Stafford)所言，“尽管二人从未到过印度，不会说一句印度话，而且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碰到一个印度人，但是他们在对印度的统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98: 4)。约翰·斯图亚特的生活方式非常有规律：早饭吃煮鸡蛋和清茶，然后就是吃晚饭。

詹姆士·穆勒1836年死于肺结核；他的死对自己的儿子影响非常大，致使穆勒患上了终生神经性面部抽搐。

穆勒与对他影响至深女子的相遇

1830年是穆勒个人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他遇到了哈里特·泰勒(Harriet Taylor)，一位激进一神教派信徒，她笃信教义、充满了智慧与激情。穆勒深深地爱上了她。然而不幸的是哈里特·泰勒已经结婚，而且在维多利亚时代，与一位已婚女子保持亲密友谊并不是什么高尚的事情。然而她的丈夫却惊人地开明，悄悄地向这位哲学家敞开了自己的家门。他甚至在乡下买了一座小别墅以供二人共度周末，还出钱让自己的夫人同穆勒一起出国长途旅行。根据泰勒的回信来看，在长达20年的交往过程中，二人之间并未发生过越轨之事，直到泰勒的丈夫去世而二人于1851年成婚前，他们的感情纯粹是柏拉图式的。不过，他们的婚姻并没有得到家人的理解。穆勒的亲属都反对这门婚事，而穆勒则断绝了和他们的所有来往，甚至仅仅在他母亲1854年因癌症去世前才去看望过她一次。穆勒花了许多年时间才和他的家人和解。

穆勒夫妇亲密无间、恩爱有加，而约翰·斯图亚特也承认哈里特对他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将他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方面。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穆勒对他妻子的高度评价。卡莱尔就认为泰勒“智而不慧，在穆勒讨论各类高级话题的时候，总是瞪着一双闪烁着无法形容的内容的深色大眼睛，重复不断地问一些愚蠢的问题”(Stafford 1998: 21)。

19世纪50年代穆勒感染肺结核的时候，泰勒在他身边照顾他，不过最后她自己 also 病倒了，两人以为活不过一年，于是在1854-1855年间结伴出游，先后到达意大利、西西里和希腊。而两人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复原之后，穆勒和他的妻子越来越感到自身的优越，并且变得有些势利。在国外旅游

期间，穆勒经常从智力、语言及政治观点上评判他遇到的人。他发现竟然无一能与自己（或妻子）匹敌。

“我生命中的春天已经消逝”

穆勒的最后一部杰作是与妻子合著的《论自由》。穆勒说这本书的“写作实在太精细，我已不能作任何改动或增删，而且我也永远不会那么做”（1989: xi）。1858年哈里特（还是因为肺结核！）不幸逝世，翌年穆勒出版了这本书，作为献给她的祭礼。穆勒对她的溢美之词几乎是过火的，说“我所结识或读到过的人物无一能与她媲美”（Stafford 1998: 10）。穆勒还为她在阿维尼翁（Avignon）立了一块价值不菲的大理石墓碑，而他自己每天都去祭拜。

穆勒的继女海伦·泰勒一直陪伴着他，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他获得了慰藉。在此前的十年间穆勒几乎毫无建树，但是哈里特过世以后，他笔耕不辍，并且将他的作品以价格低廉的简装版（People's Editions）出版，为了降低售价，他甚至放弃自己的版税。1865年至1868年他被选为威斯敏斯特区议会的自由党议员。他反对美洲的奴隶制，并为妇女选举权四处奔走。他赞成对残酷镇压牙买加黑奴叛乱的爱德华·艾尔（Edward Eyre）总督执行死刑，但是他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因此受到了威胁。（更多关于穆勒的种族主义观点的内容，参见第三章中有关托马斯·卡莱尔的讨论。）1869年，他出版了《女性的屈从（The Subjection of Women）》，而4年之后，即1873年，67岁的穆勒死于由皮肤发炎而引起的高烧，被安葬于哈里特的墓旁。穆勒刚刚过世，海伦·泰勒就出版了他的《自传》。几年之后，在1879年，他的《论社会主义（Chapters on Socialism）》也终于问世。穆勒的《全集》由J·M·罗布森（J·M·Robson）编辑整理，共分33卷于1963年至1994年之间分别出版。

功利主义与杰里米·边沁的奇怪事例

把经济学简化成为快乐的微积分的数学应用是边沁天才的想法，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其成果，它是多么令人失望呀！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51: 155）

杰里米·边沁是社会功利主义的始作俑者，同时也是穆勒父子年长的密友和导师，因此父子二人都对他非常崇敬，并在学术上追随他的脚步。小穆勒甚至痴迷到在伦敦建立了功利主义协会（Utilitarian Society）。他说功利主义给了他生活的目的。

那么边沁究竟是何许人也？他的哲学为何能如此令人着迷呢？

杰里米·边沁是詹姆士·穆勒的上一代人。1748年他出生在伦敦，父亲是一名律师。他继承的遗产使他能够自封哲学家，并终生研究法律、立法以及刑事改革。

边沁出生足够早，使他有可能结识亚当·斯密。事实上，他曾于1787年3月写了一封长信给斯密，批驳他在《国富论》中支持限制高利贷的法规。边沁说“高利贷如果一定是罪行的话，那么也一定是受到赞同的罪行”。后来他把这封信放在《为高利贷辩护》的第二版（1790）中出版。这恐怕是经济学中最辛辣的讽刺之一：主张干涉的功利主义者竟然就自由市场的优点问题责备市场经济的祖师（Adam Smith 1987: 386-404）。

边沁在1789年出版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一书中引入了功利主义的概念，原文如下：“自然将人类置于两种力量的统治之下，即痛苦与快乐。……而人的唯一目标就是要追寻快乐而避免痛苦”（1789: 11）。在边沁看来，生命中的斗争并不是在善恶之间展开的，也不是理智与情感之间，而是在痛苦与快乐之间进行的。他可能是在游历欧洲的时候就发现了这种心理学的快乐主义的形式。

不仅如此，边沁还认为快乐痛苦的关系需要被量化，也就是他所说的“造福微积分（felicific calculus）”。他竭尽全力地去测量快乐和痛苦的程度，称之为“utils”，从而快乐的utils就可以与痛苦的utils进行对比。今天我们可以把边沁的方法比作成本收益分析。一个项目的收益如果无法弥补成本的话，那么就根本不值得去做。

支持极端个人主义的边沁功利主义被视为是现代经济学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按照这一观点，社会不过是隐藏在“在组成社会的众多成员的利益总和”之后的，一种并不存在的“虚构的主体”（Bell 1996[1976]: xii）。然而，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边沁放弃了这种个人主义的方法论。

首先是民主改革

除了提出快乐与痛苦的dychotomy (疑是dichotomy二分法)之外,边沁还写了有关立法体系改革的必要性的文章。他主张社会的目标应该是“幸福最大化的原则”,即“让大多数人达到最幸福的状态。”他把社会的总效用等同于所有人行为的结果。公共的善(common good)能实现最大化。

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一出现就马上被视为一种要求民主改革和普选权的呼声。每个人的效用都被平等地度量,即便是贵族在边沁的体系中也没有特权。边沁甚至鼓动英国放弃其殖民地并允许他们独立。(穆勒认为印度应该除外)

边沁的民主倾向使他同样主张,给罪犯以更人道的对待,减少死罪(capital offence),建立第一支城市警察部队。他支持立法禁止虐待动物,甚至反对将钓鱼作为体育活动。

接着就是功利主义的法西斯主义

然而,边沁的思想中却没有多少个人权利的概念。如果要使大多数公民的幸福实现最大化,国家就需要抛弃自由放任的政策。边沁主义的激进分子们顶礼膜拜的是效用之神,而不是看不见的手。

不仅如此,边沁还把收益递减率应用到效用上,声称增加一先令的收入给一个富人带来的效用要低于给一个穷人带去的效用。边沁的收入边际效用递减理论构成了累进税率和其他再分配机制的重要前提假定。

缺乏保护收入、财产乃至生命本身的个人权利的法案,边沁的世界很容易转化成多数派的暴政,或者更糟糕的中央集权国家主义,由独裁者来决定什么对大多数人来说才是最好的。如果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对富人征收高额税金,那么就这么做。如果大多数人憎恨犹太人、黑人或者是基督教徒,那么情况就是这样。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如果少数人的利益和权利遭到了践踏,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大多数人实现了利益就好。同时代的学者,如卡莱尔和狄更斯(Dickens)认为边沁的功利主义“强硬、无情、机械、低俗、不敬神并且低级”(Stafford 1998: 13)。

理查德·波斯纳又补充道:“很多边沁的激进建议……预示了那些由官方宣传、希特勒和苏联新闻界展开的语言上的极权主义攻击”(1983: 40)。

监视局

事实上,边沁鼓吹建设大量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s)来构建极权主义的庞然大物,而圆形监狱的名称来自于希腊语,意为“无所不见”,因此也叫做监视局,用来为那个理想世界服务。这些监视局可以建成用作“工业局、作坊、救济院、工厂、疯人院、lazarettos、医院乃至学校”(Rothbard 1995: 63)。边沁期望这种理想社会形态最终能够控制英国五分之三的人口。

在这样的安排下,将由“无所不见”监视员来监察监狱、学校以及工厂,他们不停地窥探每一个人,而边沁自己希望能够成为“监视员长(the Great Inspector)”(Rothbard 1995: 62-64)。

因此,杰里米·边沁最终来了个360度大转变,从一个自由放任的支持者变成了独裁者(Big Brother)[Big Brother: “老大哥”(英国小说《1984》中的独裁者),译者注]的辩护士。穆勒作为《论自由》的作者,应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而不是给这样一个人物如此高的评价。

不朽的边沁——永久展览

边沁不仅仅想当那个监视员长,还想青史留名。他的遗嘱里有一个不寻常的要求:在他死的时候,如果将他的遗体保存起来,且在他的信徒每年的年会推出展示的话,他将成为伦敦大学学院最大的捐助人。

现在他的移动灵柩被放置在伦敦大学免费供人参观。

穆勒写了一部自由主义经典之作

穆勒的贡献主要有三。第一是在个人自由和个体性(individuality)方面,他的小册子《论自由》被视为哲学经典著作,是“最雄辩、最出色,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关于人类个体性的表述”(Collini in Mill 1989[1859]: vii)。

不过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们要想从他的书中找到对国家干预主义的批驳,那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的。《论自由》主要是针对强制道德主义(coercive moralism),而非政府。穆勒受他与已婚的哈里特·泰勒长期“不体面的”关系的影响极大,他的主题就是废弃维多利亚

时代的观念——不容忍，自以为是，加尔文主义、清教徒主义和严苛的基督教乏味的单调性。穆勒公开指责偏见、习俗和思想上的单一性。

而另一方面，穆勒支持宽容的心态、怀疑论以及自由思考。他为妇女争取投票权、在公共部门任职及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权利而大声疾呼。他捍卫思想自由和个人主义，甚至能够容忍怪异的行为。同时代的人大多不能接受穆勒的思想，认为那是在攻击基督教和为离婚辩护，不过今天的公民自由主义者倒会极为欣赏穆勒的思想。

尽管他反对周日蓝法（Sunday blue laws）[blue laws 蓝法:原来是美国殖民时期的清教徒所订的法律，禁止在星期天跳舞、喝酒等，以后转用为有关个人行为的严格规定，如禁止公务员涉足酒家、舞厅、夜总会、或不该接受款宴等等，译者注]以及各种形式的限制，但是穆勒的经典著作并没有更多地论及政府政策。一般来说，他的个人哲学就是自由放任：只要不伤害别人，个体就应该可以自由行事。

穆勒：支持萨伊定律的彻底李嘉图主义者

穆勒彻底地沉浸在李嘉图经济学里，而李嘉图经济学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却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其精华在于他支持亚当·斯密的天赋自由体系以及萨伊的市场定律。1829年到1830年间穆勒写作了《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出版)。其中有一篇标题为“论消费对生产的影响”(1874: 47-74)。他把需求创造供给的原始凯恩斯消费社会称为“有害的”学说和明显的“谬误”。他宣称“消费永远都无需鼓励”(47-48页)。不仅如此，他还说：

存钱的人和花钱的人一样都是消费者，他只不过用不同方式消费而已。储蓄可以提供将来用来消费的食品和服装，以及生产性劳动者将要使用的材料。因此说消费已经达到生产所容许的最大限度。但是，在这两种生产之间，即再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前者只能增加国民财富，而后者则减少之。仅仅为了享乐的消费稍纵即逝；而为了再生产的消费则留下了等值的商品，通常还加上利润。(穆勒 1874: 48)

就政府人为需求这一问题，穆勒写道：

政府尝试刺激需求的行为，通常仅仅会阻碍储蓄；也就是说，会以降低再生产性消费为代价来提高非生产性消费，而且恰恰是因为采用了那些试图增加国民财富的手段才导致国民财富的减少。(1874: 48-49)

这些观点是彻头彻尾萨伊式的。因此穆勒1848年撰写他的教科书时，没有对消费进行任何讨论，而只是专注于生产和分配，这也是顺理成章的。

和李嘉图一样，穆勒也反对不可兑现纸币。

然而，在糟粕这一方面，穆勒的经济学又与李嘉图的分配理论密切相关：工资和利润呈负相关，价格由劳动成本决定，而长期内工资会下降至维持生存的水平。穆勒吸收了李嘉图强烈反对地主的“租”的理论，并以此为据在任职于东印度公司期间主张在印度实行土地国有化。更有甚者，他主张以一般产权（property in general）的名义将死后没有继承人的个人的土地和财产充公。此外，按照穆勒的看法，投机性占有未使用土地是难逃其咎的，而这一点也是亨利·乔治再三强调的观点。“如果土地不是用来耕种，一般而言根本没有什么合理的原因保证它成为私有财产”(Mill 1884[1848]: 173)。

穆勒支持财富和收入再分配

本章的一开头，我们就已经发现穆勒最终和李嘉图一样把分配原则完全与生产规律分割开来。穆勒的经典论断引自于第二卷中“分配”一节的第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

财富生产的法则和条件具有自然真理（Physical truth）的性质。它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分配则完全不是一回事。财富的分配不是如此。这是一件只和人类制度有关的事情。一旦物品生产出来，人类就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随意处理。他们可按任何条件将这些物品交给自己中意的任何人支配。财富的分配要取决于社会的法律和习惯。(Mill 1884: 155)

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就是这样的想法使得很多知识分子支持对财产和财富的抨击，支持高额税收以及各类为了实现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没收方案，还认为这样的激进措施可以在毫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顺利实施。“我个人深信，把知识分子引向了社会主义的人，就是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Boaz 1997: 50)。

在穆勒的影响下，从威尔斯(H. G. Wells)到韦伯夫妇等一批知识分子转向了社会主义，而且这一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财政大臣威廉·哈考特爵士(Sir William Harcourt) 1894年这样说道：“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Stafford 1998: 18)。而受边际分析熏陶的经济学家们反驳这些再分配主义者，说明分配理论不能与生产理论相分离，还要过相当长的时间。按照边际革命之后的观点，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支付的价格是按照其劳动成果计算的，而这一计算以折现的边际产品为基础。

社会主义式的财富收入再分配措施确实影响了经济活动。正如哈耶克所言：“if we did do with that product whatever we pleaser (如果我们确实对我们满意的商品这么做了??)，那么人们就永远不会再生产这些东西”(Boaz 1997: 50)。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把自己看作是穆勒第二么？

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曾经对穆勒非常着迷。1951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哈里特·泰勒：友谊与婚姻》。哈耶克对于这两个方面很感兴趣，一是穆勒和泰勒热烈的爱情经历，二是穆勒的爱妻如何影响他的思想，特别是如何影响《原理》的写作(1848)。

20世纪40年代哈耶克自己经历过一次婚姻的变动。他和妻子海伦是在20年代结的婚，随后两人有了两个孩子。但是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期间两个人争执不断。二战后哈耶克回到了维也纳，并爱上了他的表妹兼旧情人海琳·彼特利克(Helene Bitterlich)。海琳也曾经婚配，但是当时已经是独身。哈耶克立即决定离婚，但是遭到了第一位妻子的反对，并因此失去了伦敦经济学院的所有朋友。经济学系主任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就因为这一桩郁闷的婚姻官司而和哈耶克多年不睦。1950年，哈耶克在阿肯色州教了一年书，因为那里的婚姻法对离婚的限制宽松。后来他终于娶到海琳并定居美国。不过后来二人先后移居德国和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直至1992年哈耶克去世。

故事还没说完呢。1954年哈耶克向古根海姆基金会(Guggenheim Foundation)申请资金，用以追寻穆勒和他妻子整整100年前游历意大利和希腊的足迹。1855年1月15日，穆勒站在古罗马广场(the Roman Forum)的台阶上，“想到目前最值得写作和出版的就是一部关于自由的论著”(哈耶克 1994: 130)。而哈耶克于整整100年后的同一天到了罗马，在穆勒的鼓舞下写作了《自由宪章》。这部书于1960年出版(也是穆勒的《论自由》出版100周年)。

尽管发生了如此多的事件，甚至哈耶克还帮迈克尔·圣约翰·帕克(Michael St. John Packe)写了一部完整的穆勒传记，很多年以后他还是奇怪的写道，穆勒“事实上对我并不是特别有吸引力”(1994: 128)。

穆勒对社会主义的轻浮态度

引入分配理论的同时，穆勒也立即开始了对社会主义优点的讨论。穆勒对资本主义颇有保留，并且觉得私有产权的配置并不总是公正或适当的。他描述了三种类型的社会主义：

1. 乌托邦社会主：建立合作社(cooperative communities)，像罗伯特·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提出的那种(见127页的加框文字)。

2. 革命社会主义：激进组织，包括共产主义者们，他们寻求通过暴力掌权，实行国家工业(national industry)，废除私有产权。(见有关马克思的第六章)

3. 法西斯社会主义：主张在各行各业和生产、分配以及交换方式上实行官僚式的管制，就像后来费边社和英国劳动党鼓吹的那样。

穆勒对革命社会主义和法西斯式社会主义都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对乌托邦共产主义却表示出相当的同情，因为它的运行能够保持很高程度的个人自由并且不使用暴力。他所认同的也就是这种社会主义。因此，穆勒在“从18世纪的大卫·休谟的稳健和保守主义指向费边社会主义和比阿特里斯·韦伯的集体主义的一条下坡路上”安营扎寨了(Stafford 1998: 19)。

基督教改革者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

但是如果你到过乌托邦，并且就像我一样亲眼目睹那里的一切……你会第一个承认那是你见过的组织最完善的国度。

——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中的拉菲尔（1965[1915]：67）

穆勒和其他社会主义的改革家们都常常梦想实现那个“乌托邦”，就像托马斯·莫尔爵士的理想社会，在那里没有穷人，没有乞丐，没有律师，更没有战争——那个地方的人可以“不用任何代价”就能够获得任何想要的东西，每天工作6小时，而夜晚则在聊天、读书或欣赏音乐中度过。儿童可以免费获得最好的教育，医疗系统经营管理“极为出色”，“每个人甚至宁愿抱病住院而不是待在家”（莫尔 1965: 81）。

19世纪的上半期有大批这种追寻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改革家们。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们（“社会主义者”一次最先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末的英国及30年代初的法国）遍及欧洲和美洲，建立了诸如新协和村（New Harmony），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以及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等一系列乐观向上的社区（optimistic communities）。

他们都有某些共同目标：

1. 废除私有财产和竞争
2. 人人平等
3. 集体生活

人们期望所有这类社团的成员会努力地完成指派给他们的工作，并平等地分享劳动果实。“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其他社会主义的改革家们甚至更为极端，例如，他们要废除婚姻和货币。以下就是几个突出的例子。

法国法朗吉(Phalanxes)

乌托邦式的想法对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后的许多法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们激烈地分成两派，一是自由放任派(孟德斯鸠、魁奈、孔多塞、萨伊和巴师夏)，一是乌托邦社会主义派(圣西门、查尔斯·傅立、西蒙·德·西斯蒙第(Simonde de Sismondi)以及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事实上，社会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法国思想。就像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颠覆了他们导师亚当·斯密的学说一样，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们也颠覆了自由放任派倡导者萨伊和巴师夏的学说。

法国社会主义者中最出类拔萃的是圣西门（Count Henri de Rouvroy de Saint-Simon）(1760-1825)和傅立叶(Franc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 (1772-1837)。圣西门曾经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他警告说工业社会是极为不公正的，无所事事的富人们占有与所付出的努力并不相称的一部分财富。而他的追随者们要求废除私有产权。

傅立叶虽然行为古怪，但是他的思想要比圣西门更为规整。他主张采用一种集中式的社区，他称之为*phalanstères*或法朗吉。所有人集中生活在一个中心建筑中，傅立叶主义的思想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俄亥俄州有特朗布尔(Trumbull)法朗吉，纽约有摩登时代，而马萨诸塞州有布鲁克农场。不过所有这些空想的社区最终都夭折了。

罗伯特·欧文与新协和村（New Harmony）

罗伯特·欧文(1771-1858)是威尔士一个令人惊奇的男孩，后来他当上棉纺织企业业主。他在苏格兰格拉斯哥附近新拉纳克（New Lanark）的一个贫困破败的村庄买下了数个纺织厂，然后欧文把那里变成了天堂——工人们享有良好的居住条件，每天工作十个小时，那里没有童工，孩子们享受学校教育，工人们也不会受到体罚。而这之后欧文自己也声名鹊起。他的目标是给穷人足够的激励使他们更有干劲。欧文用经营利润来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

他这种新式的“慈善资本主义”收到了极好的效果，而成百上千的参观者从世界各地赶来欣赏他的成就。他坚决地支持社会变革，主张在全英国推行“合作村”，实施《童工法》和十小时工作制。他大力支持工会和生产者消费者合作社。

他在新拉纳克村的成功大部分当归功于良好的经济社会准则，但是和大多数改革家们一样，当他在印第安纳州设立那个名为新协和村的乌托邦社区时就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旧式的资本家成了新式的社会主义者。新协和村于1826年7月4日正式开放，欧文也同时宣布了自己的独立宣言：《抛弃私有财产、不理智的宗教和婚姻！》。不到两年，这一实验

就因为欺诈横行、缺乏计划以及资金短缺而惨淡收场，欧文自己也因这个计划损失了五分之四的财产。欧文的余生是在撰写小册子和研究唯心论中度过的。

乔治·雷普利和布鲁克农场

乔治·雷普利(1802-80)，文艺批评家、先验论者，于1841年在波士顿附近开始领导组织布鲁克农场。这个村子由20位股东共同组成一家股份公司，每位股东有一份投票权。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以及很多其他著名作家都来访问过。村子里的成员工资相同、工时相同、住房相同乃至膳食都相同。教师和学生完全是“自由平等的”。布鲁克农场于1847年因债台高筑而解散。

朝圣者的共产主义实验

很多基督教团体都曾经实践过基督教式共产主义，包括1620年在普利茅斯登陆的那些清教徒移民们(Pilgrims)。他们决心根据《圣经新约》建立一个公社式的社区，在那里“凡物公用”(使徒行传2: 44-45)。然而根据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总督所说，这一计划惨淡收场，甚至还“带来了许多迷惑与不满，阻碍了许多工作开展”。布雷德福放弃了这一实践，给每个家庭分配了一块土地，而这一措施却很成功，因为它“让每一双手都勤劳工作，播种的谷物比其他情况下要多很多”(Bradford 1948: 160-162)。

摩门教徒与联合修行会(The United Order)

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于19世纪30年代建立了摩门教的教会。这一区域的内的新教教徒们没有吸取移民祖先们的教训，他们建立了乌托邦式的“共同积存(common stock)”社区。不过约瑟夫·史密斯反对这样的做法，“这会给那些贪婪者、懒惰者以及堕落者掠夺无辜者、善良者和诚信者大开方便之门”(1972: 144)。相反，摩门教徒建立了联合修行会，这一组织要求其成员将自己的财产和财富自愿献祭给教会，作为回报，他们会收到一份“职位(stewardship)”，或足够其家庭和经营所需的财产。这一职位就成为该成员的私产，可以自己工作，或者是将其出售。因此私有财产在摩门教徒的乌托邦村内保留了下来。

然而，19世纪40年代后期摩门教徒们逃到落基山一带，在约瑟夫·史密斯殉教之后，他们的新领导人杨百翰(Brigham Young)建立了高度公社化的联合修行会，并且废止了私有财产。这些团体大多只存在了几年，最终都解散了。

最新式的乌托邦：基布兹(The Kibbutz)

现在几乎没有公社式的团体存在了，而那些健在的也都是些小规模但组织紧密的团体。持续时间最长的公社团体是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im)[基布兹：现代以色列的一种集体农场或居留地，译者注]，大概最早出现于20世纪早期。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约有250个基布兹存在，不过其数量近年来急剧减少。典型的基布兹成员不超过300人，一起居住，财产共享。所有财产归基布兹所有，每个成员有自己的日常工作，并以此获得物品和服务而非工资。大多数基布兹中成人和孩子分居。

有些基布兹将其产品出售给外部世界因而获利丰厚。但是20世纪90年代基布兹因为债台高筑、内部劳动混乱以及年轻一代到外部世界寻找机遇等困难而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埃兹拉·达罗密(Ezra Dalomi)是罗什哈尼克尔基布兹(Kibbutz Rosh Hanikra)的一名成员，1999年他这样写道：“快要结束了。明年就是基布兹运动90周年纪念，但是100年恐怕是坚持不到了。……基布兹目前是毫无生气。15年危机和停滞结出了恶果。……燃气用尽，燃料也已告罄。这趟列车只能无目的的前行，逐渐减速直至完全停止”(Dalomi 1999: 25)。

乌托邦公社为什么会失败？

乌托邦社会的历史大多都是精神层面上的，却鲜少在实践上获得成功。经济学可以解释其中的原因：在一个资源稀缺但人类欲望无限的环境中，竞争是无可避免的。制度必须能够提供激励，以促进资源的增加并限制无止境的需求。产权和市场价格体系能够提供适当的激励来达成这一目标；而废除财产和价格的社会主义体系则不能。社会主义社区采用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虽然意味深长但却不符合经济规律，事实上就是采取百分之百边际税率。如此重负之下，怎么可能维系一个成功向上的乌托邦社会呢？

即便托马斯·莫尔，也在《乌托邦》一书中提醒读者注意其阻碍：“我相信在共产主

义体系中不存在适宜的生活水平。这一体系的运行总是倾向于短缺，因为没人愿意努力工作。由于缺乏利润动机，所有人都会变得懒惰，希望依赖他人為自己工作。而，当如果情况真的如此，那么就会无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谋杀和骚乱，因为谁也没有保护自己劳动成果的法律手段——尤其是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中，也不会存在任何对权威的尊重，或者说我本人看不到任何产生这种尊重的理由” (More 1965: 67)。

总而言之，把“乌托邦”称作“乌有之乡”，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总结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急切盼望一个自发的共产主义村落能够得到福佑，但是这些社区全都因为一个原因失败了：它们难以持久。新协和村、摩登时代还有联合修行会，虽然都起了品行高尚的名号，但是全都因为懒惰、债务或欺诈而土崩瓦解。

穆勒的时代刚刚过去，一种新式的社会主义便粉墨登场，暴力革命的社会主义。如果说服广大民众合作，那么就必须通过铁腕和刺刀来强制其服从。所有改革家们的眼光都逐渐转向了一种权威，那就是第六章的主题。

插图及图表注解

P117

照片5.1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73)

一个“远离人群、冷酷无情的人，聪明过头、性冷淡、怕老婆、自负、毫无幽默感”的人
感谢赫尔顿-格蒂档案馆提供

P119

插图5.1 哈里特·泰勒(1807-58)

引领穆勒走向社会主义

感谢F. A. 哈耶克提供的肖像

P120

插图5.2 杰里米·边沁 (1748-1832)

极权主义体制的遗毒？

感谢赫尔顿-格蒂档案馆提供

P122

照片5.2 作者站在杰里米·边沁的遗体旁边

强硬、无情、机械、低俗、不敬神并且低级

P127

插图5.3 罗伯特·欧文(1771-1858)

感谢赫尔顿-格蒂档案馆提供

第六章 马克思的疯狂把经济学拖进一个新的黑暗时代

本章音乐选段：霍尔斯特：《行星组曲》，第一乐章：火星——战争使者

燕妮！如果我们的灵魂能热切交融，那么我将轻蔑地把手套掷在全世界的脸上，我将像造物主般昂首走过废墟！

——卡尔·马克思致他的未婚妻（Wilson 1940: 116）

卡尔[马克思]拥有能改变现代世界的魔鬼般的天才。

——索尔·帕多瓦（Saul K. Padover）（1978: 1）

如果说亚当·斯密的著作是现代经济学的《创世纪》——那么卡尔·马克思的作品，就是它的《出埃及记》。如果说苏格兰哲学家是天赋自由体系的伟大创造者，那么德国革命家就是它的伟大破坏者。

尽管马克思的名字常常代表着恐怖，但这位德国哲学家一个多世纪来不断以鼓舞人心的旋律，拨动众多被市场资本主义剥夺了公民权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心弦。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可能播下了不和的种子，但卡尔·马克思（1818-83）打碎了资本主义的镣铐，粉碎了亚当·斯密天赋自由体系的基础。商业体制再也无法被看成是“纯粹的”（孟德斯鸠语）、“互惠的”（亚当·斯密语）或“自然和谐的”（萨伊和巴师夏语）了。现在，在马克思那里，它被描述为异化的、剥削的和自我毁灭的。

他给世界留下的烙印是无法消除的，那不是个才华横溢的就是一个失常的头脑的佐证。马克思是一个天才这一点是不存争议的——他拥有希腊哲学的正式博士学位，能流利地说法语、德语和英语，可以睿智地谈论科学、文学、艺术和哲学，在一部经典著作里创造了一个有力的经济思想的新模型。他算不清自己的帐，没法保住一份工作根本无关紧要。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传记作家称他是一个“杰出的、博学的和极有天赋的人”

（Padover 1978: xvi）。马丁·勃朗芬布伦纳（Martin Bronfenbrenner）断定马克思“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1967: 624）。

马克思和共产主义

但，就像圣经中的该隐一样，马克思因其在历史上的恶名而背上了罪恶的印记。他的名字将永远和共产主义的黑暗面联系在一起。一个幽灵在马克思头上徘徊——这就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波尔布特的历史和上百万在他们的统治下惨死和受难的人们。辩护者们说马克思不应为他的共产主义信徒的暴行负责任，甚至还断言，马克思要是活着的话，可能是第一个被处死，或者关进古拉格集中营的。也许会这样。至少，他在整个事业生涯中，一直猛烈地反对新闻审查制（Press censorship）。但是，没有马克思，是否还会有如此暴力的革命和镇压？马克思难道没有支持对资产阶级的恐怖统治（Regin of Terror）就像一个尖刻的批评家所说的：“以人类进步为名，马克思可能是所有人中带来最多死亡、苦难、堕落和绝望的”（Downs 1983: 299）。

马克思造成了青年的狂热

在所有经济学学派中，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或者我该说哲学家）像马克思这样引发了如此澎湃的激情和宗教式狂热。马克思首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和革命的偶像，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在读150多年前写下的《共产党宣言》时，每个人都不能自己地感受到那种激昂的力量、辛辣的风格和马克思、恩格斯语言惊人的简洁。

年轻的追随者们变成了真正的信徒，而且，他们往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沉溺中清醒过来。罗伯特·海尔布伦纳、马克·布劳格、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和大卫·霍洛维兹（David Horowitz）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在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据说消亡10年之后，我甚至还在我在Rollins学院的学生中见过一次。在我的课“纵览大经济学家”上，我要求学生去读一本经济学家写的书。一个学生选了《共产党宣言》。读完了这本书，他到我这，指着他那本勾勾划划过的书，兴高采烈地叫道：“这简直不可思议！我非要给它做一篇读书报告不可！”这简直有点让人害怕。在课堂上，我尽全力批驳马克思主义学说，但一点用都没有。他皈依了马克思。

我能很简单的看出一个年轻的革命者如何被不安分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些难以忘怀的字句所影响：“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964[1848]: 62）。

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一位住在纽约的老马克思主义者，讲述了他在年轻的时候如何与马克思的另外一部书——《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不期而遇。这部书带来了同样的极端狂热。“突然，我汗流浹背，泪流满面，衣服全湿了，身上忽冷忽热”——不是因为看了一本花花公子，或者第一次做股票投机交易，而是因为阅读马克思！（伯曼1999: 7）。

在许多方面，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准宗教。它有口号、象征、红旗、颂歌、党团组织、传教士、殉教者、圣经和绝对真理：“马克思有一种像受过神喻的先知一般的自信。……他是一个以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身份发言的诗人、先知和道德家；他的教义不需靠渺小的事实来检验，只需被作为道德而且神圣(ethical-religious)的真理来接受。……马克思将带领被选中的人摆脱奴隶制走向新的圣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就像坠入爱河一样，要作出一种本质上感情用事的承诺”（Wesson 1976: 29-30, 158）。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贡献

极少有经济学家像马克思一样在其他各学科方面也有突破(break out)。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称为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他非常多产，无止境地几乎在所有领域写作。即使到今天，对于马克思和他的同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作品全集的编辑工作仍然没有完成。关于马克思和相关问题的评论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在国际互联网上，亚马逊网上书店(Amazon.com)列出了超过4000个关于马克思和共产主义的条目，数量仅次于关于基督和基督教的条目，排在第二位。）因此，我们关于马克思的这一章必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在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上。即便如此，研究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马克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也不简单。好像这样有歧义。）

马克思也许是第一个建立有自己方法论和语词系统(术语?)的思想派别的主要经济学家。当他在经典著作《资本论》(1976[1876])中建立自己学派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体系与自由放任的倡导者——亚当·斯密、让-巴蒂斯特·萨伊和大卫·李嘉图的进行对比。正是马克思，将自由放任称为“古典学派”。在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时，他创造了自己的词汇：剩余价值、再生产过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历史唯物主义、庸俗经济学、垄断资本主义等等。他发明了“资本主义”这个词。自马克思以来，经济学从没有一致过。今天，不像在物理学或数学中的那样，经济学中不存在普遍接受的宏观经济模型，而只有互相对立的各种学派。

早期训练：马克思的内在矛盾

这位德国哲学家到底是谁？是谁带来这样的热情、这样的虔诚和这样有力的新经济模型甚至能挑战亚当·斯密的古典模型？

卡尔·海因里奇·马克思于1818年5月，生在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Rhine province of Prussia)里的一个高贵家庭。特里尔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

终其一生，马克思都是充满矛盾的。他咒骂卑劣的资产阶级，但自己却生长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成年的许多时光都是在绝望的贫穷中度过的，然而他却生在一个相对富有的家庭。他赞扬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物质进步，但诅咒资本主义社会。他深刻同情工人，但在成年后却从未做过稳定的工作，也没访问过任何工厂。他的母亲抱怨说：“要是卡尔能去赚点钱而不是整天写什么资本该有多好！”（Podover 1978: 344）

马克思用反犹太的侮辱性字眼大骂他的对手，但他自己却是纯正血统的犹太人（见136页加框文字“马克思：一个排犹的犹太人？”）。他珍爱他的孩子们，却眼看着他们因营养不良或疾病早夭，或者逼得他们自杀。马克思强烈反对资本主义体系中剥削的邪恶，但是，根据一个传记作家，他“无情地剥削周围每一个人——妻子、孩子、情妇、朋友，最过分的是，这一切都是他深思熟虑，精明计算后蓄意实施的”（Payne 1968: 12）。保罗·萨缪尔森补充说：“马克思是一位温柔的父亲和丈夫；但他也是一个易怒、无礼、自大的粗汉”（萨缪尔森1967: 616）。总言之，马克思怒斥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但却不断地被他自己内在的分歧困扰。

马克思的基督教信仰

最惊人的讽刺是卡尔·马克思——被认为是宗教最刻毒的对手——是作为一个基督徒长大的，尽管他的许多祖辈是犹太传教士。

他的父亲，海因里奇·马克思，克服了几几乎不可逾越的阻碍成为了一名富有的犹太律师。当1816年新的普鲁士法律禁止犹太教徒从事法律行业时，他放弃了犹太教信仰改信路德教。马克思的母亲，海丽埃塔·Pressborch，是一位犹太传教士的女儿，但她也看到了改信基督的社会价值。

卡尔，家里9个孩子活下来最大的，被施洗而成为基督徒，他还在读高中（gymnasium）的时候写了好几篇关于基督徒生活的短文。在高中高年级的时候，卡尔写了一篇叫《基督信徒们的联盟》的短文，提到了异化，一种对于被神否定的恐惧。他被创世纪中安宁的天堂的故事和（圣约翰的）启示录中可怕的末日的到来吸引住了。后来，圣经的这第一篇和最后一篇将帮助马克思构建他的学说：异化、阶级斗争、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社会和一个没有国家、没有阶级的千年纪元的和平和繁荣。他关于无产阶级胜利的观点，可能来自这些早年间的基督教救主降临的信仰。他是最初和最重要的千年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的许多教条都不是原创的。它们来自圣经，他将它扭曲改换以达成自己的目的。就像传记作者罗勃特·Payne指出的，“当他[马克思]开始敌对基督教的时候，救赎的激情和异化的恐怖被他原封不动地带给了他的社会正义思想”（1968：42）。

马克思：一个排犹的犹太人

犹太人变得让人无法忍受。

——卡尔·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被指责是一个自我厌恶的犹太人：生于犹太家庭，但却毕生排犹。在1834年出版的一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表现了一种当时在欧洲非常普遍的反犹太情绪。他的语言是报复性的：“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嫉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藐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什么抽象地存在于犹太教中——对于理论、艺术、历史的藐视？”**（Padover 1987：169）。

马克思的种族诽谤从来没有停过。他从未收回过他1843年对犹太人的中伤。“正相反，”传记作家Saul Padover写道，“他终生对他们抱有敌意……他的信件中满是反犹太的评论、挖苦嘲笑和粗鲁的辱骂：“利维的犹太鼻子（Levy's Jewish nose（典故？？））”、“高利贷者”、“犹太崽子（Jew-boy）”，“犹太黑鬼（Nigger-Jew）”等等。原因也许可以用德语中的一个概念selbsthass[自我厌恶]来解释，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憎恨是永远也无法被时间或阅历治愈的根植于其灵魂深处的溃烂“（Padover 1978：17）。

为马克思辩护

但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否定了马克思的排犹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词典》声称：“虽然，我们知道马克思并不排斥对某些犹太人使用攻击性的粗言，但并没有根据认为他一直是排犹的”（Bottomore 1991：275）。加雷斯·斯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写道：“马克思声称他排犹……只有在他表达对所有形式的民族、种族排他主义的憎恨的特殊语言环境下，才有意义，否则就是无法理解的”（Blumenberg 1998[1962]：x）。

马克思成为了大学里的激进分子

马克思的信仰几乎在他刚进波恩大学时就受到了挑战，在那，他像许多大学新生一样，开怀痛饮，狂欢作乐，却不太学习。他的账单堆成了山，参加了一个秘密的革命小组。还在一场决斗中受了伤。后来，他因为携带手枪而被逮捕，又因为粗暴好斗被监禁。

他的父亲让他转学到很有名望的柏林大学，希望能感化这个最大的儿子，马克思在那度过了接下来的5年。但是，他散漫无律的生活方式仍在继续。他贪婪地阅读，过着一种吉普赛人般放荡不羁的生活。他把自己想象为诗人、翻译希腊戏剧，在他的笔记本里写满了阴暗的悲剧和浪漫的诗歌。他参加了博士俱乐部（Doktorklub），一个小型的激进青年黑格尔派的社团。

学生们把他描述为一个才华横溢但冷酷地固执己见的人，深色的敏感的眼睛总是瞪视一切、藐视一切。他的黑色胡须和浓密的头发、尖锐的声音和狂暴的脾气令他与众不同。他异常地黝黑以至于他的家人和朋友都称他“莫尔（Mohr）??”或者“摩尔人”。他的大学生涯，可以用一首短诗描述得有声有色（Payne 1968： 81； Padover 1978： 116）：

那是谁，呼啸而来，冲动而狂野——
特里尔的黑暗使徒，狂怒地咆哮？
并不仅是奔驰或盘旋，他猛扑向猎物
以暴虐的愤怒，就像一个人跃起紧抓住
天空中广袤之地，扯下，直到地面。
高举双手，向着那梦中的天堂。
紧握邪恶之拳，他无休止地怒号
有如万恶疯扯他的鬓发。

激进德国哲学家的影响

两位激进的哲学家在马克思这段大学岁月和稍后的日子中，对他影响很大：G. W. F. 黑格尔（1770-1831）和同时代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72）。从黑格尔那，马克思发展出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动力——所有的进步都是在矛盾斗争中实现的。而从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1841）中，马克思找到了他关于宗教的虚幻观点和对基督教的反对的合理依据。上帝没有创造人类；人类创造了上帝。恩格斯这样描述费尔巴哈作品的解放性影响：“在一击之下，它……将唯物主义推上了王座……咒语被打破了……那热情是如此巨大广阔：我们都在某一时刻成了费尔巴哈主义者”（Padover 1978： 136）。

他的父母极度担心这个不想当律师却相当作家和批评家的挥霍的儿子。经济思想史中最悲哀的纪录之一就是马克思和他父母之间常常是极刻薄的通信。他的父亲，海因里奇，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捍卫者，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对于这个儿子的失望。他在信中指责卡尔是一个“邈远的野蛮人、反社会的家伙、恶劣的儿子、冷漠的哥哥、自私的爱人、毫无责任感的学生、根本不计后果的挥霍者”，这些全都是在马克思成年后不断困扰他的有力谴责。海因里奇抱怨说：“神帮帮我们吧！这种无法无天，麻木地不负责任地玩弄所有科学，在昏暗的油灯底下麻木地郁闷地冥想，套着学者的长袍、顶着乱糟糟的头发的野蛮”（Padover 1978： 106-07）。在另一封信里，他指责马克思被一种“让人心与善疏离”的“恶魔精神”所支配（Berman 1999： 25）。但是，这封来自马克思父亲的信并不是唯一一封指责马克思恶魔行径的信（见下面加框文字）。

马克思的恶魔诗文

所有的存在都值得被毁灭
——歌德的《浮士德》中的墨菲斯托菲里斯，

马克思生命的一个噩梦般的方面是他对歌德的《浮士德》的沉迷，这是关于一个年轻人自己在善恶间的动摇斗争然后与魔鬼签订契约的故事。浮士德用他的灵魂（通过中间人墨菲斯托菲里斯）交换一生的享乐和通过大量有组织劳动力控制世界的终极权利。歌德的浮士德被马克思毕生奉为圣经。他背诵墨菲斯托菲里斯的整段对白，而且可以给他的孩子背出大段的章节。（他同样热爱莎士比亚，也经常引用。）

1837年，当他还是柏林大学的学生时，马克思写了许多献给未婚妻燕妮·冯·韦斯特华伦的浪漫的诗篇。在这些诗中，有一首叫《小提琴手》，1841年发表在德国文学刊物《雅典神殿》上（Payne 1971： 59重印）。这首诗描述了一个小提琴手召唤黑暗的力量。这个小提琴手，不是路西法就是墨菲斯托菲里斯，大胆的宣称：

看那，我要把这血污的长剑
直插在你的灵魂心间，
是上帝不懂也看不起那艺术，
它从冥冥地狱爬进头脑里面。

直到我疯狂，我的心智已经完全改换
看这剑——黑暗之王子将它卖与我

魔鬼为我击拍还和着手势
我决不惧怕日日夜夜演奏这死亡之舞

马克思写了一出希腊悲剧

马克思在1839年写了一出诗体的戏剧《乌兰内姆》，其中心思想就是与恶魔的契约。他仅仅完成了第一幕，但已经塑造了一系列暴戾而古怪的角色。主角，乌兰内姆（Oulanem）是从Manuelo这个词中，调换字母顺序得到的，这个词的意思是基督或者上帝（Payne 1971: 57-97）。乌兰内姆用一种哈姆雷特式的独白，问自己是否必须毁灭世界。他是这样开始的：

毁灭！一切都在毁灭！时光正在流逝，
时钟屹立不动，而侏儒的建筑已经崩塌！
我即将把永恒紧紧地抱在怀里，而且很快
我将大声怒吼，用最强大的咒语把人类诅咒。

他在结束的时候说：

我们永远遭受捆绑，胆战心惊，被碾成粉，化为乌有，
我们被捆绑在“存在”的这一块大理石上，
被永生永世地捆绑着，永生永世！
世界包容着一切，它滚滚向前，
为自己高唱着挽歌，而我们——
我们是这冷酷的上帝的猿猴们。

马克思和自杀

马克思对于自毁行为的执著存在于他生命的大部分时刻。他甚至在1835年被流放到比利时时还编辑出版了一整本关于自杀的书。马克思翻译了雅克·帕切特（Jacques Peuchet）的作品，细致地描述了4起自杀事件的情况，其中3起是年轻女人。焦点集中在工业化体制会导致自杀行为（Plaut and Anderson 1999）。

马克思结婚并搬到巴黎

最终，马克思离开了柏林，因为大学行政部门完全被反黑格尔主义者接管了。马克思怕他关于希腊哲学的博士论文会被驳回，所以将论文提交给了耶拿大学，这所大学立刻接受了马克思的论文，根本没有考虑任何出席率的要求（答辩组的出席率？马克思的出勤率？）。在1842年间，他暂时在一个德国报社担任编辑，无畏地捍卫自由言论。当审查员令他无法继续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辞职了。

在1843年，马克思不顾双方父母的反对，与他青梅竹马的邻居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了。燕妮，比马克思大四岁，是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女儿，他是一位在城市议会中代表普鲁士政府的富有贵族。在男爵死后，马克思夫妇靠着男爵夫人的馈赠生活。燕妮全心全意地为卡尔和他的革命思想奉献了一生。在他们接下来的生命中，贫穷、疾病和失败都无法将马克思和燕妮分离。虽然也有心痛和苦闷，但他们的爱是深厚而永恒的。他们写给对方无数的情书。他们一共有6个孩子，虽然只有两个女儿活了下来。

不到一年之后，卡尔和他的新婚妻子搬到了巴黎，在那，他给一本德国月刊当编辑。马克思和燕妮热爱巴黎和法国文化。在这，马克思对于与巴师夏和自由放任学派的交往兴味索然（他后来称巴师夏是“庸俗经济学”最“浅薄”的辩护士（Podover 1978: 369）。），但与法国激进社会学家们交往甚密，包括比埃尔·蒲鲁东（Pierre Proudhon）和路易·勃朗（Louis Blanc）。他投身书籍的海洋，常常连续3，4天不睡觉（Podover 1978: 189）。在得到阶级斗争的第一手资料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令人信服地写下了关于异化和劳工苦难的内容，这部文集直到1932年才得以出版。

马克思结识了恩格斯然后改变了历史

正是在巴黎，马克思结识了他毕生共同战斗的同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95）。恩格斯被认为很“高大”（虽然他只有5英尺6英寸高），金发，有着日耳曼人的冰蓝色

（cold blue）的眼睛，他是个对于细节有着批判眼光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开始着手写一本攻击他们社会主义的对手的著作。若不是马克思在1883年去世，这亲密无间的合作将会再继续40年。

恩格斯是一个富有的德国实业家的儿子，他痛恨他专横的父亲和他的“无趣、肮脏、恶劣的”买卖，即使恩格斯也成功地经营了一家曼彻斯特的纺织品工厂，赚了钱（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改善了他的工人的处境）。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引人注目：一位有天赋的漫画家、一位军事史专家、一位几乎精通24种语言的大师。当他激动的时候，他能“用二十种语言结结巴巴地说话”！他还因玩弄女人而声名狼藉。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他的大量钱财保证他可以数十年资助马克思，另外，他在将马克思的思想引导向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恩格斯自己的著作《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马克思有深刻的影响，而且是恩格斯让马克思转变成一个革命共产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让恩格斯转变。他是《共产党宣言》的合著者，但在其他所有的方面，都被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的阴影所掩盖。

恩格斯比马克思多活了10年，他不断地与革命同伴们联络，编辑和出版马克思的著作，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火焰熊熊不灭。

世界上最伟大的批评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风格的恶毒本质从他们第一部合作作品的题目中就明显地体现出来：《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这部作品付印时，一个令人舒服得多的题目——《神圣家族》被加在了封面上。）这种对于错误发现的强调，表现了马克思对敌人的严厉的反对和激烈的愤怒。“他公开谴责任何一个斗胆反对他意见的人”（Barzun 1958[1941]: 173）。他发起了“党内清洗”（party purges）活动的实践，在一代人之后，这一活动被列宁和斯大林熟练运用。（Wesson 1976: 34）。在1847年，针对同行社会主义者普鲁东的作品《贫困的哲学》，马克思写了一部刻薄的反驳作品《哲学的贫困》。如果吉尼斯世界纪录列出世界上最有批判性的人，马克思可以轻易地获得这项奖励。他每一部书的题目几乎都包括“批评”这个词。他谨慎地描述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幸福世界，夸张地痛斥了资本主义的缺陷。

马克思写下了有利的争辩

马克思在巴黎的生活没持续多久。他因为煽动德国革命而被驱逐出了巴黎。他去了布鲁塞尔，永久放逐的第一站。在比利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受正义同盟（League of Just），后来在伦敦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的委托写下他们著名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

由马克思撰写最终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是对武力的强烈呼唤，是对新机器时代和新困苦的有力反映，在这种时代和这样的困苦中，男人、女人、孩童迁入巨大的混乱的城市中，在工厂里每天工作16小时，常常生活在一种绝望的困苦中。“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因此，“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进一步地，“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资本主义“替代以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Marx and Engels 1964[1848]: 5-7）。

《宣言》于1848年2月以德文出版，这个时机简直是在再好不过了。在夏季之前，工人起义席卷了整个欧洲——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一代人之前的法国大革命的景象支配着这个时期的精神。然而欧洲起义迅速被镇压了，马克思也因为用他父亲的遗产（6000金法郎）为比利时工人武装来复枪而被捕了。1849年，他被释放，搬到了德国科隆，在那他编辑了另外一本杂志。最后一期是用红色油墨印刷的，那是革命的颜色。

伦敦的饥饿岁月

马克思不断地惹上麻烦，然后不停地逃亡。在1849年8月被逐出德国以后，因为工人运动失败的沉重打击，马克思带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迁到了伦敦。这是他最后一次迁徙，在接下来的30年中，他在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城市中生活、研究和写作。

在伦敦的最初六年，是马克思一家极难熬的一段时间，他们因为严重的疾病，夭折和绝望的贫困而饱受煎熬。马克思为了家人能生存下去，典当了所有的东西——家族银器、亚麻布、甚至孩子们的衣物（Padover 1978: 56）。当一家人在梭霍区的一所小公寓居

住时，一名普鲁士政治间谍在1853年取得情报，并作了细致的报告：

马克思中等身材，34岁；尽管他还比较年轻，但他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他的轮廓很有力……他很大的，敏锐而炯炯有神的眼睛中有一种危险的恶魔般的东西。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凡的天才和活力……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是一个极端混乱和愤世嫉俗的人，一个糟糕的主人；他过着一种真正的吉普赛人式的生活。他鲜少梳洗、修饰和换内衣；他很容易喝醉。他经常整天整天得游逛，但只要工作，他就日以继夜的干。……他整晚不睡是常有的事。……

马克思住在伦敦条件最差因而也最便宜的住处……所有的东西都是坏的、粗糙的、破烂的；所有的东西都蒙着一指厚的灰尘；所有地方都是最杂乱的。一个人进马克思的房间，眼睛会被煤烟和烟草熏得极模糊以至于一开始要摸索前进……每件东西都很脏，每件东西都全是灰……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让马克思和他的妻子感到困窘（Padover 1978: 291-93）。

生活在贫困和悲苦中的马克思经常一文不名，极少有工作机会，工作主要是给纽约每日论坛和其他报纸当兼职记者。他顽固地拒绝变得“实际”。恩格斯不时地要给他的文章代笔。马克思三个年幼的孩子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这位恶魔般的天才和他长期受苦的妻子的生命也是这样结束的。

秘而不宣：马克思有一个私生子

在1850-51年，马克思与他妻子不计报酬的忠诚女仆，海伦娜·德穆特（Helene Demuth），（他们叫她莲琴（Lenchen））有了一段婚外情，并生了一个私生子。这段关系被马克思隐瞒起来，他请求恩格斯假作孩子的父亲。恩格斯同意了，即使这个叫做弗来迪（Freddy）的男孩长得很像马克思。“如果燕妮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这可能会让她伤心死，或至少毁了她的婚姻”（Padover 1978: 507）。燕妮事实上可能已经知道了，据说她和马克思数年没有同床。

马克思根本不承认这个儿子。最终，恩格斯在1895年临终前宣布了这个孩子是马克思的。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Eleanor），她几乎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后来，她自杀了）。这个事实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在维尔纳·布鲁门伯格（Werner Blumenberg）1962年的马克思传记中被公开（Blumenberg 1998: 111-113）。这令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者相当难堪，他们一向维护马克思作为一个忠于家庭的男人的形象，尽管他的三个孩子夭折了，两个女儿成年后也自杀了。数十年来，罗伯特·海尔布伦纳在他的畅销书《世俗事务的哲学家》中声称马克思是“一位忠诚的丈夫和父亲”（1961: 124），后来仅仅承认这是马克思的轻率举动。但，海尔布伦纳仍然捍卫马克思，辩解说这次不贞“不能破坏一场声势浩大的浪漫爱情”（1999: 149）。

马克思：富有还是贫穷？

在1856年，情况终于开始有所好转。恩格斯的资助和燕妮母亲的遗产让马克思一家得以从梭霍区搬到时髦的汉普斯泰德区（Hampstead）的优雅新家。突然之间，马克思就过上了资产阶级绅士的生活，穿上了长礼服，戴上了大礼帽，配上了单片镜。马克思家开始举办聚会和舞会，还常去海滨胜地游玩。马克思甚至还在股市里小试身手。他利用美国证券和英国合资证券进行投机交易，赚取了足够的财富，以至于他在1864年写信给恩格斯说，“现在伦敦又到了可以靠机智和一点点资金就能大转一笔的好时候了。”但是，他投机交易的细节都散失了（Payne 1968: 354; North 1993: 91-103）。

富同情心的历史学家们总是关注马克思生活的贫困处境，但这在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候都不是缺钱造成的。历史学家加里·诺斯（Gary North）调查了马克思的收入和花销习惯，然后得出了结论，除去1848-63年间马克思自愿承受的贫困，马克思恳求施舍，四处拆借，继承遗产然后挥霍无度。在1868年，恩格斯主动要求帮马克思结清所有债务，并且给他提供每年350磅的年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诺斯总结说：“在65年的事业生涯中，他只有15年是贫穷的，主要归因于他不愿意用自己的博士头衔出去找个工作……这位阶级革命的哲人经济学家，这位仅在那个破败失修的街区住过6年的‘梭霍红色博士’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是英格兰极富有的市民。但他老是做不到收支相抵。……在1869年之后，他每年定期的养老金让他跻身英国人口按收入排列的前百分之二”（North 1993: 103）。

马克思应该检查一下他自己的脑袋！

像凯恩斯沉迷于人们的手，而马克思则沉迷于他们的头颅。威廉·李卜克内西

(Wilhelm Liebknecht)，马克思的信徒之一，写下了他于19世纪50年代在一次伦敦附近的共产主义工人的夏季野餐时，第一次见到他的领袖的情形，马克思“立刻对我进行了一场严格的检查，他直视我的眼睛，然后极细致地检查了我的头。”李卜克内西对于自己能通过检查着实松了一口气(Liebknecht 1968[1901]: 52-53)。

并不是每个人都通过了马克思的花招(skulduggery)。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工人组织者，被马克思恶意地攻击，马克思叫他“犹太黑鬼”，“油腻腻的犹太佬”。“现在看来一起都很明显了”，马克思1862年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脑袋的形状和头发的长势显示出他是的祖先是追随摩西从埃及逃走的黑人(除非他的母亲或祖母在父系一方有黑鬼的血统[原文如此])。这种有黑鬼血统基础的犹太人和德国人的联合必将产生出一个反常的杂种”(Marx and Engels 41: 388-90)。

风靡19世纪的颅相学

马克思显然被伪科学的颅相学欺骗了，这是一种19世纪初由两个德国内科医师发展出来的，通过检查一个人的头骨来确定其性格的活动(见图6.1)。马克思不是唯一相信颅相学的人。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和埃德加·艾伦·坡也相信颅相学。

马克思写下了这部书(DAS BUCH) 并改变了历史进程

基本上，马克思不想浪费他的时间作常规的工作来养育他年幼的家人。他更愿意花费数小时、数月甚至数年在在大英图书馆里研究和写作。他可能回到家，告诉燕妮，他在经济决定论方面有了重大的发现，那就是所有的社会活动都由经济力量决定。他1867年以德语出版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是他事业的巅峰。《资本论》提出了经济决定论和基于马克思发现的普遍“科学”规律的新资本主义“剥削”理论。

马克思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工人阶级的圣经”，甚至希望劳工们去阅读他厚重、学究型的大部头。他认为自己“已经卷入了世界上最艰苦的斗争”，并希望他的作品能“从理论上打击资产阶级，使之永远无法从中恢复”(Padover 1978: 346)。马克思将自己看作“社会科学界达尔文”，在1880年他寄了一本《资本论》给达尔文。达尔文有礼貌地回复了他，回避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无知。

这部书仅仅印了1000册，而且卖得非常不好，主要是由于“这部书”理论上太过抽象，学术上也太过厚重，引经据典超过1500处。对于《资本论》的评价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不高，但在恩格斯和其他死硬支持者的努力下，1872年，这部作品被译成俄文，1875年译成法文。俄文版本的出版意义重大，它因为是“无威胁的”高深理论而幸运地通过了沙皇检察官的审查。俄国学者们大量地研究了这部作品，最后，其中一本落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ich Ulyanov)——弗·伊·列宁(V. I. Lenin)手中。正是列宁，马克思最有力的信徒，将马克思带入了光明。“没有马克思，也许就不会有列宁，而没有列宁就没有共产主义苏联”(Schwartzchild 1947: vii)。

直到1887年，英文版才出现。在1890年，一个美国的版本变得非常畅销，5000本的印数很快就卖完了，《资本论》的热销是因为它被当成为一本教导读者“如何积累资本”的书——一部赚钱的教程了(Padover 1978: 375)！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纳闷这么一部“冗长、罗嗦、抽象、乏味、文笔糟糕、错综复杂的书怎么[能够]成为半个世界的犹太法典和可兰经？”(Gordon 1967: 641)。马克思主义者们回答说：“这正是它美的所在！”《资本论》生存下来并逐渐被承认为一部经典著作有一部分原因是它很对知识分子的胃口。据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说，《资本论》的声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难以消化的长度，它与世隔绝(hermetic)的风格，它炫耀卖弄的博学，和它代数学的神秘”(Wesson 1976: 27)。

为什么马克思要留那么长的胡子？

宙斯言罢，弯颈点动浓黑的眉毛，
不朽的发绺从王者永生的头颅上顺势泼泻，
摇撼着巍峨的奥林匹斯山脉。

——荷马，《伊利亚特》（第一卷，528行）

革命同志们总是把马克思比作希腊众神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马克思的虚荣。他特别喜欢1843年在他的报纸《莱茵报》被禁止后，一幅将他画作普罗米修斯的政治漫画。马克思被锁链绑在他的油印报纸上，而一只代表普鲁士国王的鹰正在撕扯他的肝脏。这位编辑看起来毫无畏惧，只盼望有一天能重获自由，继续他的革命事业。

19世纪60年代，当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时候，作为圣诞礼物，收到了一尊他珍若生命的宙斯像。这尊塑像成了马克思最珍视的收藏之一，他把它放在伦敦的书房里。从那时开始，他就试图模仿这尊宙斯塑像。他不再剪头发，任由胡子疯长，直到它呈现出宙斯头像的形状和数量。他把自己想象成宇宙之神，将他的霹雳施于大地。马克思最后岁月的一张照片展现了他有如宏伟光环般的花白头发四处张扬。（见照片6.2。）

马克思创造了一种留胡子的潮流，这成为自他以后不少革命者不同于别的形象特征。但，“所有的一切都会走向终结，包括宙斯的统治和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他们的荣耀在大地上残留的痕迹只有破败的神殿和神圣的塑像”（D'Aulair 1962: 189）。

马克思惨淡地死去

在出版《资本论》的时候，马克思只有49岁，但他拒绝再完成任何完整的作品，而是阅读、研究、为大量的书籍和文章作笔记，这些书籍文章题材相当广泛，甚至涵盖诸如数学、化学和天文等领域。“他钻研诸如氮肥的化学性质、农业、物理和数学之类的问题……马克思立刻写了一篇关于微积分的专业论文和许多关于其它数学问题的草稿；他学习了丹麦语；他学习了俄语”（Raddatz 1978: 236）。

在马克思的晚年，他处于完成各项工作的低潮，尤其是有关经济学的工作。他一直没有完成《资本论》的下两卷，这惹恼了恩格斯，他最终自己编辑出版了后两卷。

马克思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病痛中度过，他一直被慢性疾病困扰——哮喘时常发作，头疼持续不断，喉咙细菌感染，常患流行感冒，他还患有风湿病、支气管炎、牙痛、肝病、眼部发炎、喉炎和失眠。他的疝气和痼疾过于严重，以至于他晚年时全身上下满是疤痕。他的“永恒爱人”燕妮在1881年因癌症去世；马克思病痛交加，连她的葬礼都无法参加。他的女儿，也叫做燕妮，在两年后因同样的疾病去世。与此同年，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在他的安乐椅里告别人世。不足为奇，他没有留下遗嘱或者遗产。

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燕妮，女仆莲琴（于1890年）及其他家庭成员一起被葬于伦敦的海格特公墓。20世纪50年代，(英国)共产党为马克思立了一块12英尺高的纪念碑，上面还塑有一尊马克思的半身像。他的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金字镌刻在纪念碑上。墓碑底部，刻着马克思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见147页照片6.3。）

恩格斯主持了马克思葬礼的仪式。他动人地赞颂了马克思在历史上的地位，称赞他是社会科学界的达尔文。“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的确如此。在马丁·西默-史密斯（Martin Seymour-Smith）（1998）的《最有影响力的一百本书》中，列出了7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托马斯·罗勃特·马尔萨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赫伯特·斯宾塞、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和卡尔·马克思。

活着的马克思一家：一场郁闷的失败

但是，恩格斯要等到20世纪才能看到马克思的影响逐渐显露。在1883年，这仅仅是一个伟大的错觉。在他去世的时候，马克思简直被人遗忘了。出席他葬礼的人不到20个。恩格斯建议西伯利亚矿山的工人同志们悼念马克思，但他们没有，就连《共产党宣言》都鲜有人记得，更别说《资本论》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从来就没听说过他。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马克思能感同身受地回忆起圣经中的句子：“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吗”（希伯来书 9: 17）。

他家庭的命运想起来就让人伤心。那简直是一场恶梦。只有两个女儿和那个私生子比马克思活的久。1898年，他的女儿，艾琳娜·马克思，（他们叫她杜西（Tussy）），一位和她父亲一样意志坚定的革命者自杀了，因为知道了弗来迪是她父亲的私生子，还有她愤世嫉俗的爱尔兰革命者丈夫是个重婚者。1911年，他生存下来的女儿劳拉，一位口才极好的演讲者和出色的美人，和她的丈夫，另一位法国社会学家完成了一个自杀协定。总之，卡尔·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以及他们的后代的生命的最后岁月都几乎毫无乐趣可言。被称为“将军”的恩格斯在1895年死于癌症。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剥削模型

现在，让我们回顾马克思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并确定其中哪些有持久的影响而哪些被抛弃了。

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卡尔·马克思尝试建立一个模型来替代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这个系统的目的是利用绝对的“科学”规律来证明资本主义存在致命缺点，即资本主义本质上保证资本家和大工业获利，剥削工人，而且由于其危机倾向，资本主义必将无可避免地自我毁灭。在许多方面，这个马克思主义模型合理化了他自己对于资本主义体制必将被共产主义推翻并取而代之的信仰。

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发现李嘉图的体系恰好与他的剥削模型相吻合。从许多角度来说，大卫·李嘉图都是他经济学的导师。正如在第四章已经指出的，李嘉图关注生产以及生产如何在各大阶级之间进行分配——地主、工人和资本家。李嘉图和他的继承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见第五章），尝试用阶级来分析经济而不是用个人的行为。

萨伊和法国的自由放任学派（见第二章）的确关注了个人的主观效用，但马克思拒绝了萨伊而跟随了李嘉图，集中考察单一同类“商品”的生产和从商品生产中得到的收入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

李嘉图的阶级体系中，劳动在决定价值时起关键作用。首先是李嘉图，然后是马克思，宣称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商品”的价值应该等于创造商品时耗费的平均劳动时间。

剩余价值理论

如果劳动真的是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那么利润和利息何去何从呢？马克思将利润和利息归为“剩余价值”。

因此，只需要短短几个逻辑步骤，就能得出资本家和地主在剥削工人的结论。如果的确所有的价值都是劳动的产品，那么所有资本家获取的“利润”和地主获取的“利息（地租？）”都必然是“剩余价值”，不正当地从工人阶级的真正收入中榨取的一部分。

马克思为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建立了一个数学公式。利润率或剥削率（ p ）等于剩余价值（ s ）除以最终产品价值（ r ）。

因此，

$$p = s/r$$

例如，假设一个制衣厂厂商雇佣工人生产服装。资本家每件衣服卖100美元，但劳动成本为每件衣服70美元。因此，利润率或剥削率为：

$$p = \$30 / \$100 = 0.3 \text{ 或 } 30\%$$

马克思将最终产品的价值分解为两种资本，固定资本（ C ）和可变资本（ V ）。固定资本代表工厂和设备，可变资本则是劳动的成本。

所以，利润率的等式变成：

$$p = s/[v+c]$$

马克思声称，利润和剥削的增加是通过延长雇工的工作时间或者以低于成年男子的工资雇用妇女儿童实现的。而且，机器设备和技术的进步仅使资本家获利，而于工人无益。马克思宣称，例如，机器设备允许资本雇佣妇女儿童来操作。这样的结果只能使更严重的剥削。

批评者反驳说，资本是生产性的并且要求一种合理的回报，但马克思辩驳说，资本最多只能算是“凝固的(frozen)”劳动，因此工资应当包括全部的生产收益。古典经济学家对马克思没有回应，至少最初没有。于是，马克思胜利了，他用无懈可击的逻辑证明了资本主义的本质造成了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之间严重的“阶级斗争”——以及资本家和地主攫取了不正当的利益。穆雷·罗斯巴德评论说，“当19世纪经过了自己的中点，李嘉图经济学的缺陷变得前所未有的耀眼。经济学自己走到了一个死胡同。”（Rothbard 1980: 237）。直到一位英国牧师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 Wicksteed)和一位影响很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欧根·冯·柏姆-巴维克(Eugen Von Bohm-Bawerk)，集中关注了资本家带来的风险承担的收益和企业家收益，才有效地反驳了马克思。这个问题我们留在第七章讨论。

下降的利润和资本积累

马克思对机器设备和技术有一种执拗的错误观点。资本积累为了满足竞争需要以及压低劳动成本而不断增长。“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与先知们！……所以，储蓄，储蓄，也就是将最大比例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变回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断言（1976[1867]: 742）。

但这带来了麻烦，一场资本主义的危机。因为，根据马克思的利润率公式， $s/[v+c]$ ，我们可以看到机器设备提高了 c 因而降低了利润。大企业更为集中，因为更大的工厂能以更低成本生产，这“总是以许多小资本家的破产告终”。同时，工人们变得更加悲惨，用以购买消费品的工资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工人被挤下工作岗位，成为不断扩大的“产业后备军”。

资本主义的危机

降低的成本，下降的利润，垄断力量，低度消费，无产阶级的大规模失业——所有的这些条件导致了“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和资本主义体制的萧条（Marx and Engels 1964[1848]: 13）。这全部都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导出来的！

马克思反对萨伊的市场定律，他把那称作“幼稚的泡沫……哗众取宠的空话……骗人的谎言”（Buchholz 1999: 133）。资本主义根本没有稳定性。马克思同时强调了资本主义体制繁荣和失败的双重本质，并且，其最终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

马克思对于资本家们积累更多资本并不断创造新的国内国际市场的能力感到非常震惊。《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对这种现象的著名描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慌乱地不断“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Marx and Engels 1964: 12-13）。

马克思此后一直将资本主义和大企业描述为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不断剥削外国工人，掠夺外国资源。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后来被J. A. 霍布森和V. I. 列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20世纪许多发展中世界的反美和反外国态度都来源于马克思，这种反资本主义的态度是极具破坏性的，导致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的发展缓慢甚至负增长。

历史唯物主义

那么资本主义将走向何方？马克思在建立他的经济决定论的过程中深受乔治·威廉·黑格尔（1770-1831）的影响。黑格尔的基本论点是“矛盾（本质上）是所有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黑格尔用辩证法阐述这种矛盾，即最终会产生新的力的相互对立的力。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一个确立的“正题”会带来一个从对立面发展出来的“反题”，最终会形成一种新的“合题”。这一“合题”又成为“正题”，然后这个过程重新开始。

图6.2反映了黑格尔这种辩证法。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于他的历史决定论观点。因此，历史进程可以用黑格尔的概念体系来描述，就像在图6.3（估计这里是原书图标错了。）中显示的那样。

根据这种理论，奴隶制被看作希腊罗马时代的主要生产方式，或“正题”。封建制在中世纪成为它最主要的“反题”。“合题”是资本主义，也就成为了启蒙运动后的“正题”。但资本主义也要面对它自己的“反题”——社会主义不断加剧的威胁。最终，这种斗争将导致生产的终极体制出现，共产主义。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是永恒的乐观主义者。他坚信所有的历史都指向更高的社会形态，在共产主义中登峰造极。

马克思的解决方案：革命社会主义

但是，当确信共产主义必将出现，马克思仍认为将其付诸实践的革命是必需的。首要地，马克思是暴力（强力）推翻政府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倡议者。他从暴力中感受到巨大的喜悦。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1860（1864第一国际成立，年代好像不对）年的第一国际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中都宣告了他的革命动机。

虽然这位德国革命家没能细节地透露他的计划，《共产党宣言》中确实提出了一个十步程序（Marx and Engels 1964: 40）：

1.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3. 废除继承权。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
10. 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不借助暴力实施其中的某些措施是难以想象的。但这还不是所有的。马克思还鼓吹中央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他支持完全废除私有制，根据他的理论，私有制是冲突和阶级斗争的根源，是奴隶制的一种形式（1964：27）。他同意普鲁东“财产即为偷窃”的说法。消灭了私有制，交换就无需存在，没有买和卖，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倡导消灭货币（第30页）。无需交换或货币，生产和消费将在中央计划安排下更加繁荣。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要求废除传统家庭，进而“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并且“倡导一个女性的社会。”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支持教育计划要“消灭人们最神圣的关系”，而且“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第33-35页）。

那么宗教怎么办？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类的鸦片。”“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的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第38页）。

马克思预言革命社会主义将第一次完整的体现人类的存在和幸福。亚当·斯密追求的“普遍富裕”的目标，将最终在真正的共产主义下实现。马克思在内心中是一个千年王国的信徒。天堂可以在人间实现。最终，无产阶级专政将被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所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们将成为全新的人类！

为什么凯恩斯鄙视马克思和苏联？

暴力变革的方式会让我们失去所有一切。
在西方工业化的条件下，采取一种红色革命的策略
会将全体人民扔下一个贫困和死亡的深渊。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1：306）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是一个干涉主义者，而且是英国自由党的支持者。像马克思一样，他不是自由放任的支持者。他争论说，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不稳定的，需要政府干预。

但是，这已经是最大的限度了，凯恩斯无法忍受马克思或者共产主义实验，他认为它们是“对我们智慧的一种侮辱”（Moggridge 1992：470；Skidelsky 1992：519）。他1925去苏联后立刻写了三篇关于这个国家的文章，揭露苏联“宗教”是“不择手段的（寡廉鲜耻的）”，“残酷无情的”，“与人性格格不入的”。凯恩斯完全没有一点那种天真的“我看到了未来”的乐观主义情绪。个人自由对于他来说太重要了。“说到我，我是在自由空气里成长起来的，没有受过宗教恐怖的袭击，天下事没有什么可怕的，红色的苏联，在我看来，其间可憎可嫌之处实在是太多了。”他补充说：“这种教义认为可取的是河底的淤泥，而不是河里的鱼虾，它把粗鄙的无产阶级捧起来，抬高到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者不管有什么缺点，总是生灵中的精粹，人世一切进步的种子，当然是要靠他们来传播的，对这样一种交易，我怎么能采纳呢？”他痛斥马克思的大部头作品《资本论》是“陈腐的经济学课本”，说它不但“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与现代世界已经没有关系或不相适应了”（凯恩斯1931：298-300）。

在大萧条的中期，最好最优秀的学者都信奉了马克思主义，但凯恩斯没有。在1934年与一群友人共进晚餐的时候，凯恩斯说，在所有的“主义”中，马克思主义是“最糟糕的一种，它建立在李嘉图老先生的一个愚蠢的错误上[劳动价值论]”（Skidelsky 1992：517）。在写给剧作家肖伯纳的一封信中，凯恩斯称《资本论》是“沉闷、过时、学术争议极大的。”他把它比作《可兰经》。“这两本书中的任一本是怎么让火焰和硝烟弥漫一半世界的？这真让我想不通。”在1935年1月1日给肖伯纳写的另一封信中，他抱怨马克思“可恶的写作风格”。然后他补充了一个后来被证明是深谋远虑的附笔说：“我相信，我正在写

的这本关于经济理论的书，在世界如何看待经济问题方面，将引起一场彻底的革命——这种影响可能不是立刻出现的，我猜想，会出现在下一个10年”（Skidelsky 1992: 520）。

这本书就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它的确在经济世界引起了革命，让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学术界变得暗淡无光。

马克思主义者们反对（turn on）凯恩斯

凯恩斯，彻底的资产阶级成员，厌恶马克思，毫无疑问，要是他们互相认识，这种感觉肯定会是相互的。同样，马克思主义者们蔑视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种理论对于工人阶级是异常危险的，”马克思主义者约翰·伊顿（John Eaton）在他的小册子《反凯恩斯的马克思（马克思反对凯恩斯）》中写道（1951: 12）。根据伊顿，凯恩斯为“工资奴隶制”和“帝国主义政策”辩护（第75页）。伊顿指责凯恩斯“根本就没有读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的科学分析”（第33页）。简言之，在伊顿看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危机四伏而腐败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庸俗经济学”，因此逃脱不了失败的厄运。

马克思的预测没有实现

但这些都实现。马克思的预测出错了，虽然不是立刻全部出错。晚到1937年，瓦西里·列昂惕夫（俄裔经济学家，后因他的投入产出分析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还赞扬马克思的纪录是“令人难忘”和“正确的”（Leontief 1938: 5, 8）。但列昂惕夫的赞扬是不成熟的。自那以后，就像莱舍克·克拉克瓦斯基（Leszek Kolakowski），前主要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宣称的一样，“所有马克思的主要预测现在看来都是错的”（Denby 1996: 339）。回顾一下：

1. 在资本主义世界，即使一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资本不断地积累，利润率并没有持续下降。
2. 工人阶级并没有陷入越来越深的苦难。工资水平上升并显著高于生存水平。在工业国，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有了引人注目的提高。中产阶级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扩大了。就像保罗·萨缪尔森总结的那样，“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再也没有发生过。作为一位预言者，马克思异常的不好运，而他的体系极端的不好用”（1967: 622）。
3.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鲜有证据表明产业的集中化。
4. 社会主义者们的乌托邦社会并不繁荣，无产阶级革命也没有不可避免地发生。
5. 除去经济周期和偶尔发生的大规模萧条，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繁荣（参见156页加框文字“更新：作为现代世界末日论者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马克思的批判

为什么马克思在建立了他坚决主张的经济学的“科学”规律后，还错得这么离谱？

首先，并且最重要的，他的劳动价值论是有缺陷的。在否定了萨伊的市场定律的同时，他也否定了萨伊合理的价值理论。萨伊正确地注意到了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最终由效用决定。如果个人不需求或需要一件产品，不论生产这件商品耗费了多少劳动或者努力，它都将不具有价值。正如历史学家雅各·巴赞（Jacques Barzun）写道，“珍珠不是因为人们为了它潜水而有价值；人们潜水捞珍珠是因为它有价值”（Barzun 1958: 152）。菲利普·威克斯蒂德在1884年，第一个写下了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批判，他写道，“一件外衣对于社会而言比一顶帽子要贵7倍，不是因为要多花费7倍的时间来做衣服……社会愿意多花7倍时间来做衣服是因为衣服将会比帽子有价值7倍”（Wicksteed 1933: vii）。

而且，那些很少用劳动或不用劳动生产，但价值持续上升的物品，例如艺术品或者土地如何解释呢？马克思也注意到了这些是他的理论的例外，但他认为它们相对于劳动力量的基础问题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苏联经济学家公然反抗马克思主义者
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这一理论是错误的而且反动的。

——苏联百科全书（Solomou 1987: 60）

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Nicolai Kondratieff）（1892-1938）在1926年向声名显赫的莫斯科经济学院提交一篇关于一个50-60年的经济周期案例研究的论文时，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灭亡的预测产生了矛盾。根据1870年以来的价格和产量变化趋势，康德拉季耶夫描画出两个半上升和下降的繁荣和萧条的经济周期“长波”。康德拉季耶夫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将不可挽救地崩溃的证据；相反，在萧条时期总会出现强有力的复苏。

1928年，康德拉季耶夫莫斯科经济环境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被撤销，他的论文被官方的苏联百科全书公开谴责（Solomou 1987: 60）。他很快就被当作非法组织工农党的所谓首领逮捕了，并在1930年不经审讯地被驱逐到西伯利亚。他死了，“就像太多和他同时代的苏联知识分子一样，不知在何地，不知在何时，不知因何故”（Blaug 1986: 115）。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不再可信

但所谓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仍然被一些经常预测萧条和经济危机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金融分析师铭记。但是，现在距最近一次世界性大萧条已经有70年了。正像维克托·查诺维茨（Victor Zarnowitz）最近总结的，“即使是在长波这一概念的支持者中，也存在许多关于某些长波确切存在性的争执，关于波动的时间和状态（相位）的争执就更多了”（Zarnowitz 1992: 238）。

更新：作为现代世界末日论者的马克思主义者

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 11-12）

追随着他们的领袖的足迹，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们仍然不断地预测资本主义的崩溃，但他们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地自取其辱。

1976年，在能源危机和通胀性衰退中期，社会主义者迈克·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出版了一本叫做《资本主义的黄昏》的书，他把这本书献给卡尔·马克思。他预测说，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将会是资本主义的终结。

同年，马克思主义者艾尔纳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写了一篇《资本论》的序言，激烈地宣称：“自1914年以来，各种危机（军事的、政治的、社会的、货币的、文化的）不断发生，资本主义不可能在这些危机之中再多存活半个世纪了”（Marx 1976: 86）。

保罗·M·斯维奇，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就预测说资本主义正在衰落，而带来更高生活水平的社会主义则将“飞速”发展（Sweezy 1942: 362）。他在1977年，与人合著了一本书，《繁荣的终结》。

然而，进入了新世纪，资本主义甚至比以往更生机勃勃。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们，永远的悲观主义者，再一次被证明是错的。

(价值)转型问题

马克思还面临一个困难，这后来被称作“（价值）转型问题”，也被称作利润率与价值问题。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存在一个矛盾，因为某些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而另外一些是资本密集型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们的资本有机构成更高。）在《资本论》的第一卷，马克思坚持认为劳动时间的不同直接导致价格的不同，因此得出结论，资本密集产业应该比劳动密集产业更无利可图。但，有证据表明在长期，所有产业的利润率是相近的，因为资本和投资可以从利润率较低的行业转移到利润率较高的行业。马克思一直无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罗斯巴德称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模型中最显著的一个漏洞”（1995: 413）。

马克思和（价值）转型问题较了一辈子劲，并许诺在《资本论》的下一卷给出答案。

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恩格斯提供了一篇极好的文章，论证了马克思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9年中，大批经济学家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但直到《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的时候，恩格斯宣称，没有人成功（Rothbard 1995: 413）。柏姆-巴维克揪住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这唯一的问题，用保罗·萨缪尔森的话来说，“一点错误也没犯，柏姆-巴维克坚持说《资本论》第三卷根本没有实现关于调和这些虚构矛盾的承诺是完全正确的”（Samuelson 1967: 620）。

资本家和企业家至关重要的职责

第二点，马克思犯了一个大错，他没有对资本家和企业家的知识和工作进行评价。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柏姆-巴维克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及其他大经济学家，都注意到了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贡献，他们承担风险，提供必要的资本（储蓄）和运营一家盈利企业所必需的管理技能。

工人资本主义现象

马克思主义今日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经济阶级的逐步瓦解。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再存在清晰的界线。只是纯粹雇员或者仅靠工资生活的工人越来越少。他们常常通过利润分享或养老金计划或拥有该企业的股份而成为他们受雇的企业的股东或共有人。许多工人都是自我雇佣的，而且在部分时间当上了资本家。今天，超过一半以上的美国家庭拥有公开上市公司的股份。大街（Main Street）和华尔街一起创造了一大群新的工人资本家，这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劳动力市场中的革命热情。

最后，马克思关于机器设备和资本品的观点是不正确和片面的。节约时间和劳动的机器设备并不仅仅让工人失业或者降低工资。它们常常让工作变得更易完成，进而允许工人们从事其他生产性的活动。机器设备和技术在减轻或消除马克思强烈谴责的“工人异化”方面，成绩斐然。通过削减成本，机器设备和技术进步创造了新的需求和生产其他产品的新机会。它们为被取代的工人创造了其他的职位，而且报酬经常更高。正如一代人之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说的，“只有一种方式能永久地提高工资率，并对热心赚工资的人们大有裨益——那就是，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同时，加速可用资本的增加。”（Mises 1972: 89）。有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劳动生产率（每人每小时的产出量）的提高带来高工资。

总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保罗·萨缪尔森得出结论（早在1957年），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什么内容经得起推敲。

马克思，反经济学学者？

迈克·哈林顿声称马克思最终是个反经济学学者（1976: 104-148）。的确，这可能是正确的。马克思是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完全不理解资本、市场、价格、和货币在促进人类物质极大丰富的方面所起的作用。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把工人从贫困、垄断、战争和压迫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并且更好地实现了马克思的和平、富饶、安逸和能“完整的”表现人类美学的千年主义希望。

现今，马克思主义能带来丰富而多样的商品和服务，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提供安逸闲暇的业余时间吗？很难。马克思在想象他那种乌托邦社会主义能够实现工人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的时候令人难以置信地容易受骗。他在19世纪40年代曾写道，

“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人有单独的活动领域但每个人都可以精通他想要得任何领域，……因此，这让我可以今天作这件事而明天做另一件，可以根据我的爱好，早上打猎，下午捕鱼，晚上照管牛群，吃过晚饭后作些批判，而不用去当猎人、渔夫、牧人和批评家”

（Wesson 1976: 15）。这是纯粹的象牙塔中的天真想法，是早期马克思的一个特征。马克思的理想主义，将把我们带回到原始或者说野蛮的物物交换的部落生活中去，交换和分工的好处都被丢弃了。

因此，当我们踏入21世纪，亚当·斯密——资本主义之父重新排到了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父的前面。在Michael Hart的《100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100人》的第一版（1978）中，作者把马克思排在斯密前面。但在1992年苏联解体后写的第二版中，斯密领先于马克思。

更新2：保罗·斯维奇拯救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使之活力重现

至少十分之一的美国经济学家属于激进派。

马克思主义从来没能真正侵蚀太多经济学家们。少数几位校园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剑桥的莫里斯·陶普（Maurice Dobb）、斯坦福的保罗·巴朗（Paul Baran）和哈佛的保罗·斯维奇（Paul Sweezy）。斯维奇是最引人注目的了，他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位从自由放任派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学家。（韦塔克·钱伯斯（Whitaker Chambers），，马克·布劳格和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都走的是相反的道路。）保罗·斯维奇1910年生于纽约，父亲是一位摩根银行的银行家，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最好的私立学校，埃克塞特大学和哈佛大学。杰出、英俊、风趣的斯维奇在1932年离开了哈佛大学，以一位古典经济学家的身份到伦敦经济学院去继续研究生学习，成为了一名热情的哈耶克信徒。然后，暂时地受到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影响，最终，他转变成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从那时起，温文尔雅的斯维奇尽一切努力建立马克思主义在大学校园中的声望。

在凯恩斯革命的黄金年代，斯维奇回到了哈佛去当讲师，他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成为朋友，指导了罗伯特·海尔布伦纳，并且协助约瑟夫·熊彼特完成他即将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斯维奇完成了他关于“弯折”的需求曲线的最著名的文章，帮助组织哈佛教师协会，然后出版了《资本主义发展论》（1942），一部解说马克思主义的极为条理分明、令人信服的著作（虽然作者因为引用斯大林而让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像熊彼特一样，斯维奇在他作品的最后预测说，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灭亡，而社会主义将“大范围地显示其优越性”（1942：352-63）。

他1942年加入战略服务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后，在哈佛的教学工作被打断了。战后，斯维奇申请哈佛的终身教职，虽然熊彼特不遗余力地支持，但被拒绝了，他后来一直也没有得到永久的学校职位。1949年，他与人合办了《每月评论》，“一本独立社会主义月刊”，它的第一期就因为印出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而造成了巨大反响。（爱因斯坦的文章非常明显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的。）从此以后，斯维奇就一直和《每月评论》联系在一起，其间他还与Paul Baran一起合著了《垄断资本》（1966）。在他的整个事业生涯中，斯维奇以站在“牵强和不真实的”立场（他自己的话）闻名，例如，他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政府（联合国最近将这个国家列入世界上最恶劣的人权侵犯国）的主要（arch）辩护，还有他对于资本主义即将来临的灭亡的坚定预测（1942：363）。在1954年的麦卡锡时期，他因为按自己的原则拒绝回答关于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颠覆性活动”的问题而入狱。1957年，最高联邦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

其他激进风潮（Trends）

越南战争期间，涌现出许多其他激进的期刊和组织：期刊《异议》和《新左派评论》，还有激进政治经济联盟（Union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sts这里原书好像有误，应为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或简写为URPE。它们都在20世纪60年代的抗议的岁月和70年代的危机趋向时期达到全盛。在1968年，数位马克思主义者在密歇根大学聚集并建立了激进政治经济联盟，他们选择了听起来很尖刻的缩写URPE。URPE的目的是展开“对资本主义体制及所有形式的剥削和压迫的批判，同时帮助建立一种进步的社会政策，创立一种社会主义的替代体制”（URPE网站）。

到1976年，保罗·萨缪尔森报告说，经济学家行业内至少十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风格的经济学家。虽然，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学理论方面有更深刻的影响，但许多大学的经济学系都以它们的激进主义闻名，包括，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纽约新社会研究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in New York City），加州大学利佛塞德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Riverside），犹他大学（University of Utah）。

随着苏联和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范式的解体，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也消失了，至少在经济学界。美国经济学年会中URPE会议的参加率下降了，而URPE的成员人数也减少到约800人。

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

如果我们证明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预测都是错误的，那么在《资本论》和马克思其他的经济学作品中，是否还有东西值得挽救？当然，有。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们强调了许多由马克思提出的当代问题：

- 车间里的异化和单调工作问题。
- 货币导向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贪婪、欺诈和、实利主义问题。
- 对于财富、收入和机会不平等的关注
- 种族、女权、歧视和环境的相关问题。

大卫·邓比（David Denby），一位成年后在大学的经典文献选读课程上读到马克思的散文家，讨论了许多经常被现今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及的当代问题。

首先，异化。邓比说，“异化是一种自我迷失：我们为别人工作，实现别人的目标，我们通常在面对自己生产的产品时，表现出一种厌恶的无差异边界”（1996：349）。我们如何应对现代商业世界中的厌倦和无意义？而什么又是替代品？一个公有的或社会主义的社会是否有更少的厌倦和无意义？一个逐渐增加商品数量、改进商品质量、提供更多种类的商品和服务的资本主义社会将带来更少的厌倦和更多满足的机会，它主要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允许工人在工作以外的副业中得到满足。

那贪婪怎么办？邓比写道，“资本主义通过商品造成了嫉妒和自我实现的欲望。从美国的情况看，资本主义本身要为道德水平的低下承担部分责任”（1996：349）。这种论点很流行，但遭到亚当·斯密和孟德斯鸠的观点的反驳，他们认为商业文化会逐渐抑制贪婪和欺诈。（参见第一章。）资本主义还将产生富有的个体，他们花大量时间精力去进行精神上、艺术上、文化方面、非贪婪的主动行为，对社会大有裨益。

邓比的同事提出了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批评：“在资产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类似商品之间的关系……如果，现金是连结你我唯一的纽带，那么是什么支撑着社会？”在一个高度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对商品的渴求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对于全能的美金的追逐，是否导致有历史的旧房子（historic homes）被拆除，高层公寓楼的不断修建？资本主义是否给我们压力，逼我们长时间辛苦工作，以至于无法建立办公室之外的人际关系？邓比警告说，“在美国，似乎能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越来越少了”（1996：344-351）

快节奏的市场经济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独立于社会，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经常变成匿名而不友善的。毋庸置疑，在公有制社会中，我们将会与邻居和本地的生意人更熟络。但，我们又放弃了什么呢？

货币关系

在这些异化、不平等和实利主义的问题之外，我发现马克思关于货币职能的演化解说最有用。在《资本论》的第三章，他从两种商品C和C'的物物交换开始讨论。交换是这样发生的：

$$C - C'$$

在引入货币后，这种关系变成：

$$C - M - C'$$

这里，货币充当两种商品交换的媒介。通常，在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货币要进行数次交换。对于资本主义体制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有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上，而货币仅仅充当交换的媒介——实现目标的手段。

但是，马克思指出，货币资本家很容易就能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更精确地说，就是关注“赚钱”而不是“生产有用商品和服务。”马克思用下面的式子表现这种新的商业方式：

$$M - C - M'$$

换句话说，商人用他的货币（资本）生产商品，C，结果卖出它得到了更多的货币M'。注意到，当货币作为这一活动的开始和结束时，人们将轻易地忘记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生产和交换商品。目标不再是C，而是M。

最后，市场体制进一步发展，达到了商品根本不在图中出现的程度。交换过程变成了：

$M - M'$

这最后的步骤表现了资本或金融市场，例如货币市场或证券（股票和债券）市场。至此，商品资本主义可以轻易的转化成金融资本主义，进一步脱离了根本的商品生产。在这样的环境下，商人们经常忘记经济系统的全部目标——生产有用商品和服务——而仅仅关注利用赌博、短期交易技巧、通过银行账户或国库券来“赚钱”。最终，赚钱这个目标的最佳实现方式是提供有用商品和服务，但这是一个在商业世界必须一遍又一遍吸取的教训。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文化如何导致最终目标和对社会的关注的丧失。这种经济活动真实目标偏离的趋势不断地挑战商业领袖、投资者和市民，让他们回归基本。

马克思放弃了么？

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卡尔·马克思

据说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说了上面的话，但显然这是一种断章取义。那时，他对于他女婿拉法吉（Lafargue）的社会主义“理论垃圾gibberish”极为失望，于是马克思声称，“如果那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传记作家弗里茨·约·拉达茨（Fritz J. Raddatz）总结说，“那绝对不是一种对自己信条的放弃和背离，而相反，那是针对那些歪曲他信条的人的对信条的捍卫”（1978：130）。

但是，正当马克思可能并没有放弃他对于暴力革命和他自己的理论的偏好时，恩格斯在较后期的几年中，似乎修正了他的观点。他在这几个方面作出让步，工人们可能赚得比生存工资要多，其他非经济的因素在社会中也起一定作用，合法的政治手段也可以实现改革。“这位曾经的自封闯劲十足的革命将军几乎变成了一位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者，”罗伯特·威森（Robert Wesson）这样写道（1976：37-38）。

总结：马克思留下了他的痕迹

总之，不能完全拒绝马克思。他的经济理论可能是有缺陷的，他的革命社会主义可能是破坏性的，马克思他自己可能是暴躁的，但他对于市场资本主义的哲学分析存在有价值的成分并值得我们关注。

在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出版后仅仅几年，一群新的欧洲经济学家将登上舞台。这些经济学家将纠正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们的错误，然后带来一场持久的革命。正像之前提过的，用生产成本方式导出的价格理论将经济学困在一个盒子里，一个装着能彻底毁灭天赋自由的古典体系的盒子。必须有一次革命性的突破才能让经济理论从郁闷科学的阴霾中重生，才能重建亚当·斯密模型的基础。这正是第七章的主题。

插图及图表注解

P132

照片6.1 担任总编的卡尔·马克思（1818-83）

“呼啸而来，冲动而狂野”

感谢赫尔顿-格蒂档案馆提供

P137

插图6.1 G. W. F. 黑格尔（1770-1831）：破坏和重建的重复韵律

感谢赫尔顿-格蒂档案馆提供

P140

插图6.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95）

“我们不承诺任何自由和民主”（Lenin 1970, vol.ix:242）

感谢赫尔顿-格蒂档案馆提供

P144

图6.1 一幅频相学的图示，

表明个人能力、天赋、感情与头的形状的假定关系

P146

插图6.3 马克思的宙斯像 “他摇撼着巍峨的奥林匹斯山脉”

照片6.2 卡尔·马克思 “我将轻蔑地把手套掷在全世界的脸上”

感谢布朗兄弟提供

P147

照片6.3 作者参观马克思位于伦敦海格特公墓的墓碑

P152

正题

反题 合题

图6.2 黑格尔的辩证法

奴隶制

封建制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图 6.3 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描述历史进程

P159

照片6.4 保罗·斯维奇（1910-）

杰出、英俊、风趣的马克思主义者

感谢每月评论出版社提供

第七章 多瑙河之波：门格尔及奥地利学派逆转潮流

本章音乐选段：小约翰·施特劳斯：皇帝圆舞曲

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后，还没有一本书像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一样对经济学的发展有如此重大的影响。

——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 (1958: 191)

门格尔是李嘉图理论的征服者……门格尔的价值、价格及分配理论是我们迄今所有的最好的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1951: 86)

卡尔·马克思在一件事情上是正确的：工业革命的巨大力量将西方世界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的新时期。身处伦敦，这第一个工业国家的中心，这位德国的哲学家不得不注意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在十九世纪可能会从英国扩散到德国到美国。然而，马克思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件：所有的阶级——资本家、地主、工人——物质条件都有所改善。虽然平均实际工资率每年据估计只上升1%，但在马克思毕生的时间都保持了这样的增长率，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经济史学家伦多·卡梅隆(Rondo Cameron)断定，“英国人均实际收入在1850到1914年间大致增长了2.5倍，收入分配些微得变得更加公平，赤贫人口的比例下降了，1914年普通的英国人享受着欧洲最高的生活标准”（Cameron 1997: 228）。

十九世纪，美国见证了更快速的经济增长。卡梅隆称尽管人口增长了近十倍，但1776年到美国内战期间，美国的人均收入至少翻了一倍。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Cameron 1997: 228）

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的时候，有证据表明，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的“生存工资”理论是严重错误的。亚当·斯密的普遍繁荣的乐观体系正得到证实。

经济学面临的一个主要阻碍

然而，尽管工业经济不断发展，经济理论却处在一个死胡同里。亚当·斯密虽然意识到自由以及有限政府会创造财富和普遍的繁荣，但是他没有一个合理的理论体系（除了分工理论）来说明在价格机制下，消费者和生产者是如何工作以达到更高生活标准的。李嘉图，穆勒以及古典学派发展了一套关于产品、商品、劳动价格的生产成本基本理论，但与此同时，他们成为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囚徒。如果利润和地租增加了，只是以工人工资的损失为代价。由于阶级斗争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斯密的普遍繁荣和利益调和的世界分裂了。古典经济学家们悲剧性地分割了生产和分配问题，我们注意到，这就给了社会主义者主张的再分配、国有化、国家中央计划等提供了依据。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英国停滞下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原理》中傲慢地断言，“令人开心的是，价值规律没有什么留待当今和以后的作者们来整理的了，关于这个学科的理论已经很完善了。”（Black 等 1973:181）古典经济学失宠于法国。经济学陷入了一个低谷，以至于在德国，马克思的故乡，教授们否认经济理论的存在。“在历史学派的冲击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写到“不只古典学说被抛弃了，任何理论分析的尝试都将受到深刻的置疑。”（1976: 13）

资本主义的存在和繁荣需要一种新的认识论，需要一个经济理论上的突破。经济学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动力，一种可以说明所有的阶级——资本家，地主，工人——获的收入，以及所有消费者如何获益的一般理论。但是，这种理论将从何而来？

三位经济学家几乎同时做出一个重大发现

我们已经注意到特定的年份怎样在经济史中突显出来，一系列事件怎样同时发生，例如1776年，是《独立宣言》和《国富论》发表的年份，而1848年是欧洲革命和《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年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特别是1871年——也是这样的年份，三位经济学家各自独立的发现了边际效用原理并领导了“新古典主义”的边际革命。价格和成本由消费者的最终需求和他们相关的边际效用决定，这一思想是现代经济学进程中最后的主

要遗失。它的发现解决了价值论的悖论，这个悖论曾让从亚当·斯密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古典经济学家们灰心丧气。这一思想也毁灭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边际效用革命拯救了垂死的科学。那是令经济学家精神振奋的时代。

这些经济学家是谁呢？来自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82），法国的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以及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虽然一些先驱，像赫尔曼·戈森（Hermann Gossen），撒母耳·兰佛得（Samuel Longfield），安东尼·古诺（Antoine Cournot），朱莱斯·杜波伊特（Jules Dupuit），他们更早就提出了边际效用原理，但是直到这三位经济学家同时出现，边际原理才在经济学中被广泛认知并应用。经历了边际革命的瑞典经济学家耐特·维克塞尔将之描述为“晴天霹雳”（1958：186）

边际革命的意义

尽管，1862年杰文斯做了关于他的基本思想的演讲，1871年，门格尔和杰文斯都发表的他们的新理论。门格尔发表了他的《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之后被译为《国民经济学原理》（1976[1871]），杰文斯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几年以后，在1874年和1877年，瓦尔拉斯发表了他的《纯粹经济学要义》的两部分。他们一起建立了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它结合了亚当·斯密最初的自由放任模型和价值的边际理论。在下一代，边际革命横扫整个经济学界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李嘉图体系成为新的正统。尽管不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那样迅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革命还是以同样的压倒性和力量征服了学术界并一直影响到下一代。

边际革命的三位代表人物——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否认价值的客观生产成本理论而将主观效用原理和消费者需求作为经济学新方法的基础。他们指出人们是在真实世界中的偏好和价值的基礎上做出选择的。像J.-B.萨伊一样，他们认为，产品的价值与劳动投入量和生产的数量无关。价值是由单个使用者的价值判断构成的。简而言之，在生产者使用生产资料以生产一单位产品之前需求必须足够多，需求必须总能替代供给。

边际学家们甚至进一步指出在长期中没有独立的供给曲线：供给最后决定于最终需求。例如，如果需求曲线向前移动，最终，当一种新的资源进入生产后，一个新的供给（成本）安排将会产生。就像二十世纪早期，边际革命最坚决的支持者——菲利普·维克斯蒂德（Philip Wicksteed）所指出的那样，“生产成本与需求安排相一致。”（1933：812）奥地利学派指出，成本只不过是放弃的选择。

生产和分配再一次联系起来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发现生产和分配可以再一次联系在一起。消费需求最终决定影响生产行为方向的消费品最终价格，最终需求确定生产要素的价格——工资，地租和利润——根据它们追加入生产过程的价值。简言之，收入不是被分配的，而是按生产过程中的各要素追加的价值生产出来的。当考虑到劳动时，工资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思想不断发展，超出了价值的边际原理的范围，在世纪之交，由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兹·克拉克进一步完善（参阅第九章）。

边际理论解决了价值悖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将效用理论进一步深化。他们意识到个人拥有越多数量的物品，他们对任何追加单位产品的评价将越低。如果到处都有大量的可用水，新增一杯水就会相对便宜。另一方面，如果公众生活在水极度匮乏的阿拉伯沙漠，公众将会对增加的每单位水给以高度的评价。这样的原理同样适用于钻石。如果钻石是丰富的，钻石的价格下降。如果钻石是稀缺的，价格上升。

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边际效用递减原理。简言之，价格由边际购买和销售决定，消费者需求的满足基于产品的相对充裕或稀缺的程度。他们完全解决了挫败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悖论。

为什么像水这样重要的日用品这么便宜而像钻石这样无用且不实际的东西如此昂贵？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将价格与效用分离，创造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分法，就像价格与效用毫无联系一样。斯密指出，水用处很大但是只有价值不高，钻石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这时钻石还没有应用于工业），但是有很大的交换价值。因此，古典经济学家们无法解决著名的钻石与水的悖论，导致了整整一代人对于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困惑。

然而，斯密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分法并非就是无害的，这会给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经常抱怨在市场中“物以获利”与“物以致用”间差别的资本主义批评家提供依据。他们指责资本家们更感兴趣的是“获取利润”，而不是“提供更好

的服务”，好象有利可图的交换无关于消费者的使用一样。

现在，边际革命解决了价值悖论，同时也就削弱了社会主义者们的论点。在新的微观经济学中，利润和使用是直接相关的。价格反映消费者需求，利润驱使生产迎合这种需求。

在解决钻石与水的悖论的时候，边际学家们是这样证明的，钻石与水存在价值差别是由于水的相对充足和钻石的相对稀缺决定的（给定需求）。由于水的供应充足，所以对每增加一单位的水有较低的需求。而钻石的供给极其有限，因此对每增加一单位的钻石有较高的需求。因此，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不矛盾。

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都将边际革命比作牛顿和莱布尼茨发现微积分，尤其是因为微积分和价格理论都包含边际变化。

门格尔在边际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

本章，我们从卡尔·门格尔的开创性贡献和他创建的奥地利学派开始讨论。三位新古典经济学家中，门格尔第一个系统的发展了新的价值和价格理论并成功地挑战了李嘉图范式。在英国，杰文斯的书有人读，但是没有被广泛接受，他的影响被李嘉图正统压倒性影响力所阻滞。（在下一章英国的新古典学派中我们将讨论在经济学的转变中杰文斯和马歇尔的决定性作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和边际分析都高度的数学化，吓退了和他同时代的大部分人。它被忽视了几十年后，在二十世纪逐渐受到重视。简言之，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是门格尔和他的奥地利学派推动了经济思想的变化并在其中产生最大的影响。引用同时期的奈特·维克塞尔的话，他在评述三位开创者的影响时说，“我们可以断言，从李嘉图的《原理》之后没有一本书像门格尔的《原理》一样对经济学的发展有如此重大的影响——甚至杰文斯很有创见但过于格言式的著述以及瓦尔拉斯那不幸很难读懂的理论也没有这样的影响”（Wicksell 1958: 191）。

令人吃惊的是，门格尔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他的主观效用理论和边际分析主要是通过他的两个弟子欧根·柏姆-巴维克和弗里德里希·维塞尔(Friedrich Wieser)普及的。此外，柏姆-巴维克还是第一位认真地接受卡尔·马克思并拆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家。

奥地利学派的成就

奥地利学派以三种方式解救了亚当·斯密以及他的自然自由模型。（在这种意义上，边际革命真是一场多重革命）：

1. 消费者价值起源：门格尔和奥地利学派确定了消费者在生产行为决策中的最重要的地位，是消费者的最终需求，而不是工作时间或是生产成本决定生产过程中的结构和定价。奥地利学派称之为他们的“归属理论”。效用（imputed）决定投入的价值。证明这一关系后，奥地利学派创建了不再隶属于马克思社会主义邪说的新模型。
2. 边际效用/成本：奥地利学派证实了价格和成本通过买卖双方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在边际量上决定。边际分析构成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3. 主观价值：奥地利学派提出李嘉图对“价值的不变量度”的追寻，就如同旁斯·德·里昂(Ponce de Leon)对“青春泉”(Fountain of Youth)的寻找一样，是徒劳的。门格尔和他的追随者们揭示了，价值完全依赖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欲望。工资、地租、利息、利润取决于消费者和使用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因此，在长期中成本从来都不是真正固定不变的。

在更广泛的层次上，奥地利学派的贡献是最激进的。门格尔和奥地利学派以人类行为与价值评价主观实现取代了李嘉图经济学的客观机械决定论。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还在资本与利息、货币、公共金融理论等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主要通过欧根·柏姆-巴维克的研究，奥地利学派创建了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它将储蓄和资本积累作为增长和普遍繁荣的关键。

简而言之，门格尔和他的追随者们增进了斯密的关于经济学和资本主义体系的积极看法。另一方面，门格尔创建了对宏观经济学（经济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运行）和微观经济学（个体的价格、成本和生产理论）的思想都有深刻影响的新的学派。在很多方面，他是一个宏观经济学（通过他的生产的时间结构模型）和微观经济学（主观需求和边际分析）的革命的发现者。卡尔·门格尔无疑是拥护亚当·斯密天赋自由体系的最伟大的理论经济学家。

维也纳：革命的舞台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维也纳大学被看作欧洲最大最富声望的学校之一。几个世纪以来，在哈布斯堡皇族统治之下的奥匈帝国将维也纳建成了东欧的政治、文化和知识中心。坐落在美丽的多瑙河畔的维也纳成为伦敦和巴黎之后欧洲的第三大城市。整个十九世纪，维也纳以它华丽的博物馆、公园、歌剧院和咖啡馆闻名。从十七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一个半世纪，奥匈帝国学术界百花齐放，繁荣异常。维也纳吸引了一批世界上最富创造力的音乐家、科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生活在那里——莫扎特、贝多芬、海顿、舒伯特、勃拉姆斯、马勒和施特劳斯。著名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也生活并工作在那里。

又一场革命发生在维也纳大学。门格尔创建了关注个人行为、企业家才能、主观价值以及时间和资本在市场中作用的奥地利学派。许多奥地利学派的概念，如边际效用、机会成本和时间偏好被纳入到标准的经济分析。十九世纪末，在门格尔的指挥下，奥地利学派挑战了它的两个主要对手，英国的古典学派和德国的历史学派，并对正在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进行了全面攻击。

奥地利学派开创了经济学的新纪元

奥地利学派主导的新古典革命是经济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大多数史学家并没有公正地评判这次革命在这一时期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家中间激起的兴奋。奥地利的效用、边际和主观革命催发了经济学杂志上大量论文的发表。经济史学家詹姆斯·波纳（James Bonar）在1888年十月份《经济学季刊》的文章中写到，由于门格尔和他的追随者的贡献，奥地利学派“现在在经济学争论中占有的地位比她以前至少整个一个世纪的地位还突出”（1888：1）。H·R·西格（H. R. Seager）在1893年三月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中说，维也纳大学正吸引着所有国家的学生们（1893）。1891年，柏姆-巴维克受邀向《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术年鉴》提交一篇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奥地利引领的革命的文章。据柏姆-巴维克所说，新的奥地利学派价值理论有以下影响：“古典经济学家的最重要最著名的学说已经根本站不住脚了，或说只有在作了本质上的修改和补充后才是合理的”（Bohm-Bawerk 1962：5）。

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也被菲利普·威克斯蒂德牧师发扬光大了。他是英国一神教派的牧师，也是一位翻译但丁和亚里斯多德的著作的中世纪学者。在阅读了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之后，他在中年时转而研究经济学。尽管他一生都是费边社的成员并且对社会主义事业（包括土地国有）富有同情心，但却成为了边际理论的纯粹支持者并通过他很有影响的著作《政治经济常识》成为了杰文斯和奥地利学派的最重要的拥护者之一。事实上，将奥地利词汇Grenznutzen 翻译成“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并引入经济学是他的功劳。

门格尔神秘的背景

革命是如果发生的呢？让我们从创立者的故事开始。

卡尔·门格尔的个人生活始终笼罩着一种神秘色彩。没有长篇传记。他的儿子，卡尔，曾经写过他父亲的往事，但是没有完成。这也许这是有原因的，可能就是下面解释的。

卡尔·门格尔早期的生活和教育并不为大家知晓。卡尔，三子之一，1840年出生在奥地利的Neu-Sandez，那里后来划归了波兰南部。门格尔的父亲是一个律师，他的母亲是一个富有的波希米亚商人的女儿。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学（1859-60），短短的几年里，他写了大量的中篇小说并在当地的报纸上连载喜剧，但是，他有着更严肃的目标。1867年，他在克拉科夫大学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之后在维也纳首相办公厅的报社做记者。在那里，他负责报道经济条件和股票市场，经常为官方报纸《维也纳报》撰写稿件。在弗里德里希·维塞尔看来，就是在这里，作为一名经济记者的门格尔开始认识到主观需求在决定价格时的重要作用并着手改造经济理论。

罕有关于他外貌的描绘。他被认为身材高大，头发浓密，蓄大胡子。“正当壮年时的门格尔，一定是一个给人非常深刻印象的人。”（Hayek 1976：33）

还是一名经济记者的时候，门格尔就开始写著他的革命性巨著。他是年轻的，在他二十多岁的年纪上。他为他突破性的发现而兴奋，以“病态的兴奋”状态疯狂地写作。

1871年对门格尔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他受雇于奥地利国民服务属（Austrian Civil Service），但当他把的书提交给维也纳大学后，他迅速的辞去了这个工作当了privatdozent，一个没有报酬的讲师。到1873年，他学院的同事对他的印象极好，以致他们

任命他为大学法学和政治学的“特别”教授。（注：在欧洲，特别教授类似于副教授，下一个更高的级别是正教授！）没有一位经济学家像门格尔这样快速地获得成功。大多数革新者都要等一代人以后或者到他们老年的时候，他们的理论才能被接受。杰文斯在他的理论被接受前就去世了，瓦尔拉斯花费了可观的钱财来宣传他的思想，而他的思想直到一代人以后才被接受。但是门格尔的新价值理论在他自己的国家被广泛接纳，以至他在33岁的年纪上就获得了教授之职。

门格尔担任皇家教师

门格尔能够简明清楚地解释经济学，同时仍然能让最聪明的学生思考，不久就成了一位颇负盛名的很受欢迎的讲师。1876年，门格尔遇到了一个非凡的机遇，一个势必令他闻名的机遇，这使得他的名望似乎达到了顶峰。继亚当·斯密之后，门格尔也被任命为贵族的教师。他不仅仅是贵族，还是奥地利皇太子，未来王位的继承人18岁的鲁道夫大公（Rudolf）。这时的国王是以其络腮胡子（mutton-chop whiskers）闻名的独裁者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

1876年的前三个月，门格尔为大公讲授了经济学的速成课程。将已经有一百年历史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主要教材。

每次课后，门格尔都要求鲁道夫上交完全根据记忆作的大量笔记，之后，门格尔对之检查修改。最近，以德文和英文出版的皇太子的笔记显示了他惊人的近乎完美的记忆力。尽管有些神经质，鲁道夫仍然是极有天赋的，他可以流利的讲七个种语言。

这个手册是重要的，它表明了门格尔关于经济政策的偏见。他早期的论著都小心地避开有关政府政策的内容。尽管他隐藏了他的观点，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笔记中清晰地知道门格尔是亚当·斯密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事实上，门格尔的鲁道夫讲稿也许是所有落于纸面的经济学的学术著作中，关于自由放任政策最极端的陈述之一”（Streissler 1994: 17）。

门格尔的自由放任思想是危险的，因为它与弗朗兹·约瑟夫统治下的奥匈帝国的干预政策相悖。他通过引用亚当·斯密和其他以往经济学家的言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以避免这种矛盾表现出来。也许，这就是他没有使用自己讲义的原因。

最奇怪的事情是根据这些笔记，门格尔一点也没有提到早在五年前就在他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里提出的三个突破性的概念，边际效用、归属理论和主观价值。门格尔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大公理解经济政策，所以也许他认为亚当·斯密原理之外的新的理论是不必要的。

结束了这门课程之后，门格尔留下来，陪伴鲁道夫大公游历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历时近两年。

门格尔的能力显然给弗朗兹·约瑟夫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879年，他同意任命门格尔为维也纳大学法律和政治经济教授，一个有很高声望并有很高报酬的职位。有些人认为门格尔将被推举为首相。

门格尔的课程一定给鲁道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经常写文章批评他父亲的干预性政策，尽管他总是用假名。显然，皇帝并没有把这些匿名的异端思想与大多数时候在政策问题上都保持沉默的门格尔联系起来。

王子爆出谋杀——自杀的丑闻之后门格尔的希望破灭了

十年后，当鲁道夫公爵意外的自杀身亡之后，门格尔原本光明的前景暗淡了。鲁道夫情绪很不稳定，还因沉迷女色而声名狼藉，政治上也存在不可预见性。1889年一月末，在维也纳森林的一个狩猎小屋内，鲁道夫开枪打死了他的情妇然后自杀。他当时只有三十岁。

门格尔成为了一个富有的教授

门格尔毫无疑问为这个可怕的谋杀——自杀丑闻而伤心。他保住了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正教授的位置，但是永远的失去了成为内阁领导的可能。幸运的是，他待遇不错的教授职位给他提供了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除了工资之外，教授们还会得到丰厚的课时费，并从每个学生那里得到极高的考试费。而门格尔一年至少有四百个学生，到1903年他退休的那年，他每年能赚得4000美元左右。以今天的购买力衡量，他的收入几乎等于500 000美元！如埃里克·斯瑞茨勒所说的，“在德语世界，教授职位不只是一个享有级高的荣誉也是一个收入最高的职位”（1990: 63）。

高薪使得门格尔可以建立一套拥有超过20,000卷书籍的杰出藏书（现在连同亚当·斯密的藏书一起存于日本东京一桥大学）。他写了大量关于经济学和方法论的文章并吸

引了一群忠实的追随者。但是由于我们下面将看到的原因，主要是第二代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特别是欧根·柏姆-巴维克和弗里德里希·维塞尔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大旗插遍西方世界。到了世纪之交，柏姆-巴维克成为欧洲大陆最知名的经济学家，而非门格尔。

为什么他最著名的论著一直没有再版

1903年从维也纳大学退休之后（他提早离开的原因见179页加框文字），门格尔变得遁世，他投入到他《国民经济学原理》的完整版本的写作中。他被授予奥地利国会上议院终身议员的荣誉，但是他并不是很积极。他的兴趣是钓鱼和收集书籍。犹如朝圣般，到门格尔家里表达对这位奥地利学派元老的敬意成了维也纳大学学生的一个传统。

从某种意义上说，门格尔悲剧性的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最爱是经济学，他职业的长期目标就是彻底地系统地更新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不幸的是，他涉猎广泛；尤其是，他卷入了与德国对手的永无止境的毫无成果的方法论争论中。他的各种兴趣和阅读范围继续膨胀。他研究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以及其他学科。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从来都对他连篇累牍而支离破碎的修订版不满意，第二版的出版一拖再拖（受马克思的影响，之后熊彼特也是这样）。

正当永不完结的修订版一直悬而未决时，门格尔的鸿篇巨著卖到绝版，变得极为稀少。作者一生也没允许重印或翻译为其他文字，因为他觉得他的第一本书是不完整的。

《国民经济学原理》直到1950年才以英文出版。哈耶克总结到，“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例子，一部像《国民经济学原理》这样产生持续而永久的影响著作，因为一些纯属偶然的意外条件，仅有如此有限的发行量”（1976：12）。

幸运的是，他追随者们的原理性著作，维塞尔的《自然价值》和柏姆-巴维克的《资本实证理论》十九世纪末被译为英文，这就促进了门格尔理论的传播。门格尔在这一点上很像马克思，如果不是因为他热心而天才的追随者们的话，他直到今天也不会为人所知。

揭秘 性丑闻迫使门格尔辞职

1903年，六十三岁的时候门格尔突然辞职。通常，大学教授都是约七十岁才退休。为什么门格尔提前退休呢？官方解释是“患病”，但是这只是一个遮掩。直到最近才有证据表明卡尔·门格尔长期与一个叫做赫迈尼·安德曼（Hermine Andermann）的女人私通。她可能当过他的女管家。当他们的儿子卡尔出生的时候，门格尔停止在维也纳大学授课，一年半后他提前退休。卡尔·门格尔一生都没有结婚，但是他不断努力并最终获到弗朗兹·约瑟夫皇帝的一项法令，让他那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的儿子得到了合法地位。

据埃里克·斯瑞茨勒（Erich Streissler）（这是一位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对奥地利学派的历史极有研究，因此备受尊敬和重视。）所说，门格尔可能是没法娶安德曼，或者因为她离过婚，或者因为她是犹太人。因为那时所有的婚姻都是一种宗教仪式，而门格尔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不能与犹太人结婚。显然，他们的儿子的出生并不是一场短期爱情的结果，而由于当时的环境，他们的关系最适合被看作是“习惯法”婚姻。

赫迈尼·安德曼继承了门格尔最重要且具有很高价值的藏书，几乎他所有的财产。为东京买下这套藏书的日本教授在与她磋商时称她为“门格尔夫人。”

1987年，门格尔的孙女，夏娃，将门格尔的论文（papers）捐赠给了杜克大学。

门格尔比他最著名的学生活得更为长久

门格尔比他最著名的学生活得还久，欧根·柏姆-巴维克 1914年去世，门格尔则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1921年，在八十一岁生日后不出三天，他去世了。那时维也纳被社会主义者接管了，变成了“红色的维也纳”，也正是奥地利的恶性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门格尔1906年去世的弟弟一定会为此高兴，他发表了著名的社会主义手册《劳动应得全部产品的权力》，但是卡尔反对激进的革命，对此一点只感到愤怒。毫不奇怪，门格尔去世时相当悲观。他一直也没有完成《国民经济学原理》的再版，时代背景也与他相悖。他的许多理论被整合到他同时代人的经济思想里，但是，他也时常为与他的同事微不足道的小争论而苦恼。

门格尔试图转变德国历史学派

1871年，门格尔写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的时候，他想完成什么呢？正像前面提到过的，由韦尔伯·罗雪尔（Wilhelm Roscher），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

和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创立的德国历史学派对英国的启蒙运动和古典经济学持否定态度。他们不喜欢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的自由放任观点和演绎的研究方法。在德国历史学派看来，并不存在脱离政治，习俗和法律体系的科学的经济“规律”。只有通过历史的研究，学者们才能得到经济问题和政策的结论。德国历史学派的激进分子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甚至公开宣称“抽象”的古典学派已经不适合在德国的大学讲授了。门格尔的追随者被排除在德国学界若干年。这是德国的损失。德国政府将花费数十年以求得有能力的经济理论家。

在为人熟知的方法论战中（Methodenstreit），门格器的目标是证明不应该因为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就简单地否认经济事实。门格尔第一部书的全部目的就是说服德国人普遍的科学的经济规律确实是存在的，他发展了他的理论以证明这一点。他甚至把自己的书题献给德国历史学派的奠基人韦尔伯·罗雪尔教授。

十九世纪，德国的大学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大学，而卡尔·门格尔则深信，如果出现新的经济科学的繁荣，德国历史学派势必转变。

门格尔在方法论上另辟蹊径

和亚当·斯密一样，门格尔对经济增长有浓厚兴趣，“人类福利增进的原因”（门格尔1976[1871]: 71）。在门格尔去世后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的第二版中，他的儿子指出，门格器的目标是要用一个全新的理论方法取代古典模型。

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方法关注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如何生产和分配消费品和财富。门格尔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不同于亚当·斯密对于劳动分工的关注，这位奥地利的思想家从讨论商品的特性开始。根据门格器的理论，更高的生活水平的不是绝大部分源于劳动分工，而是源于持续而渐进的商品和服务种类的增加和他们质量的提高。像埃里克·斯瑞茨勒指出的那样，“门格器的商品是三维的：数量，质量和种类分别作为动态变化的独立维度”（Black等1973: 165）

生产的结构

在第一章，“商品的一般理论”中，门格尔指出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要经历从原材料到最终消费品的一系列生产过程。门格尔从“直接满足人们需要”的最终消费品开始，将它们定义为“第一阶物品。”例如面包、鞋还有衣服。门格尔指出生产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生产创造出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在最终消费产品之后，还有“第二阶物品，”加工品，如面粉、皮革、布。再退一步，还有“第三阶物品，”如小麦、牛皮、羊毛。

归属理论：投入依赖于产出

门格尔将最终消费品分为“较低阶”，将一系列生产性产品划分为“较高阶”。然后他尝试证明这样一个普遍原理，对高阶生产产品的需求“来自于相关的低阶产品的需求”（Menger 1976[1871]: 63）。

在一个听起来很时髦的例子里，门格尔用烟草证明他的理论。“假设人们对于香烟的直接需求消失了”（64页）将会发生什么呢？

首先，所有烟草商品的价格将降到零，即便那些已经花费了高昂成本生产出来的也是如此。

其次，“但是，相关的高阶产品又会怎样呢？”门格尔问道，“初级的烟叶，用于生产各种香烟的工具器械，企业里雇佣的专业劳动，它们的需求又将如何呢？”（64页）

它们也会失去部分或全部价值。换句话说，生产要素的需求依赖于最终的消费需求。投入的价值明显的与产出的价值相关。通过这个对烟草产品需求减少的动态例子，门格尔能够表明投入品的价值——烟叶、烟草机、药草农民、烟叶田——完全依赖于对其产品有需求的个人消费者。

门格器的这一发现被称为“归属原理”。归属原理是对李嘉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直接攻击。门格尔写到，“产品价值的决定因素，既不是生产所需的劳动或其他产品的数量也不是再生产所需的这些投入品的数量，而是它们对我们从物品的使用中得到的满意的重要程度”（147页）。

简而言之，门格尔转换了价值与成本的因果方向。消费品不是由生产中投入的劳动和其他生产资料定价，而生产资料的价值决定于对消费品价值的预期。所有生产物资和资本品的价值最终都受消费的驱动。

门格尔想让德国否定理论的经济学家们知道归属原理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有效的。“这一价值决定原理是普遍有效的，在人类经济中，毫无例外”（147页）。

门格斯的理论导出边际原理

归属原理之后，门格尔继续揭示边际原理。再一次利用香烟的例子，他指出当人们的消费需求消失后，很多与香烟有关的投入品并没有失去他们所有的价值。“用于生产烟草的土地和农具”他写道“仍将保持它们与其他人类需求相关的商品特性”（66页）。

换句话说，土地和资本品有可以用于其他产业的多样用途。例如，以前用于生产烟草的工具和机械可以用于生产棉花。用于生产烟叶的土地可以用来生产小麦或者大豆。它们的价值会降低，但不会没有价值。他们将降到次优选择用途的价值。

门格尔间接的揭示了边际效用原理，个别商品的价格或价值取决于他的次优或边际用途。在他的分析里还包含“机会成本”原理，即经济中的每项活动和生产都有一个替代用途。这两个原理会成为每个经济学家工具箱里的必备品。

内在的价值是否存在？

最后，门格尔证实李嘉图和古典经济学家们关于“价值的不变量度”的急切寻求应当终结了——它根本就不存在。真实价值只是幻想，只有主观价值是存在的。劳动时间，或者更一般的，生产成本，不能确定一个客观的决定价格的标准。长期中，成本和价格是不固定的，而是受供给和需求变化的影响。

最近的例子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能源危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增长的需求和受限的供给导致了极为高昂的油价。高昂的石油和汽油产品的零售价显著增加了石油产业生产资料的需求。石油开采设备、工人、资本品和补给品、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权的价格都大幅上涨。然后，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石油繁荣破产以后，就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与石油产业相关联的价值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当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下降的时候，对石油投入品的需求也随之下降。工人失业，设备遗弃，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权贬值。简而言之，成本并不构成不变的价值尺度。在门格尔看来，所有的价值都是主观的。

德国人的回应

门格尔的理论在他的祖国很快便被广泛接受，但德国人却不为所动。施穆勒反驳他的“普遍的”原理是“无用的”。门格尔则以牙还牙：施穆勒是这样一种人，他来到一个建筑场地，在地上倾倒了一些材料，然后就宣称自己是建筑师。这样的互相侮辱持续了若干年。

幸运的是，尽管如此，奥地利的边际主义和新古典的分析方法为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所接受。在二十年以内，它基本上为主要的经济学教科书采纳，包括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菲利普·维克斯蒂德和弗兰克·费特（Frank Fetter）的著作。如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所述，“奥地利学派的方法在世纪之交支配着美国的经济学”（1997：151）。

门格斯的追随者们为奥地利学派的理想奋斗

门格尔的分析是原创而清晰的。但是他拒绝重印和翻译他的著作使得他的归属理论、边际分析、主观价值理论没有迅速为人所知。传播奥地利学派福音的任务就落在了他聪明的继承人欧根·柏姆-巴维克和弗里德里希·维塞尔的肩上。

维塞尔：术语的发明家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1851-1926）从来没有达到他同事欧根·柏姆-巴维克（1851-1914）那样的事业高度，但是他们永远都联系在一起。他们同岁，一起上高中，一起作公务员，写书，在维也纳大学任教。他们甚至有共同的爱好——爬山。后来，他们成为了姻亲兄弟。1880年，柏姆-巴维克和维塞尔的妹妹（姐姐？）结婚。只有死亡能把他们分开，维塞尔比他的朋友柏姆-巴维克和他的老师卡尔·门格尔都更长寿。

维塞尔出生在维也纳，是奥地利军队里的一个将军和男爵的儿子（因此名号为冯·Von'）。在德国学习完经济学之后，1884年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副教授，1903年，他继承了门格尔的经济理论教授席位。许多学生都认为维塞尔是学校里最好的老师。他的最有影响力的书《社会经济学》（1927[1914]），继承了门格尔的主观主义方法，被指定为维也纳大学的标准教科书很多年。

维塞尔为他发明了新经济学术语而自豪。例如，“边际效用”（Grenznutzen），“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和“计划经济”（economic planning）这些词的发明都是他的功劳。

维塞尔还特别强调经济进程中富创造力的个体——发明家、先驱、资本家以及企业

家。他坚定的英雄崇拜也许源自他杰出的贵族出身。实际上，“Führer”（领袖或司令）是维塞尔惯用的词汇，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还用这个词戏称过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尽管他1926年就去世了，还没有看到这种英雄崇拜的毁灭性。他还写了关于中央计划经济的好处的文章，这在持自由放任观点的奥地利学派是不受欢迎的建议。（尤其是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来说）。

柏姆-巴维克辉煌的一生

柏姆-巴维克有能力在新的方向上发展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和资本理论领域。他的影响如此重大以至于他被认为是世纪之交时欧洲大陆上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Samulson 1967: 662）。

庞（Bohm），他被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1851年出生在奥地利的布鲁诺，是奥地利的一个公务员和副行政官员的最小的儿子。1875年，他在维也纳大学得到了他的法律博士学位。

1880年在他的生命里是不同寻常的，他不仅被任命为因斯布鲁克大学的教授，还和他最好的朋友弗里德里希·维塞尔的妹妹结婚了。那是卓有成果的十年，1884年，他的《资本与利息》的出版则是最有代表性的。几年后，他的第二重要的著作《资本实证论》被译为英文并在1891年由麦克米兰（Macmillan）出版，如前所述，**这是一项很高的荣誉**。他作为新古典学派有力领袖，声名鹊起。他很快就受命于财政部，在那里他帮助奥地利整理财政，回复金本位。1896年，他关于马克思的全面批判作品发表了。两年后，它被译作《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984[1898]）。

1904年，柏姆-巴维克离开了政府，同维塞尔和菲利波维奇（Philippovich）一起成为了维也纳大学的正教授。一个特殊的经济学教授席位因他的荣誉而被专门创建。他关于资本理论的演讲和他的私人研讨会吸引了很多学生，包括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约瑟夫·熊彼特，他们所有人都将在经济学上创建自己的一番事业。

柏姆-巴维克的个人生活并不为人所熟知。人们认为他是个典型的奥地利人——“安静、谦虚，亲切”（Hennings 1997: 19）。他是一位天才的大提琴演奏家，敏捷的登山家，**越野（横越全国的？）**自行车手。他和她的妻子没有孩子。如果说他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他对于辩论的喜好和对别人理论吹毛求疵的批判。传记家克鲁治·海宁斯（Klaus Hennings）谴责他的“罗嗦，过于苛责以及小气”的风格（1997: 81），保罗·萨缪尔森讽刺他为“一个有力的作家、不知疲倦的善辩者和一个不得不承认的沉闷而拘泥于琐事的人”（1967: 663）。

政治上，柏姆-巴维克是奥地利国会上议院的独立的自由主义者。他信仰从贵族开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支持自由贸易，社会保障和工人的福利计划。

不幸的是，柏姆-巴维克六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许多奥地利的经济学家以活到八十多岁而闻名，但是柏姆-巴维克没有。1914年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健康状况不佳的老人，一战前就去世了。因此，他免于见证伟大的奥匈帝国的崩溃。

哪位经济学家被绘在了官方货币上

不，不是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或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而是欧根·柏姆-巴维克！

由于他杰出的经济才能，柏姆-巴维克于1893年、1896-97年，1900-04年三次被任命为财政大臣，而且对规范奥地利的财政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是如此成功以致他的照片被印在奥地利100先令纸币上（见插图7.1）。据我所知，柏姆-巴维克是唯一享此殊荣的经济学家。

回击马克思的人

柏姆-巴维克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他是第一个认真的研究马克思然后，猛烈地攻击其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他的批评是毁灭性，以致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没有像在其他领域（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理论）那样真正掌握整个的经济学界。

但是，柏姆-巴维克并不只是一个尖锐的马克思批判家。在仔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

会主义学说后，他发展了门格尔的理论，并在储蓄和投资，资本和利息以及经济增长领域做出了原创性贡献。甚至今天，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论著如果没有关于柏姆-巴维克的贡献的讨论都是不完全的。

柏姆-巴维克在他的经典著作《资本与利息》（1959a[1884]）中引入了他对卡尔·马克思的批判。在那里他首次从古代开始全面回顾了利息理论的历史。这一部分的后一半就涉及了罗德布特（Rodbertus），蒲鲁东（Proudhon），马克思以及其他社会学家的剥削理论。

柏姆-巴维克提出针对马克思的两个毁灭性的论点

回想第六章，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里他认为工人应当获得他们生产的产品的全部价值。得地租的地主和得利润和利息的资本家剥削工人，榨取他们的劳动成果。作为回应，柏姆-巴维克提出两点反驳：

首先，柏姆-巴维克的“等待”论。这里，他依赖于较早时期由纳骚·西尼尔（Nassau Senior）提出的利息的节欲论。资本家节制现时的消费，将他们的储蓄投资于资本产品和高阶产品，努力增加和优化产品和服务。利息收入反映了整个经济生活中的等待因素，是对资本家和投资者的合理补偿。资本品的生产者必须等待他们的产品加工销售给客户（进一步接近消费环节）之后才能获得收入。股票和地产投资商在获得支付之前必须等待。开发土地的地主必须等待若干年才能回收他们的初始投资。

简而言之，商人、资本家、投资者和地主必须等待被支付。受雇佣的工人又如何呢？他们不需要等待。他们以获得工资或报酬为条件付出一定量的劳动，不用考虑他们生产的产品是否售出就可以每月或每半个月得到支付。他们不需要为应收款项或应付款项，投资负债和市场变化而担忧。他们不用等到产品被销售出去才得到支付。假定他们的雇主是诚实而有偿付能力的，工人将有规律的得到支付。实际上，资本所有者常常是预付资金来支付工人的工资，先于产品售出得到支付，而这可能意味着要等待几个月甚至几年，等待的时间取决于产品售出资金回收的速度。像柏姆-巴维克总结的那样，“工人不能等待……他们继续依赖于那些已经储备了一些已完成的所谓中间产品的人，一句话，依赖于资本家们”（1959b: 83）。

因此，柏姆-巴维克称，受雇的工人公平的被支付给贴现产品或价值，而利息收入和利润是资本家们合理的回报。

资本家作为风险承担者

柏姆-巴维克提出了另一个要点。商业资本家承担着工人没有承担的风险。他们将土地、劳动和资本结合起来，创造一种在市场上竞争的产品，这种产品也许有利可图也许没有。资本家企业家承担这样的风险，但是受雇佣的工人没有。他们规则地得到报酬，如果企业破产，他们最多只会失去薪水支票，他们只需要去寻找另外一份工作。但是，企业家可能面临财务危机、高额负债以及破产。简而言之，工人的风险水平实际上低于资本家企业主的风险水平。

市场将如何回报这一附加风险呢？通过利润和利息将产品价值的相当一部分补偿给企业家。

总之，受雇佣的工人没有得到他们全部的劳动产品，而只得到了部分与他们在报酬方面的即时满足和企业运营中承担较低程度的风险相应的报酬，这是公正的。

柏姆-巴维克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之后，几乎没有主流经济学家再接受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剥削论或者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当理论危机来到，此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直处于守势。有趣的是，当经济学界其他学者们超越马克思继续前进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还在同柏姆-巴维克和其他批判家进行旧的论战。今天，柏姆-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被马克思主义者们出版，同时收录保罗·M·斯维奇（Paul M. Sweezy）的序言和鲁道夫·海夫丁（Rudolph Hilferding）的回应文章。（Bohm-Bawerk 1984[1898]）。

柏姆-巴维克引入了一套非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

柏姆-巴维克赞同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资本主义的真正着眼点在于资本。资本的许多形式——储蓄、投资、技术、资本品、生产力、知识、教育——是实现亚当·斯密的普遍繁荣世界观的关键。区别是，马克思通常消极地看待资本，柏姆-巴维克和奥地利学派则将资本看作工人阶级和所有阶级的救星。资本是更高的生活水平的关键。

在推翻了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主义理论之后，柏姆-巴维克通过他的“实证”的资本发展理论开创了经济理论全新的篇章。事实上，他1884年的书就用英文冠以了适当的

题目《资本实证论》。不同于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柏姆-巴维克的巨著几乎立即就被译为英文。1890年《资本实证论》被译为英文并在伦敦（由麦克米兰）和纽约（由G. E. 斯蒂查德）出版，它迅速成为一个受欢迎的非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介绍。

经济增长的关键

柏姆-巴维克的目的是证明经济增长如何发生，个人如何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以达到亚当·斯密普遍繁荣的目标。柏姆-巴维克意图证明与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阴郁的预言相对的，工人是如何超越生存工资的。

柏姆-巴维克首先指出简单的劳动和努力的工作不足以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个人只是勤勉的显然是不正确的，这个人是勤勉而且节约的。”（1959b:116）

亚当·斯密将劳动分工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奥地利学派则强调储蓄和投资在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经济怎样是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数量和种类衡量的。

奥地利学派，像亚当·斯密一样，总是坚决的捍卫储蓄和投资是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贯穿现代经济学的历史，节俭的美德总是被攻击的——从霍布森（Hobson）和消费不足论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及其需求不足学派，到保罗·萨缪尔森及其节约悖论的理论家们。

在证明储蓄和投资的需求时，柏姆-巴维克从讨论资本作为生产手段的功能开始。应用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的术语，柏姆-巴维克说道，“所有生产的最终目标都是提供满足人们需求的物品，也就是说，消费品或者一级产品。”（1959b: 10）。

柏姆-巴维克简单而有力的例证

柏姆-巴维克使用了这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农民想喝水，解渴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走到泉边用手捧着喝。但是水源离的很远，因此，日复一日的这样满足他喝水的需求是不方便也不适当的。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农夫更快的解渴吗？有的。他可以建一条从泉眼到他房子的管道。柏姆-巴维克称之为生产的间接或迂回的方法。但是有成本——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工具、时间、劳动以及技术。为了建这条管道，他必须放弃其他的农活。一旦完成，这个管道将会非常有用。农民“在房间里就一直都会有充足的清水供应了”（Bohm-Bawerk 1959b: 11）

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资本品的投资带来更高的生产力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在本质上，资本主义——一种在生产过程中资本投资的应用——促进经济增长。

柏姆-巴维克检验了三种情况，来支持他的论点。首先，假设一个国家中的个人没有净储蓄，即没有除了弥补折旧或修缮建筑、工具和设备和其他储蓄。那么，这个国家就“只能维持它的资本”（112页）。

第二，假定个人将收入的25%用于储蓄，这将引起生产过程的显著变化。最初，消费品的需求将会减少，但这种减少会被会对资本品需求的增加抵消。“经济发达的国家不是致力于增加积累，而是投资其储蓄。发达国家购买有价证券，以一定的利息在储蓄银行或商业银行储存货币，发放贷款等等，……换言之，资本的增加，将会在未来带来消费品享受的增加”（113页）。

但是还有第三种可能：市民的消费比其收入更多，他们不储蓄，反而花光储备的财富，因而减少国家的资本。资本“浪费”的结果是什么呢？更低的生活水平。

柏姆-巴维克捍卫他的储蓄论

柏姆-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发行后不久，就有社会主义的批判家针对他的理论。在1900-01年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术年鉴》里，L. G. 巴斯特多(L. G. Bostedo)和欧根·柏姆-巴维克就储蓄的作用进行争论。巴斯特多站在前凯恩斯“有效需求”的立场上，认为最终消费需求是生产“不可或缺的条件”，柏姆-巴维克的储蓄率增长的例子“不只是不正常的而且是不可能的。”更多的储蓄只会导致“一般购买力下降，因此商品的需求使资本闲置，产量降低”（Ebeling 1991: 395——96, 399）。结果将会是萧条。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巴斯特多说，是增加而非减少最终消费品的需求以刺激资本生产。

作为回应，柏姆-巴维克极力反对巴斯特多的反储蓄态度。“如果任何减少消费的尝试都必然立刻引起产出相应的减少，那么的确，任何的社会财富积累的增加都不会是储蓄带来的”（Ebeling 1991: 405）。

柏姆-巴维克维护储蓄论的论点回溯了巴师夏（Bastiat）的判断，即，一位优秀的经济

学家必须从各个方面考察政策的作用，而不是单从一个方面。他说：“事实是，消费的减少，不是导致一般产量水平的减少，只是通过供给需求定律，使特定部门的产量减少。在储蓄的影响下，部分昂贵的食物、葡萄酒和绸缎的购买和消费量减少，随之——我希望强调这个词——这种物品的产量会降低。然而，普通商品的产量不会减少，因为直接消费品产量的减少将被“资本品”或“中间产品”产量的增加所抵消”（Ebeling 1991: 405-6）。

这场交锋不会是关于经济中储蓄作用的最后争论。凯恩斯和萨缪尔森将在二十世纪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然而，很清楚，奥地利学派把自己定位在了这样的一个角落，他们偏好储蓄，甚至是高储蓄率，将之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总结：门格尔、柏姆-巴维克和奥地利学派复活了增长的古典模型

总之，奥地利学派来的正是时候，它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模型从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者毁灭性的批判中解救出来。通过他们的最终需求、主观价值、边际效用和资本理论，奥地利学派给作为完美的制度资本主义赋予了新的知性的生命。

在第八章，我们将看到奥地利学派如何和英国学派联手，创造了一个当我们进入二十世纪后日益强大的“新古典”传统。

插图及图表注解

P175

照片7.1

卡尔·门格尔（1840-1921）

“给人非常深刻印象的人”

感谢亚当·斯密档案馆提供

P177

照片7.2

鲁道夫公爵和史蒂芬妮（Stephanie）公爵夫人

门格尔为皇储作家庭教师

感谢伦敦AKG提供

P185

照片7.3

欧根·柏姆-巴维克（1851-1914）

“不知疲倦的善辩者和……一个沉闷而拘泥于琐事的人”

感谢亚当·斯密档案馆提供

P186

插图7.1奥地利100先令纸币

奥地人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第八章 集结队伍 (MARSHALLING THE TROOPS)：科学经济学瓜熟蒂落

本章音乐选段：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第6交响曲，《悲怆》，第三乐章，“极活泼的快板”

边际革命的成功与十九世纪后二十五年经济学的专业化密切相关。
——马克·布劳格 (Black 等 1973: 14)

边际分析原理和主观效用的发现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自十九世纪后二十五年以来，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在不相同。它迅速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拥有它自己的整套工具、系统规则以及定量分析。经济学家们希望曾经是神学、哲学、法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成为能够与数学、物理学的精确和逻辑性相媲美的新的科学。是时候卸去被卡莱尔讽刺为“消沉的经济学”的领域了，是时候以更正式客观学科取而代之了。

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

推进这次革命性转变的重要经济学家是著名的剑桥大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1842-1924)。马歇尔做出了一个反映这场革命的改变。通过将他的课本命名为《经济学原理》，他将这门学科的名字从“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昭示经济学已经成为了像物理学、数学或其他精确的知识体系一样的正式科学（见下面加框文字）。此外，它确认了影响经济的是自然规律而非国家政策。他1890年开创性的教科书引入了供给需求曲线、数学公式，需求“弹性”的量化度量以及其他从物理学、工程学和生物学引用的术语。不久，许多从物理学引用的术语就成了标准的词汇——均衡与非均衡、稳态与动态、资金周转率与通货膨胀以及摩擦性失业。最后，马歇尔意识到“经济学家的胜地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动力学” (Marshall: 1920: XX)。晚年，马歇尔后悔这一科学化经济学的尝试，建议说，我们对经济行为依然非常无知，但是骰子已经骰子已经掷出，覆水难收 (Schumpeter 1951: 109)¹。经济学很快成为首屈一指的精确而专业的社会科学。

马歇尔的《原理》在以后的四十年里统治着经济学，七次再版。

什么？你们主修政治经济？

经济学原本叫做“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信条，而是要与“家庭经济” (household economy)区分开来。它意味着社会或政治的经济学。

十九世纪末，发生了摒弃“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这一难以处理的词汇的重大行动，而赞同某些更符合时代的潮流，更为科学精确的名称。作家们给出了很多建议，例如“政治经济” (plutology)、“生物工程学” (ergonomy)、“理财学” (chrematistics)、“交易经济学” (catallactics)、以及“ophelimity”。马歇尔和其他教授们更喜欢“经济学” (economics) 这个词，为什么呢？

W. 斯坦利·杰文斯总结了原因：“我忍不住去希望我们科学的又旧又麻烦的两词名称尽快被遗弃……但是，我们还需要比经济学 (Economics) 更好的词吗？这个词，除了与旧的名称更相似，联系更密切外，还与数学 (Mathematics)、伦理学 (Ethics)、美学 (Aesthetics) 以及其他学术学科的分支非常相似，此外它还是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的权威用法……因此经济学 (Economics) 有望成为一门科学的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名字，它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就以 la science economique 为法国经济学家所熟知” (杰文斯 1965[1871]: xiv-xv)。

那么杰文斯给他的书起什么名字呢？《政治经济理论》！的确，第一版出版于1871年，那时“政治经济”正流行。他在1879年出版的第二版中写下了上面的那些评论，并补充道，“尽管在书中使用了新的词汇经济学 (economics)，但是改变书的标题显然是令人不快的” (杰文斯 1965: XV)。

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马歇尔的教科书流行的时期是经济科学新开端出现的时期。官方协会建立了——1885年美国经济协会以及1890年英国经济协会（1902年更名为皇室经济协会）。杂志发行了——1887年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1891年剑桥大学的《经济杂志》，1892年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尽管早在1841年十二月，《**经济学家杂志**》就已经在法国发行了。）1894年，麦克米兰出版了享有盛名的《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大辞典》，在其中亨利·斯蒂威克（Henry Sidgwick）写到，“经济学”这个词已经“越来越多的被用以取代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名字”（1926：678）。到世纪之交，主要的大学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经济系，把经济学从法学、数学和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并开始在自己的领域授予学位。这是马歇尔最大的愿望之一。1895年，伦敦经济学院（LSE）成立，几乎完全致力于经济研究（见196页加框文字）。

总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研究中讨论了他的“牛顿式”的方法，但是一直到下个世纪，经济学才真正作为一门科学和独立的学科存在。

杰文斯的影响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创立科学经济学的先驱，但是在讲他的故事之前，我们必须先叙述一下他较年长的英国同事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82）的重大影响。

杰文斯，如我们在第七章所述，是边际革命的创始人之一。杰文斯以他的数学和数量研究闻名，他还首创了指数方法。马歇尔经常赞颂杰文斯。

预感命运的神童

尽管他只活了短短的四十六年，但是他站在边际革命的颠峰，拥有多彩而辉煌的事业生涯。他1835年生于利物浦一个制铁机械师家庭。十六岁年轻的斯坦利进入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化学和生物。作为一个鲁莽的少年，杰文斯有很强的方向感。他告诉他的妹妹，他有特殊的使命要达成，而且他的见识“要比大多数人或作家都深刻”（Black 1973：18）。后来他写到：“我反对顺从任何人的思想，不论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还是亚当·斯密或是亚里斯多德”（Jevons 1965 [1870]：261）。杰文斯的父母是一神教派的教徒，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不妥协的态度。奇怪的是，他终生都是音乐爱好者，并对瓦格纳的“实验”音乐着迷。“杰文斯早期对于他自己天才和创意的自信几乎和瓦格纳完全对应”（Ekelund and Hebert 1990：354）。

当他父亲破产后，斯坦利被迫停止了他的学业。他接受了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亚铸币厂（Australian Mint）的试金师的职位。他在澳大利亚居住了五年（1853-58），写了关于气象学和铁路定价的文章。回到英国后，他在伦敦大学学院1860年获得学士学位，1862年获得硕士学位。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首次表达了他的边际效用理论的萌芽，1862年，仅27岁的时候，他在一篇论文里公布了他的发现。²到1870年，他认为完全脱离古典价值理论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便疯狂的写作他的开创性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71年，这部书由麦克米兰出版。

杰文斯在欧文斯大学任教（现在的曼彻斯特大学）。他因写《煤炭问题》和《政治经济学原理》而闻名，为此，1876年他被任命为伦敦大学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

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的奇怪起源：费边社会主义者们的梦想出了岔子！

他们坚信公平地研究经济学必将导致社会主义

——F. A. 哈耶克 (1994: 81)

1895年成立的经济学伦敦大学是世界上最富盛名的大学之一。许多名人都和LSE有联系，包括剧作家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社会学家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F. A.哈耶克以及摇滚乐歌手米克·杰格（Mick Jagger）（作为一个学生）。

LSE是由费边社的杰出成员创建的，他们全都是社会主义者——西德尼·韦伯（Sidney）和比阿特里斯·韦伯（Beatrice Webb）以及那时最富天才的剧作家萧伯纳。费

边社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为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宣传社会主义的优点而建立的。它以费比阿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命名，他是一位将军，因拒绝正面攻打汉尼拔而避免了一场败仗。费边社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式，而他们试图通过向西方政治党派和制度机构的渗透和灌输达到同样的结果。这一间接的渐进方法在二十世纪的经历过高度的国有化和社会福利国家主义的英国是及其成功的。西德尼·韦伯在1906年建立了英国工会。

费边窗：披着羊皮的狼！

乔治·萧伯纳托人制作了一个雕刻了的玻璃窗，费边窗，代表着费边社的目标。如图8.1所示，在复制品里，两个挥舞着铁锤的人是萧伯纳和西德尼·韦伯。抽动风箱的是费边社的秘书E·R·佩斯（E.R. Pease）。拨弄着鼻子的是H·G·威尔斯（H.G. Wells）（左下角），他离开了费边社并谴责他们为“新权谋政治家”（Dobbs 1964）。

但是，费边窗最声名狼藉的部分，是位于萧伯纳和韦伯之间那幅画，一头披着羊皮的政治狼！

费边社的挫折

然而，在LSE,他们的策略没那么成功了。当他们建立LSE的时候，年轻的韦伯和其他费边社成员正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中醒悟。1895年，韦伯夫妇用20,000磅的遗产创建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决定将它建成一个公正地科学地研究社会问题的独立研究机构。西德尼·韦伯坚信“事实胜于雄辩”——印证集体主义（Dahrendorf 1995: 7）。结果，韦伯主义者并没有为支持学术的纯粹性而做出努力。事实上，LSE的第一任院长，W·A·S·海温斯并不是费边主义者，更不用说是社会主义者了，后来，他成为国会的保守党！在LSE任教的第一位经济学家是埃德温·坎南，他支持硬通货和自由放任政策，于1904年编写了《国富论》的权威“坎南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LSE经济学主席是莱恩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最有影响的大学讲师是哈耶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LSE被看成是剑桥学派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主要对手。并且，当西德尼和比阿特里斯·韦伯一次旅行归来后开始赞颂苏联和斯大林开创了“新的文明”，他们便陷入了恶名。

这并不是说，LSE没有社会主义者的席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哈罗·拉斯基和威廉·贝弗里爵士在LSE任教，而且，自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哈耶克离开后，LSE一直没有把自己定位在任何特定的学派上。

杰文斯生命的终结

1880年，杰文斯因为身体状况不佳辞去大学的教职。两年后，在他46岁时，游泳溺水而死。这是一场光辉生涯的意外终结，他没能看到他的基础效用理论给经济学界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杰文斯的目标：颠覆穆勒和李嘉图

杰文斯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对于边际效用原理数学化和图形化的论证。他的意图是有意意识的革命性的：颠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权威的有害影响”。毕竟，是穆勒在他的《原理》中自以为是地写到，“令人开心的是，价值规律没有什么留待当今和以后的作者们来整理的了，关于这个学科的理论已经很完善了”（Black 等1973:181）。杰文斯回应道：“我们的英国经济学家们生活在一个愚者的天堂”（杰文斯 1965: XIV）。他的目标是从摆脱“工资发现理论、价值的生产成本学说，自然工资率以及其他令人误解的或干脆是错误的李嘉图学说”（Jevons 1965: XLV——XLVI）。

尽管他们得到了关于价值如何在边际量上决定的相同结果，杰文斯的方法仍是不同于门格尔的。事实上，杰文斯直到1882年去世，还不知道门格尔已经写出了《国民经济学原理》！（记住，用了二十年，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三位发现边际原理的经济学家才得到一致的认同。事实上，“边际”这个词直到二十世纪才被普遍的应用。）

有着扎实的数学和化学基础，杰文斯将很多自然科学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在他的工作中，他经常用到经验数据、详细的公式以及演绎推理。他深深的感到理论和现实都是必要的（Black 1973: 104-05）。例如，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他写到，“整个交换理论以及经济学的首要问题的基本原理就在于这一命题——当交换完成后，任何两个商品的交换率都是可供消费的产品量最后效用比率的倒数”（Jevons 1965:

139)。杰文斯的经济学看起来像化学的波义尔定律。他的目标是用数学揭示效用和价值经济学的“机制”。

杰文斯的主要学说

杰文斯对于经济学的贡献是什么呢？

首先，杰文斯挑战成本决定价值的传统古典模型。他独立地得到了和门格尔一样的结论：“反复的思考和考察使我得到了这样一个新奇的想法，价值完全决定于效用”（Jevons 1965: 2）。

价值是由劳动或生产成本决定的李嘉图学说“根本无法再支撑下去。”杰文斯注意到劳动（或者资本）一旦使用就不会影响一件物品的未来价值；过去的事永远只是过去的事（157页，159页）。

从边沁那里借用来的杰文斯的边际效用

杰文斯以“快乐和痛苦的微积分”开始了他的论文，借用了杰瑞米·边沁的功利主义。什么决定着价值或价格呢？不是劳动或成本，而是效用。但是多少效用？

他利用水，做了边际分析：“我们能说的是，某一数量的水是不可缺少的；这以后的水的量会有不同的效用水平；但是超过一个点后，效用似乎停止增加了”（53页）。

杰文斯用图描绘了边际效用递减（见图8.2）。像杰文斯的图显示的那样，水的供给首先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需要，之后满足他第二迫切的需要。如果水是充足的，那么就可以满足他最不迫切的需要了。因此，供给增加，总效用增加，但边际效用减少。杰文斯没有在他著作的任何部分中使用到“边际”这个词。他用“最后的效用值”。是菲利普·维克斯蒂德后来使“边际”这个词普及。

图8.2 杰文斯对于边际效用递减的证明

杰文斯还建立了一套消费者行为理论，认为个人会购买和使用不同的商品和服务，使得每种产品的边际效用都是相等的；也就是 $MU_x = MU_y$ ，x和y代表不同的商品。后来，经济学家们推广了杰文斯的边际相等原理，指出个人分配他们的收入以使每单位产品的边际效用与产品价格的比是相等的。即，

$$MU_x/P_x = MU_y/P_y = MU_z/P_z$$

马歇尔继续杰文斯不完善的著作

杰文斯的著作是不完善的。他解剖了李嘉图学派“复杂而荒谬”的假定并提出了边际效用的基本概念。然而，他没有得出一个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也没有完整的供给——需求图形。这些工作留待马歇尔去完成。凯恩斯总结得很好：“事实上，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一个有才气的但是草率、不精确、不完善的小册子，与煞费苦心的、完善的，极端详细的马歇尔的方法有很大的距离。他令人难忘的提出了最后效用、劳动的无效用与产品效用的平衡的观点。但是当我们将它与马歇尔的有耐性的，不辞劳苦的科学天才的工作体系相比时，它便只存活于伟大思想的微小世界里了”（Keynes 1963: 155）。

马歇尔完成了什么呢？不同于杰文斯，马歇尔建立了他自己的学派，所谓的英国学派或剑桥学派，有像A.C.庇古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样天才的学生。他是一个合成器，结合了古典经济学的成本（供给）和边际经济学的效用（需求）。他经常将供给和需求比作剪刀刀锋的组合——每一个都是决定价格所必要的。他让供给和需求的远远超过了文字的表述形式：他创造了供给和需求曲线，弹性的数学理论以及像消费者剩余这样的新概念。他的公式现在已经成为所有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基础了。

杰文斯预言了第一次能源危机

以往悲观的官方预言经常被证明是错误的。

——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1996：165）

在发现边际效用之前，斯坦利·杰文斯就因另一部书《煤炭问题》闻名（1865）。受马尔萨斯式语言的影响，这本书预言，英国工业的主要能源煤炭，无法跟上英国迅速增长的人口而会很快枯竭。而美国，有着几乎无尽的供给，将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工业的带头人。

杰文斯在美国的预言上是正确的，但是对英国的未来则过分的悲观了。“我们将会看到，不会有任何合理的展望表明未来对于这种工业的主要手段的需求会减少，”杰文斯警告说。“我们不能长久地持续我们现在进步的速率。导致繁荣增长停滞的第一个因素一定是过量的人口”（Jevons 1865:xiv xvi）。

但是，英国的煤没有枯竭，人口持续增长，煤能源危机从来也没有爆发。为什么呢？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石油的发现。而且，煤的产量增加了。资本家发明了新的煤炭的储存方法，企业家们发明了更好的开采煤的方式，运输业的工程师发展了更便宜的运送煤的方式，发明家们发现了更有效率的使用煤的方法。今天，英国与1865年杰文斯写这本书时相比有着更高的储煤量。

占星家杰文斯！

斯坦利·杰文斯的统计研究都很有名，但他“占星术的”太阳黑子商业周期理论是一个例外。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他写了很多论文，坚持认为恒星和行星的布局是商业危机的主要原因。“如果行星影响太阳，而太阳影响酿酒和丰收，从而影响食品和原料的价格以及货币市场的状况，那么，行星的布局将被证明是导致最大的商业周期产生久远的原由”（Ecklund and Hebert 1990:367）。

杰文斯在《自然》和其他科学杂志上提出了太阳黑子商业周期理论，认为每十年到十一年的太阳黑子的密集不只导致农业危机，还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经济学家们早就抛弃了这种过于简单的解释，事实上，杰文斯此后还结合了其他商业周期的解释。

马歇尔神秘的身世

这位影响了一整代人经济学思想的伟大人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马歇尔去世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为他的老师写了一部小传。在一本关于马歇尔的详尽传记中提到了凯恩斯的这部小传，作者彼特·格勒内维根(Peter Groenewegen)评论说：“他的第一句话列出了出生的日期，错误的出生地点，父母的姓名和关于他父亲职业的错误描述”（Groenewegen 1995：19）。为什么像凯恩斯这样一贯精于细节的人会在马歇尔主要的信息上犯这样的错误呢？

这并不是凯恩斯的错。事实上，马歇尔深深苦恼于他的身世，对凯恩斯以及为他作传作家们隐瞒了某些主要的事实。他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卑贱之人，为自己所受的教养感到羞愧。在他的母亲这边，他是漂泊的农夫和乞丐的后代，在他父亲那边，他是破产商人和屠户的孩子。他将他的出生地列为1842年的伦敦，实际上，是伯莫达兹（Bermondsey），伦敦东南部沉闷的贫民窟，因为弥漫着皮革制造的刺鼻的气味而被称为皮革区（leather district），散发着肥料、制胶、狗粪的罪恶气息。（这个区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他从来不掩饰对社会福利的关注，马歇尔还是饶过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开始。事实上，是在利用假期调查过几个城市贫困的地区之后他才决定研究经济学。

为了回避这个令他觉得颜面无光的出身，马歇尔“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从他的私人证件中毁掉了家庭资料 [受亚当·斯密影响！]，而且，由于他以这种方式隐瞒了家庭的实际情况，他连慌都不用说。例如他将自己的出生地说成是萨瑞（Surrey）或者伦敦而非伯

莫达兹，并且在作为参考文献的自传里忽略掉他的父母”（Groenewegen 1995：40）。

马歇尔反抗他的父亲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有一个残暴的父亲，威廉，一个英格兰银行的出纳员，他写了一个题为《男人的权利和女人的义务》的小册子。他劝说年轻的阿尔弗雷德放弃国际象棋和数学，研究希伯来语和古典文学为进入内阁做准备。

阿尔弗雷德拒绝他父亲的要求，继续在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在那里，他受到康德(Kant)，黑格尔(Hegel)，达尔文(Darwine)和斯宾塞(Spencer)的影响。沿着这条路，他失去了他的宗教信仰，尽管他一直赞成基督教的价值观和道德。（关心达尔文和社会进化论对经济学的影响，参见211页的加框文字。）

毕业后，他继续在圣约翰学院工作，那里要求教授单身。当他与他的学生马利·佩利结婚后，他被迫辞职。马利·佩利参与到他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并与他合著《工业经济学》（1879）。

他离开剑桥大学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和牛津大学任教，1885年43岁的时候返回剑桥大学成为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不会再离开了，一直引领着经济系直到1908年他以前的学生A.C.庇古取而代之。英国学派的这位先生继续他的著述，最著名就是他的《原理》教科书。

马歇尔：一个“荒谬奇怪特殊的人”

马歇尔是一个性格怪僻的人，特别是老年时。他不喜欢照相。他在给他在哈佛大学当教授的朋友弗兰克·陶西格的信中写到“我长的丑，我的照片也难看”。他1901年写给理查德·T·伊利的信中说“照相真是一件讨厌的事。”马歇尔的肖像画家认为马歇尔是自负的，他对画家说他“笨重的左手”太大了应该在画像中隐去（也确实被隐去了）（Groenewegen 1995：768n, 628—29）。

他经常展示他卑劣的性格而且很难维系牢固的友谊。他不公正的拒绝给予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因为发明了边际分析而应有的评价。他坚持自己在更少为人知的前人影响下发明的边际效用（杜波伊特，古诺，以及屠能）。事实上，杰文斯早于马歇尔在1871年发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令马歇尔非常生气（凯恩斯 1963：153）。马歇尔也不喜欢改革者亨利·乔治（见下一章）和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柏姆-巴维克，他敌视柏姆-巴维克的利息和资本理论。1909年，在奥地利阿尔卑斯会面的时候，马歇尔和柏姆-巴维克就利率理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吵得太厉害了，以致妻子们必须把他们两个分开。在晚宴上，两对夫妇重归于好，并互相敬酒，但“对利率未着一字”（Groenewegen 1995：477）。

马歇尔的声音有时“非常尖利，几乎是短促的尖叫，时常还伴随长时间的笑声”（Groenewegen 1995：771）。琼·罗宾逊写到：“我学习经济学越多就越钦佩马歇尔的才能，但也越不喜欢他的个性”（1953：14）。

但是马歇尔也有优点：他总是认真负责地履行他的职责。他对朋友忠诚，他的学生觉得他总能启发自己的灵感。他通常是慷慨的偶尔还是谦虚（开明？）的。

马歇尔有圣母情结吗？

如果我能重新活过，我将投身于心理学。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Keynes 1963:176）

心理学家又出场了，这次是马歇尔。他深受他生命里的所有女人的影响，他母亲、妹妹、姑母以及他的妻子玛丽·佩利（Mary Paley）。他有圣母情结吗，对女人的一种崇敬？

传记家彼特·格勒内维根认为剑桥大学的这位先生可能患一种荣格内向性（Jungian introversion），“对所有的态度、行动以及情感的处理都极为小心”并且“有谨慎、卖弄学问和吹毛求疵的倾向”，这种类型与性方面的欲求不满有关系。一个旁观者说马歇尔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只有思想没有行动，”凯恩斯认为他“不能生育。”他没有子女，他的妻子是有工作的中产阶级妇女。他们养了一只猫和一只狗作为宠物（Groenewegen 1995:260-61）。

马歇尔是一个厌恶女人的达尔文主义主义者吗？

两性智力的主要区别表现在，比起女人，男人总是能在他从事的任何岗位上达到更出众的地位。

——查尔斯·达尔文（1906: 858）

马歇尔在很多方面发展了经济学，退一步说，但他对女人的态度则颇有争议。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前，他对女人的教育以及她们在社会中的作用持进步的观点，但1878年，他母亲去世后，他心理立即产生了巨大的转变。

1880年，在布里斯托大学学院的时候，他反对授予女生学士学位。回到剑桥以后，他反对聘请一个女人作讲师，他的理由是“一个女人不适合为一大帮男性听众做公开演讲，这会破坏她的品格”（Groenewegen 1995:502）。女生也没有获得奖学金的资格。马歇尔比较喜欢女子学院，在他的《原理学》教科书列给出了女人应当留在家照顾孩子，结婚了的女人应当避免去工厂工作的情况（Marshall 1920:69）。晚年，他极为反对格勒内维根的描述这种时尚，“现代女性，她们要求工作的权利，要求经济独立，公开吸烟的权利，选举权和获得任意学位的权利”（1995: 524）。几乎马歇尔所有的朋友都认为他的观点是偏激的，并反对他的观点，但是他以自己进化论者达尔文和斯宾塞理解而为自己的信仰辩护（Groenewegen 1995:500, 524）。

比阿特里斯·韦伯，和她的丈夫西德尼·韦伯一起建立了费边社和伦敦经济学院。她曾经对妇女问题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有过几次口角。她把一次和他的谈话写在了日记里：

从男人和女人的玩笑开始，他认为女人是一种附属存在，如果她不愿意处于受支配的地位，那么男人就没有结婚的对象了。婚姻是对于男性自由的牺牲，只有当女人对男人全身心的奉献时，男人才能忍受。因此，女人不可以发展那些令男人不快的才能：力量、勇气、独立，这样的女人都是没有魅力的；在事业上与男人竞争，更是令人不快的……如果你们和我们竞争，我们就不会娶你，他笑着总结道。（Groenewegen 1995: 517）

马歇尔的妻子的反应

玛丽·佩利如何回应她丈夫那种不断滋长的反对男女平等的偏见呢？她为阿尔弗雷德和他的工作奉献一切，但她又坚决地赞同女权运动，两者间存在本质的冲突。然而，她总是在她丈夫作为主要学派领袖的事业中压制自己的反对意见。她和她的丈夫合著了他的第一本书，并协助他校对他各个版本的《原理》，是剑桥大学的第一位女讲师（阿尔弗雷德没有异议吗？），并写了他们婚姻的回忆录。马克·布劳格评论说，“（她）也许会有一个辉煌的事业，然而，由于与马歇尔德婚姻，她将她的事业融入到他的事业中去了”（1999: 741）。

马歇尔孤独的死去

实际上，他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马歇尔都卧病在床，他患有结石、高血压、神经紧张。最后，1924年，在他82岁生日后不到两个星期，他孤独的死于心力衰竭。凯恩斯等追随者们仍然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在他的领域里，他是一百年之内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Keynes 1963: 140）。

剑桥先生的经济科学遗产

马歇尔的主要贡献就是将斯密的模型发展为数量化的科学。亚当·斯密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基本原理（“普遍繁荣”和“天赋自由体系”）。但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创造了推进斯密体系的发动机。

这部发动机是什么呢？供给需求原理，价格决定，生产成本，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所有的这些工具都能在今天微观经济学的个体消费者和生产者理论里找到。它是今天经济学家用以分析和阐明消费者和厂商行为理论的手段。马歇尔用几何和数学手段创建了这一方法，尽管他经常将他的图形和等式放到附录里。他完全当之无愧地完成了“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科学的转化。

马歇尔的守护神：工人

像斯密一样，马歇尔非常关注整个人类的进步，而不只是富人。在《原理》中，他将经济学定义为“人类平凡的生活事物的研究，”特别强调“幸福所需物资的使用”

(Marshall 1920:1)。他想回答这个问题，“真实生活中机会是局限在一小部分人中间吗？”(Keynes 1963:138-139)。

马歇尔最喜欢的主题是工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花个几个先令买了一幅小油画，“一个工人的肖像”并把它挂在学校宿舍里。今天，这幅画着一位有着一副憔悴而渴望表情的工人的油画被保存在剑桥大学马歇尔图书馆（见插图8.1）。

马歇尔引入一幅连接了古典学派和边际学派的图

《原理》首先是一本微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与总体经济（宏观经济学）相反，研究个人市场和企业。它处理供给、需求和企业通过生产商品和服务创造物资进步的“日常业务”。

马歇尔是第一个普及供给需求图形的人。根据马歇尔的说法，供给和需求在决定价格和产品产出的时候都是必要的，就像是剪刀的两个刀锋。也许我们会争论剪开一张纸的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的刀锋，就像争论价值到底由效用还是由生产成本支配（Marshall 1920:348）。图8.3中再现的供给需求曲线在1890年版的《原理》中第一次出现。

在决定均衡价格的时候，马歇尔作了一系列假定，或者说是*ceteris paribus*（其他条件都不变）条件。他假定收入不变，互补品和替代品的价格不变，期望和国际贸易不变。给出了这些假定，在短期内存在一个“局部”均衡。

为了结合供给和需求，马歇尔想要从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模型以及新边际革命中各抽出一些东西。从边际革命中，他创造了反映购买者边际效用的需求曲线，从古典学派，他发展了依赖于生产成本的供给安排。

为表示供给与需求的一般均衡，我们可以画出图19的需求与供给曲线。如果OR代表实际产量，需求价格 R_d 比供给价格 R_s 高，生产是有利可图的，产量会增加。我们称之为数量指数的R会右移。另一方面，如果 R_d 小于 R_s ，R将左移。如果 R_d 等于 R_s ，即R在曲线交点的正下方，供给将达到均衡。

图19

这可以作为遵从收益递减的稳态均衡的典型图形。但是，如果将 SS' 变成一条水平直线，我们将得到“恒定的收益”，对于所有的商品供应量供给价格不变。如果我们使 SS' 曲线向下倾斜，但是没有 DD' 陡峭（稍候，这一条件的必要性将表现得更为充分）我们将得到服从收益递增规则的商品的稳态均衡。在每一种情况下，上述推理都没有一字一句的变化，但是，后一种情况给出了我们应当克服的困难。（这段不用翻译吧）

图8.3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的供给和需求
来源：马歇尔（1920：346）

马歇尔试图挽救李嘉图经济学

马歇尔发展了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的条件。根据这位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短期中需求供给条件的根本变化会导致价格相应的变化。但长期中，马歇尔总结到价格由生产成本决定。马歇尔和他的追随者们坚持认为成本是真实并完全的，独立于效用的概念。在这种意义上，马歇尔背离了，证明价值完全由效用或需求决定，成本不过是过去的某种选择的奥地利学派。本质上，他试图通过将成本而非效用作为价值的最终决定因素，把边际效用分析综合到李嘉图体系之中。因此，他试图拯救李嘉图经济学以及他的劳动价值论。马歇尔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而非改革者。他不是要摧毁古典经济学却是要完善它。

马歇尔发明了一个有无限魅力的概念：需求价格弹性

马歇尔总是尝试着将数学和自然科学应用到经济学中，两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弹性概

念和消费者剩余。

1881年，坐在意大利马勒莫城某旅馆的房顶上，马歇尔产生了弹性的想法，他的妻子说，“他为此非常高兴”（Keynes 1963:187n）。弹性是衡量购买者对价格敏感程度的精巧而有效的数学概念，生产者显然会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它也被成功的应用于税收对价格、产出和收入的影响研究。

本质上，需求价格弹性反应消费者对于价格的变化有多么敏感。生产者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提高产品价格，收益会增加还是减少？同样，如果我们降低价格，收益会增加还是减少？

需求价格弹性等式是：

这里， P 代表商品价格， Q 代表购买量， e 是弹性。

弹性为1是“单位弹性的”——价格微小的增加或减少实际上对总收益没有影响。弹性大于1意味着商品是相对“富有弹性的”，价格的增加会减少总收益，价格的减少增加总收益。另一方面，很明显，许多生产者喜欢需求弹性低的商品。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提高价格获利。但新的竞争者也许喜欢需求富有弹性的商品市场，因为以低于市场领先者的价格销售导致销量的增加并能吸引新的顾客。

税收弹性，供给经济学的一个主要问题

立法者还有兴趣知道税收增加或减少对于产量和政府收益的影响。例如，资本收入税率由28%降到20%会增加还是减少收益呢？或者，如果联邦政府对于售价高于30,000美元的汽车销售征收10%的奢侈品税，这会对汽车销售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度量税收的对产量和收益的边际影响是极为有用的。

X的价格

P_x

X的产量

图8.4 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的概念

消费者剩余——经济福利的度量

马歇尔还创造了消费者剩余的概念，一个度量消费者满意程度的方法。在上面的图中，阴影部分的三角形代表消费者剩余（见表8.4）。

如我们所见，市场对商品X决定了一个单一价格 P ，然而，许多消费者愿意支付比 P 更高的价格。你有过去商店去买东西，打算好了要花一些钱，却发现只需一半价钱就能买到它的时候吗？那个时候，你就得到了消费者剩余。例如，假如一个30英寸的彩电价格是500美元，那是均衡价格。但是，有许多消费者愿意支付600美元，如果需要的话甚至是900美元，来购买一个大彩电。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买高价的电视机——但是有人愿意——也许你自己就愿意。当有这个意愿的购买者进入电视卖场后，他们发现他们只需支付500美元，尽管他们愿意支付900美元，这些购买者得到400美元的消费者剩余。

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上消费者的满意程度。一般价格水平的降低反映着消费者满意程度的增加。更多的消费者可能购买商品和服务以满足他们的需求。马歇尔（以及斯密）的“普遍富裕”愿望——社会既对富人有利也对穷人有利——在消费者剩余的扩大中反映出来。

马歇尔反对政府变革

马歇尔对于政府政策的态度在他第四版前言中的一句话里表现得很明确。“经济变革是渐进的”（1920: XIX）。这不仅反映了他边际分析的经济方法，也反映了他的政治哲学。

这位剑桥大学的教授不反对社会主义者的理想主义，但认为社会主义经常是对经济有害的。竞争、私有财产、自由贸易都是必要的，而且“他警告说，如果没有资本家和资本，人们会回归原始，生存本身都会受到威胁”（Groenewegen 1995: 584）。马歇尔频繁的强调资本主义几代以来提高了生活水平，连农业工人也不例外。简而言之，亚当·斯密的构想正在实现中。

在他谈到亨利·乔治的税收政策的一篇演讲里（见第九章），马歇尔提出了较缓和的另一中政策。他支持放慢人口增长、教育穷人、鼓励合作社的政策。他也支持“受管制的竞争”，例如在制造业实行工厂立法和管制商业欺诈活动。他强调自助，合作以及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的作用。后来，他支持累进税和资本税这样的再分配安排。“如果富人稍微不那么富，穷人略微不那么穷”，这将多么好（Pigou 1925: 366）。

马歇尔赞成8小时工作制和利润分享，但对于工会组织感到越来越害怕。“我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打击这些人，”他写道，“完全摧毁工会主义将会花可以想象出的最高昂的代价：但是我认为这是值得的”（Pigou 1925:400-1）。他认为工会运动会降低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

但是他反对所有革命的形式。马歇尔也许被看作是一个社会主义改革者，但他从来都不是**资本的社会主义者（capital S socialist ???）**。

总结：马歇尔顾虑重重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他占支配地位的教科书迈出了一大步，收编了边际效用革命，将经济学推进到二十世纪。他创建了许多有用的图表和数学技术来将经济原理运用于日常消费者和商业的事务。他的科学方法揭穿了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者的阴郁观点，而因此重建了亚当斯密的天赋自由和经济进步的体系。他占统治地位的剑桥学派试图保护一些已经过时的古典模型——例如李嘉图的长期中的劳动价值论和成本及税收再分配政策——但是经济学显然已经走上了正确的方向。

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 (William Graham Sumner)
(1963: 157)

查理斯·达尔文（1809-82）的进化论思想对科学、宗教和哲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济学也不例外。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像十九世纪大多数学者一样，深受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和《人类的起源》（1871）的影响。马歇尔相信经济学最好应模仿生物学，并坚持经济行为的边际变动或较小的变动影响价格和产出：“经济演化是渐进的”（1920: xix）

但是，达尔文主义不仅促使了经济微积分学的产生，它还造成了市场拥护者为自由放任政策的正名，以及市场批判者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残忍的、混乱无序的，竞争惨烈的的批评。

自由放任与“适者生存”

最有影响力的社会进化论者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批评家，以及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1840-1901），主教牧师和耶鲁大学的经济教授。他们都是资本主义体制不知疲倦的捍卫者。

赫伯特·斯宾塞比达尔文早许多年就开始写他的个别而重要的进化原理。1852年，在32岁时，他发明了“适者生存”这一术语。年轻的时候，他是铁路建筑工程师，这教给了他私人自由竞争的价值以及经济生存竞争的优点。像达尔文一样，斯宾塞受罗伯特·马尔萨斯关于增长的人口给资源以压力的论著影响。不同于马尔萨斯，斯宾塞将这一“存活”条件视为有益的并且恰恰是进步的动力。“它迫使人们进入社会状态……并建立起互相依赖的关系”（Oldroyd 1983:207）。

斯宾塞将动植物变异的生物原理应用于商业世界。随着商业的展开，变得更为多样化，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产品。

然而，斯宾塞将经济视作“社会有机体”也为资本主义描绘了沉闷的图景。他说，例如，商业就像一个丛林，天生就是无序、自利、贪婪的，充斥着欺诈的工作和不道德的行动。在他的文章《交易的道德》中，斯宾塞有力的揭露了英国商业中无数的“不正当交易”形式。他描述了各种各样的贿赂、盗窃、错误的商标以及交易的伎俩。甚至行业中少数诚实的人也“被迫”欺诈，他这样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断言，但是它是真实的，那些抵制这些腐败的人，常常要冒着破产的危险”（Spencer 1865:124）。

斯宾塞独立的传统

赫伯特·斯宾塞1820年出生于英国德贝一个反对国教牧师的家庭。斯宾塞继承了他们反国家的个人主义和以科学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样，他在家学习了自然科学、经典著作、语言和历史，然后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但是他身体不好，最后患上偏瘫。后来投身于文学，为偏激的反国教杂志《非国教》（Nonconformist）以及英国第一个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刊物《经济学家》写作。尽管与著名的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有感情关系，但他并没有结婚。

自由放任与优生学

根据斯宾塞的观点，自由放任是唯一适合进化论原则的政策。社会不应该违背自然法则。最弱的成员应当失败，斯宾塞认为这会清除不聪明和不勤奋的个体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尽管不是斯宾塞所提倡的，但是这一思想直接导致了优生学运动，它最极端地表现在纳粹德国，他们提倡强制性绝育和选择性生育来提高人口质量。一些批评家坚持认为堕胎运动是优生学的最新形式。

斯宾塞是一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赞成自由贸易和废除政府福利。他激烈地批评亨利·乔治和土地国有化者。在他经典的自由主义文献《人与国家》中，他称，“必须经历过程，必须忍受痛苦。没有任何力量、没有政治家巧妙设计的法规、没有仁道的世界改造计划，没有共产主义的灵丹妙药，没有任何一种人们已经提出或将会提出的改革，而将它们减少分毫”（1981[1884]: 108）。

十九世纪后半期，斯宾塞经济上衣食无忧，而且扬名世界，但是他并不快乐而且身体状况不佳。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持极其悲观的态度。他于1903年去世。直到最近，斯宾塞的社会学通过演化经济学卷土重来。

萨姆纳在美国的影响

社会进化论在美国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如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他的《论美国民主》中提到的那样，个人自由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思想在美国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杰斐逊（Jeffersonian）的支持者坚信“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他们热心于亚当·斯密的文明的自利学说。（1988: 525-26, 539）。

引领这种思想的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在斯宾塞的引领下，萨姆纳将竞争视为“自然法则”，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天生的与进化法则相一致。当“强盗资本家”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以及J.P. 摩根因他们“割喉式（cutthroat）”竞争而遭受批评时，萨姆纳宣称，“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1963: 157）。商业大亨们对此表示支持。在1890年出版的《财富的福音》中，卡内基写道个人主义、私有产权、财富积累法则以及竞争，是“人类经验的最有价值的成果”（Carnegie 1962:16-17）。洛克菲勒说，“大企业的成长只是适者生存……这是自然的法则，这是上帝的法则”（Hofstadter 1955:45）。

萨姆纳相信竞争资本主义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反对所有形式的遗产税和财产税，他认为继承财富可以保持优秀的品质世代延续。

社会进化论给了资本主义一个恶名

很明显，斯宾塞和萨姆纳构想的社会进化论并没有改变经济学已然根深蒂固的“郁闷”“庸俗”的恶名。像理查德T.伊利（Richard T.Ely）和弗朗西斯A. 沃克（Francis A. Walker）这样的社会改革者讨厌经济进化论，寻求较和缓的社会主义方式。

对社会进化论的批评

将进化论应用于经济学是有困难的。经济并不像阿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他的一本小说中提到的那样是一个霍布斯丛林，而是一个存在自发规则和潜在进程的体系。我们的经济体系的特征不只有竞争，还有合作和利益协调。它不是适者生存的体系，

而是强者与弱者、贫者与富者共存与发展的体系。通过劳动分工，最弱的人也可以找到有用且生产性的工作。社会上大企业和小企业互相竞争，富人与穷人并肩工作。也许世界经济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繁荣和衰退，但市场仍见证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市场参与者并非像野兽一样贪婪地互相利用，而是高等的人类以高级的良知和道德与同伴及自然互惠互利、和谐共存。最后，社会中的个体可以通过激励、教育、训练来帮助相对不幸的人。境遇决不是毫无希望的。总之，人类通过合理的节约、勤劳、科技、仁慈和正直逃离这一丛林。

进化经济学（Darwinian Economics）名誉扫地

进化经济学在赫伯特·斯宾塞和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引领下于1890年至1914年间达到顶峰，但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失宠。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滥用导致了沉重代价，结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优生学、男性至上主义以及自由放任政策即使没被完全鄙弃也是被怀疑的。甚至科学家们，也日益将遗传学看成进化的驱动力，认为它比自然选择发挥着更大的支配作用。

同时，经济学家A.C.庇古——剑桥大学马歇尔的继承人——抛弃了经济学中的生物学暗喻。与生物学相比，他更喜欢力学，常使用力学平衡（mechanical equilibrium）这样的术语。三十年代，经济被视为可由政府的科技主义者掌握方向盘，并熟练操作机器。二战期间，经济学成为战争武器，全速全职运转。

在微观经济理论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德华H. 张伯伦（Edward H. Chamberlin）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提出了不完全竞争的机械模型。从那时开始，不完全竞争理论开始支配经济学，尽管约瑟夫·熊彼特，以色列·柯兹纳（Israel Kirzner）和穆雷·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激烈地反对。

演化经济学东山再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演化经济学东山再起，尽管它脱离了张伯伦——罗宾逊竞争模型的轨道。最初的努力来自艾门·阿尔钦（Armen Alchian），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学家，他们将演化视为利润最大化的：竞争过程所固有的“自然选择”，使最有利润的公司存活下来（例子参见Alchian 1950）。

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也开始用演化的方式讨论市场过程，特别是他的“自发秩序”概念。上百万个体独立地在多样的商品和服务生产中追逐他们的自身利益。没有全盘的计划。没有一个人了解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每个方面，然而无论如何，产品还是生产出来了。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论述进化时，用了一个模拟的概念，他称其为“盲钟表匠”。钟表匠是盲人，但是表还是被生产出来了。

1982年，美国经济学家Richard Nelson和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出版了《经济变迁中的演化理论》，被认为是“迄今为止，自生物学而来的进化隐喻在经济学中最广泛最精确的运用”（Hodgson 1999: 166）。这本书在管理和商业出版物中继续被频繁引用，但在经济学界，人们越来越敢感兴趣的是，寻找新的模型以替代现有的标准不完全竞争模型。然而，直到一种理论精准，实践可验的替代模型建立起来，现有的新古典模型才会被取代。正如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曾经承认，“我知道那轮盘是歪的，但是这是城里唯一能玩的游戏”（Hodgson 1999:81）。

数理经济学家们使亚当·斯密的模型正式化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不是唯一使经济学专业化的人。欧洲其他三位经济学家也做出了重大的推进：法国的里昂·瓦尔拉斯，意大利的维克弗雷多·帕累托，爱尔兰的弗朗西斯·埃奇沃思。他们的主要贡献有两点：他们将精巧的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尝试用数学方法验证亚当·斯密的基本观点，即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将自利转变为普遍利益。

瓦尔拉斯经济学最基础的定理

自由放任引致普遍利益的思想在今天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福利经济学”最重要的定理为人所知。在福利经济学中，“福利”指的是国民普遍的福利或普遍的好处，而不是享有福利的人或政府的补助。福利经济学解决效率、公平、经济损失以及经济中政治进程的问题。瓦尔拉斯、帕累托、埃奇沃思是最早用高等数学方程式和图形证明福利经济学特定假定的经济学家。于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第一次穿上了数学的外衣。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福利经济学由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肯尼斯阿罗

(Kenneth Arrow)，保罗·萨缪尔森，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都将是诺贝尔奖得主)推广普及，福利经济学的技术被应用于解决垄断和各种政府政策问题。在多数情况下，福利经济学家们能证实政府强制实行的垄断和补贴导致无效率和浪费。

让我们更细致地考察这三位创建了福利经济学这一分支的经济学奇才的思想和生平——瓦尔拉斯、帕累托、埃奇沃斯。

瓦尔拉斯：最伟大的纯粹理论经济学家？

里昂·瓦尔拉斯(1834-1910)，任教于洛桑大学的多年法国教授，最初以边际革命的创建者之一闻名，但是今天，他更多地以建立第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而为人所知。他的这两项以精密数学完成的成就有极端重大的意义，以至于约瑟夫·熊彼特从纯理论贡献上将瓦尔拉斯列为“所有经济学家中最伟大的”(1954: 827)。《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赞同：“还无人能超越瓦尔拉斯”(Walker 1987: 862)。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型由于其静态而枯燥的公式模式而被批评，而且这与熊彼特的动态企业家能力方法的风格完全相反。那么，为什么熊彼特如此认可他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瓦尔拉斯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竞争机制会最大化社会福利这一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如熊彼特所述，“一个各处均处于完全竞争均衡的状态能保证所有集团的满意程度最大化”(1954: 985)。

在他1873年的原始论文“交换中的数学原理”中，瓦尔拉斯解释他的目标就是在效率和公平的背景下度量自由放任的收益。运用一个两部门、两种商品物物交换的模型，他能表明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通过一系列交换最大化两部门的社会效用。在《纯粹经济学要义》里(1874, 1877)，瓦尔拉斯将他的分析扩展到在完全竞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弹性等假定下的多部门多商品的交换。应用这些限制假定，他建立了一个代表经济的联立方程组，注意到方程的数量等于未知数的数量，他得出结论，自由市场必然能达到一个一般均衡(GE)使所有商品的供求相等。

与普遍的想法相反，瓦尔拉斯并没有将他的分析限制在稳态均衡的条件下。他以**拟现实(quasi-realistic)**角度继续研究非均衡条件下的竞争体制。通过模型化被他称为“**tatonnement**”(摸索(**groping**)的法文)的拍卖市场，瓦尔拉斯表明价格依据供求变化，而“摸索”着趋向均衡。因此，他能够证明，一个没有中央指导的反复试错的市场，仍然会实现社会需求满足的最大化。

瓦尔拉斯过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生活。1834年他在法国诺曼底受洗礼，教名为MARIE ESPRIT LEON，他有过许多临时职业：他作过记者、铁路职员、银行经理、甚至言情小说家。他与一个有私生的女人同居，最后还是结婚了。1863年，他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但其中一个死了。久病之后，他的妻子也去世了。五年后，1879年，他与第二个妻子结婚，她活到了1900年。

他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个业余的经济学者，他督促瓦尔拉斯学习和研究经济问题。1870年，36岁时候，瓦尔拉斯最终安定下来成为瑞士洛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在那里供职20年，写作，研究。1874年和1877年，他出版了两册《纯粹经济学要义》。在再版中，加入了许多新材料。他说他的著作有“如同宗教之于信徒们般给予他满足和快乐”(Henderson 1993:848)。他1902年退休，1910年去世。

瓦尔拉斯在建立宏观模型时，极遵从杜尔哥、孟德斯鸠和萨伊的法国传统。在建立他自己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时，他从古诺和杜波伊特的著作中学到了很多，但是对于他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说，萨伊显然是他“真正的前辈”(Schumpeter 1954:828)。

瓦尔拉斯称自己为“科学社会主义者”，他总是担心经济竞争不充分。他支持政府介入经济以保证一个更为竞争性的环境。他坚持土地和自然资源专有权应当国有化，租给私人使用者以增加收益。他相信充公的税收是不公平的，应当废除。

瓦尔拉斯是其理论不知疲倦的鼓吹者，但是终其一生没有看到太大的成果。他经常抱怨马歇尔、杰文斯和其他英国经济学家的剽窃和不认同。他的《要义》直到1954年才被译为英文。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个阶段，他抱怨说，“在一个阶段，我是一个疯子，在另一个阶段，每个人都在我之前做出了我的发现。”在他去世前几年，他哀叹道，“我知道，这种成功只有在作者去世后才会清晰地显现”(Walker 1987: 862)。

当今最大的威胁就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型！

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实践意义的理论。它证明了一个多市场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和局部稳定性。我们得到了关于经济的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正式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以瓦尔拉斯命名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约翰·希克斯和肯尼斯·阿罗共同获得1972年诺贝尔奖，杰拉尔德·德布罗（Gerald Debreu）1983年获诺贝尔奖，他们都是由于推进一般均衡理论获奖。）

但是，一般均衡理论因为它没有真实的反映经济世界而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它主要的缺点就是它关注竞争的最终结果胜于过程本身，即竞争如何作用。历史学家马克·布劳格写文章尖锐地攻击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谴责它为“一场彻底的失败”和“完全无用的创新”。他将它比作“一个国家的城市地图，但没有画出城市之间的道路。”这一静态模型使中央计划者们认为他们可以计算出价格而且令社会主义可行。布劳格总结道，“简而言之，经过一个世纪或者更久的对一般均衡理论核心的不断精炼和改进，这项工作甚至吸引了一些二十世纪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这套理论还是无法清楚地解释市场均衡实际上是如何达到的”（1997：76）。

对于这样的堕落该做些什么呢？布劳格呼吁放弃完全竞争模型、一般均衡以及福利经济学，代之以由米塞斯，哈耶克和柯兹纳传授的新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运行模型（1997：79-81）。“我缓慢而极不情愿地正视，他们（奥地利学派）是对的，而我们一直都错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指的是动态的竞争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终结了被古诺带进经济学的完全竞争概念”（189页）。

帕累托最优背后的男人

1895年，维克弗雷多·帕累托（1848-1923）接替了瓦尔拉斯的洛桑大学职位，在那里，他将瓦尔拉斯的分析扩展到收入分配领域。根据帕累托，如果劳动自由竞争，工资将达到它的最高水平，而且工会无法再有效地抬高工资了。

帕累托以帕累托最优概念闻名。像瓦尔拉斯一样，帕累托试图证明，完全竞争能达到最优水平的经济公正。此时，资源分配的改变无法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使任何人变得更好。

1848年，帕累托出生在巴黎，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法国人。他在意大利读书，在杜林大学毕业获得工程学学位。然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是一个工程师和两家意大利铁路公司的经理。由于没能筹措到足够的资金来革新一个制铁车间，他被迫辞职。他还在伦敦钢铁市场的投机交易中遭受了重大的损失。1892年，他开始从事第二个职业，成为一名经济学教授，并在洛桑大学接替了瓦尔拉斯的工作。

1889年，41岁的时候，他与俄罗斯女伯爵埃利斯安德瑞娜（Alessandrina）结婚，人们称她黛娜。十年后，他从一个叔叔那里继承了超过二百万金里拉的遗产！然而，这也是痛苦的一年。帕累托成了一个独立的富豪之后没多久，女伯爵就为了一个年轻仆人离开了他。两年后，帕累托遇到了一个二十二岁的法国女人简·罗吉斯（Jeanne Regis），他们住在一起。

1911年，帕累托辞去他的教席，退休回到日内瓦湖畔的住所，在那里人们都称他是“塞里尼(Celigny)孤独的思想者”而闻名。他1923年去世（Busino 1987:799-804）。

帕累托难以预见的观点

帕累托的政治观点是难以捉摸的。早年，他是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者。亚当·斯密社的创建人，他激昂地为支持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工业补贴而战。根据帕累托，社会立法无疑会浪费财富、阻碍经济增长。只有增加生产可以帮助工人阶级。在他的一生中，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和积极的意大利政府批判者。他经常公开批判贸易保护主义和军国主义，认为这是自由的两个最大敌人。

晚年，当他由经济学转向社会学时，他看起来并不喜欢民主自由。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是一个失败的商人、投机家、丈夫或者是由于他继承的财富。

帕累托的精英理论：狮子和狐狸

不管怎样，他为社会主义感到兴奋。根据帕累托，社会主义能调动更多的热情，因此，比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更为有效。这位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偏离得太厉害了，他甚至宣称，一个计划的社会经济将得到与市场经济同样的结果。显然，这与他早期支持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矛盾。

在他最著名的著作《思想与社会》（1916）中，他发明了这个词“精英”来描绘少数统治者。根据帕累托的精英理论，社会在一种“狮子”与“狐狸”统治者的轮回中前行。

一个国家由通过武力获得权利的狮子创立，然后由官僚主义的狐狸稳定运行。最后，社会特征和道德力量恶化，需要另一只狮子起来夺取权利，重新建立社会的方向感。帕累托的社会学被指责为原始的。1923年，临近帕累托生命终结的时候，墨索里尼政府任命他为意大利参议院议员，但他婉拒了。

埃奇沃思——绝非无关紧要（indifferent）！

弗郎西斯 Y. 埃奇沃思（1845-1926），爱尔兰出生，牛津大学教授，《经济学杂志》的长期主编，是这经济三巨头里的第三位。像马歇尔一样，他是一个工具制造者。马歇尔创造了供给需求曲线、消费者剩余和弹性；埃奇沃思建立了无差异曲线、效用函数以及埃奇沃思盒形图原理，一种表示两个个人或国家间各种交易关系的方法。（它被命名为埃奇沃思，但实际上是由帕累托最先画出的。）

弗郎西斯 Y. 埃奇沃思1845年生于爱尔兰，有一个英国父亲和一个西班牙母亲。他的出生地是伊莉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他的祖先建造的埃奇沃思城。他的祖先们由于有很多妻子而声名狼藉。他的曾曾祖父结婚三次，他的祖父，理查德，结婚四次，有二十二个孩子。弗郎西斯 Y. 埃奇沃思结婚……一次也没有！他终生独身。埃奇沃思将之归咎于平均数原则。

埃奇沃思有照相机般准确而持久的记忆力，老年的时候仍能背诵弥尔顿、蒲伯、维吉尔、荷马的大段诗句。他通晓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这得益于他的爱尔兰、西班牙和法国祖先。1869年他准备从牛津大学毕业，据说，最后他要回答一个生僻的问题，“我应该回答的简洁些呢，还是应该长些？”然后，他回答了半个小时。

1891年，他成为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的德拉蒙（DRUMMOND）教授，同时成为《经济学杂志》的主编。此后的三十五年，他一直在这个职位上，直到1926年去世。他最大的贡献是1881年发行的《数学心理学》。高大的，衣着光鲜的，有一个长鼻子和修剪整齐的尖胡子的埃奇沃思据说是一个心不在焉的教授和羞怯的教师。一个学生这样描述他的课：“好几个小时之后……他终于使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这可真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摆动着他的胡子，嘀咕着听不到的话语。他似乎处于一种狂喜的状态”（Harrod 1951:373）。他喜欢使用长长的拉丁文似的词汇。“首都的天色很昏暗么？（Was it very caliginous in the Metropolis?）”他有次在万灵门（All Souls' Gate）问 T·E·劳伦斯。劳伦斯回答道，“是有点昏暗，不过并不完全让人心情沉重（Somewhat caliginous but not altogether inspissated）”（Newman 1987:86）。

亚当·斯密以书和朋友填补他的单身生涯；埃奇沃思没有什么财产——“几乎没有家具和陶器，甚至没有书籍（他喜欢去附近的公共图书馆），没有适合他自己的信纸、信封和邮票”（Kenyes 1963: 237）。

埃奇沃思非常聪明，据说，“瓦尔拉斯用了150多页才提出了消费者交换均衡的一般体系；维克塞尔用了20页完成了这个工作；而埃奇沃思只在一个脚注里就完成了！”（Gradlund 1996[1958]: 195-96）。

福利经济学的障碍

瓦尔拉斯、帕累托、埃奇沃思的著作最初发扬了亚当·斯密的有利资本主义观点，但是其不现实的假定使它很难持续为自由市场辩护。在奠定福利经济学基础几年后，瓦尔拉斯和帕累托都发现他们正在背离斯密的观点。

帕累托最优的问题是他忽视了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替代（trade-offs）。不损害其他人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政策是很少的。开放贸易，废除补贴，取消产业管制可以帮助一些人但伤害其他人的利益。取消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关税可以创造新的工作——但是这也会毁掉许多传统工作。这是混合经济必然的特征。最终效果毫无疑问是有利的，但是转换过程也许就不满足帕累托最优了。

欧洲的模式跨越大西洋得以传播

被埃奇沃思、帕累托和瓦尔拉斯的数学魔法强化了的马歇尔的新古典原理，跨过海洋传播到了美国，那里的人们也发展了自己的经济观点。约翰·贝兹·克拉克和法兰克·费特这些美国的经济学家们为马歇尔建造的房屋作了显著的补充和改进。它还受到偶像破坏者托尔斯坦·凡勃伦引领的一群新制度学派的怀疑论者们的挑战。美国经济学是第九章的主题。

插图及图表注解

P195

照片8.1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82）

“我反对顺从任何人的思想，不论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还是亚当·斯密或是亚里斯多德”

感谢马克·布劳格提供

P196

插图8.1费边窗

来源：（Dobbs 1964）.感谢瓦瑞塔斯基金会提供

P203

照片8.2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

“有谨慎、卖弄学问和吹毛求疵的倾向”

感谢剑桥大学马歇尔图书馆提供

P206

插图8.1

马歇尔的守护神

“一个工人的肖像”

经剑桥大学马歇尔图书馆授权翻印

P211

照片8.3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

“无能者贫困，懒惰者饥饿，是最大程度最有远见的善行。”

感谢赫尔顿-格蒂档案馆提供

P216

照片8.4

里昂·瓦尔拉斯（1834-1910）

他抱怨说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个阶段：“在一个阶段，我是一个疯子，在另一个阶段，每个人都在我之前做出了我的发现。”

感谢瓦尔拉斯——帕累托中心提供

P218

照片8.5

维克弗雷多·帕累托（1848-1923）

“塞里尼孤独的思想者”

感谢瓦尔拉斯——帕累托中心提供。

P220

照片8.6

弗朗西斯·耶斯达罗·埃奇沃思（1845-1926）

“我应该回答的简洁些呢，还是应该长些？”

感谢马克·布劳格提供

第九章 到西部去，年轻人：美国人解决了经济学中的分配问题

本章音乐选段：安东尼·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

在美国，对经济学的宽容处理是必要的未来经济学发展的出色的例子。
——英国经济学家C·F·巴斯塔布尔（C.F.Bastable）1894

（Dorfman 1949）

欧洲经济学派——在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的追随者们——在边际原理发现后对经济学作出了重大突破。欧洲学派将这一原理用以衡量资本主义体系中商品和服务的价值：X的价格由消费者对追加单位的X的价值评价决定，边际供给和边际需求构成了企业生产决策和消费者消费决策的基础。

但是，分配问题呢？地租、工资、利润和利息收入由什么决定？边际原理是否适用于地主、工人、资本的收入决定？

资本主义作为商品和服务的有力生产者，还具有不可超越的经济增长动力而总是被赞颂。但是，它对财富和收入的不公平分配总是受到严厉的批评（来自马克思和穆勒）。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吗？

解释收入分配基本问题的担子就落到了美国经济学家的肩上，特别是约翰·贝兹·克拉克。二十世纪初，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富活力的经济体，美国经济学界也开始变得出色。本章，我们将讨论美国对于欧洲边际革命的反应和美国经济学家对科学经济学、特别是在工资、地租、资本理论领域的贡献。

二十世纪最出色的学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贝兹·克拉克，康奈尔和普林斯顿的法兰克·A·费特，威斯康星大学的理查德T.伊利还有建立了制度经济学派的托尔斯坦·凡勃伦。

应当说，美国经济学家更多的是这一新建筑的改建者而非创造者。像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写到的那样，“美国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哲学观点”（1988[1848]：429）。然而，运用在欧洲发展起来的边际原理，他们能够解决多年悬而未决的谜题——所谓的经济分配问题。

亨利·乔治提出“土地问题”

首先，让我们讨论对土地问题的争论。十九世纪末地租和地主的作用在美国是很有争议的问题。马克思自己都写到，“似乎没有比从地租、土地所有权开始更为自然的了。因为这是与土地相关，而土地是所有生产和生存的源泉，它们也与不论在何种程度定居的社群中都是第一生产方式的农业息息相关”（Marx 1911：302）。

处理土地的经典理论是古老的李嘉图地租理论。根据李嘉图，土地是固定的不可再生资源，地租是“自然的赠予”，因此，国家可以对土地征税甚至没收土地而不影响农作物或农产品的边际成本。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依据他父亲詹姆斯·穆勒的观点写到所有“不劳而获的地租的所有未来增值”都可以被征为税收而不造成危害。

在美国，土地的价格经常猛涨，产生了一群受人鄙视的看似不劳而获的地主。亨利·乔治旧金山的记者和社会评论家，利用土地价格的起伏写了有力地反对地主的作品并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追随，被称为单一税运动（single tax movement）。乔治的运动可与十九世纪所有其他的政治或宗教组织相媲美。

乔治多彩过去

谁是带来如此坚决忠诚的人？亨利·乔治（1839-97）出生在费城——“贫穷、没有征兆、不为人知”——死于纽约市——“举行了纽约市所见证的最隆重的葬礼”（Andelson 1992：1）。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水手和探矿者，到了旧金山后成为报社的记者、编辑、发行者。1879年在加利福尼亚，他写出巨著《进步与贫困》。主流的出版社拒绝了他的手稿，所以他自己印刷了500份。在他辩论风格的书中，乔治瞄准了资本主义体系唯一的一个缺陷，这一缺陷如果纠正了，会解决贫困和整个世界的经济问题。这一缺陷是什么呢？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或资本家，而是土地的垄断。地主使所有罪恶的根源。

引用《进步与贫困》中著名的一段话：“我们已经描述了财富的不公平分配，这是现代文明对土地私有制的诅咒和威胁。我们已经看到，只要这一制度存在，就不会生产力增长能永久地利于大众的；而相反地，一定会更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处境”（1942[1879]：

乔治的唯一解决方案：土地价值税

乔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简单的：“我们应使土地成为公共财产”（1942：328）。怎么做呢？不是像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通过征收土地或土地改革。而是通过100%的土地价值税。政府应当征收与未开发土地价值的税收或建筑地租相等的税收。每一个地产所有者都将根据地租价值按月缴纳租金税。不对改良或建筑征税，乔治承认这会扭曲和减少生产。更有效的，土地税必须完全的基于“纯经济租”征收。

这种土地税的影响是什么呢？引用一个赞同者的话：“这必然会消除持有土地的投机收益，压低土地价格，并通过保证每个人都能使用便宜的土地，而有效地恢复边境？”。这会增加边际产品，提高实际工资，促进建筑和生产发展。同时，所有其他的税都会被取消”（Andelson 1922:3-4）。乔治这样构想，100%的土地税意义极端重大，以致所有其他的税——收入、销售、资本所得、遗产、进口税——都会被取消，也许专利和印花税除外。

乔治将他的简单的解决方法称为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经济学和社会学家们高尚梦想的联合（George 1942:xvii）。他说，这会减少贫困和失业，以及熨平繁荣——衰退的经济周期。

乔治环绕世界的游说活动

亨利·乔治如此确信他找到了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以致他开始了长达20年的环绕世界的游说活动。造访了纽约、爱尔兰和澳大利亚。每到一地，他都将当地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地主，而不是过多的人口，自由贸易或者资本主义。不用说，乔治传递的信息被很好的接收了，特别是在那些土地价格显著增长而市民们正在寻找替罪羊的地区。

乔治成了民族英雄并受到许多杰出市民的支持。1886年他竞选纽约市长屈居第二（他的支持者认为其中有诈）。1897年他第二次参加竞选，但在选举前五天中风去世。

支持者从温斯顿·丘吉尔到孙中山

多年来，乔治主义者发现他们领袖的观点受到了从政治家到理想主义者们的广泛支持。包括温斯顿·丘吉尔（“这一罪恶的过程[土地垄断]打击了工业活动的每一种形式”），列夫·托尔斯泰（“亨利·乔治的伟大思想……具有无可辩驳说服力，而且，最重要的，它是那么简单”），中国的孙中山博士（“亨利·乔治的教导将是我们改革计划的基础”）（Andelson 1992:2）。约翰·杜威，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崇拜地说，“世界上所有的社会哲学家，自柏拉图以来，能与亨利·乔治并肩的不超过十人”（George 1942:vii）。

单一税的批判

乔治主义者将这些批判归咎于精英当权者的阴谋（见229页的加框文字）。更理性的人会将其归咎于乔治脱离现实的经济学。

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反对亨利·乔治的单一税收计划是表现得很突出，特别是约翰·贝兹·克拉克，法兰克·A·费特，埃德温·塞里格曼（Edwin Seligman）和弗朗西斯·A·沃克（Francis A. Walker）（美国经济协会的第一任会长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院长）。

但是亨利·乔治的主要批评者是约翰·贝兹·克拉克，美国第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189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时候，克拉克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收入分配》，将边际效用原理扩展到土地、劳动和资本。克拉克从反对李嘉图的土地是不变的这一观点开始他的批判。“土地在数量上是固定不变的这一观点，”他写道，“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人们在经济讨论中不断遇到都感到厌烦的错误”（1965[1899]：338）。尽管地球上存在的土地数量确实是保持不变的，但像其他商品一样，用于销售的可用土地的供给量虽价格变化而变化。土地价格，像工资和资本品一样，是由它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在边际上”——根据它最有生产价值的用途分配（1965：346-48）。

克拉克严厉的批判乔治，认为如果对土地征税，会使资本离开土地而投向房产，因此导致有利于房产的错误的资本配置。埃德温·塞里格曼，克拉克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著名的税收专家，也认为土地税会有利于城市土地而使农用地处于不利地位。

政府抽取纯经济租，固定土地税被返还给地主。固定土地税使使用者不变地支付E点的价格，但是将地主留存的租金降低到E'。地主除了接受低回报外能做什么呢？这就为亨利·乔治的单一税提供了基本原理，这种税制的目标是为社会获取由城市化带来的增加的土地价值。

图9.1 萨缪尔森为亨利·乔治的土地税的辩护

来源：Samuelson and Nordhaus(1998:250)。在McGraw-Hill的许可下重印。

英国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卷入这场乔治的土地之争中。他争论到乔治的单一土地税会引起重大的社会剧变并带来着内战的风险。1884年，马歇尔在牛津大学的一次会议上遇到了亨利·乔治。在提问回答环节，马歇尔顽强的攻击乔治的“未经训练”的经济学，他在《进步与贫困》对节俭和勤劳的错误强调，以及他在地租上的社会主义观点。马歇尔一次又一次地重提关于地租的同样问题，乔治一直无法作答，这使牛津大学的学生听众们又高兴又丧气。（Groenewegen 1995:583-86）。

但是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反对乔治的单一税收计划。事实上，**保罗·萨缪尔森**，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受欢迎的教科书《经济学》中再三赞扬乔治以及他的单一税收计划。“**对纯经济租征税不会引起扭曲或者无效率**”他总结道（Samuelson and Nordhaus 1998:250）。图9.1重印了一幅表现纯地租的所谓效率的图形。

其他经济学家并不赞同。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穆雷·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警告说乔治倡议对地租征的税会大幅度的减少未使用的(投机性)土地，而导致过度拥挤和过度使用。根据罗斯巴德，乔治主义者没能理解市场在培植稀缺资源时的作用和未使用土地的益处。对未开发的土地征收巨额税收会导致市中心的过度拥挤，鼓励投资者减少空地，建造更高的大厦以最小化地租（Rothbard 1970:91-100）。

本质上，美国的经济学家，从约翰·贝兹·克拉克到穆瑞·罗斯巴德，都曾经论述过边际原理确实适用于土地。土地的总量是固定的，但是可售土地的价格是由购买者和销售者的边际数量决定，是不固定的。地租和土地价格帮助投资者将稀缺资源（土地）配置给社会最有价值的用途。地租控制和收缴土地税只会扭曲土地使用。

乔治说，那是一个阴谋！

为了阻止亨利·乔治，逐利者们雇用教授们去腐化经济学，并阻止民主对话。这一被腐化的经济学一直延用到现在。

——麦森·加夫尼（Mason Gaffney）（1994: Cover）

“亨利·乔治必须被制止！”激励税收中心的主任弗雷德·哈里森（Fred Harrison）在他与人合著的阴谋史《经济学的腐败》（1994）中这样开场。他和他的合著者，加州大学利佛塞德的经济学教授麦森·加夫尼提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言论，“政治精英们”图谋使十九世纪极受欢迎的社会改革者缄默。他们怎么做呢？通过收买经济学教授发表反对乔治的言论！同时，这使得乔治的主要对手——卡尔·马克思——得以在全世界传播他的学说。这所谓反对乔治的阴谋被贴上了“科学知识发展史上最可憎的事之一”的标签。（Gaffney and Harrison 1994:7）。

根据加夫尼和哈里森的观点，如果不是因为这一阴谋，亨利·乔治会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并成为一位民族英雄而不是经济史上无名的异端。

尽管有这样巨大的秘密联谋，乔治主义者们仍称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书籍，它被译为二十五种语言，销量仅次于《圣经》，超越所有其他书籍！（不必在意，和《圣经》一样，《进步与贫困》经常被赠送或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出。）

阴谋的理论充斥于整个历史，为满是坚定信徒且组织严密的政治和宗教组织所拥护。亨利·乔治的追随者们使之适合于经济学。

乔治使社会主义者激动起来

有趣的是，乔治最大的影响与他所追求的相反：许多他的听众如此相信他的花言巧语，最后他们转向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伟大的英国剧作家乔治·伯纳·萧说，在听了乔治的演讲后，他走上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费边社的领袖西德尼·韦伯指出，“尽管并非亨利·乔治先生所愿，毫无疑问的是《进步与贫困》的大量发行带来了一种触动，而它导致所有激烈的影响体现为普遍的社会主义运动”萧伯纳补充道，“大量的年轻人，穆勒、斯宾塞、孔德（Comte）、达尔文的学生们，受到亨利·乔治先生的《进步与自由》的鼓舞，扔下了进化和自由的思想，沉溺于暴力经济学并研究卡尔·马克思”（Hill 1997: 65）。但是卡尔·马克思，听说了乔治的税收规划后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防线。”

克拉克的生产力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劳动剥削学说对立

克拉克在土地上应用边际原理还仅仅是个开始。边**际革命在美国的第二大成就是约翰·贝兹·克拉克边际劳动生产力理论**。这一有争论的理论与认为工资不会在生存水平上永远上涨并认为资本家不公平的分享劳动产品的主流的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反。

约翰·贝兹·克拉克（1847-1938）是美国第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原创理论经济学家，给他带来这一声誉的是他的**工资理论**，他称之为“竞争分配定理。”1847年，他出生在普罗维登斯，罗德岛州一个严谨的清教徒家庭，并在阿姆赫斯特学院学习伦理学、哲学和经济学。他为经济学而着迷，但是由于美国在这一领域没有研究生院，他在欧洲度过了接下来的两年。在那里，他在卡尔·克尼斯的引导下接触了德国历史学派。在国外的時候，他遇到了一位美国同事，理查德·T·伊利，美国经济协会的创建者（AEA）（见234页加框文字）。我们回想一下，德国历史学派是完全集中于经验主义的研究而否认理论作用的（见第七章）。那么克拉克回到美国后做了什么呢？他几乎完全集中于理论写作！直到克拉克之前，美国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包括经验主义研究和社会改革。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系供职，从1896年到1923年（直到他的儿子，约翰·莫利斯·卡拉克接替他的职位）。在那里他写了他最著名的作品《财富的分配》（1899年初版），包括了他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在他的一生中，他逐渐转变立场，一开始是一个社会改革者，后来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保守辩护者。他将他的最后的时间用于保护和平方面的著述，成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第一届主席。他1938年，在欧洲再一次爆发战争前一年去世。

克拉克解决了劳动经济学中的“分配”问题

克拉克转向保守主义毫无疑问的是因为受到了他的劳动经济学理论著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边际生产力观点。他在寻求解决一个麻烦的经济问题时提出了这一观点，这个麻烦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两个或更多联合投入的要素之间分配他们共同生产出来的产品呢？这个联合生产问题一直以来就被视为是无法解决的，就像要决定究竟是父亲还是母亲应该对婴儿负责一样。的确如此，威廉·配第爵士称，劳动是生产之父，土地是生产之母。马克思通过宣称劳动应得到所有的产品解决了这一谜题，但是这被证明是天真的想法且不能令其他同行满意。

在奥地利经济学家边际观念的基础之上，**克拉克开创性地提出每种投入贡献它的边际产品**。本质上说，他认为在竞争条件下，**每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根据其占总产品收益的“价值追加”或说其边际产品而得到支付**。克拉克将他的竞争分配理论称为“公正”的“自然规律”（Clark 1965:v）。“换句话说，自由竞争给工人劳动所得，给资本家资本所得，给企业家协调生产功能所得”（1965: 3）。

图9.2重印了克拉克的图形，表明了工资如何等于追加进劳动力的最后一个工人的边际产品。因此，如果工人有更高的生产力并为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增加了更大的价值，他们的工资就会提高。如果一个行业的工资提高了，竞争会迫使其他雇主提高工资，因此“工

资会等于边际劳动产品”，或最后一个工人所得的支付（Clark 1965:106）。

平均工资水平（DC）由边际产品（AB）决定。公司不断增加工人直到边际产品等于工资。

图9.2 克拉克的边际工资理论

来源：Clark(1965:198)

谁应该得到约翰·贝兹·克拉克奖

约翰·贝兹·克拉克在多种意义上都是一位经济学元老。

——约瑟夫·道夫曼 (1949: 205)

约翰·贝兹·克拉克奖是经济学界很受欢迎的奖项，但要得到它，经济学家必须早早开始发表作品。它两年才发一次，给那些最出色最多产的四十岁以下的美国经济学家。第一份奖于1947年，约翰·贝兹·克拉克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颁出。获得者是保罗·A. 萨缪尔森，麻省理工的“神童”教授，美国新凯恩斯学派的带头人。其他著名的获奖者有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托宾、肯尼斯·阿罗、罗伯特·索洛、加里·贝克尔、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保罗·克鲁格曼以及劳伦斯·萨姆斯（Lawrence Summers）。其他很多人也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米塞斯的仆役长：边际生产力提高所有人的工资

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将克拉克生产力理论进一步深化，证明提高劳动生产力对边际工人有利。实际工资不仅由于更高的生产力而提高，生产力保持不变的时候实际工资也会提高。米塞斯用仆役长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

在英国首相餐桌旁服务的仆役和曾经为皮特[皮特，威廉：(1759-1806) 曾任英国首相 (1783-1801和1804-1806年)，译者注]和帕默斯顿[帕默斯顿：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 (1855-1858和1859-1865年)，译者注]服务的仆役以同样的方式服务。在农业生产中，有些劳动仍使用几个世纪以前的工具以和几个世纪以前同样的方法劳作。然而，所有这类工人的工资比过去高得多。工资高是因为它们是由边际劳动生产力决定。雇主要留住这个仆役长，以防他到工厂去工作，就必须支付与在工厂追加的一个工人所能带来的产出增加相等的报酬。工资的增加并不是仆役长这个职位的任何功劳带来的，而是由于资本投入的增加超过了人手数量的增加。（Mises 1972: 88-89）。

克拉克和米塞斯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从两个方面削弱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首先，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证明，在竞争的条件下，大多数工人都得到与他对社会贡献相等的支付。第二，生产力没有增长的工人也可以从一般工人的边际生产力中得到收益。

克拉克为现状辩护

克拉克用他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为美国的工资率正名并批评工会不遵守这一“自然规律”而试图提高工资。例如，尽管他支持**劳工的骑士工业联盟（Knight of Labor）**，他坚信罢工的工人在任何可比的劳动市场上都应当得到普遍相同工资，倡导以强制仲裁的方式结束长期的劳动纠纷（Dewey 1987:430）。另一方面，克拉克反对垄断力量和大企业通过将工资降低到边际生产力以下来剥削工人。竞争的劳动市场和厂商市场对正当的工资和社会公正都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1914年，克拉克写了关于这个主题的作品，题为《社会主义之外的社会公正》。

克拉克的指示性的经济学受到了那些断言“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对现存经济秩序的辩护”的同行经济学家们的严厉批判（Stigler 1941:297）。特别是，托尔斯坦·凡勃伦将克拉克作为他抨击主流经济学体系的陪衬（见第十章）。但，克拉克将边际原理应用于劳动，仍有其影响。甚至马克思主义者也被迫改变他们基于劳动价值论上偏激的剥削理论。他们不能再要求工人被支付“他们所有的劳动产品。”现在，雇员们只有在工资低于边际

劳动产品的价值时才是受到了剥削（Sweezy 1942:6）。

奥地利的资本理论传到美国

到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美国经济思想中的劳动和地租。那么，作为第三种生产要素资本又怎么样呢？利率在资本市场上的决定性作用又如何呢？约翰·贝兹·克拉克和法兰克·A·费特都提出了资本和利率的重要性，他们主要依据的是奥地利学派的突破性著作。

在第七章，我们讨论了奥地利学派的贡献。基本上，门格尔和柏姆-巴维克反对将所有商品分成消费品和资本品的简单两部门古典模型。他们将消费品和资本品看成一个商品队列——第一阶(order)（消费品），第二阶（批发品），第三阶（制造品），第四阶（原材料）。本质上，奥地利学派强调所有的消费品和资本品都经历一系列的生产过程，从未完成的无用的产品到完成了的有用的消费品和资本品。

这就是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增长和资本极利率作用的观点：如果社会要取得物质进步，个人必须共同工作以促进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进程——通过在“迂回”生产过程中增加储蓄和投资，通过技术改进，通过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和生产力。这是利率起作用的地方。如果人们更多的储蓄和投资，利率就会下降，刺激更多的投资和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关键。但是，储蓄和资本投资必须是真实的——不是由国家的人为手段造成的。这就是奥地利的消息，门格尔、柏姆-巴维克、维塞尔是这一消息的传递者。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建立了AEA：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拒绝加入

我们将国家视作这样一种行为主体，其积极的援助是人类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AEA原则宣言(1885)

我必须战斗，而战斗时常是艰苦的。
——理查德·T·伊利(1936: 145)

什么？美国经济学协会，世界最大最富声望的专业经济学家组织，是由一个社会主义改革者创造的？

事实上，1885年，AEA的创建者是理查德·T·伊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激进的教授，一位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大胆的批评者和工会组织的热情推动者。伊利在创立计划书中大胆的宣称，“自由放任学说在政治上是不安全的，在道德上是不健全的”（Dorfman 1949:206）。他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引起了经济学界强烈的意见分歧，以致于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信奉社会进化论的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拒绝加入AEA。伊利放弃了AEA的原则宣言中的党派性言辞，最后于1892年辞去了AEA首席秘书的职务以解决国际争端。弗朗西斯·A·沃克，MIT的校长，曾经是内战时的将军，也因同样的原因辞去AEA首席会长的职务。（然而，萨姆纳始终没有加入。）

理查德·T·伊利(1854-1943)过着一种令人着迷的生活。他出生在纽约州北部，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像约翰·贝兹·克拉克一样到德国，师从德国历史学派的卡尔·克尼斯，在那里他成为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劳工的支持者。回到美国后，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改革者一起建立了AEA。最初，AEA不只是一个专业协会，而是仿效德国社会政策联盟（German Union of Social Policy）拥护国家实践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最先加入AEA的五十人中有二十人曾任或现任的牧师。但是来自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的反对迫使伊利辞职，从那时起，AEA处于学术中立的地位。成员迅速增加，今天已经超过了25,000。

1892年，伊利成为威斯康辛州大学的教授，在那里他越来越保守。然而，他因宣扬支持工人罢工和社会主义以及包庇从国外来的工会煽动者而遭到谴责。大学的官员们下令进行一次调查以确定他是否已经不适合他的职位了。在调查中，他否认这些指控，称它们是“卑鄙的残忍的诽谤”。“我坚持，”他说“即使社会主义被组织起来并实施，它也将停止进步并颠覆我们的文明”（Dorfman 1949:257）。几个星期后，大学以保护学术自由为由证明他无罪。

1900到1902年，伊利回到AEA并担任会长。他成为威斯康辛州进步运动的创建者之一，并对宗教改革组织越来越积极。在威斯康辛州大学经济系他还集中于劳动和土地经济学，这样的课题在那里还是很受欢迎。在完成自传《路在脚下》（1938）几年后，他于1943年去世。每年AEA年会上的主题演讲(feature lecture)都要署上伊利的名字。

“经济学元老”

经济史学家列奥纳德·阿灵顿(Leonard J. Arrington)记录下了他对1939年AEA费城会议上, 年长、温和的伊利的描述:

在那见到八十五岁的经济学元老理查德T. 伊利是我最大的荣幸。他1885年建立了美国经济协会……很早到达的是伊利, 他年轻的第二个妻子以及他的两个孩子, 最小的孩子只有五岁。我利用这个机会坐在他旁边, 觉得这是上天的赠与让我可以和这个矮小、面颊粉红、孩童面庞的, 影响了两代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的男人说话。经济学, 他写到, 应当作为市场经济的伦理指引。人, 而非机械的“市场法则”, 才应当是这门学科的着眼点……

当伊利知道我来自一个爱达荷农场时, 他谈起了灌溉和西部。猜测我是摩门教徒……他提醒我他写了一篇赞颂摩门教徒的文章, 1903年发表在《哈珀斯月刊(Harper's Monthly)》——第一篇由经济学家发表的关于摩门教的文章……伊利坚信宗教曾是并且会继续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Arrington 1998: 26)

AEA中的社会主义陈迹?

AEA的成员规划仍然包含着伊利的因素。AEA通过采取会费的价格歧视来实现一种收入平衡。年收入为\$37, 000或更少的成员每年支付\$56的会费, 那些收入在\$37, 000和\$50, 000之间的成员, 年会费为\$67。多于\$50, 000的每年支付\$78。学生一年只付\$28。

看看有多少经济学家谎报更低的收入类别以节约捐赠给AEA出版物的钱, 也许是很有趣的。《美国经济评论》敢报道这种信息吗?

克拉克和费特在资本和利息上的争论

克拉克以不同的方式看事物。世纪之交, 他在经济学杂志上与柏姆-巴维克的一系列争论中说道, 投资资本是一个“永久的储备”, 像一个大储水池, “此刻水从池子的这一端流入导致另一端的溢出”(Clark 1965[1899]:313)。

克拉克认为利率与资本存量相关。他认为“加大社会存量, 就降低了利率”(Clark 1895:277)。

法兰克·A·费特(1863-1949), 康奈尔和普林斯顿的经济学教授不同意这种观点。如果像克拉克所述, 利率依据投资资本存量的规模变化, 那么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将永远比瑞士和新加坡有更低的利率。显然, 一定有其他影响利率的因素。对费特而言, 这个其他因素就是时间偏好。费特是奥地利资本和利息理论在美国的主要拥护者。

费特1863年出生于印第安纳州乡下。入国立大学, 但由于家庭经济问题临时辍学, 进入商界在他的家乡秘鲁经营一个大书店。

经商期间, 费特贪婪的阅读, 并被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深深打动。这本书让他将经济学作为他毕生的职业。费特在印第安纳大学拿到学士学位并在康奈尔大学拿到硕士学位之后, 像克拉克和伊利一样去到欧洲, 1894年在德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与德国历史学派相比他更喜欢奥地利学派并成为美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主要解释者, 甚至于1927年, 他得到了卡尔·门格尔勋章。他成功的在印第安纳大学, 斯坦福大学, 康奈尔大学任教, 最后到了普林斯顿大学(1911年到1930年), 1912年被任命为美国经济协会的会长。1949年86岁时去世。

费特的开拓性贡献: 时间偏好利息论

费特创立了解释利率趋势的心理学方法。他称之为“时间偏好。”时间偏好意味着个人喜欢现实商品胜过喜欢未来商品。技术上, 他将时间偏好定义为“对现期和未来收入的欲望的心理力量均衡时的比率指数”(Dorfman 1949:363)。费特有时候写东西并不太明确, 要理解他, 我们这样看: 如果你可以现在得到一个\$10,000的礼物或者明年得到\$10,000的礼物,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显然, 你会选择现在得到\$10,000。但是如果是现在得到\$10,000而一年后得到\$20,000呢? 当然, 存在替代。你的决定取决于你的时间偏好——相对于一年后得到两倍的数量你如何评价现期持有货币的价值?

为补偿个人的时间偏好, 借款者付给储蓄者额外的费用或年利率。当然, 根据贷款的风险和期限会有不同的利率。(门格尔强调这一点。)但是费特争辩道贷款的市场利率是经济中一般时间偏好的反应——在什么样的利率下公众愿意储蓄多少。

为什么利率在战争期间会上升呢? 费特认为在对即时可用于战争目的的现实商品的需求, 时间偏好率急速增长。为什么通货膨胀时期利率会上升呢? 因为人们提高了他们的时

间偏好，相对于等到以后预期价格更高时再购买，人们增加了对现期商品的购买。同样，由于预期价格水平的变化，利率在繁荣期上升在衰退期下降。为什么A国的利率比B国的利率低呢？费特称，A国有较低的时间偏好而有更高的储蓄倾向；B国储蓄少而必须承受一个很高的利率以吸引投资资本。

费特并不同意奥地利学派宣扬的所有学说。例如，他不同意柏姆-巴维克的利率也受资本生产力影响的观点。费特的利率理论只强调时间偏好，他认为“现时商品通常比未来商品更有价值”（Fetter 1977: 173）。但是柏姆-巴维克的论点不能全盘否定。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很有可能对利率有间接影响。在热衷于高资本集中度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国内外的投资，利率通常是非常高的。然后，当国家更为发达，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生活水平时，利率通常会下降。为什么呢？因为高收入高生活水平的国家趋于有更高的储蓄率，而稳定的储蓄供给的增长会使利率下降（假定资本需求保持不变）。甚至费特也承认，根据穆瑞·罗斯巴德的观点，“当经济进步，更多的现期商品被生产出来的时候，对现期商品的偏好就会降低，利率因此可能会被预期下降”（Fetter 1977: 16）。因此，经济增长和生产力间接影响时间偏好程度和利率。

美国人做出了另一个开拓性的贡献： 世界第一的经济研究中心

通常被我们叫做“社会科学”的应当更为社会化，也更为科学化。

——威斯利·C. 米切尔（Wesley C. Mitchell）
（1953: 11）

今天，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在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的有力领导下，出版了来自500多所大学的教授的最优秀的经验性研究成果。NBER听起来像一个政府机关，但不是——它是一个“私人的、非盈利的、无党派的研究组织”，由美国商业协会于1920年1月在纽约建立。（今天位于麻萨诸塞州的剑桥。）这一研究机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陷入了财务危机，但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企业财团以及政府拨款的援助下，在战后时期存活并繁荣起来。

NBER从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一个保守的商人的争论中建立起来

这一客观的研究组织背后的思想来源于内姆·I. 斯通（Nahum I. Stone）和马尔克姆·罗蒂（Malcolm Rorty）之间激烈的争论。内姆·I. 斯通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他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尔克姆·罗蒂是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工作的保守的工程师。斯通提倡最低工资法案而罗蒂反对。在争论中，问题出在工人与地主间的收入分配上。斯通和罗蒂只能在一件事情上达成共识：对于没有偏见的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组织的迫切需要。斯通建议一个研究团体代表经济学中的各种流派，从极端保守到极端激进的所有经济学派，并且代表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利益组织，包括工会，农业以及商业。一战之后，罗蒂辞职并组建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最后成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R的第一任主席：一位绅士，学者和运动员

NBER的第一个主席极适合这一职位。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威斯利·C·米切尔（1874-1948），是从一个极端的托尔斯坦·凡勃伦到另一个极端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人人尊敬喜爱的经济学家。与这本书中大多数性格古怪的人物相比，他看起来就像个圣人。他是一个基督徒，喜欢诗歌和科学；他与另一位大学教授婚姻幸福，他们有四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和很多的孙子，孙女；他一生都喜爱运动；他干零活很熟练，并且是个细工木匠。他患有心脏杂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他在芝加哥大学（他在那里获得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医生告诉他只能再活一年了，结果他一直都很健康的活到1948年（死于心脏病）。他是一位捍卫很多事业的社会改革家，包括妇女选举权，种族平等，教育，救助难民。他还一度教过一班年轻人木匠课。

接任NBER主席的人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这样描写他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米切尔的生活是宁静的，从容的，和谐的。他劳逸结合，广泛阅读古典书籍同时并不忽视侦探小说，自由地练习他的高尔夫球技和木匠活，喜欢在餐桌上快乐敏捷地应对，总是以恰当的评论和诗词使谈话变得生动”（Burns 1952:51）。

米切尔有四个名字

深入挖掘，我们发现米切尔有一些奇怪的特征。他兴致勃勃地吸烟（吸烟斗）只因为欧文·费雪禁烟。他款待凡勃伦因为他冒犯了如此众多的保守者。作为一个严格守时的人，米切尔从1905到1948年每天记日记，“所以这样，我能看到我每天是否浪费了我的时间，以后就不会那么做了！”（Burns 1952:74）。他有三个昵称：他的妈妈叫他邦尼（Bonnie），他的妻子叫他罗宾（Robin），他的朋友叫他克莱尔（Clair），他正式地签署的名字是威斯利·C.米切尔。

一些温和的批评家说首字母“C”代表“折衷”（Compromise）。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不知姓名）称，“米切尔在所有错误的事物里看到了一丝真理（a grain of truth）。”米切尔幽默地回复，“这句话里面有一丝真理！”（Burns 1952:81）。温和的米切尔能包容缺点但讨厌学术与研究的分割。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同事约瑟夫·道夫曼说米切尔从来没有说过别人的坏话。在NBER，他认为有各种人生观的聪明人，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都应当在客观数据的基础上“和谐的工作”，从而使理性战胜感性（Burns 1952:31）。

一个固执的研究者

米切尔写了一部题为《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s）》的详尽著作（1913），这构成了他在NBER小心谨慎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根据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米切尔的“伟大天才”是他将大量的数据“有序地、透彻地、有意义地”整理在一起的能力（Burns 1952:243）。

米切尔将很多著名的研究员聚集在他身边，包括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阿瑟·F·伯恩斯（Arthur F. Burns），杰弗里·莫尔（Geoffrey Moore）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坚持要求最高的一丝不苟的研究标准。这些研究者中我最喜欢的是弗瑞德瑞克·C·米尔斯（Frederick C. Mills），他创建了一个“奥地利学派”的时间结构经济模型（更多的细节参见12章米塞斯的部分）。在米尔斯的工作之前，NBER几乎完全集中关注一般价格指数而很少或根本不讨论原材料，资本品以及批发零售市场之间的价格差（price margin）的变动。Mills搜集分析生产各阶段的独立价格指数，然后证明这些阶段间相对价格的变化对于经济周期是至关重要的。他注意到在远离最终消费以及零售阶段的价格更不稳定，因此，显著地影响了经济萧条和恢复阶段的相对利润差和生产决策。《萧条与恢复期的价格》（1936）将这一开拓性的方法应用于1920-1936年间美国经济的繁荣——萧条时期（Skousen 1990:58-60）。

没有理论的人

如果米切尔能被挑剔，那一定是因为他的理论缺失。在他一生对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中，他努力隐藏自己的信念并反复强调NBER的研究是摒弃个人偏见的。他怀疑演绎推理，坚信所有的理论都需要验证，“以归纳性研究验证和纠正”（Mitchell 1953:11）。当然，理论不能被忽略，但是NBER，这个最大的“寻求事实”的机构，决定去检验他们的正确性。

基于他的统计研究，1947年AEA授予米切尔第一届弗朗西斯·A·沃克奖。他十个月后来去世。

总结：经济学随经济发展而前行

马歇尔和他的美国对应者们的工作对于正式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新科学非常有效。美国经济学家，特别是约翰·贝兹·克拉克和法兰克·A·费特，将边际革命扩展到生产要素和收入分配的问题之中。

由于“新古典主义”的构建接近完成，学术殿堂里就涌出了对新资本主义模型意义的批判。这种分析将来自大西洋两岸，首先来自异端的美国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然后是来自德国的经济学家马克思·韦伯。他们两人都将会成为社会学这一新领域的著名人物并帮助创建经济学的全新学派，制度学派。这是第十章的主题。

插图及图表注解

P225

照片9.1

亨利·乔治（1839-1897）

“世界社会哲学家中最伟大的美国思想家”（Andelsen 1992: 1）

感谢Robert Schalkenbach基金会提供

P230

照片9.2

约翰·贝兹·克拉克（1847-1938）

“自由竞争给工人劳动所得”

感谢布朗兄弟提供

P234

照片9.3

理查德·T·伊利（1854-1943）

“这个矮小、面颊粉红、孩童面庞的，影响了两代经济学家”

感谢马克·布劳格提供

P237

图9.4

法兰克·A·费特（1863-1943）

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感谢马克·布劳格提供

P239

照片9.5

威斯利·克莱尔·米切尔（1874-1948）

没有理论的人

感谢NBER提供

第十章 出众的凡勃伦对**抗争**的韦伯： 两位批评家对资本主义含义的争论

本章音乐选段：克劳德·德彪西，风与海的对话，选自《大海》

托尔斯坦·凡勃伦是美国社会思潮所产生的最富创意的头脑

——马克思·莱纳 (Max Lerner) (Diggins 1999:

214)

有个人的研究我非常的赞同。如果重新开始，我将仰仗他的理论。我所指的当然就是，马克思·韦伯。

——弗兰克·奈特 (Frank Knight) (Swedberg 1998: 205)

二十世纪初，由于欧洲和美国的边际革命，一个全新的经济模型已经形成。亚当·斯密和古典经济学家奠定了基础，但经过另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才完成了这一工作。现在是时候退后一步好好端详一下这一崭新的现代资本主义模型了。

像托马斯·卡莱尔和卡尔·马克思这样的批评家对亚当·斯密构建的体系进行抨击，但是那只是在边际革命以前。该做第二次研究了，这个任务落在了两位社会经济学家的肩上——今天他们被称为社会学家——仔细检查新构架的意义。他们是美国的托尔斯坦·凡勃伦和德国的马克思·韦伯。

托尔斯坦·凡勃伦：不同的声音

首先，让我们讨论凡勃伦。资本主义新理论的主要挑剔者和检查者是托尔斯坦·邦德·凡勃伦(1857-1929)。曾在十个机构任教，包括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他几乎没有使用新古典主义模型的理性——抽象——演绎的方法。事实上，他一直也没有建立过一个正式模型。相反，他研究资本主义体系的制度框架以及它怎样推进并且冲击人们的生活和文化。在此过程中，**他创建了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经过威斯利·米切尔，约翰·R·康芒斯 (John R. Commons) 以及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 (John Kenneth Galbraith) 历时多年。在很多方面，凡勃伦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学家然后才是经济学家。他首先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之后才是新理论的创造者。

凡勃伦的生平，经济学中的奥斯卡·王尔德

凡勃伦离奇的一生在很多方面都比他写的书有趣多了。没有其他经济学家在古怪，异常的行为上能与他匹敌。一方面，他是芝加哥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的主编，而且是唯一被允许在芝加哥大学就社会主义演讲的人。他是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然而经常穿戴得像一个流浪汉一样，穿着灯芯绒的裤子，戴着一顶浣熊皮帽子。他在斯坦福大学教书，但因绯闻被开除。他被看成是一个天才的怪人，穿衣邋遢的人，声名狼藉的放荡公子。

凡勃伦比起其它经济学家来，加入了更高级的机构并任教或演讲。

1. 卡尔顿大学 (明尼苏达州北地市的宗教研究所)
2. **魔诺那学院 (Monona Academy)** (魔诺那, 威斯康辛州)
3.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巴尔的摩, 马里兰州)
4. 耶鲁大学 (新哈芬, 康乃狄格州)
5. 康奈尔大学 (伊萨卡, 纽约州)
6. 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 伊利诺斯州)
7. 哈佛大学 (剑桥, 麻萨诸塞州) (只演讲)
8. 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 加利福尼亚州)
9. 密苏里州大学 (哥伦比亚, 密苏里州)
10. 新社会研究学院 (纽约, 纽约州)

作为第一代挪威移民的第六个儿子，托尔斯坦·凡勃伦成长在威斯康辛州一个的农场，只说挪威语。七岁，全家迁移到明尼苏达州。他进入明尼苏达州北地市的卡尔顿大学，在那里师从约翰·贝兹·克拉克。克拉克认为托尔斯坦是一个敏锐的学生，尽管他因写作关于食人者和酒鬼的文章并违反严格的学生行为规则而背负“知识界和平的扰乱者”的恶名（Jorgensen 1999: 20-22）。讽刺性的，克拉克毕生对凡勃伦的赞赏有加，但是凡勃伦把最严厉的批判留给了由克拉克协助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学。

女人们总是围绕在凡勃伦身边，特别是他因著《有闲阶级论》出名以后（1994[1899]）。他的这种吸引力相当令人惊奇，因为这个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人，从来不铺床，极少刷牙并且是个烟鬼。不知何故，她们发现他是有才气的、危险的、刺激的。他被描述为“高大的、强壮的、英俊的”（Jorgensen 1999:4）。他，反过来也喜欢女人，还被看作十九世纪最早支持男女平等的人之一。他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在入卡尔顿大学的时候和艾伦·罗尔夫，第二次是和比他小二十岁的“宝宝”贝文斯。他还有性流氓的恶名，和许多学生以及其他教授的妻子关系暧昧。这就是他从来不会在一个机构待太久的原因之一，他因性出轨事件而被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开除。

离开卡尔顿大学之后，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待了一个学期，然后转到耶鲁大学，并在那里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但是在这一新的边际主义竞技场上，这位新的哲学博士发现他是这世界的边缘人物，1884年到1891年他都没能找到工作。一个原因就是他在大部分学校都还是教会直属的时代持宗教怀疑论。另一个因素就是他的健康状况；他患症疾病倒了。在这期间，他先靠他的家庭过活之后又靠他妻子的家庭。他的哥哥说到，“他阅读、游荡，第二天游荡、阅读”（Heilbroner 1992:214）。

当接受了康奈尔大学的职位，并与J.劳伦斯·劳克林（J. Laurence Laughlin）之后，他的事业转折点到来了。当劳克林得到约翰·洛克菲勒新建立的芝加哥大学的主任职务时，他坚持要把凡勃伦带去。

凡勃伦从来不喜欢在一个一方生活太久，芝加哥大学也不例外。对他而言，这个多风的城市太大了、太难于控制也太丑陋了。他认为自己比年薪\$7,500的系主任更聪明。而凡勃伦的年薪只有\$1,500。

凡勃伦只给了C等！

凡勃伦教授一门关于社会主义的课程，但是他的教学方法是奇怪的。一心想被选入联谊会[Phi Beta Kappa联谊会：美国大学优秀生的荣誉组织，成绩优异者有望被选入，译者注]的学生们都很气馁，因为他拒绝给学生比C高的成绩。一个学生把他描述为“一个极度糟糕的家伙，他从来不考试，然后在课程结束的时候他会说经我们的允许他将给我们每个人记‘C’的成绩以迎合大学生活的形式需要……他老是把面颊埋在手心，或者以一些类似的姿势，用一种低沉的、平稳的完全最无趣方式说话，这本身就是一种最无趣的讲课和引导课堂的方式”（Dorfman 1934: 248-49）。另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将凡勃伦描述为性格阴暗、衣衫褴褛的人，看起来好像前一天晚上没睡过觉，语言带着辛辣的嘲讽：“一抹冷笑缠绕在他唇间，忧郁的魔鬼跳跃于其眼中”（Jorgensen 1999:7）。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

在芝加哥大学，四十二岁的时候，凡勃伦写出了他的畅销书《有闲阶级论》。1899年初版，它意图成为对世纪末美国有闲阶级的社会讽刺。没有使用任何注释和研究，他必须向出版商提供应付任何损失的担保。他曾经说他的思想来自他的父亲，他认为他的父亲是一个有深度的思想家，尽管老凡勃伦将自己的名字签为X（Jorgensen 1999:9-10）。

《有闲阶级论》的反响

《有闲阶级论》的反响是混合的。许多经济学家并没由认真看待这本书，他们谴责凡勃伦的学问作的懒懒散散，意图不良，而且论据都没有出处。他写作的风格愚钝。一个同时代的芝加哥人说，“我祝贺他并问他是否想把它翻译成英文。”但是另一个评论家说那“像是某种酒，对于初试者，要么味道不佳要么很奇怪，但是一旦熟悉了，那就是浓烈的、辛辣的、美好的”（Jorgensen 1999:73-74）。

门肯对啰嗦的凡勃伦的啰嗦的评论！

为说明一张邮票可能告诉了我们什么，他在书中用了超过一页的篇幅。

——H·L·门肯（H. L. Mencken）

(1982: 271)

H. L. 门肯，《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著名社会评论家，认为“荒谬的”凡勃伦不怎么样。1919年，他苦恼于铺天盖地的凡勃伦的书籍、凡勃伦的小册子，凡勃伦的俱乐部甚至凡勃伦的女孩们。门肯回顾《有闲阶级论》，抱怨凡勃伦的“难以理解的推理……这位有知识的先生的冗长的，罗嗦的以及……难以忍受的胡言乱语”（1982: 265-66）。门肯用他自己的笔描绘凡勃伦，用同样古怪而冗长的方式去证实凡勃伦的多余。

凡勃伦写道：“如果我们不安于单子叶植物工资学说和隐花植物的利息理论的分类法，区分复杂的，胞间裂开的，绒毛的，念珠形的变体，那么什么是细胞质，中心体或者我们可能转向的细胞核裂过程，而在哪里我们才可能发现常态的形而上学以及控制原则的终止？”（Dorfman 1934:163）。

门肯回应道：“如果一个人在他冰碛层和石笋般的字眼下面挖出一条隧道，在他大堆的厨房垃圾般不协调而沙哑多音节字中越陷越深，炸掉他坚硬、厚重的几乎是神学方法的外壳后，人们在他的文章里发现的将主要是一堆陈词滥调——不言而喻事实被装扮得很恐怖，明显的结论淹没在错综复杂中”（1982: 269）。

抱怨还在继续，门肯称凡勃伦的《美国高等教育（The High Learning in America）》为“笨拙的，做作的，晦涩的，夸大的，吹牛的，空洞的。”而且，它还是“不精确的，软弱的，独断的，想法荒谬的”（1982: 272）。

门肯称凡勃伦对自己的攻击“非常的烦乱”，这“使他对共和政体开始绝望”（1982: 265）。

在斯坦福大学的婚姻问题

1906年，托尔斯坦·凡勃伦和她的妻子艾伦迁移到加利福尼亚，凡勃伦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但是当野性开放的“宝宝”贝文斯为做毕业论文而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搬到他的隔壁后，麻烦很快就到来了，这位已婚女士成了他的情妇。贝文斯每天写信告诉艾伦，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根本不是婚姻，并要求艾伦放弃凡勃伦，这让艾伦很不开心。（Jorgensen 1999:114-15）。

同时，与在芝加哥大学相似，他教授关于社会主义的课程。一个学生写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沿着方庭（Quad）散步，耷拉的帽沿低低的压过眉毛，衣服和裤子“逛荡”在身上，头发和胡子也没有修剪整齐，总体看来很邋遢，我还以为他是个流浪汉”（Dorfman 1934:274）。除了他吉卜赛人般的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他的课程被大部分学生描述成是“枯燥的”而“难于理解的”。

1909年末，当艾伦将信件和大量她丈夫秘密活动的证据交给斯坦福大学校长大卫·史塔尔·乔丹之后，凡勃伦和贝文斯的桃色事件东窗事发了。凡勃伦被解雇了。

如果艾伦的目的是要重新获得凡勃伦的爱，那么她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托尔斯坦立刻离开了加州到达偏僻的南部爱达荷山区与宝宝住在一起。很适合他们两个的情况，这个地方叫做“无处（Nowhere）。”圣诞期间，凡勃伦差点死于肺炎，但是被深爱他的宝宝护理康复。

斯坦福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同事聚集在凡勃伦周围，为他谋取了密苏里州大学教授职位。斯坦福的阿林·扬（Allyn Young）称凡勃伦为“我所知道的最富天才的人，”哈佛大学的弗朗克·陶西格也加入唱赞歌的行列，“我们所有的经济学家中，凡勃伦是最接近天才的”（Jorgensen 1999:134）。1911年初，他开始在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但身体状况不好。学生们说他瘦小憔悴，皮肤起皱，但是所有教员和学生人都对这位《有闲阶级论》的作者非常敬畏。他的一个同事承认凡勃伦不是一个好老师，却说道：“我记得我有一次透过厚重的橡木门的窗子看进他的教室。我一个字也听不到。甚至看不到他的嘴唇在动。学生们就像从沉睡宫殿出来的木乃伊雕像一样呆坐在那里。但是隔几分钟，所有的这些都会被拘谨的笑声打破”（Jorgensen 1999:137）。

一年后，1914年凡勃伦与艾伦离婚最终与宝宝结婚；他五十七岁，她三十七岁。但是宝宝说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历经沧桑的女人，”经历了第一次婚姻，有两个孩子。她不想再多要什么了。

凡勃伦令人难以置信的预言力

凡勃伦的理论也许是被怀疑的，但是他的预言未来的能力则不然。1911年，他告诉密苏里州大学的一位同事（Jorgensen 1999:149）：

- 一次世界大战很快就要在欧洲爆发。
- 俄国革命“即将来临”并且会比法国革命死更多的人。
- 如果一战后和平再度失败，将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将与德国结盟，他们将成为对西方战争的侵略国。

凡勃伦写作和发表了一些关于他的预言的文章和书籍。这些出版物包括《德意志帝国与工业革命》（1915）以及《和平本质及其永续条件的考察》（1917）。

纽约市的异教徒

1918年，华盛顿D.C.食品管理短暂的限制之后，凡勃伦搬到纽约成为《日晷（Dial）》的编辑。《日晷》是编辑部位于格林威治区的先锋政治杂志，在那时候以作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悠久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工会组织主义、无政府主义、易卜生主义、尼采主义（Nietzschianism）、Shavianism、新共和主义、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素食主义、自由性爱主义、裸体主义”的中心而闻名（Jorgensen 1999:157）。

显然是这种气氛引发了凡勃伦的激进主义。在一篇名为“布尔什维克对谁是一种威胁？”中他赞同地写到苏联的共产主义实践，认为在苏联废除私有制会提高效率。“布尔什维克人是一个面临这一问题的普通人：我能忍受失去什么？然后得到了这个答案：没有”（Dorfman 1934:421）。

这一版本并未编辑。凡勃伦都不让《日晷》的编辑们改动他任何作品的，一个字也不许，包括标点符号。编辑们要求凡勃伦将他的文章限制在一千字内，他笑了；“光写个引言就要那么多字了”（Dorfman 1934:411-12）。毫不奇怪，凡勃伦激怒了他的编辑们。

凡勃伦出名的极端的羞涩而沉默寡言。同事，学生和客人们都为他明显无法维系一场交谈而感到厌烦。他会受邀参加一个晚会，但是整晚都不说一句话。他曾经参加了一个由杰克·伦敦组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后来，要求他做一个发言，但是他说他没什么可说的。阿普顿·辛克莱，一个欣赏他的人，见过他之后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沉默的人。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可以在一群人中坐着倾听了这么久却什么都不说的人”（Dorfman 1934:273,423-24）。

但是，哦，他怎么那么能写呢！他写了上百篇论文和大量的书。从《日晷》中的论文结集成《工程师与价格制度》（1921），这是在凡勃伦去世后及接下来的大萧条中非常盛行的一本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极其信服这本书，甚至因此转向社会主义！）在一篇论文中，他赞同“技师联盟（soviet of technicians）”是必要的，工程师们应当掌控国家的工业并取消私有产权。本质上，论文主要阐述了消灭资本主义、代之以苏联风格的工程师群体将有益于国家。（Dorfman 1934:512-13）。

凡勃伦和查尔斯·比尔德，威斯利·米切尔一起在纽约创建了实验的新社会研究学院。凡勃伦在那里任教多年（他的科目：社会主义！），据一个与他一起吃午餐的同事所说，“凡勃伦的脸上总是带着深深的忧郁甚至是绝望，没有什么能唤醒或挑起他兴趣的一点点波动”（Jorgensen 1999: 164）。他厌倦了教学，1926年回到了加利福尼亚。

1926年，凡勃伦72岁的时候，心力衰竭。吉多·马克思（Guido Marx），他斯坦福大学和新社会研究学院的同事这样描述凡勃伦的晚年：“如果有一个人，他的心总像有条蛇在咬噬，那么这个人就是凡勃伦”（Jorgensen 1999:182）。但是另一个传记作者，瑞克·提尔曼（Rick Tilman），评论他道：“托尔斯坦·凡勃伦……也许是美国所有的最有创意最敏锐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批判家”（1992: ix）。

凡勃伦的支持者们试图通过提名他们的领导者为AEA的主席建立一个“叛逆之宫”

1924年，显赫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创建者威斯利·米切尔，以及凡勃伦的热心拥护者后来成为美国参议院议员的保罗·H·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试图提名托尔斯坦·凡勃伦为美国经济协会（AEA）的会长。首先，他们试图使凡勃伦成为“名誉”会长，但是提名委员会没有通过。然后，米切尔，在任的AEA的会长，任命了一个新的提名委员会，那里大部分成员都是凡勃伦的朋友。一场可观的混战之后，其间凡勃伦被指责为是一个社会学家而非经济学家，得出了这样的结果，只要他加入AEA并发表一个就职演讲，他就可以获得这一职位。凡勃伦，惧怕公众活动的固执的不加入者，拒绝了这一职位，说“我很开心地拒绝了他，他们并没有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这一职位。”他的决定也归咎于他的身体状况太差。他67岁了，五年后，1929年去世（Dorfman

凡勃伦的墓碑在哪里？

托尔斯坦·凡勃伦没有墓地，因为他是火葬的。1929年8月3日，他死于心脏病突发后，一个用铅笔写的便条在他的卧室被发现。“这是我的意愿，如果死了的话，火葬……尽可能的迅速便宜，不要任何形式的典礼和仪式：将我的骨灰漫撒于大海或者相当大小的流入大海的河流中，不要为了纪念我设立任何墓碑，停尸板，碑文，雕像，碑，碑铭或者任何名字和性质的纪念物，……不要讣闻，纪念物，肖像或者我的传记，不要印刷或出版我写出的或收到的信件，或以任何方式复印，复制，流传”（Dorfman 1934:504）。

除了火化之外，他所有的遗愿都没有达成。

凡勃伦的世界进化论观点

托尔斯坦·凡勃伦给与世界的消息是什么呢？让我们从他最著名的著作《有闲阶级论》开始。像许多经济学家一样，凡勃伦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将工业资本主义视为进化早期的“野蛮”形态，像猿一样。仿效蒲鲁东“财产即为偷窃”的著名论断，凡勃伦称私人财产只是“持有的成功突袭而获得的战利品”（Veblen 1994[1899]:27）。资本家追求财富、空闲、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获取商品都是“掠夺的本能”（29页）。有闲的生活“和剥削的战利品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44页）。赌博和冒险反映了“野蛮的性情”（276页，295-96）。妇女像奴隶一样，作为一种财产，受其所有者支配（53页）。爱国主义和战争“是掠夺的，而不是生产或就业”的徽章（40页）。根据凡勃伦的理论，源于早期野蛮时期的爱国主义，是推动战争的最强大的动力之一。

凡勃伦对于运动和宗教的攻击

就连运动和宗教也是兽性精神的一部分，并且支持着野蛮的支配冲动。他说，“在一定程度上，沉溺于运动……标志着停止发展的人类道德品质”（Veblen 1994: 256）他说，大学的运动是“古典的对手”（397页）。宗教、仪式、神庙、寺院、教堂、圣事“并不提供直接的物质。”凡勃伦称，它们只是“显而易见的浪费的名目”并且“消减社会的经济效率……并且……降低社会的活力”（307页）。凡勃伦高度批评与有闲阶级有关的任何事情。甚至毕业典礼上穿戴的帽子和长袍都被打上“炫耀性消费的显著要素”的标签。（372页）。

以什么取代资本主义？

进步意味着原始的资本主义应当被推进到更高的社会形态。必须抵制战争（凡勃伦是和平主义者）。资本主义必须由工人的社会主义和技术专家政治，一个“**技师联盟（soviet of technicians）**”的形态所取代（见252页关于泰勒主义加框文字。）但是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1906年在哈佛大学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凡勃伦批评马克思学说没有通过进化的检验。根据凡勃伦的观点，许多国家没有经过任何阶级斗争就瓦解了。他断言，“贫困的发展必然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是可疑的。”“事实并没有证实……[马克思的理论]的某些重要观点”（Jorgensen 1999:90）。

泰勒的“科学管理”：凡勃伦在技术方面的具体化？

过去，人是第一位的，未来，制度将是第一位的。

——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 W. Taylor）（Kanigel 1997: 438）

弗雷德里克·泰勒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男女的私人 and 公众的生活。

——杰里米·瑞佛肯（Jeremy Rifkin）（Kanigel 1997: 8）

托尔斯坦·凡勃伦称赞工业和物质劳动，但是视商业和金融是一种“浪费”。观念

上，凡勃伦支持“**技师联盟 (soviet of technicians)**”，在这个社会里，工程师们主导世界，追求生产力而非利润。搞金融的人对他来说根本没用。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1856-1915)，商业效率之父，同样的认为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在于“科学管理。”泰勒的目标是通过标准化的工厂，工作时间表以及计时表最大化工人的效率。人们称他为“快速的泰勒”，他写下了他的理论，最后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1947)。他的主要观点是：规则和秩序将引致繁荣和效率。源自泰勒主义的有亨利·福特 (Henry Ford) 的生产线，爱德华兹·戴明 (Edwards Deming) 的品质管理技术以及彼特·德鲁克 (Peter Drucker) 的时间管理。

泰勒主义被广泛接受，特别是在战时。毕竟，不正是泰勒的效率方法将美国二战时的产量增长了两倍，让火车按时地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奔驰，并且促进德国的精密工程吗？不正是在泰勒的影响下列宁才提出了声名狼藉的五年计划？他还补充道，“我们必须在苏联引进新泰勒体系的学习和教学以及它的系统性检验与适应” (Kanigel 1997:18)。

工会工人叛乱

但是对于工会的工人，泰勒主义只不过是榨取工人更多汗水的一种方法。它将工人变成非人的奴隶和工作狂。他残酷的方法逼迫人们过分努力过分迅速。“科学管理是可耻的……站在你旁边拿着计时表，窥视着你，评估着你，给你分级，像对待一块牛肉似的对待你。你不能思考。所有你可能拥有的工人的骄傲都要作为效率这一圣坛的祭品” (Kanigel 1997:534)。

当然，泰勒不这样认为。他将自己视作伟大的调和者，立刻实现高工资，高利润，低价格。他构想着亚当·斯密普遍富裕的梦想。一天，他写道，“一代人的奢侈品将成为下一代人的必需品而我们国家的工人将和现在的普通商人们一样生活的很好，有同样的奢侈品，同样的休闲的、文化的、受教育的机会” (Kanigel 1997:506-07)。他的革命将带来一千年的工业和平。

凡勃伦会认可泰勒主义为最好的科学工程形式吗？我怀疑这一点。

凡勃伦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

凡勃伦构想了和不同于马克思观点的阶级矛盾。不同于将世界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产者和无产者，凡勃伦强调技术师和工程师的联盟，和对立的商人、律师、牧师、军人、有闲绅士。他看到的是工业与商业、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有闲阶级和工作阶级的矛盾。

《有闲阶级论》最著名的一章是论述富有阶级的“**炫耀性消费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商务的版本译成“**明显消费**”) 的第四章，在那章他详细地描述并进行嘲讽。他写到，“高级的生活方式和方法是与明显闲暇和炫耀性消费的标准相一致的” (1994[1899]: 75)。凡勃伦谴责富人从生产过程中抽出财富有意的用以浪费性的支出和炫耀的行为。富人通过“过剩消费”获得好名声。他补充道，“要成名就必须浪费” (96-100, 334)。此外，“有闲阶级比工人阶级更支持战争的观点和意图” (271页) (疑问：但是是谁会卷入酒吧的争吵之中？)

凡勃伦反对亚当·斯密

在强调“庸俗”阶级的多余时，凡勃伦对商品文化表现出严重的敌意，他将它的特征描述为“浪费、无益、残忍” (1994: 351)。像罗伯特·莱卡兹曼 (Robert Lekachman) 在导言中写到的，凡勃伦将商业社会说成“一个巨大的反进步的障碍，它阻碍了人类作为工作者的与生俱来的本能的充分实现” (10页)。无疑，凡勃伦极力反对亚当·斯密提出的商品社会的一切益处。亚当·斯密看到了规则、协调、裨益和理性的自利，凡勃伦则看到混乱、冲突、贪婪。“凡勃伦断然反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几乎所有前提和假设” (Diggins 1999:13)。

凡勃伦忽略了财富创造的利益——资本的扩充、新技术上的投资、高等教育上提供的资金、商业社团博爱的慷慨。凡勃伦轻蔑的将它们全部归结为“有闲阶级”。凡勃伦一生中根本没有看到平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Dorfman 1934:414)。他赞许的引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首次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中提出的观点，“机械的发明是否减轻了人类负担迄今都是个疑问” (Mill 1891[1848]: 516)。马克思在《资本论》也做了相同的引述 (1976[1860]: 492)。

我们可以原谅穆勒和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做出这样无知的论述，但是，到了凡勃

伦，他对于消费统计的忽视是令人惊讶的。到1918年，当凡勃伦做出他这个论述时，数百万的美国消费者开始享用冷藏、电力、电话、自来水、室内卫生间还有汽车。难怪，凡勃伦总是生活沮丧中——他对资本主义观点的阴郁发生于兴旺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在美国的消费者取得了巨大进步的时候。

为富人们辩护

凡勃伦主要的失败是他没能跳出对有闲阶级无关紧要的品位的纠缠。更重要的是，扩大的富有阶级的存在为整个经济提供了大量的好处：

1. 富人最先消费昂贵的新消费品。当汽车、电视、个人电脑、手机以及其他技术创新产品首次以高价雏形推出时只有富人有能力支付。从富人那里获得的利润被用以扩大生产，降低价格使得最终每个人都消费得起。如安德鲁·卡内基所述，“资本主义将奢侈品转为必需品。”
2. 富人阶层是投资资本的主要源泉。富人为新技术投资，改进生产进程，创造就业提供资本支持。如果没有富人，扩张的经济将少有或没有财富的供给。
3. 高收入阶层的人用许多他们的剩余财富投资于高等教育、图书馆、教堂、画廊以及慈善组织。
4. 今天，富人缴纳大部分的联邦收入税。例如，美国最高收入的1%的人缴纳17%的联邦收入税。

更新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中产阶级凡勃伦

凡勃伦是一个天才，最尖锐的，最有创意的，最无拘无束的——真正的最伟大的——（他的）时代思潮的源泉。

——J.K. 加尔布雷斯（Diggins 1999: 217）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是当今最接近凡勃伦的人。两个人都来自不辞劳苦的移民家庭。他们都善辩地论述了富裕的有教养的浪费。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而加尔布雷斯在《富裕社会》（1958）中。他们都质疑“消费者主权”的自由市场假定。他们都喜欢以技术专家政治治国——凡勃伦的“**技师联盟（soviet of technicians）**”，加尔布雷斯的“新工业国”的“技术专家控制体制（technostrecture）”。他们都提出了描绘资本主义的贴切的词汇——凡勃伦有他的“**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加尔布雷斯有他的“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以及“补偿力。”（countervailing power）

但是比较仅只与此。加尔布雷斯是约翰 F. 肯尼迪总统时期的前驻印度大使，并且他是一个好得多的作家。他还非常的高——六英尺八英寸——这使他成为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学家。他1908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是苏格兰加拿大移民的儿子，1934年，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大学生活恰处于大萧条时期，他阅读凡勃伦和马克思的作品。在去英国剑桥时候，他接触了凯恩斯的《通论》，他立刻就接受了这些观点。二战期间，1941年，他被任命为价格委员会副主席。根据他战时的经验，加尔布雷斯支持工资——价格控制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战后，除了1961-63年被外派到印度期间，他一生都在哈佛大学工作。1972年，他成为美国经济协会的主席。他一生都积极参政，并且是民主党的终身成员。

加尔布雷斯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仍在销售。他流传最久的一本书是《1929大崩溃》，在这本书中，他将股票市场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归咎于“坏的”收入分配，“坏的”组织结构，以及“坏的”银行体系。不幸的是，他并没有过多责备危机的主要原因——联邦储备局的“坏的”货币政策（Galbraith 1955:173-93）。

加尔布雷斯以他的美国经济三部曲最为闻名：《美国资本主义》（1952），《富裕社会》（1958），《新工业国》（1967）。都强调大的普遍政府的必要性。《美国资本主义》提出这样的情况，大的政府是对大的企业和大规模劳动力的必要的“补偿力”（但是，随着工会力量的不断减少，全球范围内的由企业家推动增长的商业的作用不断扩大，他的理论难道不是给出了减少的，而非增加的政府的作用吗？）。

富裕社会和“社会不均衡”问题

加尔布雷斯最著名的是他的《富裕社会》（1958），这本书是最畅销的，现在仍在销售。像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一样，《富裕社会》是对美国财富和不公平的社会评述。带着很大的热情以散文诗歌般的句子，加尔布雷斯准确地描述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不一致。他的观点是“公共部门不能与私人消费齐头并进”（1958：257）。当私人部门能充足地生产汽车，衣服，游船，公共部门却因提供优质教育，畅通的公路以及清洁的空气而受损。加尔布雷斯解决这一显著的“社会不均衡”的方法看起来很明显：将资金（经由税收）由富裕的私人部门转向贫乏的公共部门。

评论家们提出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公共部门相对于私人部门总是在财务上捉襟见肘，运行表现差强人意呢？考虑到二十世纪政府比私人企业成长更快，这一问题更令人困扰。公共放任的根源在于政府项目的原则性缺陷——他们缺乏竞争和市场激励。那么，解决的方法不是将更多的私人财富转移到公共部门，而是要将私人部门的原则应用到公共部门，例如，私有化政府项目，对公共服务收取使用费等。不幸的是，私有化和其他市场方法并不在加尔布雷斯的议程之中，甚至在他四十周年纪念版里都没有提及。

加尔布雷斯改变了关于不平等的看法

加尔布雷斯，凡勃伦以及其他制度经济学家总是担心收入不平等。在这方面，加尔布雷斯在《富裕社会》中做了一个有趣的自白：

几个世纪以来，受福于财富的人们为他们的好运提出了许多相当聪明而令人信服的辩护。自由主义者的本性是以坚定的眼神看待这些解释。然而既然这样，下面的事实就是不可避免的。是近年来产量的增长，而非收入的再分配带来了最大的物质增长以及平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于是，不论有多少怀疑，自由主义者都接受了这一事实（1958：96-97；着重号系后加）。

新工业国

加尔布雷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是《新工业国》（1967），产生了最大的争议，而且，许多批评家称，这是他作为一个可靠的经济学家生涯的衰落。他提出了三个基本假设：

1. 大企业变得更大更集中。许多重要的市场只由少数几个大企业掌控。
2. 主要的公司由熟练的工程师经理运营，创造一个不由股东控制的“技术专家控制体制”；他们寻求最大化动力，而非最大化必要的利润。
3. 大企业的技术专家控制体制试图通过计划操控市场以降低风险；价格和产量不再由供给和需求决定，不论“传统智慧”怎么说。

最近经验的研究质疑了加尔布雷斯的全部三个假设。没有证据表明产业变得更为集中；事实上，全球化增加了主要产业竞争者的数量，例如汽车产业。大企业也不能不受竞争和股东不满的影响。自从1967年《新工业国》出版，股东们对更好绩效的要求导致了大企业的重构，包括缩小规模和杠杆收购。最后，大企业通过广告影响但不能控制消费者（加尔布雷斯所谓的“信赖效果（dependence effect）”）。如威廉·布雷特（William Breit）和罗杰·L·兰塞姆（Roger L. Ransom）所述，“如果[大厂商]能够控制需求，就不用花费巨大的成本去开发新产品，只需要说服买者继续购买现存的产品”（1971：184）。

马克思·韦伯：一个勇敢的“理性”资本主义的捍卫者

幸运的是，托尔斯坦·凡勃伦并不是世纪之交唯一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评论者。他的主要对手来自大西洋彼岸——德国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思·韦伯（1864-1920），他写著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30[1904-05]）一书的作者。韦伯的观点更多的与亚当·斯密的精神一致而不是凡勃伦。如约翰·帕特里克·迪金斯（John Patrick Diggins）所说，“没有哪两位社会理论家会比特尔斯坦·凡勃伦和马克思·韦伯更对立了，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个性上”（1999：111）。

凡勃伦和韦伯都困扰于当代工业社会的含义——权利、管理、剩余财富问题。都在十九世纪末出版了他们最畅销的书。他们都严重地批评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的解释。

但是，韦伯得出了与凡勃伦和马克思都相差很多的结论。他既反对凡勃伦将现代资本主义描述为野蛮进化形式，也反对马克思的剥削和剩余价值理论。而是，现代社会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英雄年代”）是由于严肃的道德风纪和毫无乐趣的勤劳工作带来的，将走向长期投资和高级企业管理。有力推动西方经济发展的动力根源来自哪里呢？不同于凡勃伦和马克思，韦伯认为这一根源是宗教，特别是来自于新教改革以及它的节俭和工作的道义责任的教义，以及它的“天职感（calling）”概念。

宗教在韦伯的一生中起了主要的作用

尽管韦伯是一个职业的经济学家，他对宗教仍有着持久的兴趣。他1864年生于德国的埃尔福，有一个虔诚的母亲和一个世俗的父亲。他的母亲来自富有的胡根诺教徒家庭[Huguenot胡根诺教徒：16至17世纪法国的新教徒，译者注]，是虔诚的教徒。相反，他的父亲不是教徒，是一个法官，后来成为德意志帝国国会的立法代表，1896年被要求全家搬至柏林。他的母亲憎恶轻浮，投身于她的宗教事业和帮助穷人。韦伯厌恶他世俗的专制父亲对待他清教徒母亲的方式。

马克思是一个智力早熟的孩子，上学的时候就阅读了歌德的四十卷文集。准备自己的坚信礼时，他自学希伯来语并阅读了原版旧约。他喜欢将历史评论作为给父母的礼物。十五岁的时候，他将一篇题为“印欧语系国家的历史、发展、民族特征的考察”的文章献给了他的父母。

1882年，韦伯进入多所德国大学并跟从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卡尔·克尼斯学习法律（见第七章）。他只上一门经济学课程，但是到1893年，当他二十九岁的时候，他成为弗莱堡大学的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正式的名称，Nationalökonomie und Finanzwissenschaft）。他为工人写了个叫做《股票交易》的大受欢迎的教育性小册子，这表明他是一个快速的研究者。他的教学方法被广受肯定，以致1896年，在海德堡大学，他受命取代了他的老师卡尔·克尼斯。

韦伯神经失常——六年！

到1897年，韦伯就是成功的写照。刚三十出头，他就得到了令人尊敬的大学教职，并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四年之前，他与远房表亲玛丽安·施耐格（Marianne Schnitger）结婚了。

但是马克思过度操劳，精疲力尽。此后，他和和他们住在一起的专横傲慢的父亲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韦伯第一次挑战他父亲的独裁性格并命令他离开房子。他再也没有活着看到他的父亲，这个老人七个星期后去世了。受内疚的折磨，马克思患上了忧郁症，长达六年。不能教学，不能进行公开演讲，不能进行学术研究，他甚至很难说话，集中精神或者阅读。他忍受着慢性背痛、失眠、神经紧张以及“恶魔”的周期性骚扰。他注射吗啡，服用各种药物并去国外旅行。他徒劳的寻求解答。看着他无精打采的坐在沙发上，意识模糊，几个小时地凝视着窗外，他的妻子玛丽安说他是“折翼的鹰”。疾病令他如此苦恼，导致，他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不能承担教学任务，直到1918年。

美国的旅行唤醒了韦伯

1903年，韦伯和他的妻子到美国旅行。这次旅行是韦伯的转折点。他周游了这个国家甚至作了一个公开演说。着迷于他在美国的旅行，韦伯重新振作起来并准备写他最著名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书在1904和1905年先是作为两篇文章发行，1920年修订再版，1930年被译为英文。这部著作和其他一些未完成的关于世界宗教和经济学的计划将韦伯推到了现代社会学奠基者的前列。

天生魅力的马克思·韦伯

除了他漫长的患病期间，韦伯给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令人着迷的印象。在良好外在风度下，他是一个满怀激情和信仰的严肃学者。学生们记得他高贵而庄严的样子，一个同事描述，“每个因接触过他而感到惊愕的人永远不会在世界上再看到同样的光彩”（Wrong 1970:69）。然而，韦伯自己并不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他对写畅销书或做巡回演讲都没有什么兴趣。在一个强调英雄崇拜和仪式的德国，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荣誉头衔。

秘密的生活？

韦伯努力的工作，但是从来不拒绝生活的快乐。奇怪的是，他表现出对宗教浓厚的兴趣，但是从来不按时去教堂。他有精彩的社交生活，有时和朋友们整夜饮酒，最后在当地的小河里游泳。有时他的好色会给他带来麻烦，包括两次长期的私通事件。一次是和埃尔斯·杰弗（Else Jaffe），他在海德堡大学的第一个女学生，另一次是和米娜·托布尔

(Mina Tobler)，一个瑞士钢琴家。一战前，他和一个叫做阿斯科纳(Ascona)的自由主义的自由性爱团体扯上了关系，战后，他同时和埃尔斯、米娜以及他的妻子在一起，过着一种非正式的多偶生活。1920年马克思去世的时候，埃尔斯和玛丽安都在他床边。此后，她们成了一生的朋友。(Diggins 1996:43-44, 163-64)。

作为一个民族自由主义者，韦伯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支持一个强大的德国。他积极参政，特别是一战期间。五十岁的时候他还试图参军。被拒绝后，他在自愿一家德国医院工作。战后，他是去凡尔赛的德国代表团成员之一。1918年，他在维也纳大学教经济学，在那里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成为朋友。但是他心在德国。一年后，他受聘为慕尼黑大学的教授。他很受欢迎，在维也纳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作演讲时，礼堂从来都不够大。他全力投入写作和教学，换上了肺炎。1920年初夏去世，只活了五十六岁。

韦伯和熊彼特在维也纳咖啡厅的论战

这简直难以忍受！

——马克思·韦伯

马克思·韦伯和约瑟夫·熊彼特在个性上是完全相反的。韦伯是一个教条的、劳碌的、不受控制的有坚定信仰的胡根诺教徒，他不会草率地对待任何事情。熊彼特，维也纳经济学的天才神童，漫不经心，合情合理的接受错误，在任何政治游戏中都驾轻就熟。(见第十六章)。

1918年，韦伯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接近期末，他在大学对面的兰德曼(Landmann)咖啡厅见到了熊彼特，弗里克斯·萨姆瑞(Felix Somary)，后来成为著名的瑞士银行家的维也纳大学的学生报道了这件事。他们谈论一年前爆发的俄国革命，熊彼特表示满意，认为社会主义不再只是一个理论而可以在真实世界中得到检验。韦伯激烈的回应，认为俄国的共产主义是一项罪恶，会引致闻所未闻的苦难和巨大的灾祸。

“也许是这样”熊彼特说，“但是这将是一个可以检验我们理论的很好的实验室。”

“一个由人类的尸体堆积起来的实验室！”韦伯再次反驳。

“每一个解剖教室都是如此。”熊彼特回击道。

这个讨论演变成一场激烈的辩论。韦伯变得更加激烈并抬高了声音，而熊彼特更为辛辣并降低了他的声音。当两人开始互相用言语侮辱对方时，周围的消费者们停止了读报，打牌，开始热切的倾听。最后，韦伯跳起来冲进环城街(Ringstrasse)，喊道“这简直难以忍受！”一个朋友拿着韦伯的帽子追了出去，想去安抚他。熊彼特留在后面，只是微笑着说，“怎么能在咖啡厅里这样失态呢！”(Somary 1986: 120-21)。

韦伯的伟大成就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深奥论著对制度经济学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学者们反对正规的宗教。德国的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将信仰作为道德残废者的拐杖。弗洛伊德将宗教视作一种妄想和不理智的精神错乱，一种神经官能症。马克思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力量塑造了宗教，但是韦伯持恰好相反的观点。他赞扬基督教为一个“维系遍布全世界的兄弟情谊的社会纽带”(Diggins 1996: 95)。他反对马克思，主张资本主义根源于宗教意识形态而非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转变了西方文明，带来了资本主义，“在我们现代生活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力量”，的崛起，(Weber 1930:17)。

根据韦伯的观点，不是不受限制的贪婪和不受约束的逐利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时代。这种本能在以前的所有社会形态中都是存在的。“贪婪”是资本主义背后的驱动力这一“天真的想法”只应该在“幼儿园的文明史课上讲授。”附和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的观点，韦伯称“无限制的对利益的贪求与资本主义的一致性并不是最小的，而且它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小部分精神。资本主义甚至可能与对这一非理性冲动的约束有一致性，或者至少对它的一种理性反省。”(Weber 1930:17)。

那么，是什么带来了现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在西方，的历史发展呢？韦伯的基本观点是，几个世纪以来牢固地控制着人们头脑的宗教，在十七世纪的新教改革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那以前，赚取财富为包括基督徒在内的绝大部分宗教所不齿。中世纪的天主教在圣保罗，圣奥格斯汀(St. Augustine)和圣托马斯·阿奎纳(St. Thoms Aquinas)的影响下强调禁欲原则和贫困的誓约。他们的格言是“不虔诚者追随利益”(Weber 1930:83)

。根据韦伯，这些都改变了，随着路德教的“天职感”教义，加尔文教徒和清教徒的劳动促进上帝的荣光的信条（“尽管不是为了肉体 and 罪恶，你仍可以为上帝的富有而工作”），及卫理公会教徒对懒惰的训戒。只有在新教徒中，虔诚的基督徒才能听约翰·卫斯理关于财富的布道：“赚取所有你们能赚的，储存所有你们能存的，给予所有你们能够给的”（Weber 1930: 175-76）。

韦伯不得不克服新教对人类前途悲观的宿命论的观点。毕竟，难道禁欲的加尔文主义不是宣扬除了上帝没有人知道被选中的是谁的宿命论观点吗？但是，韦伯发现加尔文主义者尽管强调**信仰高于工作（faith over work）**，实际上鼓励世俗的利益，作为缓解尘世苦难的一种方式。

新教神学会导致什么呢？商品世界的天职感（“上帝赐福他的交易”）意味着时常的自控，诚实以及努力工作。行乞和懒惰都是被禁止的。“我们经常说，希望贫困与希望不健康是一样的”（Weber 1930:163）。

新教不仅促进了工业，他也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元素，节俭的美德。卫斯理布道说，“赚取所有你们能赚的，储存所有你们能存的，给予所有你们能够给的”卫斯理没有说“花费所有你们能花的”。韦伯解释说，基督教在反对唯物主义和骄傲的同时宣扬克己和节欲。新教的传道者们不赞成“炫耀性消费”所以资本家和工人储蓄储蓄再储蓄。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述，“事实上，这里包含着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辩护。如果富人将新增财富用于他们自己的享乐，世界就会在很久以前就发现这样一个体制令人无法忍受的了。但是他们像蜜蜂一样储存和积累，**not less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whole community because the themselves held narrower ends in prospect**”（Keynes 1920:19）。工人阶级也喜欢储蓄。“储蓄的责任成为九成的美德、蛋糕的增加，真正的宗教的目标……个人被劝诫不需要过度禁绝只需延后，并且培养安心和期待的乐趣”（20页）。

韦伯指望美国的富兰克林证明他的观点

1903年韦伯去美国的重要旅行也许在他富于创造的头脑中引燃了一个思想火花。他集中将美国视为“新教伦理”的历史化身，尤其是富兰克林的生活和著作。（需要注意的是，韦伯的母亲海伦（Helene）和姨母伊达（Ida），两个虔诚的女人，都受到美国先验论神学者（transcendentalist theologians）威廉姆·强尼（William Channing）和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深刻的影响）。

韦伯将这位美国的开国元勋视作新教伦理的缩影。韦伯认为富兰克林的教友派信徒建立的宾夕法尼亚州渗透了“资本主义精神”，并见证了富兰克林的“在他年幼时，他严格的加尔文教徒的父亲一遍一遍灌输给他的”伦理哲学“天职感”的信条，（Weber 1930[1904-05]: 53）。他的书引用了一个又一个富兰克林的言论，如“记住，时间就是金钱”以及“钱能生钱，生出来的钱能胜更多钱”。根据韦伯的观点，富兰克林的守时、勤劳、节俭的美德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那就是，“赚很多很多的钱结合严格避免一切自发的生活享乐”（Weber 1930:48-56）。韦伯将富兰克林与雅各布·福格（Jacob Fugger）相对比，雅各布·福格是德国的商业银行家，传闻他没有良心，只热衷于挣钱。

对韦伯理论的批评

当然，韦伯的理论并不完全是新的。孟德斯鸠不是已经说过“资本是新教的”（Dorfman 1949:345）？英国，最大的新教国家，也是最发达的工业国，在机械和资本品上投资最多的国家。同时，天主教法国，由于废除“南特勒令”（Edict of Nantes），驱逐了大量的工匠，因而延缓了几个世纪的经济的发展。

其他历史学家不同意韦伯的观点。西方资本主义崛起的原因被大大删减和**简化dried**。毕竟，资本主义第一次繁荣发生在中世纪天主教的意大利城邦。的确，在1523年一个佛罗伦萨人的记述中，发现了第一个前资本家宣言，“以上帝和利润之名”（Rothbard 1995: 142）。安特卫普在十六世纪中叶是繁华的金融和商业中心——那里天主教辖区。十六世纪中叶和十七世纪西班牙的经院学者们，主要是耶稣会会员和道明会修士，都拥护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

批评还指向韦伯奇怪地选出的例子——本杰明·富兰克林和雅各布·福格。我们承认，富兰克林在《贫理查年鉴》中发扬了节俭禁欲的守旧美德，但是韦伯完全忽略了富兰克林的好色以及在他作为商人、政治家和大使的长期生涯中寻乐的热情。事实上，富兰克林并不热衷于苦干而更愿意丰富美国舒适的生活。韦伯对于雅各布·福格的攻击也是没有依据的。福格，这位来自德国南部的身体力行的天主教徒，一生都在工作，拒绝退休，宣

告说“他要尽可能久的赚钱。”如果有谁能够代表韦伯的理想典范，那就是雅各布·福格(Rothbard 1995:142)。

总结

尽管有这么多的批评，韦伯的理论仍然在驱除由凡勃伦表达的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宗教信仰的文化概念的否定观点上迈出了一大步。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韦伯更强调精神因素而非物质因素。凡勃伦这位人类学家将现代资本主义看作野蛮剥削的例子，韦伯这位社会学家将资本主义伦理和道德规范视作与人类掠夺行为坚定的决裂。凡勃伦将资本家描述为掠夺者和谋求地位者，韦伯则强调个人良知以及基督教反对懒惰和浪费的训词。

纽约市立大学的历史学家约翰·帕特里克·迪金斯为凡勃伦和韦伯都写了传记，根据他的观点，近来，在学术影响上韦伯使凡勃伦黯然失色。(1999: 112)。

经济学应当“价值中立(Value Free)”

新教伦理理论并不是韦伯在经济学上做出的唯一的贡献。在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争论中，韦伯站在奥地利学派这边。他坚定地相信如果经济学想要成功的成为纯粹正式的科学，就必须是价值中立的，客观的社会科学。当他热衷于在各个大学任职的时候，在德国，他亲自见证了卡尔·门格尔的主要敌人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的成就。

几个世纪以来，经济理论都受历史事件和政治偏见的干扰。但是，经济学已经逐渐摆脱这些偏见成为一门公正科学的学科了。怎么样做到的呢？首先，经常重复检查它的前提的逻辑性，第二，反复的用经验研究检验理论。韦伯用历史证据支持他新教伦理的论点。他的证据也许是不完善和不可信的，但是它的确是经验检验的开始。二十世纪经济学的多数进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经验性研究，它能够确认或否定由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各种新理论，迫使经济学时常重新评估它的理论和工具。

韦伯最后的警告：谨防自由的铁笼

尽管他反复地批评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韦伯对市场经济并不像亚当·斯密那样乐观。他对现代资本主义最终持悲观态度。他担心官僚和有闲阶层会压倒企业家阶层，破坏资本主义的活力（一代以后，熊彼特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韦伯还警示现代社会小心自由的“铁笼”。他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为大众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繁荣，但是它也有它的阴暗面——一个非人性的铁笼，合作世界中的统一管制官僚主义，精神价值和乐趣的缺乏——能随意地创造和破坏就业以及人们的生活。他偶尔会写到“投机者的资本主义”的野蛮(Swedberg 1998:121, 190)。科学和技术，凡勃伦的力量的源泉，也不能弥补这一缺陷。对韦伯而言，现代的情况并不是令人开心的，在那里，无处可逃(Gamble 1996:178)。

韦伯的铁笼观点中有正确的元素存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常被指责为太无情，缺乏社会价值。在传统经济中，人们和他们的邻居们彼此认识共同工作。今天，在一个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可以隐姓埋名地生活，不接触他的邻居们。然而，当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进步，它提供了新的机遇，新的财富剩余以及商业伙伴和自发组织中的友情。

新古典模型中最后缺少的关键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已经被审查和改造了很多次了，进入二十世纪后，仍面临一个挑战。在资本主义模型中缺少一个要素：货币的重要作用。货币问题是二十世纪宏观经济学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且，我们将看到，对这一重要问题求解的失败几乎毁了亚当·斯密创立的自由主义体系。一位经济学家倾其一生在宏观经济学中寻求这缺失的一环，我们的下一章就从他讲起。

插图及图表注解

P244

照片10.1

托尔斯坦·凡勃伦(1857-1929)

“高大，强壮，英俊”并且是“知识界和平的扰乱者”

感谢布朗兄弟提供

P252

照片10.2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1856-1915）

“他们怎么对康德所述甚多，而对这位预见了未来十个世纪的预言家泰勒只做了一点点关注呢”（Kanigel 1997: 15）？

感谢斯蒂文森理工学院，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文集提供

P255

照片10.3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和他的妻子在印度

最富天才的作家……最有引用价值的社会评论家

感谢哈佛大学资料室提供

P259

照片10.4

马克思·韦伯（1864-1920）

“每个因接触过他而感到惊愕的人永远不会在世界上再看到同样的光采”

感谢理查德·斯维德伯格提供

第十一章 费雪尝试捕捉宏观经济学中缺失的一环

本章音乐选段：弗朗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第8交响乐，“未完成的交响乐”

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詹姆斯·托宾（1987：369）

天啊，他好象知道所有答案，看看他是怎么自取灭亡的吧！

——一个纽约人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后对欧文·费雪的评价（I.N费雪1956：263）

当我们步入二十世纪，有一个最终的难题尚待解决——如何理解货币和信用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理论家们对微观经济学已有了相当好地理解，即单个产品价格和产品的数量怎样确定的。在学术课堂上，每天教员们都在喊“供给与需求，供给与需求！”更具体地说，价格与产量依赖于单个消费者与生产的行为。根据边际革命理论的观点，价格由可获得的产品数量和消费者对该种产品需求的强烈程度来决定，这种程度以此产品为消费者带来的边际效用为依据。

经济学家们对宏观经济学也有很尚算精细的解释，即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运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古典模型，储蓄和资本投资对于国民财富最大化的正面作用表示赞同。

萨伊定律作为经典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基本被广泛接受：资本的增加、技术和生产率的提高会带来生活水平的快速增长。萨伊定律也解释了偶尔出现的经济衰退的原因：企业有时会被误导而错误地生产了消费者没有购买的产品，由此导致了财政危机和经济萧条。

微观与宏观间失去的纽带

然而经济学家们的工具箱中仍缺少一件，即货币的奥秘。怎样全面理解货币与信用这条生命线的作用是微观、宏观间尚未解决的问题。

把货币商品作为交换媒介的思想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与其他商品不同，货币永远不会被消耗。它一方面用作商品交换的媒介，另一方面行使价值存储的职能，以备后来购买其他商品。欧美的经济学家们把货币与其他商品完全区分开，并且不把货币归入到边际分析的新理论中。这样货币与“物价水平”的研究逐渐同市场经济的其他方面完全分开了。

货币的起源

什么是货币的起源？古斯塔夫·施穆勒和其他德国历史学派的成员把货币看作与其他经济分析相分离的范畴。象德国马克和英国英镑这样的通货，既不是商品也不是服务，而仅仅是国家用来帮助促进贸易、创造财富和为公共工程筹措资金的发明。然而，施穆勒的劲敌卡尔·门格尔反驳了这一观点。“货币的起源，”门格尔断言，“完全是自然而然

的，它在极少场合下表现出法律的影响。货币不是国家的发明，它也不是立法行为的产物”（Menger 1976: 262）。门格尔指出，在处于自然状态的市场里，货币作为特殊商品出现了，尤其是黄金和白银，由于它们具有耐用、难以破坏、可识别和稳定的特征，因而适宜用作交换的媒介。

其他经济学家强调，国家通货如英国英镑、法国法郎和美国美元完全是黄金和白银重量的特殊表现。例如，在中世纪的英国，“英镑”就被法定为一磅重的纯银。最终每个主要工业国家都采取金本位或银本位制度，并由此建立了国家间的汇率。但最初这些货币代表的确实是不同重量的黄金和白银。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一种国际金本位制能够保证经济自由主义繁荣发展的稳定性吗？历史上，金本位的表现远不是那么完美，它时时表现出所有价格的普遍“通货膨胀”（也被理解为购买力的下降），而在别的时候，又表现为是“货币短缺”和经济萧条。那么产生这种繁荣——萧条的经济周期的原因是什么呢？

许多观察家把经济周期归咎于金本位这一亚当·斯密资本主义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和南非的淘金热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大通货膨胀。在带有通货膨胀性质的繁荣时期之后接着就是突然的倒闭、失业、破产和贸易量滑坡。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贸易周期（Trade Cycle）”，或者更广泛的“经济周期”。经济周期好象是与单个产品供给与需求无关的某种东西。关于对经济繁荣萧条交替循环原因的研究是十九世纪的热门话题之一，并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

最后，是银行业的问题。部分准备金和无视管制的非法“野猫”银行加剧了经济周期。有些经济学家认为银行须持有100%的铸币准备以偿付存款、甚至干脆完全非法化纸币。还有些经济学家坚持，需要有一家中央银行来管制私人银行和需要信贷保险。这样，银行业和信贷业就成了经济学家和立法者心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费雪：货币主义学派的创始人

十九世纪的财政和经济危机引发了有关货币和信贷作用的严重问题：理想的货币标准是什么？如何构建一种可靠的货币银行系统？亚当·斯密自然自由的体系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吗？

很多经济学家都试图解开货币和银行业之谜。但没有人像费雪那样花费如此多的时间来寻找答案。欧文·费雪(1867-1947)是杰出的耶鲁大学教授和“货币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从詹姆斯·托宾到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些顶尖的经济学家们把费雪赞颂为货币宏观经济学之祖和其所在领域中最伟大的理论家之一。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称他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并且毫无疑问的、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Blaug 1986:77）。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和私人生活都致力于货币问题的研究。货币深植在他的血液和头脑中。费雪提出了著名的货币数量论，当然他也因为相信“只有货币至关重要

要”而终生受到指责。在今天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领导的货币主义者的努力下，费雪的理论成果延续了下来。

野心勃勃的欧文·费雪

欧文·费雪1867年生于纽约州北部，从来都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伟人”（Tobin 1987: 371）。因为是公理会牧师(Congregationalist minister)的儿子，欧文一生都保有清教主义和福音主义精神。欧文就读于他父亲的母校耶鲁大学，并于1889年在班上第一个毕业。他还当选为秘密组织骷髅会(Order of Skull and Bones)的成员。

在耶鲁，费雪逐渐培养了对数学毕生的热爱。在他最喜爱的教授威廉·格雷厄姆·萨默尔 (William Graham Sumner)的影响下，费雪成为了一名数理经济学的先锋。他的博士论文——《价值与价格理论的数理研究》创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和效用均衡函数。保罗·萨缪尔森称之为“经济学界前所未有的最伟大博士论文”（Allen 1993:11）。费雪后来（1930）成为计量经济学协会的第一任主席。

费雪在耶鲁教数学。1893年在他26岁时，娶了麦琪·海泽（Margie Hazard）为妻，他们后来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这对夫妇终生不渝地彼此深爱。

他的专业兴趣是货币经济学。1895年，费雪在新组建的美国经济学会会议上提交了他的第一篇论文，名为《货币变化量与繁荣的关系》。货币问题将会是费雪毕生的爱好。

致命疾病的突然打击

1898年，费雪31岁，他正站在远大前程的起点。健康、强壮、新婚燕尔，刚被提升为耶鲁大学政治学系的正式教授。这位年轻的教授正享受着他的幸福生活。

这时，他得到一个悲痛的消息。费雪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TB），在那个年代这等于被判了死刑。几乎没有人能跳过这可怕的疾病。费雪的父亲14年前也死于肺结核。费雪的医生对诊断结果非常震惊，由于无法直接面对费雪，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妻子。

费雪成为一个为健康而战的斗士

费雪决心战胜“不可治愈的”肺结核。仅有的已知治疗的方法就是，及早行动，呼吸大量的新鲜空气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他在纽约隐居，又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住了一年，最后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巴巴拉市。

在科罗拉多，费雪遇到了一个他永不会忘记的人——罗杰·W·巴布森。这个新英格兰人与费雪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患有肺结核，并都对经济学和股票市场深深着迷。他

们创造出治疗肺结核的新方法，共同努力坚持健康的户外生活。他们也继续写出了大量有关货币和财政的文章。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股市大幅上扬时，他们最终站在了对立面上。费雪是永恒的乐观主义者，而巴布森则一直不看好股市。（见本书275页关于罗杰·巴布森的加框文字。）

一个怪人

费雪是个行为古怪的人。他的态度坚决，有点自以为是，衣着整洁、古板，在各个方面都能严于律己。他最终战胜了病魔，这种经历也改变了他对生活的全部看法。费雪的生死斗争使他参加种种有关户外活动、呼吸新鲜空气、规定饮食和营养、体育锻炼、反对吸烟和禁酒的活动。他没有幽默感也很少笑（274页的11.3费雪面带微笑的照片是在兴旺的20年代拍下的）。费雪大约有5英尺9英寸高，体重150磅，是一个健康的典型——他定期用哑铃锻炼，并且骑自行车上班。他总是衣着时髦，留着八字胡，在晚年的时候，还蓄着很短的、修剪得很整齐的胡须。

他平常每天七点起床，然后在家附近逛逛，再吃一顿由水果、烤面包、酸奶组成的早餐。他不吸烟，也不饮酒、咖啡、或茶。他不吃巧克力，也不用胡椒作调料。他遵循一份严格的规定食谱，强调多吃香蕉和花生，并且极少吃肉。有时在他出门在外时，还会到旅馆的厨房亲自指导厨师如何准备他想要的精细食物（Allen 1993:147-48）。

他还是一个激进主义分子，颂扬世界和平的优越性，支持国际联盟，赞成银行业100%准备金制度，是禁烟协会的成员，并且提倡优生学。他深信种族的纯洁性，反对不同种族间的通婚。他一生都坚持到教堂参加礼拜。尽管宗教从不是他的事业之一。

费雪很爱他的妻子麦琪，他把她看作自己心智上的同伴。在旅行的时候，费雪没有一天不给他的妻子写信、打电话或发电报。他的信总是以“最亲爱的”开头。信中充满着爱的宣言，偶尔还夹杂着诗句。

但是很多人也认为这位耶鲁大学的教授虚荣且自视过高，甚至有时飞扬跋扈。他相信工作场所是男人的天地，而女人就该呆在厨房和卧室，尽管晚年时他曾支持经济基础上的平等权利修正案。费雪也认为传统社会低估了妇女的能力。

私人生活上的不幸，比如肺结核，时常影响费雪的经历。1918年的春天，他的大女儿与一个将赴法国的士兵订婚了。费雪竭力主张他们在她的未婚夫去法国前结婚，在社会的压力下，费雪的大女儿得了神经失常，数月后也没有康复。仅在费雪发表美国经济协会主席演讲的几周前，他的大女儿就因脑膜炎在医院去世了。费雪痛恨战争，在女儿死后，他加强了为争取和平和建立国际联盟斗争的力度。

费雪写下了30多部书

费雪是位多产的作家。在经济学方面，他写下了有关资本和利率、新货币标准、经济周期、指数和美元的多部著作。每部书中他都在探索货币的关键作用。货币经济学是他最喜欢的主题，价格稳定是他坚定不移的政策目标。

发明罗拉代克斯（ROLODEX）使费雪成了百万富翁

费雪也是个喜欢制造小巧机械的人，总是在寻找着致富的途径。在学校时，费雪就喜欢摆弄各种各样的小发明，但他的最大突破是在1910年，那一年他发明了一种索引卡片系统。在索引卡片上打孔是件麻烦的工作，于是费雪提出一种解决办法：在卡片底部切一个槽，通过这个槽把卡片附着在一条金属带上，这样罗拉代克斯诞生了。

今天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使用Rolodex，尤其是环形索引系统。费雪在1912年得到了罗拉代克斯的专利权，但他找不到一家愿意生产和销售此种装置的公司。于是在1913年，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索引可视公司（the Index Visible Company），并开始销售他的发明。

12年后，他的公司开始赢利。1925年费雪的公司被一家公司收购，这家公司之后又与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 Rand）合并。费雪突如起来的百万富翁身份使他买了辆大号林肯汽车并雇了一名专职司机。这位大学教授现在成了一个金融巨头和市场预测家。

欧文·费雪成了领袖（IL DUCE）的顾问！

风声鹤唳的权力疯子正从某些几年前拙劣的学术粗制滥造者中提炼他们的狂热。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73[1936]：383）

欧文·费雪首先是个社会改革的斗士，他总是不择手段地要达到他的政治目标。当他听说意大利的当权者本尼托·墨索里尼对货币问题感兴趣时，他就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信，希望能获得他的支持召开一个世界货币会议。领袖在回复中对此表示赞同，于是费雪1927年前往欧洲，在日内瓦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之后，他和一个朋友乘火车来到罗马。

等了几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被带到了领袖面前。费雪说：“您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不稳定货币和稳定性感兴趣，这在世界上的伟人中是极少有的。”他还向这位意大利领导人呈献了一本《货币幻觉》（1926）和一封希望墨索里尼签署的、有关支持世界货币会议的信函。墨索里尼为了避免在信上签字，询问了费雪有关意大利经济的状况。费雪当时的回答是，紧缩货币系统以谋求回到金本位是个严重的错误。费雪满怀希望的离开了。

墨索里尼没有签署那封信，这位意大利总统也没有作出任何私人回应。直到1931年6月，墨索里尼通过一位大使告诉费雪他已经读过了《货币幻觉》，并对这本书很感兴趣。在受到了鼓励

之后，费雪马上写了回信，但再未得到回音。显然，这位意大利独裁者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脑海中有其它更迫切的需要。

华尔街的先知

费雪百万富翁的身份使他成为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的先知”，有关股票市场前景和经济展望的纽约报纸频繁地引用他的话。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斯利·C·米切尔（Wesley C.Mitchell）一起，费雪也成了兴旺的20年代“新时代”乐观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是向往美好新世界的使徒之一。他把股票市场的兴旺视为美国长期繁荣新时代的反映，并且相信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美联储会避免将来的任何经济萧条或货币危机（Skousen 1993:249-56）。

除了持有兰德公司的股份之外，费雪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还在一些小盘成长性股票（small-growth stock）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他甚至采取**保证金购买**（bought on margin），据估计他的股票在牛市高峰时值1千万。

费雪与巴布森的牛市、熊市之争

1929年秋天，费雪和他的老朋友罗杰·巴布森在关于市场趋势的问题上发生了公开争执。巴布森是一位声名狼藉的末日主义者。早在1926年，他就曾警告说华尔街已陷入典型的泡沫之中，将会遭受股市崩盘。1929年9月，当对股票行情看跌的巴布森再次提醒投资者股市崩盘“近在眼前”时，对股票行情看涨的费雪则告诉纽约的报纸，“股票价格可能会有所回落，但决没有任何崩盘的可能。”

在之后的两个月里，费雪似乎占了上风。尽管股票价格此时有所波动，但未有暴跌状况发生。1929年10月16日，星期一，离股市崩盘不到两周，费雪做了一个“**即成永世的（soon-to-be-immortal）**”预言——“股票价格看起来永久地达到了较高的稳定水平”（Skousen 1993:252-53）。

当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29年9月3日达到了381点的高峰，那之后再达到这一顶点是几十年以后了。在这年年末，道琼斯指数跌到200点，失去了将近一半的价值。十月末的股票崩盘也仅仅是一个漫长、一波三折的股票价值降低的开始。

但是费雪并未被吓住。1929年12月中旬，他写了一本名为《**股票崩盘——之后**》的书，这成了他为重建国家乐观主义态度的一种勇敢而又顽固的尝试。他执拗地为自己辩解道，“在经济恐慌开始前，我已在9月份阐述了我的观点——股票行情已到了顶峰，就像

事实发生的那样。我也表达了估价衰退不具备严重崩盘性质的看法，在这点上我是错误的。我还预计了新的股票价格稳定水平将会在衰退后继续存在，这已被证明是真的。”他继续说，“就近期来说，至少前景是光明的”（Fisher 1930: vii）

罗杰·巴布森 “华尔街悲观的奥古斯都”

我得到的首要教训可能是这个世界是由情感统治着，而不是由数据、信息或其他什么东西。

——罗杰·W·巴布森

罗杰·W·巴布森（1875—1967），金融权威和商业经济学家。他的生活与欧文·费雪惊人的相似。象费雪一样，巴布森是一个对商业统计、股票市场、健康问题和正义事业深深着迷的新英格兰人。他们都是发明家、禁酒令的维护者，也都是保健迷。

象费雪一样，巴布森深受患结核病那段时光的影响。除了宗教信仰外，巴布森极力强调阳光和新鲜空气对人的重要性。他在波士顿的办公室常年开着窗，即使是冬天也不例外（见照片 11.4）。他为他的秘书设计了特殊的手套，使她在极冷的温度下也能继续打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巴布森和他的妻子在佛罗里达州威尔士湖市（Lake Wales）附近买了一所房子，他们在那里度过冬天。现在，这一地区被称为巴布森园（Babson Park），是韦伯学院（Webber College）的总部（一所女子商业学校）。他先前曾建立巴布森学院（Babson College），是一所马萨诸塞州的商业学校。

对牛顿疯狂着迷

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学士，巴布森对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爵士的物理学第三定律很着迷：“每个作用力都有一个大小相等且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他被牛顿如此深深吸引，以致于在与马萨诸塞州巴布森园的巴布森校图书馆内仿建了牛顿在伦敦的会客厅。无论墙、门还是百叶窗，都完全相同。象亚当·斯密一样，巴布森试图把牛顿定律引入到经济学和金融当中。他的“巴布森曲线图”描绘了产量、商品价格和股票指数是如何围绕巴布森趋势线上下波动的。在很多方面，巴布森是一位技术分析的先驱。他是20世纪20年代的图表主义者（chartlist）。

根据巴布森曲线图，早在1926年9月巴布森就对股票行情看跌。那时道琼斯工业指数在160左右，在达到顶点前还会再涨200点。巴布森承认这是他最大的错误：“尽管我在1929年9月的经济崩溃前很短时间，做了非常悲观的预测，然而，我大概18个月以来一直在发出的类似警告。尽管一项对报纸材料的研究显示巴布森**组织（Babson Organization）**由于预测了1929—35年的大萧

条而获得了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声望，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预计的衰退应该比实际发生的更早，同样我们预测的回升势头也应在比1932年来得更早”（Babson 1950：267）。

1940年，巴布森成为禁酒党的总统候选人。他写了为数众多的作品，其中包括他的自传《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这个名字来源于牛顿的物理学说。

巴布森也因他的至理名言而闻名：

1、“大多数人已经掌握的知识比他们应用的多得多。他们需要继承和发扬能够促使他们完全应用所拥有知识的人格。”

2、“不幸的是，我不能像一个医生那样把自己的错误埋葬在四英尺深的地下。”

3、“一个成功人士的能力并不见得像他的行为一样出色。”

4、“我们应该多读些20年、40年甚至80年前的书籍，而少读些当代的。”

关于最后一句引言，大概他把自己的书也考虑在内了。那些书现在已经绝版。

费雪面临破产

真可叹，费雪错的实在太离谱了。尽管他深信赫伯特·胡佛总统的计划能够遏制事态发展，但在1932年降至最低点前，道琼斯工业指数又降了200点，大约在40点左右波动。在1929—32年崩溃阶段，平均股价的下降幅度超过90%。费雪自己的投资组合也被扩愈演愈烈的华尔街熊市彻底摧毁。传记作家罗伯特·罗林·艾伦(Robert Loring Allen)评论说，“他有关股市崩盘和衰退的观点是错误的，这对他来说非常难接受”（Allen 1993：220）

为了终结三十年代早期的萧条，费雪曾提倡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和费除金本位。但胡佛未采用其中的任何措施，于是环境更加恶化。银行纷纷倒闭、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失业。费雪拥护富兰克林·F·罗斯福在1933年的银行假期（bank holiday）规定，他感到最低点已经达到，他最终会战胜破产。费雪反对公共工程计划而赞同通过扩大货币供给解决萧条。他成为罗斯福的一名非正式顾问，从1933年到1944年他给罗斯福写了100封信（罗斯福回复了20封）。费雪反对国家工业复苏法案、农业调整法案和罗斯福政府的其它干预生产过程的措施。他同样不支持对收入和资本利得征税，认为这会破坏生产力。罗斯福采纳了费雪有关对银行存款进行政府保险的想法，但拒绝了他的其它货币政策建议。

在20世纪30年代费雪60多岁的时候，他在耶鲁一年只教一门课，其余时间他是一名经济改革者和斗士。市场复苏了，但费雪个人的经济状况并未好转。他没能从危机中恢复元气而且始终在被迫应付沉重的债务、贬值的资产，还不断同政府税务机构就他以往的收入激烈的争论。费雪妻子富有的姐姐把他从破产中拯救了出来。她一度借给他10万美元。

1931年1月是个不幸的月份：费雪得了肺炎，同时他又收到美国国税局的一封来信，要求其偿还61234美元的税款。清偿政府债务花去了他好几年的时间。

费雪去世时一文不名

1935年，费雪在耶鲁面临强制退休。由于不能对他的房子抵押付款，耶鲁同意签署终身租期协议，买下这所房子然后再租给费雪的。到1939年，费雪欠他妻姐的钱超过75万美元，这些钱他一直也没有还清。1940年，费雪深爱的妻子麦琪死了，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旅居客地。他努力寻找赚回几百万美元的方法，却深受那些无法具体化的古怪计划之害。他发明了一种可折叠的三条腿椅子并试图把它卖给西尔斯·罗布克（Sears Roebuck），然而遭到拒绝。最终，在1947年，他被癌症击倒，去世了。艾伦写到，“他的努力使他成为全国最闻名却最不成功的货币改革家，他糟糕的判断使他丧失了财富、生意和家……在极大程度上……他希望自己能够作为商人、投资者、政策顾问、政治家、政论家、优生学提倡者、健康热衷者和博爱慈善的人来追求他想要的东西，他失败了”（1993：269—70，297—98）。

费雪的货币模型：什么错了？

尽管欧文·费雪的财富毫无疑问地使他对即将到来的风暴失去了判断力，但他没能预计20世纪最大的金融危机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在市场中的既得利益。相反，这主要是由于他不完善的货币观点。

他致命的缺陷在于他的货币论过于“宏观”的方法。他拒绝观察货币经济的内部运行。当涉及到货币的时候，费雪忽视了个人行为 and 微观经济学理论。相反，他透过笼统、总量的眼镜观察货币。他观察总的经济走势，如货币与信用在经济中增长有多快，但并不留意那些个人与机构先获得货币。他监测总价格水平受到的影响，并倡导编制价格指数，但忽略了单个产品价格在经济具体部门内如何运作。他测量了国家产出，但没能注意到单个企业和市场的起伏。费雪倾向于加总而不愿意分解。简言之，他没有意识到经济和银行系统中严重的结构不平衡。

费雪把资本看成一笔**资金（fund）**

费雪的著作从一开始就过于宏观。他关于资本和利率的首批书籍是在1906—07年间出版的，书中把资本看作一种强大的混合资金，它能易被操控，并随利率升降和经济结构变化而随意流动。“**资本是一笔资金而收益是一笔资金流**，”他写到（Fisher 1906：52）。这样，根据费雪的观点，资本的流动性非常好，因而经济就能迅速适应任何一种资本混乱

和经济危机。他持有与约翰·贝茨·克拉克 (及之后的弗兰克·耐特Frank Knight)相同的观点：资本是一种同类资金，它在没有很多配置混乱的情况下有效率地向收益最好的用途转移。就像一个蓄水池，那里的水能迅速地找到适当的平衡。

这种观点与欧根·柏姆-巴维克和奥地利学派的的观点形成强烈对比，他们认为资本主要是异质的，并且流动性很非常差。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和投资基金形式的资本是同质的、流动性很好，但投资在建筑、装备和机器上的资本是异质的、缺乏流动性。奥地利学派对投资资本金和资本品作了严格区分。

资本的性质在20世纪初是一个热点讨论问题，因为经济学家们想要知道经济能从萧条中调整和复苏的速度。如果资本是同质的且流动性强，那么调整的时间不会太长，经济会很快复原。但是如果资本是异质的且难以转向其它用途，那么调整过程会更长，一个国家从萧条中复苏可能要花好几年的时间。

费雪持有乐观态度——资本异质和资本流动性不是重大问题，不大可能造成严重的萧条。事实证明，这成了他的阿喀琉斯之踵。

费雪的重要贡献：货币数量论

欧文·费雪最著名论断出现在他接下来的著作——《货币的购买力》（1922[1911]）中。就是这部书使费雪一跃成为经济学界的顶尖人物。《货币的购买力》1977年由麦克米伦图书公司出版，几年间被译成日语、德语、俄语和法语，一部分内容被再版成有关货币银行学的选集。在这本书中，费雪向世界介绍了一个数学公式来说明他的货币理论，即货币数量论。

货币数量论的主题是通货膨胀（价格普遍上升）主要是由于货币和信用扩张造成的，在价格水平变化和货币供给变化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如果货币供给成倍增减，价格也将成倍升降。

包括大卫·休谟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在费雪之前就坚持这一种货币理论。1752年休谟警告他的国人，“但是……增加额（货币数量的）除了提高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外没有其它作用”（Friedman 1987：3）。1844年，穆勒得出结论，“一国政府的货币发行，即使只是临时的，也会使价格提高”（Friedman 1987：10）。

费雪创造了一个数学公式

费雪走得更远。他用一个数学方程阐述了他的理论。他首先引入西蒙·纽科姆（Simon Newcomb）1885年构建的货币与商品间的“交换方程”：

$$M \times V = P \times Q$$

这里，

M = 货币流通量

V = 货币流通速度，或称货币年周转率

P = 价格总水平

Q = 当年生产商品数量

这个交换方程实际上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会计恒等式。**等式右边代表货币转移，左边代表商品转移（这里原书写反了）**。在任何交易中，商品的价值一定等于转移的货币量。类似地，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乘以一年内货币转手的平均次数一定等于当年生产和出售的商品和服务的美元量。若一国货币供给总计2千亿美元，且一年中这2千亿美元从一人手中流通到另一人手中的平均次数是5，经济总支出是1万亿美元。因此，如果你把一年中所有生产和出售的商品和服务加总，被消费者购买（或被生产者出售的）的价值就应该等于1万亿美元。因此，按定义， $M \times V$ 一定等于 $P \times Q$ 。

交换方程并不是一种理论。从定义上看它是正确的，而实质上，它是一种同义反复。

然而，费雪把交换方程转换成一种理论。他假定 V （周转率）和 Q （产量）保持相对稳定，因此价格水平的变化一定和货币供给变化直接相关。正如费雪所述，“假如货币流通速度和强制实施的交易量不变，价格水平与流通中货币数量直接成正向同比例变化”

（1963[1922]：14）。

他称之为货币数量论。

费雪的模型把他引入歧途

费雪坚信长期货币中性；也就是说，货币供给的增加将导致价格的同比例增长而且不会产生长期负面后果。而当他谈到具体生产行业可能发生的“失调”和“过度投资”（奥地利学派所用术语）时，费雪把他们看作主要由制度因素（契约、习俗和法律规定）造成的短期不平衡，这些制度最终会自行解决。

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曾提出经济周期不再存在于经济系统中。这种天真的信仰导致了他的毁灭。他支持联邦储备系统渐近的信用扩张，并且认为只要价格保持相对稳定，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费雪，一位新时代的经济学家，充分依赖美国的新中央银行并期望在危机产生时，联邦储备系统能够加以干预。

20世纪20年代价格稳定蒙蔽了费雪

根据费雪的说法，方程中需要监管的关键可变因素是P，即一般价格水平。如果价格是相对稳定的，那就不会有大的危机和萧条发生。低通货膨胀将意味着低利率和稳定利润。

价格稳定是费雪在20世纪20年代主要的货币目标。他成了“稳定货币”运动的重要倡导者，并在1920—21年组织了稳定货币协会。稳定联盟的其它主要成员有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阿瑟·庇古（Arthur C. Pigou）、罗尔福·G·霍特（Ralph G. Hawtrey）、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古斯塔夫·卡赛尔（Gustav Cassel）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ynard Keynes）。

费雪感到国际金本位并不能靠它自身实现价格稳定。它需要联邦储备系统的帮助，联邦储备系统建于1913年，旨在必要时创造资产流动性和信用，稳定经济以及防止萧条和危机。费雪认为，如果批发和消费价格保持相对稳定，情况就会很好。但是如果价格开始下跌，出现通货紧缩的威胁，联邦储备系统就应干涉并扩张信用。

事实上，美国的批发和消费价格是相当稳定的，在20世纪20年代仅有微小下降。由此，这位新时代货币学家在1929年大危机将至时仍认为一切状况良好。其实，一位当代货币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指出，20世纪20年代是“储备系统的高潮”，并说明，“20年代大体上是一段高度繁荣和经济稳定增长时期”（Friedman 1963：296）。

1929年的股市价格高估了吗？

如果高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去，股市的价格也许能维持。

——安娜·J·施瓦兹 Anna J. Schwartz（1987：130）

什么！1929年的华尔街并没有投机过度（speculative orgy）？欧文·费雪在股市崩盘前夕1929年10月21日曾说过，“即使在目前的高位市场中，股票价格仍未达到它的真实价值”（Skousen 1993：253）。这是合理的么？是这样的，现代财政货币学家安娜·J·施瓦兹和杰拉尔德·锡金（Gerald Sikiu）这么认为。施瓦兹勇敢地为费雪辩白：“现在，对受收益增长预期影响的股票价值理论的应用说明，象欧文·费雪所相信的那样，股票的市场价格高估现象并不普遍”（Schwartz 1987：130）。奇怪的是，她这篇文章发表的那年，股票市场再次崩盘（1987）！

她引述了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教授杰拉尔德·锡金的著作。以看似合理的1929年多数蓝筹股市盈率为基础，锡金得出结论：1929年所有股票价格“并没有呈现出‘投机过度’的景象”

(Sikin 1975: 223—31)。

象牙塔中的学术派四处横行

这是关于自鸣得意的象牙塔思想的一个典型例子。市盈率常常会掩盖投机泡沫，因为在牛市中无论价格还是收益都是趋于上升的。一个更好的检验是把股票总回报与GDP或工业产出相比较。例如，从1926年到1929年，工业产出仅上升8.1%，商品价格下降4.7%，而此时普通股价格却上升了93%！根据平均普通股标准数据，若以最佳组合持有美国多种股票，则在1924至1929年间会获得超出三倍的收益。我得说那真是投机过度。

对数量论的批评

费雪方法中一个重大纰漏就是他过分强调长期宏观经济均衡。在费雪的世界里，通货膨胀的主要后果是价格总水平的上升，而不是结构失衡和经济周期。之前我们曾提到，在20世纪20年代，费雪甚至否认繁荣萧条经济周期的存在。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特别批判了货币主义者的这种空想观点，把它称为“把当前形势引入歧途的向导。”他写道，“经济学家们给自己的任务太简单又太没用了，如果是在暴风雨的季节，他们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当风暴过去很久以后，海面又会恢复平静”（Keynes 1971: 65）。

不幸的是，费雪和他的追随者们由于把注意力仅集中在总的统计数据上，因而低估了20世纪20年代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通过强调美国经济长期均衡和价格稳定性，费雪和其他新时代经济学家没有考虑以下美国经济的脆弱方面：

1、联邦储备系统的利率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联储都致力于“放松银根”的政策，贴现率从1921年的7%下降到1928年初的3.5%。本杰明·安德森 (Benjamin Anderson) 曾说过“为资本使用和投机提供过多的廉价货币和无限的银行信用”导致了1922-1928的虚假繁荣 (Skousen 1993: 265)。紧跟这种放松银根之后的1928—29年利率审慎增长，打破了虚假繁荣并击碎了华尔街的泡沫。1929年10月，美联储的贴现率增加到6%，股票保证金的活期贷款利率达到15—20%。这样高的利率应该为所有老练的投机者敲响了警钟。但费雪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他完全被他的数量论和对新时代的激情迷住了双眼。

2、经济结构失衡。与费雪的模型相反，通货膨胀对经济的作用并不是唯一的。宽松信用的政策对市场不同部分的影响各不相同，尤其是对资本品市场。20世纪20年代，商品或消费价格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发生了工业产品激增，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也出现了资产通胀 (asset inflation)。经济学家们把这种情况称为“过度投资”或“恶性投资”繁荣，

这时的住宅、资本密集型产业和股票以一个难以维持的增长率前进。尤其佛罗里达和曼哈顿的房地产繁荣影响了反映了这种不平衡。当1929年利率达到最高点时，过度投资繁荣嘎然而止。

3、国际金本位制。费雪和他的追随者们同样低估了国际金本位的力量。如果世界经济取消金本位而改用不兑现纸币本位制（费雪心中的理想体制），通胀性繁荣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但是在金本位制下，中央银行的力量有时也会受到束缚。中央银行无法持续增加国内货币供给而不造成国外负面反应。例如，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导致黄金流往国外，这会使美联储被迫提高利率、削减信用量，而且带来衰退。黄金流失是1929—32年经济危机期间美联储官员真正的恐惧。

更新

1929年股市崩盘和大萧条是可以预测的吗？

1929至1933年折经济崩溃不可预见也非不可避免。

——米尔顿·弗里德曼（1963：247）

1988年9月份的《美国经济评论》上，三位来自哈佛和耶鲁的顶尖计量经济学家尝试回到过去，看看用现代的时间序列分析是否能预测1929年股市崩盘和大萧条。他们使用了与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和哈佛经济服务社(Harvard Economic Service)完全相同的数据。费雪和哈佛经济服务社都没能预计到股市崩盘和随之而来的萧条。

他们的结论是什么？1929—33年的大灾难是“不可预见的。”他们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象费雪的模型一样，没能预测到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个结论让他们丢脸吗？不！他们认为，与其责备费雪和哈佛经济服务社失败，不如说他们被“束缚住了。”这三位计量经济学家得出结论：面对即将来临的世界性灾难，耶鲁和哈佛“有理由发生崩盘的前夕以及崩盘后一个月，对经济状况表示乐观”（Dominguez et al. 1988:605）。这对成千上万听从他们建议的投资者来说是种安慰！

奇怪的是，这三位来自哈佛和耶鲁的经济学家忽视了几位与费雪同时代的学者的警告，这些学者预言了危机，其中包括“健全货币”经济学家本杰明·M·安德森（Benjamim M.Anderson），他是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的首席经济师；还包括H·帕克·威尔斯(H.Parker Willis)，他是哥伦比亚大学银行学教授和《商业杂志》的编辑。这两位经济学家对费雪和他的货币数量论持高度批判态度。1988年的这篇文章同样忽视了其他有识之士的预见，如奥地利学派的

总结：对新货币理论的需要

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预见世界历史上最大货币灾难上犯下的错误迫使经济学家们寻找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审视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这种新理论之前，我们必须看一看费雪的主要对手、一种在欧洲大陆上产生的货币理论——奥地利学派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工作。利用了克努特·维克塞尔和其他同时代经济学家的深刻经济理论，米塞斯和哈耶克能够预见1929—32年的经济危机，同时他们还提供了一种寻回遗失的货币链条的更为完善的方法。米塞斯、哈耶克和维克塞尔是第12章的主人公——在极富戏剧性的经济学之中。

插图及图表注解

P270

图片11·1 欧文·费雪（1867—1947）

“他写下了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博士论文”

感谢布朗兄弟提供

P273

图片11·2 本尼托·墨索里尼

“考虑了” 欧文·费雪的货币建议。

感谢蒙赫尔顿—格蒂（Hulton—Getty）档案馆提供

P274

图片11·3 1927年股票市场崩盘前富有、快乐的费雪。

感谢飞鸽图片社（Culver Pictures）提供

图片11·4 罗杰·巴布森正向秘书口述：巴布森笃信新鲜空气的作用——甚至在寒冷的冬季 感谢巴布森学院（Babson College）提供

第十二章 失踪的米塞斯（Mises）： 米塞斯（和维克塞尔）取得了重大突破

本章音乐精选：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第五交响乐

最后，经济学完整了，成为以个人行为为基础的分析综合体；货币与相对价格之间、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裂缝不见了。

—— 穆雷·N·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 (1980: 245)

在本世纪的一个关键时期，米塞斯和哈耶克(Hayek)极大地丰富了亚当·斯密的基本原理并使之成为一个系统的整体。

—— 弗农·L·史密斯Vernon L. Smith (1999: 208)

卓越的耶鲁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预测1929-32年间大危机上的失误是这个时期的明确例证。货币经济学——货币、信用和银行业的作用——不是一个能简单解决的问题。费雪自己的解决方法即他的数理货币数量论，在解释或预测价格、交易和工业活动的上下波动时表现得令人痛心，极不充分。想象一下，在历史上最大经济崩溃的几个个月前，他居然还告诉他的同事，经济周期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费雪的老对手罗杰·巴布森（Roger Babson），在预测货币和商业环境方面做得稍好，但他的巴布森图表也使他的预测过于提前，有时甚至是几年。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他曾成功地预测了一战和约的负面影响和由于高估英镑而产生的英国经济萧条，但他在预测1929-32年间的危机上并不走运。他试图建立一种“信用循环”预测模型，但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他放弃了任何形式的市场预测（Keynes 1983: 100）。凯恩斯加入其它已建功立业的经济学家们的阵营，如欧文·费雪、罗尔福·霍特里（Ralph Hawtrey）和卫斯理·C·米切尔（Wesley C. Mitchell），和他们一起陷入了对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新时代乐观主义之中，并与他们一样认为只要商品价格稳定、央行进行控制，就不会有任何萧条的可能。（凯恩斯1929年以前的观点将在第13章中讨论）

奥地利学派又一次拯救了经济学

然而，确实有一个经济学派预测到了股票市场崩盘和世界范围的大萧条，这个预测建立在一种深奥的货币理论基础上。此学派来自于奥地利经济学家中崭露头角的一代，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 为代表。由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理论洞察力。米塞斯和哈耶克被称为20世纪“新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

在这两位奠基人中，是米塞斯创建了货币与经济周期的奥地利学派基本理论。尽管，如我们将看到，哈耶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并且因此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米塞斯革命性的宏观经济学模型也利用了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 (David Hume)、英国金融家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 (Knut Wicksell) 和米塞斯的老师欧根·柏姆-巴维克 (Eugen Böhm-Bawerk) 早期的开创性成果。他们做出了关键的贡献，然而米塞斯把这些成果结合到一起形成了完整的货币理论。

米塞斯认为，与费雪理论正相反，通货膨胀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会导致无法维持的经济结构失衡。用米塞斯的话说，货币是“非中性的。”依据米塞斯和他的追随者的观点，央行20世纪20年代促进通货膨胀并降低利率的决定必然造成虚假繁荣。然而，在国际金本位制下，这种通货膨胀性繁荣必然短命。经济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很严重。

当米塞斯和哈耶克的不详预言在1929—32年间变成现实时，经济学界才给予他们极大关注。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拥向维也纳来参加著名的米塞斯的研讨班。米塞斯的著作也被译成英语，与此同时，他的年轻同事哈耶克也被邀请在享有盛名的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几十年后，在1974年，哈耶克因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开创性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近而激发了人们对奥地利学派经济观点新的兴趣。

让我们开始讲述这位创造货币理论新方法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故事。

米塞斯的传奇：钢铁般的意志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 的一生开始于利沃夫 (Lemberg) 城，那时它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位于维也纳以东350英里。今天Lemberg叫利沃夫 (Lvov)，隶属于俄联邦的乌克兰。路 (他的爱称) 是一个显赫的犹太家庭三个儿子中的长子；他的父亲是位建筑工程师，由于他对奥地利铁路建设的特殊贡献，被授予“冯”这个荣誉头衔。(见下表有关“冯”的加框文字。) 米塞斯母亲的叔叔是奥地利国会的自由党众议员。

路在20世纪初考上了维也纳大学，在那里他读了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 (Grundsätze) 并参加了著名的柏姆-巴维克研讨班。在他们的影响下，米塞斯拒绝接受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1906年，他25岁的时候就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随时可以为世界作贡献了。

噢，被授予一个“冯”

由非凡的博士、教授——马克·冯·斯库森（Mark von Skousen）先生撰写

欧洲人以向公民授予骑士爵位和贵族头衔而闻名于世，他们可能会被授予勋爵、男爵、骑士和公爵等爵位。在奥地利，“大公”直到一战末还只是哈布斯堡王室家族人员的头衔。像普鲁士德国一样，奥匈帝国重视英雄崇拜、仪式和名誉地位。

“冯”是奥地利帝国的一个头衔，它被授予为政府工作的人，偶尔也会授予有特殊功绩的专家或商人。他与英国的“爵士”类似，但它由所有男性及未婚女性后裔继承。所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继承了父亲的头衔，他父亲是因为在奥地利铁路上的贡献而被授予“冯”这个荣誉头衔的。其他带有头衔的奥地利经济学家还有柏姆-巴维克、维塞尔（Wieser）和哈耶克。门格尔（Menger）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就放弃了“冯”这个头衔。哈耶克是在他加入英国国籍后放弃的。

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后，“冯”这个头衔被废除，大多数带有这个头衔的人都把它从名字中剔除。然而，它仍广泛地被另外一些人使用。哈耶克认为，这些名字应该以真实姓氏的开头字母为序加入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列表（如米塞斯，而不是冯·米塞斯），不象荷兰人那些以“范”（Van）开头的姓氏。

现在世界大战结束了，我想我不得不重新用罗林斯学院（Rollins College）的最初的、卑微的头衔：经济学副教授。

31岁的米塞斯发现了那缺失的一环

有了博士学位在手，米塞斯很快就成为维也纳商业厅的首席经济师，但他的真正目标是想在维也纳大学当教授。1912年，他完成了突破性著作《货币与流通手段理论》（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之后被译成英文名为《货币与信用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挑战费雪货币数量论的深奥货币模型。这本《货币和信用》弥补了微观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缺失的一环，这真是一部精心杰作。他的著作获得了充分认可，这使他在大学里谋得了一个职位，但是，是当一名无薪大学教师，既没有工资，又是兼职。战后，到了任命柏姆-巴维克和维塞尔接班人的时候，大学拒绝了米塞斯而选择了其他两个人。米塞斯仍是无薪大学教师。

在三个问题上的歧视

米塞斯没有被任命基于以下三个理由：

1. 他是身处反犹太人情绪滋长的国家里的犹太人。
2. 在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时代，他是自由放任主义坚定不移的倡导者。

3. 他本人是教条而决不妥协的。米塞斯自己承认，“我偶尔会因为说明自己的观点时过于直言不讳和不妥协而受到指责，有人告诉我，如果我愿意表现得折中一点可能会得到更多……我觉得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L. Mises 1978: 74）。

米塞斯继续在政府掌控的维也纳商业厅工作，在那里他成为政府的非正式顾问。这里有两个故事值得再讲一下。

米塞斯与红色维也纳

一战后，几个东欧国家尝试着追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奥地利在1918—19年冬天仍在遭受协约国的食品封锁。此外，由奥托·鲍尔（Otto Bauer）领导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控制着“红色维也纳”，并计划把整个国家纳入布尔什维克阵营。米塞斯战前在柏姆-巴维克研讨班时和鲍尔是朋友。他日以继夜地试图劝说鲍尔和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妻子，告诉他们共产主义政体将意味着协约国的更严重的食品封锁并会使他们的事业完全丧失名誉。最终，米塞斯说服鲍尔推迟了他的革命计划，把奥地利人从毁灭中拯救出来。之后，米塞斯用单枪匹马地阻止布尔什维克接管奥地利这件事来为自己邀功（Rothbard 1988: 31），但奥托·鲍尔后来因此事遭人怨恨。他被革命同志们痛斥为叛徒，鲍尔憎恨米塞斯，并试图令米塞斯丢掉他的大学教职。他们彼此再没说过一句话。

米塞斯版本的“如何停止通货膨胀”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由于承担着和约的过重负担，奥地利象德国一样，借助于极度通货膨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回忆说，他每月的薪水在1921年10月是每月5000克朗，11月份涨到15000克朗，到1922年7月达到了100万克朗。在德国，通货膨胀的情况更糟。米塞斯随时期待着被提名为解决通货膨胀危机的财政大臣，但始终未能如愿。

最后，在极度通货膨胀的高峰时，一个国际联盟委员会被派往维也纳。在深感忧虑的奥地利政府官员的陪同下，为了寻求米塞斯关于结束严重通货膨胀的建议，他们拜访了他。米塞斯直率地回答说，“午夜12点到这栋楼里等我，我会告诉你们。”官员们疑惑地摇摇头，但最终还同意了。午夜，在指定的地点见到米塞斯后，他们急切的问到，“米塞斯教授，我们怎么能停止通货膨胀呢？”他回答说，“听到那噪音了吗？把它关掉！”原来这栋建筑是政府的印刷厂，它日夜不停地印着新钞票。停止噪声正是奥地利政府所做的，而后通货膨胀结束了（Hayek 1994: 70）。

20年代的生活

兴旺的二十年代是米塞斯的忙碌时期，他写了一本后来会被赞为经典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书。他在1920—1934年也继承了柏姆-巴维克私人研讨班的传统。私人研讨班是一个讨论主要经济和政治问题的非正式论坛，每周五傍晚，在他商业厅的办公室举行。之后，这群人会在他们最喜欢的咖啡馆里吃晚饭，并在那里一直呆到凌晨一点钟。参加研讨班都是受邀而来的人，每个参加者都把接到邀请看得无比光荣。

米塞斯很重隐私的人。很多年来一直是个坚定的单身主义者，他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米塞斯快到57岁时才结婚。1938年，在瑞士的日内瓦，他娶了演员玛吉特·塞兰妮·海兹菲尔德（Margit Sereny-Herzfeld）——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寡妇。

米塞斯家族之争：理查德（Richard）对路德维希

理查德是最出色的；至于经济学，谁都懂。

—— 理查德·冯·米塞斯夫人在比较两兄弟时说

[理查德]从他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是一个实证主义者。

——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谈到他弟弟的死时说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总是担心会被他的弟弟理查德超过。路德维希25岁时获得了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但一年后，24岁的理查德获得了更为困难的科目——数学的博士学位。路德维希提出了卓越的经济学新理论，但没能在大学谋得一个全职、有薪的工作。而理查德马上被斯特拉斯堡大学任命为数学教授。1913年，理查德学会了开飞机并教授大学第一流课程中的有关空气动力学的一门。大战期间，两兄弟都为奥地利而战，但路德维希是个在前线的炮兵军官；理查德则是一个主管研制军用飞机的总工程师，他还协助开发出一种新颖的机翼设计。理查德被视为飞机设计领域的伟大先驱之一。

战后，在两人的对抗中，理查德仍占有利位置。路德维希成为维也纳商业厅的首席经济师和政府非正式顾问。最终，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教师——一位无薪的教师！此时，理查德回到享有盛名的柏林大学教数学，在那里他写了几部关于统计学（凯恩斯也写过的科目）和空气动力学的书。

1933年，纳粹党想召理查德入伍当一名飞机工程师，被他拒绝，理查德离开德国，接受了伊斯坦布尔大学的职位。同样面临纳粹压制的路德维希1934年也离开了他心爱的维也纳并接受了日内瓦大学的教授职务。终于，路德维希获得了一个有薪的大学职位！

可惜这个职位没能延续下去。在政治压力下的瑞士官员们让路德维希感到不受欢迎。年近60，沮丧又穷困潦倒的路德维希和他的妻子移民去了美国。1940年8月他们到了纽约。

谁在那里迎接他呢？他的弟弟理查德，理查德1939年，差不多两年前，加入了哈佛大学的教员行列！1944年，理查德成为空气动力学和应用数学的戈登·麦凯（Gordon McKay）教授。到1954年去世，他一直在这个职位上。

这时，失意的米塞斯再没能找到一份全职有薪的工作。他最后成了纽约大学客座教授。他的薪水是朋友资助的。

路德维希和理查德偶尔会见面但并不亲近。首先，他们在哲学上有强烈的分歧。理查德是维也纳学会的成员，这是一个哲学家团体。学会成员还包括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他们赞成逻辑实证论，用经验主义的事实作为检验理论的依据。米塞斯反对实证主义，赞同纯演绎法推理。穆雷·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曾在纽约随米塞斯学习，他曾问路德维希怎样看他弟弟的书——1951年由哈佛学院出版的《逻辑实证论》。“米塞斯坐直身体，态度异常严厉，眼睛炯炯有神：‘我不赞同那本书，’他一字一句毫不含糊地说，‘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那是一种不想再做进一步探讨的语气”Rothbard 1988:79）

今天，一代人以后，哥哥也许最终占了上风。理查德只有一本书《飞行理论》现在仍在出售，而路德维希关于经济学和哲学的许多书都仍在出版，并被世界各地的读者阅读。甚至有一个公益基金会以他的名字命名——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协会，该协会位于亚拉巴马州的奥本（Auburn）大学。

预言1929-32年经济危机：“那会是一场大破产！”

20世纪20年代，米塞斯和哈耶克建立了奥地利经济研究所，监视和预测欧洲经济状况。早在1924年，米塞斯就相信经济危机将要到来。依据他的开创性著作《货币与流通手段理论》，米塞斯意识到中央银行放松信用的政策会在国际金本位下导致灾难。

他的一个学生，弗里茨·麦克鲁坡（Fritz Machlup）回忆米塞斯的“预言的天赋”：“作为他在大学研讨会的助手，在每周三下午会面结束后，我常陪他回家。在路上我们会穿过维也纳信贷（Kreditanstalt）银行（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的过道。从1924年开始，每周三下午当我们走过这条为行人准备的过道时，他都会说，‘那会是个大破产。’请注意，这是从1924年起；然而当1931年银行倒闭真的到来的时候，我仍持有信贷银行的一些股份，当然这些股份也变得毫无价值了”（Machlup 1974:12）。

1929年夏天，有人为米塞斯在信贷银行谋得一个很高的职位。米塞斯未来的妻子玛吉特欣喜若狂，但米塞斯决定拒绝让她大吃一惊。“为什么不？”她问到，他的回答让她更为震惊：“大崩溃就要来了，我不希望我的名字以任何方式和它联系在一起。”他喜欢写作和教书。“如果你想要个有钱人，”他说，“不要嫁给我，我对赚钱并不感兴趣。我在

写的书是关于货币的，但我自己永远都不会有太多钱”（M. Mises 1984:23-24）。

在华尔街崩溃后的几个月，世界贸易严重受创。在1931年5月，信贷银行破产了，这比其它任何事件都更进一步加剧了遍及欧洲的萧条。

萧条的高涨时期过后，米塞斯在英文版《货币与信用理论》（写于1934年6月）的序言中这样评论他的预言：

从1926年到1929年，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美国经济繁荣的问题上。当人们沉浸在先前由信用扩张引起的繁荣当中时，他们相信这种繁荣会永远地持续下去，而对经济学家们的警告完全不予理会。1929年的潮流逆转和随后严重的经济危机对（奥地利）经济学家们来说并不奇怪；经济学家们预见了它们，纵然他们没能预测到经济危机发生的确切日期。（L. Mises 1971[1934]:14-15）

哈耶克也预见了危机

米塞斯的同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也预见了经济危机，特别是在美国发生的经济危机，他对时间的预测比米塞斯更为精确。作为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哈耶克1929年初预料到了这场麻烦。他在1975年的一个采访中提到了他的预测，哈耶克说：

预料到将发生的事情的仅有几个人，我是其中之一。1929年初，当我下此断言时正住在欧洲，之后那里就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萧条。我说只有利率下降，欧洲才有复苏的希望，并且直到美国的繁荣崩溃时利率才能下降，我说的话在接下来几个月里一一应验了。（Hayek 1975）

哈耶克是谁？

作为新奥地利学派共同奠基者，哈耶克的名字总是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联系在一起。哈耶克发展了米塞斯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对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主要批评者，并对政治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1974年，米塞斯去世一年后，哈耶克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多人也把它看作是米塞斯迟来的赞颂。（诺贝尔奖不能颁发给已去世的人。）

哈耶克和米塞斯，尽管是亲密的合作者，但在外表、背景和个性上都不相同。哈耶克高，米塞斯矮；哈耶克是基督徒，米塞斯是犹太人；哈耶克热情而乐观，米塞斯寡言而忧郁。然而，他们一直维持了他们的友谊。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92）生于维也纳，做了米塞斯17年的下属，他的一生都被自然科学家所包围。他的祖父是一位动物学家，他父亲是医学博士和植物学教授，他的兄弟们是植物学和化学教师，他的女儿是生物学家，儿子是细菌学家。家族中唯一转向

研究社会科学的，只有哈耶克这一代。

哈耶克长得超过6英尺高，惹人注意，而且聪明过人。他打算主修物理学，但世界大战的蹂躏（他作为炮兵军官服役）使他对法律和政治产生了兴趣。他很快就获得了维也纳大学的两个博士学位——1921年的法学博士学位和1923年的政治学博士学位。

1923年，他在纽约呆了一年，威斯利·C·米切尔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统计学方面的工作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于是他回到祖国他说服米塞斯建立了奥地利经济研究所。他起初对费边社会主义很感兴趣，但读到米塞斯1922年的《社会主义》后，他改变了想法。他回忆说，“这部书出版后，对于我们每一个读过的年轻人来说，世界从此不一样了”（Hayek 1992: 133）。之后，哈耶克成为米塞斯的门生和同事。他也阅读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作品。“我发现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是这么有吸引力，这么使人满意，”他写到（1994: 48）。

奥地利学派获得全世界的喝彩

米塞斯和哈耶克预测萧条的能力使奥地利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初突然回到聚光灯下。许多正在寻找对1929-32年危机的解释的美国、英国的年轻经济学家，很快就被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所吸引。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系主任，在听说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事后就前往维也纳参加了米塞斯著名的研讨班。之后，他还邀请哈耶克在LSE举办了一系列关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讲座，其特别目的在于“与凯恩斯斗争”（Hayek 1994:77）。讲座在1931年5月举办，之后，讲座的内容编成《物价与生产》（1931）很快就出版了。就是这本小薄册子把奥地利学派的基本原理发展成为成熟的宏观经济模型。

哈耶克三角形

在《物价与生产》中，哈耶克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图即“哈耶克三角形”来表述经济的时间结构。图形12.1重现了他的第一个图表。

三角形顶部以生产的最早阶段——自然资源开始，然后向下到加工产品生产直至最后阶段——零售消费。注意，这个三角形随时间推进扩展，因为每个阶段都为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增值。三角形区域代表全年经济中对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总支出。

哈耶克认为，三角形的结构随利率的变化而改变。储蓄率的提高会拉长三角形，长期内会导致更低的支出和更高的产出和一个新的宏观均衡。另一方面，货币供给的人为增加会向生产者和消费者传递错误信号，造成通货膨胀性繁荣，并将无法避免地转向萧条。三

角形起初会增大，但最终会缩小。

哈耶克的书在英国掀起风暴

哈耶克和他对经济衰落的解释给英国带来了一场风暴，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指出，“当20世纪30年代明确的经济分析史浮出水面时，这场戏（这的确称得上是场戏）中的主角将会是哈耶克教授”（Hicks 1967: 203）。约瑟夫·熊彼特称那本160页的小册子“取得了彻底的成功，其它理论书籍永远不能与之匹敌”（Schumpeter 1954:1120）。

哈耶克给1929—32年大灾难尤其是在美国发生的大灾难一个合理的解释：用他著名的三角形，哈耶克表明，经济衰退是20世纪20年代无法维持的繁荣的必然结果。罗宾斯满怀热情，他任命哈耶克为伦敦经济学院（LSE）的经济学教授图克教授（Tooke Professor），哈耶克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18年。“酒好客自来。哈耶克博士为所有真正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一杯令其流连忘返的陈年佳酿，”罗宾斯在《物价与生产》的序言中这样写到（哈耶克 1931: xi）。

罗宾斯率先倡导了奥地利经济学在英国的复兴，包括翻译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的著作。罗宾斯自己也写了一本长篇著作《大萧条》（1934），概述了萧条的原因和对策。罗宾斯认为，萧条不是由资本主义引起的，而是由于“否定”资本主义引起的。“它是由于在资本主义原本的力量已经被战争和政策破坏的背景下，货币的管理不善和国家干预引起的”（Robbins 1934:194）。伦敦经济学院早先曾被视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温床，现在却成了自由市场思想家们统治的领域。

哈耶克抨击凯恩斯

不可避免地，哈耶克遭遇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尽管他们在多数时间里是朋友，但他们是专业上的对手。哈耶克攻击凯恩斯的两卷《货币论》（1930-31）缺少资本理论，作为回报，凯恩斯指责哈耶克的《物价与生产》难以理解，是“一团看不透的浓雾”（Skousen 1990:47-51）。伦敦经济学院的“少壮派”（Young Turks）对哈耶克的货币理论充满热情，而凯恩斯周围的“剑桥圈”（Cambridge Circus）无疑对他持有敌意。

凯恩斯赢了

哈耶克和凯恩斯分别代表20世纪30年代的两个对立面，凯恩斯支持国家“货币管制”；哈耶克信奉政府不干预的政策。凯恩斯提倡通货膨胀和赤字开支；哈耶克赞同中性货币

政策和依靠的市场灵活性来调整价格和工资。凯恩斯说聚藏钱财和储蓄增长在萧条期是件坏事；哈耶克驳斥“节约悖论”并为节俭的传统意义辩护。两人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泰晤士报》（the London Times）上，哈耶克与凯恩斯就政府的作用展开辩论。1932年10月17日，在一封写给编辑的信中，有凯恩斯、A·C·庇古和其他经济学家的签名，他们反对萧条时的节俭。紧接着，10月19日，一封有哈耶克、罗宾斯和另一些经济学家签名的信中，则批评政府支出。

最终，当萧条时期逐渐过去，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的“无为”政策输给了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者的行动主义方法。米塞斯和哈耶克可能解释了萧条的原因，而他们的对策则显得不切实际和消沉无力。突然，所有的眼睛转向剑桥和凯恩斯的新书《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

哈耶克没写过一篇关于《通论》的评论文章，他最终对此后悔了。当凯恩斯的《通论》于1936年出版时，哈耶克认为它只不过是“另一张时代的传单”，不具有永久的影响。他完全错了。

总之，奥地利学派的命运遭到戏剧性的逆转，哈耶克恢复过来还要好几年的时间。米塞斯自己再也没能从这个思想挫折中恢复过来。伦敦经济学院的少壮派们——约翰·希克斯、艾波·勒纳（Abba Lerner）、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和肯尼思·邦丁（Kenneth Boulding）全变成了凯恩斯的信徒。移居哈佛的转学生保罗·斯维奇（Paul Sweezy）也转向凯恩斯，之后又转向马克思。甚至哈耶克最亲密的朋友莱昂内尔·罗宾斯也放弃了。在他的自传中，罗宾斯称他在20世纪30年代对哈耶克的支持是“我职业生涯中的最大错误……它将是一件永远给我带来深深懊悔的事情，尽管我是出于善意行事并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我却如此坚决地反对那些有可能缓和当时经济困境的政策”（Robbins 1971:154-5）。

哈耶克被20世纪40年代的这些变化弄得性情抑郁，于是他停止经济学的写作转向政治理论。二战期间，他被迫迁居剑桥并发现他自己“支持着凯恩斯反对战时通货膨胀的斗争，在那时最不希望的就是削弱他的（凯恩斯的）权威”（Hayek 1983:47）。

此时的维也纳：纳粹来了

20世纪30年代的奥地利，米塞斯的主要担忧从经济转向了政治。弗里茨·马克鲁坡回忆米塞斯早在1927年就预料到中欧自由时代的终结将要到来，并强烈要求马克鲁坡和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离开欧洲。1938年，马克鲁坡说，“我们中的大多数听从了导师的建

议，抓住了及时离开祖国的第一个机会”（Machlup 1974:13）。弗里茨·马克鲁坡去了布法罗大学，奥斯卡·莫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去了哈佛大学，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而约瑟夫·熊彼特从1932年起就在哈佛了。

1934年秋，随着纳粹势力的迅速扩展，米塞斯决定离开他心爱的奥地利，接受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个职位。纳粹党把这个崇尚自由放任主义的犹太人视为国家的敌人。1938年，纳粹分子直捣维也纳的那个晚上，他们冲进了米塞斯的公寓，把他的藏书、著作和私人文件全部充公；他们把所有物品装了38箱，驾车离去。在他生命余下的时间里，米塞斯认为纳粹已经毁了他的珍贵文件。但20世纪90年代，米塞斯去世20年后，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的理查德·埃伯林（Richard Ebeling）在莫斯科克格勃文件中发现了长期遗失的藏书。显然，俄国人在二战后从纳粹手中没收了米塞斯的财产并把它们运回莫斯科。（米塞斯的私人图书馆现在位于密歇根州的希尔斯代尔学院）。

从自由到暴政几乎只在一夜间

玛吉特·米塞斯描述了1938年3月14日希特勒军队开进维也纳时的景象：“那天晚上他（希特勒）通过广播发布了他的第一次讲话。他的声音现在仍在我耳边回响。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声音，——粗哑、低沉而且粗俗，但它有一种让人承受不住的力量和施催眠术般的说服力。他的声音把我吓坏了，但我一直听到讲话结束”（M. Mises 1984:29）。

最后，玛吉特（那时是路德维希的未婚妻）和他的女儿逃往瑞士，在那里她们见到了泪眼婆娑的路。在他们长达35年的婚姻生活里，玛吉特只见到她丈夫哭过这一次。“他哭泣着——从容而不加掩饰”（M. Mises 1984:31）。

玛吉特详细叙述了之前在纳粹控制下奥地利的日子。“过去几周的恐怖仍在我的脑海里萦绕。尽管实际上我们没什么事发生，但我始终感到危险就在我们周围。我们的自由危在旦夕；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到处都是密探，监视你的密探会曲解你最简单行为，然后向上级汇报。和主人相处了大半辈子的家庭佣工，突然变成了敌人。孩子们被教唆去监察他们的父母并告发他们。德国人预先安排得如此仔细，以致于没用几天时间自由就变成了暴政”（M. Mises 1984:31）。

新世界里的流亡

在日内瓦教了6年书后，米塞斯和他的家人被迫逃亡到美国。他的朋友像《纽约时报》的经济学撰稿人亨利·海茨里特（Henry Hazlitt）和洛克菲勒基金的约翰·范·西克尔

(John Van Sickle) 帮助米塞斯在纽约定居，但米塞斯数年苦于“绝望的悲观”。他的作品，现在是用英语写作的，充满着绝望，尤其对被充斥着西方世界的凯恩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更是如此。“他是我所见到的最令人沮丧的人，”彼得·德拉科 (Peter Drucker) 有一次这么说。德拉科小时候在维也纳就认识米塞斯，他偶尔会在纽约大学 (NYU) 校园里遇到米塞斯，总发现他一副闷闷不乐、对一切毫无兴趣的样子。

此时，他的奥地利同事甚至他的弟弟（见290页加框文字）都在学术界取得了受尊敬的地位，而米塞斯自己则被迫接受非全职工作和赠予。他成了纽约大学永久性的“客座教授”，他的薪金由威廉·沃尔克 (William Volker) 基金赞助。然而，他的兼职身份并不是完全非自愿的。有人向他提供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职位，但他固执地拒绝离开纽约。

米塞斯对战后年代的其他理论经济学家充满敌意。他热衷于辩论，并和他的对手互相进行人身攻击。凯恩斯主义者把这些自由市场批评家视为“反动分子”、“偏执狂”和“守旧派”而不予理睬。米塞斯则把干涉主义者叫做“伪经济学家”、“假进步分子”和“无知的狂热者”来作为回应。两者间确实有太多的仇恨。

米塞斯曾被邀请到一所常春藤名牌大学（可能是哈佛）演讲。他拒绝了这个“浪费时间”的邀请。“用一小时正确的经济学去对抗数年的错误教导！”米塞斯斥责说。“现在，戳穿它们（经济学谬误）中的任何一个需要的时间都比在你的项目里分配给我的多得多” (L. Mises 1980:166)。如果接受邀请，米塞斯有可能影响一批学生学会对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做出取舍。机会就摆在他面前了，可惜他没有抓住。相反，马克思主义者象保罗·斯威茨从来不放弃任何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

“你们都是一群社会主义者！”

米塞斯的朋友对米塞斯的个性有不同的论断。穆雷·罗斯巴德曾经参加过米塞斯在纽约的私人研讨班，他描述的米塞斯是个温和可亲的人，有着数以百计的狂热崇拜者，其中还有一个人写了几首歌以纪念米塞斯的研讨班。“作为一位学者，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和作为一个人，”罗斯巴德写到，“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一个使人高兴、鼓舞人心的人，他是我们所有人的楷模” (Rothbard 1988:71-74)。

那些不同意米塞斯观点的人看到了他严酷、偏执的一面。很多人知道他把积怨保留数年，拒绝和冒犯过他的人说话。对那些赞同适度政府干预的同事，他常表现得很没耐心。最恶名远扬的故事发生在1953年的蒙特沛尔林学会 (Mont Pèlerin Society) 会议上。这是由哈耶克（见300页加框文字）组建的，一个政治和经济自由论思想家们的组织。米尔顿

• 弗里德曼担任收入分配部分的主持人，他写到，“我特别记得对这个议题的讨论，期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站起来对与会者宣布‘你们都是一群社会主义者，’然后大踏步走出房间。” 弗里德曼补充到，那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哪怕用最宽松的标准来衡量，能被称作社会主义者”（1998：161）。

在另一次蒙特沛尔林会议上，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弗里茨·马克鲁坡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发表了一段演讲，对金本位制表示质疑，因而提出支持弹性汇率的观点。米塞斯非常愤怒，以致于之后三年都拒绝和马克鲁坡谈话。最后，在朋友的撮和下，他们和好了。（Friedman 1995:37）。

甚至玛吉特·米塞斯也不同意用“温和”这个词来形容他的丈夫：“他对我温和是因为他爱我。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个温和的人。他有着铁一般的意志和钢刀一样的头脑。他有时令人难以置信的倔强”（1984：144）。

哈耶克创建了第一个国际自由市场协会

我们必须发掘和培养一批为自由而战斗的斗士。

—— F. A. Hayek

在亚当·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卡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其他有影响的自由市场组织出现前，蒙特沛尔林学会就于1947年建立了。只有由里奥纳多·里德(Leonard Read)于1946年组建的经济教育基金会(PEE)比它成立得早。

为了逆转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潮流，哈耶克1944年写了《通向奴役的道路》，在一个崇拜者的帮助下，1947年春天，哈耶克在瑞士日内瓦湖以北的蒙特沛尔林组织了一个由一些志趣相投的学者组成的国际论坛。有来自10个国家的39人参加了论坛，其中包括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卡尔·波普尔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哈耶克以此会议来纪念亚当·斯密精神：“现代经济自由主义，在我看来，最初的两个表亲结合的合理产物：亚当·斯密对他所处时代的经济世界极富洞察力又绝对精湛的科学分析，加上亚当·斯密对自由、创造性努力和财富与生俱来的热爱”（Cockett 1994:111）

哈耶克起初想把这个组织叫做阿克顿—托克维尔协会，但弗兰克·耐特(Frank Knight)反对，“你不能把一场自由运动加上两个天主教徒的名字！”于是，最后他们决定用一个非政治性的名字——蒙特沛尔林学会。

这次会议非常成功，此后又不断壮大，今天它已发展成为一个限制甚严的俱乐部，几乎无法加入。候选人需由两位成员提名，受邀参加过之前的两次会议，尽管如此，如果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你成为

会员的几率会很小。蒙特沛尔林学会的创建者主张，它是一个国际组织，不应由美国人统治。

蒙特沛尔林学会既不是一个智囊团也不是一个政治压力集团,会议不公开，发言不被记录，讲稿也很少出版。一年一度的会议在世界各地（最近在日本、法国、智利）召开，成员和嘉宾来自个各大洲。米尔顿·弗里德曼评论说，“蒙特沛尔林学会是名副其实的思想青春泉，通过它我们都可以约一年修整一次，在这由相同主张的人组成的日益扩展的聚会中更新我们的思想和信念”（Ebenstein 1996: 138）。

米塞斯的巨著：《人类行为》

失去全职大学教职的米塞斯，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他在纽约的公寓里写书和文章。他的妻子说，他会和他的旧打字机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吸烟，而且就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又没有空调的情况下，也拒绝脱掉茄克衫。

米塞斯战后最重要的著作是《人类行为》，194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

《人类行为》（1966）对奥地利学派来说就象《资本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人类行为》是一部纯经济学专著，而且和《资本论》一样，米塞斯的这部巨著超过900页，是之前任何作品的两倍还多（见加框文字，“加里·诺思的厚书理论”）。“《人类行为》是写什么的？”也许你要问。它的推崇者会回答，“一切！”罗斯巴德称它为“米塞斯的最伟大成就，本世纪人类思想的最伟大作品之一”（Rothbard 1988:64）。

《人类行为》不易被读懂，尤其是头几章的方法论部分。由于含有象“人类行为学的形式与演绎特征”这样章节，《人类行为》被用于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但它的忠实信奉者不断地阅读。在米塞斯一生中，该书被修订了三次，并被译成五种文字。令人惊奇的是，当它1949年出版时就是月读俱乐部 (Book-of-the-Month club)的可选读物，这可能是由于《新闻周刊》（“它应该作为权威文献”）和《华尔街杂志》（“它应该出现在每位思想者的书架上”）的好评（1966：护封）。

然而，米塞斯永远摆脱不了不幸，《人类行为》的第二版就是学术丑闻的一个荒诞例子。1963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发行修订后的《人类行为》第二版。当一年以后它出现在市面上时，很明显，耶鲁有人在蓄意破坏这本书。简直是噩梦般的排印。322页上有4行被删除。468页完全漏掉。469页被印了两次。一页接着一页，一些段落印成细体而另一些被印成黑体。整页黑体字翻过来就是整页细体字。耶鲁印刷了勘误表，但对于这位不知名攻击者的恶毒行为，耶鲁没向米塞斯做什么赔偿。这件事严重妨碍了米塞斯的生活，他连续几个月无法入睡。终于，他和一个友好的出版商——亨利·雷格尼瑞（Henry Regnery）签订了新合同，修订的第三版于1966年出版了。

加里·诺思的厚书理论

又一本该死的、厚重、老套的书！总是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嗯！吉本先生？

——格洛斯特郡公爵威廉·亨利，在收到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卷时（1781）

经济史学家加里·诺思（Gary North）有一种“厚书”理论：创造一场革命需要一本厚书。根据诺思的观点，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写了长篇巨著。他引用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2卷，1097页），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3卷，2846页），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1260页），和穆雷·罗斯巴德的《人类、经济和国家》（2卷，987页）。毫无疑问，诺思自己也写下了数部厚重的学识渊博的著作，他的《统治的工具》（1287页）实际上是《出埃及记》的系列评论第3卷。它单独出版了。“我对它成为最畅销书不抱幻想”诺思承认（1990：2）。

诺思一定会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通论》感到沮丧，这本书只有486页，但可能对米塞斯的《人类行为》（一本907页的专著）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860页）感到欣喜。

但是最终，我们必须反对诺思的劳动价值论。毕竟，他怎么解释象《共产党宣言》（仅62页）或《四福音书》（仅177页）这么薄的书的影响？

米塞斯的最后岁月

象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一样，米塞斯在晚年时没有感到任何唱和。在他80多岁的时候，他仍继续在位于纽约哈得孙河上伊尔温顿（Irvington）的经济学教育基金会（最早的自由市场智囊团，由伦纳德·里德建于1946年）上课，继续去墨西哥和阿根廷的作巡回演讲。然而他也感到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政治上，重回自由市场原则的希望渺茫。1969年，美国经济联合会吸纳米塞斯为杰出会员，但他发现这项荣誉对他来说已没什么安慰。他90岁时生病了，两年后，也就是1973年，米塞斯在纽约市逝世。

总结：失踪的米塞斯

米塞斯是一位渊博的思想家，他的书，尤其是《货币与信用理论》、《社会主义》和《人类行为》在向建立一个充分完整经济学模型的目标前进，它们比其他任何经济学家的著作都走得更远。他揭开并解决了许多经济学遗留难题，尤其是关于货币方面的。然而由于二战后他固执地拒绝与现代经济学界融为一体，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发展整整延迟了一代。奥地利学派模型——它的资本和经济周期理论从教科书和杂志上消失了。米塞斯成了失踪的米塞斯。

哈耶克和奥地利经济学的重生

米塞斯的门生哈耶克能够重振奥地利学派吗？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行。哈耶克在二战后

也陷入低迷阶段。象他的导师一样，他继续疯狂地写作，但不是关于经济学的内容。由于不满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理论界的统治，他转向研究政治和哲学问题。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此时的哈耶克仍在剑桥，他完成了《通向奴役的道路》的写作，后来的事情证明这是一本非常有影响的畅销书。他向西方世界警告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并得出“只有资本主义才使民主成为可能”的结论（Hayek 1976 [1944]:69-70）。哈耶克的政治观点愤世嫉俗。他引用了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话，“权力正走向堕落，绝对的权力则完全堕落。”该书第10章题为“为什么最坏者当政”。毫无疑问，哈耶克想到的是希特勒、斯大林和墨索里尼，甚至可能还包括罗斯福。在1976年版的这本书的序言中，他悲观地坚称：“自从我写这本书以来，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对极权主义当权者好意的幼稚信任与日俱增”（1976 [1944]: xxi）。

哈耶克对于《通向奴役的道路》的成功感到很吃惊。在英国，第一版在几天内售罄。甚至凯恩斯也称赞它的优点，“这是一本精彩的书……在道德上和哲学上我发现我自己几乎和它完全一致；不仅是同意它的观点，而且被这观点所深深打动。”他唯一的反对意见是在计划部分；他认为国家应增加对经济的计划，而不是减少（凯恩斯 1980:385-87）。

哈耶克的美国出版商芝加哥大学1945年春天在美国安排了一次巡回售书活动。亨利·海兹利特（Henry Hazlitt）给《通向奴役的道路》写的热情洋溢的评论作为特稿刊登在星期天《纽约时报书评版》的显要位置，《读者文摘》也登了该书的缩写本。当哈耶克到达纽约港时，发现自己成了业界名流。这本学术著作极为畅销，哈耶克沉浸在演讲和会面的旋风式旅行中。

哈耶克卷入私人丑闻

我确信那样不对，然而我却做了。仅仅是由于内心需要。

—— F. A. 哈耶克（Ebenstein 1996:157）

20世纪20年代初，年轻的弗里茨·哈耶克（Fritz Hayek）和他的表妹海琳·彼特利克（Helene Bitterlich）坠入爱河。但她嫁给了别人，弗里茨被迫寻找其他伴侣。他办公室的一个秘书吸引了他的注意，这位女士不仅长得很象他的初恋情人，而且有着几乎相同的名字——海伦（Helen）（尽管她被称作海拉Hella）。这看起来是桩完美的婚姻。1926年夏天哈耶克娶了海伦·冯·弗里特斯（Helen von Fritsch），他们有了两个孩子，女儿生在奥地利，儿子生在英格兰。然而，在接下来的25年里，哈耶克夫妇经历了一段并不愉快的婚姻生活。哈耶克说海拉是个好妻子，但他们经常吵架。

战后，哈耶克回到维也纳与他的表妹海琳邂逅，海琳高兴地说她自己是单身。他们迅速的再次相爱，哈耶克决定与他的妻子离婚。回到英格兰，苦恼的海拉拒绝离婚，离婚诉讼的过程异常激烈，以致于弗里茨的朋友莱昂内尔·罗宾斯和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的其他人拒绝和他说话。他们坚信哈耶克虐待他的妻子。但哈耶克坚持他的决定。他搬走并离开英格兰（尽管此时他已成为英国公民），前往阿肯色州——此地因宽松的离婚法规闻名。他在阿肯色大学待了不到一年，当1950年终于成功离婚后，他调到了芝加哥大学工作（Ebenstein 1996:156-57; Hayek 1994:22-23）。

哈耶克和他的老朋友莱昂内尔·罗宾斯因婚姻丑闻而反目，他们再和好用了10年时间。甚至那时，他们也很少愿意谈到哈耶克的新妻子——海琳，她在哈耶克晚年时常拒绝让老朋友和同事与哈耶克联系。“她真让人受不了！”哈耶克的儿子劳伦斯（Lawrence），一次在蒙特沛尔林学会会议上公开宣称。

哈耶克在芝加哥和在弗莱堡

哈耶克的经典作品成为他走向成功的通行证。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末，他卷入了私人丑闻，一切都变了。1950年，哈耶克和他的妻子离婚并娶了他青年时代的情人（见303页加框文字）。他离开英格兰搬到美国，希望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该大学曾出版他很有影响的作品。但是哈耶克第一次遭遇了和米塞斯一样的麻烦——在一所重要大学寻求职位。芝加哥大学最终雇佣了哈耶克，然而作为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授——而不是经济学教授。哈耶克的薪水，象米塞斯一样，由沃尔克基金赞助。尽管如此，他仍愿意呆在芝加哥，和他的朋友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阿伦·迪莱克特（Aaron Director）在一起。

在芝加哥，他写下了《自由宪章》（1960），过了几年，这本书在几年内逐渐受到欢迎。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如果哈耶克没到芝加哥就不会有这本书的问世：“《自由宪章》是哈耶克向芝加哥学派的转变。它是他作品中唯一的一部广泛参考纯粹经验的著作”（Ebenstein 1996:193）。

由于渴望回到欧洲，哈耶克63岁时申请并获得了德国第三古老的大学——弗莱堡大学的一个职位。他继续写作有关法律和政治哲学方面的书籍，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度过夏天。

真令人惊奇！哈耶克得了诺贝尔奖

20世纪70年代，哈耶克到了他的垂暮之年。他感到身体很虚弱并经常得病。他的左耳耳聋（有趣的是卡尔·马克思右耳耳聋）。他终生的朋友米塞斯于1973年去世了。一年

之后，哈耶克收到了一个来自瑞典的电话，这改变了他的学术生涯和他的身体状况。由于在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上的贡献，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他不得不与社会学家贡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分享奖项（没人愿意分享该奖项），他感到对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工作的一种唱和。此外，获奖也振奋了他的精神并使他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他四处发表演讲甚至重新开始写关于经济问题——社会主义、通货膨胀和货币改革的书籍。尤其是他1988年出版的最后一部伟大著作《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20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失忆，最后于1992年，哈耶克在德国过世了。

米塞斯的第一个贡献：货币的本质

现在让我们看看米塞斯和哈耶克的作品。米塞斯和随后的哈耶克第一个主要贡献是解释了货币的本质。我们曾在第十一章提到欧文·费雪没能成功地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现在轮到米塞斯来试试看。

米塞斯试图达到的首要目标是把货币与经济系统结合起来。正如早前提到的，古典和非古典经济学家把货币当作一个独立的黑箱，没有象对经济系统的其它部分那样对其进行分析。欧文·费雪的交易方程而不是边际效用或价格理论，构成了货币分析的基础。象费雪这样的经济学家使用总量术语诸如价格水平、货币供给、流通迅速和总产出来说明问题。此外，国家通货象美元、法郎、英镑和马克，被看作由政府法令随意规定的数量单位。如德国历史学派就宣称，货币是国家的产物。于是，微观经济学（单个消费者和厂商的供给与需求理论）与宏观经济学（关于货币和总量经济活动的理论）分裂了。米塞斯承担了将二者连接起来的任务。

回归定理

《货币与信用理论》首先说明了货币原本是一种有许多独特特征的商品，并由此把微观和宏观结合起来。米塞斯指出，在国际金本位制下，所有主要的通货被定义为黄金的特定重量。例如，当米塞斯1912年写这本书时，英国英镑被定义为近似1/4盎司的黄金，美元被定义为1/20盎司的黄金。这样，汇率就固定在1英镑等于5美元的水平上。

然而，通货的价值和汇率并不是由各个政府任意决定的。国家通货的最初价值是贵金属——主要是白银的适宜尺度。例如，最早的英镑其实是精确的一磅白银（英镑由此得名）。美国美元来自于西班牙元，这种货币被叫做泰勒（thaler），最开始是一种私人铸造的银币。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贬值和政治腐化，国家通货表现出几乎完全与他们的原始价值无关的价值。

如果一个人可以回到中央银行产生以前的时代，他会发现首批的钞票不过是可向金匠和掮客兑成黄金白银的仓单。钞票是对存储着的黄金和白银的索取权。如果回到更久远的时代，货币从交换物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有用商品，通常是黄金、白银或铜。

米塞斯把他的方法称为回归定理。回归定理帮助回答了经济学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难题：为什么今天的纸币所能代表的价值与制造它所需的成本完全不相关？印制一张20美元的钞票只需4美分，然而他却值20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商业领域，价格和成本是相关联的，至少在长期内是如此，但是为什么货币不是这样呢？答案就是米塞斯的回归定理。政府能够给它的通货确定一个任意的价值是因为通货通常由一种如黄金或白银的有价值商品支撑。没有历史上的这种索取权，政府的不兑现纸币就不可能拥有它今天的价值。

货币边际原理的应用

第二，米塞斯把边际效用论应用于货币自身供给与需求之中。这是一个聪明的步骤。具体来说，米塞斯指出当涉及到边际价值时，货币和其它商品没什么不同。在微观经济学中，任何产品的价格由可获取的产品数量和此产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同样的原理适用于货币，只是在应用于货币的时候，“价格”由该货币单位的一般购买力决定。持有现金的意愿大小（也有经济学家称之为“现金结存”）由对现金结存的边际需求决定。可获取货币量和货币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美元的价格。这样，美元供给的增加会导致其价值或价格的降低。

通货膨胀没有社会福利

一方面货币供给增加会降低货币的价值或购买力，米塞斯还强调货币的一个独特性质——与其它商品不同，货币供给增加不会提供社会福利。（黄金作为一种有用的消费品或生产物资承载着增加的价值，但是作为货币它却不能。）如米塞斯所述，“货币量的增加不能被看作社会收入或财富的增长”——它不能增加“由公众控制的产品数量”（1971[1934]: 138-39）。那些获得新货币的人所获得的利益以牺牲没有获得货币的人的利益为代价。通货膨胀可能带来国家收入再分配或造成通货膨胀性繁荣，但在长期内它的净效应为零。

米塞斯的深刻见解确认了曾遭到太多误解和漫骂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关于货币的陈述：“在经济社会中，不会有本质上比货币更无足轻重的东西了；除了它具有能够节约时间和劳动的特征”（Mill 1884[1849]:293）。

货币数量论的缺陷

价格与货币供给间的关系确实是费雪货币数量论中的大致形式。如果增加货币供给，货币价格会下降。但会下降多少呢？

回顾费雪的数量论，见下面的数学形式：

$$M \times V = P \times Q$$

这里 M = 货币供给

V = 货币流通速度，或称货币年周转率

P = 价格总水平

Q = 产品和服务的年产量

费雪假设 V 和 Q 相对稳定，因此 M 和 P 会直接成比例变化。他的数量论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实证特征：它显示了通货膨胀或者说价格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由于工会的力量、垄断资本主义或者对外贸易，而主要是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也就是货币供给的增加。米塞斯同意这个基本假设。

但是费雪的公式不能帮助他理解或预测经济周期。原因在于：费雪没有集中考察 M ——货币供给，而是把几乎全部精力用在 P ——商品和消费品价格水平上，把它看作经济稳定的指标。他认为，只要价格稳定，一切状况都会良好，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费雪的大部分时间花在编制价格指数上，并把价格指数当作他的关键指标。

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中，米塞斯认识到费雪集中分析了方程中不该留意的地方。按照米塞斯的观点， P 不是经济波动的首要指标。米塞斯批评把费雪的价格指数稳定方案作为国际金本位制的替代品的做法。费雪的提案“不会以任何形式改善货币价值变化的社会后果，”他写到（L. Mises 1971:402）。商业活动在没有商品或消费价格增长的情况下也会繁荣，同样的，在总价格水平紧缩前经济也可能会衰退。米塞斯也批评了费雪试图编制价格指数的做法，米塞斯警告说，编制一个客观、没有偏见的价格指数是不可能的。

米塞斯发现了货币的关键

米塞斯认为，费雪应该关注的是 M ：交易方程中的货币供给和政府货币政策。这就是那缺失的一环和理解货币经济学的关键。

根据米塞斯的新理论， M 是造成经济混乱的独立变量，它的影响并不象费雪从理论上说明的只是简单地使价格升高，而是造成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在米塞斯的术语里，货币是“非中性的。”它影响着费雪交易方程中的全部其它变量——速度（ V ）、价格（ P ）和商

品与服务的数量（Q）。米塞斯责备了费雪对V和Q不变的假定及由此产生的P成比例的随M上下波动的观点。货币与价格的关系几乎总是不成比例。货币的供给增加确实会降低货币价值，但下降多少不可能确定。例如，如一国产量急剧上升可能会导致价格不上升。如果产量足够高，价格甚至可能会有轻微下降，就象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那样。总之，价格水平依赖于货币边际效用和公众对现金结存需求的状况。单单把价格作为首要指标进行集中分析可能会严重地被误导，米塞斯说。

奥地利学派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

最后，米塞斯把他的货币理论应用到经济周期问题，后来证明这是他最具成果的运用。在阐述理论的过程中，他向以前的经济学家借用了以下有价值的观点：

1. 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假说。
2. 米塞斯奥地利的导师欧根·柏姆-巴维克的资本理论。
3. 以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和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名字命名的休谟—李嘉图硬币溢出机制。

弄清这些思想如何影响米塞斯非常重要，所以让我们对这些观点逐一回顾。

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假说

在他对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周期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利息与价格》（1898）一书中，克努特·维克塞尔明确区分了利率的“自然率”和利率的“市场率”。两者间的差异形成了他的周期理论的基础。维克塞尔把利率自然率定义为使储蓄的供给和需求相等的利率，也就是，时间偏好的社会比率。例如，如果瑞士的储蓄率高于瑞典，那么瑞士的利率自然率倾向于比瑞典低。

另一方面，维克塞尔把利率市场率定义为银行向单个消费者和厂商进行放贷时收取的利息率。在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中，维克塞尔指出，自然率（时间偏好）通常与市场率（贷款市场）相等。如果两者不等，那么，麻烦就酿成了。

例如，假设政府采取放松银根的政策并人为地把市场率降到自然率以下。图形12.2说明了该政策的影响。

依据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假说。如果市场率低于自然率，通货膨胀的“累积过程”就会发生。然而，通货膨胀性繁荣不会持续。经济过热迫使利率升到自然率以上的水平。最终，高的真实利率将绞杀繁荣，导致萧条。维克塞尔的政策药方简单而直接：政府应该保持周期中性的政策，借以使市场率和自然率总是相等。应该避免人为的放松银根的通货膨

克努特·维克塞尔奇特的一生

从来没有更具才智的人和更高品德的人来为我们的领域增添光彩。

—— 约瑟夫·熊彼特

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是经济学界最渊博而又反传统信仰的人中的一个。他在写出了学术水平很高的著作并在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教授经济学。他是一个倔强、不守常规的人，也是一个为女权运动、社会主义、堕胎和渎神辩护的自由思想家。他甚至因为说了反对圣母马利亚的话而被关进监狱两个月。

克努特1851年生于斯德哥尔摩，他是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他差不多7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在他15岁时父亲也去世了。他孤独地在一位路德教牧师的感化下虔诚地学习和研究《圣经》。尽管他晚年时放弃并嘲弄传统宗教，但他仍记得教堂的赞美诗集，如《诗篇》、《山边宝训》和《圣经》上的许多其它段落。

维克塞尔是个聪明的学生，他在乌普萨拉大学仅用了两年就获得了数学和物理学的学士学位。正当他要开始研究生的学习时，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抛弃了他的宗教信仰，而且很快演变成一个直言不讳的反基督教批评家和一个狂热的极端分子。在国外旅行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许多新思想，并受英国作家乔治·德莱斯戴尔（George Drysdale）著作——《社会科学的元素》的影响，这本书有一个不加掩饰的副标题“物质、性和自然的宗教；对社会上三种主要罪恶——贫穷、卖淫和禁欲的真实原因和对策的解释”。维克塞尔深受这部带有强烈新马尔萨斯主义风格的著作的影响。之后，他成为一个节育和堕胎的倡导者，把这作为减少人口拥堵、贫穷和卖淫的手段。

一桩习惯法婚姻

在他20多岁时，他拼命寻找伴侣，但这个害羞的瑞典人被他两段不成功的恋爱弄得很消沉。第一次是和一个小他从未见过的姑娘，第二次是和他最亲密朋友的妻子。1888年，维克塞尔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安娜·布格（Anna Bugge）——一个比他小11岁的挪威高中教师。他求婚，两人结成了一段习惯法婚姻，而后他们有了两个儿子。“结婚以来，我的工作热情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到（Gardlund 1996[1958]:124）。安娜后来成为瑞典的第一位女外交官和争取选举权与和平运动的领导人。

由于持有激进的观点，他直到50岁才获得了教师职位。他仅靠救济金、遗产和教师薪金来维持生

活。从1901年到1916年，维克塞尔在隆德大学教经济学。他的个人处事方式和他的思想一样激进：他上课时穿着土里土气的工作服，戴一顶渔夫帽。他经常把装有蔬菜、肉类和水果的市场购物篮带到课堂上。他非常规的着装是受了穆勒的《论自由》的影响，这是一本为非正统行为辩解的书。

奥地利学派的同路人

维克塞尔是一个书籍、文章和小册子的多产作家，但它们中的多数直到现在才被译成了英语。他深受奥地利经济学家欧根·柏姆-巴维克和他的《资本实证论》的鼓舞，维克塞尔曾说“这对我是一个启示……突然之间，好象一座学术大厦的最高点呈现在我眼前。”他把自己看作是奥地利学派理论坚定的捍卫者，他支持他们的边际效用、衍生需求、迂回产出方式和资本理论，尽管他反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某些方面。（Wickell 1997:26-38）。

维克塞尔因亵渎宗教而入狱

1908年11月，一个公开攻击宗教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判有罪，这激怒了维克塞尔。由于把这件案子视为侵害言论自由，维克塞尔据此话题向斯德哥尔摩大批听众发表演说，“宝座、圣坛、利剑和钱袋”用此讥讽圣母马利亚的故事。维克塞尔被捕，经过审讯被定为亵渎宗教罪，判入狱两个月。他利用这段时间写了一本关于人口过剩的小册子，主张瑞典的最优居民数量应该是300万而不是现在的500万，欧洲的人口应该减少1/4。很明显，维克塞尔没能意识到医药和农业技术的进步缓和了人口爆炸带来的影响（见第三章关于马尔萨斯的内容）。

七十四岁去世

维克塞尔一生都厌弃所有学术和法律的繁文缛节，包括官方批准的婚姻、洗礼仪式和接受荣誉头衔。他的妻子在1926年他去世后（因肺炎引起的胃病）安排了一个精心筹备的葬礼，他在坟墓中一定辗转反侧，无法安宁。

应用柏姆-巴维克的资本理论

第二，米塞斯应用了柏姆-巴维克的“迂回”理论和资本结构学说。政府引发的通货膨胀性繁荣不可避免地使迂回生产过程延长，尤其是在生产资本品的行业中，这个过程在衰退阶段也不会轻易改变。此外，一旦有新资金用于机械、工具、设备和建筑上，资本的形式会异质化，并且在经济发展减速期也不易廉价出售资产、设备和库存。简言之，当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会需要一段时间——有时是几年才能复苏。

金本位制：一个严格的监工

最后，米塞斯把国际金本位看作是执行纪律者，认为它会以简洁的命令打断通货膨胀性繁荣。借用休谟—李嘉图的硬币溢出机制，米塞斯概述了一系列事件，凭此说明在金本位制下通货膨胀性繁荣会很快终结：

1. 通货膨胀时，国内收入和价格会上升。
2. 公民购买进口商品多于出口商品，导致贸易赤字。
3. 支付赤字平衡导致黄金外流。
4. 国内货币供给下降，造成通货紧缩性崩溃。

总之，米塞斯和哈耶克给出了一个合理解释，说明了即使价格并没有提高，金融危机和由通货膨胀扩张导致的经济崩溃如何产生。

为什么奥地利学派的模型没能流行？

如果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经济学和经济周期理论有了全部答案，为什么它没有流行？毕竟，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是1912年出版的。为什么费雪、凯恩斯和其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在1929年临近时没能注意到这些极有洞察力的深刻见解呢？

答案是米塞斯的理论被经济学界大大忽略了，而留意到它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这本1912年出版的书直到大萧条开始后才被译成英语。凯恩斯1914年在享有盛名的《剑桥经济学杂志》上对《货币与信用理论》（德文版）发表评论时，认为米塞斯作品既无“建设性”也无“创造性”，因而不予关注（1914：417-19）。没过几年凯恩斯就承认他对德文并不精通，他坦白地说“由于语言的障碍，新思想极易被我掩盖”（1930，1：199，n.2），哈耶克回应，“如果凯恩斯勋爵的德语能稍微好一点的话，这世界会免去许多苦难”（M. Mises 1984:219）。

说到克努特·维克塞尔和他令人信服的利率“自然率”假说，情况也是这样。实际上直到奥地利人把他极其重要的分析传到英格兰，维克塞尔的经济周期理论才真正被瑞典以外的人们所知。（在罗宾斯和哈耶克的支持下，维克塞尔的讲稿在1934—35年被译成英语。）

这样，米塞斯—维克塞尔的货币理论只在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发生后才得见天日。米塞斯、哈耶克和维克塞尔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口，并帮助完成了从亚当·斯密始建的理论大厦的重建。经济学界接近于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不再需要各个“学派”。但是米塞斯—维克塞尔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仅得到短短几年的瞩目，部分问题是他们对萧条的解决方案，它被普遍认为是包含了“无为”的政策建议。哈耶克和米塞斯提倡降低工

资率 and 价格、降低税收，减少政府对商业和贸易的干涉，但他们坚定不移地反对再次通货膨胀和赤字财政开支。“那仅仅是为新混乱和新危机埋下种子，”哈耶克坚持道。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留给时间去实现永久性的解决”——换句话说，等到它随时间结束，让市场自然发展（Hayek 1935:98-99）。这种药方解决普通的衰退或许有效，但显然在制止大范围紧缩性经济崩溃方面就表现得很不充分。

对于表面看来永无止境的萧条，奥地利学派没提供什么解释，也没有解决方法，经济学家们最终转到其它地方去寻找方案。奥地利学派能够解释萧条的原因，但没能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那么谁能挺身而出拯救资本主义呢？一位经济学家大步上前提供了一套宏观经济学的新理论和一种消除萧条的有力政策，这就是第13章的主题。

致使米塞斯疯狂的方法论

20世纪20年代，米塞斯对货币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当然还有社会主义经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后来关于经济科学基本原理的著作却如此古怪和特殊，以致于我们仅能猜想，真的有谁认真看待这些理论么。

—— 马克·布劳格（1980: 93）

米塞斯的书不含曲线图、表格，也没有图片。书里也没有数学公式或计量经济学模型，没有经验研究，没有任何经济理论的数量证明，甚至没有供给和需求曲线图，米塞斯把它们描述成“两条假定的曲线”（L. Mises 1966:333）。

确实是“古怪”又“特殊”。米塞斯在他的《人类行为》中就主张唯一的纯经济科学是彻底的推论——仅用演绎原理而不需事实经验的帮助。与几何学相似，他的整个理论体系构建在逻辑和不证自明的假设之上。米塞斯反对任何形式的实际观察归纳法，或用经验研究或历史去检验一种理论。米塞斯郑重声明，“**特定的原理不会因经验而表现出任何证实或歪曲**”（1966[1949]: 862）。他又进一步指出，“历史不会教我们任何普遍的法则、原理或规律……历史只和那些懂得在正确理论基础上解释它的人们交谈”（1966: 41）。

米塞斯反对计量经济学和经济学中的数学。“摒弃数学方法不仅是由于它的匮乏无效。它完全是种恶性的方法，从错误的假定开始，导致谬误的结论……根本没有所谓数量经济学这样的东西”（1966: 350-351）。

方法论的二元性

最后，米塞斯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分开，把社会科学称为人类行为学，以研究人类行为特征。（米塞斯也发明了其它术语，如用“catallactics”代表交换论。新术语的采用往往是新思想流派产生的标志。马克思和凯恩斯也发明术语。）

米塞斯是一个二元论者，他把自然界分成两部分：

1. 人类，他们思考、有价值观念、会选择并能从过去（社会科学）学到东西。
2. 动物和物品（有机物和无机物），它们是机械的和可预计的（自然科学）。

如米塞斯所说，“推理和经验展现给我们两个不同的领域……没有桥梁将这两个范围联系在一起——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1966：18）。米塞斯和哈耶克都对经济学家模仿自然科学术语的尝试表示批评，例如“弹性”、“周转率”和“摩擦性失业”。哈耶克称这些尝试为“唯科学主义”。

甚至米塞斯的门徒也对其极端的方法产生疑问

就连米塞斯最忠诚的学生也不全赞同他极端的方法。哈耶克用图表（哈耶克三角形）说明奥地利宏观经济模型，罗斯巴德收集并使用大量的历史数据以支持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米塞斯固执地拒绝用经验研究来提出支持自由市场的理由。这就是在经验工作和数量研究已经不断推动经济学事业发展的时代，奥地利学派仍在困境中挣扎并落后的原因之一。尤其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因其在统计和数量研究上的研究而在经济学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有关这些研究的例子见本书第一章和第三章的更新部分。）

一些对米塞斯的支持

但，米塞斯的狂热也有一定道理。不象物理学和化学，用可控制的实验来检验经济规律并不总是可行的。理论上，经济学家们必须建立 *ceteris paribus*（“万物平等”）（这里根据下文应为其其他条件均不变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ceteris paribus)??*）条件，作出真实生活中可能并不存在的假设。建立在依赖过去的公式和方程基础上的预测模型，可能在未来会发生变化，因为人们既不是机器也不是旅鼠，他们会以不可预计的方式改变他们的态度和行为。

案例研究：1962年，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支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理论，他们主张主动采取赤字刺激经济复苏。议会遵照他们的建议行事，削减税收，并在1962—63年实现赤字。结果呢？非常确定，国家产出急剧上升。

然而，其他经济学家不同意凯恩斯主义政策建议者的观点。由米尔顿·弗里德曼领导的货币（芝加哥）学派认为，这场考验站不住脚，不能证明凯恩斯主义理论有效。弗里德曼指出同样在1962-63年，联邦储蓄系统的货币政策也是积极的，经济复苏事实上是迅速增加的货币供给的功劳。同时，供给学派持另外的观点，他们主张，税收缩减本身就刺激生产率，通过增加单个消费者和私人投资者手上的资金来实现的，进而导致复苏。

谁是正确的，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还是供给学派？经验证据并不确定，因为三个变量——税收、赤字和货币供给全都是同时发生变化。

因果律对不确定性

米塞斯提出，经济行为中两个经常起相反作用的原则，令我们难以或者干脆无法作出准确预测。第一条原则是因果律——每一个原因都有一个结果。如米塞斯所述，“人类行动是目的性行为”（1966：11）。然而，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原则是不确定性。人们行动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他们有时还会改变想法。显然要知道每个人做什么和为什么这么做是不可能的。萨伊一个世纪前写过关于这方面的书（见第2章）。知识的复杂性常使我们在了解未来的股票价格、新产品、消费需求的改变和政府政策时变得无知且无能为力。一个天文学家能够知道早晨太阳升起的确切时间，但哪个人都能精确预测一个学生早上几点起床？因此，精密的计算机模型对利率、通货膨胀和金融市场变动的预测几乎总是不准确的。经济学的高度无知是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中央规划不可行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哈耶克，写了大量关于“人类知识不可避免的不足”和人类行为“非故意后果”之类的书（1984：211-80）。

这并不是说人永远不能准确预知任何事。一些经济学家，象路德维希·M·拉克曼（Ludwig M. Lanchmann）和乔治·沙克尔（George Shackle）（奥地利学派的同路人），主张不确定性如此普遍以致于没有人能预测任何事。另外一些人，尤其一些极端的金融市场技术分析者，相信他们拥有的工具能准确预测未来的股票和商品价格。在哈耶克的脑海中，真理是在对未来“完全了解”和“完全无知”之间的某个地方。有时因果关系很强，未来极易被预知；另外一些时候，不确定性很强，确切预测几乎不可能。

米塞斯总的来说倾向于不确定性的一方面。谈到他对1929-32年经济危机的预测，他写到，尽管他预见了这些事件，但他不能预知“它们发生的确切时间”（1971[1934]：15）。他还在别处写到，“对于繁荣的持续时间或随之而来的萧条的计算，没有规律可参考”（1966：870-71）。

然而，在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企业家，其角色就是作为商人或金融顾问尝试预测未来的经济事件。但他必须是个孤立的，与众人想法不同的人才能这么做（Skousen 1993:279-80）。

插图及图表注解

P288

照片12·1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

“他承受着无望的悲观情绪。”

感谢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协会提供

P290

照片12·2 理查德·冯·米塞斯

照片12·3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理查德对路德维希：米塞斯家族长达一生的对抗。

感谢哈佛大学档案馆和米塞斯协会提供

P294

图12·1 哈耶克三角形——一个经济的时间结构模型

来源：哈耶克（1935：39）

P295

照片12·4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899—1992）
他搬到伦敦“挑战凯恩斯”。
感谢赫尔顿—格蒂档案馆提供

P309

图表12·2 政府推动市场率低于利率自然率的条件

P310

照片12·5克努特·维克塞尔（1851—1926）因亵渎上帝而入狱！
感谢马克·布劳格提供

第十三章 凯恩斯叛变：资本主义面临最大的挑战

本章音乐精选：阿拉姆·哈恰图良（Aram Khachaturian），“马刀舞曲”，选自芭蕾舞剧《加雅涅》

这是一个对绝望的补救方法……。它不是推翻这个体系而是保全它。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glbraith) (1975[1965]: 136)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传统经济学的权威以前从未遭到过的最严重的打击。

——W·H·哈特(W·H·Hutt) (1979: 12)

由亚当·斯密建立起来的天赋自由的资本主义系统，经过边际革命的修正，马歇尔和奥地利学派的提炼，现在危机四伏。节俭的传统美德、平衡预算、低税收、金本位和萨伊定律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亚当·斯密构建的大厦岌岌可危。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20世纪最具破坏性的经济事件。尤其在经历了兴旺的20年代所带来的西方生活水平的巨大进步后，这更令人措手不及。1929—33年间，提高的生活水平被萧条的冲击滤去。在美国，工业产出下降超过30%。差不多一半的商业银行倒闭。失业率猛增到25%以上。股票价值缩水88%。欧洲和世界其它地区也面临着相似的混乱。

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和美国健全货币经济学家们预见了危机，但面对徘徊不去的经济滑坡，他们感到束手无策。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的罗斯福新政使经济出现复苏，可惜并不持久。美国的失业率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平上整整十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消失。欧洲的情况也不乐观；只有希特勒统治下好战的德国在战争临近时达到了充分就业水平。自由世界中对失去工作、饥饿和战争的恐惧不祥地迫近。

大萧条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使大部分英美经济学家对古典自由放任经济学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体系的自身调节能力提出质疑。这些质疑基于两个层面——资本主义的竞争本质（微观）和经济总水平的稳定性（宏观）。

竞争的古典模型是不完全的吗？

在微观层面上，两位经济学家同时独立地写出挑战古典竞争模型的著作。1933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公开发行了**爱德华·H·张伯伦（Edward H. Chamberlin）（1899—1967）**的《垄断竞争理论》，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1903—83）**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两位经济学家都提出市场上存在不同竞争程度的思想，从“完全竞争”到“完全垄断”，并且大部分市场条件是“不完全的”，包含不同程度的垄断力量。张伯伦—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使整个经济学界为之神往，而且此后一直是微观经济学不可缺少的特征。它有很明确的政策含义：自由放任是有缺陷的，它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竞争条件；政府必须通过控制和反托拉斯行动进行干预，以减弱经济中自然垄断的趋势。

对资本主义的根本威胁

与那些在宏观经济学中提出的、激进的、非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相比，这个威胁确实很小。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曾在大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中风靡。保罗·斯维奇（Paul Sweezy），一位由哈佛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初去了伦敦经济学院（LSE），不想却成了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迅速在他的母校传授他的激进思想。西德尼和比阿特里斯·韦伯乐观地从苏联回来，坚信斯大林开创了充分就业和极具经济优越性的“新文明”。彻底的社会主义是对不稳定资本主义的唯一替代品吗？

谁来拯救资本主义？

更多冷静的知识分子在探索替代彻底社会主义、国有化和中央计划的选择。幸运的是，出现了一个竭力主张中间立场的强大声音，一条既保护经济自由又不破坏西方文明基础的道路。

这个声音来自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新剑桥学派的领导人。在他1936年的革命性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宣称资本主义是内在不稳定的，没有朝充分就业发展的自然趋势。然而，他同时反对经济国有化、强加的价格—工资管制和对供给和需求的微观基础加以干预。政府真正需要的是控制不规则的资本主义方向盘，使这辆车驶回到通往繁荣的道路上去。怎么办？不是通过大幅度削减价格和工资的古典方法，而是通过主动地实行联邦政府赤字和在能扩大需求及重建信心的公共部门上进行投资。一旦经济回到正轨并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政府就不再需要实行赤字，古典模型也会恰当地起作用。

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模型把沉闷的科学变成乐观主义者的俱乐部：终于，人成为他

自己经济命运的主人。凯恩斯指出，政府能够根据条件需要扩大或缩小总需求，就好像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周期而保持资本主义本身。期间，经济自由的自由放任政策可以在微观经济水平上实行。简言之，凯恩斯的中间道路政策并没有被视作对自由事业的威胁，而是它的救星。事实上，凯恩斯理论使它的主要对手——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的步伐完全停滞了（Galbraith 1975[1965]:132）。

“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凯恩斯革命差不多一夜之间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最年轻最睿智的人中间广泛流传，他们把对奥地利学派的爱戴转向凯恩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描写了那段时光，“这是一个对绝望的补救方法……。它不是推翻这个体系而是保全它。对于非革命者来说，它好象太完美，另人难以置信；对于临时革命者来说，它就是美好的。旧经济学仍在白天讲授。但到了夜晚，从1936年起的几乎每个夜晚，差不多所有人都在谈论凯恩斯”（1975：136）。后来成为凯恩斯主义理论高声反对者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与这凄凉的画面（奥地利学派自由放任的解决方法）形成对比，关于凯恩斯对萧条和正确治理政策的解释的新闻从剑桥（英国）渗透到外界，这必然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它提供了一种对疾病极乐观的诊断。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更为直接、更少痛苦和更加有效的预算赤字形式的治疗方法。广大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们简直太容易被它吸引了”（1974：163）。

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的模型席卷经济学界的速度甚至比边际革命还要快，尤其是二战后的情况好象也证明了赤字和大规模政府支出的正确性。没用多长时间，在阿尔文·汉森、保罗·萨缪尔森、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和其它凯恩斯主义追随者的指导下，大学教授们开始教学生消费函数、乘数、边际消费倾向、节约悖论、总需求和C+I+G。这是一种奇特的、令人兴奋的新学说。

凯恩斯的黑暗面

凯恩斯可能提供了一种治理萧条的看似合理的对策，但他的理论也造成一种赞同普遍的国家干预主义、福利国家和对大政府无限信任的战后环境。他的理论鼓励过度消费、负债财政、**对于储蓄征累进税、平衡预算（怎么会有平衡预算？）**和低税收。批评家们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看作对传统经济价值的直接攻击和自马克思主义以来对经济自由原则最严重的威胁。对他们来说，凯恩斯的《通论》“以英语对传统资本主义和自由事业构成了最阴险而有害的攻击”（Hazlitt 1977:345）。

尽管说凯恩斯主义已经穷途末路的言论时常出现，但凯恩斯主义思想仍在学术界、国会大厅和华尔街流行，《时代》杂志恰当地将凯恩斯选为20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传记作家查尔斯·赫森(Charles Hession)写到，“描写凯恩斯的书和文章比其它经济学家都要多——也许卡尔·马克思除外”(1984: xiv)。自然，《新帕尔格雷夫》上最长的传记是描写凯恩斯的——共20页，相比之下，马克思的只有15页。最新传记作家罗伯特·斯克德斯凯(Robert Skidelsky)将凯恩斯至于圣坛之上：“凯恩斯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由他来开展一项不可思议的工作再合适不过了，再没有一位经济学家能象他这样”(1992: 537)。

凯恩斯——生于英国管理精英之家

能使这么多人拥戴又使这么多人反对，凯恩斯是怎样一个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从童年时代起就智力超群。一次，当有人问他的名字如何发音时，他回答说，“凯恩斯，有点像用脑子[智力brains与凯恩斯Keynes后半部分发音相似，译者注]。”凯恩斯1883（这一年马克思去世了）生在英国中部的精英之家，他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是剑桥大学的教授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朋友。内维尔实际上比他的儿子活得长，在梅纳德去世三年后，内维尔1949年97岁时过世。梅纳德的母亲弗洛伦斯·艾达·凯恩斯(Florence Ada Keynes)因是剑桥第一位女市长而闻名于世。

凯恩斯总是和他的母亲很亲近，而对父亲疏远。他的父亲1891年在日记中写到过这种情况，这时的梅纳德只有8岁，“他唯一的榜样就是他的母亲；不管怎样，他都希望自己在每件事情上都像她”(Hession1984: 11)。

凯恩斯上了伊顿公学，一所贵族学校，并得偿所愿进入到剑桥大学学习，1905年他在那里获得了数学学位。凯恩斯后来写了一本关于概率论的有争议书。

凯恩斯成了一名“使徒”

他的朋友们认为他早熟、聪明、有时还有点儿粗鲁。他最与众不同的特征是他“不羁的眼神”和“活跃的思维”(Skidelsky 1992:xxxi)。凯恩斯则认为自己“的相貌招人厌恶。”然而，他被选为“使徒会”仅有的12名成员之一，这是一个剑桥秘密、排外的团体（与耶鲁的骷髅会相似）。该会会员为终生制。其它值得一提的成员包括诗人阿尔弗雷德·罗德·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数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哲学家G·E·穆尔(G.E.Moore)和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和传记作家

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key)。使徒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集体，他们每周六晚上聚在一起讨论文件。

20世纪初，使徒会在G·E·穆尔的影响下，更加蔑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和中产阶级价值观。他们甚至提出一种颠覆性的思想即同性恋是更高级的道德观。凯恩斯在成年后，早期是一个同性恋实践者，虽然在1925年与莉迪亚·洛普科娃（Lydia Lopokova）结婚时他似乎抛弃了这种思想，那年他44岁（见325页加框文字）。

毕业后，凯恩斯进入英国内政部，在印度事务厅呆了两年（尽管他从未去过印度）。1909年，他开始在剑桥教书，从1911年到1944年他担任剑桥《经济学杂志》的总编辑。他未受到过经济学方面的训练，只上过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一门课，但他很快掌握了技巧并开始教经济学。

凯恩斯写了一本畅销书

1919年，一战结束，凯恩斯当时是驻凡尔赛和会英国代表团的高级财政部官员。由于对议项忧虑，他辞职并写下了《和约的经济后果》。这本畅销书让凯恩斯的名利双收。

凯恩斯以犀利的散文体谴责了协约国强加给德国人的无法实施、不切实际的赔款。战败国被要求支付协约国的全部战争费用，包括罚款、抚恤金和军队的死亡恤金——总计达50亿美元，“不管是以黄金、商品、船只、有价证券或其它什么形式，”在1921年5月1日前付清。“大额战争债务的存在威胁着世界各地的金融稳定，”凯恩斯警告说（1920：279）。态度悲观的凯恩斯预计欧洲会出现负面后果。他曾暗示德国除了靠通货膨胀摆脱困境外别无它法。在一段著名的论述中，凯恩斯指出，“列宁确实是正确的。为了推翻现存的社会基础，没有比通货贬值更精妙、更有效的办法。这一过程激发了经济法则破坏性一面的潜在力量，并以一种百万人都无一人能救治的方式发生作用”（1920：236）。

凯恩斯是同性恋的真相

现在再变也来不及了。我一直是，而且将永远是，一个非道德论者。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Hession 1984: 46）

在凯恩斯的官方传记中，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这样描写他的朋

友，“关于他的缺点，我（对事实）没有任何刻意隐瞒。出于恶意或不了解情况的批评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Harrod 1951: viii）。确实存在隐瞒。哈罗德小心地掩盖了凯恩斯的性行为，他觉得这会给凯恩斯的声誉带来不利影响。

在今天和盘托出的传记派中（这本书也不例外），哈罗德的传记已经过时了。较新的由罗伯特·斯克德斯凯（1992）、D·E·孟格瑞德格（D.E. Moggridge）（1992）和查尔斯·赫森（1984）撰写的过往，很少略去凯恩斯的性经历的细节。孟格瑞德格甚至在附录上印了凯恩斯的性约会日记（1992: 838—39）。

影响凯恩斯的性取向可能受着几个方面的影响，他的家庭生活（溺爱孩子的母亲、懦弱的父亲）；只招男生的伊顿公学，在那里希腊哲学教导说男人间柏拉图式的爱情比男女间肉体上的爱情要纯洁高尚；还有社团同伴G·E·穆尔的思想，他宣扬抛开一切道德和行为准则。凯恩斯坚信要过“美好的生活”，不在乎对与错。

凯恩斯是个厌恶女人的人吗？

凯恩斯对男性的偏爱影响了他对女性的态度。像马歇尔一样，他不喜欢女学生出现在他的课堂上。1909年他在剑桥时，曾这样写到，“我想明年我应该放弃教女生。由于和她们两小时的接触而产生的神经性刺激非常强烈。我似乎憎恨她们思想的任何活动。而男人的思想，就是在他们很愚蠢和丑恶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如此厌恶”（Moggridge 1992: 183—34）。

历史学家伊丽莎白(Elizabeth)和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甚至认为凯恩斯厌恶女人的态度扩展到了他关于储蓄和投资的理论。约翰逊一派指出，凯恩斯和他的信徒常把储蓄看成女性而把投资看成男性。女性的储蓄常位于背光处，男性的投资则常以积极的方式出现。“投资的男性因素和许多其他因素一起，常被琼·罗宾逊和其它剑桥学者引用来说明企业家的‘动物精神（the animal spirits）’；女性的储蓄明显表现为就业均衡结论分析中储蓄的消极作用”（Johnson 1978: 211）。凯恩斯自己在他的《货币论》中写到，“这样，节俭可能是企业的女仆和护士。但她同样也可能不是”（1930, 2: 132）。

然而，凯恩斯有时对储蓄的性别确定也是模棱两可。在同样一本《货币论》中，凯恩斯对20世纪20年代欧洲经济的停滞不前发表评论。“战争结束后到现在已过了10年。储蓄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规模。但它们中的一部分被浪费了，洒到地上”（1930, 2: 185）。这里暗指圣经故事里的俄南（Onan），他把他的种子洒到了地上（Genesis 38: 8—9）。

1925年的大新闻

1925年，凯恩斯宣布和一位俄裔芭蕾舞女演员莉迪亚·洛普科娃订婚，随后他们就结婚了，这件事使他在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同性恋朋友们感到震惊。从梅纳德与莉迪亚的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婚姻远非柏拉图式的。“性关系确实发生了，”传记作家罗伯特·斯克德斯凯这样写到（1992：110—11）。

凯恩斯的双重稟性：他创造性天赋的关键？

传记作家查尔斯·赫森提出的一种新理论认为。凯恩斯革命性的观点和创造性的天赋来自于他的双性恋背景，这使他兼有“男性的理性思维和女性的感性思维”（Hession 1984：107，17—18）。斯克德斯凯也同意这种说法，“他在性上的摇摆不定使他的看法敏锐”（1992：537）。但为什么洞察力和创造力仅属于女性而理性和逻辑思维仅属于男性呢？

凯恩斯1925年做出的另一个英明预测

凯恩斯在1925年以另一个具有洞察力的分析推动他的成功，此时的英国在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指导下，回到了金本位制，停留在战前高估的4.86美元固定汇率水平。凯恩斯反对这种通货紧缩的方法。在他的小册子《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中，这位剑桥教授警告说，通货紧缩会迫使英国降低真实工资并使经济增长减速（Keynes 1963[1931]：244—70）。凯恩斯再一次证明他自己具有先见之明：英国在大萧条来临之际，遭受着日益严重的经济低迷。

不幸的是，凯恩斯的预言天赋在20世纪20年代末消失了。在他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米尔顿·弗里德曼把它看作凯恩斯最伟大的著作）中，他和货币主义者欧文·费雪一起反对金本位，并把1923至1928年间美元的稳定作用赞颂为联邦储备系统的“胜利”。

“我们的时代不会有进一步的股价下跌了”

像费雪一样，凯恩斯是一位新时代的倡导者，他对20世纪20年代的股票和商品市场充满信心。1926年，他约见了瑞士银行家费利克斯·索马尔（Felix Somary），急切地想买股票。当索马尔表达了他对未来股票市场的担忧时，凯恩斯坚定地说，“我们的时代不会有进一步的股价下跌了”（Somary 1986[1960]：146—47）。索马尔曾在维也纳大学

学习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他知道新世纪的繁荣不会持久。但凯恩斯像欧文·费雪一样忽视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观点，把希望寄托在联邦储备系统和价格稳定上。

1928年末，凯恩斯写了两篇反驳“危险的通货膨胀”已在华尔街形成这一论断的文章，并得出“眼前还没什么能被称为通货膨胀”的结论。参考美国的房地产和股票价值，凯恩斯补充说，“我认为今天就断言存在过度投资还为时尚早……因此，我倾向于预计股票价格不会严重下跌（那就是说，在现有低水平下）除非市场预料到经济衰退。”这种情况又不可能发生，因为联邦储备局会“尽其所能避免经济衰退”（Keynes 1973b: 52—59; Hession 1984: 238—39）。

在卧室里赚钱

凯恩斯不该如此自信。20世纪20年代晚期，他因在货币、商品和股票交易上显示的才能而获得金融行家的美誉。他是国家相互人寿保险公司的主席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财务主管。他的私人账户里有大量商品和股票的承付款项。除了拥有好几种汽车股票外，他还持有橡胶、谷物、棉花和锡的多头期货合同。

事实上，他以还没起床就能做出交易决定而闻名。据赫森记述，“他的一些财务决定是当他早上还在床上时做出的；他通过电话从他的经纪人那里获取信息，然后他会读报并作出决定”（1984: 175）。

凯恩斯被股市崩盘洗劫一空

可悲的是，凯恩斯误解了这个时代，因而也没能预计到股价崩盘。他投资组合的收益几乎全丧失：他失去了净财产的3/4，其中主要是商品损失（Moggridge 1983: 15—17, Skidelsky 1992: 338—43）。在他1930—31年出版的《货币论》中，他承认自己被20世纪20年代稳定的价格指数误导，并且“利润通货膨胀”已产生（1930: 190—98）。

然而，凯恩斯，这位固执的投资者，继续持有他的股票并从1932年起在投资组合上追加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尽管他不能在最高价时脱手，但他拥有奇异的能力，总可以在市场最低价时买进股票（Skousen 1992: 161—69）。他购买那些明显不受欢迎的证券，如公用事业公司发行的股票和黄金债券，他非常确信自己的策略，甚至采取大量保证金购买。1944年，他在写给一个货币经营同事的信中说，“我投资的中心原则是和大众的想法相反，其依据是，如果每个人都相信它有价值，那么这项投资不可避免地会价格太高，因而也就没有吸引力”（Moggridge 1983: 111）。

凯恩斯至死仍掌握惊人财富

凯恩斯在选择股票上取得及其引人注目的成功，因此在1946年去世时，他的净财产达到411,000英镑。他在1920年的投资组合仅价值16,315英镑，他得到了用13%复利计算的年收益，远超出大多数专业的货币经营者的所得，这在仅有轻微或没有通货膨胀——事实上，是严重通货紧缩的时代是一个惊人的业绩。而且这种非同寻常的成就是在1929—32年和1937—38年经济极大衰退时取得的。只有金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有比这更好的成绩。

一本革命性的著作问世了

凯恩斯在预测股价下跌和大萧条上的失败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他极度憎恨投机商，因为这些人使价格降到一个荒谬的低水平并且使他差点进了贫民院。他早就反对把自由放任看作社会管理的总原则，而1929—32年的经济危机加深了他对传统古典经济学的厌弃。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猛烈抨击财富贮藏者、投机者、**大量吸纳黄金者 (gold bugs)**，同时竭力主张把赤字支出、通货膨胀和放弃金本位作为解决经济滑坡的办法。他批评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伦敦经济学院，因为他们相信经济会自我调节，把工资削减和平衡预算作为解决萧条的办法。

凯恩斯一直呆在剑桥的家里，他正在理查德·卡恩 (Richard Kahn)、琼·罗宾逊和以他为中心的剑桥小组人士们的帮助下写一本创造经济学新模型的书。1935年新年这一天，凯恩斯写信给剧作家**乔治·肖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我相信，我正在写的这本关于经济理论的书，在世界如何看待经济问题方面，将引起一场彻底的革命——这种影响可能不是立刻出现的，我猜想，会出现在下一个10年” (Skidelsky 1992: 520)。这是一个傲慢的预言，但它被证明是正确的。

我们已经提到过，《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于1936年首次出版。象其他经济学家一样，凯恩斯也仿效了以往伟大的科学家。亚当·斯密和罗杰·巴布森把自己的理论体系比作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理论体系，凯恩斯也模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的书名模拟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凯恩斯说，他的书创造了经济行为的广义理论，而他把古典模型归入“狭义”的情况并把古典经济学家比作“非欧几里得世界里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家” (Skidelsky 1992: 487)。

象马克思一样，凯恩斯热切期待他的巨著会被学生和公众阅读，他说服麦克米伦图

书公司把这本400页的专著仅定价为5先令。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结果《通论》是凯恩斯最难读的书，其中充满技术性行话和晦涩难懂的语言（见332页加框文字）。甚至连保罗·萨缪尔森这位尽职的凯恩斯主义者也曾说过，“这是一本写得很糟的书，条理不清；所有被作者以前名气所引诱而买下这本书门外汉，都被骗走了5先令。在课堂上使用它并不合适。它傲慢、措辞激烈、好争辩，也未获充分的承认。它充斥着极端复杂的内容（无稽之谈？mare's nests）或干脆是一片混乱……洞察力与直觉的闪光散布于乏味的代数演算之中。累赘的定义突然让路给惊人的华彩段落。当最终读通之后，会发现他的分析既明快易懂又是崭新的。简言之，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Samuelson 1947[1946]: 148—89）。

《通论》现在仍可买到，仅仅因为他的信徒的阐释工作，尤其是哈佛的阿尔文·汉森和保罗·萨缪尔森，他们破译了凯恩斯繁复晦涩的行话，把它译成明白的英语，并使整个经济学界改观。

凯恩斯，手相师

手！手！手！其它没什么值得看的。

——J·M·凯恩斯（Skidelsky 1992: 286）

凯恩斯的怪僻之一是他对人的手很着迷。这位剑桥大学的先生毕生都在研究手的大小和形状，他把这看作是洞察性格的主要线索。他如此倾心于手相术——从手掌的样子解读个性，以致于他有自己和妻子的手的铸模，他甚至谈到过要收集朋友们的手铸模（Harrod 1951: 20）。

他的弟弟杰弗里(Geoffrey)认为凯恩斯奇怪的固恋是由于他9岁时一次造成他受伤的自行车事故，这次事故导致他的一根手指永久性畸形（M·Keynes 1975: 29—30）。

凯恩斯第一次评论的手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兄弟乔治·达尔文（George Darwin）爵士的，他在1899年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说：“他的手看起来确实象继承自一只猿猴”（Harrod 1951: 19）。

无论什么时候，凯恩斯一遇到同事、政客或陌生人，都会立即注意到他的手，而且常常迅速地对这个人的性格做出判断。在凡尔赛和会时，他遇到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凯恩斯注意到他的手，“尽管很能干又相当坚强，但欠缺敏感和策略”（J·M·Keynes 1920: 40）。在同次会议上，凯恩斯对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

(Georges Clemenceau)戴手套感到失望（20—21页）。

难怪凯恩斯不怎么接受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学说！

凝视罗斯福的手掌

1934年，当第一次见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凯恩斯全神贯注地审视着他的手，连说话都支支吾吾，“关于白银、平衡预算和公共工程，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据说罗斯福对凯恩斯没有深刻印象，而且凯恩斯也感到很沮丧。他对罗斯福手相的分析是：“坚定而有力，但不聪明又缺乏技巧，相当短的弧形指甲跟商人手指上的指甲没什么两样”（Harrod 1951：20）。凯恩斯肯定地说，罗斯福的手让他想起了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的手。

1936年，凯恩斯在一次晚宴上坐在剧作家W·H·奥登（W·H·Auden）的旁边，他留意观察了奥登的手指。凯恩斯描写奥登的手指“总的来说讨人喜欢，但是、但是、但是他的指甲又脏又湿，这是非常糟的情况，像一个预科学生。”奥登的指甲表明“他的工作有什么不如意”（Skidelsky 1992：628）。

好吧，好吧，我会去修指甲的！

凯恩斯教授的混乱倾向

一个人若闭门造车，即极可笑之事，也会暂时深信不疑。经济学尤其如此。

——J·M·凯恩斯（1973a [1936]：序）

李嘉图和马克思都写了招人烦的书，凯恩斯也不例外。以下的简单问题将说明《通论》中的一些困境。

问：请问，凯恩斯教授，你认为“非自愿失业”是什么意思？

答：我的定义是……如下：设当工资品之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而言上涨少许时，现行货币工资下之劳动力总需求量与总供给量，皆形增大，则称之为有不自愿失业的存在。

问：嗯……听起来使人获益非浅，凯恩斯教授。现在请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中如何管理私人投资？

答：我们的结论能以最普遍的形式表达……如下：当所有各种资产之本身利率中最大者，等于所有各种资产的边际效率（用本身利率最大的资产作计算单位）之最大

者时，投资量即不能再增加。

问：哦，我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凯恩斯教授。是货币扩张引起虚假繁荣吗？

答：在这一点上我们陷入困境。野鸭已经潜到水底，深至无可再深，而且死命咬紧水底下的野草、蔓茎、垃圾；现在要有一只非常聪明的狗跳下去，方才能再把鸭子捞上来。

问：谢谢，凯恩斯教授，祝贺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来源：感谢奥本(Auburn)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杰·加里森(Roger Garrison)提供此段讽刺小品。

奋斗不息的凯恩斯 (Keynes at war)

凯恩斯52岁了——他的朋友或许会说他正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此时他最后的重要著作《通论》已完成。他被自己的力量推向事业的顶峰。与他的剑桥同事阿瑟·庇古或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不同，凯恩斯从不是个学院式学者和隐士。他乐于参与世俗事务，热爱聚光灯下的社交生活，沉醉于作家和艺术家们的聚会，他还是纸牌和轮盘赌爱好者，并在伦巴第街和华尔街做投机买卖。他有魅力的个性吸引了政府最高领导者，他们寻求他的建议。他是一位驾驭文字的大师，也是一位频繁出现在BBC广播电台的妙趣横生的演讲者。

1937年遭遇心脏病突然发作后，凯恩斯被迫将生活节奏放慢，他和他的妻子开始积极促进艺术发展，在剑桥建立了艺术剧院。1940年，战争在德国爆发，凯恩斯回财政部担任顾问，并写了一本有影响的小册子《如何为战争付账》。他建议限制消费和投资，把强迫性储蓄方案作为降低需求和通货膨胀的方法。

1942年5月，凯恩斯的名字被呈递给国王，提名为提尔顿男爵凯恩斯(Baron Keynes of Tilton)，7月份他在上议院就职。在他60岁生日时，凯恩斯授予剑桥大执事 (High Steward of Cambridge) 这一荣誉职务。他过分喜爱谄媚和他的杰出地位。

战争接近尾声，凯恩斯和他妻子前往美国，帮助洽成一项新的国际财政协议。凯恩斯是布雷顿森林协议的缔造者之一，该协议建立了以黄金和美元为基础的固定汇率体系并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两年后，他在62岁时死于心脏病突发。

凯恩斯对亚当·斯密毫不留情

现在让我们来看凯恩斯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最开始要指出的是尽管凯恩斯被赞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而他的模型和政策建议事实上是对亚当·斯密自由放任体系的批驳和攻击。当他说出以下这番话时，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这一点，“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拥有约定俗成的‘天赋自由’，这不是事实……利己心总的来说是明确清晰的，这也不是事实……经验并未表明，当个人组成社会单位时总不如他们单独行动时精明能干”（Keynes 1963[1931]: 312）。他这篇讲话恰如其分地题为《自由放任的终结》，是1926年作的，比《通论》整整早了10年。这显然是对亚当·斯密天赋自由理论体系的攻击。

20世纪30年代初，凯恩斯对资本主义越来越不抱幻想，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审美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想在那时正流行，凯恩斯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观点——赚钱是种神经官能症，“一种有点令人作呕的病症，有半犯罪和半病态的倾向，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地把这种病交给精神疾病专家来处理”（1963: 369）。之后，在1933年，他指出资本主义体系的病症：“战后我们发现掌控我们的是国际化但却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这个日益衰落的体制不成功。它不明智，它不美好，它不公正，它不高尚——它也没有奉上商品。总之，我不喜欢它而且开始藐视它。但当想到用什么来替代它的时候，我们困惑了”（Hession 1984: 258）。这简直是与亚当·斯密的想法大相径庭！

凯恩斯的靶子成了苏联间谍？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是个打击，他后来再没能同以前一样。

——G·R·费伊（G·R·Fay）

在《通论》中，凯恩斯把古典经济学家阿瑟·庇古（1877—1959）当作他最喜欢的靶子（1973a: 7各处）。对这位腼腆、甚至远离尘嚣的教授来说，这样的攻击似乎不太公平，他在《经济学》（Economica）（Pigou 1936）中用一篇措词严厉评论进行猛烈反击。然而庇古在晚年时设法原谅了凯恩斯，甚至成了凯恩斯的赞赏者。

1908年，庇古31岁，年轻的他接替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从此再未离开过此岗位。他早年的时候是一位活跃的演说家、一流的教师和撰写劳动与福利问题的多产作家。然而接下来是1914年的世界大战。庇古是一个被授勋过的英国军官的儿子，但他仍然是对战争全心全意的反对者。象许多和平主义者那样，

他的假期都用来在一个由贵格会教徒组织的战时流动救护站工作。战争的苦难深深地影响了他，他开始变得孤僻并开始喜欢隐居生活。庇古这位抱有独身主义的男子，他的闲暇时间用来爬阿尔卑斯山或在巴特米尔湖区(Lake Buttermere)的家里安静地招待他的男性同伴。

庇古有多腼腆？他会透过一扇半开的门向另一个房间里的秘书口授信稿。第二天她通过校园邮件交回打字稿（Graaff 1987： 877）！

从自由贸易理论家到共产主义同情者

很难说庇古什么时候改变看法变成一个革命事业的秘密支持者。表面上他作为一位坚定的自由贸易理论家和亚当·斯密奖的获得者而建立了很高声誉。而他所开创的福利经济学，包含了对分配公平和穷人利益的强烈同情。他拥护再分配方案（累进所得税和高额遗产税），萧条期间他和凯恩斯一起倡导赤字支出和公共工程计划。之后，他主张把煤炭和铁路等“垄断”行业收归国有。因为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庇古公开宣称支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这本书中，他赞成对生产方式进行渐进、民主的非暴力接管 (Pigou 1937： 138—39)。

然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证据表明在他职业生涯早期，庇古曾是革命事业的秘密特工人员。据英国特工理查德·迪肯（化名）（Richard Deacon）所述，1925年底古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会议并决定成为一名秘密特工，他被指派发展一个英国间谍网络和筹划运往俄国的军火运输费用。他甚至保存了一本那年完全用密码写成的日记本（Deacon 1989： 44—45）。

如果庇古真是一名间谍，他确实严密保守了他在英国从事间谍活动的这个秘密，并完全与他在剑桥的职业职责区别开来。他强烈地反法西斯、反纳粹，经常赞扬二战期间的同盟国苏联所取得的成就。在此期间，他涉嫌与苏维埃秘密机构会面并提供关于剑桥地区机场与空军中队的战略信息。他还帮助招募年轻男子参加苏维埃间谍组织。他会邀请他们一起长途旅行或去湖边他的家里做客。

庇古一度还曾接近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哈耶克在战争期间从伦敦调到剑桥。哈耶克象庇古一样是一个劲头十足的登山爱好者，庇古邀请他到自己湖边的家里并一同去远足。据哈耶克说，庇古对能穿越国境线的人的名字很感兴趣。但庇古突然疏远了哈耶克，而哈耶对其中原因也异乎寻常地漠不关心（Hayek 1994： 136—37）。

庇古所谓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在他去世后被英国情报机关所知，并且这件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引起公之于众。他在经济学界的声誉并未因此受损。“他所有作品的质量都很出众，”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写到，“他只在获得卓越经济学家美誉这件事上慢了些”（1999： 893）。

凯恩斯这位离经叛道者使古典经济学彻底改变

《通论》的目的不在于重建古典模型；它旨在代之以精妙、反传统的概念和一种崭新的世界观。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界仍普遍支持亚当·斯密古典模型的基本假设——节俭的美德、平衡预算、自由贸易、低税收、金本位和萨伊定律。但凯恩斯彻底改变了古典模型。他并没有把斯密古典体系视为普遍或通用的模型，而把它降格为“特例”，仅在充分就业时适用。凯恩斯自己“总有效需求”的通论则适用于非充分就业和资源未充分利用时期，凯恩斯主义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会无限期存在。在这种情形下，凯恩斯提出以下原理：

1、储蓄增长能缩减收入并减缓经济增长。在激励投资方面，消费比生产更为重要，这就颠覆了萨伊定律而变成：“需求自身创造供给”（1973a： 18—21， 111）。

2、联邦政府在衰退期间，应主动将预算保持在不平衡的状态。应采取高度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直至恢复繁荣，并且利率应长期保持在低水平（1973a： 128—31， 322）。

3、每当必要时，政府就应放弃自由放任政策并干预市场。凯恩斯认为，在危急关头回归到重商主义政策包括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都是必要的（1973a： 333—71）。

4、金本位是有缺陷的，因为它的缺乏弹性使它没有能力适应不断扩张的经济需求。有管制的不可兑现纸币更为可取（1973a： 235—56； 1971： 140）。凯恩斯对金本位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憎恶并且在废黜黄金作为世界范围内货币本位的地位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凯恩斯实际上是一个信奉太平盛世（社会千年论者）的人，想像着最终能出现一个资本无限积累的世界。他的乌托邦观点在他一篇文章中体现得最为明确，《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前景》（1963： 358—73）。通过用渐进的信用扩张促进充分就业，凯恩斯相信普遍存在的稀缺性问题最后会被克服。利率会降到零，人类会重返伊甸园。凯恩斯的想法是，金本位严重限制了信用扩张并且保持了稀缺性的现状。这样，黄金的非弹性——古典经济学家眼中的首要优点——阻塞了凯恩斯的天堂之路，需要废除而改用不兑现纸币及采取通货膨胀（1963： 360—73）。布雷顿森林协议是取消黄金在世界货币体系地位的第一步。毫无疑问，凯恩斯会很高兴看到在21世纪黄金在国际货币事务中扮演

着一个行将就木的角色。

总之，就像他的追随者们主张的那样，凯恩斯的目标不是拯救亚当·斯密的房子，而是另建一座完全不同的房子——凯恩斯建造的房子。他相信经济学家们的大部分生活、工作时间内应呆在凯恩斯的房子里，偶尔使用一下斯密的房子，大概是当作渡假住房。

资本主义是内在不稳定的吗？

凯恩斯反对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在长期内能自我调节的观点。《通论》就是专门为了建立了这样一个模型而写，它基于市场体系有内在、不可避免的缺陷的思想。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因此根据脆弱的金融系统的不确定水平，它会长期卡在在不同程度的“失业均衡”上。凯恩斯想要表明经济停留在“一种长期状态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低于正常水平的活动，既没有走向复苏，也没有完全崩溃的任何明显趋势”（1973a: 249, 30）。保罗·萨缪尔森正确地理解了凯恩斯的意思：“就总购买力和就业总水平而言，凯恩斯否认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每个人的自我中心行为走向社会最优状态”（Samuelson 1947: 151）。

凯恩斯通过“失业均衡”解释了自己的想法，但没用图表来说明。在一篇精彩的文章《凯恩斯先生与古典经济学》中，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建立了一种图形框架（熟知的IS—LM曲线图）说明了凯恩斯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特殊的古典理论）相对于失业均衡（通论）的说法（Hicks 1937）。今天的教科书中用相似的图形说明总供给（AS）与总需求（AD）。见图13.1。

在上面的图形中，我们看到经济在低于充分就业时是怎样保持稳定的。依据凯恩斯的模型，古典模型仅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 Q_f ）时起作用，而凯恩斯主义的通论应用于AS曲线与AD曲线任何交点上。

谁来承担责任？非理性投资者！

凯恩斯把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归咎于投资者的恶劣行为。《通论》创造的宏观经济模型完全建立在金融不稳定假说上。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海曼·P·明斯基（Hyman P. Minsky）所断言，“凯恩斯《通论》的基本角度是深入分析了金融力量（我们可以把它描述成华尔街）如何与生产和消费相互作用来决定产量、就业和价格”（1986: 100）。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艾伦·H·麦尔特泽（Allan H. Meltzer）提供一种相似的解释，凯恩斯的就业与产出理论与投资及资本市场的预期和不确定性相关紧密，而与刚性工资则关系不大（Meltzer 1988）。

《通论》中为数众多的段落支持此种观点。凯恩斯抱怨投机者非理性的短期“**动物精神 (the animal spirits)**”，他们在经济危机期间为了获得流动性而抛售股票。他认为，这种“非理性心理的波动”将严重损害长期预期。“确定无疑地，在所有金融业的传统规则中，没有比迷恋流动性更有害于公众的了，此原理认为作为投资机构将财力集中于持有“流动性”证券能起到积极的作用”（1973a: 155）。凯恩斯认为，股票市场不单单是增加资本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有效方式，而且可被比作卡西诺[译者注：一种纸牌戏]或一种凭运气游戏。“可以说，它是一种呼‘同’游戏、‘老处女’游戏或随着音乐抢椅子的游戏——是一种消遣，呼‘同’游戏的胜者不早也不晚地喊出‘同’；‘老处女’游戏的胜者在游戏结束前把‘老处女’传给隔壁；随着音乐抢椅子的胜者在音乐停止时保证自己有一把椅子”（1973a: 155—56）。

凯恩斯是凭经历说这番话的。他没有任何理性经济学的原因来解释1929—32年毁掉他投资组合的经济危机——恐慌是由于华尔街对现金的非理性需求造成的，他称之为“流动性偏好”或“**流动性迷恋(fetish of liquidity)**”（1973a: 155）。

“极端主观主义”产生无知的新学派

技术性投资的社会目标应当是战胜掩盖我们的未来的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73a: 155）

凯恩斯对行业心理的内在不稳定性谈论得如此之多，以致英国的G·L·S·沙克尔(G.L.S Shackle)和德国的路德维希·M·拉克曼(Ludwig M.Lachmann)争辩说经济学象一只万花筒，在那里结果以不可预期的方式随经济领域的每次震动发生改变。这样，凯恩斯经济学是一种不确定性和无知的通论（Shackle 1974; Lachmann 1977）。

凯恩斯自己听信了宏观经济学中的这种“极端主观主义”。在评论《通论》的研究方法时，他说，“我们对未来的了解是起伏、含糊和不确定的，这一事实使财富成为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中一个特别不适宜的主题……无论如何，对于形成任何可计算的可能性，我们没有丝毫科学依据。我们纯粹什么也不知道”(1973b: 114)。

傲慢的时代

到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忘记了他们导师谦逊的评论，并且相信他们通过已经利用凯恩斯主义工具找到微调经济的方法。但接下来混乱的70年代使许多经济学家感到迷茫，也迫使他们公开承认自己理论和政策的失败。正如哈耶克1974年获诺贝尔奖时所说，“我们目前确实没什么理由感到自豪：我们这个职业，把事情做得一团糟”（Hayek 1984：266）。

无知的时代

从那时起，一个新学派就产生了，我给它取了个“经济学无知学派”的绰号。这一学派里经常出现一些非常聪明的经济学家，他们对当前的热点经济问题显示出一种新的奇怪不安和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得情绪。这些新的虚无主义例子有：

- 赫伯特·斯泰因(Herbert Stein)，经济学顾问委员会前任主席，写到，“我越来越注意到我的无知.....我不知道增加预算赤字是激励还是妨碍国家收入。我不知道是M2还是M1控制支出水平。我不知道个人所得税的最高比率增加10%，税收收入会增加多少.....我不知道如何挑选获利股票”（1993）。

- 查尔斯·R·比恩(Charles R. Bean)，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在《经济文献杂志》上写了一篇47页的关于欧洲失业的文章并得出结论，“高失业的巨大增长是一个主要的难题”（1994：573）。

- 罗伯特·J·巴罗(Rober J. Barro)，哈佛大学教授和新古典学派的代表者，这样描写1991—92年的衰退：“我这些日子最常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经济复苏的状况比预期的要差？下一年全年经济会怎样？政府该做什么才有帮助？最近似于这些问题正确答案的就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和‘什么也不作’”（1991）。

- 保罗·克鲁格曼，麻省理工学院新凯恩斯主义教授，在一本名为《兜售繁荣》的书声称，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周期，并且“不知道怎样使穷国变富，或在经济增长停滞时如何使其恢复。”此外，“没有人真正知道为什么1973年以前，年生产率增长可达3%而之后只有1%；没有人真正知道为什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一跃成为全球经济强国，而英国却慢慢地滑到三等地位”（Krugman 1994：9，24）。克鲁格曼（Krugman）是约翰·贝兹·克拉克奖章的获得者并被《经济学家》誉为今天最有前途的年轻经济学家！

无知的时代还是启蒙的时代？

无可否认，市场中总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和无知，但为过度无知辩护也不是一件好事。圣保罗曾告诫提摩太（Timothy）说，知识分子“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道”

(2 Timothy 3: 7)。

对不确定的自得情绪的确定回应

精邃经济学的旗手能为斯泰因、比恩、巴罗和克鲁格曼的疑问提供答案。赤字是刺激还是妨碍经济增长？从生产性私营部门向非生产性公共部门的转移在长期内不可避免地阻碍经济增长。货币供给控制支出水平吗？亚当·斯密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告诉我们，购买力不由货币供给决定，而由生产率和产量决定。边际税率的提高会增加税收收益吗？不如边际税收削减增加的收益多！没法挑选获利的股票吗？大概与金融家彼得·林驰(Peter Lynch)、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约翰·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和其它分析家们坐下聊聊也许会对斯泰因先生有帮助。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欧洲顽固的高失业？证据正在增加：过高的工资税和限制性的劳动规则（法定带薪假期、有限工作周、不能解雇工人等等）。如果欧洲政府使其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失业率就会降低到美国的水平。

政府怎样做才能创造长期复苏？不是像布什1991年那样增加税收。削减税收和行业管制会更好。

为什么穷国能变得富有？东南亚经济奇迹的共同特征是：一个强大、稳定和精干的政府，低税收，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开放的市场和对收入分配尽可能少的干预。这些理由能帮助解释日本战后的成功历程吗？支持经济增长的政府，高储蓄比率，投资方面的低税收，强调培训和质量改进的重要作用。或者这些理由能解释英国的停滞不前吗？高税收，价格和外汇控制，过于强势的工会、官僚主义和社会福利国家主义。

总之，这不是一个无知的时代，这是启蒙的时代。

罪魁祸首：非投资的储蓄

如果凯恩斯是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位经济学家侦探会在他的谋杀案——“储蓄失踪案”中指控节俭小姐有罪。在凯恩斯的模型中，导致无限期衰退的关键因素是储蓄和投资的脱节。如果在储蓄没有被投资，经济总支出会降到低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上。如果储蓄在银行中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贮藏或遗留，象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那样，那么对于流动性的迷恋会使国家的投资和产出降低。

在《通论》中，凯恩斯主张，当收入和财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积聚，不用储蓄来投资的威胁会增加。他引入一个“心理规律”，即“边际储蓄倾向”随收入增加而增加（1973a：31，97）。也就是说，当个人收入越多、越富有，在收入中他们想用于储蓄的比例就

越大。这样，当国民收入增加时有储蓄不成比例增长的强烈趋势。但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不是总处于对新增储蓄进行投资的压力之下吗？凯恩斯回答说，“也许是，也许不是。”如果不利用储蓄来投资，繁荣将变为崩溃。

实际上，凯恩斯在对非投资储蓄的批评这个问题上以前曾经摇摆不定。在《和约的经济后果》（1920：18—22）中一个风趣的段落里，他承认了19世纪节俭和克己的必要性——他说节俭“使固定财富的广泛积累和资本增值成为可能，而这种积累令这个时代与众不同”（1920：19）。但在《货币论》（1930）中，这位剑桥经济学家表露出的想法是：储蓄和投资增长不协调的可能性很大，而这种增长造成了经济周期。在一个现代社会，储蓄和投资是由两个不同的集团所操纵。储蓄是一个“节制支出的负面行为，”而投资是一个“开始或保持某些生产过程的正面行为”（1930：155）。利率不是使二者结合的“自动机制”，他们会“失调”（1963：393）并且储蓄可能会“早产”。如果投资超过储蓄，繁荣出现；如果储蓄超过投资，衰退发生。

在20世纪30年代萧条期间，凯恩斯猛烈抨击节俭的储蓄者和财富贮藏者。在不景气时期人们的常规想法往往是减少支出，摆脱债务，积聚大量的现金头寸，然后等待复苏。凯恩斯反对这种“过时的”方法，他也得到其它经济学家的声援，其中包括英国财政部官员拉尔福·霍特雷（Ralph Hawtrey）和哈佛大学的弗兰克·陶西格（Frank Taussing），他们都鼓励消费者花钱。在1931年1月的一次广播讲话中，凯恩斯断言节俭会造成贫穷的“恶性循环”，如果“你储蓄5先令，你会使一个人一天没有工作。”他鼓励英国家庭主妇继续大买特买，鼓励政府继续疯狂建设。他强烈要求，“为什么不把从威斯敏斯特到格林尼治的整个南部伦敦都拆掉，然后再漂亮地建起来……那样会雇人吗？嗨，当然会！”（1963：151—54）。

凯恩斯对节俭的偏见在《通论》中达到顶点，在那里他把对储蓄的传统看法称为“荒谬的”。他醒目地写到，“我们越是品性正直，就越是被节俭所左右，我们国家财政和私人财务中的正统事物越顽固地存在，我们的收入也就越低”（1973a：111，211）。凯恩斯赞扬底层社会人物和金融怪才的非正统观点，如伯纳德·德·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J·A·霍伯森（J.A Hobson）和西尔维·盖赛尔（Silvio Gessell），他们持有消费不足主义的观点（1973a：333—71）。他无疑受到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社会信用运动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少校（Douglas）和消费不足主义者福斯特（Foster）和凯晴斯（Catchings）思想的影响（见下表）。

消费不足主义者悬赏5000美元驳倒他们的理论！

凯恩斯不是第一个对节俭美德提出质疑的人。数年前，一小群激进思想家，一般被称为消费不足主义者，就对传统赞同节俭的观点表示反对。这些人包括西蒙德·德·西斯蒙迪(Simonde de Sismondi)、卡尔·罗德伯特斯(Karl Rodbertus)、J·A·霍伯森和卡尔·马克思。凯恩斯对C·H·道格拉斯少校的“异端”观点表示支持，道格拉斯上校是20世纪20年代加拿大社会信用运动的谋划者，他还写了几本拥护“经济民主”的书（1973a：370—71）。由于相信储蓄会造成一国购买力的长期缺乏，道格拉斯上校倡导严格低的市场价格控制，让消费者买得起他们生产的产品。

里德学院(Reed College)的前任校长威廉姆·T·福斯特(William T.Foster)和制铁工厂主威德尔·凯晴斯(Waddill Catchings)、戈德曼(Goldman)投资公司的合伙人萨克斯(Sachs)一起提出一个不同的方案。福斯特和凯晴斯写了一系列类似的反储蓄主题的书。“被用于储蓄或投资而不是消费的每一美元，都会造成消费者用于购买的一美元的缺失，除非这种缺失能以某种方式得到补偿”（Foster and Catchings 1927：48）。什么方式？福斯特和凯晴斯提倡政府发行新的货币信贷给消费者，用以弥补消费者的购买力缺失。

为了引起公众对他们的理论和提议的兴趣，1927年他们提出对能驳倒他们的人奖励5000美元。几个月后他们发表了其中最好的文章，但最优秀的评论文章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1929年写出的。他的文章《储蓄的悖论》被翻译过来在1931年5月的《经济学》（Economica）发表。

哈耶克认为。福斯特—凯晴斯难题是建立在一个错误假设上的。他们采用一个“单期”模型，所以投资完全而且直接地依赖于消费需求。在这样一个约束性很强的假设下，“不存在动机……导致存钱……（或）……利用储蓄来投资，”哈耶克强调（1939[1929]：224，247）。哈耶克用一个使用资本、以时间为导向的生产阶段说明了增加的储蓄延长了资本主义进程，提高了生产率，从而增加了利润、工资并提供给消费者购买最终产品的足够收入。

福斯特和凯晴斯驳回了所有反对意见，而且一直没有支付奖金。

凯恩斯把支出视为关键要素进行集中研究

在凯恩斯的思想中，储蓄是一种不可靠的支出。只有由经过商业投资的储蓄才“有效”。因此，贮藏在床垫底下或堆积在银行保险库里的存款是整个经济中漏损。

只有“有效需求”——《通论》第三章引入的一个有力的新术语——有重要意义。消

费者和各行业支出决定了国家的产出。凯恩斯把有效需求定义为总产量（Y），它是消费（C）和投资（I）的和。即，

$$Y=C+I$$

今天我们称Y或总“有效需求”为国内生产总值（GDP）。GDP被定义为当年产品和服务的最终产量的价值。一位凯恩斯主义统计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用国家收入帐户作为衡量凯恩斯有效需求（那时称国民生产总值或GNP）的方法。（更多关于库兹涅茨的内容见371页加框文字。）

凯恩斯有效地证明了如果储蓄不进行商业投资，那么GDP就不能达到潜在水平；衰退或萧条表明有效需求不足。

关于萨伊，凯恩斯说了什么？

凯恩斯革命所反对的正统学说建立在萨伊定律的基础之上，即认为不存在需求不足。

——琼·罗宾逊（1976：121）

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一个假想敌并发起了一场经济学革命。这位假想敌就是J·B·萨伊和他著名的市场定律。斯蒂文·凯特斯（Steven Kates）称《通论》是“从头到尾都在尝试批驳萨伊定律的一本书。”但是为了做到这点，凯恩斯严重扭曲了萨伊定律并从总体上严重曲解了古典经济学。正如凯特斯在他非凡的著作《萨伊定律与凯恩斯革命》中所揭示的，“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解释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他错误地理解了它的经济含义”（Kates1998：212）。

凯恩斯是怎样曲解的

在1939年出版的《通论》法文版的序言中，凯恩斯把萨伊定律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集中探讨。“我认为直到近期，经济学处处被统治着……被与J·B·萨伊这个名字相联系的教条。的确，许多经济学家早就抛弃了他的‘市场定律’；但他们并未将自己从他的基本假设，尤其是他的需求由供给创造的谬见中摆脱出来……然而建立于这种基础上的理论无疑对处理失业和商业周期问题难以胜任”（1973a：xxxv）。

遗憾的是，凯恩斯没能理解萨伊定律。他错误地把萨伊定律释义为“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1973a：25），这是一种对原有含义的曲解。实际上，凯恩斯把萨伊定律的

含义改成所有的生产物被自动购买。因此，凯恩斯认为萨伊定律不能解释经济周期。凯恩斯错误地得出结论，“萨伊定律……等价于达到充分就业无障碍的主张”（1973a: 26）。

有趣的是，凯恩斯从未直接引用萨伊的作品，以致有些历史学家猜测凯恩斯从未读过萨伊真正的《概论》，而是代之以李嘉图和马歇尔对萨伊市场定律的评论。（关于萨伊定律的详细论述及对萨伊《概论》的直接引述，见本书第二章。）

凯恩斯进而说明了基于萨伊定律的古典模型“假定充分就业”（1973a: 15, 191）。其它凯恩斯主义者继续持有这一观点，但没有比这更不符合真实情况的了。失业的环境不会阻止生产和销售的发生进而形成新收入和新需求的基础。

萨伊实际上是用他自己的定律去解释衰退。同样，萨伊定律确实形成了关于经济周期和失业的古典理论的基础。如凯特斯所述，“古典经济学的立场是非自愿失业不仅是可能发生的，而且经常发生，并对失业者有严重后果”（Kates 1998: 18）。

萨伊定律得出推论：衰退不是由需求水平不够造成的（凯恩斯的观点），而是由于供给和需求结构上的失灵造成。依据萨伊定律，当生产者错误地估计了消费者想要购买的东西时，由此会造成未售出的产品堆积、生产缩减、工人被解雇、收入降低，最终，消费者支出减少，此时经济衰退就会发生。象凯特斯说明的那样，“古典理论通过表明周期处于上升段期间生产过失是如何可能产生的来解释衰退，而这些生产过失会导致一些产品无法以能弥补成本的价格卖出”（1998: 19）。古典模型是一个“关于衰退和失业的极为深奥微妙的理论”，它被著名的凯恩斯一下子就“抹杀”了（Kates 1998: 20, 18）。

在他范围广泛的著作中，凯特斯也强调了其它古典经济学家，包括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罗伯特·托伦斯(Rober Torrens)、亨利·克莱(Herny Clay)、弗雷德里克·莱文顿(Frederick Lavington)和威廉·罗克(Wilhelm Röpke)，他们发展了萨伊定律的古典模型。很多古典经济学家集中精力研究了通货膨胀如何加剧经济周期。

凯恩斯的劲敌

有一点凯恩斯是对的：萨伊定律是凯恩斯的劲敌。它明确地否认凯恩斯基本原理——总需求不足造成衰退和通过政府赤字人为地刺激消费者支出是消除萧条的对策。引用凯特斯的话，“萨伊清楚地知道经济能够并且确实会进入漫长的经济萧条阶段。但他费尽苦心想表明的是提高非生产性消费的数量不是一个治疗经济活动萧条水平的良方，它对财富创造的过程毫无益处。消费，无论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都耗竭资

源，而只有生产性消费能够做出等价的贡献甚至能创造更高的价值”（1998：34）。

需求创造它自身的供给

凯恩斯决办么额产
会产来进经济复苏从这种义说凯颠萨
创给见343页“关萨凯说么”
□

为Y国产时选择经济间
风险I资资样费们
费C当资费们

把G加入到方程

只有一条出路，凯恩斯写到。让政府开始支出。凯恩斯把G（政府）加入到国民收入方程中。因此

$$Y=C+I+G$$

凯恩斯把政府（G）视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它能够通过印刷机和公共工程刺激经济。如果不危害消费或投资且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扩张性的政府政策会提高“有效需求”。事实上，在衰退期间，G的增长将激励C和I，由此推动Y。

在空地上挖坑：凯恩斯赞同激进主义的财政政策

凯恩斯推翻了古典经济学解决衰退的方法，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是在通过削减价格、工资和浪费的支出来“勒紧腰带”的同时等待衰退结束。与此相反，凯恩斯建议在衰退期间通过联邦政府主动的赤字开支来启动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严重萧条期间，他甚至支持更为激进的方法：政府开支可以完全是浪费性的，而且即便如此也仍然有帮助。“金字塔式建筑、地震甚至于战争都可能对增加财富起作用，”他宣称（1973a：129）。当然，“实际上建造房屋和诸如此类事情会更切合实际，”但生产性建筑不是必要的。凯恩斯认为，支出就是支出，不管目标是什么，它有着同样有益的效果——增加总需求。

凯恩斯赞同公共工程胜于通货膨胀

凯恩斯感到采用财政政策（改变开支和税收）补救经济比货币政策（改变货币供给

和利率)更有效。他在20世纪30年代对货币政策和联邦储备系统失去了信心,那时的利率如此之低,以致于再降低利率也区别甚微。劝说联邦储备系统扩张货币供给也不会非常有效,因为银行无论如何都拒绝贷出超额准备金。凯恩斯把这种情况称为“流动性陷阱。”由于“流动性偏好”——在严重萧条时期人们有持有现金的愿望,新增货币不会用于花费和投资,而仅仅是堆积起来(1973a: 207)。

乘数如何引致充分就业

公共工程会提供几项好处。首先,公共工程提升实际支出,使人们有工作,使钱进入商家的口袋。此外,他们有建立在该国边际消费倾向基础上的乘数效应。

乘数,是由理查德·卡恩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凯恩斯主义者工具箱中一个有力的新工具,它用来说明“投资的小额增量将带来充分就业”(J.M.Keynes 1973a: 118)假定衰退中政府雇用建筑工人和供应商去建造一栋价值1亿美元的新联邦政府大楼。先前失业的工人现在获得工资。第一轮支出,有1亿美元被增加到经济中。

现在假定公众的边际消费倾向是90%,也就是说,这些工人每挣得新的一美元当中有90美分用于消费。(另一种表述是:他们的边际储蓄倾向是10%。)第二轮支出,有9000万美元被增加到经济中。

然后是第三轮。工人花掉他们新挣的钱后,那9000万美元变成其它行业的收入,它们包括购物中心、加油站、超级市场、汽车经销商和电影院。这些行业转而雇用新工人来经营这些新需求,也支付他们更多的工资,这些工人同样花掉收入的90%。他们得到新增8100万美元(9000万美元的90%)的消费力。最终,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引起一轮接一轮的不断减少的支出。此时,新的支出不断持续到过程结束,总支出已增加了十倍。凯恩斯为乘数 k 建立的公式是,

$$k=1/(1-MPC)$$

这里MPC=边际消费倾向

因为在上面例子中, $MPC=90$, $k=10$ 。如凯恩斯所述,“乘数 k 是10;由公共工程带来的总就业量.....将是原本公共工程提供的最初就业量的10倍,假设在其它领域内没有投资缩减”(1973a: 116—17)。

凯恩斯做了一个有害的假设

值得注意的是在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只有消费支出能在经济中引起额外的收入和就业。凯恩斯假设储蓄是无效果的,它造成现金贮藏或过多的银行储备。这样,最初提出

的凯恩斯主义模型被视为一个“萧条”模型。我们在下一章将看到，这是一个在战后年代导致经济学中许多危害和误解的关键性错误。

凯恩斯提出巩固资本主义的严厉措施

这位剑桥的领袖对暂时性的方法如用公共工程和赤字开支恢复充分就业并不满意。一旦达到最大产量，他分析说，没有理由认为它就将在那停留。投资是不可预测和短暂的，凯恩斯说。只要非理性的“**动物精神**”在一个自由放任的金融市场里起作用，那么长期预期、稳定的商业氛围及储蓄和投资相等就不能得到保证。凯恩斯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他主张把一种渐进而广泛的“投资社会所有化”作为“保证接近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1973a: 378）。这决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而是意味着政府对整个资本市场的所有权。凯恩斯也赞同用对所有证券销售征小额“证券交易税”的方法抑制投机热潮。

20世纪经济学的转折点

有两个因素为凯恩斯主义革命横扫经济学界创造了有利的环境。首先，大萧条的严重程度和长期性似乎证明了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市场资本主义是内在不稳定的，市场会不定期地滞留于失业均衡。

经济史学家指出20世纪30年代在消除失业方面取得进展的仅有几个国家是有极权主义体制的德国、意大利和苏联。奇怪的是，凯恩斯在德文版的《通论》中承认，他的理论“与其说是在自由竞争和大范围自由放任条件下采用的对已知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理论，不如说它更易于适应极权主义国家的条件”（1973a: xxvi）。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恰恰在《通论》出版后到来，这为凯恩斯的政策妙方提供有力的经验证明。在二战期间，政府支出和赤字财政显著上升，失业消失，经济产出猛增。正如凯恩斯所料，战争对经济是“有好处的”（1973a: 129）。历史学家罗伯特·M·科林斯（Robert M. Collins）写到，“凭借对大规模政府支出的有效性提供明显证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凯恩斯主义盛典搭建了一个舞台”（1981: 12）。以下这段话引自于一本流行的教科书，它重复了战后时期其它教科书上的叙述：“20世纪40年代大规模的、适应战争的支出一开始实行，收入立即有灵敏的反应，而且失业缩减。政府在商品和服务上的开支在20世纪30年代还低于GNP的15%，而1944年一下子就猛增到占GNP的46%，而失业达到难以置信的低水平，只占平民劳动力的1.2%”（Lipsey,Steiner,and Purvis 1978: 573）。

凯恩斯1946年去世，刚好在战争开始后。只剩下他的门徒去引导潮流和创建一门

“新经济学。”凯恩斯是幸运的，一位年轻的天才青年已准备好接过他的衣钵。他的名字是保罗·萨缪尔森，他将写出一本教科书，这本书将统治经济学界超过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在第14章讲述他的故事。

凯恩斯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在长期我们都死了”？

我甚至认为它是新英国剑桥学派唯一正确的宣言。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凯恩斯因他目空一切的言述而闻名，“在长期内我们都死了。”许多经济学家把他的言词视为对弗雷德里克·巴师夏经典观点（“见到的与见不到的”——见第2章）的公开侮辱，巴师夏认为必须考虑政府政策的长期而不仅仅是短期的作用。例如，赤字开支在短期内可能刺激经济中某些部门，但是在长期内会有什么作用呢？关税可能保全了一些制造业岗位，但它会对消费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象亨利·海兹利特（Henry Hazlitt）断言的，“经济学的艺术在于它对于任何行动或政策都不仅观察其眼前的效果而且观察其长期效果；在于不仅为一个集团而是为所有集团追查那种政策的后果”（1979[1946]：17）。另外一位评论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也得出结论，“我们已经渡过短期，正在遭受[凯恩斯主义]政策的长期后果”（1980：7）。

凯恩斯可能确实把他的格言用于支持短期政策如赤字开支，但他也把它用于其它情况。

凯恩斯攻击货币主义

凯恩斯第一次说出的上面引述的这个著名言论，是用它来嘲笑欧文·费雪的极端货币主义，这种货币主义主张通货膨胀在长期内没有负面作用而仅仅是提高价格（见第11章）。凯恩斯反驳说，“现在‘在长期内’这可能是真的……但这个长期是对当前事务的误导。在长期内我们都死了。经济学家们给自己的任务太简单又太没用了，如果是在暴风雨的季节，他们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当风暴过去很久以后，海面又会恢复平静”（1971：65）。毫无疑问，海兹利特和米塞斯会在此段论述中找到很多共同点。

凯恩斯也把他的著名言论用于英国外交政策和战时政策。1937年，当丘吉尔倡导重整军备并提出提防以希特勒的绥靖时，凯恩斯似乎支持短期和平法案（short-term peace initiatives）：“我们的职责是延续和平，一小时接一小时，一天接一天，我们能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在另一种情况下，我已经说过‘长期’的不利，在长期内我们都死了。但是我同样也可以说‘短期’的巨大益处，在短期内我们都还活着。生命和历史是由短期组成的。如果我们在短期内处于和平之中，那就很了不起。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就是推迟灾难”（Moggridge 1992: 611）。凯恩斯是在提倡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吗？

1941年12月珍珠港遭袭之后，凯恩斯对英国外交部认为与美国开展自由贸易将对英国的“长期”有利的观点感到沮丧。凯恩斯气势汹汹地说，“‘为了在长期内想为所欲为’我们就必须在短期内做出让步的理论，使我联想起我曾用‘在长期内我们都死了’这句话向经济理论界投掷的一颗炸弹。如果最后不剩下谁可以绥靖了，外交部就会集体感到无所事事了”（Moggridge 1992: 666）。

这就是凯恩斯——真正的嘴脸是重商主义者。

插图及图表注解

P320

照片13·1 琼·罗宾逊（1903—83）

照片13·2 爱德华·张伯伦（1899—1967）

竞争性资本主义是不完全的。

感谢马克·布劳格提供

P323

图片13·3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8）

“活跃思维加上不羁的眼神。”

感谢赫尔顿—格蒂档案馆提供。

P326

图片13·4 爆炸性新闻 莉迪亚·洛普科娃和梅纳德·凯恩斯结婚了！

感谢麦洛·凯恩斯（Milo Keynes）博士提供

P328

图片13·5 床上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感谢赫尔顿—格蒂档案馆提供。该照片摄于1940年3月，他正在布卢默斯伯里的家中。

P334

图片13·6 阿瑟·C·庇古（1877—1959）

剑桥大学教师，苏维埃间谍？

感谢剑桥大学提供

P337

图表13·1 以凯恩斯失业均衡理论的一个说明：通用模型和古典模型

来源：Byrns and Stone（1987：311）。

经Scott, Foresman and Co. 允许重印。

第十四章 保罗举起凯恩斯主义十字架：萨缪尔森和现代经济学

本章音乐选段：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匈牙利舞曲第5号

如果我能为一个国家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并不在乎谁为它写法律，谁在为它起草条约。
——保罗·A·萨缪尔森（1990：ix）

1948年是经济学领域中偶然出现的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之一。还记得1776年、1848年和1871年吗？

1948年初，奥地利移民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把自己关在纽约的寓所里为一个名为“直言”的保守出版社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石头变面包，凯恩斯的奇迹”。他庄严地宣布：“美国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的最终失败。毫无疑问美国公众已逐渐放弃凯恩斯主义的概念和口号。这些概念和口号的影响力日趋下降。”（Mises 1980：62）

这可能是个热切的心愿，但米塞斯误选了1948年来发表上述观点，这个错误实在太严重。这一年正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新经济学被骤增的凯恩斯追随者热情地拥戴为未来的潮流趋势和资本主义的救星。自从凯恩斯《通论》发表后有关凯恩斯和新凯恩斯模型的几百篇文章及几十本专著相继出版。

另一个剑桥

1948年也是哈佛经济学系主任西蒙·E·哈里斯编辑出版《拯救美国资本主义》一书的年份。这本书是他1947年《新经济学》编辑工作的继续。这两本畅销书都是由杰出经济学家宣讲凯恩斯新经济学理论的论文合集，这些论文很受赞赏。

达尔文有一个传播他进化论的忠实斗士，而凯恩斯在美国则有三个，他们是西蒙·哈里斯、阿尔文·汉森和保罗·萨缪尔森。他们都来自另一个剑桥——马萨诸塞州，剑桥。哈里斯和汉森都是哈佛保守派教师，他们转向凯恩斯学派并且竭尽全力说服他们的学生和同事相信这种奇怪的新学说的有效性。

凯恩斯经济学在美国的推进表明从欧洲到新大陆的转变，这种转变虽然微小却很清

晰。战前剑桥和伦敦主宰着经济世界。战后，对优秀研究生最具吸引力的是波士顿、芝加哥和伯克利。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到美国深造，并且不局限于经济学领域。

教科书之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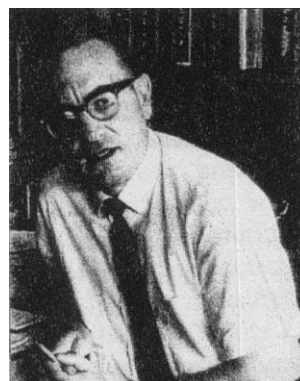
最后，一部令人兴奋，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教科书问世于1948年。这本书出自哈佛大学的邻校麻省理工学院（MIT）。其作者是一个“盛气凌人、妄自尊大、积极进取的年轻人”（他自己的形容词！）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注定成为各领域出版过的最成功的教科书，它已再版十五次[2005年，《经济学》第17版业已问世,译者注]售出超过四百万册，并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能与之相比，包括让-巴蒂斯特·萨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教科书。萨缪尔森《经济学》历经了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及经济学界的风云变幻：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萧条；通胀与通缩；共和党与民主党及一系列新的经济理论。

萨缪尔森教科书流行的重要原因不是写得如何好，而是他熟练地应用简单的几何学和简明的图形阐明并简化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他带来席卷了整个经济学界，每年售出的册数数以千计。萨缪尔森约三年再版一次他的教科书。现在每部教科书的出版者都效法这种做法。《经济学》在1946年最流行时售出超过440,000册。甚至诸如我的母校博明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这样保守的院校都使用萨缪尔森的教科书。

专业领域内成功的巅峰

萨缪尔森成名的原因不单是因为他普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他还被认为是现代宏观理论之父。他在数理经济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但毁誉参半；他使经济学成为精确的逻辑科学，因而受到尊敬；同时他把李嘉图恶习和瓦尔拉斯的均衡分析推向极致，全无任何实证分析（见第四章和第八章），因而也遭到指责。

萨缪尔森因其广受赞誉和学术成就，几乎得到了学术界所有的荣誉奖。包括首届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该奖章授予四十岁以下的有为经济学家；1970年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还有非经济学奖项，1971年他被授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奖章。甚至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年度奖，保罗·A·萨缪尔森奖专门颁发给金融领域的出版物。他的文章发表在所有权威的刊物（和许多小刊物）上。他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AEA）会长，并获得许多其他大学的名誉学位。萨缪尔森成为许多论文集（Festschrifts）的主题人物，即学者们聚在一起用关于其成果的文章来表彰一位同行经济学家。



照片14.1

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
(1915-)

“盛气凌人的年轻天才”
感谢保罗·A·萨缪尔森提供

谁提出的“宏观经济学”这个术语？

对于那些经历过1929—1935年大萧条的人们，当时最好的课本中关于宏观经济学内容几乎可以说是滑稽的。因为那时这个词还没发明呢。

——保罗 A 萨缪尔森（1997：

157）

是保罗·萨缪尔森发明“宏观经济学”这个词的吗？这个术语在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第一版中尚未出现。萨缪尔森认为“微观”和“宏观”的区别应该追溯到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拉格纳·弗里希和简·丁伯根。弗里希创造了“经济计量学”这个词，而“宏观经济学”这个词则可追溯到1939年埃里克·林代尔（Erik Lindahl）（Samuelson 1997：157）。

然而，“微观”和“宏观”之间的区别可追溯到更早的19世纪末，奥地利经济学家欧根·柏姆-巴维克1891年1月写过这样一句话：“想精确了解一个发达国家的宏观事件的人不能回避学习微观事件。”（Bohm-Bawerk 1962：117）又是奥地利人！

盛气凌人的年轻天才

保罗·A·萨缪尔森1915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盖瑞城的一个犹太家庭，后移居芝加

哥。1935年年仅20岁就获得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同现在一样是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大本营。那时的代表人物有弗兰克·奈特、雅葛布·维纳、哈里·西蒙斯等。萨缪尔森的第一节经济学课是阿伦·迪莱克特（Aaron Director）讲授的。阿伦·迪莱克特可能是所有教员中最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后来成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姻亲兄弟**。弗里德曼和乔治·斯蒂格勒都是当时的研究生。迪莱克特的自由放任思想未能俘虏年轻的改革者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喜欢成为这个保守机构里的天才叛逆者，同时他深受被称为“温和社会主义者”的父亲影响。然而，在大萧条期间许多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建议把赤字支出和其他激进政府政策作为临时对策（见第十五章，芝加哥并不总是坚持自由放任传统）。萨缪尔森从芝加哥学派继承了一个概念——货币主义——直至他接触到凯恩斯。他因为自己曾接受货币主义理论而称自己为“蠢人”（Samuelson 1968: 1）。

萨缪尔森不久就去了哈佛大学，在那儿他亲眼目睹了一个惊人的转变。他的老师阿尔文·汉森从一个长期坚定的古典经济学家转向凯恩斯主义学派（见356页加框文字）。凯恩斯及其《通论》瞬间风靡美国，萨缪尔森很快放弃货币主义而倒向凯恩斯主义。萨缪尔森发现当时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最振奋的时代：“1936年以前出生的经济学家确是得到上天的恩惠，是的！但不要出生得过早！”（Harris 1947: 145）他引用下面为人熟知的威廉·华兹华斯的《序曲》（在第三章已经引用过）：

在那个黎明仍然活着已是福份，年轻则是上上天堂！

那也是一个恋爱的年代，1938年保罗与另一位经济学家玛利安·克劳弗德，**a Radcliffe summa cum laude**，喜结良缘。这对夫妇育有二女四子，包括经济学家罗伯特·J·萨缪尔森。玛利安·萨缪尔森1978年去世，1981年保罗·萨缪尔森与里瑞沙·埃克斯结婚。

萨缪尔森1941年完成博士论文，并因此获得当年的威尔斯奖（David A. Wells Award）。1947年他的博士论文以《经济分析基础》的名字发表。在这篇文章中萨缪尔森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决裂，他主张经济学的主要阐释方法应该是数学而不是文字表述。

但是当他毕业后却发现天堂的生活也不是那么甜美。他说自己愿意在哈佛教书，但是他年轻的活力、傲慢的个性加之犹太背景都拖了他的后腿。他趾高气昂的态度早就激怒了系主任哈罗德·赫克斯·波庞克，并且系里只给他提供一个普通讲师的职位。萨缪尔森决定留在剑桥，他接受了相对名气较小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的一个职位。

哈佛大学不久就为其失策而感到后悔。1947年萨缪尔森因其成为最有成就的年轻经济学家而获得首枚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系里提升他为正教授，同时麻省理工学院也跃升为全美最好的经济学系之一。发生这一切之时萨缪尔森年仅32岁。一年后萨缪尔森又引起一场学术轰动并受到所有经济学系的仰慕：第一版《经济学》问世，萨缪尔森的宏观经济学《**新约**》。哈佛大学奥特·埃克斯坦教授评论说：“哈佛失去了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Sobel 1980: 101）。

萨缪尔森怎么会写出他著名的教科书：“仅仅是一个机缘”

二战期间，萨缪尔森在麻省理工学院放射实验室工作，研发追踪飞机的计算机技术。二战刚结束时，哈佛学生学的经济学教材已过时，里面未涉及二战情况，也很少谈及凯恩斯的新经济学。萨缪尔森批评到：“哈佛和麻省理工的学生经常是一副目光呆滞的样子。”萨缪尔森的系领导请他写一本新的教科书。三年后，在萨缪尔森每个夜晚和暑假的辛苦工作下（“我的网球运动都搁浅了”），《经济学》诞生了。

腹背受敌

第一版由麦格罗·希尔公司出版，至1950年共售出120,000多册并持续热销。但是不久就遭到一方面来自商界的攻击，他们抱怨该书的社会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遭受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他们对该书的资本主义倾向不满。威廉姆·F·小布克雷的《**神和人在耶鲁**》（1951）抗议说：萨缪尔森教科书是反商业且亲政府的。一个叫做维雷特基金会（Veritas Foundation）的组织出版了《凯恩斯在哈佛》一书，把凯恩斯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及法西斯主义并列。当萨缪尔森指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体系将的预言是个彻底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者感到不快，他们出版篇幅巨大的两卷评论《反萨缪尔森》（1977），以此攻击萨缪尔森同时向学生们宣传马克思主义。萨缪尔森听说在斯大林时代，他的《经济学》被放在图书馆的特别保存架上并挨着性学书籍，除了有特别许可的读者外禁止阅读，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很高兴。萨缪尔森说：“事实上，你右脸被打时的疼痛

会随着左脸再被打一下而减轻”（1998：xxvi）。同时，萨缪尔森提出一个看似平衡的经济理论而得到主流的支持。当他倾向于总体经济迫切需要稳定时，他在微观领域以一个相对自由放任的形象出现：支持自由贸易、竞争和农业市场自由。

阿尔文·汉森转换立场成为“美国的凯恩斯”

在把凯恩斯革命引入美国的过程中阿尔文·汉森比任何其他经济学家贡献都大。
——马克·布劳格（1985：79）

保罗·萨缪尔森的导师、哈佛大学教授阿尔文·汉森（1887-1975）是凯恩斯在美国的提倡者。起先多数老经济学家们包括明尼苏达大学的汉森都反对凯恩斯的异端学说。只有后来成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犹他银行家Marriner Eccles和罗斯福的经济顾问Lauchlin Currie是杰出的凯恩斯主义倡导者。



照片14.2
阿尔文·H·汉森
（1887-1975）
“美国的凯恩斯”预言停滞
感谢哈佛大学档案馆提供

1937年秋季，汉森转到哈佛大学并突然——在50岁之际——发现了凯恩斯革命本质。他成为坦率的拥护者——“美国的凯恩斯”。他的财政政策研讨班吸引了包括萨缪尔森在内的很多热情高涨的学生，并且说服了包括西蒙·哈里斯在内的很多同事。凯恩斯的学说必须被译成简单明了的英语和易懂的图形及数学，于是，汉森成了主要翻译者，从《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1946）到《凯恩斯学说指南》（1953）一直致力于此。汉森还声援了1946年的就业法案。

“停滞论题”损害了汉森的名声并且几乎毁掉萨缪尔森的名誉

然而，汉森落入一个陷阱，他合乎逻辑地把凯恩斯失业均衡理论扩展到“长期的停滞论题”。1937年，汉森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中就曾大胆地指出美国由于缺乏技术创新、美国的领域和人口增长率等因素而陷于“成熟经济”的轨道之中不能摆脱。乔治·Terborgh在他的《经济成熟的鬼怪》（1945）一书中猛烈攻击汉森的停滞论题。二战后经济生机勃勃的复苏也有有力地证实了这个论点的错误。这个没有实现预言的耻辱在他的余生中一直折磨着他。

在汉森的停滞观点笼罩下，保罗·萨缪尔森也几乎遭受同样的命运。1943年，他写了一篇文章警告说除非政府在战后强有力地行动起来，否则“经济将会被引致任何经济体都未面对过的失业和工业错位时期”。在一篇发表在1944年秋季《新共和》上的分两部分的文章中，萨缪尔森预言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将会重演（Sobel 1980：101-02）。

虽然萨缪尔森及大部分凯恩斯主义者对战后时期的预测都被证明不准确，但是他逐渐开始在教科书中表达了对美国经济的强烈乐观态度。“我们的混合经济——除掉战争——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1964：809）。

萨缪尔森《经济学》的高潮

20世纪60年代初凯恩斯经济学和萨缪尔森教科书达到成功的巅峰。1961年麻省理工的教授萨缪尔森成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同一年约翰·F·肯尼迪总统举行就职典礼。萨缪尔森成为肯尼迪总统的顾问，该顾问团还包括瓦尔特·海勒以及其他著名凯恩斯主义者。1962年他们帮助在国会通过肯尼迪减税案，一项通过主动采取赤字财政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方案。这项方案看似有成效，因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济确是繁荣。当时萨缪尔森教科书在经济学界也独占鳌头，每年销售量超过250,000册。当瑞典银行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第一个诺贝尔奖——在必要地向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家垂首之后——落入萨缪尔森之手。

自从20世纪70年代经济动荡和通货膨胀以来，萨缪尔森教科书已风光不再。并且距第一版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部书已不再位居流行教科书榜首。然而，新的榜首之书（特别是近年来销量最好的坎贝尔·麦克康奈尔的教科书）多数被认为是萨缪尔森的抄袭之作。自从1985年以来，萨缪尔森与耶鲁教授威廉姆·D·诺德豪斯合著新版《经济学》，萨缪尔森的头发也由金色变成棕色直至暮年的灰白色。然而一个崇拜者写到：“即便是比以前衰弱许多，萨缪尔森的记忆力仍令人称奇。”（Elzinga 1992：878）

世界上最自负的经济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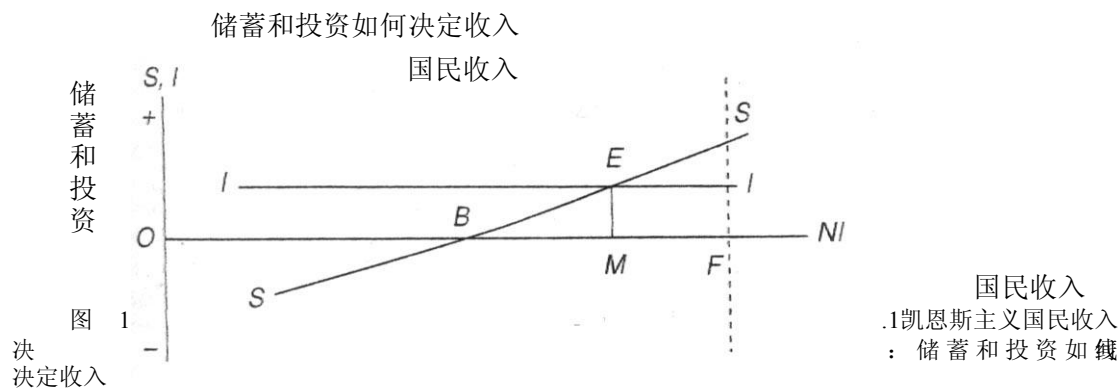
萨缪尔森从来不给人以谦逊的错觉。他获诺贝尔奖后毫不掩饰地将自己比作艾萨克·牛顿爵士和德国伟大的数学家高斯（Samuelson 1997: 881-96）。他承认自己犯过错误，正像他预言二战后经济会萧条的“大错”以及他断言苏联的经济表现会超过美国。然而他也自夸说：“我几乎对我写下的所有章节、文段、笔记及脚注都非常满意”（Breit and Spencer 1986: 69）。当然萨缪尔森确实是一位聪明、有力的作者，可能也是最风趣的经济学家。例如，他对马克思的评论就是一部经典之作（Samuelson 1967b）。

然而尽管他“天性自负”，但是他通常是和蔼可亲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公开有时甚至是十分严厉地批评萨缪尔森后，他仍恭敬地回复我写给他的每一封信，这确令我惊奇。（另一位有见地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也经常回复我的信；不幸的是，对于伯克利的巴瑞·艾欣格林，我没法同样这么说。）

萨缪尔森的目标：把凯恩斯主义的十字架钉在新的经济学殿堂的顶部

保罗·萨缪尔森想实现什么？经济学中没有真正意义的萨缪尔森学派；他称自己是“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通才。”（但肯尼思·伯丁呢？）这位麻省理工教授的首要意图是把凯恩斯主义带入课堂：乘数、消费倾向、节约悖论、**逆周期（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国民收入统计和C+I+G都是1948年第一版《经济学》中介绍的新题目。在最早几版里只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传记性描述被恭敬地收录，并且是只有凯恩斯被称为“一位多方面的天才”（Samuelson 1948: 253），而不是亚当·斯密或马克思。

“凯恩斯相交线”收入—支出图形是萨缪尔森的发明，在前三版中它被印在封面上，见下图。



来源：萨缪尔森（1948：259）。经McGraw-Hill授权重印。

凯恩斯相交线包含新“通论”中所有成分。在图中，注意到储蓄（S）随国民收入（NI）增长而增长。即人们收入越多，储蓄就越多。然而投资（I）是自主变量并独立于储蓄。它被设定为固定的量，因为依据凯恩斯的理论投资是一个无规律的变量，他随“**本能心理**”和投资人及商人预期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投资可以固定在任何水平，与收入无关。均衡（M）在S=I处决定。你会发现在该点收入少于完全就业收入水平（F）。因此凯恩斯相交线反映的是不完全就业水平均衡水平。

该模型表明萨缪尔森（和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是内在不稳定的，并且可能无限期地处在不完全就业水平（M）之下。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存在保证完全就业的“自动机制”

（Samuelson and Nordhaus 1985: 139）。萨缪尔森把资本主义比作一台没有方向盘的汽车，他经常偏离路线并撞毁。“私人经济更像一个没有有效的操纵杆和操作者的机器，”他写道。“补偿性财政政策正试图引入这样一个操作者或平稳控制器”（Samuelson 1948: 412）。

有时候的确看来如此，我们最优秀的学生可谓是无所不知，但就是对常识一无所知
——保罗·萨缪尔森（1960：1652-53）

数理经济理论最近变得越来越抽象、苍白和贫瘠。
——森岛道雄（Michio Morishima）（1976：viii）

保罗萨缪尔森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经济分析基础》之后经常被认为是现代数理经济学的奠基人。从那时起，正式的建模和模型检验（称为计量经济学）才成为经济的科学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是没有争议的。

旧的保守派对萨缪尔森的先驱理论的回应是在芝加哥的弗兰克·奈特那儿得到了很好的总结。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美国经济学会执行会议上，他坦率地对众人说：“如果说有一些事是我不赞成的，那就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和相信垄断竞争的人”。

一个同事问他：“弗兰克，你怎么看待对经济分析中应用数学的信奉者？”

“同样反对”，他坚定地回答（Samuelson 1977：886-887）。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将数学引入经济领域，当时斯坦利·杰文斯和莱昂·瓦尔拉斯（但没有卡尔·门格尔）开始应用正式方程。斯坦利·杰文斯在他教科书的前言中写道“所有经济学作者都应懂数学，这样其著作才能完全科学化”（1965[1978]：xxi）。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把经济学转变为科学学科过程中所作的工作比任何人都多，他反复地应用数学和图表。

“销毁数学”

然而，马歇尔害怕数理经济学会成为李嘉图恶习；他把公式和图表放在教科书的附录中。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提醒到好的数学理论可能不是好的经济学。他提出五条规则：

- （1）数学只是简化的表达方式，并不是研究的发动机。（2）在你完成之前坚持用数学。（3）译成英语。（4）接下来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例子来阐释。（5）销毁数学。（6）如果你不能成功做到第4步就销毁第3步。最后这步我常做……我认为应该竭尽全力阻止人们在文字语言与数学语言同样简洁的情况下用数学（Groenewegen 1995：413）。

这种责备的言论让人想起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这个问题上的极端观点：“数学方法应该被拒绝，这不仅因为它的无效，它还是一种邪恶的方法，它从错误的假定开始得出谬误的推论”（Mises 1966：350）。

萨缪尔森开始出击

保罗·萨缪尔森厌恶马歇尔的不可知主义和米塞斯的无神论。在奥卡姆的剃刀（Occam's Razor）的精神里，萨缪尔森纯数学的《经济分析基础》“正好反对”马歇尔的格言（Samuelson 1972[1947]：6）。与传统的文字形式相比，他更喜欢数学公式。

美国的保罗·萨缪尔森和英国的约翰·希克斯通过将20世纪30年代的几何学转变为50年代和60年代的多重微积分学，作了示范。20世纪40年代，约翰·冯·诺伊曼引入了博弈论。1964年萨缪尔森宣布胜利：“经济学变得比以往更数学化和技术化”（萨缪尔森 1972：xii）。的确如此，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评论》中发表的文章足足有96%本质上主要是数学。几乎有38%的文章对历史事实只字未提（McCloskey 1998[1985]：139-40）。

不断加剧的对抗

在一段时期里，数学获得全面胜利，以至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经济学派都采用分析几何学、微分方程和最小二乘法回归。“定理、引理和数学都来了。语言走了”，阿加·克萊默（Arjo Klamer）和大卫·克兰德说道（1990：4）。

但是结果往往不容乐观。例如20世纪60年代剑桥学派的琼·罗宾逊和皮耶罗·斯拉法挑战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后来被称为“reswitching” debate。这些激进的经济学家试图应用缜密的数学公式来反驳正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即高储蓄率带来低利率，提高生产率，增加更多迂回产量（见第七章）。在某个时刻，就连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

（另一个剑桥的成员）都被纯理论证明说服了。但是批评者们永远不能找到事实证据使人们确信他们的说法，并且争论逐渐过时。1987年，罗伯特·索洛在他获诺贝尔奖的演讲中说道：“**reswitching debate**是在浪费时间”（1988：307-17）。

克莱默和克兰德的调查表明经济学研究生们很沮丧，原因是学术界的李嘉图恶习，理论与现实间越来越大的隔阂。“我们从心底深处感到过去发生的许多东西中有一些纯属浪费”（Klamer and Colander 1990：xiv）。罗伯特·卡特纳谈论道：“经济系培养了一代白痴专家，他们擅长深奥的数学却对现实的经济生活一窍不通”（1985：74）。甚至检验模型的计量经济学也遭受到猛烈攻击。《让我们剔除计量经济学中的骗局》是一篇关于经济学中滥用数学和统计学的著名文章（Leamer 1983）。相关系数的平方数值很大也不能证明一个量的变动导致另一个量变动。莱荣霍夫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他精彩的寓言《经济学部落的生活》中嘲笑“数理经济学”的社会等级体系是一个把人们引入“死胡同”的“无心”群体（1981：350，355）。

许多经济学家都要求返回到现实中来，而且《美国经济评论》（AER）和其它报刊的最近几期也越来越实际。发现人们越来越多地抱怨读不懂AER和其它专业出版物——并因此不读——后，美国经济学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版《经济展望杂志》（JEP）。《经济展望杂志》中的数学大大减少，目前已成为全球阅读范围最广的经济学杂志。

乘数怎样神奇地发挥作用

补偿性财政政策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有两个路径可使经济增长并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投资线I上移或储蓄线S右移。

首先，我们看投资。通过重建商业信心可使投资曲线上移，重建商业信心主要是靠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每种手段都有乘数效应——政府支出1千亿美元或减税都会带来4千亿美元的新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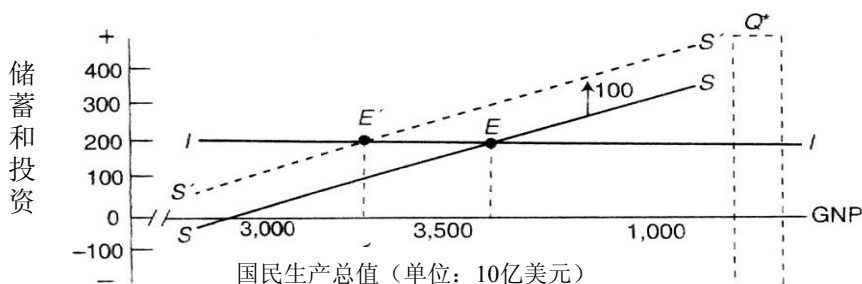
但是萨缪尔森指出在凯恩斯理论里，政府支出比减税有更大的乘数效应。为什么呢？因为联邦政府支出项目100%被花费，而减税则只有一部分被花费，另一部分被储蓄下来。萨缪尔森把他的发现称为“平衡预算乘数”。因此，凯恩斯主义者更喜欢一项新的政府支出项目而非减税，因为与减税相比支出被认为是对付经济萧条更有效的工具。

反对亚当·斯密的节俭悖论

走出萧条的第二条路径是增加公众的消费倾向以使储蓄线向右移动。

观察凯恩斯主义模型，在经济下滑时如果公众增加储蓄只会使经济形势变得更糟。消费者购买减少，生产者解雇工人，结果家庭储蓄也减少。在原始凯恩斯模型中因为利率被假定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储蓄供给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降低进而鼓励投资。在下图中，更多的储蓄意味着储蓄曲线将向左移动，并且不会对提高投资曲线产生任何影响。

储蓄和投资图表明节俭如何遏制收入



注释：Q*=充分就业产出或GNP

图14.2 萨缪尔森

充分就业产出

萨缪尔森的“节俭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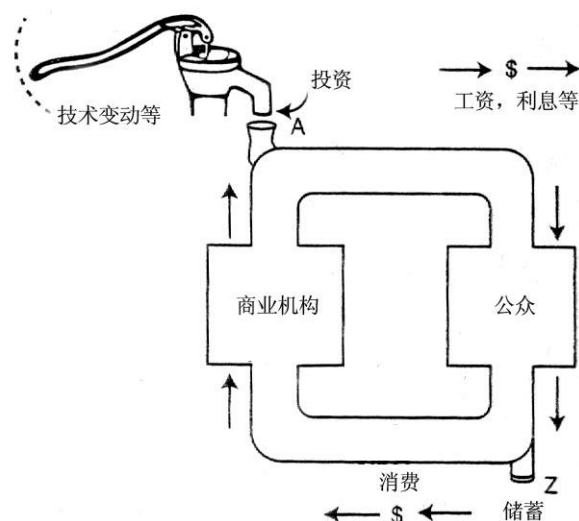
来源：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1989：184）。
经McGraw-Hill授权重印。

萨缪尔森称这种现象为“节俭悖论”——节俭欲望的增强导致储蓄总量的减少！他断言：“在失业的前提下，试图节省往往会导致储蓄的减少而不是增多”（Samuelson 1948：271）。当然，凯恩斯，当然，也阐述过实际上相同的观点，只是更有文采：“我

们越是品性正直，就越是被节俭所左右，我们国家财政和私人财务中的正统事物越顽固地存在，我们的收入也就越低”（Keynes 1973： 111）。见图14.2。

萨缪尔森喜好攻击亚当·斯密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正统理论。斯密发现节俭是个普遍的美德，他写到：“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1965[1776]： 424）。富兰克林忠告每个孩子：“存一分钱就相当于挣一分钱”。但是萨缪尔森称这种思想为“部分谬见”。他反驳到：“对单个人有益之事不须对全体都有益”。并且，富兰克林的“旧[节俭]美德”可能是现代的罪孽（1948： 270）。正像一本当今的教科书写的那样，“节俭可能铺就个人的致富之路，如果整个国家都节俭，那么结果将是经济萧条和整体的贫困。”（Baumol and Blinder 1988： 192）

凯恩斯主义者欣然赞同节俭在充分就业时期是一种美德，但是萨缪尔森确信充分就业极少发生。他写到：“但是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在我们最近的历史上仅仅偶尔发生过。大部分时期的状态是有一定的资源浪费、一定的失业、一定的需求不足、投资不足和购买力不足”（1948： 271）。这段话在前11版中几乎无变化地被保留下来。



技术变动、人口增长和其它动力因素使得投资井柄一直运动。收入随投资的变化而增减，任何时候的均衡水平都意味着Z处的意愿储蓄等于A处的意愿投资。

图14.3储蓄从系统中漏出而投资的水压则成为推动经济的动力。

来源：萨缪尔森（1948： 264）。经McGraw-Hill授权重印。

储蓄漏出

重述凯恩斯的话，萨缪尔森称要对抗不投资的储蓄，正是这种储蓄从系统中“漏出”并“成为一种社会罪恶”（1948： 253）。他绘制了一个图形（见图14.3）将储蓄和投资分开。该图表明储蓄从系统中漏出，与上面的投资水压柄没有连起来。（该图性令观察者将其称为“管道凯恩斯主义”模型。该模型强调通过政府支出来增强水泵动力。）

消费比储蓄更重要吗？

凯恩斯主义模型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即消费比节约更具有生产性。注意上面的凯恩斯收入决定模型可知“消费倾向”的提高（更低的储蓄率）将带来充分就业。凯恩斯赞成“所有提高消费倾向的政策”，包括遗产税充公和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财富再分配，因为低收入者能比高收入者以更高比例地花费其收入（1973[1936]： 325）。第一个写凯恩斯教科书的加拿大经济学家洛里斯·塔西斯(Lorie Tarshis)警告到，高比率的储蓄是“造成我们困难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是联邦政府“减小对节约激励”的目标之一（Tarshis 1947： 521-12）。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赫曼·米什金支持这个非正统的方式时说：“政策的中心应该从通过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转移到通过消费产品来实现充分就业上来”（Minsky 1982： 113）。当然，所有凯恩斯主义理论都与传统的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高水平的储蓄——相悖。

凯恩斯主义是政治中性的吗？

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是政治“中性的”。例如，“它既可以应用于保护也可以限制私营企业，它既可用于支持也可以攻击政府的财政干预”（1948：253）。但是这个论断正遭受事实的挑战。

比如说，平衡预算乘数（这是萨缪尔森认为最令他骄傲的“科学发现”之一）倾向于将政府支出项目而不是减税作为**反周期政策**。依据萨缪尔森的观点，累进税制（税率随财富增多而提高）对经济中的再分配有好的影响：“从节俭的富人手里而不是从将欲支出的穷人手里拿走美元，累进税将使购买力和就业都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1948：174）。

萨缪尔森赞成社会保障税、农业补贴金、失业救济金和经济中被称为“内在稳定器”的其它福利。萨缪尔森教科书索引中一向列出“市场失败”（包括不完全竞争、外部性、财富不均等、垄断力量和公共物品），但没有“政府失败”。他的偏见是如此明显。

国债的辩护者

在最早的几版教科书里，萨缪尔森否认国债是一种负担。第一版支持“我们欠自己的”的论断，并说：“内债的利息是美国人付给美国人，因而没有商品和劳务的直接损失”（1948：427）。在第七版（1967a）中，提出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忧虑后，萨缪尔森继续说：“另一方面，在没有其他可行方式移动C+I+G使均衡交点向充分就业移动的前提下引入负债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期未来造成一种负担，因为它将导致比原来更多的现金资本形成！”（1967a：346）。在关于国债的附录结尾，萨缪尔森把联邦负债管理和个人负债管理作以比较，例如AT&T “永不停息”地增长的负债（1967a：358）。在隐含层面上，萨缪尔森仍建议政府负债不断地增加，而不只是根据经济周期保持必要的收支平衡。

总而言之，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由萨缪尔森表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变成了大政府资本主义的辩护词。“自由放任的经济不能确保充分就业所需的确切的投资量”（1967a：197-78）。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做得到。

灯塔这个奇特的例子

政府提供特定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没有这些公共服务的社会生活是不可下想象的，并且这些公共服务由其本质决定不适合由私人企业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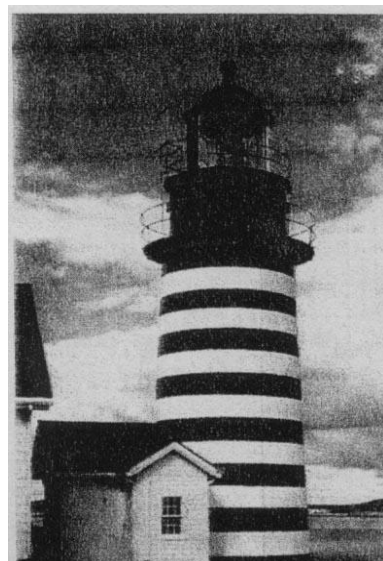
——保罗·萨缪尔森（1964：159）

萨缪尔森在“政府的经济作用”一章中用灯塔作为私人企业不能提供的完全公共物品的例子。“灯塔的光有利于所有看到它人，一个商人建灯塔不会获利，因为他无法向每一个使用者收费”（1964：159）。

真的吗？芝加哥经济学家罗纳德·H·科斯在一篇经典作品中指出在19世纪以前英国的许多灯塔都为个人或私人企业所拥有。他们通过对停泊在附近港口的船只收取可观的通行费而获利。三一塔就是私人所有并运营的重要例子，业主于1514年获得特许状经营灯塔并对船只征收使用费（Coase 1988[1974]）。

杰出的经济学家们忽略历史

科斯发现不只萨缪尔森这一位经济学家未检验事实就假定灯塔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甚至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亨利·希基维克（Henry Sidgwick）和阿瑟·C·庇古都明显忽视了他们本国历史上的私人灯塔。科斯总结到：“灯塔，就这么被凭空抓来作为例子了”。



萨缪尔森继续指出灯塔的修建资金源于公众税收。依据科斯，这个税收体系在英国从未实施过；“[三一塔的]服务维持的资金来自船只的通行费”（1988：213）。

更令人吃惊的是1974年科斯写了他的开创性(并宣传到位)作品后，萨缪尔森仍继续把灯塔作为只有政府能提供的完全公共物品。直到我公开指责萨缪尔森不予承认科斯的新发现之后（Skousen 1997：145），萨缪尔森终于在16版教科书的脚注中承认私人灯塔存在于“早期”，但是萨缪尔森坚持认为私人灯塔仍面临着“免费搭车”问题（1998：36）。

批评家们展开了一场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长期斗争

萨缪尔森在第一版教科书中宣称凯恩斯主义体系“为越来越多的各学派的经济学家所接受”（1948：253）。当然，从萨缪尔森教科书的流行程度上看，他的说法是正确的。20世纪50、60年代，各主要院所的学者们把他们的全部精力用在实证研究上，研究对象包括消费函数、乘数、国民收入统计以及其它凯恩斯主义总量。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也流行于记者和政治家之间。前者原因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易于理解（增加消费者支出“对经济有益”），后者原因是赤字支出能够拉拢选票。萨缪尔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总结新的正统理论时自豪地宣称：“我们已有的短期宏观经济理论很是完美……剩下的只是填满这些空盒子的琐碎工作”（1965：146）。

庇古效应：首次出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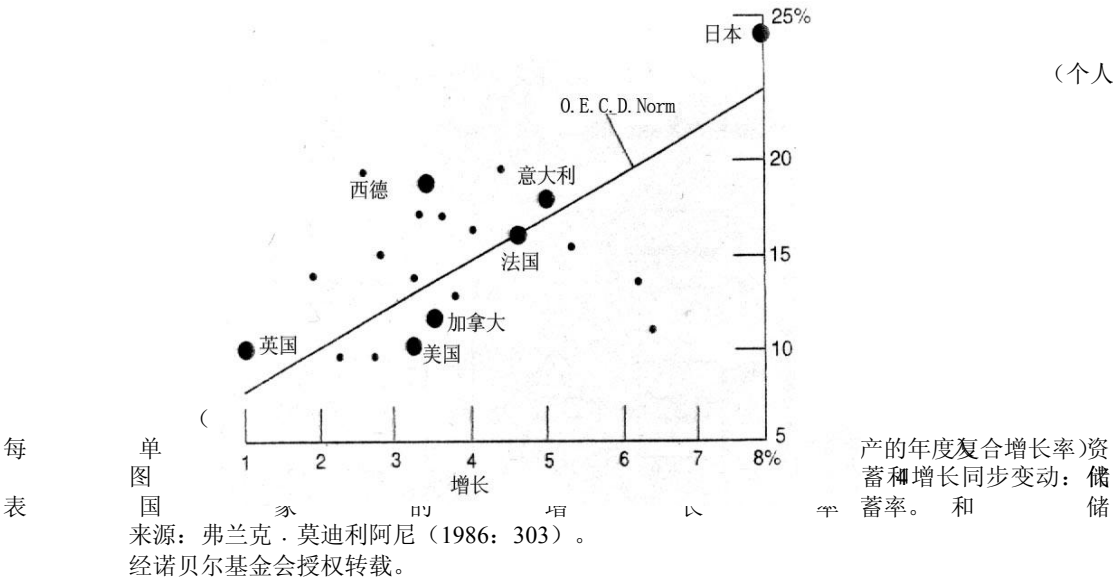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批评家们也不断地在挑凯恩斯主义框架的刺。首当其冲的是“流动性陷阱”学说，凯恩斯担心在利率非常低且“流动性偏好”极强的情况下，降低利率将无济于事，因此经济可能会无限期困在一个低靡的陷阱之中（1973：207）。第一个反对流动性陷阱学说的是阿瑟·C·庇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凯恩斯在其《通论》中曾把他当做箭靶。庇古在20世纪40年代写过一系列文章来说明凯恩斯忽视了物价和工资紧缩的一个有益的副作用：通货紧缩提高现金、国库券、**政治保险现金价值**和其它个人及商业企业流动资产的真实价值。这些流动资产价值的提高扩大了总需求并且为经济走出低谷时，产生新的购买力和雇佣新工人提供资金（Pigou 1943，1947）。这个正向的真实财富效应后来被以色列经济学家唐·帕廷金（Don Patinkin）在其代表作《货币、利息和价格》一书中称为“真实余额效应”。该理论对攻击凯恩斯流动陷阱和失业均衡学说作用颇大。

庇古的“财富”或者说“真实余额”效应也可以扩展到经济下滑时削减工资问题上。凯恩斯反对古典论点，即需要通过削减工资把经济调整到新的均衡状态以使经济复苏。保守观点认为过高的工资率将导致持续的失业。凯恩斯反对此观点并声称削减工资只会使需求减少得更多而对减少失业毫无益处。但是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们混淆了工资率和总的薪水总额。面对经济衰退和扩大的失业，商业领袖们发现降低工资率的确能增加实际就业和**应付工资总额**。在经济衰退至谷底时削减工资能使企业雇佣更多工人。当经济走出谷底时，管理良好的企业开始在低工资水平上雇佣更多的工人。所以即使工资率仍保持在很低水平上，应付工资总额仍会增加并因此把经济推上复苏的道路。（Hazlitt 1959：267-69；Rothbard 1983[1963]：46-48）

增长数据驳斥反节约主义

经济史学家们即时就对凯恩斯厌恶储蓄深表怀疑，因为最近储蓄一直被认为是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特别列举出欧洲和亚洲国家，如德国、瑞典、日本和东南亚，这些国家和地区战后的经济增长率大大得益于高储蓄率。两位凯恩斯主义者，诺贝尔奖得主弗兰克·莫迪利阿尼和著名教科书作者坎贝尔·麦克康奈尔都认识到储蓄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关系。例如莫迪利阿尼1986年诺贝尔奖**获奖演讲稿**中就包括了图14.4。

纵观历史，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高的储蓄率促进高的增长率，而这正与标准凯恩斯预测相反。正如最近的一本凯恩斯主义教科书在教授学生节俭悖论之后言明的那样：“政府并不阻挠储蓄的事实表明节俭悖论通常不是现实世界的问题”（Boyes and Melvin 1999：265）。



但是，节俭悖论既无历史根据又是根本的错误，为什么还教授它呢？问题是凯恩斯主义者将储蓄与整个经济割裂开来，认为储蓄仅仅被贮藏或者被悲苦地留在银行保险库中，不用去投资。事实上，储蓄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支出，不是用于现在的消费而是用于未来消费。凯恩斯主义者只强调储蓄消极的一面即减少目前消费，而忽视它积极的一面即构成了生产性企业的投资。正如第七章提到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欧根·柏姆-巴维克强调储蓄积极的一面：“对于经济发达国家来说，不鼓励储藏，而是把储蓄用于投资。他们用储蓄购买各种证券，把钱存入付息的储蓄银行或商业银行，然后将它用于放贷等等。”（1959：113）

储蓄也有乘数效应！

实际上储蓄是一种更好的支出形式，因为它以未来生产力的形式提供了潜在的无限的支付（因此富兰克林总说：“存一分钱就是多挣了一分钱”）。如果公众普遍储蓄更多，则储蓄池会变大，利率会降低，旧设备将被更新，并且会有更多的研究和开发，新技术和新的生产程序也将逐渐形成。未来的益处不可胜数。同时，花费在纯消费者商品上的资金将在一个特定时期内耗尽或虽时间推移贬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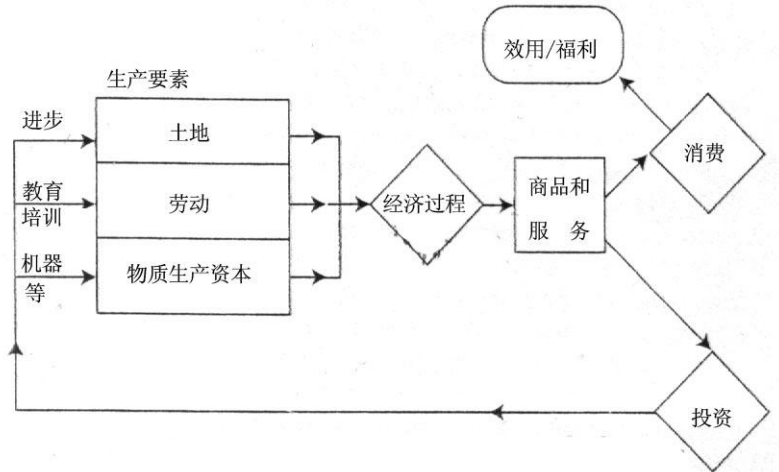


图14.5储蓄如何投资于经济系统中
来源：Ekins and Max-Neef(1992：148)。经Routledge授权重印。

凯恩斯主义乘数k随公众消费增多而提高。但拥护者们假定储蓄未用于投资，在通常情况下这是个错误的假定。实际上，收入的两个部分——消费和储蓄——都花费了。因此，乘数k是无穷大的！储蓄部分在经济中作为生产中的投资也有的乘数效应。并且，储蓄乘数k在理论上比消费乘数k产生的效应更大，因为储蓄不会很快被耗尽。

我们回过头看萨缪尔森循环水管模型（图14.3），储蓄并未从系统中漏出，而是流回到系统里通过新技术、教育和培训改进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图14.5表明了储蓄、消费和经济真正是如何运转的。

这么多年来萨缪尔森教科书中的循环水管模型应该换印图14.5的图形。在这个图形里，经济行为的最终目标是提供更高的效用。注意这幅图中消费是如何耗尽的。正是消费而不是储蓄“漏”了出去并作为效用被消费掉。相反，储蓄不断地被投资回到经济过程中，便利新的投资并改进我们的生活标准（效用/福利）。一个惊人的对比。

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的一个关键缺陷

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核心问题在于它未能理解生产—消费过程的真正本质。凯恩斯主义体系假设的唯一关键是当前对最终消费品的需求——消费者需求越高越好。尽管凯恩斯已过世，但是凯恩斯主义消费者需求主导的思想在当今已有的大众传媒中几乎被完全接受。例如，华尔街通过监测零售额来确定经济和市场的走向。如果消费者们花费不够多，他们就会很沮丧，他们的行为让人觉得他们希望全年都是圣诞节！

然而，消费者的花费是繁荣的原因还是结果呢？如果每个人都疯狂地去当地的百货公司或零售商店购物，那么对新产品和技术投资是否会扩张？当然，对消费商品的投资会扩张，但是消费品支出的增加对很多事务作用不大或根本无作用，比如修桥、建医院、资助一个治疗癌症的研究项目抑或为新发明或新的生产程序提供资金支持。

根据对经济周期的分析，零售额以及其它当前消费者支出的测量方式是滞后于经济活动的指标。美国商务部的主要经济指标指数的绝大部分都是生产和投资指向的。比如说，车间设备的合同和订单，半成品和市场交易存货的变化，原材料市场价格的变化，和意味着长期资本投资的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化（Skousen 1990: 307-12）。

典型地，在一个经济周期中，消费在经济已经开始衰退时才随之减少；类似地，经济开始复苏后，消费者支出才随之增多。

消费者推进经济的神话持续下来的部分原因是国民收入统计的误解。媒体频繁报道说消费者支出占GDP的三分之二。回想第十三章中的 $GDP=C+I+G$ ，美国的典型数据如下： $C=66\%$ ， $I=14\%$ ， $G=20\%$ 。

因此，媒体得出结论既然消费约占GDP的三分之二，那么经济必然由消费者推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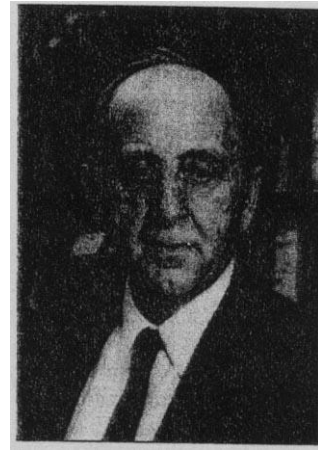
其实不然。GDP是指一年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他不计经济中的批发、加工和自然资源阶段的全部中间产品。如果计算生产的全部层次中的支出，结果会大相径庭。我已创造一个名为国内总产出（Gross Domestic Output）的国民收入统计方式，这种方式计量生产各阶段的总支出。应用这种对于经济中总支出的更广泛的新定义，我们能明显看出消费品仅占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商业支出（投资加上中间商品支出）占整个经济的一半还多。因此，在美国（并且在多数其它国家）商业投资比消费者支出重要得多。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模型缺点在于过于简化——它假设只有两个阶段，消费和投资，并且假设投资只是当前消费的直接函数。如果当前消费增多，则投资也会增多，反之亦然。

俄罗斯的凯恩斯主义者发明GDP

为人熟知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发明者——以前名为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俄罗斯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西蒙·库兹涅茨（1901-85）。库兹涅茨出生俄罗斯，1922年移民美国以前为布尔什维克作过一段时间统计员，他移民美国后，在那拿到了高级学位，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威斯利·米切尔让他加入美国国家研究局（NBER）（见第九章）。他在那里开创了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国民收入和生产统计的基本统计方法。在库兹涅茨之前，GDP还不存在。

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时，库兹涅茨为凯恩斯主义骨架添加经验研究的血肉。他发明表示经济中最终总支出的新的名为国民生产总值（GNP）的统计方式来代表为人熟知的C+I+G公式。GNP(现在为GDP)把一个历年内消费者、企业和政府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加总。由于GDP强调最终支出（凯恩斯称为“有效需求”），所以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凯恩斯主义统计方式，它漏掉了所有中间产品。



G属于GDP吗？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国民收入和生产统计中最有争议的部分是将G——政府加入。政府支出应该计入国民产出吗？由于政府支出特别是战争时期的政府支出存在潜在的扭曲，库兹涅茨慎重考虑了从GDP统计中全部排除G的想法。将G计算在内，GDP在二战期间高速增长并在1946年暴跌（下降17%！）。它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战争对经济有利并且结束战争导致经济衰退而不是复苏。

显然其中存在谬误。在1945年NBER出版的《战时的国民生产》中，库兹涅茨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只含C+I的国民生产统计方式，G被排除，这个统计方式表明私人部门真实支出在二战期间轻微减少并且在1946年骤增——一个对战争的影响的复苏的更准确观点（Higgs 1992: 44-50）。

但是最终库兹涅茨相信了GDP的“和平时概念”，它表明多数的政府支出代表着商品向消费者或资本形成的流动。因此他决定把G留在国民生产的公式里。从那时起G的增长就伴随着我们的生活。1971年，库兹涅茨因其在国民收入统计工作中的先驱性贡献获得诺贝尔奖。

照片14.3
西蒙·库兹涅茨
(1901-85)
用实证数据填充凯恩斯框架
感谢马克·布劳格提供

经济到底是如何运行的？

威廉姆·福斯特和威德尔·凯晴斯犯过同样的错误（见第13章342页）。正如哈耶克在对福斯特——凯晴斯辩论批评的那样，投资实际上有很多阶段，并且会随着利率的升降而改变形式和结构。投资不仅是当前需求的函数，而且还是未来需求的函数；长期和短期利率都影响投资和资本形成（Hayek 1939）。例如，假定公众为了未来生活更好而决定储蓄更多收入。在汽车、衣物、休闲和其它当前消费形式上的花费可能持平甚或下降，但是这种消费的暂时减少不会导致普遍萧条。相反，储蓄增多将导致利率降低，这将促进商业，特别是资本品产业和研发活动不断扩大规模。低利率意味着低成本，企业现在能负担起电脑和办公设备的升级、建立新的工厂和楼房以及增加存货。低利率使得汽车的潜在买主获得更低成本的融资，这甚至能将转变汽车销售的下滑趋势。与凯恩斯主义者的可怕预言正相反，储蓄倾向的增加是值得的。它没有导致“全体的衰退和贫困”（Baumol and Blinder 1998: 192）。经济活动的总量未变，只是生产和消费结构发生变化而已。

一个实例：建桥

这个假设的例子可能会对说明储蓄增加的益处有帮助。假设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一河之隔并且两个城市之间的唯一交通方式就是船运。在这两个姊妹城市之间来往，旅费高昂且费时。最终，市政府官员们召开会议决定建桥。人人同意削减当前支出并把他们的储蓄用于建桥。在短期，当地百货公司的零售额、雇佣人数和的利润都下降。然而新的工人和新的投资基金被用于建桥。从总量上看，产出和就业都未减少。并且，桥建成后这两个

姊妹城市将因降低的旅费和增强的竞争而获益匪浅。结果，这两个姊妹城市的牺牲转变成更高的生活水平。

重述萨伊定律：生产比消费更重要

实质上，凯恩斯的消费决定论未能认识到比当前需求更强大的另一种力量——未来消费需求。在当前消费品和服务上的花费对改变未来消费品和服务的质量及种类毫无用处。这个改变需要新的储蓄和投资。

因此，我们回头看不言自明的萨伊定律：供给（生产）比需求（消费）更重要。消费是繁荣的结果而非原因。生产、储蓄以及资本形成才是真正的原因。

让我们回头看萨缪尔森的收入决定模型，他发明的代表失业均衡的凯恩斯相交线（见358页图14.1）。我们现在发现储蓄和投资根本不是包含在两条对立的曲线中。极端的情况除外，储蓄就是投资。收入增加时，储蓄和投资都随之增加。因此，S和I不会只在一点相交，因此没有宏观均衡的决定。凯恩斯相交线被自己的重量压垮了。

通货膨胀的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处于守势

与高深的理论相比，经验往往是好得多的老师。关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争辩贯穿着战后时期，没有别的事实比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危机更多地增加人们对凯恩斯——萨缪尔森模型的怀疑。当时石油和商品价格飙升而工业国陷入经济衰退，根据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总需求分析，滞胀是不可能发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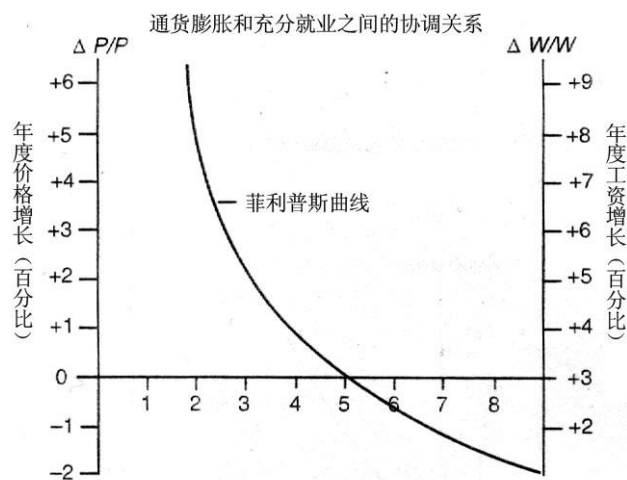


图14.6 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之间的替代

来源：萨缪尔森（1970：810）。经McGraw-Hill授权重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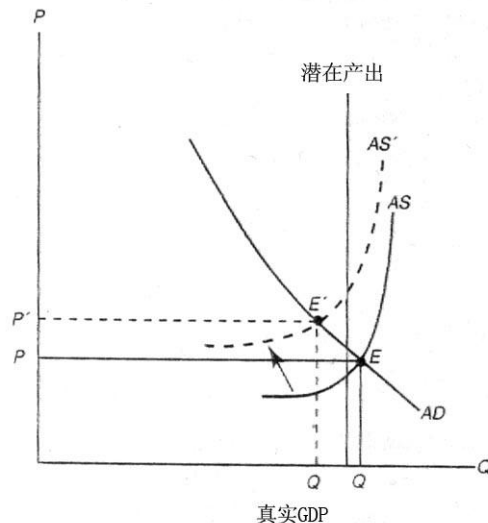
凯恩斯主义者过于依赖菲利普斯曲线，该曲线是经济学家A.W.菲利普斯依据英国的工资率和失业数据的经验研究绘制的（1958），在20世纪60年代很流行。许多经济学家都相信通胀和失业之间存在某种替代关系。通过复制这个理想化的菲利普斯替代曲线（见图14.6），萨缪尔森描述了“宏观政策的两难”——如果社会期望低失业水平，就必须接受高通胀；如果社会希望降低生活中的高成本，就必须接受高失业水平。在这两个艰难选择中，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失业比通胀更糟糕（Samuelson 1970：810-12）。

但是在20世纪70、80年代，理想的菲利普斯关系已无效——西方国家发现高通胀并不能减少失业相反使失业更为严重。

滞胀的出现和菲利普斯曲线的失效使得经济学家们第一次对他们的教科书里的诸多模型产生质疑。在他们寻求另一种解释之际，一场各种经济理论的“文艺复兴”突然发生了——从马克思主义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复辟：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发明

然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明了一个新工具来解释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于是令人惊奇地复活了。这个工具便是总供给和总需求，或AS-AD。当比尔·诺德豪斯在作为合著者第12版（1985）上签名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加入了AS-AD图形。萨缪尔森和其他凯恩斯主义者用AS-AD解释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现象。（见图14.7）



石油、商品或者劳动成本的骤增使商业成本上升。这导致滞胀——停滞伴随着通货膨胀。在AS-AD框架里，高成本将AS曲线从AS推升至AS'处，并且均衡点从E变动到E'。产出从Q下降至Q'，同时价格上升。因此经济遭受双重打击——低产出和高价格。

图14.7供给冲击的后果——总供给下降，价格上升并且产出下降，这是通货膨胀衰退的特征。

来源：萨缪尔森（1998：385）。经McGraw-Hill授权重印。

正如萨缪尔森表述的那样，“供给冲击带来价格上升，随之而来的是产出减少和失业增多。供给冲击因此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的所有目标都恶化”（1998：385）。

凯恩斯主义的重要人物阿兰·布兰德同样用AS-AD解释传统菲利普斯曲线的扭曲。根据布兰德所说，20世纪70年代之前，波动的数据主要是总需求。然而，70年代间，总供给占支配地位，其结果是滞胀的发生。“随着OPEC在1973-74和1979-80年间的冲击、通胀和失业同时上升与菲利普斯曲线的替代关系并不矛盾”（1987：42）。

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20世纪70年代中恢复过来了，并把AS-AD图形收入现代教科书之中。用G·K·Shaw的话说，现代凯恩斯主义理论“不仅战胜了挑战而且经历了根本的质变，以更具可信性和强的适应性的形态再度出现”（1988：5）。留下来的凯恩斯主义准则获得了某种特定的“永久变革”。

现代凯恩斯主义理论还剩什么？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们仍然紧紧抓住一个核心信念不放，即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体系是内在不稳定的，并且需要政府干预（扩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确保高水平的“总有效需求”和充分就业。是否有人能动摇这场持久的革命？

挑战歌利亚巨人凯恩斯的大卫出场了

经济学家在未找到另一个强大的理论来取代原有理论之前是无法消灭它的。恰好这样的一个新的经济模型在战后悄悄地诞生了——这个模型将挑战凯恩斯—萨缪尔森不稳定假设的基础。建立这个新模型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第十五章的主题。

第十五章 米尔顿的乐园：弗里德曼领导一场货币主义的反革命

本章音乐选段：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1812 序曲》

在我看来，现代经济理论中最薄弱且最令人不满意的部分就是货币动态学。
——米尔顿·弗里德曼（1953：42）

为确保远航中鱼的活力和新鲜，船长们过去常常在桶中放入鳗鱼。在经济学领域，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是那条鳗鱼。

——保罗·萨缪尔森（Sobel1980：144）

20世纪末，《时代周刊》的编辑们聚在一起评选世纪经济学家。最后，他们选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但是他们差一点就选了芝加哥货币主义学派的创始人，身材矮小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事实上，主编诺曼·佩尔斯坦（Norman Pearlstine）选弗里德曼是因为他独特的能力，“清楚地说明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和政府过度干预的危险”（1998：73）。人矮却站得高。

今天，米尔顿·弗里德曼可能是在世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并且获得了无数荣誉，其中包括1976年的诺贝尔奖。但是情况却非一直如此。20世纪50、60年代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开始他的学术生涯时，他的理论经常被认为是“极端的”且“过时的”而遭到排斥。

博明翰扬大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拉里·维莫尔（Larry Wimmer）讲述了1970年左右弗里德曼在剑桥大学与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辩论的故事。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在当地很受欢迎并得到极大的荣誉和尊重。但是当客人米尔顿·弗里德曼走上讲台时，得到却是嘲笑声和学生们嘲弄的低语声。那时，货币主义——货币最重要的观点——在凯恩斯的大本营里仍被认为是极端而过时的。正像萨缪尔森在较早几版教科书中写的那样：“今天极少经济学家把联邦储备的货币政策当作控制经济周期的万灵药”（Samuelson 1956：316）。然而弗里德曼笑到了最后。他的反击如此不可思议而不屈不挠，以至于那群学生离开时不自愿地对这位倔强的芝加哥经济学家有了一丝尊敬。正如马克·布劳格指出的，“所有见过他本人的人都能证明，他是经济学领域中最大勇敢不屈的辩论家”（1985：62）。

信仰的捍卫者

如果说有人能够取代凯恩斯主义并恢复了古典经济学，那么这个人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的激烈斗争的风格和思想渊源都很完美地适合这项任务。在许多方面，亚当·斯密都是他的思想导师。“看不见的手推动进步的效力比看得见的手治理衰退的效力更大”，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1982[1962]：200）中如此写到。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奖正值《独立宣言》签署和《国富论》出版200周年之际，这再合适不过了。他几乎独自把经济学从凯恩斯主义全面胜利的边缘上拉了回来。

“批评阵营里则情形惨烈”

除了弗里德曼，与凯恩斯主义理论相对的自由市场理论几乎毫无影响力。奥地利学派的带头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关于凯恩斯的著述很少，他的巨著《人类行为》（1966）中只涉及了一点。20世纪30年代反凯恩斯的带头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战略上犯了错误，他忽视了1936年出版的《通论》，后来他深深懊悔当时的决定。战后他对经济学失去了兴趣并开始政治哲学方面的著述。他仅仅在1979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即《骑虎难下：通货膨胀的凯恩斯主义遗产》。

在开普顿大学教学的杰出经济学家威廉·H·哈特把大量时间用在剖析凯恩斯上。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闲置资源理论》深入地分析了失业。他的基本观点是失业“通常且唯一取决于价格机制管理的缺陷”，而不是凯恩斯所谓的购买力不足（哈特1977[1939]：20）。20世纪30年代末，哈特花了很多时间来阐释《通论》，但是战争打断了他的出版计划。他把大量文稿绑好放入壁柜。直到30年后才在以《凯恩斯主义：回顾与展望》（1963）为题发表。然而他的文章多数不明确且不切题。他引入新术语与凯恩斯的术语对抗，这造成复杂化和潜在的误解，这些术语诸如“真实抑制效应（real damping effect）”

”、“伪闲置(pseudo-idleness)”、“储蓄峰(saving hump)”、“缓冲效应(cushioning effect)”、“渐缩假定(supposed decumulation)”、“能力释放弹性(elasticity of release of capability)”和“最大价格固定(maximum price fixation)”。让位，凯恩斯！不用说，哈特的书未被广泛接受。他坦言：“我必须坦白承认1963年我的《凯恩斯主义》一书的表达失败。我的论点未被人理解，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未被我的朋友理解”（Hutt 1979: 16-17）。

一位记者挑战凯恩斯

20世纪50年代末，记者亨利·海茨利特(《一堂课的经济学》的作者——见第二章)为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未能在课堂上取代凯恩斯而感到沮丧。“凯恩斯主义文献可能已增长到数以百计的专著和数以千计的论文。有些书完全是用简明易懂的语言来详细阐述《通论》。但批评阵营则情形惨烈。非凯恩斯主义者和反凯恩斯主义者满足于写短篇文章、插图，或者一个理论上的粗略批驳，而他们研究的这些理论也往往因其自相矛盾而解体并很快被遗忘”（Hazlitt 1973[1959]: 4）。

海茨利特是一个商业和文学记者并未受过正规的经济训练，他挑起了这个担子，写下了一部冗长的作品，逐章逐句批评《通论》。海茨利特的《“新经济学”的失败》（1973[1959]）第一次出版时博得了媒体好评，但是未被专业期刊所接受。艾伯·P·勒纳把这本著作称为“最令人沮丧的作品”，并把海茨利特比作一位聪明的学生，该学生考试时答得清晰且有趣，然而未切中任何问题，因此他不及格（Lerner 1960: 234）。

海茨利特对《通论》的每一页都作了透彻而卓越的学术性剖析，但是他被凯恩斯难懂的术语所拖累。为了了解易懂的海茨利特，你不得不先读懂晦涩的凯恩斯。海茨利特用了一个流行的题目并因此售出多册，但是他的书只是放在保守主义者和商人们的书架上招惹灰尘并且被专业经济学界忽视。最终，海茨利特觉得“无望”而放弃了修正所有凯恩斯主义错误的任务¹（Hazlitt 1973: 8）。

罗斯巴德的尝试活动

继海茨利特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穆雷·N·罗斯巴德(1926-95)在20世纪60年代初接过反凯恩斯主义的大旗。罗斯巴德在很多方面看来都是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同弗里德曼一样，他也出生于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家庭并在纽约长大。在学校里他擅长数学（他中间的名字是牛顿），并于1956年在历史学家约瑟夫·多夫曼（Joseph Dorfman）和他的老师阿瑟·F·伯恩斯（Arthur F. Burns）的指导下，在弗里德曼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货币经济学博士学位。罗斯巴德同弗里德曼一样矮小、固执而聪明。他们甚至患有同样的疾病——心脏衰弱（罗斯巴德于1995年死于心脏病；弗里德曼做过两次心脏搭桥手术）。并且他们都是蒙特沛尔林学会成员。

但是他们的相同之处仅止于此。罗斯巴德没有选择进入重点大学，而是接受了保守派的威廉·沃尔克基金会的一个职位。随后在不出名的工科学院，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Brooklyn 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New York)教书二十年。他在纽约参加米塞斯的私人学术研讨班，但是拒绝加入美国经济学会抑或是写学术文章，他选择著书。他的著作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出版，但不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而是由它资助的Van Nostrand and Co出版的。也就是说，他犯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站在学术界门外。

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罗斯巴德的著作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明确且敏锐的批判。《人类、经济和国家》（1962）是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长篇论述，该书写得很有逻辑性和说服力。罗斯巴德在他学术生涯的早期就认识到，“像许多保守派经济学家那样，贸然摒除[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没有深入细致的处理他的谬见给凯恩斯主义留下征服思想领域的余地”（1960：150）。

罗斯巴德在他的长篇巨著中大量的篇幅都是用自由市场反击凯恩斯主义，包括对加速数原理、乘数、流动性偏好、消费函数和赤字财政的批判。关于国家负债，罗斯巴德英明地斥责政治保守者，他们“过分夸大公债的危险性并一直在拉响关于临近的‘银行倒闭’的警报，他注意到政府不像私人民众，他们有能力通过征税或印钞机来“强行获得货币”。同时，他严厉斥责凯恩斯主义的口号：“我们欠我们自己的”，他敏锐地注意到“我们”和“我们自己”不须是同一群人。“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可能会说税收是不重要的”

（Rothbard 1962：882）。贷者（国库券的投资者）一般都富有并无需工作，而纳税人一般是中等阶层的工资收入者。因此，罗斯巴德认为赤字支出会导致财富从穷人和中等阶层转向富人的反常再分配。

罗斯巴德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的大萧条》（1983[1963]）中继续着他的批判。除了攻击增加流动性陷阱、工资刚性、加速原理、停滞论题和其它凯恩斯主义理论，罗斯巴德还用数量研究来支持1929-32年大危机的一种“奥地利学派”解释。他论辩说正是联储的放松银根的政策导致兴旺的20年代的不可持久的人为繁荣。在1971年的第二版中，他给滞胀做了一个精明“奥地利学派”解释，并指出到消费品价格膨胀是“衰退期的一般普遍趋势”。也就是说“在衰退期间，消费品价格相对生产性商品价格来说是趋于上升的”，而20世纪70年代初的这一次，政府的通胀政策非常强硬，使得消费者价格“绝对且明显可见地”上升。（Rothbard 1983：xxv-xxvi）

不幸的是，除了他的自由主义听众，其他人都对罗斯巴德大胆的分析充耳不闻。从1984年直至1995年他去世，他一直在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大学教授经济学，这所学校的篮球队比其严肃学术更有名。他宣称自己是一个“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但开始卷入自由党的政治之中。他15年间，断断续续地写作他的经济思想史，只完成到马克思为止的两卷（更多细节参见前言）。罗斯巴德的思想史很有见地，但是都被他未认清亚当·斯密著作的权威贡献而埋没，他居然用“严重缺陷”和“混乱不解”来形容亚当斯密的著作（Rothbard 1995：436-37）。这对于一个有如此多许诺的人来说确是一个苦恼的结局。

弗里德曼的英明策略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故事要吉利得多。他处于一个关键地位，可以成功地发起一场反凯恩斯并恢复古典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运动。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萨缪尔森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后两年，也成功获得这项殊荣；并且在美国最著名的学府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学。换言之，他在专业经济学资历无可厚非并且为追求他的目标选择了理想平台。他关注的货币政策和货币数量论在通货膨胀时期尤其引人注目。



照片15.1

穆雷·N·罗斯巴德(1926-95)

N代表牛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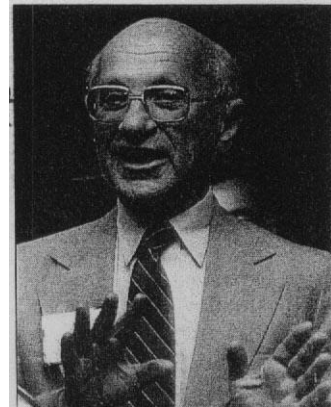
感谢米塞斯研究院提供

的

此外，弗里德曼巧妙地开发了一套学术准则，引起变革并推动经济学界进步，**在威信和荣誉上超过凯恩斯达到了新的高度**。他是怎么做到这点的呢？弗里德曼在他的自传中称这为“运气”，但幸运总是垂青主动之人。下面是他的轶事。

弗里德曼的无产阶级出身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年生于布鲁克林，他是这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且是唯一的男孩。这些移民到纽约后在一个血汗工厂工作。尽管处境艰难且赶上大萧条，但是美国仍是弗里德曼一家的机遇之地。米尔顿获得了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奖学金，他在学校里擅长数学和经济学，同时还要在当地的饭店做服务员并在一个百货公司作售货员。



照片15.2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
“他是经济学领域内勇敢的伟大
辩论者”
感谢米尔顿·弗里德曼提供

“我的幸运之城就是芝加哥”

在处于大萧条最低谷的1932年，弗里德曼又获得一项奖学金，这回是去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在那里他遇见了他一生的同事和朋友乔治·斯蒂格勒。后来他写道，“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工作伙伴、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谈话对手、一个高度建设性批判者，而且，和我自己一样，生活在经济学中，每天呼吸经济学，并且枕着经济学入眠”（Friedman 1998: 149）。

弗里德曼在芝加哥还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罗斯·迪莱克特（Rose Director）。在前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他跟随天才的历史学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学习价格理论。同时雅各布·维纳还教授他经济理论的逻辑学。²因为学生按字母顺序排座位，所以他与罗斯邻座。她是阿伦·迪莱克特的妹妹。阿伦·迪莱克特可能是芝加哥全体教员中最具自由思想的人。1938年米尔顿和罗斯喜结连理。从那时起他们便成为搭档和合著者，他们有两个孩子，戴维（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和詹妮特（一位律师）。

米尔顿在芝加哥还遇到了保罗·萨缪尔森。有趣的是两位经济学家几乎在同一时期受教于同一学校，然而一位成为凯恩斯主义者而另一位则成为自由市场货币主义者。奇妙的是，萨缪尔森是从一个货币主义者变为凯恩斯主义者的，而弗里德曼是欣赏凯恩斯主义思想（见398-89页的记述）而后来变成货币主义者的！尽管米尔顿和保罗在经济和政治上有许多不同观点，但是他们却成了终生的朋友。

弗里德曼1933年在芝加哥获得硕士学位，但是大萧条期间他已囊中羞涩，于是在阿瑟·伯恩斯的帮助下获得另一项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³正是在那里他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并且在威斯利·C·米切尔和西蒙·库兹涅茨的指导下了解到高质量的实证研究的价值（更多关于NBER的情况，参见239页加框文字）。他在自己的一份职业收入研究报告中发现内科医生和牙医的收入差距很大。他根据数据确信差距来源于医疗职业中的垄断行为。这是弗里德曼第一次知晓科学客观的实证工作能够得出强有力的政策结论。

1940-41年，弗里德曼应邀到威斯康星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但是他的客座期因为反犹主义和校园政治而被打断。麦迪森城居住的多是德国移民，而弗里德曼全家都是反纳粹亲英派。经济系深受凯恩斯和凡勃伦教条主义追随者的影响。然而，肯尼迪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恩斯主义者沃尔特·海勒却保护弗里德曼并且请他留在系里。弗里德曼一直与凯恩斯主义者如海勒和萨缪尔森保持着友谊，但是不久他便辞职返回纽约。

什么，凯恩斯之前的芝加哥学派凯恩斯主义者？

凯恩斯未给我们这些立足于西蒙斯、明茨、奈特和维纳理论上的人提供任何启发。

——米尔顿 弗里德曼（Gordon 1974:

163）

为什么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芝加哥的多数学生未被凯恩斯所吸引呢？因为诸如弗兰克·H·奈特、哈里·西蒙斯和雅各布·维纳等名人们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就曾倡导采用大额持续赤字支出来对付大量的失业和通货紧缩。他们是凯恩斯以前的凯恩斯主义者。



照片15.3
弗兰克·H·奈特
(1885-1972)

照片15.4
哈里·卡沃特·西蒙斯
(1899-1946)

照片15.5
雅各布·维纳
(1892-1970)
芝加哥经济学派最初代表人物
感谢芝加哥大学档案馆提供

弗兰克·奈特(1885-1972) 1955年之前是芝加哥学派的带头人, 反对在通货紧缩加剧时向下调整经济。包括奈特在内的十二位芝加哥经济学家在1932年写给国会的信中提醒到“生产能力浪费和严重痛苦中产生的巨额损失”。他们鼓励国会支持萧条期采用“财政扩张”, 特别是由新发货币支持的赤字支出(Davis 1968: 477)。

雅各布·维纳(1892-1970) 支持凯恩斯主义形式的反周期财政政策, 即繁荣期采取盈余财政; 萧条期采取赤字财政。在繁荣期间, 传统的财政原则是重税、减少支出、弥补赤字。但是, 根据维纳的观点, 萧条期采取这些政策是不明智的。政府行为应该相反: 减税、多支和多借(Davis 1968: 477)。

哈里·西蒙斯: 这是自由放任?

哈里·西蒙斯(1899-1946) 是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强调在萧条期间需要恢复商业信心并且倡导以赤字支出和减税作为促进经济恢复的主要手段。米尔顿·弗里德曼自己评论到, “西蒙斯和凯恩斯所表达的观点何其相似——关于大萧条的成因, 货币政策无能为力以及需要更大程度地依赖财政政策”(Davis 1968: 476)。

西蒙斯在一本题名讽刺的书——《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1948)——中表达了他同样担心资本主义下“自然”垄断的过度扩张以及他的铁路、公用事务和所有其它“非竞争”产业的国有化倾向。

应该强调的是在萧条期间和反托拉斯措施之外, 芝加哥经济学家们是自由市场的坚定捍卫者, 他们支持自由贸易、货币稳定和干涉工资或价格。西蒙斯强调政府政策要“规则高于权威”, 这也是弗里德曼采纳的一个传统。

弗里德曼犯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错误

二战中断了弗里德曼的博士学业。他去位于华盛顿的财政部工作, 并且在1941-42年为政府的一个项目工作。该项目——个人所得税扣缴——最终导致美国大政府的膨胀。结果原来免缴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普通工人开始向美国国税局(IRS)缴纳他们正常收入的一大部分。可笑的是, IRS的官员反对这个“临时”战时对策, 认为这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但是弗里德曼和其他人都坚持他们的项目。数年后弗里德曼坦言: “当时我完全没想到我正在帮助发展一个能支持大政府成为可能的机器, 这个政府后来将被我严厉批评为会过大、过分干预而且严重破坏自由”(Friedman 1998: 123)。

他会重蹈覆辙吗? “对此我并无愧疚”, 他在1995年《理性》杂志的专访中说到, “但是我真心希望我们发现它没必要实施并且我希望现在能有别的方法废除之”(弗里德曼1995: 33)。当时是二战期间, 他的爱国义务在呼唤。德国和英国早就实行税源扣缴, 无疑美国迟早会采用这种有效的敛税手段。但是, 德国和英国政府无需年度申报来调整最终税额; 弗里德曼and Co.则坚持认为年度税收调整是必要的, 可能会带来追加税额或退税。

弗里德曼两面受敌

税收扣缴只是这位明星麻烦的开端。战后，弗里德曼在明尼苏达大学呆了一年，那时与乔治·斯蒂格勒合写了《屋顶还是天花板？》——一本论辩战后租金管制是反生产的且应被废除的小册子。它是1946年由经济教育基金会出版的。该基金会是里奥纳多·里德创办的自由市场思想战斗堡垒。该基金会当时颇具争议，并同时遭受政治中两派的攻击。小说家艾恩·兰德（Ayn Rand）称这本小册子是“集体主义者的宣传单”和“保守组织公开发表的最有害的东西”，因为这两位经济学家倾向于减少租金管制，这是站在实际的，人道主义的立场而不是维护“地主和财产所有者不可侵犯的权利”（Rand 1995: 326）。后来弗里德曼评论到，“她的想象力确实丰富！”（1998: 621）。

类似地，一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评论》中攻击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但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现在取消租金管制不能解决住房问题，反而会造成更糟的不公平。”（Bangs 1947: 482-83）

顶级经济学家们的笔迹分析——秘密个性大揭露！

每个人的笔迹中，他的个性都将显露无遗。

——托马斯 卡利里

首先有卡尔·马克思，颅相学家；然后来了斯坦利·杰文斯，占星家；随后是梅纳德·凯恩斯，手相师。现在我们有米尔顿·弗里德曼，笔迹分析家。

不错。弗里德曼在他的自传中声称他能通过一个人的笔迹分析出他的性格，这是1933-34年他在哥伦比亚读书时养成的癖好。“从那时起我便成为一位业余的笔体学家”，他声称。

1953-54年期间，弗里德曼在哥伦比亚当了一年的富布莱特（Fulbright）学者。一天，彼得·保尔（现在是保尔男爵）给弗里德曼看理查德·卡恩的一封信，卡恩是凯恩斯的得意门生，是他发明的乘数。弗里德曼很快注意到卡恩特别的笔迹，各行陡峭地向下倾斜。弗里德曼对保尔说：“卡恩必是一个极端悲观者”。

第二天弗里德曼与卡恩共进午餐，在谈论过程中，卡恩评论到，“凯恩斯和我差异最大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乐观者，而我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悲观者。”完全正确！不久在一次酒会上，卡恩向弗里德曼展示凯恩斯笔迹，的确，凯恩斯的各行陡峭地向上倾斜，一个明显的“乐观者暗示”。

琼·罗宾逊让弗里德曼分析另一个笔迹样本。弗里德曼答到，“显然这是外国人的笔迹，因此我很难分析之。但是我要说这是由一位极有艺术天赋但智慧稍显不足之人所写。”结果这是由凯恩斯之妻、世界著名的俄罗斯芭蕾舞女演员莉迪亚·洛普科娃所写。“那确实是我在哥伦比亚的一年中最大的成功！”（Friedman 1998: 245）。

四位经济学家的分析

笔迹能为我们提供人的个性的线索吗？我决定验证弗里德曼的假说。我委托一位“公认的”笔体学家来分析四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手稿。（这四位的签名见图15.1）

依据专家的分析，亚当·斯密的笔迹表明他是“乐观的和富有雄心壮志的”（正确），但又是一个“极度的肉体享乐者”（很不确定）。发现马克思要么是“极度乐观的”和“非常友好的”，要么是“无耐性的”和“喜怒无常的”，这种性格适用于多数人。凯恩斯的笔迹显示一个“支配欲强偶尔还有侵略性的个性”（正确），但是是一个不愿意做笔迹分析的人（不确定）。弗里德曼的笔迹代表一个“乐观而不屈不挠”而且还有点“脾气”的人（正确），但是也表明其“可能逃避与人交流”（绝对不！）。简言之，我非常怀疑笔体学的可信性，它更像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真正的科学。

但是那时这位笔体学家又说我的笔迹表明我是一个“好的教师和讲师”，一个“创新”思想者和一个“对别人的感受敏感”的人。嘿，弗里德曼可能真的懂些东西呢。

很特别的是，在打字机和个人电脑盛行的时代，弗里德曼全部文章和著作都是手写的，直到他80多岁。他的手稿足够笔体学家们忙上几十年。继续写，弗里德曼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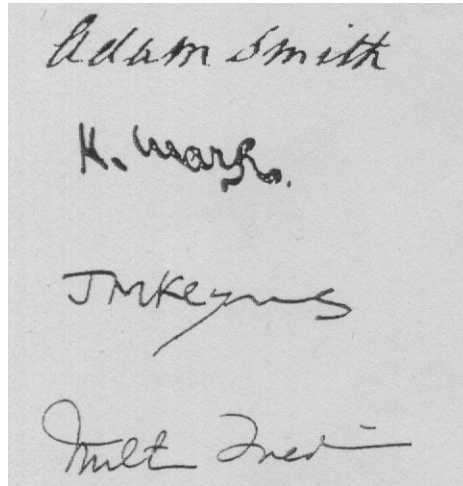


图15.1
四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签名：你能说出哪一位是消极者吗？

弗里德曼回到芝加哥就成了货币主义者

最终，1946年弗里德曼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重返芝加哥大学并全职授课直至1977年他退休。弗兰克·奈特1955年退休后，弗里德曼继承芝加哥传统并使其得到强化。他提出一种欧文·费雪货币数量论的升级版理论并将它应用于货币政策。他就大量关于货币经济的论题写作，这些研究和著述在他最著名的实证研究《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中达到顶点。该书（1963）是与安娜·J·施瓦茨合著并由著名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出版。实质上，他意义重大的研究表明了货币和货币政策在美国经济起伏中的持久力量，包括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货币无效”的大萧条和战后时期。甚至一位友好的评论者，耶鲁的詹姆斯·托宾也认识到它的建树：“这是那些罕见的书中的一本，它会在该题目的未来研究中留下持久的痕迹”（1965：458）。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正是弗里德曼的《货币史》为他达到经济学界和政治世界的权威高度铺平了道路，尽管爬山的过程仍需数年。

面对一个敌视的环境

20世纪50、60年代凯恩斯革命在学术界的地位已牢固确立，这使得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在校园里处于少有人知的艰难境地。我们已在第十二章（“失踪的米塞斯”）中提到米塞斯、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在争取学术地位的方面面临的巨大困难；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经历了相似的挑战。弗里德曼在学术听众面前出现不啻于造物主论者们在自然课上出言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由放任的支持者们常被呵止和嘲笑。据弗里德曼所言，像杜克大学那样声誉好的大学拒绝使用他的任何书。那里的经济系认为他的著作不值得购买。

弗里德曼写了一本热销书

回归的漫长道路开始于1962年，一本薄薄的小书出版了，这就是捍卫自由放任经济的《资本主义与自由》（1982a[1962]）。恰巧，弗里德曼的两本最重要的著作《货币史》和《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出版日期和米尔顿·罗斯·弗里德曼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相吻合。

《资本主义与自由》是弗里德曼第一次尝试把自由市场原理介绍给一般公众，这本书是他在瓦贝希学院（Wabash College）做完一系列演讲之后所著。那时，弗里德曼仍不为专业外人士所知，并且这本书从未被任何主要出版社评论过。然而它已售出不下50万册并在继续印刷。除了作为雄辩捍卫自由市场和谴责政府权力过大，《资本主义与自由》还提出了一些弗里德曼著名的政策建议，如弹性汇率制、教育券（school voucher）和负所得税。10年后甚至萨缪尔森也把它评论为一个“逻辑性强、谨慎、阐述清楚、说服力强的重要观点”（Samuelson 1973：848）。

20世纪60年代晚期，弗里德曼应邀去威斯康星大学与尖锐的凯恩斯主义者里昂·凯泽林（Leon Keyserling）辩论。在辩论即将结束时，凯泽林宣读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强调的十四条“不公正的”政府行为。凯泽林一边读一边嘲笑这些内容，希望

借此获得辩论的胜利。当他读完弗里德曼对社会保障、租金管制、农业支持和国家公园的批评时，他明显获得学生的支持。但是当他读到第十一点时，他却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麻烦。第十一点呼吁和平时期应该缩减军事征兵。弗里德曼对该草案的反对为他博得热情的掌声并获得辩论的胜利（Friedman 1982: ix）。

好与同事争论且对学生严厉

争论已成为弗里德曼风格的一种基本性质。不足五英尺高、带有鼻音嗓门很细的他常被认为对于自己的观点总是直言不讳而固执己见，并且总是非常易怒。“人际交往不是我的长项”，他承认（Friedman 1998: 51）。举个例子，1971年他与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见面，总统在抱怨国家的工资价格控制非常麻烦。“不要因为这个畸形的东西而责备乔治·舒尔茨”，尼克松说。弗里德曼很快答道：“我不责备乔治，我责备的是您，总统先生”（Friedman 1998: 386-87）。

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在他敏捷的思维和快速的判断力面前不寒而栗。他会快速指出同事工作中的错误，即使这个人是他的前辈。他们觉得受到了侮辱之时常令弗里德曼费解。弗里德曼同他的老老师雅各布·维纳一样，对课堂上跟不上的学生没有耐心。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刚入学的学生在一个概念的理解上有困难，弗里德曼让他周末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周一早上他还未弄清楚，你认为弗里德曼会给他什么建议？是（1）雇一个家庭教师，（2）到他的办公室见他，或者（3）转学另一个课程？他的答案是（3）！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说弗里德曼是一个给分严厉的人——在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课上他是仅有的两个B中的一个。弗里德曼没给人评A。（Sowell 2000: 126）

另一方面，一旦学生们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弗里德曼教授就会出了名的耐心，他花费无数小时帮助他们完成在芝加哥的博士论文。如同加里·贝克尔写的，“弗里德曼对学生和其他教员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通过课堂传播，还通过他们对他们的研究尤其是他们的学位论文的评论产生”（Shils 1991: 143）。

“他们叫我弗里德曼先生”

芝加哥的教授们讨厌学生们称自己为“博士”。因为每个人都有高学历，他们认为那样做是做作的。相反，教员们遵循一个长期的传统用普通的问候语“先生”彼此相称。“弗里德曼先生”甚至比“弗里德曼教授”更易被接受。并且弗里德曼先生（像任何一位其他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一样）从不出版护封上的头衔为“弗里德曼博士”的书。那样的头衔被认为是无礼的。毫无疑问德国那些以“杰出的博士教授先生”这样的称呼出名的学者们将会因这样不体面的称呼而被警告。

弗里德曼终于有了影响

弗里德曼的努力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收到回报。1967年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货币和货币政策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弗里德曼在专业经济学中的天才学识。一年后，弗里德曼开始反对沃尔特·E·海勒，肯尼迪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任主席，也是著名的1964减税案的设计者。他们之间的著名辩论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争》为题出版。海勒开始便承认，“论题不是货币是否起作用——我们都同意那一点——而是是否只有货币起作用，如同一些弗里德曼者们……如此声称”

（Friedman and Heller 1969: 16）。海勒用1964减税案和越南战争预算来说明“财政政策的效力——好坏参半”（31页）。弗里德曼这位“杰出的反传统者”在回答中否认他曾支持只有货币起作用的观点，并称那种极端立场是“荒谬的”，但是接着又继续指出财政政策是多么经常“伴随货币政策改变”而改变的（47页，52页）。例如，1964减税案和20世纪60年代末的越战的政府积累，都是与自由货币政策相伴而生的（见393页加框文字）。

保罗·萨缪尔森的教科书是经济学界中弗里德曼和货币政策观点的演进过程最好度量。第三版指出，“今天极少数经济学家把联储的货币政策当成控制经济周期的灵丹妙药”（1955: 316）。在写第九版时，正值两位数通货膨胀时期，萨缪尔森写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起重要作用”（1973: 329）。萨缪尔森（和他的合著者威廉·诺德豪斯）在1995年的第十五版中实际上已改变立场并向货币主义者屈服：“财政政策不再是美国稳定政策的主要工具。展望未来，联储的货币政策将履行稳定政策的职责”（1995: 645）。

照片15.6

芝加哥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宏观先生”）和乔治·斯蒂格勒（“微观先生”）看这一高一矮！
感谢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提供



“只有货币起作用”！

那是一个荒谬的立场，而且我从未支持过。

——米尔顿 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在1968年与沃尔特·海勒的辩论中否定了针对他提出的“只有货币起作用”的批评（Friedman and Heller 1969: 47）。然而，在同一场论辩中他断言财政政策，即“政府自己的预算对名义收入、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或者周期性波动没有重要影响”（51页）。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则有巨大影响。

没有供给面？

在另一场合，弗里德曼被问及“供给面”经济学和减税对经济的影响。“我不是一位供给面的经济学家”，他宣称。“我不是一位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我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又补充说，“我从不相信在货币政策既定的前提下，财政政策会对经济的起伏产生重大

影响”（Friedman 1982b: 53-54）。

日本的处方：印更多的纸币！

最近，弗里德曼以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疲软的对策为题于1997年12月17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个专栏。整篇文章强调日本银行“不适当的”货币政策和几乎唯一的对策就是日本需要加速其货币供给。弗里德曼没有提到自由市场选择：减税、撤销银行体系管制或者促进自由贸易和移民。尽管弗里德曼提出异议，但是他又一次给读者留下一个印象，即弗里德曼认为只有货币起作用。

二百周年纪念诺贝尔奖被示威破坏了

1976年，弗里德曼自己获得诺贝尔奖并可与保罗萨缪尔森的获奖能力并驾齐驱了。颁奖正值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二百周年。实际上，那一年的全部七位诺贝尔奖获奖者都是美国人。这次美国人的盛事于12月份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弗里德曼在诺贝尔颁奖仪式上的出现并非毫无异议。他被选出，必须得到瑞典皇家学院的认可。在这之前弗里德曼因涉嫌与智利及其独裁者奥格斯托·皮诺切特将军（General Augusto Pinochet）有牵连而导致了一场关于他资格的激烈讨论。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诺贝尔奖颁奖仪式期间，示威者们抗议弗里德曼的出现。他被认为一群被称为“芝加哥男孩”的智利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的组织者和非官方顾问。

智利和芝加哥男孩

智利在20世纪70年代初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萨尔瓦多·阿兰德（Salvador Allende）是第一位国内选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国有化、高工资和价格控制的社会主义政策造成了经济灾难，并由此导致1973年9月奥格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统治下的军队发动政变登上政治舞台。阿兰德自杀身亡。智利经济因全球通胀性衰退变得更糟之际，皮诺切特将军向芝加哥男孩求助。这些智利经济学家们都在一个长期奖学金项目的资助下在芝加哥大学受到训练。他们建议大减政府支出、私有化、税收改革和严格控制货币供给。（后来，在1982年铜危机期间，他们建议了社会保障体系的首次高度成功的私有化。）

政变一开始就遭到谴责，因为军事集团干预民主选举政府，并且政变发生之后立即有许多阿兰德和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被监禁和折磨。加之人权问题，批评者们把芝加哥男孩的经济政策定性为“严酷的”和“反动的”。

然而，智利经济得到恢复并且创造了高速增长、低通胀和出口市场繁荣的奇迹。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智利已成为拉美的新楷模。并且从1990年以来，它已恢复了民主制度。在很多方面，弗里德曼被证明在智利惊人的成功事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诺贝尔奖：高尚的还是可耻的？

奖金应该授予那些在前一年中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Fant 1993: 329）

经济学家们是幸运儿。自1895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立遗嘱以来，在社会科学家当中只有经济学家这一类人说服瑞典皇家科学院增加一个新的诺贝尔奖种类。社会学、商学、心理学、语言学、数学或教育学都没有设诺贝尔奖项。但是1969年以来，瑞典中央银行在经济学科上设立了诺贝尔奖基金。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有能力使科学院确信经济学达到了其它社会科学所未达到的科学所要求的高水平，因而应获得这项殊荣（尽管后来他撤回声明并希望他曾拒绝领奖，因为他现在认为经济学不能与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和价值相提并论）。

考虑下面这些事实

-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使其身体状况好转并且又活了十八年；约翰·F·纳什，曾遭受精神分裂症痛苦并生活在贫困中，获奖后恢复以前了文雅的自我；但是威廉·维克里获诺贝尔奖后三年便去世了。
- 马克思主义者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无一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 1989年，芝加哥的罗伯特·卢卡斯签署了离婚协议，即如果他在5年内获得诺贝尔

奖就把奖金的一半给他前妻。在该协议即将到期的不几周之前，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并履行了他的契约。“交易就是交易呀”，他说。

- 获诺贝尔奖的唯一瑞典人冈纳·缪尔达尔因为不得不与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共同分享诺贝尔奖而心烦意乱。

- 芝加哥大学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多于任何其它院校，包揽了20世纪90年代诺贝尔奖的半数之多。

- 奖金逐渐由77,000美元增加到一百万美元，但是却管理不善且相比美国和欧洲的指数，业绩不佳数年。如果从1969年就将其投资于标准普尔500指数下，奖金现在将价值超过三百万美元。（198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弗兰克·莫迪利阿尼看起来是最聪明的投资者——他把奖金的大部分投入了股指期货。）

- 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取消了诺贝尔奖免税的资格。第一个被征税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他最终只得到获奖金额的一半。

- 最尴尬的诺贝尔桂冠得主是1997年的得主金融经济学家罗伯特·C·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因为他们卷入一支采用他们的期权定价策略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该基金在脱困之前损失了40亿美元。

- 只有一位黑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的W·阿瑟·刘易斯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有一位亚洲人，哈佛的阿马蒂亚·森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女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剑桥的琼·罗宾逊在20世纪70年代因其在“不完全竞争”上的重大成就而有望获奖，但是她对共产主义中国和北朝鲜的热情辩护令她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一样困窘。

瑞典人厚酬自由市场经济学家

在经济学科领域内，没有什么比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奖项之一诺贝尔纪念奖的获奖者名单更能表明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复兴。从1969年瑞典增设第六个诺贝尔奖项以来，该奖绝大多数都颁给了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者中有保罗·萨缪尔森、詹姆斯·托宾和罗伯特·索洛获得过该奖，但是自1974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与社会主义者冈纳·缪尔达尔共享该奖后，天平明显倾向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

而且，几乎所有获奖者都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过或者曾就读于该校。在20世纪90年代，诺贝尔奖多次落入该校，包括罗纳德·科斯、加里·贝克尔、罗伯特·福格尔和罗伯特·卢卡斯。

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芝加哥经济学家们把强大的理论与熟练的实证工作结合在一起将经济学科引申到新的领域。比如金融学、种族歧视、福利和经济史方面。其次，瑞典银行选出评选该奖的五人委员会的意识形态逐渐由

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感到被欺骗了。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在1990年11月12日的《商业周刊》中哀叹，多位杰出凯恩斯主义者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被诺贝尔委员会忽视了，其中包括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和罗伊·哈罗德爵士。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可以做同样的争论。当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应该获得诺贝尔奖却始终未如愿。



照片15.7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明显的遗漏

其它学科的诺贝尔委员会也经常忽略那些在他们所在领域内知名的且具有“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之资格的人们。马克·吐温和列夫·托尔斯泰从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贝尔实验室称“电”是20世纪第一的工程伟绩，然而托马斯·爱迪生从未因其发明电灯而获诺贝尔奖。其他被忽略的科学家包括：制造飞机的怀特兄弟(Orville and Wilbur Wright)；发明电视机的菲勒·法恩斯沃斯(Filo Farnsworth)，弗拉基米尔·佐里金(Vladimir Zworykin)和埃萨克·舒恩伯里(Isaac Shoenbery)；发明雷达的罗伯特·沃森·瓦特(Robert Watson Watts)；发明喷气发动机的弗兰克·惠特尔(Frank Whittle)和汉斯·帕贝斯特·冯·奥海因(Hans Pabst Von Ohain)；Xenography的发现者切斯特·克拉森(Chester Clarson)；数字计算机的发明者霍华德·艾肯(Howard Aiken)、小约翰·艾克尔(John P. Eckert, Jr)和约翰·曼彻里(John W. Manchly)；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发现者约·纳斯萨克(Jonas Salk)；以及微处理机的发明者泰德·豪夫(Ted Hoff)。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未授

予原子弹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该奖。毕竟，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自己开发过一种威力较小的引爆物——黄色炸药。

以往的诺贝尔奖获奖者和全球75所高校的知名经济学教授们提名候选人。五人委员会在广泛评论和辩论之后作筛选。最后，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260人）在十月份通过不记名投票选举并且在一个清晨用一个惊喜的电话通知获奖者。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和诺贝尔奖获奖演讲则是12月份于斯德哥尔摩举行。

弗里德曼开始进攻：《自由选择》电视录像

弗里德曼很愿意在《新闻周刊》的专栏为大众撰稿，从1966年至1984年他笔耕不辍，但是他成功的巅峰时刻是1980年1月电视连续短剧《自由选择》在公共广播公司（PBS）电视台的播出。该片的目的在于向大众传播自由市场观念。三年的制作期花费了250多万美元，这个10集的系列节目“带我们进入生活中最令人兴奋的事业”（Friedman 1998：471）。

最大的难关是说服PBS播出这个节目，PBS节目导演们认为弗里德曼是一个“极端的法西斯主义者”。但是既然他们之前已经播出过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富有偏见的《不确定的年代》，他们觉得不得不播出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

节目形式很吸引人。每一期节目都以弗里德曼的公开演讲开始，随后是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激烈辩论。题目包括“谁保护消费者？”“谁保护工人？”和“如何治理通货膨胀”。该节目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均有拍摄和实况报道，颇具全球性。香港被竖立成处于最不利的环境下仍获益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典型。

该剧反响巨大。超过三百万美国人观看了《自由选择》，这个数目的观众对PBS也实属罕见。同名书最终售出100万册之多（1980）。

芝加哥到加利福尼亚

弗里德曼1977年从芝加哥大学退休并接受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一个职位。他用诺贝尔奖金（1976年免税的奖金180,000美元）的收入买了一所漂亮的公寓，该公寓位于俄罗斯山丘（Russian Hill）上且能俯瞰整个旧金山。但是弗里德曼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二字。他和妻子仍活跃于蒙特沛尔林学会和包括税收限制在内的多种公共事务中。弗里德曼成为罗纳德·里根总统的非正式顾问，就像他以前做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顾问一样。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同妻子建立了米尔顿和罗斯·D·弗里德曼基金会。该基金推动采用教育券的方式来改善公共教育，特别在贫困家庭的公共教育方面。“学校教育是我们技术上最落后的重要产业之一”，弗里德曼宣称（1998：349）。在两次开胸心脏手术后，弗里德曼不得不放慢步伐，但是无疑进入21世纪后，他仍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更重要的是，他在反对凯恩斯主义浪潮和重建新古典经济学的地位中，比任何其他经济学家的贡献都大。

弗里德曼如何能在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失败之地获得成功

弗里德曼如何力挽狂澜地把学术氛围从凯恩斯主义模式转回亚当·斯密的古典模式的呢？

首先，如前所述，弗里德曼具备从事经济职业无可争辩的资格。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的全职教授职位和为人垂青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他已准备好攻克凯恩斯主义世界。

其次，弗里德曼在其学术生涯早期注重学术性技术工作，他在具备足够学术资格之后才开始为大众写作。因此，他首先耐心地获取来自同行们的尊重，之后才在公众面前大声疾呼。

第三，他为自己的理论发掘了缜密的经验证据。就像新奥地利学派证实的，理论，即便是高明缜密极有逻辑，也无法动摇凯恩斯主义体系。需要可信数据、数量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来检验和支持自己的论点。弗里德曼从西蒙·库兹涅茨、威斯利·米切尔以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其他名人们那里学到了这个道理。

弗里德曼应用了一个颇有争议的策略

第四，也是最令人惊奇的方式是弗里德曼通过应用凯恩斯主义的语言和理论工具来破坏凯恩斯主义体系、攻击凯恩斯主义模型并且提出名为货币主义的相反模型。许多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都误解了弗里德曼所用的这种有争议的策略，但是它确是英明且有效的行动。

弗里德曼的凯恩斯主义过往

弗里德曼在其1998年的自传中作了一些不寻常的披露，其中之一就是20世纪40年代早期他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短暂韵事。他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受命论证二战期间治理的通货膨胀的方式。他的反应表达了凯恩斯主义思想，他提到的几个选择是：削减政府支出、增税和加强价格管制。他那时未曾在任何地方提及货币政策或是控制货币供给，这些现在在他的成名之作。“我完全忘记了那时我是一个多么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他坦言（1998：113）。

20世纪30年代，弗里德曼也曾支持凯恩斯主义风格的赤字支出作为走出萧条的一个手段。弗里德曼的导师不是凯恩斯而是他在芝加哥大学时的老师们（见385页的加框文字）。

弗里德曼在198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赞凯恩斯是“杰出的学者”和“迄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尽管他认为凯恩斯最好的作品是《货币改革论》，但是他仍把《通论》称为“杰作”。而且，他郑重地说：“我相信凯恩斯理论的优越之处在于它的简明性、它对少数关键数量的关注及它能实现的丰硕成果”（Friedman 1986：52）。

“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诸如上面的引语导致像经济学家罗格尔·卡瑞森（Roger Garrison）和罗伯特·J·哥顿（Robert J. Gordon）这样一些评论家把弗里德曼归类为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主义者，即倾向于应用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刺激经济。

这些引语使人产生误会。实际上弗里德曼只是在凯恩斯主义工具箱里开发了他自己的技术而从未对凯恩斯主义既定态度实行“拿来主义”。正如弗里德曼给我的一封信中写到的，“我从未被政府干预的优点劝服而反对自由市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就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他对凯恩斯主义关于大萧条是市场现象的观念持完全“敌对”的态度（Gordon 1974：48-49）。

回顾另一个有争议的引语的背景或许能使事态平息。1965年12月31日《时代》杂志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作封面并引用弗里德曼的话：“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不久，弗里德曼说该引语断章取义。“在某种意义上，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在另一种意义上，不再有人是凯恩斯主义者。我们都在用凯恩斯主义的术语和工具；不再有人接受凯恩斯主义的原始结论”（1968：15）。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实质上，弗里德曼这位对凯恩斯主义体系极为熟悉的学者就是用凯恩斯的术语和工具来证伪凯恩斯自己。正如1986年他赞赏地评论凯恩斯之后的声明，“我被引导而反对它[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因为我认为它与事实经验相悖”（1986：48）。

首次出击：永久性收入假说

20世纪50年代早期，弗里德曼与其他职业经济学家一起通过开展数量研究来阐明诸如投资乘数和消费函数等凯恩斯主义概念。弗里德曼的这一系列贡献中的就有他最初的贡献之一，永久性收入假说。弗里德曼认为他1957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是他最好的技术性著作，并且这也是他用凯恩斯主义术语使凯恩斯蒙羞的典型例子。凯恩斯主义认为提高政府支出引致充分就业的关键在于消费函数——即在家庭消费支出和家庭当前收入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联系的体现。依据凯恩斯主义模型，政府支出将会通过乘数杠杆效用增加家庭收入。

然而，弗里德曼通过对美国消费数据的大量研究证明家庭仅根据长期或永久性收入的变化调整其支出，并且很少注意短期形式。因此，凯恩斯主义消费函数是根本错误的并且政府支出通过乘数产生的杠杆作用要远远小于预期的作用。弗里德曼勤奋且全面的工作为实证研究树立了一个新的高标准，弗兰克·莫迪利阿尼、詹姆斯·托宾和其他凯恩斯主义学者们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进一步的研究也证实了弗里德曼的结论，乘数是接近于1的而不是教科书中所写的6或7。

弗里德曼关于消费的永久性收入理论还有助于反对凯恩斯主义中的收入累进税和遗产税收，以及阿尔文·汉森的“长期停滞”论题（见第十四章）。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下降，因而随着一国变富投资机遇必须更快速地扩张以便与储蓄率高速增长相协调。凯恩斯主义者称其为“储蓄缺口”。凯恩斯的猜测是汉森的长期停滞论题的重要成分，它提出除非政府采取巨额财政赤字，否则美国经济就会陷入停滞。凯恩斯同样建议对富人收取高额税，这样会鼓励社会高消费并避免停滞。

然而，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观点表明高收入不一定导致高储蓄，并且证实了西蒙

• 库兹涅茨在NBER的研究，该研究表明自1899年以来尽管实际收入大幅增加，但是收入储蓄的百分比几乎稳定不变。因此，加在富人身上的高税收不一定像凯恩斯设想的那样使得消费倾向增加。

当然，必须指出，即使凯恩斯的假说正确——储蓄率随收入增加而提高——那也不会是一件坏事。毕竟，高储蓄将引致更多的资本投资和技术突破。企业能力和技术进步或者稳妥投资的能力都是无限的。

弗里德曼攻击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核心

然而弗里德对消费函数的攻击与一个更重要的观点相比只不过是初级的表面功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背后的核心假设是对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的深深怀疑，认为除非通过政府干预否来提高“有效需求”并恢复其生命力，否则自由资本主义将会无限期地困在非充分就业均衡上。正如詹姆斯·托宾所言，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需要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Breit and Spencer 1986: 118）。大萧条没有证明这一点吗？自由市场经济不能自我规制因此不得不需要外部控制。

弗里德曼聚焦货币和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以间接方式提出这个批判观点——通过于对内战以来美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的大量研究。他得到训练有素的NBER研究人员安娜·J·施瓦茨的帮助，她后来成为他的合著者。⁴ 他们一起花费多年时间收集大量各种关于货币、信用、利率以及联邦货币当局的政策等的统计资料。最终成就不朽之巨著——《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该书由NBER和普林斯顿大学共同出版（1963）。它的专业方法不容忽视。

弗里德曼研究并写作《货币史》具有双重使命。第一，他想驱除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无效”看法，即认为在衰退或萧条期间货币供给的积极扩张是无济于事的，好比“你无法逼人们花钱”。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反复证明货币政策的扩张和紧缩都确实起作用。随着20世纪60、70年代通货膨胀的升温，弗里德曼的货币经济学著作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越来越可行。弗里德曼最著名的话是“通货膨胀始终是货币现象”（Friedman 1968: 105）。

弗里德曼发现大萧条的真正原因

证明货币有效是一个重要目的，但是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研究揭示出一个更深的意图。他们共860页的书有一句惊人之语永远改变了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对20世纪经济大灾难成因的看法：

从1929年8月周期的波峰至1933年3月周期的波谷，货币存量减少超过三分之一（Friedman and Schwartz 1963: 298）。

30年以来，整整一代经济学家未能了解到联邦储备对1929-1933年美国经济的破坏程度。他们的印象是联储在避免大萧条变得更糟的过程中尽了能力范围内的最大努力，但是正像“你无法逼人们花钱”一样，这些努力面对绝对强大的通货紧缩的力量于事无补。根据联邦储备系统的官方申辩，他们已经尽力但仍无力阻止衰退。

弗里德曼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传统观点。“大收缩”，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这样称它，“实际上是货币力量重要性的一份可悲证明”（Friedman and Schwartz 1963: 300）。在另一场合，弗里德曼解释到，“20世纪30年代是货币因素在制造萧条时重要作用的悲剧性证明，而远不是它们在阻止萧条时毫无效果的证据”（1968: 78-79）。政府的“不当”行为使一场普通的衰退演变成上世纪最严重的萧条。

THE GREAT CONTRACTION 大收缩

The Stock of Money and its Proximate Determinants, Monthly. 月度货币存量及其直接决定因素
1929-1933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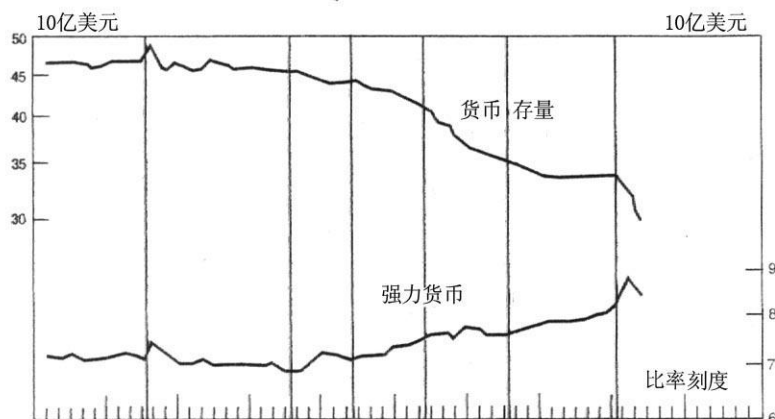


图15.2

1929-33年货币存量显著下降 “货币存量减少超过三分之一”
(Friedman and Schwartz 1963: 333)。经普林斯顿大学允许翻印。

忽视货币政策的一个原因是直到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他们的书(1963)中提出M1和M2的概念之后政府才开始公布货币供给数据。弗里德曼评论说,“如果联邦储备系统在1929-1933年间公布货币数量的统计数字,我认为大萧条不会如此严重”(Friedman and Schwartz 1969: 80)。1929-1932年萧条期间货币供给图表见图15.2。它给出充分证据。

因此,弗里德曼总结道,“事实上大萧条同多数其它时期的严重失业一样是由政府的管理不力而不是由私人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造成的”(1982[1962]: 38)。进一步,他写到:“萧条绝非自由企业体系的失败而是政府的惨败”(1998: 233)。从那时起,由于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见解深刻的著作,教科书中关于大萧条的章节将逐渐用“政府失败”代替了“市场失败”。

弗里德曼对乘数提出疑义

这位芝加哥经济学家在他1962年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中继续攻击凯恩斯主义,在该书中他对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稳定性提出质疑。他指出乘数这个概念名不副实,并称其为“站不住脚的”。“简单的凯恩斯主义分析隐含了关于借钱对其它支出毫无影响的假定”(Friedman 1982[1962]: 82)。凯恩斯主义赤字支出的两个可能后果是通货膨胀和私人投资挤出效应。弗里德曼还指出联邦预算是“战后国民收入的最不稳定因素”。凯恩斯主义平衡轮盘通常是“不平衡的”,并且它“不断促进政府行为范围在联邦层面上的扩展且不断阻止联邦税赋的减轻”。(76-77页)

金本位制导致了大萧条吗?

金本位制根本就不稳定,金本位制本身就是两次大战之间金融稳定和经济繁荣的重大威胁。

——巴瑞·艾欣格林(Barry Eichengreen) (1992: 4)

弗里德曼消除了一种得到广泛支持的信念,就是国际金本位制应对萧条负责。金本位制的批评者们指出在1931-32年的关键时期联邦储备因害怕黄金储备流失而提高贴现率。他们论辩到,如果美国没有受到金本位制的束缚,那么联邦储备就能避免把国家推向萧条和银行业危机不计后果的信贷紧缩。

然而,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指出在紧缩的前两年美国的黄金储备有所增加。但是联储反应不当。“我们不允许黄金流入扩大美国货币储备。不仅封存黄金,我们甚至做得更过分。我们的货币储备在黄金储备上升时却下降,这是不合理的”(Friedman and Schwartz 1963: 360-61)。

简言之,即便是在有缺陷的黄金兑换制下,还是有机会避免世界范围的破坏性萧条和货币危机。

弗里德曼也对菲利普斯曲线提出质疑

1968年出版的弗里德曼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中他引入“自然失业率”概念来反对菲利普斯曲线。如第十四章指出的，凯恩斯主义者很快就利用菲利普斯曲线来为自由财政政策正名；对他们来说，如果通货膨胀意味着低失业率，那么它是可以容忍的。一种“轻微的通货膨胀”不会有害相反还会大有益处。

弗里德曼反对并争辩道“在通货膨胀与失业间只有短期的替代关系。不存在长期的替代关系。”因此，任何把失业率降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的努力都必将导致加速通货膨胀。而且，“降低失业率的唯一方式是通过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这很难实现。弗里德曼得出结论，通货膨胀的加速最终将带来更高而不是更低的失业率。因此，通过扩张的政府政策来减少失业的努力在长期中被公众预期到后，只会事与愿违（Friedman 1969: 95-110）。

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事实证明弗里德曼是正确的。因为与20世纪50年代英国发生的现象相反的通货膨胀与失业共同上升，使菲利普斯曲线无法识别。1977年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在一篇著名的讲话中坦言，“我们过去常常认为能通过支出走出衰退……我可以完全坦白地告诉你，那种选择已不存在；而它曾经存在的时期，也只是通过往经济中注入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因素起作用，随之而来便是下一阶段更高水平的失业。那就是过去20年的历史”（Skousen 1992: 12）。弗里德曼在其诺贝尔奖获奖演讲中提醒，菲利普斯曲线已变成正斜率上升了，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上升。

从菲利普斯曲线的论战中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理性预期”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小罗伯特·卢卡斯，他获得了1995年的诺贝尔奖。理性预期彻底推翻政策制定者能够愚弄公众使其对通货膨胀作出错误预期的理论。因此，政府政策在实现其目标方面频繁失效。

弗里德曼对理想货币标准的追求

弗里德曼得出结论，一旦货币体系是稳定的，那么亚当·斯密的天赋自由体系将兴旺起来。与凯恩斯的信念相反，弗里德曼忠实地坚持新古典模型代表着“通”论，并且只有政府的货币干扰才能使自由市场经济脱轨。简言之，依据弗里德曼，经济周期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导致的，并且货币稳定才是经济稳定的实质性前提。

当弗里德曼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认识到这一原则时，他就开始著述理想的货币标准。他的研究受到欧文·费雪的影响很大，包括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和他的经济周期对策——一个100%准备金的银行系统。哈里·西蒙斯吸收了费雪的思想并在芝加哥大学进一步发展它。

但是弗里德曼发现费雪（和西蒙斯）在应用他的货币数量理论时犯了一个错误。回想第十一章中的费雪交易方程式：

其中 M =货币数量，
 V =流通速度，
 P =价格水平，
 Q =商品和劳务的真实产出。

像我们在第十一章中强调的那样，费雪在他犯的致命错误在于他在他的预测模型中过于注重价格水平（ P ）的预测和价格稳定。因此，他未能预测到1929—1932年的危机。在芝加哥大学，西蒙斯犯了相同的错误。他建立一个价格指数规则并将其作为理想的货币目标。

“灵光一现”

弗里德曼正确地把重点转移到货币政策上来。货币数量 M 远比 P 重要。他这种来自他的货币主义启蒙导师费雪和西蒙斯的“标新立异的观点”，被他描述为“灵光一现”。

“我认为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货币数量规则都远优于价格水平稳定规则”（Friedman 1969: 84）。米塞斯在1912年写《货币和信用理论》时得出相同的结论（见第十二章）。

规则与权威

弗里德曼从西蒙斯那里学到的一个原则是严格的货币规则优于政府权威的擅自决策。“任何一个系统如果赋予少数人过大的权力和过分自由度，使其错误——可原谅的或不可原谅的——影响深远，那么这就是一个糟糕的系统，”他写到（弗里德曼1982: 50）。

弗里德曼研究两个提供规则而非权威的货币体系：金本位制和**不兑现货币本位制**（fiat

弗里德曼考量金本位制

一个真正的金本位制无法提供弗里德曼所期望的稳定货币框架吗？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金和银就成为健全货币体系的基础。一个成熟的商品本位制得到各种人的认可，诸如托马斯·杰弗逊、大卫·李嘉图、弗朗西斯·A·沃克（首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和更近的穆雷·N·罗斯巴德，在该体制下银行券以百分之百兑的金或银为储备。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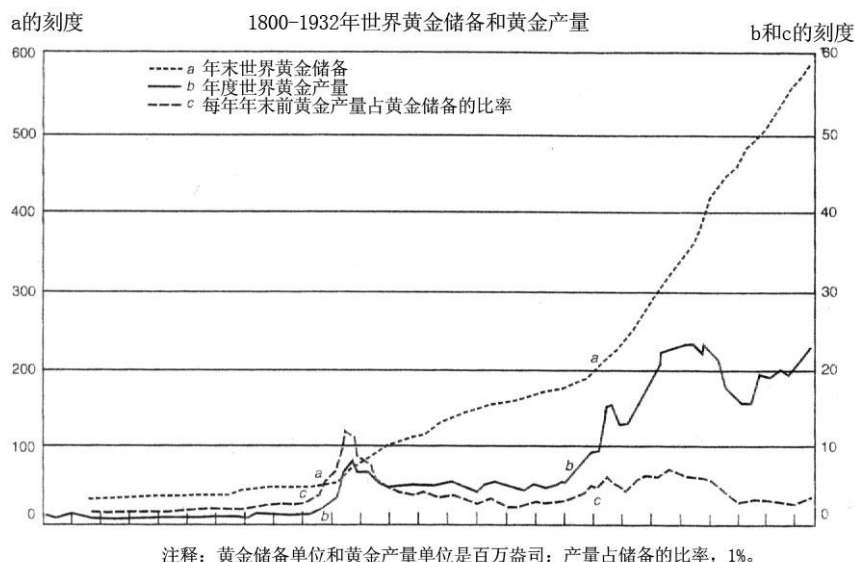


图15.3

1800-1932年金本位制下金属货币的逐渐增长：注意代表世界黄金储备的线a从未下降。

来源：图克（1934：12）。

黄金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因为黄金持久耐用，地上的黄金储备总量趋于稳定的增长（每年1%-3%），因此黄金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标的（见图15.3）。唯一的例外是在淘金热时期，但那样的通胀持续期很短。在完全金本位制下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是不可能发生的。黄金严格限制政府财政并且防止通货膨胀泛滥。“在成熟的金本位制下全部货币由黄金或者黄金仓储凭证构成，也许还存在固定的信用纸币。这种本位制的突出优点是政府控制下获得了完全自主与自由”，弗里德曼在《货币稳定方案》（1959：119）中写到。

100%的金本位制还能避免当今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的“内生不稳定的”本质发挥作用。弗里德曼同意他的老师哈里·西蒙斯的看法，“在同一笔基金被用作工业和贸易的投资基金和个人的流动现金储备的金融系统下，可能存在极端的经济不稳定”（Simons 1948：55，着重号系后加）。

依据历史，弗里德曼赞同地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之前的古典金本位制：“盲目的、无计划的和半自动的金本位制的运行产生了一种预期和管制的更好方式——可能因为它的规则客观且不可逃避——与意欲提升稳定性的制度化安排下的故意和自觉的控制相比”（Friedman and Schwartz 1963：10）。

弗里德曼最终否定了金本位

弗里德曼同欧文·费雪和哈里·西蒙斯一样最终放弃了把黄金作为货币一般等价物的主张。他从两个层面上反对，一个是高昂的资源成本，另一个是实施的不现实性。当弗里德曼注意到大量的资源——可能是每年GDP的4%之多——要用来生产货币金属时，他表示出最普遍的担忧。从亚当·斯密到保罗·萨缪尔森的所有经济学家都担心，生产“野蛮的遗物”（凯恩斯之语）会“浪费”珍贵的土地、劳动和资本，而纸币则能够实现“只需用极少的实际资源就能生产出交换媒介”（Friedman 1960：5-7）。

保罗·萨缪尔森在他教科书第八版著名的一段中更深入地阐明“浪费资源掘出地下深处的黄金只不过是为了重新把它掩藏在肯塔基的纳克斯堡(Fort Knox)[美国的国家黄金储藏地,译者注]的金库中，这是何等的荒谬！”（Samuelson 1970：700）

资源的高成本的论点一直是作为正统观点为人们所接受。这种状态持续到奥本大学的经济学家罗格·W·加里森对它提出挑战的时候。加里森在一篇杰作中指出，黄金生产的资源成本无论是在不在金本位制下都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1971年世界取消金本位制后，“黄金继续被采掘、冶炼、分割或熔合、贮藏和保护；资源成本继续发生着。”而且，他推断说，如果政府不负责任地扩张其货币供给，导致投资者过度储存硬币和金锭，这样会占用更多的资源（Rockwell 1985：70）。

尽管弗里德曼不久接受了加里森敏锐的观察结果，但是他是在实践层面上反对金本位制。至少，弗里德曼确定黄金生产通常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并因此会产生或多或少的通货紧缩。

引入货币主义规则

弗里德曼认为一个更好的方法是采用严格的法定货币本位，这个货币体系基于不可兑换的纸币，而纸币将包括银行存款（活期存款账户）的百分之百的存款准备金，并采取法定规则，规定货币供给将以一稳定速率增加，该速率应大约等于国民经济增长率。弗里德曼建议3%-5%的货币目标。这种货币规则实施起来很简单，甚至可以用一台计算机代替联邦储备体系了。

当然，货币主义规则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货币供给”的组成部分。它应该是狭义的货币供给比如M1(现金和活期存款)，还是较广义的货币供给M2（M1+货币市场存款），还是更广义的货币供给呢？通常来讲，弗里德曼倾向于广义货币供给M2这个释义。

虽然弗里德曼的影响不断扩大，但是并没有国家采用他的100%银行储备政策或者货币规则。政治家和经济领袖们都对在如此重要的领域采用这种自由放任之政策感到恐慌。他们不喜欢当货币危机或财政危机袭来时把他们的命运系于无意识的电脑上。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七国的多数中央银行在过去的几年里都逐渐降低货币政策的强度和不确定性。20世纪70年代，M2场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M2就以一位数字的速度增长了。可能是金融市场的压力越来越大导致货币领袖们最终默默遵循了弗里德曼的货币规则。

世界还未采用弗里德曼和反通胀的货币主义者们设想的理想货币体制，因此世界仍易遭受潜在的金融或经济不稳定性的破坏。在这个领域务实让位于虚夸，这无疑将威胁到未来的全球市场。它很可能将成为全球经济的致命弱点。

方法论的疯狂，第二部分

因而，重要的是，在其假设中假说必须是被描述成错误的。

——米尔顿 弗里德曼（1953：14）

第十二章描述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怪异”的方法论，他除了纯粹的演绎推理外不使用历史、数学、图形或任何其它技术。

米塞斯的非正统哲学在其1949年著作《人类行为》中有所表述。四年后弗里德曼写了一篇题为《实证经济学方法论》（1953：3-43）的文章，该文同《人类行为》一样颇有争议。使争议升温的是弗里德曼拒绝评论自己的这篇文章或者回应批判者的事实；他说想要去“研究经济学”而不是“写关于经济学应该如何去研究”（Friedman 1998：215）。

基本上，弗里德曼认为，评判一个经济学模型的唯一方式是其预测能力——这是“唯一相关的检验”——而不是其假设的现实性。但是他又更进一步宣称，“普遍来讲，一个理论越是重要，其假设就越不现实。”弗里德曼坚持说，具有“现实性”假设的理论无疑是“无用的”。如果一个理论“提供足够精确的预测”，那么它的假设甚至可以是“错误的”（1953：14-15）。最后，弗里德曼借用了卡尔·波普尔的证伪理论，认为你永远不能证明任何事物本质上正确，只能通过经验观察将一理论证伪。

弗里德曼用该方法分析凯恩斯模型。他发现凯恩斯的简单假设很完美，但是最终他否定了该模型，“因为我相信它与经验事实相悖”（1986：48）。

弗里德曼自己的预测怎么样？

这位芝加哥经济学家因其某些预言的失误，如20世纪80年代的高通胀，不得不重新检验自己的货币理论。

在经济学中，错误的和误导的假设会导致困境。例如，开发计算机生成的计量经济学

模型用于对股票、债券和期权的趋势预测，这些预测完全基于历史模式。这些所谓技术分析的金融模型通常忽视基本面而过于关注“什么起作用”，即过去什么因素发挥作用。很典型，这些模型在一段时间内，有时是几年都有效，但是随后便在“未预知地”重要基本因素起作用时失效。这就是前面提到的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发生损失40亿美元的本质问题所在。总之，我们必须对忽视基本经济行为的任何试探性理论持怀疑态度。

弗里德曼完全改变学术气候

让我们回顾一下战后时期的这一壮举，这个不与智慧史上最强大的引擎相啮合的人。弗里德曼令人钦佩地拆除了“凯恩斯建起的房屋”并引领经济学家们回到亚当·斯密的根基。弗里德曼最终实现了目标，在亚当·斯密的体系之上重建了自然自由的基本原理。剔除政府的不善管理，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或不理性。正如弗里德曼在写完《货币史》之后所宣称的，“现在经济学家们广泛赞同凯恩斯主义主张在纯理论层面上是错误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上总是存在一个充分就业的均衡点”（Friedman and Schwartz 1963: 167）。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反革命影响极大，以至于阿克塞尔·莱荣霍夫德最近承认，“目前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凯恩斯的著作缺陷甚巨、谬误百出，甚至无需再学……对于，现在青年一代的宏观经济学家们，不理解凯恩斯似乎是作出专业理论推进的充分或至少是必要的条件”（1999: 16: 30）。的确，当前的观点认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不是一个“永久性”革命，而是一个不幸的插曲，或者像理兰德·雅格（Leland Yeager）所说的，是新古典模型的短暂偏离。（Yeager 1973）

然而，没有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另一场革命——柏林墙的拆除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苏联体制的崩溃——发展的帮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反革命将无法完全实现。这些事件和它们对学术气候的影响是第十六章的主题。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创造性毁灭： 约瑟夫·熊彼特的**阴郁**观点

本章音乐选段：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第七交响乐

资本主义能存活吗？不，我认为它不能……

社会主义能运作吗？它当然能。

——约瑟夫·熊彼特（1950: 61, 167）

熊彼特是正确的吗？不，我认为他不是。

——罗伯特·海尔布伦纳（1981: 456）

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其他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艰苦努力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伟大回归的唯一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 and 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模式的崩溃。从那时起，全球化打开了通向更为自由的经济政策的大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过去几十年一直实行国有化、保护主义、进口替代、外汇管制和**企业亲信主义**计划政策的国家已经向国外投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其它市场政策打开国门。甚至一度严厉批评资本主义模式的世界银行，也已明显转向支持以市场方式解决低度发达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长达一世纪的争论

但是状态并非一直如此。事实上，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人们认为暴虐的中央计划比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更有效率且更具生产能力。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质疑集体主义时代精神的第一人。他在1920年的文章《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计算》中站在纯粹的经济学立场上批评社会主义。他就此主题写作是为了回应社会主义者们热情地赞颂1917年之后在俄国建立了一个真实世界中的共产主义国家以

及1908年意大利的恩里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的社会主义生产数学公式（哈耶克1935：245-90）。尽管有巴罗内的正式模型，米塞斯论证了一个由不存在私人财产、交换和竞争的全面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中央权威，不能理性地计算价格和成本，因而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具有生产能力的经济体。他列举修建铁路的例子。“铁路该不该建，如果该建，那么多能想到的路线中应该建哪一条？在一个竞争的货币经济中，这个问题将由货币计量结果来回答。”但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呢？他这样总结，“只有在黑暗中摸索。社会主义是理性经济体的毁灭”（Mises 1990[1920]：24-26）。米塞斯预言在苏联的纯粹社会主义体制下或者任何想尝试这种体制之处都将出现短缺、缺乏创新和激励、投资不当或不足等现象。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最严重之时，知识分子都被中央计划所吸引，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把米塞斯的文章译成英文与其他几篇文章一起结集出版，题为《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哈耶克1935）。在之后的文章和书中，哈耶克主张竞争价格为运行良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协调经济提供必需的重要信息。哈耶克指出重要信息的内在本质是局部的，如果通过中央计划委员会来引导，那么国家决定的行为将扭曲保证经济有效运行所必需的信号。对于中央当局来说“要获取所有知识……恰是……忽略现实世界重要且有意义的每一件事”（Hayek 1984：223）。总之，做决定权必须分散。

“市场社会主义”获胜

社会主义者用他们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击，这一观点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波兰社会主义者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和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弗莱德·M·泰勒认为中央计划委员会能够通过“试错试验”来定价。可以先确定每一种产品的价格由此来决定其供给和需求。如果发生短缺，可以抬高价格；如果大量剩余，可以降低价格。兰格甚至建议中央计划委员会“随机地”定价，由此导致的短缺或过剩将会决定委员会接下来的反应（Lange and Taylor 1938：70）。

奇怪的是，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这种市场社会主义者们应用的“试错试验”方法能够运作。如德莱布诺夫斯基（Jan Drownowski）所写的那样，“现在每个人都同意，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在理论上不可能的主要观点是错误的”（Lavoie 1985：4）。甚至连米塞斯最杰出的同学约瑟夫·熊彼特也反对米塞斯的论点。他写道，“社会主义能运作吗？它当然能，”又写到“资本主义秩序将会自我毁灭而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显然是……一个很有希望的继承者”（Schumpeter 1950：167）。



图片16.1
Oskar Lange (1904-65)
“市场”社会主义者：
“随机确定价格”
感谢马克·布劳格

所谓的苏联经济神话

苏联看似成功的经济事迹是引导知识分子转向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苏联之行归来的记者们宣称“我去了未来社会，而它确实行的通”（Malia 1999：340）。1936年，西德尼和比阿特里斯·韦伯夫妇回来后热情地报道了一个“新的文明”和“人类的再造”，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国度里就业充分、工作条件优越、教育免费、医疗服务免费、儿童有人照顾并且妇女也享有权益。博物馆、剧院和音乐大厅遍布各地且可随时使用。甚至鄙视马克思主义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认为韦伯夫妇的报道“令人印象深刻”。凯恩斯认为苏联领导人已摆脱了马克思主义，1936年他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台的演讲中表示了对自己国家的乐观态度：“它留给我一种强烈的愿望和希望，在这个国家，我们在保持传统主义和一种谨慎的保守主义的同时，也许可以发现如何将准备就绪的试验与政治经济的手段和制度的变革结合起来”（1982：333-34）。

的确，二战后欧洲和拉美国家开始大范围进行社会主义试验，一个又一个产业的国有化、增税、加强工资价格控制、扩张货币供给、建立全民福利计划并且卷入了所有形式的集体主义闹剧。

中央情报局（CIA）的数据使经济学家们相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带来了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甚至比采取市场经济西方国家经历过的增长还快速。保罗·萨缪尔森也是相信苏联经济优越性的经济学家之一。在第五版《经济学》中，他用一个图形来说明苏联与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甚至可能会消失（1961：830）。第十二版中，一个表格代替了图形，说明1928年至1983年苏联经济以惊人的4.9%的年增长率增长，这个增长率高于

美国、英国，甚至高于德国和日本（1985：77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柏林墙拆除前不久的第13版中，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自信地宣称，“苏联经济证明了社会主义指令经济能够运行甚至能够走向繁荣，这与许多怀疑论者早前的观点相悖[指米塞斯和哈耶克]”（1989：837）。

萨缪尔森不是唯一对苏联社会主义持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1987年里查德·利普塞（Richard G. Lipsey）和彼得·斯泰纳（Peter O. Steiner）在他们的流行教科书中大胆地宣称，“苏联居民生活水平甚至比10年前还要高许多并且仍在迅速提高。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很舒适”（见Skousen 1997：148）。罗伯特·海尔布伦纳和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提出了类似的论点：“经济指令能够有效推进且加速经济增长过程吗？苏联的杰出表现证明它能。1920年苏联只是世界经济体中很小的一部分。今天它的经济成就可与美国相提并论”（1984：629）。

自由是有成本的？

亨利·沃利希（Henry C. Wallich）是耶鲁的保守派经济学家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前任委员，就连他也被CIA的统计数据说服了，还写了一整本书论辩说自由导致经济增长缓慢、更大的收入差距和更少的竞争。他在《自由的成本》中总结到，“自由经济的终极价值不是高产而是自由，而自由不是作为一种利润存在，而是以一定成本为代价”（1960：146）。

熊彼特：奥地利学派的叛逆小子（enfant terrible）

约瑟夫·熊彼特是杰出的哈佛经济学家，他也是奥地利学派的叛逆小子。在20世纪上半叶没有比他更好的例子能说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论辩的难以理解的本质。

今天，熊彼特因为他引入动态竞争过程理论及企业家的核心作用，并反对静态“完全竞争”模型而受到很高评价（1950：81-86）。在1986年的一篇题为《现代先知：熊彼特还是凯恩斯？》的文章中，管理学的权威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的答案倾向于熊彼特，他预言到“这两位本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中，熊彼特如果不在下一个30或50年内，便将是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内，决定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思想框架”（Drucker 1986：104）。并且加尔布雷斯评价熊彼特是“这个世纪最老练的保守派”（Swedberg 1991：150）。

尽管有这些溢美之辞，熊彼特是经济史上最古怪的人物，其生活跌宕起伏甚至比凡勃伦或者马克思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熊彼特除了个性怪异，他的经济思想更是难以预料。他捍卫社会主义经济学，预言资本主义将走向灭亡，并且认为静态一般均衡模型之父莱昂·瓦尔拉斯是“所有经济学家中最伟大的”（Schumpeter 1954：827）。

让我们回顾一下他的奇闻轶事

神秘的一生



约瑟夫·A·熊彼特（1883-1950）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摩拉维亚（Moravia），与他一生的主要对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出生于马克思去世的1883年。一个神秘主义者可能认为马克思转世为两个强大并具创造力的形象——凯恩斯和熊彼特。

和凯恩斯一样，熊彼特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他的母亲。他仅四岁时父亲去世，他的继父是一个严肃的贵族。他们全家搬至维也纳，熊彼特在那读完高中，并于1901年入读维也纳大学法律系。他的兴趣逐渐转向经济学，并在弗里德里希·维塞尔和欧根·柏姆-巴维克门下学习。1906年毕业后，他写了第一本书《经济发展理论》（1934[1912]），这本书与米塞斯的《货币和信用理论》（1912）同年出版。整部著作是奥地利学派立场，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家的动力作用。但是熊彼特是奥地利学派的叛逆者，他经常采取折衷主义并很愿意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来适应其政治和金融野心。熊彼特傲慢而势利，然而他没有留下明确的学派。

熊彼特倒向社会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共产主义建立之后，奥地利被共产主义控制。（回想第十二章的红色维也纳的事。）熊彼特倒向马克思主义，他称赞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天才”，并于1919年说服外务大臣任命他为财政部长，由此便成为他的老师欧根·柏姆-巴维克的后继者。熊彼特上任伊始就开始过奢华的生活，租了一个城堡并养了一马厩的跑马。当被问及高档的生活时，他倨傲地答到，“*Krone ist Krone*”意思是“**皇冠就是皇冠（a crown is a crown）**”。遭受饥饿和贫穷的普通奥地利人可没这么开心。（Swedberg 1991：63）

熊彼特的放肆行为

熊彼特只在公职上呆了一年一点也不奇怪。然后，由于简历上写着“前任财政部长”，他给自己找了一个新银行的委员会主席的职位。熊彼特挣着巨额工资，还享有可观的透支特权，于是他又恢复了以前的奢侈生活方式，其中还包括一段放肆的感情生活。当他被告知应该言行谨慎一些时，他“大中午，租了一辆两匹马拉的敞篷马车在城中心的一条主要街道，卡尔特纳大街（Kartnerstrasse）上来回溜达，并且一个膝盖上坐着一位诱人的金发妓女，另一个膝盖上坐着一位肤色浅黑的”（Swedberg 1991：68）。

1924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奥地利，该银行被迫重组，这时熊彼特发现他突然面临累累负债和税金却没有工作。一年后他时来运转，波恩大学为他提供了公共财政学的教职。

一系列奇怪的婚姻——和死亡！

熊彼特的爱情生活至少可以说是古怪的。1906年熊彼特去伦敦时，突然与一个大他12岁的英国女人结婚。他返回大陆去波恩教书时抛弃了她，并从未与其正式离婚。熊彼特在一系列婚外情之后于32岁时把他的全部心思放在了一个叫安妮·黎辛格（Annie Reisingerin）的12岁（！）女孩身上。他安排她接受教育并让她到婚龄时与他结婚。1925年11月，22岁的安妮和42岁的约瑟夫在一所路德教教堂（尽管他是天主教徒）结婚。

但是熊彼特的肥皂剧没完没了。婚后一年，熊彼特生命中的第一个女性——他的母亲——去世。在同一时期，安妮正遭受怀孕之苦，并因熊彼特的第一个妻子威胁以重婚罪起诉熊彼特而火上浇油。1926年8月，他母亲去世一个月后，安妮突然死于难产。

这些悲惨的事情对熊彼特打击极大，他好几年都不改换安妮卧室的任何一件东西。甚至连安妮的衣服也没有从屋内移走。他每天早上在安妮的坟墓上放一支玫瑰。反常地，他开始每日坚持极精细地抄写安妮日记里的段落，模仿她的笔迹和错误的标点符号。每当他抄完整本日记后，他再重新开始抄。在天主教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开始向已故的妻子和母亲祈祷。“每当他遇到困难时，他祈求她们的支持；而当某事如意时，他一再地感谢她们”（Swedberg 1991：74-75）。熊彼特有时写到“*Hasen sei Dank*”（感谢Hasen）。

（Hasen，字面义是兔子，指深爱的人。）

来自哈佛的邀请

了解到熊彼特的个人行为如此怪异，你可能惊诧他是如何在经济学领域获得那么高的赞誉。显然，他早期在经济发展理论方面的著作为他博得了荣誉。1932年，哈佛德高望重的经济学者弗兰克·陶西格（Frank Taussig）在哈佛大学为他提供一个职位。熊彼特期望彻底改变他的生活，于是离开德国，并从此再未返回欧洲。他留下28箱财物，包括他的论文和手稿。他甚至连自己的第一部书都未拿走一本。

熊彼特搬入陶西格家中并在那里住了五年。熊彼特从陶西格身上得到了自己从未得到过的父亲般的关爱。为避免回想过去的家庭不幸，熊彼特不分昼夜甚至周末也不例外地疯狂工作，并且每天在自己的私人日记里自己的工作打分。他遭受忧愁和多种疾病的困扰。

1935年，熊彼特还清所有债务并接替75岁退休的陶西格，讲授很受欢迎的研究生经济学课程。陶西格的教学方式是苏格拉底式的（Socratic）：提出一个问题后，他会耐心地引导学生寻找的解决方案，而并不给出正确解答。熊彼特的教学方式更加国际化——他拓宽学生的视野使其不局限于英国经济学家并向他们介绍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理论家。尽管熊彼特带有浓厚的维也纳口音，有时让人很难听懂，但是他给保罗·萨缪尔森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了上课的时间，不是在学生们都进入教室之前而在那之后，熊彼特走入教室，以大幅度的动作脱下帽子、手套和外衣，然后开始上课。着装对他很重要：他常穿各种做工考究的花呢上衣，并且认真搭配衬衣、领带、紧身裤和手帕（Harris 1951: 50-51）。

熊彼特待人友善，学生们都戏称他为“**Schumpy**”。他有规律地在当地咖啡馆和研究者们聚会，对他们尤其关照。同米塞斯一样，从熊彼特手中获得学分很容易。有个笑话说的是他给三种学生评A：所有犹太学生、所有女学生和剩下的所有其他学生（Swedberg 1991: 114）。

反凯恩斯

当哈佛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中心时，凯恩斯的成功使心怀妒嫉的熊彼特大吃一惊。他写了一篇极端否定凯恩斯《通论》的评论，并且在1946年凯恩斯去世后，熊彼特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纪念文章中也充斥着对凯恩斯尖酸刻薄的评断（Schumpeter 1946）。“与微不足道的真理相比我们都更喜欢冠冕堂皇的谬误，”他在日记中写到。熊彼特与米塞斯和哈耶克同样坚持认为大萧条应顺其自然而不应该通过赤字支出或再膨胀来干预。

熊彼特的敌视态度可能基于职业嫉妒心理。凯恩斯抢夺了熊彼特的光芒。熊彼特的大部头作品《经济周期》（1939）未得到西蒙库兹涅茨的好评。熊彼特通常对自己评价很高，但是他的两部经典之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50[1942]）和《经济分析史》（1954）在他去世很久后才为世人所公认。¹

反罗斯福

战争期间，熊彼特似乎变得更加古怪、失调和孤立。他继续直接向已故的妻子和母亲自言自语。他的日记满是关于死亡的内容，并包括偶然爆发的对“黑鬼、犹太人和弱智者”反对。一个声明宣称：“正如黑人的舞蹈成了当今的舞蹈一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成了当今的经济学。”1944年正当罗斯福准备竞选第四个任期的总统，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一个女人走向熊彼特并问他是否会选罗斯福。熊彼特刻薄地回答到，“亲爱的女士，如果希特勒竞选总统且斯大林竞选副总统，我会心甘情愿地投票反对罗斯福”（Swedberg 1991: 141）。他认为希特勒会赢得战争。

他的反动行为因他的又一次婚姻而愈演愈烈，这次是1937年与伊丽莎白·布迪（Elizabeth Boody）结婚。他的新婚妻子本人因强烈反对罗斯福且亲日而被起诉，但是她后来在完成熊彼特的“永无止境的”经济史时，功不可没。

熊彼特的全球畅销之作

熊彼特在20世纪40年代他最孤立和沮丧的时期出版了他最杰出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并在他有生之年修订了两次。此书一跃成为全球畅销书并被译成包括波斯语、朝鲜语和印地语在内的16种语言。它已远远超越经济学范畴而涉及到了政治学和社会学，并且被广泛应用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

“创造性毁灭”的动力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本431页的书从总体上看有些头绪不清，然而却内涵真正的精华和影响深远的段落。熊彼特振振有词地写到市场资本主义的动力和技术的破坏力如何扰乱均衡状况。有时他的词语比如“创造性毁灭”听起来像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释义。借用他维也纳大学的老师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的思想，熊彼特把企业看作是他所谓的“创造性毁灭”的市场体系的主要催化剂。资本主义“永远不能稳定”。工业化过程“不断地从内部变革市场结构，不断地毁坏原有的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Schumpeter 1950: 82-83）。

熊彼特并未因诸如福特、标准石油（Standard Oil）或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 IBM) 这样垄断一个部门的企业的增长而感到吃惊。事实上, 他是欢迎公司垄断的。熊彼特观察到垄断公司在其发展的萌芽阶段都积极创新且需要大量风险资本。他们激起更强的竞争, 以于一代之后新的暴发户将取代原来的垄断者。熊彼特如果见到微软超过IBM或者丰田汽车(Toyota)超越福特, 他肯定不会感到吃惊。他完全反对张伯伦——罗宾逊的“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 原文是完全竞争, 疑有误)模型, 不认为这是任何一种理想模型。根据熊彼特的想法, 竞争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自身不断再造的过程而不是静态均衡的一点。他总结到, “现在忽视这一问题的本质要素的理论结构……就像是《王子复仇记》里没有了丹麦王子”(1950: 86)。

熊彼特过早地悲观

熊彼特与米塞斯和韦伯一样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未来持宿命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 他写过这样一部分, “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 时值1935年经济处于大萧条谷底, 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的阴郁观点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失败(他彻底地反对汉森的投资机遇消失的“长期停滞”理论), 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成功(Schumpeter 1950: 61-163)。他相信先进的资本主义体制将会不可避免地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因为官僚主义的管理者将取代创新的企业家, 而繁荣将在中产阶级社会中引发反资本主义的敌视态度。

而且, 熊彼特引入下面的观点, 即“有强有力的例证使人相信它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效率”高于资本主义。熊彼特反对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有效地分配资源的基本观点, 他认为一种运行良好的社会主义民主能够消除经济周期、失业和通货膨胀。他可能不喜欢它, 但是它是不可避免的。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把恶魔的辩护士演得太好, 因而一些人指责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否认这一点。

熊彼特在1949年12月的最后一周中宣称: “我不拥护社会主义”, 这发生在美国经济学会当年的年会之前。他以《向社会主义进发》为题发表了他的会长演讲, 这也成了他的最后一次演讲。然而, “资本主义秩序将会自我毁灭而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显然是……一个很有希望的继承者。”现代社会要求“保障、平等和规制”——经济工程而不是企业关系(熊彼特1950: 416-18)。

毫无疑问, 熊彼特正确认识到了利益腐化社会的强大力量将越来越支持福利国家的稳定, 但是他过分低估了战后的企业精神。今天, 全球的资本主义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勃的局面, 而社会主义则通常处于守势。

熊彼特的最后一个贡献

熊彼特最后一部著作在他于1950年67岁时过早过世后才发表。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写作卷帙浩繁的《经济分析史》。他经常为“该死的历史”感到焦躁, 这项永无止境的工程他终未完成。他死后, 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发现各个部分的手稿散乱堆积在他的住处和办公室。在瓦西里·列昂惕夫、保罗·斯威奇和其他朋友的帮助下, 她花费几年时间辛勤地编辑并录入手稿。后来, 她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不得不卖掉房子。伊丽莎白殚精竭虑并在该书出版之前撒手人寰。这部1260页之巨的著作最终于195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今天这部著作已被认为是经济思想史的权威之作。

辩论的结局: “米塞斯是正确的!”

苏联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联盟的剧变事实上结束了一个世纪之久的两种对立的经济体系之争。事实证明熊彼特对资本主义未来的悲观预测为时过早而对社会主义的能力过分乐观。

熊彼特在哈佛的一名学生罗伯特·海尔布伦纳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并在早年胡思乱想着马克思主义。不久他写著了《世俗事务的哲学家》(1999[1953]), 该书成为前所未有地流行的经济史。在熊彼特和阿道夫·洛厄(Adolph Lowe)的影响下, 海尔布伦纳加入了经济学界的其他人, 并得出结论说米塞斯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能够运行。如前所述, 他坚持该立场数十年。

20世纪80年代后期, 在柏林墙拆除和苏联解体不久前, 海尔布伦纳开始反思他的观点。海尔布伦纳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发表了一篇令人震惊的好文章, 题为《资本主义的胜利》。他写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长期论战已经结束, 并且资本主义获得了胜利。他继续说, “苏联、中国和东欧给我们提供了最清晰而适当的证据证明在管理人类的物质事务方面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令人满意: 无论市场在分配商品时多么不公平或多不负责任, 它都比计划经济下排起的长队要好得多; 无论商业主义文化多么盲目, 它也比国家规定的道德标准更吸引人; 并且无论商业文明的意识形态多么具有欺骗性, 它也比社

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可信”（Heilbroner 1989：98）。

东欧剧变后，他在一篇后续文章中甚至更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是这个世纪的一场悲剧……无疑这些剧变及解体表明其作为一种明晰的经济模式的终结。”进而，基于当代的几桩大事件，我们不得不重新考察兰格和米塞斯的辩论。“当然，结果是米塞斯是正确的，”海尔布伦纳宣称（1990：91-92）。《异议》和其它社会主义出版物中的反应表明，这些文章令海尔布伦纳的社会主义同事生厌，但是他的本质转变发出了一种范式更迭的信号。

新的经验工作证实米塞斯的论点

苏联的没落导致对共产主义经济史的一次重要修正。历史学家们通过研究曾经秘藏于莫斯科的机密克格勃文件证实了米塞斯对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否定观点。希莉亚·费兹派区克（Sheila Fitzpatrick）在她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的作品《日日斯大林主义（Everyday Stalinism）》中，反对西德尼和比阿特里斯·韦伯夫妇以及肖伯纳所支持的传统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体制是一种辉煌的“新文明”。相反，费兹派区克写到，“取消市场后，食物、衣服以及所有消费商品短缺都成为通病。农民逃离集体主义村庄，主要城市都面临严重的住房危机，一个个家庭几十年被塞入公社公寓中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这个世界充斥着贫穷、过分拥挤、无穷尽的长队和破裂的家庭，而在这样的世界里，当权者对未来社会主义富庶的承诺仍然空洞地回响……政府的官僚主义经常将每日的生活都变成了梦魇”（Fitzpatrick 1999：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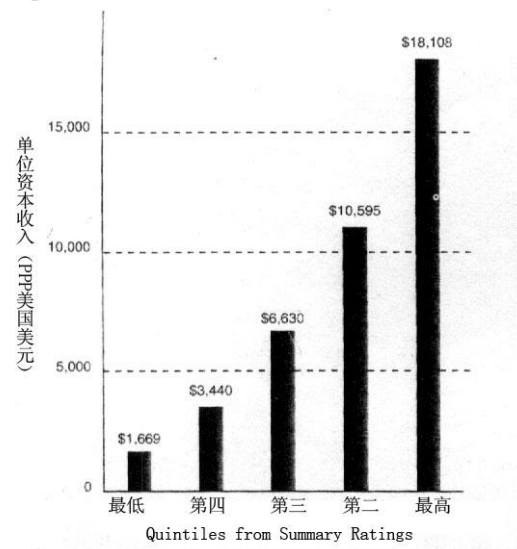


图16.1

经济自由和单位资本收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1995-97年

来源：Gwartney and Lawson (2000:15). 经Fraser 研究院允许翻印。

经济自由的国家增长更快

另外，最近对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其自由程度的比较研究也证明了米塞斯论点的正确。根据詹姆斯·格沃特尼（James Gwartney）（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及其同事们的工作，可知经济最自由的国家享受着最高的生活水准。第25页图1.2所描绘的经济自由图形反映了这些发现。（见上面的图16.1。）

经济史中重要的一章就这样结束了。去世已久的米塞斯终于得到了平反。这里引用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之语：“科学是在一幕幕葬礼中前进的”。

随着我们进入21世纪，这种转变之风吹遍大地。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时代》杂志中所说的，“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一个控制绝大部分经济并通过财富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政治经济体系，那么我敢很确定地说，社会主义在下一代的任何时候回归的可能性趋于零”（2000：111）。

发展经济学的转变之风

由亲政府行为主义向亲市场解决方案的转变在发展经济学中也有所体现，但那是20世

纪末的事。二战后，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穷国的命运，这些穷国被称为第三世界或者正式一些，被称为欠发达国家（LDCs）。通常来讲，它们都经历着低教育率、高失业、快速的人口增长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其中许多国家还遭受着高通货膨胀率、短缺、黑市和资本外逃。这些穷国如何参与到亚当·斯密普遍富裕的目标中来呢？

20世纪3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前途未卜，而战后马歇尔计划表明政府援助的功效，新的正统方式变成国家主导的增长。诸如世界银行和发展联盟的国际发展组织相继建立并帮助发展中国家。

1960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写下了他的“非共产主义宣言”《经济成长的阶段》，该书很快就成为第三世界计划的标准载体。罗斯托认为持续经济增长的“起飞”期的先决条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凯恩斯主义方法的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中有所体现，该模型是根据罗伊·哈罗德和埃夫塞·多马命名的（Eltis 1987）。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只是一国资本—产出比率的函数，因此固定资本的增长将带来利润增加和经济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型几乎只强调了对作为增长关键的资本存量扩展和技术的需求——或来自国内储蓄、国际援助、私人投资、政府支出的增加，或来自通货膨胀。效率、激励和贸易被忽略了。他们的模型实际上忽略了应用资本的作用和新想法创造财富的企业家的作用。因为发展中国家遭受“贫穷的恶性循环”并不能由内部产生增长，所以罗斯托和其他发展经济学家强调国家通过大量的投资项目来打破恶性循环的必要性。

鲍尔（P. T. Bauer）：反对的声音

发展正统理论的一个热情批评者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鲍尔。战后时期，彼得·鲍尔（Peter Bauer）开始了反对外国援助、全面中央计划和国有化的孤立之战。他指出像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家驳斥了“贫穷的恶性循环”的论点，他补充说，“纵观历史，无数的个人、家庭、团体、社会和国家——在西方和在第三世界的——都曾在没有外部捐赠的条件下从贫穷走向了繁荣”（Dorn 1998: 27）。他否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身进步是以穷国为代价的，并反对外国投资是第三世界发展的关键因素。依据鲍尔，国家计划不是有益的增长计划而是权力向一个政治精英手里的集中，这势必导致腐败和权力滥用。

他在一篇经典文章中写到了一个二战后困苦不堪的亚洲地区的事情。它几乎没有自然资源，不得不进口石油和原材料，甚至淡水也需要进口。它面临着大量迁入移民并最终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它的贸易伙伴都与它相距千里之遥。“你会认为这个地区除非得到大量的外部捐赠否则一定会陷入绝境，”鲍尔评论到。然而，香港这个小殖民地由于其自由放任的管理走向了繁荣，并且今天它已成为太平洋地区第二繁荣的地区。

（Bauer 1981: 185-90）

自从苏联中央计划模式崩溃以来，罗斯托的论点越来越受到怀疑，而鲍尔的非正统观点已取得胜利。甚至罗斯托最近也承认，“鲍尔的立场明显具有发人深省的正确的洞察力”（1990: 380）。最近世界银行已转向鲍尔一方。1993年一项关于亚洲四小龙和东亚经济奇迹的研究总结到，“每个国家或地区的高速增长都主要源于采用一系列普遍的亲市场经济政策，这带来了资源的大量积累和更好地配置”（世界银行1993: vi）。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明显倾向市场方面。新近，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总结到[外国]援助将挤出国民储蓄”（Schmidt-Hebbel and Serven 1999: 17-18）。

对外国援助的批评

世界银行从始建至今已将5000亿美元的大部分通过贷款、拨款和援助形式转给各国政府，却经常忽视贫困的个体。彼得·鲍尔（现在是鲍尔男爵）不是这项政策的唯一批评者。穆罕默德·犹尼斯（Muhammed Yunus）就是用私人企业方案来解决第三世界贫困的一个著名支持者，他原是世界上穷的国家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Chittagong University）的教授。1983年犹尼斯建立乡村银行（Grameen Bank）为贫穷的企业家提供急需的小额信用。今天，数以百计的私人小额借贷机构正帮助人们摆脱贫穷。

犹尼斯在他的《穷人的银行家》一书中，谴责世界银行说：“我们乡村银行从未想过要接受世界银行的基金，因为我们不喜欢银行指挥商业的方式。”他也不喜欢外国援助并说到：“多数富国把国外援助预算主要用于雇用本国劳动力并出售他们自己的商品，其次考虑的才是减少贫困……援助基金造就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很快就开始腐败和低效，造成巨额损失……援助资金还是用于扩张政府支出，并经常与市场经济的利益背道而驰……外

国援助成为强国的一种施舍，然而穷国更穷了”（1999：145-56）。

在得知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后，犹尼斯的言论更加令人惊异。但是当他在范德贝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他亲眼看到“市场[在美国]是如何解放个性的。”“我确实相信了全球性自由市场经济的力量和应用资本主义工具……我也相信提供失业救济不是对付贫困的最好方式”。因为相信“所有人都是潜在的企业家，”犹尼斯确信可以通过向穷人贷放资本，使其进入有利可图商业来消除贫困，而光给穷人政府救济品或进行人口控制则不行（1999：203-05）。

他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同事称之为资本主义阴谋。“你正在做的”，一位共产主义者教授告诉犹尼斯，“是给穷人少量鸦片……他们的革命热情会冷却。因此，乡村银行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敌人”（Yunus 1999：203-05）。

私有化的故事

随着东方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首要问题变成如何废除社会主义国家和重建资本主义。口号变成了非国有化、私有化和撤销管制。

十年前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就已经开始推动私有化。但是奥地利出生的管理学权威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在《中断的年代》中恰如其分名为“政府的弊病”一章中写到了“重新私有化（reprivatization）”（Drucker 1969：234）。理性基金会主席小罗伯特·普尔（Robert Poole, Jr.）将这个术语简称为“私有化”。

德鲁克心目中的私有化是怎么样的呢？1969年他写到事实证明政府只能做好两件事——发动战争和通货膨胀（他没提到收税）。除此之外，政府是一个悲惨的失败。当经营商业、提供公共服务、为退休人员支付养老金或者为贫困人员提供适当的福利时，政府都是“惨败的”。简言之，德鲁克总结到，“现代政府变得难以管理”（Drucker 1969：220）。

为了解决社会不断增多的问题，德鲁克支持求助于商业和私人企业，因为他们在管理变革、创新和满足消费者需要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他说，更重要的是商业是唯一承担风险并能摒弃无效转向有效的组织机构。另一方面，政府则是保守的，因此会难以废止那些成本过高或毫无结果的服务。换言之，经济运行不关政府的事。

德鲁克要传递的一个主要讯息是在保持经济稳定、社会公平和改善生活水准方面，私人商业——而不是政府——更应作为“代表性的社会机构”。他特别指出大公司——大跨国公司——最适合承担社会责任，诸如提供就业保障、培训和教育机会、免费医疗和养老金计划以及其它社会福利。德鲁克将这种新的社会工业秩序称为唯一的“自由非革命方式”（1969：236-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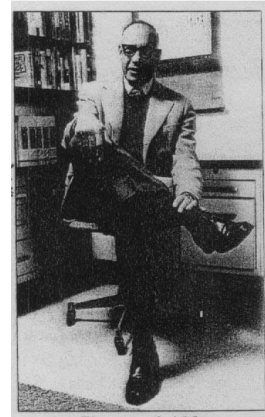
德鲁克的先见之明在于他指出在建立自由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商业将起主导作用。事实证明私人企业比政府能更好的提供社会服务和运行经济。个人养老金制度、健康医疗保险、社会救济和企业福利计划经常比政府福利项目更广泛。

德鲁克意识到时代的征兆，他支持社会在提供社会经济和社会需要时更多地依靠私人企业，而不是政府。正如以色列经济学家施莫·麦图（Shlomo Maital）所言，“大量的个体商业——小的、中等的和大的——的健康和财富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和财富。他们成功时，将设法为更多的人创造财富、收入和工作……是商业创造财富，而不是国家或政府。是商业决定我们的贫富”（Maital 1994：6）。

私有化：从梦想变为现实

1969年彼得·德鲁克第一次写到私有化时，那还只是个梦想。其后，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领导下的英国开始出售国有工业，1979年首次出售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私有化的真正先驱是1984年英国电信（BT）的出售。百万计的英国居民被鼓励购买低价股票，当股票价格随着英国电信变为大众所有而飞涨时，公众对私有化的支持率显著上升。并且，电讯服务显著改善。私有化之前，英国电讯系统已过时。获得一部新电话要花费数月之久，而且许多有故障的公用电话数月无人修理。当英国电信在伦敦股票交易所公开上市后，这一切很快就改变了。²

从那时起，私有化随着工人和消费者成为持股人，政府税收的增多和企业更为有利可图而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随着英国计划的成功，私有化已成为一项全面展开的全球性事业。依据《全球私有化》杂志，估计全世界有75,000个大中型企业将被处理，产生超过7350亿美元的资金。天下所有东西都被国家出售了：石油公司公共事业、通讯公司、银行、邮局、旅店、饭店、机场、铁路、矿山、垃圾站、监狱、消防局、出租车服务、农场、超市、教堂甚至电影院。包括印度、俄罗斯、中国、越南、墨西哥和秘鲁在内的几乎每个大洲的每个国家都已私有化了一些或多数国有行业。



社会保障的私有化

德鲁克讨论了私人企业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天然优势。不久，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将这一原理应用于社会保障、全民医疗和公共教育，而这些部门传统上是由政府起支配作用的。

社会保障的私有化在美国之外已取得明显进展。拉美国家都遵循智利这个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影响的模式。20世纪80年代初，智利从国家经营的“只要退休就支付（pay-as-you-go）”的养老金体系转变为私有化的工人个人退休计划。

事实证明，智利的世界上第一个私有化养老金体系在深化国家资本市场、提高储蓄率和刺激经济增长（1982年以来平均每年5.4%）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今天，93%的智利劳动力被纳入20个独立的私人养老金计划之中。世界各国的政府养老金专家都到智利去考察私人部门如何建立起比政府的更好的社会退休计划。

其它拉美国家和欧洲国家已尝试建立私人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在美国建立那样一个体系的努力却受到阻碍，原因可能是美国政府尚未面临智利1982年曾面临的社会保障体系临近崩溃的局面。正如德鲁克指出的，政府不擅长治本或放弃运行糟糕的计划。

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兴盛

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突破性的学术工作加上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在全世界带来了新亲市场（market-friendly）学派和新议程的日趋成熟。这包括供应学派经济学家、公共选择理论家、新古典经济学家和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倡导者们。他们为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带来了新的生命。第十七章将讲述他们的传奇故事。

第十七章 斯密博士走向华盛顿：市场经济的凯旋

本章音乐选段：莫代斯特·穆索尔斯基（Modest Moussorgsky），“基辅大门”，
选自展览会之画

从舆论的潮流来判断，我们赢得了这次思想之战。每个人——左派或右派——都谈论着市场、私有财产、竞争和有限政府的优点。

——米尔顿·弗里德曼（1998：582）

战后时期，凯恩斯的政府管制经济理论看起来无懈可击。但是半个世纪过后，凯恩斯被推翻，而出类拔萃的是哈耶克这个自由市场的坚定倡导者。

——丹尼尔·叶尔金和约瑟夫·斯坦尼斯劳¹（1998：14-15）

米尔顿·弗里德曼自从在芝加哥大学上第一堂雅各布·维纳讲授的经济学开始，便对完善的经济学理论的“连贯性和逻辑的整体性”印象深刻。“无疑那堂课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次心智体验”，他说（Breit and Spencer 1982：83）。

弗里德曼的长期愿望就是把经济学综合成一个连贯的、逻辑的整体，一套“一页纸就能写下”简洁普遍的原理²（Breit and Spencer 1982：91）。他总是讨厌各学派之间的支离破碎及争吵不休，而这一切从马克思把自己从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学派分离时便开始不断发生。1974年夏，弗里德曼在佛蒙特州的避暑别墅里度假时，在附近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非正式地谈到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他坦率地告诉听众，“不存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只有好经济学和坏经济学”³（Dolan 1976：4）。他的观点是任何源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他特别指出了哈耶克的贡献）的有用概念都应该纳入主流经济学理论当中。1982年，他在供给学派经济学的一次研讨会上发表了相同的观点。“我不是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我不是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我是一位经济学家”⁴（Friedman 1982：53）。

弗里德曼在其漫长且富有成果的事业的尾声，开始见证在经济学中广泛传播的一致意见，这是在他自己的帮助下正式化的一整套信念。的确，尽管不同理论之间仍争论不休，但是基本观念最终已得到肃清。

新古典模型得到重建

首先且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经济学家认识到新古典模型是经济分析的基石。在微观经济学中，这意味着包括供给和需求、收益和损失的原理。这就是在基础广泛的竞争条件下，会产生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一个自我管制的经济体。在竞争条件下，人类自我决断的自然倾向将带来社会的幸福。它表明“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因而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进行统计分析甚至科学预测。

在宏观经济学中，它意味着包括讲授节俭的古典模型、一种稳定的货币政策、财政责任、自由贸易、广泛传播的经济和政治自由，以及服务于公平体系的一套稳定的法规。

的确，诸如财政的、宗教的和司法系统的制度在微观经济决策过程和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制度的作用是双向的。制度若是强化上述原理，则其作用是正面的；制度若是阻碍并扭曲经济增长和经济自由，则其作用是负面的。

所有这些基本原理在200年前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965[1776]）中都已经建立起来了。

这些是献给你的，罗宾逊夫人：
有男女平等主义经济学(Feminist Economics)吗？

琼·罗宾逊是一位极富争议但相当杰出的经济学家，尽管我与她的观点迥然不同，但是我们私交甚好。

——米尔顿·弗里德曼（1998：245）



照片17.1

琼·V·罗宾逊（1903-83）
V代表瓦奥莱特（猛烈）——
“不屈不挠的、坚韧的、吸引人的、不遵循社会常规的人。”
感谢马克·布劳格提供

马克·布劳格的《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书着重介绍了二百位经济学家，其中剑桥教授琼·罗宾逊被公认为“在经济理论中取得卓越成果的唯一女性”（1985：207）。布劳格特别指出她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与爱德华·张伯伦的著作《垄断竞争理论》（1933）共同奠定了现代新古典微观企业理论的基础。因为这一成就，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她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但遗憾的是在1975年（国际妇女年），她却因为极端的政治观点而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虽然她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她一直为中国、北朝鲜和古巴的共产主义体制辩护，公开宣扬既让朋友也让敌人难为的观点。

琼·罗宾逊（1903-83）出生于英国的萨里，入读剑桥大学，并于1926年与经济学家E. A. G. 罗宾逊（后来的奥斯汀·罗宾逊教授阁下）结婚。但是她明显比丈夫出色。作为20世纪30年代“剑桥小组”的一位杰出成员，她推进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事业。与二战后逐渐转向古典经济学的多数经济学家不同，琼·罗宾逊变得越来越非正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她同皮耶罗·斯拉法及其他人一起发起“剑桥之争”，对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大规模攻击。她觉得她找到了经济学理论的致命缺陷，特别是关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品理论。当经济学领域内许多人都反对她煽动性的“后凯恩斯主义”观点时，她在暮年变得更加激进和敌对，写了大量关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经济学异端学说”的书和文章。（她的《文集》整整五卷。）她在1983年遭受一次中风之后六个月亡于一所剑桥医院。

男女平等主义经济学

许多经济学家注意到在经济领域内男人占主导地位。现在在大学生多数是女性，而主修经济学的女性比例仍然相当低。在马克·布劳格的《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书中的二百位经济学家之中只有三位女性上榜。多萝西·兰登姆·汤姆森（Dorothy Lamden Thomson）将这个低比例归咎于经济中过于注重高等数学，而这正是许多女性不感兴趣之处（Thomson 1973：135-36）。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过去的名字是唐纳德（Donald），甚至进一步断言今天正式的数学建模本质上是男性化的。“男孩子们的游戏对我来说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她在一次变性手术之后宣称。依据迈克洛斯基，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现在是时候从他们的“玩具沙盒”里拿走“审慎”而加入“勇气、自制、公正和爱”了。她还评论到，“如果你曾读过亚当·斯密另外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你会发现五种美德的一种结合方式，而《国富论》中的谨慎也被放在了适当的位置上”（McCloskey 1998：191-92）。

为了对抗男性主导经济学的趋势，几位女经济学家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立了男女平等经济学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eminist Economics）并开始出版《男女平等经济学》这份聚焦经济学中女性问题的专业期刊。我注意到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合著著名的《美国货币史》的安娜·施瓦茨未列入许多投稿者之中。我问施瓦茨是否存在男女平等经济学那样的东西。她回答说：“我不隶属于那种声称关于女性的议题与关于男性的议题的经济学内容不同的团体”（2000年6月7日的私人信件）。

哈佛令人震惊的反革命

哈佛的格雷戈里·曼昆（Gregory Mankiw）的近作最好地表明了这种向市场原理和古典模型的回归。在他20世纪90年代初写的教材《宏观经济学》中，曼昆从古典模型开始谈起而结束于短期凯恩斯主义模型。这种与标准的萨缪尔森教育理念相悖的方式震惊了整个经济学界。这是一种英明的、革命性的——更确切地说是反革命性的——做法，也是基本哲学转变的反映。曼昆在序言中为他的新方法辩白，写道“在凯恩斯革命的影响下，太多经济学家忘记古典经济学家为许多基本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答案”（Mankiw 1994：前言）。

这个声明出自曼昆之口更令人震惊，因为曼昆自认为是新凯恩斯主义者，还给他的狗取名为凯恩斯！

曼昆将古典经济学称为“长期的真实经济”，他准确解释了政府支出增加的结果

——不是乘数作用，而是“挤出”私人资本。“政府购买的增加必将伴随着与其相等的[私人]投资下降。……政府借款减少国家储蓄”（Mankiw 1994: 62）。

萨缪尔森和他的同事们在以往的教科书中强调资本主义周期性本质和如何稳定经济。与此相反，曼昆在他的《宏观经济学》中先讨论经济增长问题。曼昆应用索洛增长模型得出强烈的赞同储蓄的结论。依此有，“储蓄率是稳态资本存量的重要决定因素。如果储蓄率高，经济中将会有大的资本存量和高水平的产出。如果储蓄率低，则经济中将会有小的资本存量和低水平的产出”（1994: 62）。更多储蓄的结果是什么？“储蓄率的提高会使经济增长加速直至达到新的稳态，”尽管报酬递减律表明“它不会使经济永久保持高速增长”（1994: 62）。曼昆完全不接受节俭悖论的观点，他赞许地描述那些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的国家，甚至包括日本和德国战后增长奇迹的案例研究（这些事例恰是萨缪尔森教科书所忽略的）。因而曼昆支持美国旨在提高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的政策，包括社会保障从“只要退休就支付”体系转变成全额基金计划的可能性，虽然他从未直接讨论过私有化（1994: 103-04）。

失业是曼昆以非凯恩斯主义方式论及的另一话题。失业的成因是什么？依据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曼昆指出失业保险和类似的劳动法规减低了对失业者找工作的激励。他举出实例证明组织工会和采用最低工资法案事实上增加了失业率。最后，他列举对亨利·福特的著名5美元工作日的案例研究作为更高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例子。

他赞同地引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货币理论的言论：“通货膨胀始终是货币现象。”曼昆应用大量实例，包括德国内战时期恶性通货膨胀，来证实通货膨胀的社会代价（1994: 161-69）。

理性预期和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冲击

曼昆和其他教科书著者们深受以约翰·穆斯(John Muth)、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和小罗伯特·卢卡斯（1995年获诺贝尔奖）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的影响。大多数经济学家现已认识到联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常在经济中被预料到，使得行动主义的政策低效，甚至可能起反作用。例如，过去赤字支出或一个“放松银根”政策可能激励经济行为，但是当个人预期到这些政策时，经济可能会因私人投资被挤出或利率上升而停滞不前。理性预期理论事实上已被有效应用于包括政府政策和金融市场在内诸多领域（Sargent 1987）。

曼昆在其教科书的后半部分引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标准工具，用以处理“短期”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乘数和加速数以及收入——支出模型。但是它们几乎以事后思考的形式出现，并多数时候与今天动态且充分就业的经济不相关。

如果说曼昆的教科书中存在一个消极的方面，那就是他对减税对经济的影响的分析。在曼昆的模型中，减税与赤字支出有相同的结果——减税通过增加消费“挤出投资并提高利率”（1994: 64）。他指出里根减税增加了赤字，从而提高了利率并减少了国民储蓄。然而他忽略了里根执政时期税收收入每年都有所增加的事实，而供给学派预测到这一点。供给学派是由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保罗·克雷戈·罗伯特（Paul Craig Roberts）、马丁·安迪尔森（Martin Anderson）和阿瑟·拉弗（Arthur B. Laffer）领导的，他们猛烈批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面政策。该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执政时期很流行，他们支持减税、放松管制和自由贸易，而反对赤字支出和放松银根。依据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们，政府应该鼓励生产和供给而不是消费和需求。

此外，他们不同意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宣称的政府支出比减税更能有效地刺激经济。他们说高额累进税是工作、投资和储蓄的强烈遏制因素。正如保罗·克雷戈·罗伯特所言：

供应经济学给财政政策带来了新的前景。供应学派不注重对于支出的影响而证明了税率对商品和劳务供给有直接影响。降低税率意味着对工作、储蓄、承担风险和投资的更强的激励。因为人们追逐更高的税后收益或者更大的盈利能力，收入增加且税基扩大，因此财政部损失的一部分得到了弥补。储蓄率也增长了，为政府和私人借贷提供更多资金（1984: 25）。

税率和拉弗曲线

供应学派利用拉弗曲线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即削减边际税率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并实际上增加税收收入。拉弗曲线（见图17.1）表明税率和税收收入之间的理论关系。该曲线是由原芝加哥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阿瑟·拉弗创造的，据说这条著名的曲线是他20世纪70年代末在首府华盛顿一家餐馆的餐巾上画的，目的是证明他的观点，在一定条件下，削减税率能够增加税收收入。

依据拉弗曲线，在税率不太高时提高税率将会给政府形成更多的收入。但是一旦税率超过X，再提高税率实际上会减少税收收入，因为过高的税率阻碍努力工作并且引发了避税甚至是非法逃税。图17.1中，如果税率达到禁区，那么减税（ t_a 到 t_b ）能够增加税收收入（从 r_a 到 r_b ）。供应学派指出美国在1978年和1996年削减资本收益税使得美国财政部的资本收益税收收入增加。

大多数凯恩斯主义教科书的著者对供给学派的论点持警惕态度，但是1999年的诺贝尔奖颁给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一位著名的供给经济学家）可能有助于转变多数教科书中对供给学派和拉弗曲线的歧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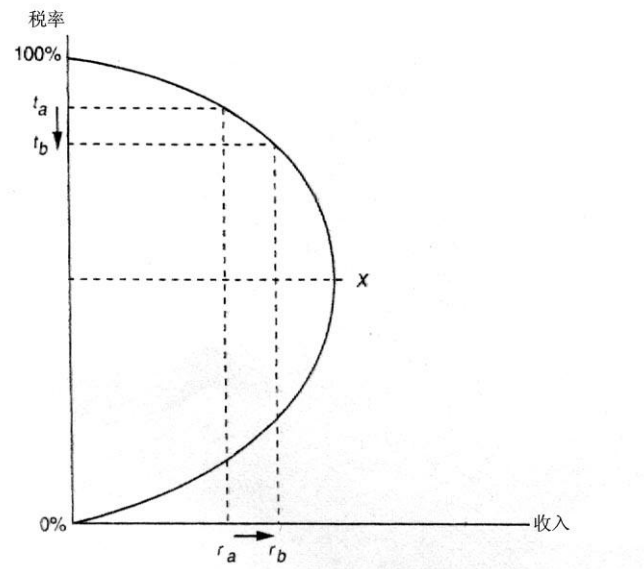


图17.1 拉弗曲线
减少税率能够增加税收收入。

凯恩斯的“通”论降级为“个别”事例

曼昆的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非常成功，以致1992年他被提前预支110万美元写“下一本萨缪尔森”——一部初级教科书。这本教科书1997年一出版便引起轰动。像他的中级教科书一样，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几乎全部篇章都留给了古典经济学，而把凯恩斯主义模型扔在最末章。令人惊奇的是，曼昆的教科书对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分析多数未予提及：没有消费函数、没有凯恩斯相交线、没有储蓄倾向、没有节俭悖论，并且只是简短地提了一下乘数。实质上，在曼昆那里古典模型变成了“通”论而凯恩斯主义模型则变成了一个“个别”事例——这恰与凯恩斯的论点相反。

因而，我们看到经济学中沧海桑田的变化，这个变化源于哪里？剑桥、麻省，这正是凯恩斯革命在美国的发源地。

萨缪尔森：废黜财政政策！

甚至连萨缪尔森也不得不在其著名教科书的最近几版中转变他的焦点，这可能部分源于其合著者比尔·诺德豪斯的影响。萨缪尔森可能已经转变自己的思想，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充分就业是常态而不是例外，所以即便是在凯恩斯主义模型下，古典经济学也应该有效。

萨缪尔森教科书的五十周年版（1998）表现的很显著。虽然他不愿把古典模型放在前面，但是在内容上，他的态度已有明显改变。例如：他把原来反储蓄的“节俭悖论”替换为对美国低储蓄率的感叹，并将部分原因归咎为社会保障和重税（1998：422-24）。赤字支出这个前几版中一直被建议的政策已变成令人厌恶的政策。依据萨缪尔森新版教科书，“大量的公共债务可能阻碍长期的经济增长”（652页）。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萨缪尔森放弃了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稳定器的观点。他的十六版教科书还用彩色字体强调了 this 声明：“在美国，财政政策已不再是稳定经济的主要工具了。在可预见的将来，稳定经济的任务将主要由联邦储备体系的货币政策去完成”（655页）。

简言之，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们最初可能输掉了这场争论，但是他们看来赢得了这场斗争。“趋于市场方向定位的增长”，萨缪尔森

总结到,“伴随着广泛存在的精简政府、减少管制和降低税率的期望”(1998: 735)。萨缪尔森对这个结果感到气馁,他以一个酸溜溜的注释结束他的五十周年版著作,在这个注释中他把新的全球经济称为“残忍的”并定性为不平等“增长”和“严酷”的竞争环境。但是事实——市场经济和古典经济的胜利——似乎不可逆转。代表着自由市场经济的两个学派(芝加哥学派和维也纳学派)的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联合起来左右开攻终于扭转了思想潮流(Yergin and Stanislaw 1998: 98)。

亲市场教科书的增多

随着凯恩斯主义教科书的凯恩斯主义色彩不断淡化,强烈的自由市场倾向的教科书变得更加流行。包括保罗·海恩(Paul Heyne)的《经济思维方法》(第9版)在内的流行的市场倾向教科书甚至剔除了总供给总需求(AS/AD)图形;罗杰·理若·米勒(Roger Leroy Miller)的《当代经济学》(第10版)经常位于把自由市场的微观原理应用于现实世界例证的前列;詹姆斯·格瓦特尼(James Gwartney)和理查德·斯特鲁普(Richard Stroup)的《经济学:公共选择和私人选择》(第9版)中强调公共选择经济学和私有化。

罗伊·拉芬(Roy J Ruffin)和保罗·格雷戈里(Paul N. Gregory)(都在休斯敦大学工作)的第6版《经济学原理》(1997)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作者在全书中关注四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经济学中划时代的时刻”):第一,工业革命和亚当·斯密;第二,社会主义浮沉,伴随着对卡尔·马克思、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讨论;第三,大萧条,以及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贡献;第四,全球化和大卫·李嘉图。他们也给私有化、公共选择、金本位制及欧洲和亚洲的经济成功事例留下一席之地。先前的版本中未提及米塞斯和哈耶克。

马奎特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的吉恩·斯麦利(Gene Smiley)教授所写的一本经济史教科书反映了这种公平展示每个方面的新鲜的平等方法。例如,《20世纪美国经济》(1994)的第6-8章展示了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派对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1929-45年的不同观点。

取代凯恩斯主义AS/AD模型

虽然经济学教学改进取得了许多进步,但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仍然存在——什么模型应该取代现在还在使用的有缺陷的凯恩斯“总供给总需求”模型?如前所述,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将AS/AD模型放到教科书的最后,仅仅将其作为经济周期的“短期”解释来讨论。尽管那样,更多的经济学家发现了它的缺点。自称为新凯恩斯主义者的大卫·科兰德尔(David Colander)(米德尔布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最近说,“AS/AD模型……有严重缺陷……是形式最差的模型——晦涩而非清晰的一个模型”(1995: 169)。

为了理解AS/AD模型的一些相关问题,我们在图17.2中复制了AS/AD模型。

AS/AD图形的一个缺陷是他表明了凯恩斯主义论点,自由市场不能确保充分就业,即经济可能在非充分就业水平之下达到均衡。但是当劳动力市场非均衡时经济是如何达到一般均衡的呢?显然,AS/AD模型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点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现在也承认。

第二个缺陷是该图形支持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处方,增加政府支出能够激励经济行为并推动AD曲线右移直至实现充分就业,该处AS曲线是垂直的。AS/AD模型还试图将通货膨胀式衰退解释为由“供给冲击”引起,这导致了价格上升和失业同时出现。

然而该模型没有很好地解释在充分就业条件下(AS曲线垂直处)经济会怎样。该模型表明更大的赤字支出或者扩张的货币供给将拉动价格上升而不会影响真实产出。然而对许多经历通货膨胀的国家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不只是拉升价格上升,而且还导致经济扭曲和真实产出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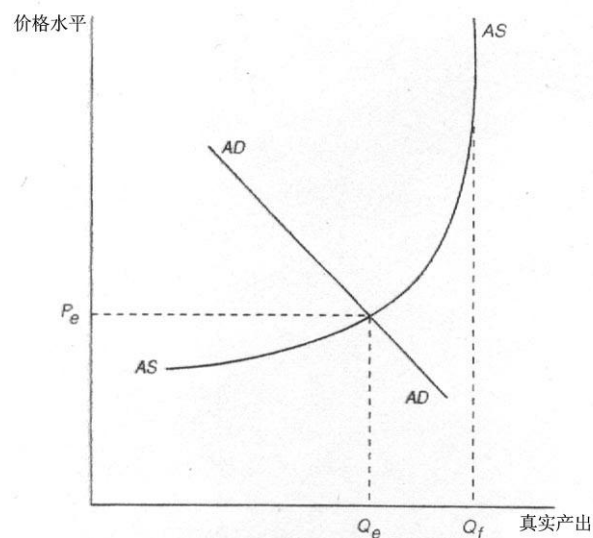


图17.2 非充分就业水平之下的总供给（AS）和总需求（AD）

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模型

简言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呼吁抛弃凯恩斯主义的AS/AD模型。但是能够代替它的是什么呢？一个强有力的、被人忽视的工具就是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模型，复制在图17.3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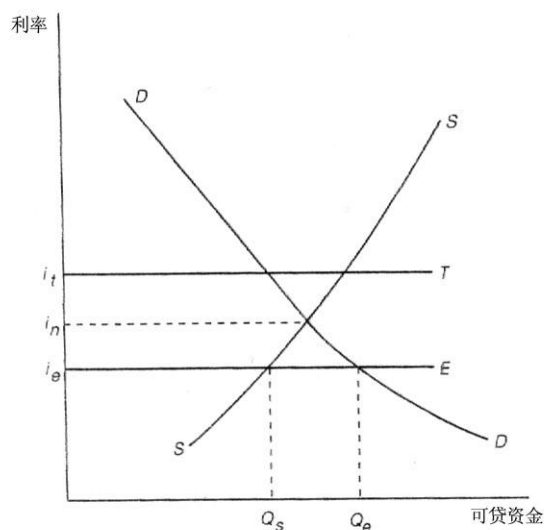


图17.3 维克塞尔的自然率模型

在第十二章中我们讨论了这个货币宏观模型。维克塞尔模型关注时间和利率在经济中的作用，这是关于今天全球经济中基准利率的主题。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正确地写到，“时间要素……是几乎每个经济问题的主要难点的核心”（Marshall 1920: vii）。

维克塞尔模型表明信用市场上的一般均衡将在储蓄供给等于信用需求处产生，这是基于公众对货币的时间偏好和自然利率（ i_n ）。它很好地描述了宏观非均衡和当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供给曲线（ SS ）或需求曲线（ DD ）移离“自然”利率水平时经济周期是如何产生的。例如，维克塞尔模型——与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哈耶克）的跨期经济模型结合——表明了“放松银根”政策的后果。正如直线 E 所示，一项放松银根政策暂时将市场利率降至自然利率之下，以至政府信用（ $Q_e - Q_s$ ）补偿了私人储蓄（ Q_s ）的不足。其结果是资本资产行业的虚假繁荣。

维克塞尔——米塞斯模型还描绘了“收缩银根”的情况，直线 T 处市场利率高于自然

利率。这里我们看到储蓄是如何超过投资的，这是一个产生衰退或萧条的凯恩斯主义情形。

有缺陷的凯恩斯主义AS/AD模型只研究了经济的“短期”波动，而维克塞尔——米塞斯货币模型一个更严密更精确的替代物。⁵正如罗杰·加里森（Roger Garrison）最近所言，“当代资本密集经济，特别是繁荣和萧条插曲的特有难题，也许能在基于资本的宏观经济学的协助下得到最好的分析，”这包括维克塞尔——米塞斯的非均衡模型（Garrison 2001: 8）。

从阴郁的科学到至高无上的科学：百花争艳

在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的带领下，在课堂和政府大厅重建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学，导致了其惊人泛滥地应用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经济学不再是象牙塔哲学的追求。在宏观方面，经济学家们已向政府发出清晰的信号——通货膨胀和赤字支出对经济有不利影响；高税率和过度管制降低工作热情；并且保护主义侵害消费者。市场原理还指出尽管有限，但政府确实具有积极作用——提供一个公平正义体制，强化财产权利，建立的包括公路、桥梁、供水和污物排放系统以及发电站等完善的基础设施。有限而合理的政府能够鼓励生机勃勃的商业氛围。

微观经济学原理已经远远扩展到传统范围的经济论题之外。经济学家们应用强大的新理论和统计工具，已经对政治、历史、法律、犯罪、种族关系、医药、运动、宗教、金融和环境主义产生了影响。它甚至改变了国库券的拍卖形式。经济学已被应用于如此广泛的其它领域，以至很难把握各种应用的成果。⁶长期在科罗拉多大学担任教授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肯尼斯·布尔丁（Kenneth E Boulding）（1919-93）一直认为经济学应该兼容并包且应该与其它学科共享其成果。现在他的梦想实现了。

在这一章中，我们着重列举新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几个实例。

加里·贝克尔：将经济学扩展到传统之外

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在将供给和需求原理应用于人类行为科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人类行为包括种族歧视、犯罪和婚姻。事实上，他称自己的书《生活的经济学》（1997）是为大众所作。他的许多案例研究中都包含了对市场原理常识的应用，诸如“对激励的反应行为”。例如，贝克尔曾应用激励原理证明通过严厉判刑、快速审讯和高定罪率来提高犯罪成本将会有效降低抢劫、偷盗或强奸等罪行的数目。“依据经济学方法，罪犯同每个人一样会对激励有所反应”（1997: 143）。贝克尔从需求曲线中获得的启发比专业领域内任何人都多。

贝克尔、罗纳德·科斯和其他芝加哥经济学家们工作的结果是一个全新的学科在经济学和法学中发展起来。枪支管理、毒品法、地主限制、**可比价值（同工同酬？）**规则和环境管制的金融后果是什么？芝加哥大学又一次走在分析民法和刑法的经济影响的过程的前列，其中理查德·蒲士纳法官（Richard Posner）和法学教授理查德·爱波斯坦（Richard Epstein）做出主要贡献。

贝克尔因其在非传统领域另辟蹊径的工作获得1992年诺贝尔奖，但是为人接受的道路仍然曲折。他首先指出，“这项工作多数经济学家都不接受，”并且来自批评者的攻击“有时非常恶毒”（Becker 1997: 3）。他工作的成果已经影响了公共政策，但仅仅是以延时和迂回的方式。

学术走向华尔街

象牙塔式经济学变成应用科学回报最高的领域之一是金融领域，特别是华尔街大为流行的股票指数基金和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然而这对学术却是一个长期升级的斗争。当时还是芝加哥大学师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研究生哈里·马克维茨（Harry Markowitz）在1952年3月那期《金融期刊》上写了一篇关于投资组合理论的文章。这是首次尝试准确量化股票和投资组合选择的**风险**。在他的方法之前，投资者当然知道多种股票和投资的广泛风险，但是未能用任何科学方法来测量风险。马克维茨和其他金融学教授开发了高级数学方法来量度风险，这些方法中包括标准差和**β**系数概念。

这种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带来了几个建议：（1）投资者能够通过分散他们的投资组合来提高收益并降低风险；（2）高报酬与高风险相关联，因此投资于成长型股票的人必须预期到波动；（3）突破市场的平均值在长期来讲是极端困难的，正如此，大多数投资者都应该投资于基础广泛的股票指数基金。

自由市场智囊团（**团体？**）的蔓延

我认为现在的自由市场的智囊团真是该死得多。

——米尔顿·弗里德曼（1995：37）

1948年，萨缪尔森第一版《经济学》问世时，只存在一个自由市场智囊团——里奥纳多·里德在纽约欧文顿（Irvington）建立的经济教育基金会。同时，有许多亲政府的团体存在，比如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和经济发展委员会。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建立蒙特沛尔林学会的一个原因就是传播经济自由观念并重建古典经济学的原理。接下来英国的胆小农民安东尼·费雪爵士（Sir Anthony Fisher）（1915-88）在伦敦建立了经济事务协会（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费雪醉心于建立自由市场基础的想法，所以他以在全球建立更多的团体为目的创建了一个组织：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会（Atlas Economic Research Foundation），该基金会本部在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Fairfax）。他的想法逐渐地实现了。今天全世界有数以百计的自由市场智囊团，并且许多团体以前都被认为是反市场的，比如布鲁金斯研究所和世界银行，都已经变成亲市场派。阿特拉斯基金会列出了350个组织，其中不但包括大名鼎鼎的传统基金会、卡图研究所和美国企业协会（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也包括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几十个自由市场智囊团。它们当中的许多团体都是极度缺乏资助，在预算极低的情况下存在的。

政府智囊团也不断在繁衍，比如密歇根州的麦金纳克中心(Mackinac Center)、佛罗里达州的詹姆斯·麦迪森研究所（James Madison Institute）、犹他州的萨瑟兰德协会（Sutherland Institute）和俄勒冈州的卡斯凯德政策协会(Cascade Policy Institute)。这些政府组织运行非常成功，并且由于专注于当地的问题而吸引了许多研究成果。

第三个概念就是著名的“有效市场”或“随机游走”理论，当它在20世纪50年代末首次被提出时引起一阵轰动。伯顿·麦吉尔（Burton Malkiel）（普林斯顿大学）在他的流行著作《漫步华尔街》中详细解释了这种奇怪的新学说：“它意味着股票价格的短期变动不可预测。投资咨询服务、收益预测和复杂图表都是无用的。……推向逻辑极端，它意味着一个蒙住眼睛的猴子往报纸的金融版面上投飞镖所选出的投资组合选择将会与一个专家认真选择的一样好”（1990：24）。

华尔街最初对这些象牙塔式的理论嗤之以鼻。然而，几年过后，研究证实了学术理论。几乎没有资本经营者和共同基金公司能持续地突破标准普尔500股票指数。结果是指数基金现已成为华尔街上出售数量最大的共同基金——并且因为哈里·马克维茨的开拓性工作，他于1990年（与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和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⁷

关于美国奴隶制的争议之作

芝加哥的另一位经济学家罗伯特·W·福格尔（Robert F. Fogel）与斯坦利·恩格曼（Stanley Engerman）合力将统计分析（被称为“计量史学（Cliometrics）”）应用于美国奴隶制问题。《**踌躇的年代（Time on the Cross）**》（1974）反驳如下观点，即奴隶制是一种无效率且无利可图的生产方式并且即使没有内战也会自行消失。福格尔和恩格曼通过艰辛的研究⁸，坚持认为奴隶制是非常有效率的，因此只有战争才能将其毁灭。尽管福格尔与一位黑人女性结婚，他仍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但他终于在1993年与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共获诺贝尔奖时感受了一些支持。

经济史学家揭开大萧条之谜

修正历史的另一个例子是西雅图大学的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对大萧条的一个新解释。本质上讲，这个重大事件中有三个不同的时期：大紧缩期（1929-32）、大持续期（1933-39）和大逃逸期（1940-46）。大萧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为什么持续那么长时间？二战真的恢复了繁荣吗？

正如我们在第十五章中了解到的，弗里德曼在回答第一个问题大萧条的成因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是自由企业而是政府控制的联邦储备系统把经济推到了1929-32年的边缘。

是什么造成了世界经济十年之久的停滞并进而导致古典经济学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范式转变？希格斯提供了一个经济学家们未曾仔细思考过的答案。希格斯在对20世纪30年代的深入研究中，关于该一时期私人投资的短缺。多数经济学家都认识到投资是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关键。希格斯指出新政（New Deal）提案如何一次又一次地严重阻碍私人投资、破坏急需的投资者和商业的信心。这些计划包括国家恢复法案、亲劳动法规、政府管制和增税（Higgs1997：561-90）。

希格斯在另一项明智的分析中攻击关于二战把我们的大萧条中挽救出来并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的正统观点。战争只给我们以表面上的恢复，因为每个人都就业了。然而实际上当美国人为他们的国家战斗并死亡时，私人消费和投资都在减少。真正繁荣的恢复——真实的大逃逸——直到战后才发生，当时多数的战时控制都被废除而且多数军用资源都回归民用生产。直到战后私人投资、商业信心和消费者支出才确实恢复到以前水平。（Higgs 1992：41-60）

忽略GDP数字中的政府（G）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二战期间发生了什么。消费C和投资I增长速度减慢，甚至在1940-45年间还在略有减少，之后在战后的1946-48年骤增。

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这些相对较新的发现，但是一个逐渐达成的共识表明“政府失败”应该对美国经济1930-45年的灾难性时期承担更多的责任。

“实验经济学”与垄断力量

最诱人的发展之一发生在“实验经济学”领域。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亚利桑那大学）站在这个令人兴奋的领域的最前沿。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与他的学生们开始做实验，允许每一方对一种产品出价，最后确定最终价格。一半的学生是购买者而另一半学生是销售者，每一方均有最低竞价。在出价过程中，学生们得出与标准竞争条件模型相似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这个结果在张伯伦——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模型中有惊人的应用。回顾第十三章，这个模型表明数量较少的销售者（或购买者）造成了竞争的不完美形式，抬高价格而降低产出。不完全竞争模型支持政府通过反托拉斯行动，打破大企业进而在行业中创造了更多的竞争。

然而，史密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他将他实验中的购买者和销售者减至很少时，结果是一样的——最终价格与存在大量购买者和消费者得到的竞争价格几乎相同。这暗示到当行业内仅剩少数几个大企业时，竞争未必减弱（Smith 1987：241-46）。

史密斯的发现证实了乔治·斯蒂格勒、哈里·约翰逊和其他芝加哥学派成员的工作，即使只有少数几个大企业，竞争仍然会很激烈。垄断企业倾向于保持竞争价格，因为其它大企业进入的威胁始终存在。世界“就像”是完全竞争的（Bhagwati 1998：411-12）。

公共财政和公共选择：从“市场失败”到“政府失败”

20世纪50、60年代期间，哈佛教授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的《公共财政理论与实践》(1958)很是流行而且事实上是一部毫无争议的教科书。马斯格雷夫发现政府必需的三个方向的政策：（1）配置——提供私人部门不能提供的公共物品；（2）分配——再分配财富并建立社会公平；（3）稳定——稳定本质波动的资本主义经济。



照片17.2

照片17.3

理查德·马斯格雷夫（1910-） 詹姆斯·M·布坎南（1919-）
旧公共财政学派对新公共选择学派。

感谢马克·布劳格和詹姆斯·布坎南提供

马斯格雷夫在1998年的辩论中为社会保险、累进税和公共部门的增加辩护，称其为“我们为文明付出的代价”（Buchanan and Musgrave 1999: 75）。提到今天对过度膨胀的政府的担忧时，马斯格雷夫写到，“我们的文明国度真的那么坏吗？……它们中很多应该算到账本的**贷方（权益方）**上。**驯服放肆的资本主义和注入社会责任以新政为开端**。……社会化资本主义体系……是它自身生存和建立一个良好社会所必需的”（1999: 228）。他还提到在20世纪在黑人 and 妇女身上得到的“巨大的收益”。

马斯格雷夫与詹姆斯·布坎南进行辩论，后者是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和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布坎南责备民主政治的“臃肿的”公共部门，“**而政府则面临无限的授权声明**”，其结果是“道德腐化”（Buchanan and Musgrave 1999: 222）。他主张通过完善宪法的规则和限制来压缩政府。他简明地描述了两者之间的区别：“马斯格雷夫相信政治家；我们不相信政治家”（1999: 88）。

谁赢得了争论？马斯格雷夫的观点仍流行于凯恩斯主义教科书之中，但是他的著作很少被引用并且早就不再付印。另一方面，詹姆斯·布坎南获得1986年⁹的诺贝尔奖并且公共选择理论成为多数学校的专业课程。甚至萨缪尔森在最近版本的教科书中也引用了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的公共选择著作。

公共选择的基础是什么？布坎南和图洛克在《同意的计算》(1962)中认为政治家与商人一样都以自我利益为动机行事。例如，他们为了连任而施行政策。但是在市场领域建立的激励和秩序经常在政府那里缺失。选民几乎没有激励去控制过多的立法者，而这些立法者于是更多地响应强大的利益集团。结果是，政府一方面补偿商业和其它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同时将成本高昂而不经济的管治和税收强加给普通公众。

布坎南和其他公共选择理论家建议采取一系列宪法规则来扭转被误导的公共部门使其运行得更可靠。这些建议包括：（1）严厉加强对立法者增税能力的限制，比如增税必须有绝大多数（三分之二）选票同意；（2）保护少数人权利，比如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和**全民投票复决**；（3）恢复地方政府的立法权和管治权以增加各政府之间的竞争。

未了之事：是缓慢发展的社会主义还是穷途末路的社会主义？

市场原理的应用近来的确向各个方向扩展，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的胜利还远未完成。许多胜利来自论文而非政策。尽管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观察到“大政府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工业化国家的政府规模已达到巨大的比例。（见图17.4。）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蒙特沛尔林学会第15届年会（1997）上评论到，“我们在修辞层面上收获了，但是在实践层面上损失了”（Friedman 1998:5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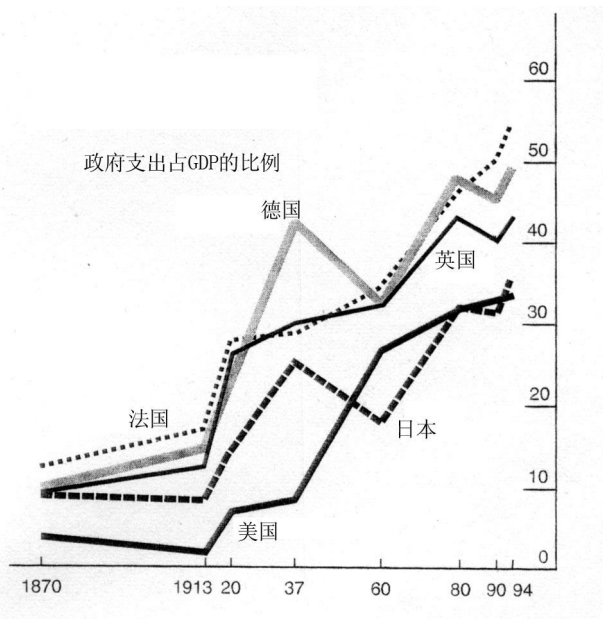


图17.4 五个工业化国家政府的扩大

来源：《经济学家》（1996年4月6日）。经允许翻印。

从正面来讲，政府规模似乎已经达到它们的上限了。在大多数国家里，私人部门目前比公共部门增长得快，因此从比例上看政府已开始缩减。但是如果经济形势转向而世界再一次遭受萧条或危机，则这种新的趋势可能不会持久。

尽管已实施私有化、放松管制和供应面的减税，政府仍然是侵扰的、税收饥渴的和官僚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为立法者提供了许多建议帮助他们通过将政府限制于其本质的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让我们看几个实例。

经济学和国民健康保障

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国民健康保障危机。例如，在国有的医药系统中，市场原理经常被忽视，结果造成医疗服务短缺且质量差。医疗保障方案和其它全民健康计划很典型地违背市场的自然报酬体系**和责任原理（principle of accountability）**。在许多情况中，国民健康计划下缺少创新和降低成本的激励，原因是多数健康保障的受用者不为他们获得的医疗服务直接付费。

这里我们可以应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文章《为什么中间道路政策导致社会主义》。米塞斯采用了控制牛奶价格的例子。低于市场价格的控制导致短缺，这将强迫政府对牛奶生产者的采取成本控制；这种成本控制将鼓励政府把成本控制扩展到农业机器的供给者，于是过程不断进行下去。“这不再是资本主义；这是政府的全盘计划，这是社会主义”（Mises 1980[1952]: 24）。他的分析极其适用于美国的医疗保障方案，这种方案下美国医疗服务行业份额的增加受联邦政府的控制。国会已经考虑将制药纳入医疗保障方案之中。同时，市场经济学家急迫要求采用新的方略来恢复医疗体系中的市场激励，比如医疗储蓄账户（MSAs）和大额年度扣除条款，这些均可鼓励消费者慎入药店以及最小化不必要的求医。

对“失去控制的”资本主义的攻击

在这个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时代，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始终遭受着攻击。书店里满是诸如以下题目的流行著作：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岌岌可危的开放社会》，乔治·所罗斯（George Soros）著。

《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约翰·格雷（John Gray）著。

《反全球经济的事实》，杰里·曼德（Jerry Mander）和爱德华·戈德·史密斯（Edward Gold Smith）编。

《工作过度的美国人》，朱利耶·肖尔（Juliet B Schor）著。

《富裕的终结》，杰夫·马德里克（Jeffrey Madrick）著。

《经济学疯狂：增长驱动的资本主义如何吞噬美国的梦想》，罗杰·泰瑞（Roger Terry）著。

尽管这些作者多数不是专业经济学家，但是他们表达了对自由贸易、技术、跨国公司和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的忧虑，并且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出面协调新的全球环境中的不均衡。

另一方面，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则很少危言耸听而且对全球化的动态趋势很是乐观。他们相信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生的就业和商业的短期破坏将会在长期带来更好的工作和更有利可图的商业——以及每个人更高的生活标准。

经济学家们争论环境问题

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在环境问题上都持类似的态度，他们认为环境保护论者，如马尔萨斯主义者对于这个星球的前景过于悲观。当加里·贝克尔被问及这个全球“危机”时，他答道，“是的，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但是它肯定被夸大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补充说，“私人行业趋于减少污染。……但是没有现代技术的话，污染会更加严重。马带来的污染比汽车带来的污染更严重。……今天美国的大部分地区空气更加清新。”并且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声称，“总有将环境破坏归罪于资本主义的倾向，然而现在我们发现社会主义阵营的情况更糟”（Ravaioli 1995: 9-12, 32）。

环境保护主义已经成为大学校园里的流行话题，并且成为国会大厅里的重要议题。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在无污染空气、污染水和破坏环境的前提下，保持增长并提高人民生活标准呢？这个争论又回到马尔萨斯那里并且与历史上和当今对无限增长和有限资源的关注相关。在这场生态学的论辩中，经济学家，虽然不是危言耸听者，但在减少污染和解决其它环境问题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见第三章）为了解决“公共地的悲剧”，自由市场经

济学家强调需要建立对于水资源、渔业资源和森林资源的可保护的权力，以使其所有者能够在一个均衡方式下保护这些资源。在空气污染问题上，经济学家还建议收取排污费和可进行市场交易的排污许可。排污费就是按照排放污染物的比例来惩罚排污者的一种税收，在欧洲普遍实行。可交易许可允许排污者将他们的许可转售给其他企业，这种许可在美国已成功降低了污染率（Anderson and Leal 1991）。

全球货币体系：有解决方案吗？

经济健康增长的最大威胁可能就是不稳定的世界货币体系。现行的体系是由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44年帮助创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派生出来的杂乱无序的金融体系网络。每个国家都有独立的银行体系，其中包括不断变动的利率、通货、货币供给和银行管制。自从他们1971年放弃金本位制以来，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有了相当大的余地，但是金融秩序仍基于脆弱的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而这个体系取决于公众对政府保证货币事务秩序的能力的信心。在一个全球化的自由放任金融体系中，一个危机会很快导致另一个危机。迄今各个中央银行已经能够协调他们的援救力量，但是如果形式在某种情况下失去控制会发生什么？那将带来整个系统的瘫痪。

1954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写了一篇预测性文章，《为什么美国经济是萧条的证据》，该文基于他在瑞典发表的一次演讲。他辩称改进货币政策和联邦存款保险将会避免再次发生1929-32年那样的紧缩性崩溃（1968：72-96）。直至今日，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但是未来会怎样呢？世界可能不会再一次遭受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全球大萧条。但是，我们在欧洲、亚洲和美国仍不时经历严重的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这主要是各中央银行的主要干预主义做法的产物。那样的货币大灾难造成了很多经济困难并且引起对资本主义体制相当多的批评，纵然政府政策可能负有最终责任。

为了减少这些不稳定性风险，弗里德曼自己主张采取100%活期存款准备金制度，这实际上是在再次发生货币危机时排除银行运作。但是我们连接近100%准备金的制度都没有。

乔治亚大学的劳伦斯·怀特（Lawrence White）和乔治·塞尔林（George Selgin）领导的“自由银行”学派提出一个解决建议。他们在书和文章中论辩到对包括遍及全国的分支机构在内的银行体系撤销管制，将会确保一个稳定的货币结构，尽管在这个体系里，他们更乐于把黄金当作银行储备，但是这并不是其本质。他们的银行业自由放任方法有点令人惊恐：“没有政府控制交换媒介的数量。没有国家筹建的中央银行。没有进入、设立分支机构或者退出商业银行业的合法壁垒。……没有储备要求。……没有政府存款保证”（Selgin and White 1994：1718-19）。我们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看到这样一个体系。

当然，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倡导的弹性汇率、竞争通货和遍及全国的分支机构有助于减少世界货币危机的产生，并且金融市场成为了对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管理不当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约束。然而人们越来越担心，一种稳定的货币体系仍旧难以捉摸，而一场巨大的货币危机可能使世界从当代所经历的显著经济增长中脱轨而出。黄金已不再像在古典金本位制时那样是货币的后盾了，但是全球性金融恐慌会鼓励各国恢复使用这种“**野蛮的遗物**”吗？

回到亚当·斯密的观点

亚当·斯密提出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关键在于国家授予公民最大限度的自由使其能够在一个可容忍的司法体制下追求他们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自那以后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但是亚当·斯密的天然自由体系，自从他的《国富论》1776年出版以来，在每一代都遭受着挑战。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写，“自由是一株罕见且娇弱的植物”（1998：605）。今天亦不例外。

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观点跨过了英吉利海峡，在让-巴蒂斯特·萨伊、弗雷德里克·巴师夏和法国哲学家那里实现了最初的繁荣，但是不久我们的主人公就在最不可能的地方遭到攻击——来自他自己的英国学派。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把亚当·斯密的乐观世界彻底颠倒过来，变成了生存工资铁律的深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加入社会改革者的行列开始寻找所谓阴郁科学的一个乌托邦式替代品，然后，在自发方式未能出现时，不受控制的卡尔·马克思顺应时代潮流出现了，他使经济学陷入一个新的异化和阶级斗争的黑暗时代。

正当我们将要放弃我们几乎死掉的主角之时，三位乐善好施者（good Samaritans）挽救了亚当·斯密的生命——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和莱昂·瓦尔拉斯。边际革命恢复了斯密主义精神，并且在英国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美国的J·B·克拉克以及其他人的帮助下，斯密死而复生并被塑造成一位全新的古典主义者。尽管托尔斯坦·凡勃伦和其他制度主义者尽力批评资本主义，但是马科斯·韦伯等人有效地回击了这些批评。新古典

模型站得很高，已准备好在新的科学时代作出贡献。

在欧文·费雪、克努特·维克塞尔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不断寻找建立亚当·斯密大厦的理想货币标准时，新古典经济学在黄金时代仍继续面临着各种障碍，然而直到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使世界陷入现代最严重的萧条时，关于这个问题仍未达成任何共识。斯密又一次濒临死亡。马克思主义者在舞台的两侧正准备取而代之时，一位新医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给世界带来一剂新药。他建议用这剂药来拯救亚当·斯密并恢复其资本主义之父的地位。但是凯恩斯根本没有成为一个拯救者，而是成为了给病人开错药的灾难制造者。亚当·斯密的一位杰出的后继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用他的创造性正确地分析了困境的原因并且恢复了强调竞争资本主义的模型。

现实可能会变成什么样？

毫无疑问，马克思、凡勃伦、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其他批评者的大胆挑战都有其正面的效果——他们引起了市场经济学家的反应并且促进他们改进亚当·斯密建立起来的古典模型。杀害之举未成却使病人更强壮。今天新古典市场框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并且它的应用更是无处不在。

虽然如此，人们总是禁不住思量，在如下情况下经济还可能会取得多大进步：

- 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在20世纪使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遭到奴役并且陷入贫困；

- 如果凯恩斯主义者早一点认识到是政府的无能而不是私人企业导致了大萧条；

- 如果诸如保罗·萨缪尔森那样的教科书作者早一点引入古典经济学的正确原理（法律规则、节俭、平衡预算、有限政府、健全货币、自由贸易）；

- 如果发展经济学家反对愚蠢的国有化、进口替代、政府间国际援助和中央计划；

- 如果社会改革者将合理的经济原理应用于社会保障、卫生保健和贫困及福利体系。

经济思想者和政治领袖们转变极缓慢，并且我们已经承受了大政府的后果——增长缓慢、深度萧条、货币危机、广泛贫穷、冲突斗争和大量死亡。亚当·斯密是正确的：“一个国家里坏掉的东西多着呢”（Ross 1995：327）。

亚当·斯密的梦想：解决经济问题

人们总是禁不住想要知道如果经济学家和政府领袖们一直遵循亚当·斯密的天赋自由体系将会发生什么。毫无疑问，我们会避免大萧条这场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灾难，并且我们甚至可能避免两次世界大战。没人能告诉我经济增长率会是多少——甚至每年10%？——以及会有多少百万的处于共产主义者控制下和第三世界的人们免受饥饿和贫穷。事实上，我们甚至可能不会谈及“第三世界”，因为贫困不堪之地几十年以前大概就已消失。我们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地区将享有更多的财富；人民将作更有意义、充实的工作；以及会有充裕的闲暇去追求非物质目标。

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写过一篇乐观的文章，《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前景》。在严厉斥责他的门生们预言的无尽的萧条和永久的停滞之后，凯恩斯预见了一个光明的未来。他说，在下一个一百年里人类将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本形成解决其经济问题。商品和服务将会变得十分丰富且便宜，以致闲暇变成了成为最大的要求。在一个人的空闲时间能做什么生产性的事情呢？依据凯恩斯，资本将会变得非常便宜，甚至利率可能降至零。利率还未降至零，但我们的生活标准已有显著提高，至少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如此。凯恩斯总结说，“预见一种更长足进步的可能性将仍然不是愚蠢的”（Keynes 1963[1930]：365）。

未来无限

市场力量正在不断增强。凯恩斯主义范式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已经使“缓慢发展的社会主义”变成了“穷途末路的社会主义。”没有人能告诉我们通过扩大贸易、减少壁垒、放松管制、简化税收体系、**学校选择**、社会保障私有化、公正的司法体系和稳定的货币体系，世界生活标准将会达到多高。正如亚当·斯密所写，“使一个国家从最粗野的原始状态变成最富庶之地的不是别的，只是和平、轻税和可容忍的司法管理”（Danhert 1974：218）。

然而，坏的政策、社会主义思想和阶级仇恨消亡得很缓慢。除非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提高警惕，否则天赋自由和普遍繁荣将再一次受到威胁。

亚当·斯密的精神——和它的看不见的手和天赋自由的双生学说——在几个世纪的发展和贫穷中存活下来。这些学说数次死去而被放弃，但总能通过某种方式复活。“亚当·斯密建立的房屋”几乎完整了。尽管建筑构造偶尔很遭，还有些未经许可的建筑者恼人

This document was created by Unregistered Version of Word to PDF Converter

地乱搭胡盖，但是它的结构大有前途并且拥有某种动人之美。引用约翰·济慈(John Keats)的《希腊古瓮颂》，这也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自孩提时代一直喜欢的诗：

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that is all
Ye know on earth, and all ye need to know.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就包括
你们所知道、和该知道的一切。
——查良铮 译

“美是真，真即美，——这是你在世上洞察
所得，也是你必须知道的造化功。
——孙大雨 译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就已经包含
你们所知道、应知道的一切真谛。
——汪剑钊 译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你们只晓得
这么多，也只需晓得这么多。
——江冰华 译